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

第一輯



民族資本創辦和經營的工業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

第一輯

民族資本創辦和經營的工業

陈真、姚洛合編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一九五七年·北京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

第一辑

民族资本创办和经营的工业

陈真、姚裕合编

*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北京东总布胡同1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56号

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850×1168公厘·印张25 $\frac{1}{2}$ ·插页4·字数614,000

1957年11月第1版

1957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007,000~~^{3,813} 定价(9) 3.70元

书号4002·101

校对者：盛振翔等

編輯說明

本書內容着重介紹解放前有关中国近代工业的史料，虽然有少数选录的資料并不完全屬於工业範圍，但都是以工业为中心或者和工业有密切关系的。近代工业在中国的產生經歷了一百多年，牽涉的問題很多，本書只能就近代工业史的某些主要問題的材料加以整理介紹。为了便于讀者参考起見，全書按民族資本創辦和經營的工业、帝国主义对中国工矿业事业的侵略和垄断、清政府和国民党官僚資本創辦和垄断的工业、中国工业的特点、产量、結構和工业中的各个行业的概況以及中国工人階級的生活狀況等問題分为五輯陸續出版，每种書都附有目录，以备查考。

本書的資料来源大部分是摘自書报刊物，一部分摘自旧中国反动政府档案和有关部門或編者直接調查整理的材料。对于資料的处理与編排，一方面，凡是有用的資料尽量选入，并尽可能保持原文；另一方面，又注意到从相当数量的資料中整理出一点头緒，使其近似地反映中国近代工业的產生和发展的迂迴曲折过程的某些特点，因此，对于資料必需有所選擇，加以剪裁、加工和重新安排。

輯录的資料有些是全文登录，有些是摘录，凡是选录的都有注明，对于有些資料，并加以考証，改了一些錯字和加注按語，但因选輯的資料太多，遺漏的地方和考証按語做得不妥当的一定很多。由于尽量保持原文，勢必附帶地保存原文的觀點方法，而有不少文章在觀點和方法上是存在錯誤的，希望讀者參考时加以注意。

在本書出版之前，已有一些有关工业史的資料出版，本書在选材和編排方面尽量加以注意避免重复。由于掌握的資料不够充分，編者能力有限，錯誤和遺漏的地方一定不少，希望讀者批評指正。

本書在編輯过程中，得到刘义立、罗立业同志帮助收集一部分材料，吳駿揚和徐洪烈同志也為本書积累了相当材料，此外，本書在編輯过程中还得到許多同志提供了不少宝贵的意見，在这里謹向他們致以深切的感謝。

編者 1957年1月23日

目次

一、中国工业在各个时期的發展和衰落概况

1862年至1921年的中国工业	1
辛亥革命前民族資本創办的工厂統計	38
1920年以前中国近代工厂統計	54
1933年华商工厂統計	57
1930—1936年各年度工业概况	58
抗日战争爆发后民族工业的损失和被掠夺	78
抗日战争时期我国工业的损失統計	85
抗战爆发后工厂的内迁	87
抗日战争初期国民党統治区工业的变化	89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統治区工业和战前的比較	98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統治区工业大大落后于战前	107
淪陷区和台灣香港的民族工业	109
1. 淪陷后上海香港等地的工业和国民党統治区工业比較	109
2. 淪陷后上海的民族工业問題	110
3. 抗日战争时期上海等地淪陷区的民族工业的变化	116
4. 1939年河北、山东、山西、河南和江苏北部五省市华人經營的工厂統計	130
5. 1940年东北华人經營的工厂統計	130
6. 台灣工业統計	131
7. 殖民地化下的香港民族工业	134
抗日战争期中国国民党統治区民族工业的危机	143
抗日战争結束初期国民党統治区的工业狀況	161

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危机·····	165
甲 抗战结束初期的危机表现·····	165
乙 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官僚资本的掠夺是民族工业 危机形成的主要原因·····	167
丙 各地厂矿停闭情况·····	188
1947年国民党统治区工厂统计·····	208
1872—1921年的中国矿业·····	209
1912—1918年中国的近代矿业·····	227
民族工业集中的五种形式·····	230
附录：抗日战争时期民族资产阶级向国民党呼吁解决 困难文件·····	235
(1) 工业界之困难与期望·····	235
(2) 工业界关于协助政府安定物价之共同意见·····	242
(3) 后方工业界对目前紧急情势宣言·····	244

二、民族资本创办和经营的若干厂矿

1936年以前上海 238 家工厂主要创办人出身调查·····	247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区民族工业若干厂矿简表·····	257
河北、山东等地民族工业的资本来源·····	300
江浙财团的起源及其发展过程·····	308
中国资产阶级的分析·····	319
抗日战争前后上海若干民族资本集团的新旧组合·····	330
张季直和他创办的企业·····	348
申新、福新、茂新公司所属企业·····	372
聶云台和他经营的工业·····	397
刘鸿生和他的企业·····	402
宋偉臣和他经营的工业·····	417
永安公司的事业系统·····	422
盧作孚和民生实业公司·····	430

周星棠和他所屬的企业	446
薛明劍和他的企业	450
穆藕初創辦棉紡事业略史	453
燕湖中一紗厂	457
恒源紗厂	459
景綸、景福衫袜厂	461
三友实业社	467
美亞織綢公司	469
孙多森和他的面粉工业	474
天津存丰面粉公司	477
天津福星面粉公司	480
复兴面粉公司的創設	482
張裕酿酒公司	487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	489
馬玉山和他的制糖公司	502
洗冠生和他的冠生园食品公司	510
范旭东和他的化工事业	513
吳蘊初和他的化工事业	521
中国化学工业社	530
家庭工业社	534
五洲大葯房	538
信誼化学制葯厂	541
新亞化学制葯厂和他的事业系統	544
丹华火柴公司	550
龙章造紙厂	553
民丰和华丰造紙厂	555
中国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559
江南水泥厂	564
童世亨和他的鑄丰搪瓷厂	566

大中华橡膠厂	569
商务印書館	573
中华書局	580
世界書局	584
中国标准鉛笔厂	588
淪鑫鋼鐵厂	591
周恒順机器厂	593
大隆机器鉄工厂	595
华丰机器厂	597
新民机器厂	606
楊济川和他的华生电器制造厂	603
中国亞浦尔电器厂	612
康元制罐厂	615
尹致中及其經營的制針制釘事业	618
上海华商电气公司	619
上海閘北水电公司	622
广州电力公司	626
成都电灯公司	630
長兴煤矿	632
峰峰煤矿	635
附录:上海、天津等地工商业团体簡介	638

三、利潤和剩余价值

抗日战争前民族工业利潤率的一个計算	649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統治区工业利潤	656
工厂的若干行业历年利率統計	659
若干工厂利潤分配举例	685
若干厂矿剩余价值率試算表	689
层层被剝削下的錫矿工人	698

門头溝煤矿工人所受的剝削·····	704
附录：若干工厂成本計算資料·····	707

四、捐稅、運費給予民族工业的負担

上海絲厂請国民党减免捐稅电·····	712
封建割据剝削下的四川蚕絲业·····	714
抗日战争前棉紡織业負担的捐稅和運費·····	715
山东火柴业因捐稅負担过重向当地政府請願·····	718
陶瓷业負担的捐稅年年加重·····	720
上海机制面粉业請国民党减免麦粉特稅呈文·····	722
天津面粉厂因軍閥混战影响捐稅負担过重紛紛停业·····	726
四川制糖业負担的各种捐稅·····	728
烟酒联合会向北洋軍閥政府請願减稅原文·····	730
国民党卷煙稅有利于洋商不利于华商烟厂·····	732
上海总商会等四团体电請国民党政府改变卷煙稅率·····	733
繁重的鹽稅負担·····	735
煤矿业負担的各种捐稅·····	736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統治区工商业界負担的繁重捐稅·····	738
临近解放前石家庄立元荣鉄工厂的捐稅負担·····	740
华商煤炭運費較矿山成本尤高·····	741
運費桎梏下的山西煤矿·····	742
重庆工商业团体呈請减低輪船運費·····	748
抗日战争时期运输工具使用的不合理·····	750
附录：棉紡織业呈請国民党政府制止紗布交易所投机 原文·····	751

五、銀行錢庄与民族工业

我国銀行与工业·····	753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統治区民营商业行庄放款的分析·····	779

抗日戰爭以來國民黨四聯總處各項貸款統計	782
工業貸款杯水車薪無濟於事	783
1948年上半年國民黨各行局貸款按官營民營分類比較表	784
官營與民營各得的貸款額相差太懸殊	785
抗日戰爭前和抗戰期間四川商業銀行放款利率	787
抗日戰爭前紡織業負擔的利息高達一分以上	788
抗日戰爭結束後的高利率	789
國民黨四聯總處各種放款利率比較表	791
銀行貸款的形形色色利率	792
官辦銀行貸款目的是為了控制民族工業	793
若干商辦和官商合辦銀行對民族工業的投資	794
1.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及其在工業方面的投資	794
2. 浙江實業銀行及其在工業方面的投資	797
3. 浙江興業銀行及其在工業方面的投資	798
4. 新華商業儲蓄銀行及其在工業方面的投資	801
5. 四明商業儲蓄銀行及其在工業方面的投資	804
6. 中國實業銀行在工業方面的投資	805
7. 聚興誠銀行及其投資事業	807
8. 四川美豐銀行及其投資事業	808
若干廠礦主在銀行的兼職	811

一、中国工业在各个时期的 发展和衰落概况

1862年至1921年的中国工业

(编者按：本文原载申报馆编辑1923年2月出版的“最近之五十年”，题为“五十年来中国之工业”。本文作者站在民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对某些问题的认识是不正确的，如认为不摧毁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制度，只要改进工业的组织和技术就可以发展民族工业；称太平天国革命为“洪杨之乱”、称汉奸曾国藩李鸿章等为“中兴名臣”、称义和团的反帝运动为“拳匪之乱”等等。但本文对近代工业发展的情况，提供了比较系统的和有参考价值的资料，故特转载于此。文中有一些统计数字不精确，工业时期分类也有问题，但为保存作者原意，仍照录于此。)

(一) 緒 言

嘗中国者，每謂中国为世界最古最大之农业国，中国人亦往往以此自豪，以为4千年来既以农立国矣，則居今日而言富强中国，其惟振兴农业乎！若工业則本非我所長，固不妨取諸他人也。然而一覽吾国历年对外貿易統計，則吾国每年商业上之最大漏卮即为工业品之輸入，举出口农业品之全額不足相抵也。光緒2年至民国9年，四十五年中吾国出口貨較进口貨總3,207兆兩(3,206,874,570海关兩)之巨，其中工业品約占进口貨65%。是四十五年来，吾人因工业不振，为外人所吸收之金錢，已达2,100兆兩。以其半数，已足偿全国之政治外債。(民国5年末中国之外債总額为1,108兆77万元)以45年平均

之，每年之金錢損失約 4,650 萬元，以之贖還膠濟路，所差不過 350 萬元。若以最近 10 年之統計平均，則一年因工業品所輸出之金錢足贖還兩膠濟路。此僅就進出兩抵不足之數言之也，若以每年進口工業品之全額計，且八九倍于上述之數。工業不振之影響不可謂不巨矣。夫農非不當重也，無工商為之輔，終難獨勝。故今之強國三者并進，不肯以一得自足。美，農國也，南北戰爭以後，努力工業，獎勵發明，卒為世界第一製造國。英，工業國也，19 世紀以來，提倡農業不遺余力，三島之土地有限，則注其全力于各屬地，今印度之茶，非洲之棉，皆于世界市場占重要之位置，其功效可見。歐戰以後，此風益甚，平時仰給外貨者，皆知一旦戰事發生，必受來源斷絕之困，爭師德人故智，各業并重，以謀自衛。故歐戰以前，各國之實業趨重國際分工；歐戰以後，皆趨重閉關自給。吾國之農遠不如美，而工業品之需要則相伯仲，國際貿易仰給于人之處尤視英美為多，則居今而欲不興工業，其可得乎！

中國數千年來閉關自足，不知海外尚有世界。明清之交，印度航路發見後，中西始有國際交通。道光之交，鴉片戰爭起，英法聯軍入京，為中國受創外力之始，亦為外商勢力膨脹之起點。自是而後，列強之武力侵掠與經濟侵掠并進，中國兵戰失敗以後，繼之以商戰失敗。就出入口貿易統計言之，彼所取諸吾者大抵原料，而所供給于吾者多為製造品。故所謂商戰失敗者，實為工戰失敗也。咸同之交，西人機械始為吾人所重視，當時士大夫每謂中國長于形而上之學，西人所精者形而下之術而已。彼時已自知工業不如西人，其覺悟不可謂不早，然而 50 年來工業之進化幾何？外貨之輸入既日增而未已，固有之絲茶市場，復為印度日本所攘奪，處今日之機力世界，而全國所用之馬力數竟不及英美一中等工業城，其事誠可恥，其原因更不可不知。

本篇所論事實，由同治元年起，至民國 10 年止，實包括新工業誕生發展以迄今日之全史。然以月余之力，搜羅 60 年之史料，其事已屬甚難。蓋以國人向不重視工業，竟無專書可供參考，篇中材料，僅就力所能得之書編摘。中間復因病肺咯血，時作時輟，漏誤之處知必甚

多，改正補遺，惟有俟諸異日矣。旧工业記載尤少，原有規模洪揚亂復迄未恢復，零星破碎，至不易為綜括之論，今于工业統計中擇其重要者言之，旧工业之大勢可得而見焉。

(二) 新工业之进化时期

中国新工业虽进化于近50年間，然其发源則在同治初年。故言新工业史者皆自同治初始。为便利研究計，此60年可区分为数大时期，以見时代之变迁与进化之趋势。中外作者于分期段落大同小异，今摘录許衍灼君与日人安原美佐雄及东亚同文会所編“中国的工业”中所分时期如下：

	許衍灼（見“中国工艺沿革史略”）	安原美佐雄（見“中国之工业与原料”）	“中国的工业”	每期包括年数
第一期	官督商办时代 同治元年至光緒20年	同左 同左	同左 同左	33年
第二期	外人兴业时代 光緒21年至29年	同左 同左	同左 同左	9年
第三期	国人兴业时代 光緒30年至宣統3年	利权收回时代 光緒31年至宣統3年	同左 光緒29年至民国元年	7年
第四期		自觉的发展期 革命以后	国货維持时代 民国元年未至現在	10年

以上三書所分时期大致相同，惟名称略异耳。第四时期所包括之年数因作書之迟早不同，遂各异。然皆从民国元年起至作書之时止。若引伸至今日所括皆十年也。就每期所括年数觀之，第一期失之过長，其名称亦太籠統，今改为兩期。其他时期名称亦略有增改，共得五时期如下：

第一期	軍用工业时期	由同治元年至光緒7年	約20年
第二期	官督商办时期	由光緒8年至20年	約13年
第三期	外人兴业时期	由光緒21年至28年	約8年
第四期	政府獎勵及利权收回时期	由光緒29年至宣統3年	約9年
第五期	自动发展时期	由民国元年至10年	約10年

軍用工業時期 西人機械流入中土，最早者為天文儀器之類，明以前已有之。明代西教士如利瑪竇湯若望輩，皆能自制儀器，其精巧往往為朝野所嘆賞。然以其與國計民生無關，見者多以淫巧忽之，故仿造之心不生。及洪楊之役，兩軍皆有西人參戰，所謂洋槍隊者始出現於中國之戰場，而西人機械之利乃大彰。當時為清室盡力者，如美之華爾，法之買忒勒，英之戈登輩，皆以善用西式槍炮輪船見重於當局。中興諸臣目擊西器之制勝，遂有仿造軍艦軍器之舉，此所以光緒年間提倡新工業最力之大吏，皆為中興名臣也。鴉片之戰，英法聯軍入京，中國軍隊當之輒敗，長驅直入，如過無人之境，政府於創痛之余，知受辱之故實由軍器陳舊，痛定思痛，遂有大興西式軍工之決心。同末光初，疆吏朝臣凡章奏舉辦軍工者，多以國耻為言，可見當時君臣之心理也。故中國之新工業濫觴於軍工，軍工所以勃興之故，則由於：一、洪楊之役得西人槍炮兵輪之益；二、鴉片之戰受西人槍炮兵輪之禍。軍用工業時期最長，由同治元年至光緒7年，凡20年。今日國內規模偉大之兵工廠造船廠多成於此20年內。擇其要者言之，如同治4年曾國藩設江南造船廠，5年左宗棠設福州船政局，8年李鴻章設江南製造局，光緒3年丁寶楨設四川兵工廠，皆為國內重要之軍用工廠。此時期中之新政，如曾國藩李鴻章之遣送幼童出洋，李之開設天津水師學堂，皆以造就軍工人材為目的，當時朝野絕少注意於製造商品之工業。惟李鴻章奏設江南製造局折中，有“數十年後，農賈必有仿造洋機以求利益者”之語，薛福成治平六策奏疏中有獎勵制器造船兩條，其眼光不可謂不遠矣。軍用工業雖為新工業之先進，然其成效之劣則遠出始創者意料之外。中法戰爭中日戰爭中國既屢戰屢敗，庚子之亂復受八國聯軍入京之奇辱，卒致國耻未雪而反日增，終且習慣而成自然，亦大可悲矣！推原其故，則效法不徹底誤之也。製造軍器輪船，豈僅僅購西人機器，用西人工程師，訓練若干中國工頭工人，而以總辦大權委之不學無術之官僚所能收效？必同時講求基本之科學與工程原理，造就獨立之製造人材，乃可推陳出新，應變不窮，此豈當時官吏所知，即今日之官吏恐亦未足語此也。雖然，中國

之兵工厂雪外耻则不足，助内争则有余，今日直奉之徒方各拥其兵工厂以自豪，此又曾左诸人始料所不及矣。

官督商办时期 由光緒8年至20年之13年間为官督商办工业时期，以光緒8年始者。是年李鴻章奏請在上海試办机器織布局，其出品只完上海海关正稅一道，內地厘稅一概免除，实开官办工业之先河，立国貨免稅之創例。虽机器織布局至光緒16年始实行籌备，19年厂毀于火，卒未成立，在新工业进化史上要为空前之举，李氏之功不可沒也。官办工业，前乎此者尚有左宗棠在甘肃設立之織呢机器厂（光緒4年），惟时期略早，甘肃又地处边僻，故影响甚小，談新工业者几不知有此事。若論創辦商品工业，終当推左为第一人。此时期中之工业，其始大都为官办，繼因成績失敗，漸改为官督商办。改为商办之期，大抵在光緒20年以后。官办工业之功臣，李鴻章而外，当推張之洞，李所发起之实业，以航业（招商局）电报（北洋电报局）为最重要。制造工业仅有織布局。張則在粵在鄂皆銳意提倡織布煉鉄，汉阳之鉄政局，武昌之織布紡織制麻繅絲四局，規模之大，計劃之周，数十年后未有能步其后尘者。惜夫所用非人，不能兴利，反为外資輸入之阶，亦中国新工业之大不幸也。本时期中有官商合办之工业，如上海道唐松岩所設之机器紡紗局；有原拟官督商办，終因款絀改为完全商办者，如盛宣怀所发起之华盛紗厂；亦有純粹由商人自办者，如祝大椿所設之上海源昌机器五金厂。然大多数之工厂則皆官吏主动也。

官督商办之工业几乎无不失敗，即其变相之商办工厂，因官习未除亦百弊叢生，鮮克生利。其失敗之原因有二：一、信任官紳万能，不重專門人材；二、依賴外人过甚，工程大权遂为外人所專攬。其人大率为工头之流，月得多金，远过其在本国之享用，遂百計謀把持其地位，其后中国虽有相当人材，亦不能取而代之矣。某鉄厂煉鋼工头，至今尚用比人，其例也。

外人兴業时期 由光緒21年至28年，为外人兴業时期，亦为华商觉悟时期。中日战争以21年終，中国政府既賠償日本战費2万万兩，更

被迫締結馬关条約(亦曰下关条約)，許外人以在中国通商口岸設工厂权，一时外商工厂紛起，如日商之东华公司，英商之怡和、老公茂、鴻源(現为日人購去改为日华紡織会社第二厂)、德商之瑞記(后改东方)等紗厂相繼成立，树上海紗业之先声，亦为外人在中国經營工业之起点。臥榻之側他人酣睡之声既起，中国商人亦漸悟利权之不可放弃，有起而集股开厂者矣。20年官督商办时期所提倡不起之工业奋斗精神，至是受外人之猛击而醒。苏州之苏綸(今由宝通公司租办)、上海之大純及裕源(民国7年为日商收买改为内外棉株式会社第九厂)、与无錫之业勤(今由福成公司租办)等紗厂皆为中国紗业之先进，亦新工业之前导也。此时清政府以战敗之余，一籌莫展，百政俱非。朝臣有主張鼓励制造以求富强者(如李端棻之奏設仪器院)，有謂西法不能制胜，归罪于学堂制造局等之无用，而主張一律裁撤者(如管廷献之奏議)；亦有以战敗归罪于官办船机等局之办理不善，而主張招商承办者(如褚成博之奏議)。群喙紛紜，政府对于振兴工业遂无一定之計劃。湖北之汉阳鉄厂竟于次年(22年)由盛宣怀組織公司改归商办，張之洞之奏議虽以官办不經濟为言，当时朝論对官办工业多抱怀疑态度，亦其原因之一也。然張氏提倡工业之志未尝因之稍挫，由鄂至苏，則移在鄂所訂購之紡紗机于苏，以謀振兴苏之紗业；至鄂复設工业学堂劝工劝商兩公所，又在汉口上海設商务局，联络工商，講求制造。此时期中疆吏之能知工业重要，而以全力提倡者，張氏当首屈一指矣。

此时期中有一最足紀念之事，即南通大生紗厂与上海商务印書館皆于此时期中成立也。大生創議于21年，开办于24年，所用紡机即为鄂督移苏之物，集股管理皆由張謇一手成之，为南通新事业之基础，中国工业能直接造福社会者，自大生紗厂始。張氏締造經營之艰难，詳載其所著經理大生紗厂12年之历史，工业史中至可宝贵之文字也。商务印書館成立于23年，由夏粹芳鮑咸恩鮑咸昌高鳳池等創辦，其始規模甚小，二年后燬于火。29年中日合資重兴，复得張元济加入經理，营业大发达。32年在农工商部注册，为純粹中国公司，复將日

股完全收回，自此一日千里，執中國印書業之牛耳，誠中國實業界之好模範也。有人以該館曾用日資為病，不知中日合辦之實業甚多，能如該館之出淤泥而不染，卒收回自辦者，何可多得。此正該館不可及之處也。

政府獎勵工業政策，此時期之中叶已開其端。24年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定獎勵新學新法章程，凡發明軍用船械者頒特賞，專利50年；發明日用新器者，給工部郎中實職，專利30年；仿造西器之制法未傳入中土者，給工部主事職，專利10年。當時朝野見通商口岸外人工廠日漸增多，知經濟亡國之禍日迫，非提倡國內工業不足抵制，所謂“洋商改造土貨”之恐慌即指此也。獎勵新法章程實為此時期外商勢力膨脹之反響。今則外人工廠方日增而未已，國人亦司空見慣，視若無睹矣！

政府獎勵及利權收回時期 由光緒29年至宣統3年，為中國政府獎勵工業最力之時代。中日戰爭之後，繼以庚子事件，聯軍入京，清政府武力復仇之念至此殆完全絕望。同時復增加日本賠款2億萬元，與列國賠款4億5千萬兩之負擔，此時之中國不特國威扫地，經濟亦瀕于破產矣。而外人工商侵略之勢力復深入中國之腹心，政府至是始憬然大悟，盡棄舊日練兵之主張，而注全力于振興工商業。振貝子(載振)遂於是時被遣至歐美日本考察實業，既歸，力言東西各國振興實業之利及獎勵之法。光緒29年7月政府遂有商部之設(32年改為農工商部)，以載振為尚書，陳璧、伍廷芳為左右侍郎，奏定商律及公司註冊章程。一時官吏提倡于上，紳商響應于下，收回權利之聲洋溢國內。風起雲湧，朝野咸有振作之精神。31年因美國禁止華工，復有抵制美貨之舉，提倡國貨之心，因以益堅。此時中國之實業，如紅日初升，前途希望正復無窮。此時期中之重要提倡事業，如31年袁世凱在天津設工藝總局，商部在京師設勸工陳列所，及奏設各省高等實業學堂；32年商部奏訂獎給商勛章程，鼓勵製造新器，學部考驗游學生設工商科進士學位；33年農工商部奏定華商辦理實業爵賞章程，辦1,000萬元以上之實業者賞男爵，2,000萬元以上者賞子爵；宣統2

年端方在南京举行南洋劝业会皆为60年内仅见之盛举。中兴名臣曾国藩仅赏侯爵，李鸿章不过伯爵，其余百战功臣竟有望男爵而不可得者，今乃以子男等爵奖励创办实业之工商，一扫数千年贱商之陋习，斯诚稀世之创举。吾人于此不得不叹当时清廷望治之切也。即以南洋劝业会而论，规模宏大，收罗精备，为远东诸博览会之冠。今之巡阅使日言爱国，有以劝业为心如端方其人者乎？江河日下，亦可慨矣！

自动发展时期 由民国元年至10年，政争兵乱，无年无之，举清末奖励实业政策之成绩尽破坏之，而无以为继。各省军人官吏不特不能提倡保护其省内之实业，且加之以剝削摧残；兵匪劫掠，官吏敲詐，几乎相习成风。受之者亦视同不可倖免之天灾。故就政府对待实业之态度与影响言，60年中清末之9年为黄金时代，而民初之10年为黑暗时代。此由当局者有贤不肖之分，与国体无关。吾人虽酷爱共和，无所用其諱也。幸而欧战发生，欧美之商品来源断绝，其人从事远东商业者，亦皆归国从戎；日货又以二十一条之要求，而受国人之抵制。于是吾国工业乃得千载难逢之自动发展机会。试就进出口统计观之，民国2年(1913年)进口货总额为5万7千余万两，次年为5万6千9百余万两，已因欧战而略减。至民国4年(1915年)竟跌至4万5千余万两，约减1/5。终欧战之期，未复民2之旧额。出口货民2总额为4万零3百万两，次年因欧战初起，跌至3万5千6百万两。以后即逐年增加，终欧战之期，皆超过民2之旧额。当此时期，国内之需求既未尝减少，则供给国内市场之缺乏，与应付出口货之增加，当胥赖本国之工业。宜乎此时国内实业之进步一日千里也。故民3至民7之5年中，注册工厂成立者亦较他时期为多。此诚天与之机，使果上下一心，并力赴之，未尝不可如日本之坐收渔人之利；无如自甘暴弃，二次革命后继之以袁氏称帝，皖直交锋，民无宁日，安有生息教养之暇。惟少许通商口岸之工业，借外人之庇荫，尚得自由发展，略沾欧战之余润。然视日本因欧战造成之百万富翁以千百计者，相去不可以道里计矣。欧战既终，险象即生。九、十两年实为中国工业恐慌时代。铁厂积货如山，无人过问，至于闭炉停机，纱厂结账

大多无利。上海数十年之三大油厂竟同年倒閉，其他工业亦皆消沉；因欧战致富之实业家，营业失敗重入漩渦者，乃时有所聞。吾国工业因参战所得之利，能永久存在不为曇花一現者，窃恐甚少也。試就9年对外貿易統計言之，入口較上年增1/6，为60年中最高之額；而出口反較上年少1/6。一消一長，絕非偶然。起衰制胜，是在吾国之工业家，記者窃願所言不中也。

本期中政府对于工业之設施，舍少許官制变更外，竟无政策可言。民3張謇長农商部时，宣布其棉鉄政策，定工业保息費章程，提倡制造，拟以2,000万元为基金。当时耳目一新，頗有朝气。未几張氏因袁图謀帝制去职，棉鉄政策亦成陈迹。民5因袁氏帝制將成，欲有以見好于国民，故虽当政府財政困难之际，預算中竟列商工业振兴資金1,500万元。云南起义，袁未帝而死，所謂振兴工商业資金者，亦与帝制同灭。繼任之执政者，并此紙上空談之預算，亦不可复聞矣。民間之提倡事业，惟民10上海总商会設立之商品陈列所，設備收罗皆为国中所仅見，虽不能如南洋劝业会之規模博大，然一为官办，一出商力，一供短期觀覽，一备随时参考，性質既异，自不可同日語也。

(三) 新工业之統計

工业統計为工业之数量的历史。欲研究最近50年中国工业之盛衰，自不可不知其統計。惜乎吾国統計事业尙在幼稚时代，政府所刊惟农商統計，仅出至第五次，調查手續又不完备，不足据为信史。实业界自刊者惟紗业尙有全国紗厂一覽表。此外間有見者，大都散見書报。外人所刊者有英文之“中国年鉴”已出至1922年，与日人之“中国年鉴”，仅出至第三回。收罗宏备，日人之年鉴似胜英文，惟关于工业者仍多轉鈔农商統計。外人論中国工业之書，亦以日人所著为詳尽，如“中国之工业”“最近中国經濟”(善生永助著)“中国之工业与原料”及“中国經濟大全”等書，其收罗宏博，西人固不能及，即中国人自知亦不如远甚。至求50年之統計，則惟海关报告中进出口統計可

略窺50年來工業之盛衰。今惟擇其重要言之，為篇幅所限也。溫故知新，察往知來，欲求工業之進步，必研究過去之統計而得其成敗之因，此理明甚。甚願吾國實業團體早着手此事，勿使日人越俎代庖也。

工廠設立年別 是最能代表新工業之盛衰者，莫如每年設立之工廠數。惟此種統計，欲求全國無遺，亦殊難得。至註冊工廠，則以農商部有詳錄，故甚可信，今分錄如下：（見第一表）

第一表 全國工廠成立年別

年 別	全國工廠數	民國五年存在之 全國工廠	註冊工廠	註冊公司 總 數
1903年以前	12,415	7,390	24	1
1904	1,166	794	9	8
1905	442	336	18	47
1906	631	489	35	65
1907	423	420	36	49
1908	513	458	23	55
1909	1,646	1,134	26	61
1910	1,203	849	26	74
1911	821	657	18	35
1912	2,001	1,282	17	10
1913	1,249	1,019	37	23
1914	1,027	891	37	85
1915	672	672	50	99
1916	556	558	33	98
1917			34	80
1918			29	88
1919			23	122
1920				167
總 計	24,765	16,957 ^①	475	1,167

表中第一行之全國工廠成立年別，乃就民國元年農商統計，參加

① 將歷年創設至民國5年尚存在的工廠數加起來，與此總數不符。農商統計表原表如此。

以后4年之每年新工厂数，并改正以前之矛盾处编成，元年以前关闭之厂数皆不在内。第二行为民国5年存在工厂之成立年别，其总数为13,957家，以与民元之总数24,765家按，是5年之中关闭之厂为数乃至7,808家，平均每年约1,580家，远过每年成立之新厂数。使此效果确，则中国之工业死亡率（即每年每千厂中关闭之数）必大。惟农商统计中矛盾之处甚多，例如民元之工厂中成立于光绪30年者，数凡1,039，至民2反增至1,166，绝无已死之厂复活之理，必为民元调查未周无疑。故上述之统计仅可供参考之用，未足据为定论也。表中第三行为每年注册工厂数，第四行为每年注册公司总数，其趋势可观第一图（图略）。光绪21年至28年为外人兴业时期，每年之厂数甚少。29年至宣统3年为工业发达之第一峰，盛于32及33年，至34年稍衰，殆受光绪母子逝世之影响。宣元复有兴起之象，至宣3民元复衰，辛亥革命之反响也。政府奖励时期至此告终，乃入工业发达之第二峰，是为自动发展时代。以前两时期工厂数与注册公司总数弧起落大致相应，即工业盛衰与全国实业之盛衰，其趋势大致相同，至自动发展时期情形乃略异，工业极盛于民4（欧战之第二年），而衰于民7（欧战停止之年），全国公司注册盛于民4-民5，至民8民9乃大盛，几倍于寻常之数，与工业完全背驰，此即全国若狂交易所信托公司风起云涌之时也。其结果遂成民国10年之经济恐慌，工业衰落。徒兴投机商业之不可恃，亦可可见矣。

第二表示注册工厂分类设立年别，此为农商统计与各书所无。今从“远东时报”1921年10月所出之“中国工业公司”增刊中摘编。第一表之注册工厂数即由此表得来。原书中同一工厂设立年别有重出而两歧者，虽加选择，苦乏参考，或与农商部之记载小有出入，工业名称由英文翻译，亦恐与他书不能尽同，读者会意可耳。

第三表示全国注册工厂种类分期比较，从“中国的工业与原料”（安原美佐雄著）中摘编。原表分三部，今合为一表。凡有银两者悉依农商统计例以库平银6钱6分7厘折成银元。表中不尽为工业公司，如表末之交通与矿业，固不在本篇范围之内，杂业中所含何业更不可

第二表 注册工厂分类设立年别

年份	1951	1952	1953	1954	1955	1956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1962	1963	1964	1965	1966	1967	1968	1969	1970	1971	1972	1973	1974	1975	1976	1977	1978	1979	1980	总数
印刷及文具	1																														18
纺织、肥皂																															23
糖																															2
炼铁																															10
碾米、米粉																															13
面粉																															62
造纸																															7
榨油																															15
瓦器																															8
磁器																															9
玻璃																															4
石灰、水泥																															4
革																															7
棉、纺织染																															80

知，惟所分时期甚便比較，故录之。第一期由光緒29年至34年，为政府獎勵时期之极盛时代；第二期民2至民4为自动发展时期初盛时代；第三期为同时期之极盛时代。第三期每年平均公司数3倍于第二期，第二期又兩倍第一期，其增加之速可見。惟每期各厂平均資本，反以第一期为最大，虽汉冶萍公司一家（鉄工中）之数占2,000万元，足令平均数加高，然即去此数，仍較他期为多也。（約25万元）

第三表 注册工厂种类分期比較表①

类 别	1903—1908年 (共6年)		1913—1915年 (共3年)		1916—1918年 (共3年)	
	公司数	資 本 (千元)	公司数	資 本 (千元)	公司数	資 本 (千元)
生 絲 紡 織	5	1,085	1	50	5	882
棉 紡 織	24	9,266	18	8,050.4	17	17,320
面 粉	12	2,320	17	1,684	17	2,850
陶 瓷	11	1,850				
烟 草	11	810			2	90
电 米 业	5	845			1	50
电 油 业	7	4,150	12	1,663	22	3,512
糖 肥 皂、蠟	9	1,610	2	170	3	365
火 燭	6	98			5	274
玻 璃	3	629.5	13	397	9	655
鉄 工	2	1,120				
罐 制	2	20,525			1	1,400
炭 酸			3	442	2	320
印 制			1	170		
煉 糖			1	110		
制 紙			4	1,024		
制 糖			1	30	1	20
制 紙			1	280	1	30
制 紙					1	110
制 紙					1	200
制 紙					1	50
自 建					2	1,440
交 通	6	1,665			1	700
矿 业			16	502.9	7	1,625
杂 业			3	145	4	700
总 数	24	2,111	31	9,705.4	20	927
本 期 平 均 每 年	127	51,219.8	124	24,421	374	74,633
本 期 平 均 每 公 司	21.1	405	41.3	196	124.6	199

① 本表統計数字，各类与总数有不符合处，因一时无原材料核对，故仍保持原状。

期中繼續发展之业有五，而速率各不同，茲分述于第四表。絲电及火柴 3 业資本在第一期最大，大都官商合办，故資本雄厚；第二、三期厂数虽增，資本反减少。易言之，即小厂增多也。棉业进步最速，資本亦增加甚多。面粉次之。

第四表 五种注册工业分期比較

业 别	第一 期		第二 期		第三 期	
	每年平均 公司 数	每公司平均 資本(千元)	每年平均 公司 数	每公司平均 資本(千元)	每年平均 公司 数	每公司平均 資本(千元)
生 絲 紡 織	$\frac{5}{6}$	217.5	$\frac{1}{3}$	50	1.67	176.5
棉 紡 織 染	4	385	6	448	5.67	1,018
面 粉	2	194	5.67	99.3	5.67	168
电 业	1.17	590	4	139	7.35	160
火 柴	0.5	209.8	4.33	30.5	3	73

工厂內容比較 工厂內容統計惟农商統計中有之。然元年以前 5 年以后皆不可得。政府社会日言提倡工业，并此而不注意，其效可知矣。第五表示全国工业动力情形，5 年調查不全，故不能代表全国。大概言之，用原动力之厂数逐年加增，不用原动力之厂数則增减甚微。注册之工厂类皆属于用原动力，盖資本較多也。动力机关与馬力数亦逐年增加，然較之他国尚不逮远甚。5 年之机关数(即机械——編

第五表 历年工厂动力比較①

		1912年	1913年	1914年	1915年	1916年
工場 数	原动力使用	363	347	360	488	490
	不用原动力	20,386	21,366	19,992	20,258	16,467
	合 計	20,749	21,713	20,352	20,746	16,957
蒸 机	机 械 数	379	296	357	353	642
	馬 力	20,351	43,448	55,120	53,697	87,746
电 机	机 械 数	144	146	332	261	318
	馬 力	2,853	20,198	12,153	16,105	17,269
其 它	机 械 数	214	212	476	381	1,070
	馬 力	1,340	2,220	9,092	12,277	6,837
煤炭消耗額		557,833	900,959	2,337,745	1,206,322	2,461,833

① 原文“机关数”一律改为“机械数”。

第六表 各省动力状况及职工数 (1915年)

省 别	工 场 数			煤炭消费额(吨)	男女职工数
	动力使用	不用动力	合 計		
京 兆	6	216	222	6,135	6,483
直 隶	26	2,241	2,267	10,162	43,183
奉 天	24	759	783	80,806	12,908
吉 林	6	631	637	22,719	10,911
黑 龙 江	—	276	276	21,646	3,751
山 东	121	815	936	15,886	24,774
河 南	3	839	842	4,941	14,891
山 西	1	1,293	1,294	50,680	14,047
江 苏	149	1,139	1,288	122,039	142,678
安 徽	—	386	386	6,096	24,680
江 西	—	1,610	1,610	286,169	60,802
福 建	—	1,129	1,129	—	23,095
浙 江	13	2,488	2,501	121,663	73,739
湖 北	17	515	532	38,051	36,790
湖 南	6	680	686	260	22,661
陕 西	—	465	465	3,049	5,058
甘 肃	—	234	234	1,016	2,329
新 疆	—	31	31	—	417
四 川	4	1,951	1,955	184,092	38,201
广 东	101	755	856	1,938,326	54,181
广 西	—	74	74	—	953
云 南	—	—	—	—	—
贵 州	—	17	17	41,420	606
热 河	1	172	173	5,231	1,586
察 哈 尔	—	127	127	182,412	1,001
合 計	478	19,321	19,321	1,204,582 ^①	649,725

① 將各省煤炭消费额加起来,与此总数不符。农商统计表原表如此。

者),为 2,030, 馬力总数为 111,851。上海圣約翰大学社会学教授呂馬(C.F.REMER)謂全国用动力厂之資本不及美国辟支堡一城之大,其言殊不易証实,此类統計尙不可得,惟以馬力言,美国一納割雷瀑布現在已用之馬力数已在28万左右,足供全中国之需要兩倍有余矣。

第六表示各省动力狀況及职工数。不用动力之厂以浙江为第一,直隶四川江西次之,手工业发达之区也;用动力之厂江苏第一,山东广东次之,用机工业发达之区也。职工之数江苏最多,浙江广东次之,为吾国工业最盛之省。第八表示各省注册工厂分类比較,江苏几乎每类皆占多数,直隶浙江广东次之。未附資本比較,仍由远东时报工业公司增刊中,分类計算得之,仅供参考,恐与部中記載未必尽合。大抵注册公司最多之省,其注册工厂之数亦最多。工业与其他实业之关系,固如是其密切也。

第七表 工厂种类逐年比較

业 别	1912年	1913年	1914年	1915年	1916年
織 染 工 場	4,150	4,642	4,273	5,069	4,370
机 械 及 器 具	2,393	2,524	2,182	1,643	1,735
化 学 工 場	7,567	6,030	6,910	6,373	5,706
飲 食 品 工 場	4,801	6,145	5,308	4,384	3,610
杂 工 場	1,746	2,184	1,329	1,506	1,511
特 别 工 場	92	158	350	346	25
合 計	20,749	21,683	20,552	19,321	16,957

第八表 注册工厂分类省别 (民国8年止) 附资本比较

	注册工厂分类省别														总 数	资本总额 (元)	平均每 厂资本									
	京 直	奉 天	吉 林	黑 龙 江	山 东	山 西	河 南	江 苏	江 西	安 徽	福 建	浙 江	湖 北	湖 南				陕 西	甘 肃	新 疆	川 康	东 北	广 东	广 西	海 外	
印刷及文	2					1	6	1				4						2	2					18	3,819,960	212,000
蠟燭、肥	3	1			1		17	1				2	1	1										28	1,938,000	69,000
煉糖工			1				4			2		1	2					1						2	700,000	350,000
麵粉	1						7	2	1		1	1												10	21,467,000	2,147,000
麵粉	3	4	2	8	5	3	29	1	1			2	2					1	1					13	2,869,000	220,000
紙	1				2		2											1	1					7	1,765,000	252,000
油	1	1	1		1	2	6	1											2					15	3,011,000	205,000
瓦器	1			1	1		1	1	1				1					1	1					8	444,000	55,000
玻璃						1	1			2	1							1						9	1,170,000	130,000
水泥	1				2		1							1					1					4	540,000	135,000
革												1							1					4	2,725,000	681,000
染	2						2											2						7	4,102,000	587,000
灰、水							35	4	1	1	6	4							5	1				80	46,128,000	578,000
織	1	2	5	1	8	1	17	1	2	10	14	3	4					2	9	2				83	17,100,000	205,000
電							9				9													20	3,285,000	164,000
織								1			1	1												3	153,300	51,100
織	2	6	3	2	2	4	3	1	1	1	2	2	1	5	1			6	6					48	5,434,000	113,500
柴							1				1													2	32,800	16,400
干、匣							1				1							1	2					5	3,533,000	706,600
水																										

煉石	2																		639,000	319,500
制烟	1	1																	67,000	33,500
制草	2																		800,000	267,000
蛋冰	3		4						1										7,030,000	414,000
袋酒				1															285,000	71,250
藏粉	1			3															122,000	40,670
酸、漂	1			1															300,000	300,000
白	1	1	2																2,330,000	466,000
豆	1	1	1	3															722,000	90,250
總	1245	1914	33114	9	155	1210	2042	1911	3	1	0	1733	1	0	4	475			1,200,000	1,200,000

(省本元)

京	京	兆	4,341,100	直	求	27,761,100	率	天	2,651,600	吉	林	3,350,000
黑	龍	江	1,653,000	山	東	6,690,000	河	南	2,639,500	山	西	500,000
江	蘇	40,856,000	安	徽	1,883,000	江	西	828,000	福	建	2,123,000	
浙	江	8,175,300	湖	北	32,864,000	湖	南	1,617,000	陝	西	75,300	
甘	肅	28,200	新	疆	—	西	川	1,631,000	廣	東	5,617,860	
廣	西	5,000	云	南	—	貴	州	—	海	外	埠	2,340,000

費本總數
(單位元)

附：各省注册公司及工厂之比较①

			注册公司	注册工厂	工厂总数
京		兆	79	12	233
直		隶	74	45	2,443
奉		天	25	19	945
吉		林	50	14	570
黑	龙	江	5	3	254
山		东	71	31	785
河		南	34	14	777
山		西	26	9	1,368
江		苏	385	155	1,284
安		徽	32	12	473
江		西	26	60	1,630
福		建	52	20	1,084
浙		江	12	42	1,465
湖		北	56	19	467
湖		南	32	11	549
陕		西	4	3	376
甘		肃	5	1	152
新		疆		0	27
四		川	40	17	3,732
广		东	75	33	1,091
广		西	5	1	76
云		南	4	0	105
贵		州	3	0	81
热		河	1		181
察	哈	尔	6		146
綏		远			25
海		外	4	4	
总		数	1,202	375	21,321

① 注册公司与工厂皆根据农商部统计，惟注册工厂省别仍照 22 行省及北京区旧制。工厂总数根据 5 年农商统计，惟西南 5 省则用 3 年调查较近真象。

第九表 工厂职工逐年比較

年 次	男 工	女 工	合 計
1912.....	421,994	239,790	661,784
1913.....	418,304	212,586	630,890
1914.....	391,126	233,398	624,524
1915.....	403,448	245,076	648,524 ^①
1916.....	334,152	231,103	565,255

第十表 工厂职工分业逐年比較

工厂类别	1912年	1913年	1914年			1915年	1916年
			男 工	女 工	总 計		
織 染	228,497	249,324	122,978	165,234	288,212	302,666	277,309
机械及工具	33,267	36,697	36,997	518	37,515	25,965	26,096
化 学	154,621	94,745	104,509	13,557	118,066	119,789	110,505
飲 食 品	208,900	181,732	91,450	50,116	141,566	151,677	122,408
杂 工	30,726	64,353	26,045	3,959	30,004	35,085	27,780
特 别 工 場	5,773	4,040	9,147	14	9,161	13,093	1,157
合 計	661,784	630,890	391,126	233,398	624,524	648,285 ^②	565,255

工厂职工状况 工厂中男工約占总数65%，女工占35%。以工厂类别言之，織染业工人最多，女工亦最多。更就第十一表觀之，广东江苏之工厂中女工較男工多兩倍有余，山东則男女工約相等，其余諸省男工皆多于女工，黑龙江热河綏远三地工厂中竟无女工。工資以江苏最高，贵州陝西最低，男工工資大抵皆多于女工，最多者約4倍有余。

① 这一个数字不符，农商統計表原表如此。

② 这一个数字不符，农商統計表原表如此。

第十一表 各省男女工人数及工资额

(本表以五年农商统计为根据调查不全者改用三年数)

省	别	男 工	女 工	工人总数	每 日 工 资			
					男 工		女 工	
					最多	最少	最多	最少
京	兆	7,057	259	7,316	.30	.14	.09	.07
直	隶	39,339	3,515	42,854	.29	.14	.26	.15
奉	天	17,639	110	17,749	.33	.18	.15	.12
吉	林	8,564	33	8,597	.45	.20	.10	.06
黑	江	3,200	—	3,200	.28	.17	—	—
山	东	17,795	22,176	19,971	.25	.19	.26	.14
河	南	12,233	2,033	14,266	.24	.12	.20	.11
山	西	16,228	1,264	17,492	.23	.12	.13	.08
江	苏	44,286	100,594	144,880	.53	.23	.35	.23
安	徽	11,080	16,204	27,284	.24	.16	.21	.16
江	西	36,157	2,319	58,476	.25	.15	.15	.09
福	建	17,202	3,434	20,636	.37	.21	.22	.12
浙	江	53,263	25,902	79,165	.28	.17	.24	.14
湖	北	22,992	9,083	32,075	.32	.15	.20	.12
湖	南	14,233	3,642	17,875	.26	.14	.19	.15
陕	西	3,537	645	4,182	.19	.10	.13	.08
甘	肃	1,538	955	2,493	.22	.14	.21	.09
新	疆	355	45	400	.40	.26	.22	.14
西	川	43,141	8,198	51,339	.47	.14	.14	.09
广	东	16,148	42,255	58,403	.46	.23	.22	.18
广	西	853	64	917	.45	.23	.25	.14
云	南	2,698	1,141	3,839	.33	.17	.11	.07
贵	州	1,507	367	1,874	.16	.11	.07	.05
热	河	674	—	674	.21	.18	—	—
察	尔	1,294	21	1,315	.21	.15	.08	.05
绥	远	279	—	279	.25	.11	—	—
总		393,292	244,259	637,551				

注册工厂资本组织 农商统计对于工厂之资本与资本组织付诸缺如。此种调查本极困难，各国工业统计中，最不可信者即为资本统

計。因調查時廠主或經理人有種種猜疑，往往不肯以真相示人。至資本組織惟註冊之工廠可查，然歷年農商統計所載甚簡。茲從“中國之工業”中轉錄民國二年之工業公司資本組織表，借知大概而已。（表中工業包括礦業）

第十二表 註冊工廠資本組織 (1913年)

	股 份	股份有限	合 資	合資有限	未 詳	總 計
10,000元以下	12	86	29	47	84	258
10,000— 50,000元	6	85	26	24	39	180
50,000— 100,000元	1	22	4	5	9	41
100,000— 200,000元		29		4	6	39
200,000— 500,000元	1	23	1		2	27
500,000— 1,000,000元	1	9		1		11
1,000,000元 以上		7		1	1	9
總 計	21	261	60	82	141	565
資本總數	1,039,520	39,244,905	1,165,571	2,924,551	5,500,613	49,875,160

全國工業概況 第十二表以前皆限于工廠，茲更編第十三表示全國工業之概況。

第十三表 民國4年全国工業分類統計摘要①

出品分類	製造戶數	職工數		出		品 價 額 (元)	出口價額 (元)	進口價額
		男	女	總	數			
油	247,774	1,204,310	146,073	1,350,383	7,906,675	126,306,384	31,269,660	
酒	147,144	748,052	23,792	771,844		404,933,397	1,693,401	4,638,167
糖	27,908	913,139	19,809	933,038	472,707	43,462,679	1,821,203	44,779,082
烟	64,811	281,660	63,765	345,425		2,723,106	4,990,861	19,310,549
澱粉	212,961	913,468	122,220	1,035,688	694,932	46,580,761	1,269,671	
罐頭食物	30,038	88,333	7,300	95,633		22,911,185		
絲織物	36,806	122,489	56,247	178,736		40,123,016		
棉織物	581,871	1,157,944	954,848	2,112,792		343,462,057		225,026,782
麻織物	71,730	80,291	120,196	200,487		10,611,424		
毛織物	5,478	56,470	1,478	57,948		2,338,446	247,253	3,731,399
絲棉交織物	1,731	3,482	4,045	7,527		904,949		
編物	148,615	24,401	35,058	59,459		6,367,928		
肥皂	7,001	11,267	2,618	13,885		4,606,654	31,163	3,486,453
蠟燭	43,911	151,984	7,968	159,952		18,405,701		
漆	8,908	26,904	768	27,672	3,276	2,130,387		

蠟	9,202	25,801	2,185	27,986		1,134,520	
瓷	35,388	621,156	21,627	142,783		17,067,085	234,453
火柴	482	77,412	14,273	91,685		23,309,816	9,076,058
玻璃制品	705	3,166	124	3,290		2,031,259	1,829,429
磚瓦	83,221	686,767	17,970	704,737		62,150,732	
薄荷樟腦	286	887	100	987		398,835	
紙類	55,868	274,987	23,551	298,538		54,860,795	6,952,016
皮革	20,016	199,385	2,339	201,724		63,132,713	1,417,686
化妝品	1,631	5,176	1,166	6,342		1,112,333	
業用藥品	2,955	17,709	152	13,861	236,968,868斤	2,344,278	
陶瓷器	141,607	509,155	38,891	548,046		13,120,743	2,635,275
漆器	23,730	109,656	2,449	110,105		15,667,176	
五金制器	69,139	384,676	11,039	395,715		93,193,205	
眼鏡	548	2,278	19	2,297	766,727副	811,060	
鐘錶	192	1,240	-	1,240	60,630件	347,966	368,980
纖維器	7,062	53,619	626	54,245		2,806,141	
雜工产物	295,614	741,113	400,808	1,141,921		71,796,400	
	2,394,334	8,656,377	2,103,594	10,759,971		1,200,403,031	

① 本表从五年农商統計摘編五年調查不全故不录。

表中之制造户数包括工厂及旧式工业而言。全国工人约1,000万,男工占4/5,女工占1/5。工厂之工人仅占总数6%(约60多万人),则旧工业之重要可见矣。一年出品总值仅1,200余兆元,与进口之工业品较,相差不过200余兆耳。(民国9年进口总额约977兆两,中约65%为工业品,得633兆两,更折成银元约950兆元。)以中国之大,每年所需要之工业品,自造者不过56%,仰给外人者乃多至44%,亦可惊矣!表中统计未必完备,然大致相去当不甚远也。出品之中以棉织品价额最高,达343兆,占总值28.5%,亦新工业之好现象也。其次则为油酒,皆在100兆元以上。丝茶为中国大宗产品,皆未列入。

外人在华所设工厂 自马关条约订立后,外人在华之工厂逐年加增,民国2年其数已达166家。18年中进步如是之速,亦可惊矣。第十四表从“最近中国经济”摘录,仅及民2为止。近8年中,外商之工厂增设者必多,惜无详细统计可供参考。欧战期中,日人在山东及津滬等地,增设之厂甚多。青岛之德人工厂几全为日人所占有。单就青岛及山东之日人工厂而论,为数已139家,资本皆极雄厚。今胶济路贖还有期,青岛亦将复为我有,然经济势力恐不免终为日人所劫留,此亦国人所当早为之计者也。1921年3月之远东时报载有在日本治权下之山东中外工厂详细调查,计日厂139,华厂93,美厂2。他处日人工厂虽无确数,然就纱厂一项而言,上海有日厂22,青岛3(已包括上述厂数中),津汉等处4,总数共29家。(见民国9年华商纱厂联合会之中国纱厂一览表)民2所有外人之纱厂不过10家,今日人竟独有29家,可推知他种工业日人之发展亦必甚大。吾人苟仍不自奋作,行见他国资本家之势力,将满布关中,政权未失,先为经济奴隶矣。

第十四表 外人在华工厂

工厂类别	厂数	工厂类别	厂数	工厂类别	厂数
蛋	9	家	6	制	1
白	9	煤	4	肥	12
煉	1	制	9	皂	3
化	10	冰	1	及	9
学	22	及	6	蠟	12
用	17	冷	13	糖	9
品		藏		草	12
織		工		压	22
造		革		业	
船		业			
机					
粉					

总.....166

重要進出口統計 進出口統計凡十九与工业有关系，盖非为工业之原料，即为工业之出品，无论进口出口，均足见一国工业盛衰状况也。兹仅择最重要者四种言之，一、进口机器。(见第三图，图略)海关报告有机器分类，自光緒13年始，至民国9年共34年，其趋势极足表现工业时期之变迁。13年至20年在官督商办时期，平均进口額亦最低。21年馬关条約成，入外人企业时期略高。28年受联军入京之影响大降。29年至宣統3年为政府獎勵时期，繼長增高。至民元因革命之影响而略跌，遂入自动发展时期漸升。至民4受欧战各国禁止机械出境之影响再跌，民7以后欧战告終，三年之中漲至原額5倍有余，民9之总額达3,300万元，图中弧綫直入霄汉，海通以来未有之速

最近34年機器統計①

光緒13年……	39,8407	光緒30年……	287,8114
14……	37,2790	31……	546,7157
15……	34,5863	32……	609,1467
16……	41,0348	33……	642,4018
17……	90,0500	34……	686,2978
18……	59,3449	宣統元年……	614,6475
19……	93,0651	2年……	721,8100
20……	111,9771	3年……	712,1820
21……	238,5205	民國元年……	587,7447
22……	206,4441	2	808,6200
23……	271,6731	3	869,6251
24……	175,8615	4	476,5988
25……	152,6550	5	665,5468
26……	145,0091	6	654,0108
27……	122,0167	7	1324,1272
28……	79,4363	8	2173,0271
29……	235,9127	9	3314,5102

度也。其中一大部分当然为数年中已訂購，因禁令未得出境之积貨。然工业发展之量，亦由此可得其大概。其中以紡織机为最多。二、蚕

① 海关报告机器入口自光緒13年始，本表統計，自民国4年以前由中国商战失败史摘录，4年以后从1917海关报告及1921-22中国年鉴摘补。

絲、三、綢緞，四、陶瓷器(見第十五表)。45年中絲綢出口皆逐漸增加，似甚可喜，然世界市場貿易之數增加尤速，故中國絲綢在世界市場來源總額之百分數反年有退步。以絲而論，1880年至1890年之十年間中國占世界總額40%，至1914年已降至25.9%，几削減半數。日本在同一時期則由14%而增至44.5%(見科學雜誌三卷三期著者所作“中國之實業”)，人進我退，得失相較如是其巨，是45年來中國之出口增加，實受世界工商業興盛之賜，而非中國工商界努力得之，則他日人愈進，我之出口額亦必有日減之勢，食人唾余且坐待之，誠可耻矣。陶瓷器出口之增加不多，惟民7至民9之三年中驟增，几兩倍原額有餘，當亦戰後商業恢復，需要驟增所致也。每年進口之陶瓷器加增之速度亦至可驚，民國6年進出几于相等，進口大抵為日本瓷。甯工不求精，而國人之嗜好則日趨西化，是亦工業界所當注意者也。

第十五表 中國主要工業品對外貿易之消長①

年 份	蚕 絲	綢 緞		陶 瓷 器	
		出 口	進 口	出 口	進 口
1876	31,653,900	4,158,438	1,764	417,451	
1877	18,134,372	4,620,296	4,797	402,111	—
1878	20,376,237	4,749,967	6,777	548,501	—
1879	23,872,388	4,748,945	6,187	491,683	—
1880	24,175,756	5,655,488	5,372	548,706	—
1881	22,017,006	4,851,194	8,010	584,501	—
1882	18,898,950	3,938,302	6,725	706,149	—
1883	19,258,469	4,679,427	5,287	538,460	—
1884	18,305,322	4,876,519	5,554	454,853	—
1885	15,201,946	4,745,729	6,474	486,072	—
1886	21,832,530	7,002,313	6,605	489,513	—
1887	24,607,528	7,082,686	—	1,404,638	—
1888	23,765,467	8,414,831	—	1,090,022	—
1889	28,642,418	7,759,549	—	1,099,998	—
1890	24,491,370	5,764,535	—	952,498	—
1891	29,884,375	7,017,651	—	1,173,731	—
1892	30,341,113	7,951,017	—	1,432,766	—

① 本表統計由“中國商戰失敗史”及“中國年鑑”摘錄。

1893	29,326,155	8,788,070	---	1,572,874	---
1894	33,604,291	9,040,291	---	1,626,149	---
1895	39,723,871	11,963,231	207,696	1,983,543	16,898
1896	31,671,540	10,417,795	233,710	2,019,564	65,534
1897	44,460,990	10,789,670	280,848	1,735,132	151,554
1898	45,412,818	10,691,101	327,224	1,934,192	132,174
1899	71,582,849	10,526,521	461,977	2,232,527	184,012
1900	39,732,031	9,711,838	657,364	1,999,471	105,892
1901	50,027,282	10,888,338	757,860	2,090,846	61,128
1902	68,954,140	10,258,067	414,249	2,294,772	155,349
1903	59,334,758	14,954,945	845,835	2,696,703	305,968
1904	65,687,302	12,568,110	991,542	2,059,992	298,534
1905	59,614,102	10,779,731	1,009,028	2,055,942	536,898
1906	60,436,061	10,859,464	1,693,898	1,918,906	564,257
1907	75,202,955	13,881,079	1,901,451	1,983,563	533,543
1908	68,334,347	14,580,017	1,270,917	2,002,978	399,051
1909	71,154,364	18,866,907	1,258,598	2,227,990	486,938
1910	80,326,688	19,072,340	1,764,250	2,361,172	686,546
1911	74,509,684	18,165,948	1,697,184	2,364,972	772,012
1912	76,544,640	17,013,001	1,270,309	2,311,726	815,771
1913	83,156,282	21,718,532	1,742,418	2,504,538	1,210,833
1914	62,919,246	17,071,834	2,520,841	2,349,219	1,042,867
1915	78,406,476	22,393,243	1,652,065	2,995,025	779,591
1916	90,042,152	20,975,288	2,021,308	1,787,399	967,515
1917	86,088,250	17,987,445	2,523,360	1,513,413	1,318,037
1918	87,634,561	20,502,641	2,725,005	2,585,941	1,258,905
1919	113,957,908	26,194,636	2,969,228	5,083,505	1,291,748
1920	76,998,360	28,138,544	2,240,472	6,096,917	965,424

(四) 中国工业之位置与前途

50年中中国之工业不可謂无进步矣，然其行也迂緩。軍用工业时期国人犹在夢中，可置不論，若官督商办以至政府獎勵之三时期，则官倡于上而社会退縮不前，故其效甚微。自动发展时期，社会似有覺悟矣，而官吏軍人又从而撓之抑之，故其效仍不大。清末之官賢而

民不肖（此句应改为清末之官不賢而民賢——編者），民国之民賢而官不肖，中国之政府与人民对于工业遂竟无一日之通力合作，50年之光阴草草过矣。在此时期中，日本由島国而跃登世界第一等之富强地位，而中国之出口額尚不能与进口額相抵，亦大可憐矣！5年欧战，天与中国以自新之机，又以政爭自扰而虛度。今試以中国工业与日美为簡要之比較，則知中国工业所处之地位。

第十六表 中、日、美工业之比較

	中 国	日 本(本部)	美 国
人 口	439,425,000	57,070,936	105,253,300
面 积	4,278,352 方哩	148,756	2,970,138
工厂或制造戶	2,384,333	20,966	275,791
工 人 数	11,095,971	1,280,964	10,658,881
出 品 总 值	1,237,810,613元	1,867,000,000日元	24,246,475,000金元
調 查 年	1915	1917	1915

中国之人口 8 倍日本，4 倍美，面积30倍日，較美約 4 与 3 之比，而出品之值仅及日60%，美 5 %，工业之不发达尚可以道里計哉？更就工人之數言，中国 9 倍日本，与美則相近，而出产悬殊如是其远，人力之不經濟又可見矣。其故果安在乎？曰中国工业資本太少，組織太幼稚也。試就制造單位数比較，中国每單位平均不过 6 人，則知中国尚在家工业时代，机器之用仅少数之新式工厂有之，大規模之組織用工人在 1 万人以上者，竟无聞焉。特12人之五官心思，数十工人之手足与体力，以与东西科学方法之組織与数千馬力之机器相竞争，烏得而不敗？故中国工业不进步之原因有三：一、資本少；二、組織小；三、管理不得法。論者乃归罪于中国人富自大思想及保守主义（日人安原美佐雄語），非确論也。吾以为今日思想最足为中国实业之障碍者，莫过投机心。無論何人，無論何业，苟其人日日沽业外之名，謀业外之利，則其业必敗，而况实事求是之工业哉。然而今之政客軍人失勢則办工厂，曰吾將以实业救国也。既办厂矣，朝开会，暮

投机，而明日又为官，工厂遂为傳舍。本业工厂者宜可以專心一业矣，又日思从外国汇兌与交易所得分外之財，厂业未亏，而竟因投机倒閉。故吾敢曰，自大思想保守主义絕不足为中国工业患，即資本缺乏組織管理不良亦有补救之法，惟投机心乃万不可有。資本少，苟任事得人，信用昭著，則資本自趋之如归。組織与管理之学識，虛心求之，亦不难得。惟在业厂者安分專心，以工业为終身之事业，則工业必有兴盛之一日。孔子有言，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西諺亦云，久磨之石，不能聚菽。未聞有为官之卡尼基，亦不聞有办厂之威尔遜。20世紀为人材專門时代，願吾国之工业家專心本业，尤願吾国軍政界之偉人，勤修己职，勿污工业界之干淨土，然后乃可言振兴工业之道。振兴工业之道亦至簡：一、政府与工业当合作，凡妨碍工业之法令制度皆当革除；二、工业組織当大，則資本与人材皆可經濟，而得多量制造之益；三、当多設制造机械之厂。机器为工业最要之資本，故孙中山有机器借款之議。然中国本有煤鉄，与其仰人供給，不如退而自造。仅購基本之机械，即能源源供給各业之需要。今者关税已有修正之机会，各国对于中国通商之待遇亦將渐趋平等，此正吾人发展国外貿易之日。工业革新，不容更緩。自动发展时期之后，若繼之以通国合作，吾知中国工业史上之黄金时代，不难立致也。

(五) 最近60年中国工业大事年表

年 份	工 业 大 事	附政治要事
1862 (軍用工业 时期始)	曾國藩于安庆設立軍械所，做造火輪船，驗年成，可用。 李鴻章在上海苏州設制炮局，上海兩局以丁日昌韓殿甲分管。	
1863	曾國藩命容闈赴美采办机器洋鉄。(后并入江南制造局) 李鴻章奏設外国語言文字学館，以为习西人理算制器之阶。	
1864		洪楊乱定
1865	曾國藩設江南造船厂于上海。	
1866	左宗棠設船政局于福州。	
1867	崇厚籌备天津机器局。	

年 份	工 业 大 事	附政治要事
1868	李鴻章在上海設江南製造局,以唐国华等4万兩贖罪金購得之虹口西人机厂,及原有兩制炮局合組。金陵机器局亦由李設立。	
1869	福建机器局購机建厂。 李鴻章奉旨籌划拓展天津机器局。	
1870		中日締結修好通商条約。
1871	曾國藩、李鴻章奏請選派幼童赴美肄习技艺。	
1872	陈蘭彬、容闈护送幼童詹天佑等赴美习艺。 內閣学士宋晉,奏請停造輪船以省經費。李鴻章力陈輪船之重要,宋議卒不果行。	
1873	沈葆楨奏請選派閩船政局學生出洋学习制造駕駛,因台灣有事不果行。	
1874		
1875		
1876	李鴻章、沈葆楨奏派閩船政局學生魏瀚、薩鎮冰等至英法各國学习工程制造,由李鳳苞护送監督。 李鴻章奏派軍官卞長勝等赴德习軍械技艺。	中英締結芝罘条約。
1877	丁宝楨奏設四川机器局。(即今成都兵工厂) 薛福成奏陈治平六策,有制器宜精造船宜講兩条。	
1878	左宗棠在甘肅省城南关外設織呢机器厂,用德匠。 御史曹秉哲,奏請倣用西法开采,以利器用。	
1879		
1880	李鴻章奏开天津水師学堂,分駕駛、管輪兩科。	
1881	吳大澂設立吉林机器厂。	中俄締結伊犁条約,許俄商在蒙古及天山南北无稅貿易。
1882 (官督商办时期始)	金陵製造火藥局兴工,越二年成立。 李鴻章奏請在上海試办机器織布局,其出品奏准只完正稅一道,免沿途厘捐。	
1883	商人祝大椿設源昌机器五金工厂于上海,資本10万元。	
1884		中法战争。
1885	中法战争中国水師失敗后,左宗棠、李鴻章等奏請拓增船炮大廠。	中法天津条約。

- 1886 李鴻章奏開天津武備學堂，授軍器、炮台、算法等學。
張之洞奏准兩廣鐵斤鐵器出洋銷售。
- 1887 又以4萬兩在粵設鑲絲局。
御史陳秀登奏准明算學人員一體鄉試。
李鴻章奏准天津水師武備兩學堂學生教員一體鄉試。
張之洞在粵奏設機器鑄制錢局，購機費25萬兩，造廠5萬兩，
英京教廠機。
又設銀元局附設錢局內。
李鴻章在天津機器局，購機鑄制錢，定名寶津局。又于保定設
廠。
- 1888 貴州鎮遠府青谿縣設煉鐵廠，由官商合股。
- 1889 張之洞在粵奏設織布局，開辦費40萬兩。
又奏准將粵省鑄鐵爐餉、爐稅停征3年，以示鼓勵。
又奏設煉鐵廠定英國熔爐兩座，銀13萬千余兩。
- 1890 上海紡織新局成立，由官商合辦。（今之恒丰紡織新局）
李鴻章奏設之上海機器織布局，開始籌備。
張之洞奏准，將在粵定購之織布機、煉鐵爐移鄂，在漢陽建廠，
以大冶鐵苗、當陽白煤為原料，漢陽鐵政局至是正式成立。
（今漢陽鐵廠）
又于漢陽設槍炮廠。（今之漢陽兵工廠）
- 1891 上海道唐松岩，設上海機器紡紗局，由官民合資。
- 1892
- 1893 張之洞在武昌設織布、紡機、制麻、鑲絲四局，后更名湖北紡紗
織布官局。（今由楚興公司租辦）
李鴻章奏設籌備將成之上海機器織布局被焚。
- 1894 盛宣懷由李奏派招商股80萬兩，為重興洋布局之計，因股款不
足，改設華盛紗廠。（今之三新紗廠）
湖北聚昌、盛昌等火柴公司成立，多屬官股。
- 1895 馬關條約許外人以在中國通商口岸設工廠權，故是年日商之
（外人興業 東華公司，英商之怡和、老公茂、鴻源（后為日人收買），德商
時期始） 之瑞記（后改東方）等紗廠，相繼成立。
中日締結馬關
條約。
- 蘇州蘇輪紗廠（今由寶通公司租辦）由官商合資開辦，上海商
辦之大純及裕源紗廠與無錫之業勤紗廠（今由福成公司租
辦）成立。
張之洞奏陳馬關議和條約妨礙中國工商業發達之害。
津海道盛宣懷，奏請就博文書院屋，辦頭等、二等學堂，造就制
造人材，以伍廷芳等為總辦，丁家立為總教習。

年 份	工 业 大 事	附政治要事
1896	<p>李端棻奏請各学堂須設儀器院，注重格致、制造、实习。</p> <p>御史管廷献，以西法未能制勝，奏請裁撤所有学堂、台塢及各省机器制造等局，以节財用。</p> <p>給事中褚成博，以各省船塢机器等局，徒耗巨款，无济实用，奏請一律招商承办，以节糜費。</p> <p>張之洞奏准汉阳鉄厂，由盛宣怀組織公司，改归商办，其历年用去官款五百数十万兩，由公司將來偿还。</p> <p>又奏准以在鄂定購之紡紗机四万零七百余錠，約銀70万兩，移苏振兴紗业。</p>	
1897	<p>依克唐阿在奉天奏設銀元局，購德国礼和洋行机。</p> <p>給事中褚成博以洋商改造土貨，奏請飭南北洋大臣，各籌款二三百万元，在內地广設絲紗机厂，以为倡导。</p> <p>張之洞奏准將机器造貨值百抽十之新章緩办，以振兴土貨。</p> <p>又在鄂設氈呢、造紙、制革、紅磚、針釘五厂。（此五厂不詳何年立附于此）</p>	
1898	<p>又在鄂設鑄錢局，購美汉立克納浦厂机約3万兩。</p> <p>上海商务印书館成立，資本15万元，營印刷及制造业。</p> <p>張之洞在鄂設工业学堂，及劝工、劝商兩公所，以广人材。</p> <p>又奏准在汉口、上海設商务局，联络工商，講求工厂制造。</p> <p>总理各國事务衙門定獎勵新学、新法章程，发明制造船械、枪炮等器新法者，預特賞，專利50年；发明日用新器者，給工部郎中实职，專利30年；做造西器之制法，未流傳中土者，給工部主事职，專利10年。</p> <p>張謇在南通設大生紗厂，資本130万兩，即用張之洞由鄂移苏之紡机。</p>	<p>庚子變法，戊戌政變。</p>
1899	<p>孙多森在上海設阜丰机器面粉公司，資本100万元。</p>	
1899	<p>胡聘之奏准在山西綏州三十三林鎮，設紡紗織布局。</p>	
1900	<p>汉阳鉄厂由張之洞及盛宣怀与日本訂15年購買矿石契約。</p> <p>英人在上海設瑞瑞机器輪船工厂。</p>	<p>美国提出开放中国門戶条件，經列强承認。</p>
1901		<p>庚子之乱，八國联軍入京。</p>
1901		<p>北京和約，海关税率改正为值百抽五。</p>
1902	<p>北洋烟草公司成立于天津，資本105,000兩。</p>	

1903
(政府獎勵
及利稅收回
時期始)

政府設商部，以載振為尚書，陳璧、伍廷芳為左右侍郎。
商部奏定商律，又奏定公司註冊試辦章程18條，設註冊局專司其事。

1904

朱志堯在上海設求新廠，製造船舶機械，資本約60萬兩。
督辦胡廷干，在山東博山設玻璃公司。
翁紳張謇、許鼎霖等集股50萬兩，在江蘇徐州宿遷設耀徐公司，製造玻璃。
漢陽鐵廠向日本興業銀行借款3百萬元，訂立30年借款契約。

1905

商部在京師設勸工陳列所。
直督袁世凱在天津設工藝總局，舉辦工業學堂、教育品陳列館、考工廠、實習工場四事。

美國禁止華工，中國抵制美貨。

1906

商部奏設高等實業學堂。
御史王金銘奏請添設初等中等實業學堂。
商部奏訂獎勵商勸章程，鼓勵製造新器。
學部奏定考驗遊學生章程，有工商科進士等。
商部改稱農工商部。

中央官制改革。

1907

日俄戰爭後，東三省匹頭業大興，紗廠多增布機。
鄂督張之洞在鄂設制麻局，并奏准麻布免稅，以裕銷路。
漢陽鐵廠、大冶鐵礦、萍鄉煤礦合組漢冶萍煤鐵廠礦有限公司，并向日商興業、正金、三井3銀行及大倉洋行借款6百萬元。
江南造船廠改為官督商辦。
奉天本溪湖煤鐵公司成立，由日商大倉組經營。
英人設上海造船廠，資本557兩。
上海泰豐繅頭公司成立，資本7萬元。
農工商部奏准獨資商業得援公司例，一體註冊。
鄂督張之洞奏設大冶水泥廠。
鄂督張之洞、川督趙爾丰等，奏請于武昌省城外下新河設廠，造鐵路、橋梁、車輛、鐵軌等件，備川湘鄂粵四省鐵路應用，并辦費40萬兩，由四省路股分提，將來出品并請暫免出口稅銀。
農工商部奏定華商辦理實業爵賞章程，凡辦1,000萬元以上之實業者賞男爵，2,000萬元以上者子爵。又改訂獎勵華商公司章程。
農工商部工藝局附設工廠成立，分織繅染等12科。
江督端方奏准江西景德鎮磁器公司改歸商辦，其出品，照機器出品例，僅完正稅。

年 份	工 业 大 事	附政治要事
1908	农工商部与度支部奉旨会訂权度划一制度。 汉口漢家磯揚子机器公司成立，資本100万兩。 香港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成立，資本100万元。 农工商部与度支部会奏权度仍遵定制，以营造尺、漕斛、庫平为准则。	
1909	武昌举行物品展覽会。	
1910	江督端方发起之南洋劝业会是年秋举行。 东三省总督錫良与日人大仓喜八郎訂中日合办本溪湖煤鉄公司契約。	
1911	农工商部奏定度量衡兩制并用，一为营造尺庫平制，一为万国通制，并設权度制造所。 武汉起义，汉阳鉄厂解散，机爐多受彈毀坏。	武汉起义。
1912 (自动发展时期始)	南京临时政府設实业部，以張謇为部長。統一后改設农林、工商兩部，朱其美为工商部長。 江南造船厂改归海軍部直轄管理。 盛宣怀、李維格代表汉冶萍公司与日人訂中日合办契約，經汉冶萍股东大会全体否决。 伍廷芳、王文典在上海設国貨維持会。 工商部議决用万国通制为权度标准，經国务會議通过，为參議院擱置未議。	清帝遜位。袁世凱就大总统任。
1913	工商部另訂公司注册暫行章程 18 条，裁注册局归工商司直轄。 詹天佑联合粵工程师会、滬工学会、路工同人共济会，組織中华工程师学会。	二次革命失敗。議会解散。
1914	农林、工商兩部合并为农商部，張謇为部長，宣布棉鉄政策。 政府定工业保息費章程，提倡制造，拟以 2 千万元为基金。	
1915	农商部設劝业委员会，附商品陈列所、工业試驗所及工商訪問所。 王正廷等发起劝用国貨会于上海。 直隶省立模范紡紗公司成立，資本40万元，英国机器。	日本二十一条要求，抵制日貨。袁世凱帝制阴谋。
1916	政府預算列商工业振兴資金1,500万元。 王錫彤等在天津設华新紡織公司，資本1,000万元。	袁氏取消帝制。
1917	农商部設实业协进会。 国务院設經濟調查局。	
1918	江南造船厂与美国航务部訂承造美国运艦12艘。	

1919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在上海改为股份有限公司, 资本 500 万元。	皖直之战。 解散安福。
1920	上海求新厂改为中法合办, 资本 120 万两。	
1921	上海总商会之商品陈列所成立。 江苏实业厅在南京举行全省物品展览会。	

(全文录自楊銜:“五十年来中国之工业”, 申报館編輯最近之五十年, 1923 年出版)

編者注: (1) 本文作者所稱之“洪楊之乱”, “拳匪”等污蔑中国人民的字样作了改动。(2) 原表格之中曆一律改用公元年号。(3) 表格中之“打米米粉”改为“碾米米粉”业。(4) 日文之书名一律譯中国文。

辛亥革命前民族資本創办的工厂統計

設立年度	厂名	所在地	創办人或主持人	資本(元)	工人数	备注
1863	洪盛机器碾米厂	上海		6,000	8	
1872	繼昌隆繅絲厂	广东南海县	陈启源(华侨)	206,000	224	估計当时可能是打铁作坊,后来才改用机械生产。
1875	程恒昌軋花厂	江苏奉贤				
1878	貽来牟机器磨坊	天津	朱其昂			
1879	裕昌厚絲厂	广东南海	陈植棠			
1879	机器榨油厂	广东汕头				
1880	恒昌祥机器厂	上海		6,800	90	
1881	永昌泰機絲厂	广东順德		20,000	320	
1881	合昌机器厂	上海	蕭永祺	3,000	53	
1881	公和永机器繅絲厂	上海	黃佐卿	139,860		
1882	罗兴昌机器厂	南昌		5,000	27	
1882	均昌机器船厂	上海	李松雲			
1882	同文书局	南昌	徐雨之(宝順洋行买办)			
1882	巧經昌絲厂	广东順德		32,000	560	
1883	源昌机器五金厂	上海	祝大椿(怡和洋行买办)	139,860		
1883	协三才絲厂	广东順德		36,000	540	
1884	永同昌絲厂	广东順德		20,000	380	
1884	永植祥絲厂	广东順德		30,000	560	
1885	經利絲厂	广东順德		30,000	540	
1886	美綸昌絲厂	广东順德		30,000	560	
1886	广純昌絲厂	广东順德		36,000	600	
1886	广和祥絲厂	广东順德		40,000	620	
1886	天津自来火公司	天津	楊宗漢 吳懋鼎	25,000		
1886	中国机器軋鋼公司	上海	福建商人			
1887	通久源軋花厂	宁波	严信厚			
1887	怡順滄記印务局	上海	丁克明	30,000	47	
1887	公和祥絲厂	广东順德		60,000	600	
1887	中西大藥房	上海	顧松泉	500,000	170	
1888	协綸和絲厂	广东順德		22,000	560	
1888	永兴綸絲厂	广东順德		40,000	620	
1888	瑞和綸絲厂	广东順德		20,000	420	

1888	广亨絲厂	广东顺德		18,000	360
1888	妙成昌絲厂	广东顺德		40,000	620
1888	公茂机器厂	上海		27,972	40
1889	广利和絲厂	广东顺德		30,000	530
1889	宏远堂造纸厂	广州	鍾星溪	200,000	65
1889	慈谿火柴厂	浙江慈谿	宁波商人		
1889	忠兴泰絲厂	广东顺德		30,000	560
1889	广元丰絲厂	广东顺德		20,000	380
1889	中法药房	上海	黃楚九(1915年时收买)	200,000 (1915年)	181
1889	森昌泰火柴厂	重庆	卢干臣等	50,000	
1890	上海机器織布局	重庆	郑官应等(太古洋行买办)	699,300	
1890	宏記隆絲厂	广东顺德		36,000	500
1890	协成机器厂	烟台		1,500	
1890	順昌翻砂厂	上海	顧丕善	10,000	50
1890	燮昌火柴厂	上海	叶澄衷	200,000	1080
1890	广昌絲厂	广东顺德		20,000	340
1890	永昌綸絲厂	广东顺德		25,000	600
1890	兴利絲厂	广东顺德		40,000	500
1890	經盛絲厂	广东顺德		35,000	600
1891	大成造纸公司	香港			
1891	熾丰机器厂	上海		4,000	15
1891	吳順兴机器鉄厂	上海		2,000	11
1891	永貞和絲厂	广东顺德		20,000	320
1891	巧經綸絲厂	广东顺德		38,000	500
1891	巧元絲厂	广东顺德		24,000	400
1892	悅經綸絲厂	广东顺德		19,000	360
1892	永昌成絲厂	广东顺德		30,000	500
1892	巧利絲厂	广东顺德		38,000	440
1892	阜經綸絲厂	广东顺德		30,000	560
1892	华英药房	上海	庄凌晨		
1893	隆起火柴公司	九龙		30,000	
1893	森昌正大火柴厂	重庆	卢干臣等	10,000	
1893	义和火柴厂	广东南海		10,000	70
1893	瑞記絲厂	广东顺德		30,000	560
1893	广純亨絲厂	广东顺德		18,000	370
1893	利源祥絲厂	广东顺德		30,000	500
1893	广和隆絲厂	广东顺德		24,000	380

設立 年度	廠 名	所 在 地	創 辦 人 或 主 持 人	資 本 (元)	工 人 數	備 注
1894	德昌綸絲廠	廣東順德		30,000	580	
1894	廣興和絲廠	廣東順德		25,000	560	
1894	勝昌機器廠	南京		3,000	19	
1894	瑞綸絲廠	上海	吳伸伯	111,888	1,350	
1894	戴聚源鐵工廠	上海		1,000	8	
1894	中英大藥房	上海	上海商人	13,000		
1895	合義和絲廠	浙江蕭山	樓景暉	240,000		
1895	大綸絲廠	鎮江	張劭史	150,000		
1895	上海禮和軋花廠	上海		67,132	176	
1895	金榮昌機器廠	上海		10,000	25	
1895	張裕釀酒公司	烟台	張弼士(華 僑)	2,000,000	300	
1895	信昌纜絲公司	上海	馬眉叔	375,000	1,354	
1895	美和絲廠	廣東順德		20,000	550	
1895	福記絲廠	廣東順德		16,000	380	
1895	宏經絲廠	廣東順德		20,000	540	
1895	裕晉紗廠	上海	中國人與華 俄道勝銀行 合辦 盛某	279,700		
1895	大純紗廠	上海		279,700		
1895	普其昌絲廠	廣東順德		30,000	540	
1895	永成綸絲廠	廣東順德		20,000	380	
1896	源盛絲廠	江蘇吳縣		180,000	2,200	
1896	盛昌絲廠	廣東順德		34,000	600	
1896	協昌絲廠	廣東順德		30,000	560	
1896	同記絲廠	廣東順德		35,000	420	
1896	永昌泰絲廠	廣東順德		17,000	360	
1896	頌維坤絲廠	廣東順德		20,000	380	
1896	廣德和絲廠	廣東順德		16,000	330	
1896	萃綸絲廠	鎮江		40,000	426	
1896	通久源紗廠	寧波	嚴信厚(李 鴻章幕僚)	450,000		
1896	協泰和機器廠	上海	蔡方源	10,000	39	
1896	大德榨油廠	上海	朱志堯(東 方匯理銀行 妥辦)	209,790	75	朱志堯 奉盛宣懷 之命辦理。
1896	業勤紗廠	無錫	楊宗讓等(原 任山西布政 使等職)	335,700	1,047	
1897	永泰紗廠	上海	徐錦榮	279,720	1,230	
1897	通益公紗廠	杭州	高鳳德(候 補知府)	533,300	1,240	

1897	蕪湖益新麵粉公司	蕪湖	章錫爵	209,790	
1897	商務印書館	上海	夏粹芳, 鮑	5,591	1,500
1897	蘇經源盛織絲廠	吳縣	咸昌	300,000	800
1898	乾康織絲廠	上海	汪辛致	150,000	1,340
1898	麟經絲廠	順德	顧敬齋	20,000	350
1898	劍利絲廠	順德		20,000	340
1898	永盛綸絲廠	順德		20,000	340
1898	合綸絲廠	順德		40,000	620
1898	崙洪榨油廠	海州	沈云沛	280,000	
1898	綸盛絲廠	順德		18,000	360
1898	妙綸絲廠	順德		20,000	420
1898	裕盛絲廠	順德		24,000	520
1898	致興綸絲廠	順德		20,000	360
1898	源昌機器碾米廠	上海	祝大椿	400,000	
1898	阜丰面粉公司	上海	孫多森(曾任 中國銀行總 裁中日實業 公司買办)	419,580	580
1898	北洋機器硝皮公司	天津	吳懋升	550,000	100
1898	同源吉鐵器廠	常州	孫伯英	30,000	60
1898	裕通紗廠	上海	朱幼鴻(朱 鴻慶之子)	209,800	1,760
1898	恒丰永地毯廠	上海	朱子霞	100,000	110
1898	張萬興機器廠	上海		1,500	4
1898	義興翻砂廠	上海	吳慎齋	30,000	60
1898	上海永茂札花廠	上海		69,930	
1899	大生紗廠	南通	張謇	699,300	7,000
1899	鈞昌機器廠	上海	劉鈺卿	5,000	36
1899	張源祥機器廠	上海	張廷楨	1,500	16
1899	洪昌布廠	武進	吳友德		38
1899	泰西恒絲廠	順德		40,000	800
1899	同機絲廠	順德		20,000	440
1899	明昌利絲廠	順德		28,000	560
1899	細絲綸絲廠	順德		30,000	390
1899	冠經絲廠	順德		30,000	450
1899	通惠公紡織廠	蕪山	樓景暉(候 選同知)	559,400	1,161
1900	華興機器面粉廠	上海	祝大椿	699,300	
1900	復新面粉廠	南通	周重慈	140,000	74
1900	生和隆榨油廠	上海		30,000	300
1900	文明書局	上海	沈韻濤	20,000	47

原名大
興面粉
廠, 1909
年改現
名。
原在江
蘇泰興縣,
后遷上海。

設立年度	廠名	所在地	創辦人 或主持人	資本(元)	工人數	備注
1900	金龍面粉廠	漢口	張繪初	150,000	84	
1900	吉厚祥布廠	重慶	印用卿			
1900	頌維亨絲廠	順德		33,000	600	
1900	廈門電燈廠	廈門	孫遜	70,000		
1900	利用面粉廠	杭州	庄誦先	70,000		
1900	永泰裕絲廠	上海	薛南溟	280,000		
1900	天津織呢廠	天津	吳懋鼎	350,000		
1901	永利絲廠	順德		40,000	600	
1901	永昌興絲廠	順德		18,000	300	
1901	源丰機器榨油廠	淮安	陳琴堂	41,958		
1901	祥盛肥皂廠	上海	邵爾康	139,860	15	
1901	振新肥皂廠	杭州	謝之謙	3,000	8	
1901	華裕布廠	上海	梅佩玉		228	
1901	寧波電燈廠	寧波	孫某	14,000		
1901	公信玻璃廠	福州南台		5,000		
1901	森記製造機器船廠	上海		2,300	15	
1901	廣太和機器廠	上海	張鴻發	5,000	14	
1901	徐順興鍋爐廠	上海	吳文輝	2,000	30	
1901	順記機器廠	寧波		5,000	75	
1901	顧順記機器廠	上海		2,000	5	
1901	茂新第一面粉廠	無錫	榮宗敬、榮德生	1,200,000	151	
1901	茂新第二面粉廠	無錫	榮宗敬	資本合并在茂新第一廠內	200	
1901	裕昌絲廠	無錫		55,944	825	
1902	人和雪茄烟廠	上海		60,000	220	
1902	丰裕火柴廠	重慶江北	尹煥庭	10,000	440	
1902	鴻興汽水公司	天津	張鶴臣	8,000	35	
1902	錦昌翻砂廠	上海	周和元	2,000	15	
1902	大隆機器廠	上海	严裕棠	100,000	700	
1902	東信機器廠	上海	袁忠雷	30,000	17	
1902	廣生行化粧品公司	香港		80,000	232	
1902	戴仁記布廠	上海	戴登川		240	
1902	振恒昌電燈廠	江蘇奉賢		30,000	54	
1902	景綸紡織廠	上海	徐雨之		220	
1902	漢口既濟水電廠	漢口	宋煒臣	3,000,000	396	

1902	洪順機器廠	漢陽	周文軒	15,000	50
1902	北洋烟草公司	天津	黃恩永	206,992	
1902	同德絲廠	順德		30,000	440
1902	同和絲廠	順德		19,000	420
1902	盛利絲廠	順德		19,000	420
1902	永源絲廠	順德		20,000	560
1902	大興面粉廠	南通	張審	20,000	
1902	內地自來水公司	上海	曹驥、楊文俊	1,810,000	
1902	同昌榨油廠	上海	朱志堯	130,000	
1902	忠信恆絲廠	順德		30,000	560
1903	協和絲廠	上海	樓景暉	30,000	1,120
1903	天津造膜公司	天津	宋壽恒	5,000	20
1903	福成布廠	上海	張嘯虞		136
1903	緒丰布廠	上海	王金林		100
1903	中華圖書館和記	上海	吳炳銓		228
1903	翰墨林印刷廠	南通	張審		50
1903	雙合盛火磨	哈爾濱	張鳳亮	40萬盧布	
1903	廣生榨油廠	南通	張審	300,000	350
1904	耀華玻璃廠	武昌		699,000	
1904	開成鉛筆廠	鎮江	許鼎霖、張審	140,000	
1904	源昌絲廠	上海	祝大椿	500,000	
1904	德隆烟廠	上海	陳錫鴻	13,986	162
1904	幼稚染織廠	重慶	李春林		
1904	裕丰面粉廠	上海	朱斗文	297,720	74
1904	丰和肥皂公司	杭州		6,400	9
1904	賈協昌鋼鐵廠	上海		2,000	10
1904	洽怡興鐵廠	上海		2,000	22
1904	裕通面粉廠	上海	朱計	500,000	120
1904	恆茂機器廠	上海		3,000	25
1904	協大機器廠	上海	陳志超	55,000	67
1904	張鴻昌鋼鐵機器廠	上海		2,000	4
1904	永勝面粉公司	寧古塔			
1904	裕順利火磨	寧古塔		500,000	
1904	萃源榨油廠	崑山	徐杏生		28
1904	裕順火磨	寧古塔			
1904	裕昌順記絲廠	無錫	周舜卿	55,944	825
1904	恆記手振記布廠	上海	葛桂臣		130

1926年
為阜丰收
買，改裕
通阜記面
粉廠。

設立 年度	廠 名	所 在 地	創 辦 人 或 主 持 人	資 本 (元)	工 人 數	備 注
1904	通川電燈公司	重慶	尹德鈞	300,000		
1904	華順肥皂廠	上海	朱銀水		100	
1904	華升昌布廠	武昌		1,000	20	
1904	大照電燈公司	鎮江	郭鴻韶	279,720	68	
1904	華昌電燈公司	汕頭	方仰政	100,000		
1904	福建輝華電燈公司	福州	林炳章	100,000		
1904	上海華商電燈公司	上海	翁子文(上 海馬路工程 總局太守)	100,000		
1904	鈞密磁業公司	禹州	曹廣叔	69,930		
1904	德昌成絲廠	順德		26,000	560	
1904	生記絲廠	順德		30,000	500	
1904	益記布局	沙市		5,000	68	
1904	阜生織綢廠	南通		20,000	180	
1905	寶興布廠	海門		6,000	4,500	
1905	裕生機織廠	寶山	黃柳臣	7,500	230	
1905	振東織造有限公司	梅縣		20,000	80	
1905	忠棧絲廠	順德		24,000	400	
1905	鉅經絲廠	順德		26,000	400	
1905	三星紙煙有限公司	上海	劉樹祥	139,860		
1905	烟台電燈公司	烟台	孫克選	210,000		
1905	大隆油皂廠	南通	張謇	10,000		
1905	廣州紙煙廠	廣州	梁灑淪	50,000		
1905	仁增盛煙草廠	烟台	孟昭顏	55,944		
1905	裕源織藤公司	蕪湖	張廣生	420,000		
1905	同利藤袋公司	上海	嚴信厚	280,000		
1905	資生鐵工廠	南通	張謇	70,000		
1905	中國紙煙有限公司	上海	蘇紹柄	41,958		
1905	隆盛煙草廠	烟台	王廷彬	13,986		
1905	恆利紙煙公司	烟台	易懷遠	69,930		
1905	中國四民紙煙公司	上海	朱曉	139,860		
1905	中安煙草公司	烟台	唐世鴻	27,972		
1905	南洋兄弟煙草公司	香港	簡照南	100,000	400	
1905	振新紡織公司	無錫	葉宗敬	419,530	2,300	
1905	中興面粉公司	上海		349,930	80	
1905	大有機器榨油廠	上海	席裕福	139,860	70	

1905	博山玻璃厂	博山	顧恩远、 胡廷干	209,790	
1905	振徐玻璃有限公司	宿迁	張晉等	559,440	500
1905	海丰面粉公司	海州	許鼎霖	279,720	200
1905	大丰面粉厂	清河鎮	刘寿祺	139,860	-
1905	富川造纸厂	重庆			
1905	振兴电灯公司	苏州	黃美欧	100,000	375
1905	济南华商电灯公司	济南	刘恩駐	279,720	130
1905	列用紡織厂	常熟		419,580	1,300
1905	宝华陶瓷厂	厦門			
1905	丹鳳火柴厂	北京	溫祖筠	77,000	
1905	惠利火柴厂	重庆		10,000	150
1905	东华火柴厂	重庆		20,000	200
1905	同丰榨油厂	汉口		200,000	
1905	华澄布厂	江阴	吳增元	72,000	1,100
1905	协順昌船厂	上海		2,000	15
1905	汇昌机器厂	杭州		4,000	30
1905	大丰面粉厂	上海	顧馨	100,000	150
1905	复原布厂	重庆			
1905	东华玻璃厂	重庆		30,000	
1905	裕泰紡織公司	常熟	朱幼鴻	699,300	963
1905	益泰轧花厂	上海		69,930	
1906	永貞祥絲厂	順德		30,000	550
1906	亨耀电灯厂	江苏江宁	李經楚	280,000	
1906	福华烟公司	汉口	孙泰圻	20,000	
1906	万益織呢厂	天津	潘汝杰	699,000	
1906	京师毛織厂	北京	汪世杰	420,000	
1906	同益砖瓦厂	广东南海	馮耀东	100,000	
1906	广和綸絲厂	順德		18,000	420
1906	永綸昌絲厂	順德		16,000	380
1906	錦記和絲厂	順德		17,000	300
1906	永和綸絲厂	順德		18,000	400
1906	虞兴織布公司	常熟		21,000	365
1906	羨余織布厂	宜兴	徐粹初	10,000	106
1906	广記火磨	黑龙江		400,000	
1906	汉丰面粉公司	汉口	黃蘭生	300,000	
1906	济泰紗厂	太仓	蔣汝坊(郎 中)	699,300	1,700
1906	泰丰罐头厂	上海	王拔如	70,000	160

1919年
合并于苏
州电氣厂。

設立年度	廠名	所在地	創辦人 或主持人	資本(元)	工人数	備注
1906	鹿窩玻璃廠	重慶	何鹿窩	111,888		
1906	毓蒙機器廠	永嘉		5,000	35	
1906	裕亨康記面粉公司	高郵		140,000	180	
1906	利民自來水公司	成都	王肇臣	23,000		
1906	汕頭自來水公司	汕頭	蕭永華	600,000	200	
1906	萬昌機器廠	上海		84,000	51	
1906	同茂興機器廠	上海		3,000	15	
1906	和豐紗廠	寧波	顧劍(中書 科中書)	839,200	1,785	
1906	匯昌機器船廠	上海	施興昌	100,000	60	
1906	利華機器廠	上海	張渭漁	1,000	13	
1906	福建藥房	廈門	叶心鏡	56,000	70	
1906	合記造胰公司	天津		2,000	20	
1906	晉裕布廠	武進	吳寄儒		340	
1906	五洲大藥房	上海	夏粹芳、 茂松	279,720	600	
1906	瑞記布廠	吳縣	吳次伯		26	
1906	清華實業榨油公司	清化鎮	程祖福	200,000		
1906	明遠電燈公司	蕪湖	程寶珍	251,748	100	
1906	豐豐榨油公司	江蘇海州	許鼎霖	300,000		
1906	大均榨油公司	常州	傅祖祜	300,000		
1906	豐盈榨油公司	安徽懷寧	張杏恩	100,000		
1906	公信玻璃廠	廈門		5,000		
1906	廣建玻璃廠	廈門				
1906	惠昌火柴廠	成都		32,000	300	1916年 改名利 生, 1920 年又改名 新集, 后 改現名。
1906	慶祥紡織廠	宜城		150,000		
1906	楊子機器有限公司	上海	顧潤章等	489,510		
1906	金陵機器火磚廠	南京	汪家声	20,000		
1906	愛國紙烟廠	北京	董思永	50,000		
1906	武昌水電廠	武昌	周秉忠	2,780,000		
1906	江西電燈廠	南昌	賀贊元	70,000		
1906	晉昌機器鋸木廠	上海	林應祥	260,000		
1906	龍章造紙廠	上海	龐濟元	559,440	600	清政府 補助六万 兩。
1906	恒裕機器錫酒公司	上海	孫植齋	167,832		
1906	吉祥磚瓦公司	南昌	徐象藩等	13,986		
1906	湧源面粉公司	天津	劉經鐸	41,958		
1906	双如意衛生磨廠	北京	黃文田	2,797		

1906	禾盛烟公司	鄞县	蔡鴻儀	100,000	
1906	华勝燭皂有限公司	天津	李韻嗣	3,000	
1906	怡源机器皮毛兼打包公司	上海	祝大椿	280,000	
1907	裕兴榨油厂	安徽阜阳	程恩培	279,720	
1907	振新紗厂	无錫	葉宗敬張若君(茂生洋行买办)	210,000	1,687
1907	天津永丰油庄有限公司	天津	李善亨	10,000	
1907	启新榨油有限公司	河南周家口	丁毅邦	139,860	
1907	鼎升恒榨油厂	汉口		10,000	25
1907	聚华肥皂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	張墨林	30,000	50
1907	光明燭皂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	姚秀亭	27,972	30
1907	瓦华制革公司	上海		419,580	
1907	福建华宝制磁公司	厦門	林絡存等	167,832	
1907	兴記机器磚瓦公司	蕪湖	李祥卿	27,972	
1907	裕源涌蛋厂	高邮	楊色信	20,000	100
1907	兆丰机器碾米公司	汉阳	刘建炎	139,860	
1907	裕亨面粉公司	高邮	刘瞻	279,720	53
1907	亲泰机器面粉公司	泰州	楊奎綬	180,000	30
1907	求精机器制造厂	上海	朱志堯	699,300	1,000
1907	兴商磚茶厂	武昌		500,000	400
1907	吉林兴华玻璃厂	吉林	陈佐庭	50,000	
1907	九成紗厂	上海	中國人与日本棉花会社合办	461,500	2,121
1907	振华紗厂	上海	吳祥林(怡和买办)	419,600	720
1907	福昌油坊	大連		60,000	
1907	天兴福油坊	大連		46,000	
1907	允丰榨油厂	汉口	凌盛禧	420,000	
1907	龙华制革公司	上海	严良沛	839,160	
1907	太原双福火柴厂	太原		16,783	100
1907	金陵自来水厂	南京	李光瑜等	420,000	
1907	新兴造纸厂	天津	楊宝慧	182,000	
1907	順丰榨油厂	汉阳	宁波商人		70
1907	鎮江造纸厂	鎮江	尹克昌	350,000	
1907	鼎和詰罐厂	杭州	孙懋华	15,000	
1907	大成布厂	宝山	盛錦元		250
1907	勤华布厂	常熟	夏云卿		123
1907	源康絲厂	无錫	顧重庆	10,000	825

后归日商，1917年为申新收买，改称申新。

設立年度	廠名	所在地	創 辦 人 或 主 持 人	資 本 (元)	工 人 數	備 注
1907	呂 盛 布 廠	南通	張容	6,035	67	
1907	公 義 成 地 盤 廠	上海	朱重生	13,986	110	
1907	光 明 燭 皂 廠	杭州	姚芳亭	15,000	30	
1907	又 和 鐵 工 廠	上海		2,000	26	
1907	泰 來 元 記 機 器 面粉廠	丹徒	傅筱庵		200	
1907	大 生 紗 廠	崇明	張譽	1,210,000	3,400	
1907	淘 化 罐 頭 食 品 公 司	廈門		120,000	100	
1907	新 云 龍 軋 花 廠	上海		27,972		
1907	貞 禧 絲 廠	順德		20,000	350	
1907	潛 源 紡 織 公 司	汾陽		9,345	67	
1907	商 辦 振 興 紡 織 公 司	無錫		270,800	954	
1908	同 昌 紗 廠	上海	朱志堯	600,000	708	
1908	利 用 紗 廠	江陰	施子美, 严 惠人等办。	419,600	1,300	
1908	鴻 興 蠶 絲 廠	宝山		30,000	313	
1908	益 晉 織 布 公 司	祁县		22,500	260	
1908	振 發 織 布 局	广东澄海县		50,000	180	
1908	裕 隆 興 絲 廠	順德		20,000	320	
1908	麟 記 卷 烟 公 司	天津	紀巨汾	80,000		
1908	祥 森 火 柴 公 司	上海	洪德生	13,986		
1908	怡 茂 皂 廠	上海	董文祥	10,000		
1908	祥 生 燭 皂 公 司	上海	洪德生	27,972		
1908	天 盛 榨 油 廠	漢口		279,720		
1908	南 昌 碾 米 有 限 公 司	南汇	葛靜研	41,958		
1908	大 恒 機 器 磚 瓦 公 司	杭州	吳恩元	13,986		
1908	商 辦 關 北 水 電 廠	上海	陳佩衍	629,370	287	
1908	德 裕 肥 皂 廠	成都		13,000		
1908	祥 合 肥 皂 廠	重慶		2,797		
1908	松 茂 火 柴 廠	云南昭通		10,000	70	
1908	文 明 火 柴 廠	廣州	梁煥文	20,000	200	
1908	永 衡 電 燈 公 司	吉林	李士名	400,000		
1908	中 興 布 廠	常熟	許蘭溪		193	
1908	吉 林 機 器 磚 瓦 廠	吉林	裕康	28,000		
1908	天 津 鐵 絲 釘 廠	天津	徐宗棠	420,000		
1908	廣 州 電 力 有 限 公 司	廣州	黃秉常	1,500,000		
1908	美 利 發 布 廠	江陰	王恩槐		192	

1908	鼎升布厂	江阴	季希三		240
1908	华纶布厂	江阴	顧良友		156
1908	厚生碾米厂	南昌	蕭慶良	139,860	
1908	益新面粉公司	蕪湖	胡庆余	100,000	50
1908	永远火磨公司	阿什河		50,000	
1908	利同布厂	丽水		6,500	360
1908	長宁火磨公司	宁古塔		40,000	
1908	裨农絲厂	四川三台	陈宛溪	80,000	300
1909	美經絲厂	順德		14,000	300
1909	德昌綸絲厂	順德		20,000	316
1909	絲业有限公司	广西梧州		43,360	116
1909	积善昌山蚕工厂	貴阳		7,500	200
1909	連盛織造局	中山		5,000	50
1909	肇新織染有限公司	汉口		150,000	370
1909	新兴功工厂	山西忻县		25,500	120
1909	陈明合織布厂	广东澄海		10,000	70
1909	源康永記絲厂	无錫	何夢蓮	45,000	679
1909	裕綸織物公司	武进		6,000	200
1909	勤华織布厂	常熟		5,000	121
1909	汇西爱国布厂	上海		52,500	220
1909	协成元織工厂	河北饒阳		60,000	590
1909	善記織染工厂	天津		5,000	42
1909	华兴織工厂	天津		5,000	50
1909	恒兴絲厂	安东		8,000	110
1909	湖南电灯公司	長沙	陈文煒	200,000	160
1909	湘潭电灯公司	湘潭	黎景高	150,000	
1909	五升昌机器厂	武昌	顧維桢	9,000	20
1909	北洋火柴厂	天津	尹長庚	210,000	1,350
1909	广益紗厂	安阳	孙家胤馬希援	699,300	1,559
1909	同聚祥油坊	大連		42,000	
1909	协和火柴厂	云南		5,000	60
1909	云祥火柴厂	云南东川		12,000	
1909	德昌火柴厂	云南东川		6,000	70
1909	美綸麻袋公司	汉口	李平书	200,000	
1909	揚清肥皂厂	上海	虞洽卿	180,000	
1909	太原电灯厂	太原	刘篤敬	209,790	
1909	恒泰面粉厂	南昌		1,000	10

設立年度	廠名	所在地	創辦人 或主持人	資本(元)	工人数	備注
1909	立大面粉厂	上海	顧馨一	279,720		
1909	惠华汽水厂	上海	陆荣彰		16	
1909	通州电灯厂	通州		100,000	47	
1909	九丰面粉厂	无錫	蔡文鑫	391,608	120	
1909	劝工棉織厂	无錫	吳玉书	40,000	430	
1909	德源碾米厂	无錫	华承謨		30	
1909	云澄布厂	无錫	王桐		280	
1909	美綸織布厂	无錫	夏云鶴		294	
1909	泰康玻璃厂	永嘉		1,000	10	
1909	恒隆蓮記油厂	上海	傅運生	15,000		
1909	祥华制糖厂	福建龙溪	郭植祥(华侨)	450,000	400	
1909	萃隆針織厂	杭州		10,000	40	
1909	广兴制蛋厂	保定		200,000	213	
1909	合記教育用品社	上海	林康侯等	200,000		
1909	姚兴昌机器厂	上海		10,000	23	
1909	耀龙白灯厂	昆明		1,200,000		
1909	宝新碾米厂	无錫		10,000	27	
1909	同裕碾米厂	杭州		5,000		
1909	兴順福机器榨油厂	济南		150,000		
1909	文通书局	贵阳	华鴻之	100,000	160	
1909	裕隆面粉公司	汉口		419,580		
1909	东兴火磨	傅家甸		50,000 盧在		
1909	永泰第二絲厂	无錫		60,000	1,025	
1910	振艺絲厂	无錫	許稻蓀	10,000	720	
1910	裕順和火磨	吉林		50,000		
1910	振艺协絲厂	吉林	杜鳳桥	70,000	770	
1910	富华制糖公司	呼蘭				
1910	鄒成泰絲厂	无錫				
1910	大中火柴公司	开封				
1910	譚花机器厂	汉口	譚益禧	5,500	20	
1910	福茂余記肥皂厂	上海	邵錦章		40	
1910	东永茂油坊	大連		30,000		
1910	华洋糖厂	福建仙游		500,000		
1910	义生火柴厂	鎮江				

初时商办，后改官办，并改名为呼蘭糖厂。

1910	光 华 火 柴 厂	杭州	王 湘 泉 等	50,000	1,490
1910	吉 祥 火 柴 厂	广州		21,500	200
1910	广 中 兴 火 柴 公 司	广州		6,000	
1910	大 和 火 柴 公 司	广州		16,000	
1910	宁 远 制 革 公 司	甘肃宁远		350,000	20
1910	巧 明 光 記 火 柴 厂	广东佛山		20,000	200
1910	申 大 面 粉 厂	上海	顧 馨 一	200,000	184
1910	科 学 仪 器 馆	上海	林 滌 菴		15
1910	恒 泰 丰 布 厂	上海	葛 桂 臣		158
1910	华 彰 布 厂	上海	赵 鏡 清		100
1910	大 有 利 电 灯 厂	杭州	俞 丹 屏	30,000	
1910	永 明 电 灯 厂	嘉兴	赵 家 蕻	50,000	
1910	福 州 电 灯 公 司	福州	陈 文 麟	1,200,000	740
1910	長 春 商 埠 电 灯 厂	長春		180,000	
1910	华 新 布 厂	上海	赵 鏡 清		234
1910	东 升 布 厂	江阴	楊 錫 祉		346
1910	业 勤 毛 巾 厂	无錫		6,000	240
1910	华 丰 布 厂	江阴	姜 叔 屏		154
1910	华 美 布 厂	江阴	周 繼 武		194
1910	勤 德 布 厂	常熟	陈 勤 齋		252
1910	昭 勤 布 厂	常熟	陆 云 台	5,000	220
1910	普 临 电 灯 公 司	开封	魏 步 云	250,000	200
1910	乾 蛙 絲 厂	无錫	孙 鶴 卿	100,000	640
1910	光 华 針 織 厂	浙江平湖		30,000	
1910	彩 道 机 器 厂	上海	周 彩 道	5,000	45
1910	鉦 鍋 机 器 厂	上海		1,500	15
1910	鄰 成 泰 碾 米 厂	无錫		5,000	
1910	貽 来 牟 和 記 面 粉 厂	北京	朱 有 謙	120,000	40
1910	国 光 印 书 局	上海		20,000	80
1910	天 福 絲 厂	重庆			316
1910	全 启 泰 铁 工 厂	济南	黃 全 材	20,000	65
1910	利 恒 昌 絲 厂	順德		18,000	400
1910	順 昌 絲 厂	順德		17,000	500
1910	合 順 成 铁 工 厂	天津	馬 際 云	5,000	
1910	硖 石 电 灯 厂	浙江海宁	徐 光 溥	30,000	
1910	同 吉 祥 布 厂	宜昌		5,000	45
1910	香 山 南 屏 广 兴 織 造 公 司	中山		7,500	55

1929年
开封市政
府收归官
办。

設立年度	廠名	所在地	創辦人 或主持人	資本(元)	工人数	備注
1910	錦華恒織布廠	常熟		7,500	130	
1910	大綸仁記布廠	常熟		7,500	178	
1910	中興織布廠	常熟		14,000	232	
1910	遠記絲廠	安東		22,500	180	
1910	公益紗廠	上海	祝大椿	1,340,000		
1910	華安絲廠	安東		15,000	230	
1910	大業織布公司	遼陽		20,000	50	
1911	永泰和織布廠	武進		8,000	210	
1911	華昌織布廠	常熟		20,000	297	
1911	衣家染紡股份 有限(工)	廣東揭陽		10,000	85	
1911	美經成絲廠	順德		12,000	300	
1911	華昌火柴廠	天津			1,200	
1911	華利肥皂廠	上海	俞鍾亮		48	
1911	泰昌利油坊	大連		30,000		
1911	福順成油坊	大連		80,000		
1911	聚成祥油坊	大連		42,000		
1911	有麟火柴廠	重慶		30,000	200	
1911	遼陽電燈廠	遼陽	中日合辦	120,000		
1911	鴻發電燈廠	湖北宋埠				
1911	永明電燈公司	嘉興	陳寶聚、楊 廷棟等	100,000		
1911	松江電燈廠	松江	龔孟班	60,000	30	
1911	裕泰恒布廠	上海	孟友生		115	
1911	匯西布廠	上海	朱开甲		500	
1911	中國化學工業社	上海	方液仙	50,000	110	
1911	履和絲襪廠	上海	施亦政		501	
1911	九成布廠	江陰	趙贊成		112	
1911	華利布廠	常熟	高長庚		128	
1911	南陽燭皂廠	上海	項松茂	30,000	68	
1911	善昌布廠	常熟	翁寅初		223	
1911	維新布廠	常熟	譚芝溪		127	
1911	手泰豫碾米廠	吳江	顧楚臣		14	
1911	天泰布廠	武進	朱子康		140	
1911	通惠布廠	武進	孟永蓮		85	
1911	精益眼鏡公司	上海	張士德		10	
1911	江省電燈公司	齊齊哈爾	廣信公司	93,000		

1911	美昌机器厂	上海		20,000	30
1911	大生铁厂合资公司	宝坻		12,000	
1911	乾义昌锅灶厂	上海	于义庭	10,000	46
1911	滑鑫机器厂	无锡		3,000	14
1911	史恒茂机器厂	上海		4,000	13
1911	歌川丝厂	重庆			470
1911	光华火柴厂	杭州		500,000	1,490
1911	葵昌火柴厂	上海	邵尔康	50,000	800
1911	双合盛火磨公司	双城堡		100,000	

說明：(一)資料來源：1.1912年“農商統計”，農商部總務廳統計科編；2.實業部國際貿易局編：“中國實業志”的江蘇、浙江、湖南、山東、山西等省；3.1912年以前的上海“申報”和“時報”；4.上海總商會出版：“上海總商會月報”各期；5.實業部中央工廠檢查處編：“中國工廠檢查年報”第一、第二期；6.“世界年鑑”921至940頁；7.日本東亞同文會編：“中華民國實業名鑑”；8.施復侯：“30年來之中國面粉業”，茂新、福新、申新公司三十周年紀念刊；9.國貨事業出版社：“中國國貨工廠史略”；10.聯合征信所編：“華股手冊”；11.上海機聯會編：“工商史料”第一第二集；12.“江蘇政治年鑑”；13.“湖南年鑑”；14.“五年來廣東之工業建設”；15.嚴中平：“中國棉紡織業史稿”；16.張肖梅編：“四川經濟參考資料”；17.“貴州之經濟”；18.“第一回中國年鑑”；19.日文“中國之工業”；20.同期的“申報”、“中外日報”、“時報”、“東方雜誌”等有關資料編成。

(二)本表統計是以使用動力的工廠為對象，至於有些工廠（如織布廠），因資料缺乏不易區別是否使用動力，則以僱傭工人30人為限，但這類工廠入選的為數極少。

(三)資本數是統計其創辦時的實收資本，至於創立以後的增資改組，則沒有加以統計。

(四)創辦人或主持人，是指初創時的主要出資者或後來的總經理、經理。

(五)由於歷史資料的缺乏，工人數都不是創辦時的數字，而是後來所填的數字。同時，個別工廠的創設年分，資本數及創辦人可能有錯誤，個別工廠也可能遺漏沒有加以統計，但估計，大體上還可近似地反映中國工廠早期發展情況。

(六)統計對象僅限於民族資本經營的工廠和個別官商合辦工廠。不包括官辦工廠。

1920年以前中国近代工厂统计

(一) 甲午战争以前(1895年以前)商办和官办工厂统计

业 别	商办 厂数	官办 厂数	合 計	商办工 厂資本 数(千元)	官办工 厂資本 数(千元)	合 計	商 办 工 厂 工 人 数	官 办 工 厂 工 人 数	合 計
棉紡織工业	6	4	10	1,738	4,200	5,938	10,000	12,200	22,200
繅 絲 工业	48	—	45	1,659	—	1,659	22,894	—	22,894
毛紡織工业	—	1	1	—	262	262	—	174	174
化学工业	14	2	12	1,600	450	2,050	3,171	400	3,571
食品工业	4	—	3	2,016	—	2,016	328	—	328
机械和五金 工业	12	2	13	218	20,400	20,618	457	4,000	4,457
印刷工业	2	—	2	60	—	60	300	—	300
冶煉工业	—	2	2	—	25,000	25,000	—	3,000	3,000
鑄 錢	—	2	2	—	5,000	5,000	—	647	647
軍 械 工业	—	18	18	—	120,000	120,000	—	27,000	27,000
合 計	77	31	108	7,291	175,312	182,603	37,150	47,421	84,571

說明：(一)这个表格資料来源是根据后述附录“辛亥革命前民族资产阶级創办的工厂统计表”和本书第三种第一节“辛亥革命前官办工厂”汇总而来的。

(二)这里的统计是以采用动力的工厂为对象，至于有些工厂因材料关系分不清是否采用动力(如織布工厂)，則以僱佣工人數30人以上者统计在內。此外，仅包括华商经营的工厂，外国在华工厂不在內，矿山也不在內。

(三)商办工厂中有一小部分的資本数和工人數不明，官办工厂中有大部分資本数和工人數不明，这些工厂的資本数和工人數是参照其規模及同类工厂加以估算的。此外，有不少工厂的工人数字都不是剛創办时的工人數，而是后来(1895年以后)所填的数字。資本数則以其初創办时的实收資本为统计原則，至于創立以后的增資或工厂所有权的变迁(如商办改为官办，官办改商办)則沒有加以统计。

(四)由于資料缺乏，特别是資本数和工人數的資料缺乏，因此这个表格的统计是不够确切和完备的，但凡是可能收集到的資料都包括在內并加以校正，估計在工厂数方面遺漏的不多，因此这个表格大体上还可以反映当时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情况。

(五)本表的业別分类中，棉紡織业包括軋花、棉紡織工厂；化学工业包括火柴、制造西药、造纸；食品工业包括机器碾米和机器榨油；机械工业包括机械制造和修理及造船。冶煉工业包括煉鉄制鋼；軍械工业則包括前清官办軍械火药工厂。

(二)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1913年以前)中国近代工厂统计

业 别	厂 数	资 本(千元)	工 人 数
紡 織 工 业	231	32,547	157,150
食 品 工 业	105	18,620	13,700
印 刷 文 具 工 业	25	8,280	8,460
机 械 和 五 金 工 业	101	31,219	18,450
冶 煉 工 业	8	28,100	7,532
化 学 工 业	153	20,127	28,687
公 用 事 业	38	53,700	5,640
軍 械 工 业	23	128,000	28,500
鑄 銀 錢 业	5	10,000	1,447
其 它	9	231	1,151
合 計	698	330,824	270,717

說明：(一)資料来源，除根据前表“甲午战争前商办和官办工厂”外，还根据下列资料逐个工厂统计的：(1)历次“农商统计”；(2)实业部国际贸易局编：“中国实业志”江苏、浙江、湖南、山东和山西各省；(3)实业部中央工厂检查处：“中国工厂检查年报第一和第二期”；(4)中文“世界年鉴”，第921—940页；(5)日本东亚同文会编：“中华民国实业名鉴”；(6)日本东亚同文会编：“中国年鉴”第一、二、三各回；(7)施复侯：“30年来之中国面粉业”，福新、申新公司三十周年纪念刊；(8)日本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华北工场实地调查”天津、济南、烟台、濰县各编；(9)張肖梅：“四川经济参考资料”，国民经济研究所出版；(10)严中平：“中国棉纺织业史稿”；(11)龔駱：“中国都市工业化程度之统计分析”；(12)“江苏政治年鉴”；(13)“湖南年鉴”；(14)日本满铁经济调查委员会：“满洲工场名簿”；(15)上海市社会局：“上海工厂名录”；(16)建设委员会：“中国电气事业统计”；(17)全国经济委员会：制纸、火柴、橡胶、毛織、电器用具等调查报告；(18)日本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广东、天津、无锡、武进等各地经济事情；(19)本书第三种“辛亥革命前官办工业统计表”等及1913年以前之“申报”、“时报”、“中外日报”。

(二)同上表“甲午战争以前中国近代工厂统计”之注(二)至注(四)。

(三)由于资料缺乏，本表格只统计其开业情况，对于开业以后是否停闭则没有加以统计。

(四)业别的分类：纺织工业包括棉織、絲織、毛紡織、印染和轧花工业。食品工业包括面粉、机制碾米、机制糖、酿酒(雇佣工人50以上)、机器榨油、罐头、卷烟；印刷文具业包括印刷文具仪器；化学工业包括水泥、机制磚瓦、陶瓷、火柴、西药、肥皂、化粧品、制革和造纸；机械五金工业包括机器制造修理、五金制造、造船和铁路附设之工厂；公用事业包括电灯、自来水；冶炼工业包括煉鉄、制鋼、煉鉛、錫、鋅；其它工业包括鋸木和繅絲厂等。

(三) 中国共产党诞生前夜 (1920年以前)中国近代工厂统计

业 别	厂 数	资 本(千元)	工 人 数
紡 織 工 业	475	82,750	358,110
食 品 工 业	280	63,246	43,150
印 刷 文 具 业	51	10,821	11,825
机 械 五 金 工 业	252	38,885	25,720
化 学 工 业	383	47,558	61,955
冶 炼 工 业	12	32,150	8,990
公 用 事 业	243	85,377	15,190
军 械 工 业	23	128,000	28,500
鑄 銀 錢 业	5	10,000	1,447
其 它	35	1,833	2,735
合 計	1,759	500,620	557,622

說明：(一)資料来源同上述第二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中国工厂统计”。

(二)与上述第二表注(二)至注(四)同。

1933年华商工厂统计

业 别	厂 数	职 工 数	总产值(千元)
木材制造业	18	1,251	2,766.2
机械制造业	222	14,285	20,102
金属品制造业	82	7,077	61,034
电气用具制造业	55	4,507	11,340
交通用具制造业	29	2,206	5,246
土石器工业	105	13,122	15,351
水电气制造业	603	19,581	117,477
化学工业	159	41,734	77,536
纺织工业	808	342,433	592,452
服用品工业	165	16,815	37,481
皮革制造业	85	14,555	38,231
饮食品工业	493	44,756	377,476
造纸印刷工业	237	19,183	47,590
饰物仪器工业	74	3,882	5,611
杂项品工业	32	3,105	4,766
合 计	3,167	548,492	1,414,459.2

注：(一)资料来源见巫宝三等编：“中国国民所得”上册第64页后第一表和第70页后第5表。

(二)编者按：这个统计表是“中国国民所得”一书作者根据刘大钧著的“中国工业调查报告”所统计的数字加以补充改编而成。“中国工业调查报告”所统计的数字仅系17省市，没有包括东北、冀南、贵州、新疆等省，总计全国共有2,435个工厂，资本额406,873千元，职工人数493,257人，年产值1,113,974千元。“中国国民所得”的作者虽然对刘大钧数字作了补充修改，但它统计的对象仍按国民党的所谓工厂法规定，这个工厂法仅限于雇佣工人30人以上并使用动力的工厂才列为统计对象，因此许多中小工厂都被抛弃漏列了。故这个统计是不完备不精确的，在厂数、职工人数和生产总值都远较实际为小。

(三)总产值合计数原文是1,415,459.2，经编者核对修正如上数。

1930—1936年各年度工业概况

一 1930年度

民國19年之紗业 苦于战事，内地人民消费力减少，销数不旺，加以秋棉歉收，交通不便，原料益感不足，购买外棉，则以金价紊乱，成本难定，支持煞费苦心。幸至年终，因统税将次颁布，各地纷纷预先进货，又因花价腾涨，纱价骤见起色，各厂得赖资弥补。其有12厂停业者，则由于投机失败所致，其原因不在乎纱业之本身也。计是年全国各纱厂增加锭子数目，就其已装置完竣者，约为14万余锭，合原有共为2,336,000余锭。此外在华之日本纱厂锭子已达150万左右，闻不久尚须增加四五十万锭，其增进之速，远迈我国，允为中国纱厂之劲敌。中国厂家，若不于原料、工作、管理、资本之四者，切实改进，前途实岌岌可危。

粉业 北方粉厂，年来日见衰微，至19年度，因南方禁止粮食出口，得以获利。南方各厂则因原料缺乏，复格于禁令，销路阻滞，营业不佳，幸至十月解禁，销路打开，尚得维持，而获利者则殊寥寥。全年中新厂成立者一家，旧厂稍事扩充者只12家，视前无大发展。全国生产额，若开全工，每日为25万包，较前3年之日出20万包者，生产率已增20%。然以原料不足，销路不广之故，各厂开全工之期间，只有5个月，其余7个月只开半工。

中国生丝产量，向来推测，应有40万担上下，年来逐渐减少，19年度计只27—28万担，较之18年度约减少八九万担。其减产之重要原因，不外乎蚕茧歉收及茧质不良，致出品欠佳而成品反贵。同时复因世界市面衰落，各国丝织厂大半减工停业，生丝销路大减，日本丝贱价出售，华丝无法竞争。故丝业之衰败，为数十年所罕见。上海丝厂

106家中，年終時停業者約達70家，無錫絲廠70家中，停業者約40家，廣東絲廠情形之困難，亦復相類。

國人經營之工廠，年來因愛國心之勃發，政府之提倡，復因關稅增加，金價騰貴諸原因，頗有蓬勃氣象，19年度各國貨工廠之營業數量，較之18年度，均有多少之增加，試以18年度之各業營業數量為標準，表示19年度各業之增加百分數如次：（18年度為100）

捲烟業.....	130	造紙業.....	110
棉織業.....	120	針織業.....	120
制帽業.....	130	調味品.....	140
制皂業.....	115	搪磁業.....	100
化妝品.....	110	橡膠業.....	250
機器業.....	50		

國貨工業，種類繁多，未遑備舉，前表所列，系摘其重要者而言。其18年度，上述各業之營業總數量，估計約為120,000,000元，平均以增加20%計，則19年度之營業總數量，應有2,400萬元之增加，不可謂非進步。

（摘自中國銀行1930年度營業報告31—33頁）

二 1931年度

中國近年來國貨工業，已見萌芽，孳生甚速，主要者當首推紗業，而紗錠亦日有增加。但與世界之工業國相較，則尚百不得一。其尤可注意者，上海一隅，已成中國工業之中心，大小工廠約2,000家，資本總額約3萬萬元，工人總計約25萬。本年因原料價低，成本減輕，復以抵制日貨關係，除絲業因日絲充斥，市價銳跌外，其餘各業上半年均見蓬勃氣象，較19年度為獲利。不意其後長江水災東北事變次第發生，銷路銳減，故全年總計不能有意外之盈餘。惟關於中國工業有一二不可忽視之點，略言之如下。

紗業之競爭 中國人自辦之工業，首推紗業，而中日工業競爭最烈者，亦莫如紗業。去年本行調查，全國之中國紗廠所有錠子共為233萬6千餘錠，在華日本紗廠錠子，約150餘萬，然以日廠資本雄厚，技術精良，組織完密，故雖如本年度抵制之激烈，工作時間之縮短，而

上海日厂之产量，反多于中国厂家。計上海华厂出紗 56 万包，出布 147,000 件；上海日厂出紗 697,000 包，出布 216,000 件。即以中国全国計之，华厂共出紗 1,458,000 包，出布 357,000 件；日厂共出紗 1,008,000 包，出布 315,000 件。由此觀之，中日相較，日厂之全体产量，出布几相等，出紗則多于紗錠比例应得之产額，本年度华厂增加 6 万余錠，而日厂反增加 10 万余。

近来关税增加，金价向上，进口細布价貴，紗厂本以出細紗为获利之源，华厂更应趁此时机，增加产量。乃上海华厂所有之細紗錠子，只占总錠数之四成半，而日厂則占日錠总数之七成半。中国厂家，若欲改易細紗錠，又岂短時間所能举办。是以本年度虽有抵制之举，而日貨之需要如故，加以日本紗成本，往往卖价低于国产，华北各省，但計价之高賤，不論貨之中外，故黄河以北，几成日紗之銷售区域。長江下游以及华南各省，則倡用国貨，甚为热烈。日紗虽較难插足，而日本紗业在中国之占优势，已成明显之事实。

中国产絲之品质价格与数量，均不能与日絲竞争，論品质則茧种龐杂，机械陈旧，以致絲质高下不一。論数量則年总产 5 万余包，而品质不齐，不合美国大量生产之需要，論价值則茧价高昂，纒折奇大，拆息稅捐、負担奇重，成本大于日絲十之二三。在普通年成，已难与日絲竞争，乃本年欧美絲市，日益疲滞，絲价暴跌，前年年底厂絲尚在 1,000 兩外，本年 4、5 月間仅及 900 余兩，至年底降至 800 兩。若以日絲价格合华絲价格只等于 600 兩左右，乃中国厂方成本均在千兩以外，亏耗太巨，惟有观望不售，結果各厂势难支持，相率停閉。上海 107 家絲厂，工作者仅 20 余家，无錫 49 家中工作者亦只 10 余家。其他苏、鎮、杭、嘉、湖各厂，十之八九，均已停閉。20 年度，江浙厂絲輸出数量較之 18 年减 2/5，較 19 年减 1/5。18 年輸出为 54,000 余包，19 年减为 42,000 余包，本年度只 32,000 余包。广东絲厂总数，减去 40%，出口总数仅 46,000 余包，比 19 年减去 14,000 余包，比 18 年减 20,000 包。

政府为救济起見，有絲业公債 800 万元之发行。然結果增加出口稅每包 30 元，債券既不能在市面流通，而于絲厂，复无所补救，而且增

加出口之成本，可謂毫無計劃之救濟。

所可喜者，國人對於蠶種業漸知注意，此一年中江浙蠶種業之進步，蒸蒸日上，浙江蠶種產額增加一倍，江蘇在一倍以上。絲廠之中亦有數家改用多條繅絲，以提高均勻程度，期合美國之需要。然根本之道，仍在政府與人民切實合作，于蠶種之改良，絲廠機械全部之更換，必須有一大規模之統盤計劃，切實進行。否則養蠶繅絲，勢將絕迹，即中國廠家所夢想之美國愛用華絲之機會，亦等于鏡花水月耳。

國貨工業基礎之薄弱 三年以來，國貨工業，只以關稅增加，外貨暴漲，人民漸知愛用國貨，大有振興氣象。20年度各國貨工廠之營業數量，較之19年度均有增加。茲將19年度各種營業總值為基數，以20年度增加百分數列于下：（19年度假定為100）

面粉業.....	120	機器業.....	125
染織業.....	125	洋傘業.....	60
油墨業.....	350	棉織業.....	128
造紙業.....	125	絲織業.....	160
橡膠業.....	200	針織業.....	100
調味業.....	112	火柴業.....	120
搪瓷業.....	158	卷煙業.....	115
造漆業.....	128	化妝品業.....	120
榨油業.....	109	毛織業.....	89
磚瓦業.....	143		

是以除一二業稍遜外，余均進步，營業總值約增加4,000萬元。若無水災與東北事變，則進步尙不止此。惟國貨工業，萌芽伊始，而一則資本均屬薄弱，二則原料大都來自國外，三則設備不完備之小廠增加，四則外國廠家之競爭，尤以日本在華添設雜貨工廠為國貨工廠之勁敵；益以國外市面衰敗，銷路停滯，金價跌落；因此外貨充斥，國貨工業之基礎，隨時足以動搖。

（摘自中國銀行1931年度營業報告35-40頁）

三 1932年度

本年度因抵制日貨，提倡國貨，及銀價不高，各種工業尙有相當

成績。然以市面不振，物價低落，故產量曾未大減，而營業總額已漸見低減，盈利更見微弱，非上年可比。茲將各業情形，略述于下。

紡織業 據最近調查，全國共有紗廠128家，開工紗錠4,493,000余枚，比較20年底，增加265,130余枚。其中屬於華商紗廠者，計2,522,300余枚，比較20年底，增加141,775枚。屬於在華日商者，計共1,787,780余枚，比較20年底，增加109,380余枚。全國中外紗廠出品，最近一年中，共計棉紗2,283,898包。其中華商紗廠出品，僅約1,427,920包，日商紗廠出品，則有805,979包。去年度各紗廠產量，比較前年為增，棉紗銷路，則見減少。上海紗號全年營業大都虧本，71家紗號之中，倒閉者共17家。華商紗廠之被日軍炮火轟毀者一家，局部受害者7家，其他各廠，因紗銷減少，無不大受影響。至廠布產量，計華商紗廠本年度之出品，為206,000余件，在華日商紗廠所產棉布，合255,000件。自東三省市場完全為日人占領後，我國本廠布及土布，受極大之影響，統計上海一埠，現有棉商號630—40家，較諸往年減少1/3。本埠棉布商之經營外貨者，無不折閱，惟推銷國貨棉布之家，稍有利潤。至于小布廠，則因日貨跌價競爭，及出品滯銷關係，僅能苟延殘喘而已。

棉織業 中國之棉織業，亦以上海為中心。統計本埠棉織業54家之中被日軍炮火所毀者16家，較大之廠，均在戰區以外，故未波及。棉織廠之中，專事織造汗衫及衛生衣者共八家，全年營業380余萬元，較上年度減少70余萬元。本年度以物價跌落，故斯業中接受大量定貨者，無不虧折。

繅絲業 本年度中國生絲產業之衰落特甚，上年度我國生絲出口總數，共計133,000余担，而本年度總數，只有76,600余担。且合美國銷路者，日見其少，去年美國購進生絲547,900包，其中日貨占513,000包，而華絲僅18,000包而已。運往印度者，則增加一倍有半，運往歐洲者，亦與上年數量相仿。惟價格低落，絲廠無不虧本。本年度絲廠開工者，無錫47廠中只開9家，上海97廠中只開11家，而絲業衰落之最大原因，仍在蠶種退化，養育無方，非有根本救濟，絲業難望進

步。

絲織業 綢緞為我國特產之一，近來國際經濟衰落，對於我國綢緞進口關稅增加；而在南洋、安南、印度則近年受日貨排擠，東北市場又被日本侵奪，故生產額隨銷路而大減。上海絲織廠 560—70 家，繼續開工者只 240—50 家。本年度之營業，較上年減少 30% 強。杭州綢廠，自 900 余家減至 200 余家；南京蘇州各綢廠，更無起色。

其他各業 面粉業則本年上半年萎靡不振，下半年日漸暢旺，故斯業頗為發達。捲煙業全年統計，全國出品約計 140 余萬箱，共值 16,800 余萬元，較上年度減少 10%。滬上各廠，大都無利可圖。其較大者如南洋、英美、華成各公司均有相當利潤。橡膠廠在本年度大見增加，香港、青島，均設新廠，上海方面，增加 20 余家；但生產增加而銷路不旺，致成供過於求之現象。結果去年橡膠廠營業，多數有虧無盈。機器工業，近年頗見發達，國內工廠所用之各種輕工業機器，均能仿制，成本較舶來品減少 2/3。上海一埠，現有機器工廠大小 500—600 家，其中加入公會而認為規模稍大者，計 107 家，全年營業總數，約計 1,100 余萬元，較上年度減少 1/3。化妝品統計上海化妝品工廠 70 余家，上年度營業總數，超過 800 萬元，本年則不足 500 萬。油漆業上海方面較大者只四家，本年全體營業，約計 290 萬元，較上年度增加 1/10。搪瓷廠營業，共計 350 余萬元，較上年度減少 36%。熱水瓶廠在滬戰期內大受損失，然恢復甚速，本年全體營業總數，與上年相仿，約計 270—80 萬元。

國貨工業基礎之薄弱，已屢言之，今後中國人民購買力日見低落，其影響於國貨工業，固不待言；而日貨挾其巨大之勢力及低價之匯兌，向中國傾銷，更屬無可抵禦。

（摘自中國銀行 1932 年度營業報告 49—52 頁）

四 1933 年度

中國工業，發達較早範圍較廣者，首推紗廠、粉廠、絲廠，次則捲煙、火藥二業，其新興而範圍較小者，為日用品工業。粉廠之進展，已

至相当限度，紗厂則年有扩充，惜近以人民購買力薄弱，銷路狹隘，故紗粉兩业，其經營不甚得法者，即遭亏折；絲业則以絲价跌落，十九不能支持；卷烟、火柴二业，以竞争剧烈，統稅加高，除少数基础巩固者外，均难获利。至新兴之日用品工业，正在发揚滋長之秋，至去年而呈露艰窘銷沉之象，則一二八事变，及农村衰落之影响，有以致之也。故以全般工业論：22年度可称工业界困苦时期之开始；若以地域論：則內地之厂，接近原料产地与消費市場，故成本較之通商口岸之厂，得以輕減，所以本年内地紗厂粉厂營業，較胜于上海、天津、汉口各厂。顧內地与租界地之中国工业，无不时受二重威胁；即在中国所設外国工厂之竞争，及外国同样进口品之傾銷，此經營工业者之时时引为深忧者也。

紡織業 22年度棉紗价格跌落之巨，为10年来所未有。21年度标紗最低价为193元，本年度为166元；本年上海客帮銷路，仅21年之七成，不及20年之半数；若与灾患以前之19年相較，南方及長江均減其半，北方則只減1/50。据22年3月調查数目，全国紗錠，計5,019,917枚，較去年增加322,637枚，較前年增加575,617枚。在此种現象之下，不得不各謀生存；于是外商紗厂与中国紗厂相竞，內地紗厂与通商口岸之紗厂相竞，北方紗厂与南方紗厂相竞，竞争愈烈，生存愈苦。概括言之：全国紗厂，亏多盈少；即稍有盈余者，亦迥不如去年。若以日本紗厂与中国紗厂較，則日本紗厂成本愈減愈輕，出品日見精良；复有南洋印度之出路；故迥非中国紗厂所可望其項背。以內地紗厂与通商口岸之厂相較，則內地紗厂工人易于訓練管束，工作效力較高；且或接近消費市場；或則接近原料产地；故胜于通商口岸之厂实多。北方紗厂，向以东北为大宗尾閭；近則去路断絕；故營業較之南方紗厂，更屬艰难。顧以适者生存之原則言之：竞争愈烈，則改进愈速，其缺乏知識，管理腐敗者，自然淘汰；其技术精良，管理合理者，即能生存。本年度中国紗厂之中，試一加分析，已有显著之比較；况以中国人口之多，此500万紗錠，每百人約占一枚；以6,000万人口之日本，尙有800万紗錠；則中国紗业前途，烏可視為已达高限？同时国产棉布因有进口

稅則逐漸提高之保護，與外貨競爭較易；故為中國紗廠計，宜奮進減輕成本，改良生產，以厚其競爭之實力；一方宜擇銷紗較多或原料供給較便之內地，設廠經營，以避外廠之壓迫。今棉業統制會對於植棉改良，已積極進行；則內地之原料供給，更見充分，此為經營紗業者之所不宜忽視者也。中國紗廠與日本紗廠之比較如下：

	華 廠	日 廠
廠 數.....	89	41
紗 錠.....	2,637,413	1,790,748
占全國.....	57.19	38.84
綾 錠.....	135,860	272,700
占全國.....	33.25	66.75
布 機.....	19,081	17,592
占全國.....	48.23	44.46

面粉業 面粉廠集中於南方，而去路向以東北為大宗；次則北方。國粉之銷於東北者，約有400萬包，近不過數萬包；北方近有日粉俄粉廉價傾銷，天津當地粉廠，已受打擊；南方粉廠之去路更狹，則以南粵一帶，地方不靖，人民購買力薄弱，商家不敢屯貨；尤以本年各地麥子丰收，鄉村農民，食用土磨之粉，粉銷更滯。同時美國粉麥借款之成立，正值新麥上市之際；於是粉價狂落，開數十年未有之低價，自2元6、7角跌至2元左右。各廠存貨堆積，上海存貨最高之額，達300余萬包；天津、漢口，亦有200余萬包。不得已於中秋節後，宣告停工。後以工人生計，輪流開車。其停閉者，有天津之民豐及寧波之立丰。以本年度面粉業大體言之：原料與粉價同時并跌，其隨制隨拋者，大半尚可獲利；且不若紗業之有外商競爭，只須謹慎從事，不至有大虧損；近復有洋粉進口稅之征收，廠商不無喘息之機。

繅絲業 22年度業絲者以上年度多數虧折，均謹慎從事；即農民養蠶，亦不敢擴大。差幸天時順利，蠶量較多，蠶價不大，廠商購進春蠶後，絲價忽漲，稍能獲利。及夏秋二熟，蠶價抬高；而外國絲市，步步趨跌，廠商均反盈為折。本年度出口，較上年雖增加18%；然絲價之

跌，則甚于上年。美銷絲價，上年度最高895元，最低640元；本年度最高950元，最低則僅500元左右；且最高之價，不過曇花一現。按本年度日本產絲，較上年增加9.2%，即5萬担；而美國消費，減少84,000担；同時人造絲之產量，日益增加。以中國生絲出數之少，成本之高，品質之次，運銷機關之不健全，一旦受此種種世界潮流之壓迫，其不能立足，固不待言。本年春秋苗本，平均在700元，加繅絲工資及其他開支約150元，即每担成本，約須800元以上。乃絲價跌至500余元，是以業絲者十九虧折。江浙兩省絲廠，共110余家，而年底繼續開工者，只上海廠五、六家，無錫十餘家，浙江六七家，即不及2/10。故絲業之衰敗，已達極嚴重之時期，今後非改良原料，改進技術，根本革新，無法挽救。而此改良原料與改進技術之途徑，非由近代科學化之方法不為功。非舊日之因循補救所可為力。今有絲業改良委員會之設立，從事于根本改進之工作；絲業中亦不乏具有新知識者，以近代之方法，經營管理，困苦奮鬥，不得謂為無復興之望也。

卷煙業 年來國貨卷煙，銷路漸廣，中國卷煙廠之設立，風起雲湧，曾達156家之多。其中範圍較大，設備完善者，不過數家。本年度以統稅加重，各地土製卷煙充斥，并以人民購買力之薄弱；故各廠營業，迥不如前，小廠紛紛停閉，現所剩不過五、六十家。20年中國廠統稅數目，多于英美煙公司，21年分則漸相等，本年度則少于英美。今後小廠之難于立足，大廠之必須改進，已屬情勢顯然。其可值研究者，中國煙廠之與英美煙公司之對峙，正如中國紗廠與日本紗廠之關係。惟山西省政府自辦卷煙廠，以政府之力推銷出品，現英美卷煙每月在山西之銷路，已不能超過山西自辦煙廠銷煙之1/3；而山東省政府近亦有獎勵中國自辦煙廠出品之舉，此為卷煙業新傾向之一端。

火柴業 中國火柴業，自民國16年起，逐漸衰落；至18、19年大有岌岌不可終日之勢。至20年1月實行增加關稅后，外國火柴進口減少，中國廠家，漸有轉機，此一年間，為營業最安定之年。21年起，重入黯淡，各廠相率跌價。本年度各廠營業，大廠尚可支持，小廠痛苦萬

狀，其重大原因，在各廠生產量漫無限制，如18年之出數，不過60萬箱，至19年增至70萬箱，20年仍恢復60萬箱，至21年忽復增至73萬箱；但因加稅而減少進口之外柴，不過5萬餘箱。各廠不問銷路，任意增加生產，以致跌價競爭，以前每箱售價53—54元者，現僅售40元；以前售價20元者，現僅售12元左右，其售價僅及成本或至不及成本者。故火柴業本身，若不亟圖聯合，限制生產，恐將均有不能支持之一日。全國火柴廠，共50餘家；外商所設立者有7家；但出數約占華廠1/4，是中國火柴廠勁敵尙存焉。

日用品工業 橡膠業以新廠增多，生產過剩，存貨山積，價值跌落，以前上等貨套鞋每打售價11—12元者，現降至8—9元；至小廠次等貨，只售5元餘；存貨聞有400餘萬雙。上海大小橡膠廠50餘家，本年停頓收歇者，達1/5以上；而所剩2/3之中，其營業較勝者，不過6—7家。化妝品業有40—50家，本年營業總量，當在700萬元左右。大者5—7家，均尙獲利；小者營業平平。肥皂工業，年來亦甚發達，大小50餘家；規模較大者，不過10餘家。其出品不特運銷國內；并有一部分運銷南洋一帶。搪瓷業上海有10餘家，本年營業平平，其營業總量，約400餘萬元。制酸為年來新興工業之一，現有制酸廠2家。電燈泡業計10餘處，其大者每日可出15,000只；小者自2,000只至6,000—7,000只不等。每月約可出130餘萬只；年產約1,200—1,300萬只；日貨進口，年約600—700萬只；在中國外廠出貨，亦有600—700萬只；而中國全年需要不過1,600—1,700萬只；故供過於求；加以外貨跌價傾銷，各廠營業，難以獲利。針織業上海大小廠家200餘家，本年營業，約減少38%。食味品業，廠數過多，紛紛低價競爭，已有數家不能支持而停歇者。全年營業，不過300—400萬元。毛綸業近稍見萌芽，天津東亞廠營業尙佳。此外制鹼及機制石粉、絲光棉織等業，業務總量不巨，無大出入。

最近三年國貨工業之消長情形：茲就調查各該業最近三年營業額之消長指數，錄述如下；但未敢認為絕對正確。（假定民國19年度之營業額為100）

	20年	21年	22年
棉紡业·····	78	52	35
染織业·····	125	110	80
棉織业·····	128	110	110
毛織业·····	89	65	85
絲織业·····	160	110	90
面粉业·····	120	85	50
火柴业·····	120	135	140
搪瓷业·····	158	126	95
化妝品·····	120	75	85
調味品·····	112	135	100
針織业·····	100	70	50
卷烟业·····	115	105	80
橡膠业·····	200	135	80
油漆业·····	128	137	185
机器业·····	125	81	73
热水瓶·····	100	120	150

中國工業 年来稍見曙光，乃一因农村衰落；二受世界不景气之影响；三以外商在中国設厂之压迫；四以同业无謀之竞争；致令此含葩初发之工业，將有挫折不前之势。

(摘自中國銀行1933年度营业报告40-48頁)

五 1934年度

23年国内工业之变态，更形尖銳化。各业創設之初，皆在通商口岸；良以大都市劳工供給便利，金融周轉灵活，原动力价格不高，治安亦比較安定。但近来則内地治安已有进步，交通亦漸改良，劳工糾紛較少；加以内地于原料及消費市場，均較接近，形成內向发展之趋势；在过去一年，已見端倪。至全体工业，就区域言之：口岸工厂，多感困难；内地工厂，較为寬裕。就規模言之：大工业亏多盈少；小工业尙能支持。就經營言之：計劃周密，开支节省者，均获盈余；管理松懈，預算

龐大者，难免亏折。各业虽各有其兴衰之原因；而上列种种，实其共同原因。兹擇主要諸业，分述于后：

棉紡織業 23年份，华厂紗錠增105,341枚；綫錠增7,182枚；布机增1,845台。日厂紗錠增12,736枚；綫錠增21,992枚；布机增1,425台。英厂紗錠增1,712枚；綫錠增2,720枚。总計共增151,683枚。22年与23年相較，紗錠以华厂之增率为大；綫錠則以洋商各厂为多；因洋商各厂增紡細紗綫；而国人經營各厂，仍以粗紗为主要出品。本年度紗錠虽增15万余枚；惟紗綫产量共計2,272,834包，較去年反減59,850包；其中华厂减少45,000余包，洋厂减少无几。至于棉布产量，計23,465,437匹，較去年增3,343,537匹；其中日厂增加3,861,143匹，华厂减少508,088匹；此足表現洋商各厂趨重于自紡自織也。本年紗价之衰落，实所罕見；標紗市价与去年較，平均跌13.2元；与前年較，則跌43.5元；而棉花成本，每担平均价計43.75元，較去年增0.12元；此花費紗賤之現象，致令資本較弱之厂，无法維持。上半年全国开工錠数，計4,678,272枚；停工錠数，計1,224,267枚。再查各厂存紗，凡达近年之最高額；即以上海市場而論：本年2月底計165,704包，較去年同月多32,636包；3月底計167,150包，較前年同月多7,623包。其后一面紗銷漸暢；一面縮減生产；因之存紗漸少，至11月底，尙存71,717包。要之：本年度实为紗厂业最艰苦之年；而洋商紗厂成本輕于华商厂，更使华商紗厂难于立足。顧同时华商紗厂之紗錠布机，仍年有增加，尤見国人存斗图存，不遺余力也。

繅絲業 近数年来，我国生絲出口銳減；本年度匪特未見轉机；抑且衰落更甚。22年底江、浙兩省所有180余家絲厂，繅絲車头4万余部，大半停頓。今年夏，絲价略高，原料尙賤，开工者始見增加；但多数仍存觀望，靜待时机。上海108厂，不过23家開車；无錫50厂，開車者仅有33家；浙江全省，只16厂开工；且复多临时集資租厂代繅性质，时作时輟；而四川、山东、广东各絲厂，亦复衰敝异常。四川絲厂，分鉄机与木机兩种：22年鉄机絲厂尙余19家，23年上期尙存11家，年底則全停頓矣！木机絲厂規模較小，大都散于农家，无从統計。山东絲厂，亦有

鉄机、木机之分：惟鉄机絲厂寥寥无几；木机散布四乡，皆系家庭工业；經該省建設厅劝导农民組織制絲合作社，改良技术后，已較前进步。至于广东絲厂，去年开工者，仅50余家，較諸全盛时期减少2/3。惟因生絲市場，向在欧美；人造絲之竞争，与夫世界不景气，皆是减少生絲之銷路；且日汇步跌，有利日絲之推銷，更令华絲无法竞争。全年我国生絲出口数量，約33,000担，較去岁减少28%。但我国工資廉，成本輕；倘能选择良种，改善品质，制造进步，推銷得法，未尝不可复兴也。

面粉业 本年全国国人經營之面粉厂，除东北四省不計外，共有89处；其中江苏、浙江、安徽三省占36处；山东、河南二省占25处；湖南、湖北、江西三省占9处；河北、山西、察哈尔、綏远四省占19处。全年机制面粉产量，約計27,600,000袋，較之去年增加8%。至本年銷售数量，約計3,350万袋，較之去年亦减少8%。同时本年进口面粉，計595,748公担，較之去年减少70%。在本年上半年中，粉价殊形低落；最低时每包仅1.93元；而原料供給，因新陈不接，小麦市价并未随粉价下降；各厂营业，均极不振。惟6月以后，江南苦旱，人心不安，內地囤戶，紛紛吸收現貨，投机者复乘机而起；致上海积貨350万包，1月之内，即經出清。加以平沈通車成立，面粉可以出关；致粉价每包漲至2元以上；8月底竟提高至每包2.9元。惜9、10月間，逐步跌落；致年終各粉厂大都歇工，其中自不免有亏累者；惟获盈余者亦非少数。查制造面粉原料之小麦，向多仰仗进口；而本年吾国小麦产区，如河北、山东、河南等省，又均屬歉收，全国产額，总計較去年减少；致內地各厂原料成本，不能不因之增加。今后誠能有充分之国麦供給，則成本尚可減輕；面粉一业，不难維持常态也。

卷烟业 全国70余卷烟厂，大半設于上海；玆就滬地华商加入卷烟业同业公会之46家言之：23年度全体營業，以价值論：約仅22年之7成；以銷路数量論：則与去年不相上下。华商全体銷額40余万箱；外商銷路則大減。据估計：去年全国中外各厂合計營業額达2万万元，华厂約占6/10。华厂所以能与外商竞争者，盖因国民經济困难，購買力弱，以前喜吸上等洋貨香烟者，紛紛以較廉之国貨香烟代替之；且

華商烟廠更能減低售價，加送贈品，竭力宣傳，薄利多賣；故能稍獲盈餘。

火柴業 自20年火柴關稅稅率增高，群以有利可圖，竟設新廠，產量突增。產銷無法平衡，市價日漸低落。若以統稅區域估計，本年度蘇、浙、皖區國人經營39廠，產194,000箱；銷195,000箱。魯、豫區35廠，產271,000箱；銷272,000箱。冀、晉、察、綏區10廠，產131,000箱；銷154,000箱。湘、鄂、贛區3廠，產34,000箱；銷34,000箱。共計產630,000箱；銷655,000箱。產銷相差數額，乃以去歲存貨補充。又洋商在華開工之火柴廠，共有6家，本年产85,800箱；銷73,500箱。若將兩年情形比較，本年度華廠產額雖增10%；而銷額却減8%。外廠產量減25%；銷路減40%。至于市價，每箱下跌7元至10元不等。各廠營業既遭虧損，實難繼續開工，全年停工者有13家；短期停工者有30余家。近雖有同業合作之組織；但至今未見顯著效果。

水泥業 自民國11年至21年，我國進口水泥，數量上、金額上均系歷年遞增，計民國11年進口為4,355担，21年達到3,670,201担；惟至22年則降為2,278,701担；本年則減少益巨，計1,303,038担。輸入國家，多屬鄰境，如安南、香港、日本、澳門等處，以距離不遠，運輸方便之故。查國人所營水泥工廠，共有7處，每年可能產量，計4,230,000桶；實際產量，大約不過4,000,000桶。全國各廠實際產量，雖乏整個統計；惟就華北、華中及華南等地之四大廠產量而論：尙年有增加，民國21年計2,570,000桶；22年計2,640,000桶；本年計2,910,000桶。至于出口水泥，則年見減少，民國20年計400,000担；21年降為36,000担；22年更減為18,000担；本年則僅6,750担。年來國內百廢建設，水泥之需要日增；內地市場漸廣；且本年自新稅則頒行後，進口水泥，已顯見減少。雖國人所營水泥工業，并未呈突飛猛進之現象；然以吾國幅員之廣，人口之眾；市區建設之繁，新興工廠及橋梁、道路營造之日增；則現下國人經營各廠之產量，自不足以資應付；是則水泥工業之前途，當尙有長足發展之余地。

糖業 近數年來洋糖進口，年見減少，由民國18年之14,000,000

担，降而为22年之420万担。本年輸入，亦不过410万担；其中上海一埠进口者，約占1/4。輸入来源，首推爪哇；次为香港及日本等处。至于进口减少，当不外关税增高，私运增加；内地购买能力低落；及土糖产量增多之故。查本年国内之制糖工业，并无显著之进展；而国人經營之各厂，仍依旧停工。惟产蔗各省，則紛紛籌立新式糖厂，截至本年底止，广东省营糖厂已成立三处，預計来春可以陸續出貨；四川、广西、江西、福建四省，亦正鳩工設計，各拟成立一处。

基本化学业 酸、鹼两类之进口，年来互有增减，21年酸类輸入117,000担，鹼类833,000担；22年酸类收入154,000担，鹼类859,000担；本年酸类輸入137,000担，鹼类965,000担。輸入国家，酸类以日本为首，鹼类則推英国第一。至于氮气工业品，每年輸入之总价值，当在4,000万元以上；即以硫酸銨肥料一項而論：21年輸入1,865,000担；22年1,674,000担；本年826,000担。惟年来国人認为此項化学工业之基本原料，实有設厂自給之必要；因之酸、鹼、氮气等厂，自民国16年以来，恒年有增加；截至本年底止，国人經營之酸厂計6处；鹼厂計7处；氮气厂計2处。至氮气厂虽均在建造之中，預計24年秋季当可陸續出貨。22年中，酸厂計产硫、鹽、硝三酸共243,000担，較之进口酸类，几及兩倍。本年酸厂产額，虽尙无整个統計；惟进口三酸，則較去年减少18,213担；此盖由于外人或欲以是国防产品，留以自給；同时亦由于国人对于酸类制造之努力迈进耳！至于鹼类，則22年中計产純鹼、燒鹼、泡化鹼、硫化鹼等共819,000担，恰与进口鹼类数量相当；本年产量，不下900,000担，与进口数目相等；其中純鹼一項，且轉有輸出；是則不得不归功于各鹼厂之发奋进取也。

(摘自中国銀行1934年营业报告41—48頁)

六 1935年度

去岁我国工业各历銀根紧縮之艰辛，盖多数工厂大都資本不足，向恃銀行貸款为营运資本，去岁利率过高，即地位最优之工厂，亦不得不限其經常产量。其与一般商业关系最多之錢业，亦收縮放款，

商家因无由儲集存貨。益以洋貨竞争，外汇放長，私运日增，国貨迭受打击。11月新币制之施行，即期銀根松动，外汇見縮，因而提高物价，以資挽救国内工业之衰敝，而助長其发展也。

一方近岁进口稅率之增高，足以鼓励国貨数量及种类之日增，在輕工业尤甚，且在政府扶掖之下，更进而从事于基本工业之創設。但国内大規模之工业，尙在萌芽时期，而国内創設最早并且发展最良之股份公司企业，厥惟銀行，从而銀行应指导工厂企业，俾其組織趋于健全，更助長其发展，明屬責无旁貸，惜乎迄今至多仅畀以短期放款而已，茲試分述去岁各业情形于下：

紡織业 我国紡織业之弱点，由于全盛时期分紅过巨，折旧太少，致使其事业在去岁信用紧縮市面蕭索之下，即不能支持，結果大多工厂咸被迫而陷于全部或局部停工之境。6月末停工之錠，約占全体四成，嗣新棉上市，虽有多厂勉强复工，但至年終未开工之紡錠織机，尙达25%。而外商所营紡織厂，則由于理財穩健，并蒙低利之惠，厥狀甚佳。

去岁一年中紗价异常低廉，6月間标紗价格每包158.9元，实为15年来最低記錄。逮币制改革后，进口棉布稍減，从而紗价驟漲，自10月間之每包177.66元，一跃而至11月之每包195.47元。然而紗价虽漲，棉价亦昂。因美印棉之金价，随外汇匯率之低落而增高，而国产棉价亦連帶上升矣。

自23年7月至24年6月，全国棉紗产量，計粗紗3,298,504公担，細紗725,611公担，杂紗71,529公担，綜計4,095,646公担，就中国厂所产，粗紗占77%，細紗占33%，杂紗占41%；日厂所产，粗紗占21%，細紗占66%，杂紗占56%；其余則为英厂所产。

在此狀況之下，可足述者，則为我国多数厂家，于此不景气中，不得不撙节开支，故生产成本已見減低，同时多数旧机亦設法改良，并且增置相当自动布机矣。

繅絲业 岁初絲价因极低廉，但至6月国外需要增加，价遂上漲，至11月竟开近数年来之新紀錄。去岁一年中絲价，乃自最低之每

担380元，一跃而至700元以上。

去岁慎选无病蚕种之结果，所产生丝，品质匀度均见进步，姑置去岁受国外偶然影响之助于不论，此实可期为丝业界之永久利益也。

24年蚕茧总产额140万担，生丝总产额95,000担，就中江浙两省产6万担，四川、湖北、山东共10,000担，广东25,000担，江浙所产占总产额63%，较上年增加30%。去岁全国缫丝厂开工者约300家，缫丝车计123,000架，但随市况及丝价之变动而时有增减。即以江浙两省而论，年初开工者约20家，但自6月以后即逐渐增加，至10月开工者已达94家，缫丝车亦24,000架。

面粉业 去岁面粉之产销，尚称顺利，面粉业都获盈余，国产小麦尚供不应求，仍依赖进口洋麦，就中尤以澳洲麦为多。

去岁面粉厂开工者共94家，就中上海14家，无锡4家，济南7家，青岛6家，天津5家，开封3家，其余各地计58家。全年面粉总产额共79,068,518袋（每袋重49磅），较22年增加7,821,468袋，较23年增加8,909,356袋。全年国产面粉总销额共78,999,418袋。全年进口外国面粉共510,496公担，约合2,250,000袋，较23年减少376,000袋。

水泥业 23年水泥业虽享高价之利，但去岁因金融紧迫，致建筑工程减少，水泥销路亦衰落。加以外货倾销甚烈，故国内各厂几无不受重大损失。

由于运费过大，陕西、江西、四川等内地均自设新厂，粤省官营士敏土厂且增置新机。故无论需要虽减，价格虽低，而全年水泥总产量仍有377万桶之多，较23年增加36万桶。

火柴业 去岁火柴业承上年罢歇之余，依然如故。华北福建等处，私运火柴充斥市场，其纳统税之国产厂家，反因与私货竞争而遭损失。中部7省之厂家，为防生产过剩，设立火柴同业联销机关，实行以来，颇见成效，其在此联销区域以外之冀、鲁两省厂家，则情况极坏。国内各地之我国及日本、瑞士之火柴厂家，曾拟共同采用比额生产制度，苟能见诸实行，则非特国内生产过剩可以免除，即私运亦可稍戢。

去岁全国火柴厂开工者計69家，安全火柴总产額計267,932箱，硫化磷火柴总产額計524,486箱，散裝火柴計8,382箱，全年共銷火柴約748,018箱，与23年相仿佛，較22年則减少98,763箱。

制糖业 我国进口糖稅之高，足以鼓励制糖业之发展。粵省府建置煉糖厂6处，其中3厂业已出貨，桂省府亦着手建置1厂。向以产糖供給長江上游之四川，亦为制糖有望之区，正計劃建置一大規模煉糖厂于重庆。

我国甘蔗与甜菜之产量虽尚不足，但制糖之利甚厚，目前糖之产量虽年仅15万担，然可相信借保护关稅之力，如能防止目前可惊之私运，則不出数年或能生产大量之糖以自給也。

化学工業 我国近年輕工业发达之速，遂令工业家傾向于化学原料之制造。其最显著者則为浦口建設中之700万元資本硝酸鹽厂；上海浦东已开工之250万元資本酒精厂；天津制造各种染料之有机染料厂；及山西制造酸类酒精以太之新設化学工厂。

(摘自中国銀行1935年度营业报告31—35頁)

七 1936年度

去岁我国工业，已从24年不景气情形中，显现回苏之象，厂家之前厄于銀根紧縮者，頃已获到銀行之助力，币制改革后物价水平之提高，足以刺激工业之活跃，而海关从事于抑制私貨之移动，亦有助于减少此种不公平竞争之惡影响，惟去岁工业之回苏，大半仍須認为因秋收大熟农村購買能力增加所致，工业制品之需要，至24年已降至低度，在去岁春收后已略見回苏，在下半年一般經營日用貨品之商号，营业頓感活潑，而船公司及鉄路局之轉运业务，亦大量增加。

自21年至24年間不景气所予吾人之教訓，要非全无利益可言，其所昭示者，則为如欲避免工业失敗之危險，則我国厂家之內部組織必須改良，現已有拆卸敝旧机件而易以最新設備者，他如原料与制成品之标准化，已在提倡，适宜之工厂會計制度，业經設置，而工业管理之科学化，亦見实施，惟目下仍屬草創时期，諸事仍須繼續兴办，然后可

使我国工厂之效能标准，提高至相当程度，才堪与任何处之工业相媲美也。

紡織業 去岁紡織業，在上半年間，虽以銀根較松及棉紗漲价每包达200元，仍处于未能尽惬人意之地位，半由于前数年之損失过巨，亦半由于24年棉产失收棉价高漲所致，厂家之停业者达26家，計有170,000錠子，均无法复业，加以天津3家华商紗厂共拥有128,000錠者，亦遭倒閉而售与日方，唐山某厂亦不得已而加入日商資本以維持其营业。

但至秋間，因承秋收丰稔之后，棉价低落，局勢頓見改善，同时农村購買能力之跃进，使紗布之需要驟增，因此紗价繼續提高，至12月份每包达268元，此項价格，虽最低能之厂家亦能获利，故其結果，全数厂家已于去岁9月一律复工矣。

繅絲業 上年初承24年漲价之后，生絲价格坚穩，至年中回落，旋又繼續趋漲，至11月而达最高峯，全年平均价为745元，比24年漲近170元，惟生絲出口只37,900公担，与24年相較，計減8,200公担。

政府提高生絲品質及厉行标准化之努力，頗获成效，无病蚕卵之施用，亦見增加，去岁生絲产量估計为120,000担，較24年約增20%，該業自21年起已日見陵夷，目下价格高漲，可助該業之更生，現在各重要之产絲区域，已活潑有加矣。

面粉業 去岁之初，面粉業仍感受24年不景气之影响，惟近年底已大見昭苏，由5月份之每袋平均价格3元漲至10月份之3.55元，11月之3.74元，及12月之4.19元，是为近年来之最高价，惟全年面粉产量不过6,300万袋，与24年相較約減1,200万袋，此可以上半年市况松懈及因麦价之高漲使厂家举措謹慎与統制产量以說明之者也。

水泥業 去岁之初，水泥業因24年份需要之减少，遭受存貨壅积及价格低落之苦痛，益以外国水泥之极力傾銷，为应付此种局面起見，各厂家協議減削出品及維持齐一价格，但虽有此項設施，价格仍繼續跌落，由1月份每桶之6.2元降至6月份之5.6元，至下半年建筑业务增加，价格升至7月份之6.1元，8月份之6.4元及11月份之6.9元，

去岁水泥出产总数，只及3,050,000公担，而24年则为4,460,000公担，但进口数量亦较24年约减一半。

火柴業 去岁火柴业就产量及价格管理而论，均大见进步，年初政府批准火柴产销联营社之设立，该社计包括华商厂家58家，美商厂家2家，日商厂家7家，关于新厂之设立及出品之数量均予限制，此项设施，益以3月后需要之改善，结果使火柴每箱价格涨至由1月份之56.1元至6月之63.9元，该项价格，一直维持至11月，至是又略降至每箱57元，全年出品计810,000箱，销数约760,000箱，较之24年增12,000箱。

制糖業 去岁该业继续扩展，广东省计有3家新厂开始产糖，现该省共有炼糖厂6家，以上6家及广西炼蔗糖厂与山东炼甜菜糖厂每年共能产糖630,000公担，惟因原料供量之不充，未能尽量出产，上年确实产量只约计270,000公担。

糖市曾因私糖以极低价格出售之影响，而呈紊乱，惟当此种走私风潮于年中受挫之后，价格回涨甚速，糖商已能恢复前受之损失矣。

化学工業 去岁化学工业最显著之发展，为浦口硫酸铵厂之完成，是为我国第一家制人造肥料之厂，此外设立者，计有汉口之中国植物油料厂，广州之制新闻纸厂及陕西与天津酒精厂及上海天利淡气厂等，天利淡气厂已于去岁开始出品矣。

(摘自“中国銀行1936年度董事会向股东大会报告书”25—29页)

抗日戰爭爆發後民族工業的 損失和被掠奪

在現今的淪陷區內，正是過去我國工礦業所集中的地方，礦業受礦藏地理的限制固不待說；即以工業而論，全國工廠的70%簇集於江蘇、浙江、安徽三省，上海、武漢、無錫、廣州、天津五市佔了全國工廠總數的60%，並且，在全國民族資本工業中，全廠數的50%，全資本額的40%，全年產額的46%，還集中於上海一地。

滬戰起自1937年8月13日至11月中旬，歷時3月之久，實為近代有數的市街戰之激烈者，其工業所遭損失之嚴重，殆可想見。上海工廠集中於公共租界東北兩區，滬戰起後，首遭波及，事後工部局調查，計兩區遷移之小工廠422家，完全被毀者竟達905家，未受戰事影響者，只有滬西蘇州河以南自曹家渡至叉角嘴地方。又據上海金城銀行調查，自“八一三”滬戰爆發至27年3月止，總計上海市及其近郊中國工業之損失，已達155,764千元，滬戰3月之直接為炮火所毀的物質損失則達85,484千元。但是，若據上海社會局的調查，上海工業的損失還要巨大，計被害工廠約2,270余家，損失總額在8萬萬元左右，其中，閘北區的損失比率为100%，虹口及楊樹浦之損失比率約占70%。而日人大阪貿易調查所的統計，在南市未陷以前，滬市工廠被害者已有1,958家，損失總計為56,450萬元，若將南市被毀者計入，則上海全市損失工廠也當不下2,000家，損失總額也在8億元以上。

除了上海以外，在揚子江下游三角地帶的工業損失，也相當嚴重。特別是江南運河沿岸各城市，津浦路南段及京滬沿綫一帶，都受到巨額損害。如太倉、嘉定、常熟等地，甚或較上海近郊之損失為尤大。據滿鐵調查，這區域的工業損失，僅設備一項即達戰前的50%。多

数工厂均因设备之损失过重，至今未能复工。

武汉三镇的损失状况，据满铁于1939年9月实地调查的结果，该地516工厂中，有12%为自行破坏或遭炮火所毁，已告完全损失；41%业已迁移内地，其余47%则有修复可能。其损失额据湖北省政府“湖北省公私损失统计”推算，约达16,672千元。

华北方面，工业损失极其轻微，仅山东日资企业多受损害，华南情形与华北相同，但华北及华南之工业尚不发达，其所占地位并不重要。

若以业别而论，我国主要工业的损失均甚重大，全国纺织业毁损设备在六成至十成者，约有纱锭298,195枚，锭27,780枚，织机2,999架；毁损较轻在二成至五成间者，约有纱锭522,344枚，锭47,060枚，织机6,915架；其中不能修复之确实损失数，据日本纺织联合会调查，至少有纱锭288,578枚，锭20,202枚，织机4,649架。其损失额占全国纱厂总设备的百分比，则平均约在20%以上。

缫丝业的损失，仅上海一市被害的丝厂即达33家，毁坏率数约6,836部，损失价值仅此丝车设备即达千万元以上。其他若以损失的绝对数言，电业约损失3千万元，自来水等公用事业约达2,600万元，造船业损失约达1,650万元，也都是可惊的数字。

若以损失额对各该业总资本的比率看来，以下各业的损失尤重：染织业损失，仅上海、无锡、武进三地可考者计算，即达9,749千元，约占全国该业总资本的80%以上；橡胶业损失为600万元，占该业总资本的70%；他如造纸业损失64.6%，机器翻砂业损失70.7%，烟草业损失48.5%，也都对各该业以极大打击。

至于矿业方面的损失，则至今迄无资料可据。我们所可知者，华北方面除山东少数日资矿场有所破坏，及井陘阳泉等矿事后为游击队损毁一部外，没有其他比较严重的损失，华中方面，大冶及淮南矿曾将机件内迁，原矿稍有破坏，损失较重；但因为我国矿产多集中于华北，我们说矿业方面的损失没有工业方面严重，是不致有多大错误的。

但是，即此上述工业方面的損失，已經使我国的經濟組織为之扰乱了。这样巨大損失的最初影响，就是淪陷区工业生产在1938至1939年全部陷于停頓状态，日方借此絕对的压制了我国工业的发展。特别是和他本国对立的棉紗、繅絲、面粉、化学、杂货等工业部門，更以掠夺手段全部据为己有。在这个时候，国人在上海租界內虽曾組設許多小規模的工厂，利用各厂之損毀或停工的机会，廉价收購原料，加工赶制以运銷各地，但因規模过小，到底不能全部供应市場需要，于是，又給日貨傾銷和日資企业在华活动的一个絕好机会。至于工厂大部停閉，許多农畜矿产原料，为日方所劫去，更是不必說了。

日本对华产业政策向以摧毁我国民族企业爭取我国广大市場为标的，我国工业的战时損失和战后劫余工矿业之被夺，更是加速了日本企图使淪陷区殖民地化的实践过程。

27年华北关稅改訂，把日貨的进口稅率减到了最低的限度，同时在华北发行伪联銀券和伪蒙疆券与日圓相連系，以及华中方面的各种金融措施，是吸收淪陷区的資源和独占淪陷区的广大市場的主要手段。至于独占經營淪陷区的鎖鑰产业——电力、交通、通信、公用事业以及煤鉄等矿——及夺取一般輕工业、实施原料分配統制，統籌重要制品的販卖，則是更直接更完密的縛住了淪陷区的經濟生活。

日本夺取淪陷区工矿业的野蛮和完密，可說是在其他帝国主义者經營殖民地史上找不到先例的。对于战后劫余的工矿业，不惜以各种手段据为己有。我們大略区分，日本采用了下列五种方法，把我国所有主要企业都夺去了。

一、軍管理 据日本兴亞院的解釋，所謂(軍管理)是依“国际公法”或“战时法規”沒收“敌人官产”之行为，但因防止“不逞之徒”加以破坏，私人产业亦多暫为保管。

日軍于占領我方工矿业后，由特务部視其工厂或矿山之性質，决定其为“临时軍管”或委托日本适当会社代为經營，故軍管理事业又可分为二种，一为日軍自行經營之軍管理事业，一为委托經營事业。因为軍隊多不善經理；大都委托日本会社代为經營，故以后者为多。

但此項委托經營事業与后述之“委任經營”又有所不同，日本會社受軍隊委任后虽有經營工厂之權，但該厂之主權則仍操諸日軍之手，日軍可隨時另委他人經營，受委者不得另持異議。此項軍管理委托厂除電業及礦業已歸并日本在華國策會社独占經營外，其一般工業仍在軍管理形式下經營者，共達82厂。其分布計山西38厂，河北12厂，河南11厂，山東18厂，安徽2厂，綏遠1厂。至其各業分配，則以面粉厂為最多，共達30厂，紡織15厂、毛織、火葯、制酸、火柴、水泥、冶煉各3厂，機器翻砂8厂，其他如造紙、制革、精鹽、制糖、印刷、烟草等共11厂。

二、委任經營 此項委任經營厂系日本私人工商業者自行在華劫奪之工厂，与前述軍管理委托經營不同，無論主權或經營權均直接操諸日本會社之手，与日本軍隊無關。此項委任經營厂多數在華中，据我們所獲資料，仅資本較大者，其厂數即達137厂之多。（縹絲業歸入中支振興會社經營不計）。以業別言。紡織厂達40家，面粉厂18家，造船厂11家，造紙厂9家，樹膠厂9家，烟草8家，染織厂6家，金屬制品業5家，機器業4家，其他如毛織、絲織、制革、榨油、絨布、針織、制帽、紐扣、電器、肥皂、油漆、制酸、酒精、制葯、水泥、制糖等則被掠一家至三家不等，共計27家。

三、中日合办 此項以“中日合办”形式被掠之工厂。約可分為二類，一為日本國策會社經營下之独占事業，一為一般工業即日人所謂“自由企業”；前者包括淪陷區一切電燈電力厂，電報電話局，鐵路、機車厂、輪船公司，碼頭倉庫業，公路、汽車公司、煤礦、鐵礦、煉鋼厂、煉鐵厂、鹽厂、以及水產公司和縹絲厂，這些事業均被迫与日人合組一独占經營公司，隸屬於國策會社下，后者則除上述事業外之其他一般工業，或屬自願或系被迫，共達70余厂，其中以化學工業為最多，約有27厂，金屬機械10厂，食料品工業約9厂，其他雜工業約26厂。

四、租賃 此項租賃厂仅華中淪陷區可考者約達31厂，其中金屬機械9厂，纖維業7厂，化學工業6厂，窯業5厂，其他4厂。我們無法確知此項租賃厂是否出于原主自願行為，但觀日人在淪陷區內

大批掠奪華廠，日本能否履行租借條件，殊屬可疑，則無庸辭費。

五、收買 日人以極廉價格收買華廠約共有20余家，華中有16廠，華北約有6—7廠。

我們對於上述日人以各種方式掠奪之我國工礦事業，加以粗略的統計，則除淪陷區全部煤鐵礦業、煉鐵、煉焦業、電力、電燈廠以及鹽場、水產、機器繅絲等業被掠一空外，棉紡織業之被掠者，共有紗錠1,567,456枚，綫錠104,987枚，布機16,764架，若與戰前我國民族資本之紗業全設備比較，則被占紗錠為56.9%，綫錠為60.6%，布機為65.6%。面粉業在戰前全國共有157家，制粉能力約達7,500萬包，今之被掠者，僅軍管理及委任經營廠即達48家，制粉能力約達6,750萬包，適占當時全粉產的90%。造紙廠戰前全國原僅38廠，今被掠達13廠，以資本計，未奪部分之資本約為1,370千元，已奪部分之資本則達3,392千元，而天章西廠之資本20萬兩還不在內。其他情形我們也就不必再舉了。

在淪陷區內敵人的威脅和包圍中，我國民族工業曾在上海租界內一度“繁榮”起來，他們據守着這最後的“堡壘”作了一次最後的掙扎。我們在前面已經說過，因為淪陷區工礦業在戰時損失慘重，供給激減而內地及南洋的需要又殷，所以上海租界內在1939年竟有小規模工廠新設了1,010余家之多，1940年內又新設了220家（但其中有中日合辦廠112家，實為107家）。但是，這種“繁榮”氣象只是維持了一年多，至1941年以後，新設廠就不及停閉的多了。

這些華商小規模廠以紡織染業為最多，在1940—1941年間，日商的產紗量曾自395千件減至175千件，而同期內的華商產紗量反能自193千件伸至197千件。在設備上，華商紗廠也能自605千錠增至617千錠，而日商及接管廠則僅能保持1,328千錠之原數。他如金屬機械業也曾經一度簇生起來，因為戰事起後，該業損失至為慘重，至1938年春上海市面逐漸恢復，各工廠紛思复工，因之其機器或須修理，或須裝配，該業乃隨之應運而生。我們大致說來，上海租界內的工業不論它的氣象是多麼蓬勃有生氣（雖然這蓬勃的氣象在1941年

后已經衰退了)，这和日資在华企业同样是一时利慾刺激的结果，在敌人的統治下，工业是没有前途的——特别是民族工业。我們即使暂时撇开日本对华产业的掠夺政策不談，仅以淪陷区工业活动的經濟背景略为一述，也可以看出来。

第一、是金融的不安 这是影响淪陷区工业的重要因素。华北方面伪鈔与日币等价連系，华北淪陷区的工业始終受日貨傾銷的威胁和压迫，但华北工业向不发达，若就华中方面言，則华中币制紊乱，尤为他地之冠。自1938年3月我国停止无限制买卖外汇以后，法币对外价值即告下跌，但至1939年6月7日尚稳定在8便士左右，沒有过大的变动，自此以后，变动甚剧，而日圓軍票及伪鈔等也莫不随法币之汇值而动荡不安，汇价影响淪陷区的工业日益显著。自太平洋战争发生后，則货币对内价值的变动影响更大，伪鈔比价一日数易，物价大涨，囤貨投机买卖特甚，籌碼时感不足，而銀行紧縮又不願投資工业，淪陷区原以資本缺乏之小工业为多，其所受打击，自較太平洋战争以前因汇率不安之打击为尤重。

第二、是交通的艰阻和运銷的限制 自中日及欧战相繼发生后，淪陷区对外交通因受日本非法封鎖与航行远东船只减少之影响，交通原已日益困难，但是，在1940年6月以前，滬市对内地的交通，还没有完全被阻，滬閩綫可取道福清与兴化照常航行，由滬至浙，也有滬甬滬温二道可通，滬市工业的一时繁荣，賴此不絕如縷之交通特多，1940年7月15日以后，日方借口防止“第三国將由此交通綫运输軍火”之故，交通乃倍加艰阻，而上海工业亦随之衰落。迨太平洋战争爆发，南洋内地的交通均为之阻絕，这些工业的命运更可不言而喻了。

第三、是原料的限制 原料的限制，所予淪陷区工业的打击較上述二种为尤大，上海租界原可不受日本統制原料的影响，今則此項优遇条件完全失去。原料之仰給国外者，今已完全断絕来源，国内原料之难于获得也不亚于国外原料。蚕繭、生絲、廢鉄、銅等自1938年起即受日本統制，1939年更有华北紗布指导机关，專事統制华北一

帶之紗布買賣，偽棉花協會專事統制棉花的分配，偽全國火柴聯營則專事統制白藥、柴梗、包皮等火柴原料之分配，此項分配統制，均以統籌運日為目標，即日本在華工廠也嘗受限制，迨1940年5月後，日方的統制益復變本加厲，如華北所產之煤，沿長江各省所產之木材，自此均受華北煤炭販賣公司及揚子江木筏株式會社等機關所統制，不再運滬。他如花生、芝麻等榨油業專要原料，自6月以後，也因受日人在華北加緊統制之影響，使滬上榨油業全陷停頓狀態。他如華北棉花、皮革、苧麻、煙草等物，自10月後更由天津日軍所設之清水會社嚴格統制其運輸，而華中所產棉花、皮革、煤以及廢銅廢鐵等物，亦自此時起，由日軍當局特設之公司加緊收購直接運日。自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則頒布了全般物資統制令，几无一物不受統制。我們大概說來，原料困難以華商各廠為最嚴重，日商各廠或可在直接運日數之外分得部分剩餘，而華商廠則不然，其廠權雖未被奪，亦因原料困難陷于窒息狀態。

（摘自鄭克倫：“淪陷區的工礦業”，經濟建設季刊1卷4期，1943年4月出版）

抗日戰爭時期我國 工業的損失統計

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我國工業在這次戰爭中所受的損失，是相當巨大的，據金城銀行的統計，上海一處之損失約估為155百萬元，其中8,500余萬為原料損失，7千萬為國軍（指國民黨軍隊——編者）西撤後被日人占據之47家工廠的資本總額。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蔡謙先生根據所調查的1千幾百家工廠損失約為3萬萬元左右，而推論全上海工業界的損失約6萬萬元到7萬萬元，潘仰菴先生的估計，上海一地的損失當在30萬萬元以上，再加沿江沿海以及京滬滬杭各鐵道沿綫之工廠損失，約計在80萬萬元左右，（見銀行界3卷6期）又據經濟部統計，上海我方的損失約達3萬萬元，上海以外其他各戰區的工廠損失則達237百萬元，合共537百萬元，上述的各種估計和統計，雖相差甚遠，但表明損失數目之浩大，則是非常明顯，茲姑以經濟部調查為準，來分析一下，上海各工業部門的損失，是怎樣的一個情形：

工業部門	損失數(千元)	工業部門	損失數(千元)
紡紗	75,000	玻璃	500
染織	9,830	印刷	3,000
毛織	3,000	烟草	5,000
絲織	115,000	面粉	5,000
化學工業	10,000	木材	1,500
肥皂皮革	3,000	機器工業	10,000
橡皮	2,000	其他	50,000
紙	5,000	總計	297,000

上海以外其他各地的工业損失,估計如下:

地点	工厂数	損失数(元)	地点	工厂数	損失数(元)
南京	91	15,941,509	河南	87	13,232,287
北平	97	15,873,340	浙江	269	15,402,884
天津	53	20,502,093	江西	2	2,720,885
青島	137	10,618,980	安徽	5	1,389,111
江苏	372	61,191,250	广东	9	16,973,558
山东	243	13,492,212	厦門	2	1,420,000
河北	27	23,487,712	总计	1,465	237,403,568
山西	71	15,157,746			

以上是以地別計算,茲再以厂別为主,来比較一下各个工业部門的損失。

工业部門	厂数	損失数(元)	工业部門	厂数	損失数(元)
建筑	3	10,273,000	紡織	488	80,534,495
机器	105	1,185,966	矿产	4	4,315,000
电气	322	54,152,951	农产	216	32,491,803
运输	17	5,263,700	林产	5	42,900
鉄厂	64	770,025	紙业	12	2,842,100
其它金			瓷业	40	18,201,790
屬工厂	15	95,540	其他	113	2,152,150
化学	161	25,082,148	总计	1,465	237,403,568

上述这些工厂是就曾在經濟部注册的各工厂而言,至于未曾注册的各地小工厂的損失,尙未計入在內,又表內关于武汉工厂的損失,亦无統計,故实际各地工业損失,一定要較前表所列数目为大。

(引自李善丰:“我国战时工业政策之檢討”,建設研究第3卷第4期)

抗战爆发后工厂的内迁

战前我国的工厂集中于上海附近，所以“七七”战事发生后，朝野动议拆迁工厂，目光也都集中于上海区内的工厂；等到淞沪战事告一段落之后，才开始扩展及于其它接近战区的厂矿之拆迁。

据林繼庸說：“民国26年7月28日，我出席机器和化学工业組的會議。在會議中曾討論到全面抗战时期軍需供給的問題，我即把握着这个机会，提議把上海的工厂迁移到内地去”。會議結果，資源委员会于当日就派林繼庸和另外兩位職員到上海去商洽进行。这就是迁厂的发軔。初步商洽的結果，由資源委员会做成拆迁上海工厂的提案，經8月10日行政院第三二四次會議通过，首由資源委员会、財政部、軍政部、实业部、会同組織上海工厂迁移監督委员会，以資源委员会为主办机关，关于印刷业之迁移，由教育部参加監督。次日（8月11日）上海工厂迁移監督委员会就在上海成立。迁厂工作入于实行阶段。

（王子建：“民营厂矿内迁紀略”，經濟建設季刊1卷2期）

我們不能不指出，政府及厂主对工厂迁移之无决心与做得太不够太不好，以上海而論，上海之工业生产占全国工业生产1/2以上。大小工厂，据統計不下5千余家。滬战三月，迁移至内地的工厂不过152家，連同无錫、南京、鎮江各地退出的工厂，亦不过二百几十家左右，这些工厂指定武汉、長沙、重庆、梧州、南昌、株州、昆明等处为目的地，但事实上，各厂家一时都集中武汉，待到了武汉以后，始发现征用土地，建造厂址，均成問題，且武汉时遭敌机空襲，非理想的建厂地点，于是計作第二次迁移。

（千家駒：“論第二期抗战的战时經濟”，国民公論一卷五、六合刊）

内迁工厂统计表 (1938—1940年)

业 别	内迁工厂家数			内迁技工人数			内迁复工工厂数		
	截至 1938年	截至 1939年	截至 1940年	截至 1938年	截至 1939年	截至 1940年	截至 1938年	截至 1939年	截至 1940年
总 计	304	418	448	1,793	11,413	12,182	81	274	308
钢 铁 工 业	1	1	1	313	360	360	1	1	1
机 械 工 业	121	168	181	797	5,588	5,986	47	135	155
电 器 工 业	17	28	29	161	684	744	4	12	11①
化 学 工 业	41	54	56	126	1,376	1,408	7	29	36
纺 织 工 业	71	92	97	135	1,603	1,688	3	53	58
饮 食 品 工 业	15	22	22	12	549	580	3	10	11
文 化 工 业	22	31	37	184	606	635	11	22	24
杂 项 工 业	9	14	17	50	270	404	4	10	10
矿 业	7	8	8	15	377	377	1	2	2

(国民党经济部编：“经济统计月报”第4期，1947年出版)

内迁工厂按省市别统计表

省 市 别	内迁工厂数			内迁技工人数			内迁复工工厂数		
	截至 1938年	截至 1939年	截至 1940年	截至 1938年	截至 1939年	截至 1940年	截至 1938年	截至 1939年	截至 1940年
总 计	304	418	448	1,793	11,413	12,182	81	274	308
湖 南	118	122	121	148	2,561	2,777	13	118	86
四 川	131	223	254	1,532	7,688	8,105	54	118	184
陕 西	20	27	27	58	352	432	1	17	17
广 西	21	23	23	55	524	532	7	13	14
其 他	11	23	23	—	288	318	1	8	7

按：(一)各项数字其有逐年减少者为因各该厂矿再变迁移之故。

(二)四川一栏数字包括重庆在内。

(三)资料来源与上表同。

① 电器工业截至一九四〇年之复工工厂数小于上年底数字，系改业之故。

抗日戰爭初期國民黨 統治區工業的變化

一 戰前工業之回顧

中國工業化之歷史距今雖已數十餘年，然其進步極緩，分布至為不均，迄26年底為止，全國工廠總數，依據經濟部工廠登記之統計，不過3,935廠，資本總數不過37,700萬元，工人總數45萬餘人，^① 若以4,000萬方里，45,000萬人口平均分配，計每1萬方里或10萬人，僅有工廠一家，若以投資計算，則每方里不過90元，每人投資不過8角，工人占全人口總數不過千分之一，而平均每廠之資本尚不及10萬元，若與1933年美國14萬廠家，600萬工人；德國190萬廠家，900萬工人相較，固為望塵莫及；^② 即與日本比較，1937年日本工廠總數為106,005家，工人為2,937,000，亦復墮乎其後^③，此種數字雖不甚完全，然已可見其梗概。

分析此3,900余廠家之分布，計上海有1,235家，約占全數30%以上，其他沿海各省份共有2,063家，占全數51%，合計內地各省所有之工廠不過占全數19%左右，此種分布之畸形，久為識者所詬病，無待申述。

然此尚為地域上之偏重，若按業別略加分析，即可見戰前之工業，泰半屬於輕工業範圍，而重工業所占成分極少。上列3,900余廠家中，屬於輕工業範圍者約占全數80%以上，其發展之不平均，極為顯著，而輕工業中復以紡織及飲食品工業為最發達；紡織工業資本為141,297,069元，飲食品工業資本為65,699,447元，兩項合計為206,996,

① 經濟部統計處編經濟統計

② The Statesman Year Book(1937)

③ 英文日本年鑑(1940-41)

516元，已占全部資金總額55%。以紡織工業而論，紗綫總歷年均有增加。

20年來（指1913—1934年）紗綫總增加5倍以上。若與1896年417,000綫相較，則已增10倍以上。且於世界經濟恐慌，紗綫減退狀況中，我國綫數反年有增加，惟所增加者要以外商紗廠為多。此種情形在面粉及捲煙工業中，亦復類似。

推敲中國工業發展畸形之原因，可得兩端：一則由於中國社會形態之特殊，一則由於中國經濟之不能自主，前者使現代工業在中國難於迅速發展，後者則促成中國工業發展之畸形，因之經濟中心乃完全集中於勞工集中，資金豐厚，運輸便利，市場廣大以及不受政治影響之區域。而於工業類別中，自然形成二大類型，一為易于模仿工業之發達，此類工業出產之物品，泰半均屬已有之市場者，且製造之技術簡易，如棉紗、面粉、捲煙、火柴等項是，另一種即為買辦工業之蓬勃，此種工業完全為準備出口者，如繅絲，打蛋，打包，洗毛等項均是。其結果乃演至凡需要高上技術，遠離港口，而復需與進口貨相頑抗之工業，即無發展之余地，戰前中國工業之特征，要不外此。

二 工廠內遷（略）

三 國民黨統治區工業的興起

抗戰期間，除戰區工廠內遷外，後方新設工廠為數亦伙。戰前後方較具規模之民營廠家，在四川僅有電力廠1，水泥廠1，面粉廠5，紙廠1，機器廠2；陝西有紗廠1；面粉廠2；貴州有紙廠1；江西有機器廠1。後方規模較大之工廠，僅此而已。試更以23年後方電廠投資而論，四川為320萬元，西康為2萬元，貴州為8萬元，雲南為233萬元，廣西為113萬元，甘肅為10萬元，共計不過686萬元，占全國電廠投資總額（不包括外資電廠）6%。若以發電容量言，四川為5,611瓩，西康為25瓩，貴州為150瓩，雲南為1,852瓩，廣西為2,291瓩，甘肅為131瓩，共計不過10,060瓩，約當全國總數4%弱。至於發電方面，四川為471萬度，西康為4萬度；貴州為37萬度，雲南為416萬度，廣西為450萬度，甘肅

为21万度，共計不过1,400万度，在全国发电68,700百万度中仅占2%左右。若更以发电用途分析，則用于工业上之电力，23年四川不过兩万度，云南为40万度，广西为61万度，与全国工业用电总额22,733度相較，其数目之細微尤为昭著^①。电力与現代工业既为母子之关系，故电力事业不发达，即可想見后方工业之落后。

經過数年来之努力，后方工业已大异旧观。据本报告之統計，后方各省厂数已超过3,700家，資本总额为20万万元，工人共約24万人，动力約为14万馬力，此項数字已与22—23年間上海工厂之情形不相上下。^②

依据本报告之統計，后方工业自27年起即有突然之进步，（編者按：这种所謂进步只能指抗日战争前与战时国民党所統治的西南西北战时与战前比較，由于战时物資供应通貨膨脹等刺激而暫时的增加）3,700余厂家中，开工在27年以前者，不过590家，約占全数15%，在27年者即为240家，28年为466家，29年为589家，30年为843家，合共2,138家，約占工厂全数60%，31年以后交通封閉，工厂开設为500余家，較30年为少（开工年份不明者不包括在內）。

除接近战区省份外，后方各省工业之增長，要以四川为最速。27年前四川之工厂不过240余家，但至31年底止，即已增至1,600余家，五年来較原有增加7倍以上。其次为湖南，27年前共有工厂90余家，5年来增加4倍。再次为陝西，27年工厂数为70余家，31年底止共增加4倍强。云南、貴州、甘肃等省，工业之增进均大体数此。

四 国民党統治区工业的特征

依据吾人之分析，后方工业之发展具有下列四大特征：

一、重工业之抬头 过去我国工业之发展偏重于輕工业，已如前述。抗战以后，情形为之轉变，协助迁建之厂矿，即以軍需及在国防上确有需要者，如机器、化学、冶煉、动力、材料、交通器材、医药等

^① 申报年鉴25年份729—730頁。

^② 刘大鈞：“中国工业之方針”国民經济研究所油印本。

厂为主。資源委员会則專以办理重工业及基本工业为任务，数年以來，进展极速，計所办事业，已有96單位，其中工业部分屬於冶煉者11單位，屬於化学者18單位，屬於电器者4單位，矿业部分屬管理者有錫鎊汞6單位，屬於生产者為煤鉄石油銅鉛鋅31單位，电业部分屬於火电者18單位，屬於水电者4單位。本報告3,700余厂中，如以厂数而論，化学工业占总数22%，紡織占21，机械占18.1，飲食占9.6，文化占6，金屬品占4.3，冶煉占4.1，水电占3.3，土石品占3.2，电器占2.6，計屬於重工业范围之工厂約占工厂总数35%左右，如以資本而論，各业所占百分比則为：化学28.83，机器17.42，冶煉15.59，紡織14.98，水电7.39，电器4.8，土石品3.32，合計重工业約占50%左右。

二、工業区位之建立 过去中国工业地理之分布，亦至为偏畸，上海一地即集中半数以上之工厂，而内地各省几无現代工业可言。抗战以來，除四川为抗战中樞，交通便利，原料丰富，迁入工厂較多外，并另在湘、桂、滇、黔、陝等省从事建設，以为補助，經数年之努力，此数区域已逐渐发展。試以本報告之統計觀之，厂数方面，四川最多，約占全数44%，湖南次之占13.34%，陝西又次之，占10.24%，广西更次之，占7.77%，此外云南占2.82%，貴州占2.98%，甘肅占3.69%，若以較大之区域划分，則川康約占44.33%，湘贛占13.06%，陝甘占13.93%，兩广占9.62%，云南占5.8%，閩浙占4.16%。資本方面，仍以四川为首，計占总数58%，云南次之占10.8%，广西又次之占7.89%，陝西占5.43%，浙江占4.71%，湖南占3.91%，甘肅占3.19%，貴州占3.38%，若以較大区域划分，則以川康占58.45%，云貴占13.19%，陝甘占8.62%，兩广占8.37%，湘贛占5.64%，閩浙占5.28%。如更以动力設備比較之，此种分野仍极显著，計川康占43.52%，湘贛占13.74%，云貴占11.45%，閩浙占10.8%，陝甘占10.77%，兩广占8.87%。

三、“公營”（編者按：即国民党官僚資本經營的工业，下同。这些厂矿絕大部分都是以巧取豪夺的办法吞并民族資產階級經營或接收前清和北洋政府而來，国民党本身創設的厂矿是微乎其微的。請參看本書第三种关于官僚資本的敘述）事业之优势 此外，“公營”事业

之优势，亦为战时后方工业一大特色。过去国家多故，除軍需鐵路等工业外，政府少有余資举办工业。直至抗战前夕，資源委员会始着手整理工业，經過数年之努力，現已蔚然成觀。各省政府于抗战期中亦紛紛組設工厂，其中尤以黔、貴、閩、贛等省为最。同时国家銀行亦逐漸投資实业，如中央銀行之于川康，中国銀行之于陝甘即为显例。此外各战区經濟委员会在此方面，亦有建树。尤于上述各方之努力，后方“公营”工厂已漸占重要之地位。此点可于資本分配中見之。依据本報告之統計，“公营”厂家資本額約占資本总数69%强，其中四川占36.68%，云南占10.3%，广西占6.83%，浙江占4.58%，甘肃占2.77%，陝西占2.25%，貴州占2.03%，湖南占1.47%，除湖南陝西外，各省“公营”資本均較民营資本为大。如按业別分析，則“公营”資本69%中，复以化学工业为最多(其中以煉油酸鹼酒精等业为最发达，但資源委员会方面化学工业并不占重要地位)。計为21.66，冶煉工业次之为14.18，机器制造工业又次之，为12.71，此外紡織工业占7.35，水电工业占6.58，电气制造工业占4.21，土石品工业占1.64。于此可見“公营”事业已大半集中于基本工业之領域。

四、“公营”民营厂矿規模之悬殊 此外应特为揭出者，即为“公营”民营工厂規模之悬殊。本報告所統計之3,700余厂家中，“公营”不过600余家，而民营則达3,100余家，在数量上当占絕對多数，然若一按实际，則知民营厂家，泰半規模甚小，資本不多，而“公营”厂家則反是。此可于后方工业資本分組統計中見出，試將“公营”民营工厂之資本分組表列于后：(資本不明之厂家除外，下同此。)

組 別	“公营”厂数	民营厂数
5,000元以下	41	306
5,000—10,000元	20	366
10,000—50,000元	105	1,104
50,000—100,000元	59	418
100,000—500,000元	129	485
500,000—1,000,000元	59	118
1,000,000—5,000,000元	77	113
5,000,000—10,000,000元	22	31
10,000,000—50,000,000元	28	11
50,000,000元以上	9	—

由以上分組比較之，“公營”廠家資本在10萬元以下者約占全數40%，而民營部分則在70%以上。若以平均資本而論，“公營”廠家平均每廠為200萬元，而民營廠家則尚不及20萬元。以工人而論，“公營”工廠每廠平均可得工人百餘名，而民營工廠則為50餘人。以動力設備而論，亦復如是，“公營”工廠平均每廠有百匹馬力，而民營廠則約為30匹馬力。試更按業別比較“公營”民營廠家之資本百分比如次：

工業類別	“公營”部分%	民營部分%
水電工業	89	11
冶煉工業	90	10
金屬品工業	3	97
機器製造工業	73	27
電器製造工業	89	11
木材及建築工業	4	96
土石品工業	49	51
化學工業	75	25
飲食品工業	23	77
紡織工業	49	51
服飾品工業	8	92
文化工業	16	84
雜項工業	6	94

由以上分析中，可以見出“公營”占絕對優勢者為冶煉、水電、電器、機器、化學等工業。民營占絕對優勢者為金屬品，木材及建築，服飾品，飲食品，文化及雜項等工業。而“公營”民營相差無幾者有紡織及土石品工業。于此可以概言，後方之基本工業及重工業均已在“公營”勢力範圍之內，而民營占優勢之工業則均屬於輕工業之範疇。此點與“國營”民營事業劃分之基本原則似尚吻合。

按：上文公營及國營之引號是編者加的。

（摘自國民黨經濟部統計處編：“後方工業概況統計”
第1—5頁1943年5月出版）

表一：國民黨統治區工業概況總表

后方工業廳資本工人及動力設備統計民國31年

類別	廠數(家)		資本(元)		工人數(人)		動力設備(匹)	
	合計	公營	合計	民營	合計	公營	合計	民營
總計	3,758	656	1,999,026,035	589,774,681	241,662	77,217	143,915	75,608,867
水電	123	60	143,414,236	16,813,180	4,618	2,519	51,213	20,738,000
冶煉	155	40	302,319,526	274,427,794	17,404	6,657	9,659,000	8,351,000
金屬	160	7	23,804,200	700,000	8,291	1,791	2,064,000	1,107,000
機器製造	682	50	337,597,611	246,555,588	31,541	9,991	16,077,500	7,534,000
電器製造	93	23	93,044,850	81,547,650	7,197	4,985	8,561,500	7,158,000
木材及建築	49	4	5,663,362	252,108	1,839	379	682,000	65,000
工業	122	21	64,400,276	31,869,376	10,651	2,289	4,804,000	1,357,000
土石	826	125	559,220,372	420,060,709	36,140	7,938	24,835,000	9,703,000
化學	360	32	83,485,600	19,175,400	11,447	2,595	9,705,000	1,383,000
飲食品	788	245	290,508,705	142,465,128	93,265	34,552	15,452,500	3,298,750
紡織	147	8	11,044,040	705,160	9,241	843	160,250	160,250
服飾	224	35	21,422,441	3,294,281	7,320	2,615	657,000	173,000
文項	24	2	3,645,816	133,216	2,708	63	145,000	145,000

說明：1. 各項統計，均依據工廠性質，分為公營及民營兩部分。所謂公營，系指中央各機關，省政府，縣政府，各戰區司令部以及國家銀行所經營及投資之工廠而言，其尚未查明之廠家，則暫列民營部分。

2. 本表系依據本部工廠登記之底冊及直接向工廠調查所得之資料，編制而成。凡因材料不齊或原無數字者，均以(一)符號表示之。

3. 資本欄內，水電工業有7廠，冶煉工業有32廠，金屬品工業有3廠，機器製造工業有20廠，申氣製造工業有10廠，木材及建築工業有2廠，土石品工業有67廠，化學工業有67廠，飲食品工業有15廠，紡織工業有52廠，服飾品工業有5廠，文化工業有32廠，雜項工業有1廠，資本不明；工人欄內，水電工業，冶煉工業各有32廠，金屬品工業有6廠，機器製造工業有15廠，電器製造工業有6廠，木材及建築工業有10廠，土石品工業有9廠，化學工業有78廠，飲食品工業有72廠，紡織工業有121廠，服飾品工業有12廠，文化工業有39廠，雜項工業有1廠，工人數不明；動力欄內，設備不明者共有2,032廠，均未列入。

(資料來源：國民黨經濟部統計處編：「后方工業概況統計」第二頁1943年5月出版。)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区工业开工年份统计 (单位: 数)

年份	总计	1931 以前	1931	1932	1933	1934	1935	1936	1937	1938	1939	1940	1941	1942	年份 不明者	
合计	共計	3,758	245	29	28	33	40	57	72	91	240	468	539	843	567	458
	公营	656	28	2	5	4	8	6	11	20	45	95	108	162	39	123
水电业	民营	3,102	217	27	23	29	32	51	61	71	175	371	481	681	528	335
	共計	123	20	4	2	1	4	5	4	7	7	19	8	13	2	27
冶煉业	公营	60	5	1	0	0	1	3	1	4	7	17	7	10	2	2
	民营	63	15	3	2	1	3	2	3	3	0	2	1	3	0	25
金屬品业	共計	155	1	0	1	0	1	3	7	4	16	23	23	25	18	33
	公营	44	0	0	0	0	0	0	1	0	3	8	7	10	3	12
机器制造业	民营	111	1	0	1	0	1	3	6	4	13	15	16	15	15	21
	共計	160	19	2	1	4	2	2	4	3	14	18	33	34	23	1
电器制造业	公营	7	0	0	0	0	0	0	1	0	4	1	1	0	0	0
	民营	153	19	2	1	4	2	2	3	3	10	17	32	34	23	1
土石品工业	共計	682	47	3	4	6	6	11	10	13	49	94	113	159	149	19
	公营	50	4	1	1	1	0	0	0	0	11	7	7	11	3	4
化学工业	民营	632	43	2	3	5	6	11	10	13	38	87	106	148	146	14
	共計	98	1	0	0	2	3	1	0	5	7	15	18	22	22	2
材料及建筑业	公营	23	0	0	0	0	1	0	0	1	2	6	5	4	3	1
	民营	75	1	0	0	2	2	1	0	4	5	9	13	18	19	1
飲食品工业	共計	122	7	0	1	0	1	5	3	6	14	9	19	28	19	10
	公营	21	0	0	0	0	0	0	2	1	1	2	4	4	5	2
材料工业	民营	101	7	0	1	0	1	5	1	5	13	7	15	24	14	8
	共計	826	45	4	6	8	9	10	15	15	31	78	154	261	90	100
材料工业	公营	125	1	0	0	0	1	1	3	3	10	20	23	46	5	12
	民营	701	44	4	6	8	8	9	12	12	21	58	131	215	85	88
飲食品工业	共計	49	5	0	0	2	0	0	0	1	3	8	8	11	5	6
	公营	4	0	0	0	0	0	0	0	0	0		3	0	0	1
飲食品工业	民营	45	5	0	0	2	0	0	0	1	3	8	5	11	5	5
	共計	360	25	7	2	0	2	8	9	15	13	28	41	89	86	35
飲食品工业	公营	32	1	6	0	0	0	0	1	0	0	5	6	14	0	5
	民营	328	24	7	2	0	2	8	8	15	13	23	35	75	86	30

紡織工業	共計	788	53	3	9	3	5	7	8	9	31	104	107	164	126	159
	公營	245	17	0	2	2	2	1	2	6	7	27	34	56	16	73
	民營	543	36	3	7	1	3	6	6	3	24	77	73	108	110	86
服飾品工業	共計	147	9	2	1	2	1	0	3	4	13	26	24	36	15	11
	公營	8	0	0	0	0	0	0	0	0	0	1	4	2	1	0
	民營	139	9	2	1	2	1	0	3	4	13	25	20	34	14	11
文化工業	共計	221	12	4	1	5	1	4	4	5	17	25	23	16	9	98
	公營	35	0	0	0	1	0	0	0	3	1	4	4	5	2	15
	民營	189	12	4	1	4	1	4	4	2	16	21	19	11	7	83
雜項工業	共計	24	1	0	0	0	1	0	1	0	3	3	4	4	5	2
	公營	2	0	0	0	0	0	0	0	0	0	0	1	1	0	0
	民營	22	1	0	0	0	1	1	1	1	3	3	3	3	5	2

(資料來源：國民黨經濟部統計處編：“后方工業概況統計”第15頁總表(二)-1。)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統治区 工业和战前的比較

一 战时工业的发展行程

我国战时工业是有它的特殊性质的。它既不是單純的由平时工业轉入战时工业，亦不是完全从头創造的，我們知道我国战前工业，不只是数量上极为微小，产品远不足供应国内需要；所在地偏在东方的几个港埠，使广大的内地不單失去平衡发展，且多是仅仅輸入少数日用品的半自給的地方經濟。更重要的是：战前工业在各个部門的配备上，在技术、器材、原料以及产品銷路上，都是缺乏国民經济的独立性。換句話說，这种独立性缺乏，不只是工业幼稚的表征，亦是半殖民地的特質。其次，战时后方的区域，主要的川、滇、黔、陝、甘及桂、湘諸省，都是交通梗塞，封建性的小农經濟占着絕對优势，缺乏新式工业所必需的各种經濟条件。这些地区，在战前是制造工业不移植，或移植了也是不能生存发展的地方。另外，还有一个也許更为重要的因素，即是我国許多主持战时工业的人，都是缺乏工业經濟的全盤認識，或是小农經濟和买办經濟的意識(應該說是封建和买办的意識——編者)，又时时的发生决定作用。这样，我国的战时工业，就在战前的都市陸續淪陷时，部分的搶迁出来，而在僻远的中古城市或荒村野地里重建起来的，并是在工业部門和区域的計划分配下建設起来的。現在，我們引証几个統計数字来作战时工业发展行程的总視察：

战时工业历年厂数及資本統計

年 别	厂 数		实繳資本		币值資本		各厂平均資本	
	实 数	百分比	实数(千元)	百分比	实数(千元)	百分比	实繳資本 (千元)	币值資本 (千元)
总 計	5,266	100.00	4,801,245	100.00	487,480	100.00	911.74	92.57
1936以前	300	5.70	117,950	2.46	117,950	24.20	393.17	393.17
1937	63	1.20	22,388	0.47	22,166	4.55	355.37	351.84

1938	208	3.97	117,750	2.45	86,583	17.76	563.40	414.27
1939	419	7.95	286,569	5.97	120,914	24.80	683.94	288.58
1940	571	10.85	378,973	7.89	59,031	12.11	663.70	103.38
1941	866	16.44	709,979	14.79	45,718	9.33	819.84	52.79
1942	1,134	21.61	7,612	9.32	9,896	2.03	393.33	8.70
1943	1,049	19.92	1,486,887	30.97	14,486	2.97	1,417.43	13.81
1944	549	10.42	1,119,502	23.32	3,419	0.70	2,039.17	6.23
年份不明	102	1.94	113,635	2.36	7,317	1.50	1,114.07	71.74

注(一)本表及本文所引用其他有关战时工业统计,均系依据经济部统计处之数字,而重加计算者。

(二)币值资本系依据重庆市零售物价指数计算之货币购买力,折算之战前法币价值。

(三)原文年别系采用民国年份,现改为公元年份(编者)。

依实业部26年止之战前登记工厂统计(东三省除外),共有工厂3,935家,资本373,359千元。32年止之战时工业登记工厂如上表统计者,则有工厂5,266家,实缴资本4,801,245千元,或折换战前币值资本487,480千元。似乎战时工业在厂数及资本两方面都已超过了战前。其实,这两者的范围性质颇多不同,是不可直接比较,只可作为某种程度的参考罢了。因为实业部举行登记时,外资工厂既不在行政范围以内,国营工厂履行的亦不踊跃。且那时工厂法的规定是兼备使用动力及雇用工人30人以上两个条件,战时的工厂法则改低到:凡有30个人以上,使用动力或资本10,000元以上三个条件之一者,皆可认合于工厂法的工厂;尤其是在币值不断降低的情形下,致将许多手工业工场,或使用三、五个工人的碾米厂等都包括在内了。

关于战时工业的发展情形,上表依据开工年份所作的统计,颇能给我们一个较清晰的认识:在被统计的5,266个工厂中,26年以前开工的尚不到7%,其他均在战时设立;其发展的趋势,自27年起逐年增加,到31年达到发展的顶点,而33年更回到29年的水准。从实缴资本上看,趋势大致相同,只是将其发展高峰移后了一年;但从以货币购买力换算的币值资本,即是揭开了货币跌价所致的幻象以后,则开工工厂资本比重最高的时期,已不是31年或32年,而是更早的28年。

同时，由币值資本計算的每厂平均資本的最高紀錄，还要提前到27年。这种币值資本是有相当估計性的，因为工厂的开工与登記可能不在同一个年度，而在后来登記时，由于币值逐年猛烈下降，因应事实需要，可能已实行增資。这样，在換算29年以前，特别是26年以前币值資本时，可能是偏大了的。不过，币值資本所表現的趋势，仍要算是最接近事实的，因为二十七八年开工的，多是迁移或新建的較大規模的工厂，而后来在創辦工业潮流下紛紛設立的工厂，規模却是較小的緣故。

一般說来，后方战时工业的发展速度，已在我国工业史上造出惊人的紀錄。虽然最初几年設立的工厂，多屬由战区迁移来的，如从战区迁移有統計的民营工业，依31年3月的数字，为工厂446家，器材12万余吨。但以33年所有厂数論，已等于战前1.35倍。如以26年开工厂数为后方工业发展的平时速度，則战时每年的平均数也已增高了10倍以上。战时的实繳資本較战前增加了34倍，每年平均速度增高了22倍。即以币值資本言，前者約增了3倍余，后者亦增高2倍余。这些工业，我們如果也必須加以应有的注視与維護，則除了战时供应軍需民用的物資外，对于战后工业化的平衡发展，也提供了許多便利的条件。而这些由战时努力所提供的便利条件，在战时工业的西部地区，是过去五、六十年的遙長历史中所不能具备的，所以更觉得珍貴，也更值得利用与发展。其次关于战时工业发展的因素，抗日战争激起的爱国热忱和支持战争的坚决意志，自是不辞千辛万苦迁移并建設战时工业的精神力量的根源，而下列的几个因素亦是最有效的条件。这几个条件是：通貨膨脹未至惡性阶段，工业品价格上涨的刺激，外貨断絕輸入等，皆使战时工业突現一个繁荣时期。当时卷起的投資工业的浪潮，曾使一部分学者喊出达到“充分就业”限度的警告。不过究竟因为原料、器材、資金，特别是管制与銷路的限制，这种战时工业的繁荣，終以30年或31年为它的分水嶺。自此以后，战时工业是以走着下坡路的。

二 战时工业的业别分配

战时工业与战前工业不同的特征，首先表现于工业部门的分配上。前引实业部登记的战前工厂，在业别的分配上，计为纺织及服饰品工业合占厂数30.2%，资本的37.4%，工人的61.6%；饮食品工业倒占24.2%，17.3%与8.1%；化学工业占16.8%，18.3%与16.3%；所谓基本工业的机器工业仅占8.6%，1%与2.2%；冶炼工业更只占1.5%，0.7%与1%罢了。如果说这是战前工业的弱点，那末，战时工业恰已完全改正过来。

战时工业业别统计

业 别	厂 数		实收资本		币值资本		工 人 数	
	实 数	百分比	实数(千元)	百分比	实数(千元)	百分比	实 数	百分比
总 计	5,266	100.00	4,801,425	100.00	487,480	100.00	359,663	100.00
冶 炼 工 业	198	3.76	748,005	15.58	75,755	15.54	49,136	13.66
机 器 工 业	1,016	19.30	704,722	14.68	59,711	12.25	45,424	12.63
五 金 工 业	337	6.40	135,137	2.81	12,550	2.57	15,533	4.32
电 器 工 业	124	2.35	170,160	3.54	33,562	7.91	8,551	2.38
化 学 工 业	1,520	28.86	1,475,058	30.72	151,900	31.16	80,860	22.48
纺 织 工 业	1,026	19.48	808,832	16.84	80,828	16.58	113,558	31.57
服 饰 品 工 业	182	3.46	64,846	1.35	5,083	1.04	12,999	3.62
饮 食 品 工 业	601	11.42	466,266	9.71	30,883	6.34	18,967	5.28
印 刷 文 具 业	154	2.91	106,155	2.21	17,007	3.49	9,554	2.65
杂 项 工 业	108	2.06	122,564	2.56	15,201	3.12	5,081	1.41

从上面统计中，很明显的看出战时工业部门分配的特点：不只是化学工业地位已超过纺织工业，在厂数，资本额上都占到第一位，工人数上占第二位；而最特异的是向居末位的机器工业，在厂数上仅稍次于纺织工业，资金及工人数亦各占12.25%与2.63%；冶炼工业在厂数上虽只占3.76%，但它所有的资本及工人，却占到15.54%与13.66%，而为战时工业第三个大工业部门。

三 战时工业的地域分布

战时工业与战前工业不同的第二个特点，是地域的分布，或是說战时工业都是分布于新創的工业区上。战前工业由于历史的关系都是建立于沿海沿江的通商口岸。战前工业的这种偏集东部少数都市的現象，远見的人，早已見到它的弊害：一方面是阻碍国民經济改造的平衡发展，另一方面是国际战争发生极易入于敌人的掌握。抗日战争发生，这两种預見完全成为事实，同时，并由于战争发展的事实，亦只有不易受侵的内地，才可成为迁建工业的新区域。

战时工业地域分布表

地域別	厂 数		实繳資本		币值資本		工 人 数	
	实 数	百分比	实数(千元)	百分比	实数(千元)	百分比	实 数	百分比
总 計	5,266	100.00	4,801,245	100.00	437,480	100.00	359,663	100.00
重 庆	1,518	28.83	1,408,124	29.33	153,899	31.57	90,852	25.26
四 川	864	16.41	1,134,396	23.63	108,671	22.29	64,773	18.01
貴 州	210	3.99	130,604	2.73	9,361	1.92	8,232	2.29
云 南	168	3.19	524,350	10.93	61,407	12.60	25,130	6.99
广 西	384	7.29	284,318	5.92	39,185	8.04	19,727	5.48
湖 南	935	17.76	524,641	10.93	38,545	6.88	57,563	16.01
陕 西	367	6.97	315,914	6.57	35,402	7.26	31,204	8.63
甘 肃	220	4.19	167,142	3.48	6,690	1.36	10,401	2.89
其他各省	600	11.37	311,766	6.48	39,380	8.08	51,781	14.39

从上述地域統計看来，战时工业的分布是相当均衡的，所謂后方地区，除了最偏僻的西康，青海，宁夏以外，最重要的四川等七省，都占取了一个重要地位。同时，它們的分布亦是相当集中的，除了重庆市成了后方最大的工业中心，在各方面占取25—31%的优势外，其他各省的工业亦集中于少数城市：如四川的成都、万县、瀘州、宜宾、長寿，云南的昆明，貴州的貴阳，广西的桂林、柳州，湖南的衡阳、祁阳、邵阳、芷江、沅陵，陕西的西安、宝鷄，甘肃的蘭州等，都可以說是后方的新工业区。

四 战时的民营工业

民营工业业别统计

业 别	厂 数		实收资本		币值资本		工 人 数	
	实 数	占总額百分比	实数(千元)	占总額百分比	实数(千元)	占总額百分比	实 数	占总額百分比
总 計	4,764	90.47	3,175,266	65.09	298,297	61.19	254,597	70.79
冶煉工业	136	2.58	136,162	2.84	17,121	3.51	19,263	5.36
机器工业	965	18.33	418,742	8.72	30,546	6.27	33,425	9.29
五金工业	326	6.19	110,073	2.29	11,193	2.30	11,178	3.11
电器工业	104	1.97	100,310	2.09	15,350	3.15	3,563	0.99
化学工业	1,353	25.69	1,112,671	23.17	104,594	21.46	64,530	17.94
紡織工业	880	16.71	560,098	11.67	55,548	11.39	79,877	22.21
服飾品工业	173	3.29	61,926	1.29	4,876	1.00	11,946	3.33
飲食品工业	588	11.17	427,455	8.90	17,007	6.02	17,254	4.80
印刷文具工业	144	2.73	79,865	1.66	15,327	3.14	9,004	2.50
杂項工业	95	1.81	117,964	2.46	14,375	2.95	4,539	1.26

民营工业地区别统计

地域 别	厂 数		实收资本		币值资本		工 人 数	
	实 数	占总額百分比	实数(千元)	占总額百分比	实数(千元)	占总額百分比	实 数	占总額百分比
总 計	4,764	90.47	3,125,266	65.09	298,297	61.19	254,597	70.79
重 庆	1,461	27.74	819,354	17.09	95,368	19.56	64,701	17.99
四 川	813	15.44	858,643	17.89	88,419	18.14	52,146	14.50
貴 州	183	3.48	100,110	2.09	5,621	1.15	6,314	1.76
云 南	142	2.70	246,580	5.14	20,301	4.17	9,277	2.53
广 西	343	6.51	202,146	4.21	11,940	2.05	13,613	3.78
湖 南	870	16.52	415,394	8.65	22,337	4.65	48,400	13.46
陕 西	325	6.17	217,634	4.53	27,100	5.66	23,112	6.43
甘 肃	193	3.67	67,202	1.40	2,535	0.52	6,755	1.88
其 他	434	8.24	198,173	4.11	24,676	4.55	30,279	8.41

依据上述统计,可知民营工业在厂数上虽仍占取绝对的优势,但在资本及工人数字上已显大为削弱;尤以币值资本仅占61%的相对

优势，更显现战时民营工业的规模是較微小的。如从工业部門上观察：民营工业的重心，是在化学工业、紡織工业、机器工业、飲食品工业、五金工业及服飾品工业上。它們在厂数，資本数及工人数的比重虽不相同，但趋势大体是同一的。民营工业的一般特征，是除了冶煉、电器、印刷文具及杂項工业外，資本所占的比重是远小于厂数的比重的，而那些占取較大比重的原因，大多又属于开工較早之故，此在币值資本大于实繳資本的比重，可以看出。再一方面，如冶煉、紡織、服飾品、五金、机器等工业所有工人数的比重，大于資本，甚至大于厂数的合理解釋，則是使用动力程度較小的表現。至于民营工业的地域分布的特征：第一是民营工业的最大多数，是集中于列举的 8 省市，尤以重庆、湖南及四川是最大的中心，其他偏僻落后或战区的省份，是比較稀小的；这足見民营工业是更多的依賴于一般經濟条件，而合于自然发展的趋势。第二是从資本角度看，显見云南和四川的民营工厂一般是規模較大的，而湖南、广西的工厂比較是規模最小，而从而币值資本与实繳資本之百分比的增减上，亦可看出各省工厂設立的先后。第三是將各省所占工人数的百分比与其資本及厂数的比重，互相參看，亦是可作各地的工业部門，工厂規模和动力化程度的一种間接指标的。

战时民营工业所尽的任务，可以說頗为巨大，而所遭遇的重重困难，都又鑽牛角尖似的越来越难有发展乃至生存的余地了。民营工业的資力較少，設備較小，負担較重，并缺少器材、原料及运输的便利条件，而其在战时对于軍需民用的供給，工业技术的改进，和新工业区的創建上，都曾在我国工业史上开創了新的纪录。但是，民营工业正如上面論述的，它在本身的脆弱性，和客观的經濟条件严重束縛外，还遭遇了許多政策和行政上的障碍。例如“国营”（即国民党官僚資本經營的工业——編者）与民营工业的范围，管制及外汇政策，都从原則的爭論发展为事实的矛盾。这些問題，并已使全部战时工业，首先是全部民营工业遇到了不能繼續生存的厄运。自胜利迄今，重庆的較大工厂，正式解散，并請求收購机器设备的已达一百余家，即是

这一危机初步发展的严重表征。

五 战时的官营工业

战时的“国营”工业是战时工业中的一个新姿态，一种新势力。它在基本性质上虽然继承了清末以来的官办工业，而在形式和范围上却已有了极大的不同。这种不同，主要的表现在：第一是工业的经营范围，已经几乎扩大到每个工业部门，而不足限于兵工及交通官办工业。第二是“国营”或“公营”工业的经营主体已扩大到中央部会、国家银行、省市县政府、战区司令部及党团部等方面；而经营工业的机关与其所经营的事业，亦已打破了行政性质或事业性质的范围。第三在经营方式上，当然最主要的仍是独资与合办，可是亦有采用董事制和公司制的新形式的。

下列二表是可以使我们对于战时的“国营”事业获得一个概略的认识的：

官营工业业别统计①

业 别	厂 数		实收资本		币值资本		工 人 数	
	实 数	占总额百分比	实数(千元)	占总额百分比	实数(千元)	占总额百分比	实 数	占总额百分比
总 计	502	9.53	1,675,979	34.91	189,183	38.81	105,066	29.21
冶 炼 工 业	62	1.18	611,843	12.74	58,634	12.03	29,873	8.30
机 器 工 业	51	0.97	285,980	5.96	29,166	5.98	11,999	3.34
五 金 工 业	11	0.21	25,064	0.52	1,352	0.28	4,355	1.21
电 器 工 业	20	0.38	69,850	1.45	22,212	4.76	4,938	1.39
化 学 工 业	167	3.17	362,386	7.55	47,306	9.70	16,330	4.54
纺 织 工 业	146	2.77	248,233	5.17	25,280	5.19	33,681	9.36
服 饰 品 工 业	9	0.17	2,920	0.06	207	0.04	1,035	0.29
饮 食 品 工 业	13	0.25	38,811	0.81	1,520	0.31	1,713	0.48
印 刷 文 具 工 业	10	0.18	26,290	0.55	1,680	0.35	550	0.15
杂 项 工 业	13	0.15	4,600	0.10	826	0.17	542	0.15

① 原标题是“国营工业”经编者改为“官营工业”，下表同。

官營工業地域別統計

地域別	廠數		實繳資本		市值資本		工人數	
	實數	占總額百分比	實數(千元)	占總額百分比	實數(千元)	占總額百分比	實數	占總額百分比
總計	502	9.53	1,675,979	34.91	189,183	38.81	105,066	29.21
重慶	57	1.08	588,770	12.26	58,531	12.01	26,151	7.27
四川	51	0.97	257,753	5.74	20,252	4.15	12,627	3.51
貴州	27	0.51	30,464	0.64	3,740	0.77	1,918	0.53
雲南	26	0.49	277,770	5.79	41,105	8.43	15,853	4.41
廣西	41	0.78	82,172	1.71	27,245	5.59	6,114	1.70
湖南	65	1.24	109,247	2.28	11,208	2.30	9,163	2.55
陝西	42	0.80	93,230	2.05	8,302	1.70	8,092	2.25
甘肅	27	0.52	99,940	2.03	4,096	0.84	3,646	1.01
其他	166	3.14	131,583	2.36	14,704	3.02	21,502	5.98

从上述統計數字中所看出的“國營”工業的特征是在于：它在廠數上所佔不到10%的地位，竟佔到資本39%，和工人的29%的優勢。這種現象，既表示“國營”工業的資力雄厚和規模巨大，同時亦表示它在許多方面的主導作用。其次，“國營”工業的範圍，已經普遍到每一個工業部門，而其重點則放在冶煉、化學、機器、紡織及電器工業方面。上述統計已指証清楚，還有一種值得指出的現象，即“國營”工業不但已越出重工業的範圍，在化學或紡織等輕工業方面佔取了頗為重要的地位，而印刷文具工業亦已成為經營的重要對象，又可顯示“國營”事業的一種新趨勢。再次，“國營”工業區域的重點，顯然是在重慶、雲南、廣西和四川等幾個戰時工業最稱發達的地區，至於湖南及其他省區所以在廠數上佔了重大地位，而在資本和工人數字上又相對的較為微小的原因，不只是由於那些地區的“國營”工業的規模較小，並亦由於“省營”或“縣營”的工廠數量的較多所致^①。

(摘自李紫翔：“從戰時工業論戰後工業的途徑”，中央銀行月報復刊第一卷第一期，1946年1月出版)

① 原文之國營、公營、省營、縣營中的引號是編者加的。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統治区 工业大大落后于战前

抗战以后，中国工业发展有其积极的光明的方面，然而同时亦有其消极的困难的方面。就积极发展的方面来说，抗战前我国的工业建设遍在于少数帝国主义经济势力所笼罩的东南省区与条约口岸，广大的西南与西北完全是一片未经开发的工业处女地，抗战以后，专为新式工业之处女地的西南与西北也开始了烟突的冒烟。这是最值得我们兴奋的一件事。据林繼庸氏(工厂内迁之主持人)之报告，内迁之厂矿共计总数为452单位，物资重量共12万余吨，其中大部分迁入四川，计250单位，湖南次之，计121单位，陕西广西又次之。其中有矿业单位6、冶业1，机械工业181，电器工业25，化学工业60，纺织工业103，饮食工业21，教育用品工业37，其他工业18。(见“民营厂矿内迁纪略”一书)再加以战前存有与战后新设之厂矿，现在后方的厂矿数目已达2千余家以上，这是我们对于日寇摧毁我国工业最好的答复，也是我国支持抗战最有力的武器。虽然有这些成绩，我们是并不能认为满意，就内迁厂矿对原有的比例来说，林繼庸氏称：“上海之役，余负重责，乃因环境关系，所迁出之厂数不及当地原有者12%，广州之役，余又受令将事，乃结果竟无。”这固然是负责者的谦辞，然而也是实录。以数量说是如此，至就规模而论，战后更不能与战前相比拟了。我国的民族产业，在战前本已相当可憐，不仅比起外国来是有如侏儒，即比之外国在我国投资开设的企业亦如小巫之于大巫，早成喧宾夺主的形势。不过我国当时总还有些规模相当的经营，如纺织业中的申新、永安、大生等纺织厂，重工业中之汉冶萍、龙烟、六河湾等公司，它们虽或受外国资本之压迫，或因国内政治环境之影响，而

在風雨飄搖之中，但究竟不失為規模較大的經營。抗戰以後，大規模的經營，或則毀于炮火，或則淪于敵手，至後方廠礦之規模，比起戰前來實在微弱得很，例如抗戰以前我國紡織業全國紗錠總數為280萬余錠，抗戰後後方各省紗錠總數僅占戰前6%強，以個別單位來說，戰前華商紗廠的紡紗錠子可達八、九萬枚，五、六萬枚的尤為司空見慣，而在抗戰以後，整個四川全省的紗錠不到五萬枚，以廠家而論，最大的紗廠紗錠也沒有達到二萬枚的。

（摘自千家駒：“論當前工商業發展的動向”新工商1卷1期）

淪陷区和台灣香港的民族工業

1. 淪陷后上海香港等地的工業和 國民黨統治區工業比較^①

據上海公共租界的統計，截至27年年底止，上海租界內的工廠數已達4,700余家，超過戰前2倍以上。比戰前全市的廠數，相差只800余家。如果把去年新建立或開工的廠數估計在內，一定會恢復戰前5,000余家的數目的。你看，上海租界那麼小的地方，現在竟有5,000家的工廠，而西南各省這廣大的領域，經過了幾年的推動與努力，才只有上海廠數的1/10。上海現在這數千家工廠，固然不完全是屬於華商的，但大半可說是由中國的資本經營的。這一點說明了中國目下的有錢人仍不肯放心的來後方投資。

（1940年3月11日重慶新華日報）

在太平洋戰爭前，上海和香港由於英美的勢力關係，工業生產還存在着半民族的性質，而且在全國生產的比重上還占了很大的成分。上海原是我國最大的工業區，戰前共有工廠5,400余家；“八一三”後不是被毀於炮火，即是內遷或停工，26年年底開工的僅有422家。但是到了27年，戰區西移，上海又成為一般有資產者的安樂窩，於是原有工廠既未被毀又未內遷者都紛紛開工。該年年底，開工工廠已有4,709家之多。至28年則更有許多新廠設立，頓呈戰時繁榮之象，生產量甚至已超過25年。香港工業基礎雖不如上海，但據29年的調查，全年所產工業品，外銷者亦值9,000萬港幣。據經濟部統計，29年度民營工廠全年產品總值約47萬萬元，而大後方民營“國營”工礦業產值的總額只有10萬萬5千萬元。這個數目，僅及該年度民營工業產值

^① 本文國營公營內引號是編者加的。

總額的20%左右，若除去大后方“國營”工業的部分，則全國民營工業至少有80%左右在滬港兩地。幾年來雖然輿論方面竭力鼓吹工廠內移，畢竟因為沒有決心，缺少計劃，以致許多規模較大的工廠，始終留在一個危險的境地。太平洋烽火一起，坐觀我80%以上的民營工業陷入敵手，這個損失，比較“八一三”時實有過而無不及，實在是不可挽救的損失！

（張錫昌等著：“戰時的中國經濟”173—174頁）

如以港滬為對比，該兩地之工業建設，在全國生產事業中，迄占優勢。上海一地，戰前本有大小工廠5千余家，為全國工業中心，八一三事變後，租界外之大部分工廠，雖遭受嚴重之破壞，一部分工廠亦接受政府勸告，陸續遷至內地開工，但多數廠主仍以上海市場對工具及原料取給較易，熟練工人招致方便，產品銷路，既可以大后方及淪陷區為對象，復可輸至南洋一帶，加之租界以內，又可从英美方面獲得若干庇護力量，以擺脫敵人之控制，於是紛紛遷入租界，繼續開工，雖其工廠規模較小，而工廠數量，截至27年底，先後復工者，即已有4,700余家。如以生產量而論，28年上海工業生產總值已超過25年，年來則更有進展。香港方面，國人經營之工業，29年輸出總值為9,000萬港元，超過同年“國營”工業生產總值50%。復據經濟部估計，去年我民營工業產品總值達百萬萬元，然其中在港滬兩地生產者占70—80%。我大后方年來雖建有相當規模之“公營”工業及民營工業，若與前者相較，不逮遠甚；蓋“公營”工業之年產值，至今尚不及10萬萬元，民營工業，則更瞠乎其後。可見5年來之工業建設，除“公營”工業內地已較有基礎外，而其全部重心，則仍在港滬兩地。^①

（摘自秦柳方：“今后的工業建設”，中國工業創刊號）

2. 淪陷後上海的民族工業問題

自我們正規軍撤退淞滬一帶以後，一般人把上海稱為“孤島”，所

^① 本文國營公營內之引號是編者加的。

謂“孤島”的意義，不外是由于我們政府的權力暫時不能支配上海，雖然敵人的軍事勢力已控制上海的四圍，而我們在上海的人民，猶能依存第三者（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勢力，保有向來的秩序，得以生息于其間，不致馬上遭受敵人的洗劫和殘殺。因之，這兩年來，我們的中央政府雖然西遷重慶，而上海的民族工業猶能漸漸的恢復起來。據公共租界工部局工業課的統計，上海租界內的工廠數，前年底已達4,700余家。最近報道，全上海工廠共有6,300余家，除敵人的經營和控制有1,000余家以外，民族工業實有5,000余家，已恢復到戰前的工廠數目。

上海的民族工業恢復這樣的快，還有幾個重要原因：第一，上海從來是中國的經濟中心，現代經濟組織，無不完備；有各種各業的銀行放款，各種各業的工業生產，各種各業的倉庫設備；雖然在抗戰中上海經濟遭受空前的破壞，但上海經濟中心，並沒有轉移到內地來。因之，從已有的現代經濟完備的機構，調整和恢復舊有的工業生產，總比較在經濟落后的區域，另起爐灶建設工業，要容易得多；而中國工業家一向是貪圖眼前便捷的利益，缺少艱苦創造的精神，誰不遷就現成的便利環境易于恢復自己的工業！第二，上海是中國惟一的國際貿易市場，對外的交通是比其他各大都市要便利得多；中國工業生產工具，大都是從海外購入，不但工業生產工具從海外購入，並且有許多工業生產的原料，也須依存于外洋的供給；上海既是國際貿易的中心和對外交通便利的都市，所以購入工業生產上所需要的工具和原料，比較其他都市也要方便得多，工業的恢復自然也就容易。第三，在東南敵人占領地的中國人民，為着逃避敵人的洗劫和殘殺種種的慘酷行為，都逃避到上海的租界中去；于是上海的租界人口驟增到450萬。人口的增加，當然日用工業品的需要亦必隨之增加；日用工業品的需要增加，是促成上海工業恢復的有力因素。同時，逃亡到上海租界的人們，大多數是有一點現金在手里，不願意把現金白白的花了，有的作為工業生產的資金，以經營工業，也是事實。因之，戰時上海資金集中也是促成上海工業迅速恢復的一個原因。

因为这几个重要原因，所以上海有种种的便利条件促成工业的迅速恢复。然而这些迅速恢复的工业，縱然在本质上完全是民族工业，不使用敌国制造的原料，完全是自己資本，更沒有敌国的技术員工参加；这即是說，在工业生产上，不与敌人发生絲毫的关系，根本不受其势力的支配，也不受第三者的剥夺，这不能不承認为民族工业了。但这些“孤島”上的民族工业即是依存第三者在中国的特权，处在敌人势力包围之下而从事生产的。不能說，工业制成品只銷售于“孤島”，而原料的取給也全在“孤島”上，并不越雷池一步，通过敌人势力所控制的范围，而与外界不发生任何关系的。“孤島”上的工业既不能与外界完全脫离了交换关系，那就不能避免与敌人势力所控制的范围发生关系，即是必然的要发生关系，究竟这种发生的关系，于我們有什么利害？这是值得研究的。

上海的海关和总稅局是在敌人势力支配之下，这是誰也知道的事实。海关和总稅局既是在敌人势力支配之下，則上海租界的民族工业，所需要的原料輸入和制成品的輸出，必須通过和繳納为敌人所把持的关税，轉口稅，統稅等等，这些稅款大半又为敌人劫持而去，作为以战养战之資；所以上海的民族工业越繁荣，敌人所收的稅款越增多；敌人所收入稅款越增多，則敌人对华軍事的財政困难要减少，这是很显然的道理。

在上海民族工业的生产原料，有的須購自江浙一帶的淪陷区域，而工业的制成品，大半也要在江浙一帶淪陷区域銷售；因之，上海租界与江浙一帶淪陷区域的輸出和輸入的商品，当然要运用敌人控制的交通路綫，才能达到目的；于是上海民族工业的繁荣，一面繁荣了淪陷区域的农村經濟，即是做了敌人劫夺的經濟基础；一面增加了敌人運費的收入，更不啻支持了敌人在淪陷区域的經濟掠夺。

敌人在上海設立了許多工厂及各种公司为掠夺我們物資的机构，在其对华的軍事和政治处处感触棘手之今日，而华中經濟“振兴”企图不能充分实现的时候，他是要利用上海的中国工业制品以補助其生产之不足，或是以上海的中国工业为培养他在华工业发达的助

力，或是以之販賣于淪陷區域為剝削中國人民經濟的工具，都是可能。所以上海租界的民族工業的發達，有助長敵人在華工業經濟膨脹的趨勢，做了他“振興”華中經濟的基礎。

有人說，上海的民族工業發達，對於我們戰時經濟有很大的幫助，同時使淪陷區域的經濟，也不致為敵人整個的獨吞，例如，上海租界有450萬的人口，所消費日用工業製品，因為有民族工業供給，不致購買敵國和第三國的貨物，能減少外來經濟侵略的損失，此其一；現在西南和西北各省的工業建設尚未完成，也須要上海租界的民族工業製品的供給，以補不足，免得件件須向外國購買，增加國家外匯的支出，此其二；南洋各埠，有大多數華僑，需要國貨供給，在上海的民族工業製品，得到交通的便利，可以販運南洋各埠，確保國貨市場的不失，換取大批外匯回來，此其三；因為要爭取我們經濟勢力不隨着軍事和政治勢力的退却而失了存在的根據，就要利用上海與敵人作經濟戰爭的據點，爭取經濟的勝利，所以上海民族工業應支持其發展，是沒有問題的。

然而我們要知道，一種經濟戰略的策動，不能說，只對於敵完全有害，對於我絕對有利的，其實一切政策，不全是有百利而無一害，或是有百害而無一利。比方敵人在戰區使用軍用票和偽鈔，在他原來的計劃，用一張紙，不要一個錢的基金，就可以從戰區的中國老百姓手里取得實際應用的物資，這是以戰養戰最好的方法，但是敵人軍用票和偽鈔一到中國老百姓手里，馬上就購買日貨，不存留一張，結果，軍用票和偽鈔都到了日本商人的手里，日本商人拿着這些廢紙，莫不叫苦連天，這正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使之自作自受。

所以敵對華的貨幣戰，至今陷於僵局，一籌莫展，原非敵人始料所及，這是證明一種對敵的經濟戰略，于己有利，也有害，決不能只有利而無害。誠然，在上海的民族工業發達，對於我們戰時經濟及淪陷區域的經濟也有許多幫助，然而問題是在利多於害，還是害大於利？固然不能選擇有百利而無一害的政策，但也要選擇利大於害的政策，分別利害的輕重為決策標準，這是合理的。

前已說过，上海民族工业的发达，有利于敌人以战养战的企图，虽然对于我们战时经济及沦陷区域的经济不无利益，但这种利益不及我们所受损失的重大，从以下几点分析，更可以明白。

第一，现代工业的发展，必须借助于政治力量的保护，没有政治力量保护的工业，决不能健全的发展，这是一个显然的事实。上海的民族工业是借助于第三者的庇护，我们政府的政治力量不能达到，在这种情势下的民族工业，能否永远的繁荣，当然有很大疑问。第三者能保护至如何程度，敌人对上海租界的秩序将来如何扰乱，也都是很严重的问题。纵然这些问题都不成为问题，上海的民族工业可以保持永久的繁荣，试问工业中心与政治中心脱了节，各处一方，民族工业无论在上海如何发达，对于后方抗战建国的工作，有什么充分的帮助？现在由上海运输货物到内地来，最快的时期也要一月之久，不但从上海出口要向敌人主持的税关缴纳税款，同时也要利用第三国的交通工具，消耗运费，增加了货物的生产成本，扩大消费者的负担，缓不应急，不能大量输入，这都是不能充分利用上海工业发达的事实。并且上海同一样货物，在重庆制造，其出售的价格，并不以在重庆制造的成本计算的标准，而是以上海同样的货物在重庆出售的价格为标准，这是后方物价不能平抑的一个原因。换一句话说，上海的经济势力依然支配了内地，因为上海的民族工业发达，超过了内地工业生产的水准，所以我们的经济中心依然在上海而没有转移到内地来。我们的政治力量既不能支配我们的经济中心，作为强大我们抗战建国的力量，而后方的经济和政治反要受这种不为我们政治力量支配的经济中心的恶影响，然则我们为什么要发达上海的民族工业，耗散和削弱我们经济的实力，以强大敌人和第三者的控制，扩大我们内部经济和政治的矛盾？

第二，中国此次抗战的目的是要国家民族得到独立自主的地位，要国家民族得到独立自主的地位，不仅仅以军事和政治的方法求得实现，尤其是在经济上要扫除半殖民地经济素质，才是确立了我国国家民族独立自主的基础。上海是各帝国主义对华经济侵略的大本营，

他們的經濟勢力占着支配的地位，我們要求得獨立自主的經濟實現，即是掃除半殖民地經濟的素質，脫離各帝國主義勢力羈絆，無論平時和戰時，就不應該以上海為我們的經濟中心，這就說，我們的工業根本不應該集中在上海，一來我們的工業力量不能與帝國主義在上海的工業競爭，二來我們的工業在上海能存在，必須與帝國主義經濟間接和直接發生關係，即是求屬於帝國主義經濟的範圍，構成半殖民地經濟的素質。所以我們應該另外構成經濟中心的勢力，才能與帝國主義在華的經濟競爭。因此，在抗戰中，正好把我們的經濟中心轉移到內地來，脫離帝國主義經濟勢力的羈絆，建樹獨立自主的經濟體制一個絕好機會，長此依存帝國主義在華的政治上特殊勢力，卷入帝國主義在華經濟勢力的範圍，使我們的工業，不能脫離帝國主義的政治和經濟勢力的支配，而能獨立的生产，這樣，將來我們的抗戰勝利，而我們的工業經濟依然是半殖民地的素質，反阻礙我們獨立自主的國家的完成。

第三，上海工業的發達，勢必促成上海對外貿易更大的入超，因為中國工業生產要依靠外來物品的供給，這種供給，有許多並不是必依存於外來的，但因為貪圖便利，已成了慣用品，而不願改變過來。現在上海這種入超和供給，我們既沒有經濟的方法制止使之減少，也沒有政治方法控制使之萎縮，聽從他們自由的发展下去，所以抗戰中，上海洋貨入口每年總在14萬萬左右，而上海在戰時也就成為中國外匯大量的向外流的一個最大的漏洞。這就是說，上海的工業品，把內地和淪陷區域的法幣吸收到上海，而上海的工業家吸收了法幣以後，把一部分的法幣變成了外匯，把一部分法幣變成了洋貨，如以繼續生產，繼續循環，中國外匯基金漸漸減少，法幣的價格漸漸的低落，造成物價上漸漸不可救藥的因素。所以上海的經濟繁榮是剝奪內地和淪陷區域經濟的果實，而上海的工業也就變成了消耗我們外匯的機器，替帝國主義作了剝削中國經濟的工具。

第四，中國工業的資力和人力太薄弱，尤其是受戰事的破壞，使工業生產力量的衰退，在這種情勢下的工業，只可集中在一處以圖健

全的发展，不应该把工业力量分散在政府权力不能支配的区域减少复兴的力量。并且各种工业的生产，彼此有互相密切关系，轻工业需要重工业的发达而发达，重工业也要依存轻工业的繁荣而繁荣，所以各门工业越完备，各门工业生产就越能发达，各门工业越集中，各门工业的建立就越容易。现在上海租界的工业发达，吸住了大部分中国工业的资本和人力，把战时仅有的薄弱的中国工业的力量分散了，实阻碍后方工业建设的发达，因为各种工业生产，须互相配合，后方各门工业种类不充分完备，所以工业生产也不容易发达起来。换一句话说，上海租界的工业越发达，后方的工业越不能发达，不但东南一带的熟练的技术人员和大量的资金，不能转移到内地来应用，甚至于将后方已有的资金和技术人员，有渐渐诱至于上海的趋势，使后方工业建设更感棘手。

基于以上所说，上海租界工业的发达，必将演成这些恶果，现在许多的经济问题，都是这些恶果的作祟，如不急图制止，则内部经济的矛盾必将扩大。所以当前经济上最切要的问题，莫过于根绝这些恶果产生的因子。

（摘自高叔康：“上海民族工业问题”，新经济半月刊3卷12期，1940年6月出版）

3. 抗日战争时期上海等地沦陷区的民族工业的变化

一、棉纺织业 上海方面之纺织厂，在事变初（即中日战争，下同——编者）共有65家，其中华商31家、计纱锭1,114,408枚；日商30家，计纱锭1,331,412枚，英商4家，计纱锭221,336枚，合计纱锭总额2,667,156枚。华北方面共有28家，大部分在天津、青岛、济南等地。战事发生后，华商损失较重者有申新第一、五、七各厂，永安第一厂，振华、恒丰、上海印染、大丰、恒大、纬通、美丰、振泰、鼎鑫、仁德等厂。27年间，华商当时在租界以内复工者共有11家，新设者有荣丰、安达、新中国、新生、合丰等5厂，其余在租界以外，而损失尚轻者，暂由日商经营。至28年，又有德丰、保丰、中纺等厂成立，故截至31年底止，总计上海纱厂仍有65家，纱锭2,201,026枚；英商5家，纺锭241,000枚；

純粹華廠及向英美註冊者共有22家，紗錠632,000枚；日商及接管華廠共38家，紗錠共計1,328,418枚。當事變後一年，上海各廠生產之總和，每月平均產紗14萬餘件，布約200萬匹。27年產量減退甚巨，紗每月在96,000件左右，布約16萬匹。28年趨向增加。至29年，因原棉減少，加以華北禁止原棉南運，產量減至27年之原狀。30年，因電力限制，又行減工，減少30%。30年年底，因大東亞戰爭（按即太平洋戰爭，下同——編者）由醞釀而終於爆發，英美產業悉受接管，但彼時尙繼續開工，至9月正式公布軍管理，故開工之工廠亦由65家而減至52家。當初實施軍管理之工廠共有怡和、綸昌、崇信、統益、安達、信和、申新第二、第九兩廠、永安第三廠、公益、中紡、保丰等十餘廠。至32年上半年純粹華商產業，几全部解除軍管理。但在這一期間，原料問題難于解決，生產大不如前。緣上海紡廠原料，初因華北禁止原棉出口，繼因華中一帶棉產區遭受統制、華商工廠之運轉悉賴棉源之接濟。29年間外棉輸入量達380餘萬担，同時日美時局日趨惡化，煤之來源日減，產量步縮，31年產量因有存底，亦僅達30年之半數。32年各廠雖在繼續生產，但華商工廠之開工率僅及總錠數之一成，且系粗紗。無錫、常州、蘇州等處被燬之廠固一仍其舊，而未受損害者反較上海紗廠差勝一籌，蓋因當地棉產收買較易也。

二、染織業 上海染織業在事變前數年，因農村漸趨復興，營業日臻佳境。且以衣着日新月異，花色祇求奇巧，染織整理廠之設立，隨消費之日增而年有增加。以前上海開工之廠約有260—270家，資本總額約900餘萬元，布機共11,000多台，織造及印染之布匹年約1,400—1,500萬匹左右，而英商綸昌廠因規模宏大、設備完全，每年產銷額為各廠之冠，實為華商之勁敵。因華商大多資本有限，且力量分散，往往此起彼仆，基礎不穩，該業中較負聲譽者有達丰、光明、麗明、中國、仁丰、光華等廠；滬東、虹口、閘北、南市等區之廠，規模較小。陸家濱一帶受戰事損失之較大工廠，計有96家。此外由外埠遷滬復工者有：常熟之茂成、辛丰豫兩廠。江陰之勤生、慎沅、華澄三家，及常州之益民，無錫之興業等廠。綜計新廠及遷滬各廠之布機，共達15,374

台、染机共达113台。故在27年底全埠开工者当在335余家。至翌年，旧厂如光中、公胜、五丰、中国、光华、达丰、鸿新、通和、一中、美丰等厂，亦先后恢复，运输尚能畅通，各地需要军装布及色布甚殷，各厂营业蒸蒸日上，28年間又有新厂計78家成立，統計布机至28年底，上海新旧染織厂約有414家，織机22,582台、印染机575台、絲光車68台，产量达130余万匹，实为該业之鼎盛时期。29年春季，該业景况尚屬良好，但自5月分受汇市狂縮暴伸之影响，致高价吸进原料者亏累不少，加以嗣后浙东海口被封，华南越南形势紧张，該业所受打击，益为严重，停工减工事件紛紛踵起，据同业估計近年全埠开工布机仅及全盛时之半数，30年仍有新設厂20余家，但停歇亦有20家。此时德国染料及化学顏料缺乏，价格飞漲，同时8月間复有棉織品禁止出口令之頒布，予該业以重大打击，下半年之产量与上半年相較，已減退60%。31年中，因紡織厂停工减工、紗布供給减少，重以上海与内地相隔絕，另成一特別統制区，搬运不易，处此情况，染織厂一籌莫展，其中除少数規模較大，姑留一部分工人維持工作外，90%陷于停頓观望之中。各种經濟机构，虽在努力調整，以期提高生产，但原棉供应問題一日未获合理解决，即恐一日不能脱离上年之情势。

无錫、苏州、常州一帶之染織厂，其中資力較厚者，先后迁滬复工，迨28、29年，漸次恢复，30年以后，轉向内地投資者，頗不乏人。

三、絲業 蚕絲为我国特产，养蚕制絲，历史最早，浙江一帶农民，以此为副业者甚众。江浙兩省主要城市如上海、无錫、杭州、嘉兴等悉为絲业重鎮，产质最良，在国际貿易市場夙占重要地位，后因日絲竞争，中国蚕絲在欧美市場之銷路大不如前。迨人造絲出現，我国蚕絲外銷益疲，繭价日趋跌落，蚕农不堪賠累，大多將桑园改为稻田，江浙之桑园因而减少1/3左右，而产絲最富之无錫，竟达十分之六七，其衰落程度，实为可惊。当局（按：即日本傀儡南京汪精卫政府——編者）有鉴于此，全国經濟委员会遂有蚕絲改良委员会之增設，江苏省政府則設立蚕业改进管理委员会，浙江省政府亦設蚕絲統制委员会。从統制育种、繭价、繭行三方面着手，奈事与願違，成效未著。如

蚕种之統制，虽在各地設立育种場，然因售價过高，农民仍用土种，改良种銷路既窄，蚕种之普遍改良遂亦无从实现。至于繭价之統制，則因繭价过低，对于蚕农未能尽救济之責。战乱以还，江浙兩省蚕絲之产銷即进入全面統制之下，对外輸出已不能自由，采运来滬亦屬不易，上海絲厂乃不得不分散各地，就近取料。且因繭价不敌粮价，桑田之改种他物者更多，鮮繭出產逐年减少，如民国29年約为21万担，30年約为16万担，31年約为125,000担。至于华中繅絲业之具备工厂規模者，事变以后仅一日商华中蚕絲股分有限公司，有工厂21所，散处各地，絲車总数6,000余部。其余小型工場虽有350所，而絲車合計13,000部。民国31年底华中蚕絲公司开工之絲車，为无錫3厂，共1,088台，嘉兴一厂，240台；杭州一厂，336台；苏州一厂，248台；合計6厂，共有絲車2,091台，占全車数30%强，迨32年全国商业統制总会成立，对于蚕絲并未列入統制，准予自由營運，而日方亦將軍管理之絲厂全部交还业主，同时，上海金融及蚕絲界巨子，为謀整个蚕絲事业之复兴起見，发起組織中国制絲公司，資本2,000万元，一次收足；專从事于收繭与制絲之工作，在上海、杭州、无錫設制絲厂5所，開車制絲，另一方面，各絲业有关团体及各厂商亦籌备組織中国絲繭业联合会。民国31年及32年江浙兩地之綢厂数及机数如次：

地 区		厂 数	机数(台)	地 区		厂 数	机数(台)
江苏区	上海	160	1,240	浙江区	杭州	72	920
	苏州	40	520		湖州	56	670
	盛澤	60	482		嘉兴	35	418
	合計	260	2,242		合計	253	2,008

又，30年至32年3年来江浙兩省綢厂之生产量如下：

1941年	4,200匹
1942年	700匹
1943年	30,000匹

四、毛紡織業 于民国26年間，上海华商毛織厂仅有章华、安乐、上海、达隆、中国、緯綸、天翔、鴻发、振兴、唯一等9家，其余多系

棉毛交織之駝絨廠，合計38家，資本約425萬元，占全國65%以上。該業工廠多數在租界區內及滬東一帶，所受戰事影響不大，僅章華、中國、裕民稍受損害。戰事之後，該業中最先復工者當推安樂毛紡織廠，繼則章華紡織廠以原址由上海紡織會社營運，另遷廠址復工。租界內駝絨廠如天翔、其昌、振興、華東、達隆、愛國、緯綸、大達、亞洲、天益、旌達、新民、大南、信利、天生、申昌、鴻發等廠，亦均在原址復工。27年下半年，該業以銷路尚暢，小規模駝絨廠仍有陸續設立者，如大來、天成、大安、精益等廠。總計27年底新舊廠共有24家。28年初，舊廠在原址復工者計有上海毛紡、大華、大上海、大光明、達隆、裕民、中國、唯一等廠。新設者則有寅丰、協新、大業、大德、大東、新華、經綸、升昌、大緯、茂霖、景新、華成等廠。故至28年底止，實際開工者大小已達42家。29年又有華綸、德大、潤鼎、丰新、大陸等廠設立，但其間因匯市起伏，波動甚巨，復以各地海口時被封鎖，資力薄弱之小廠，難于支持，被迫停工。至30年，情勢更見惡劣，縱系大規模之工廠，亦多減工，以保存原料逐漸消耗為原則。至于產量方面，27年間各廠雖紛紛復工，惟有大規模之工廠仍有停工者，即使照常開工，亦因環境關係，無由發展，產量亦及戰初40%。28年，工廠數額雖有增加，而消費激增，市價步漲，刺激生產甚巨，但毛織業制品異常複雜，如毛絨綫毛、紗花素、駝絨、西裝呢嗶嘰之類，難于綜合估計。據聞毛絨綫一項，就華商紡織論，每日約出3千磅左右，每月可達10萬磅之譜。備有紡錠者只章華、上海、安樂、寅丰、協興等數廠，且多各以自用，不足之數，再向外廠定制。至匹頭產量，以四季出品各殊，更難估計。大致就整個毛紡織業論，毛冷之產品及駝絨，僅及戰時之半數。匹頭產量雖有新廠增設，但亦僅達戰前產量80%。29、30兩年，生產步減，僅及28年之半數，至于英國及澳洲之來源，因嚴行統制，重以資金凍結，申請進口不易，國內原料，僅恃杭州、吳興等處少數私運來滬，粥少僧多，不敷支配。30年底大東亞戰事發生，上海擁有較多存貨之廠商，如密丰，上海毛紡織廠（按這兩個工廠是英國商人經營的——編者）均被接收管理，況羊毛屬于軍用品，棧存者先後由當局收買，如此，毛

織業之活動力如何，不難想象。

華北毛織廠之數額，並不亞於上海。天津原有102家，但在27年間，已有小廠13家停歇，生產量減去一半，當地對於羊毛屬於軍用品之措施，早付實施，故產量逐年減退。

五、藥品工業 關於新葯業，共計全市入公會新葯業為108家，正式葯廠為數有限，資本總額約在3,000萬元左右。內中以制葯廠之資本較巨，共約1,800餘萬元。新葯業之勃興始於28年春，當時外匯暴縮，兼以歐局風雲日緊，新葯廠商以於上次世界大戰殷鑒不遠，乃紛紛定購大批原料，或預囤多量成葯。此後來源日少，成葯貨價日高，於是集資設廠配裝者紛至沓來，原有各廠相率增資，以謀擴充。新葯業之繁榮達於空前，如許冠群氏主持之新亞葯廠更出其餘力，在香港及西南各地設立分廠，以廣業務。

六、橡膠業 上海橡膠工業在26年時之蓬勃氣象，已恢復至20年時期之盛況。統計當時上海共有大小橡膠廠31家（大中華橡膠廠第一、二、三、四廠作一家計算）資本總額約510餘萬元，占全國90%以上。該業全屬華商經營，除少數資本較厚者外，普通資本均在10萬元以內。該業大多散處滬東、滬西一帶。滬戰爆發後，大多損失奇重，遭炮毀而陷於停頓者竟占多數，估計直接間接之損失當在600萬圓之譜。滬東區之大陸、正大、大康、正泰、華通、華興、大同、大安、益昌、利亞、上海實業，滬南區之大上海、民生、義和、培明，滬西區之四達、及北匯之大生、華商、信大各廠，均受空前之浩劫；倖而保全者僅有大中華總廠、義生、大新榮、南洋等几家，但大中華附設之第一、第二原料廠亦全部被毀。其餘有遷往內地者，如春華廠；有中途受損者，如中國。誼記橡膠廠一再遷移，由上海而武昌，而衡陽而昆明，最後雖然開工，但兩年停頓之損失亦頗可觀。該業之復活時期在27年春季，市面稍定，大中華、義生、永勤等廠徐圖開工，嗣因橡膠銷路日暢，廠數亦逐漸增加，28年下半年，如正泰等12家。日商亦有秋每、處德2家。故橡膠業雖能恢復舊觀，僅表面上之景氣與繁榮，按其實際，難以持久。且此後新創者均係小型工廠，資金單薄，生產微小，不堪

市面之变动。际此战事急轉直下之秋，經濟情狀之动蕩不可捉摸，以至29年初，宣告停工者計有利康、国泰、华通等厂；改組出盤者，亦有多起，其根基之薄弱，暴露无遺。过去膠鞋之产量，全年达3,000万双。27年因一部分工厂被毀，已減至800万双。28年略有增加，但亦仅1,200万双，其余如制造車胎者原有4家，減至2家，产量亦随之下降。惟橡皮另件，因同业制造家数增多，产量亦增，在此一过程中，橡膠业中最感苦痛者，厥为出口手續之阻梗，因橡膠跑鞋車胎一类，均系軍用品，不能自由运出，必須經過当局之核准，方能放行。厂商欲求充分发展，自屬空想。其次，原料之困难亦不亞于前者。迨30年，益見严重，荷屬东印度亦禁止橡膠运滬，以防流入軸心国之手，同时汽油供量日少，該业开工者由16家減至14家。31年局势改觀，該业之活动几全部受上海原料存底之支配，即使有一部分原料运达，亦須由公会斟酌分配。迄至32年底，华商橡膠厂开工者有大中华、正泰等10家；停工或仅半开工者，有义生、利盛、南洋、鼎泰、蔡同兴、交通等20家。至华南方面，本为橡膠业发祥地，但自广州香港兩地經過战事之后，复工者为数尙少。

七、制革業 制革业厂数共有百余家，但其中資本在10万元以上者，祇精益、大华、昌記、詳生、老永森、孙荣記等数家而已。其次資本金不过3—5万元，最小者則仅有数千元至1—2万元，战争期中，厂屋被毀，或生財貨物失窃，損失之巨，实为上海制革业第二次之浩劫。查此次損失較大者，如大华、昌記、源大、福利、精益、老永森、协源昌、金燮記、大上海、越兴、孙荣記、呂金記等厂，估計該业总損失当在100—200万元之間。是年冬季，詳生首先复工，当时滬地以人口麇集，市面日趋繁荣，皮革需要激增，原有各厂于租界內安全帶，重振旧业，新厂亦如雨后春笋，相繼設立。計27年間籌备复工者，有精益、大上海、越兴、老永森、孙荣記、协源昌、嶺南、三友等厂。新厂設立者，計有中南、生利、久兴、合信等四家。27年底新旧厂合計共有14家，其資本在5万以下者，并不列入。迨28年，旧厂复工者，則有金燮記、源姓昌、張銀記、呂財記等厂。新厂在籌备中及开工者則有巩固、中国、日新、

胜利、勤志、福記、六合、同兴公等八家。新旧合計，該业已有27家。此外在滬西一帶复有小皮坊30余厂，已具一部分之势力，是該业大小厂合計，实有60余家之多。迨至29年，小厂复有設立，大小厂合計又增至80余家。30年之情势更大有轉变。制革原料固有問題，而本埠所存之拷膠亦成有行无市之局面，独木何能成林，下半年停工者日增，即四大厂亦在11月中宣告停工。31年，該业皆成閉門坐吃之局。至制革厂之皮产量，每月本有50余万斤，約值50万元，全年可达600万元左右。然27年間，仅达战前40%，而市价已漲20%。嗣以供求不均，貨价續見上升，截至32年夏估計，每月大小厂产量約为25万市斤，約值100万元。不过当时所有以前各大工厂，如能全部开工，則估計紅底皮每月可产378,000市斤，小厂共約6—7万市斤，合計全埠亦有44万市斤之譜。但多数工厂，均以原料缺乏，不能全部开工，产量只在全工五、六折之間。至于制面皮者，共有13家，每月全部开工产量可达23万方尺，实际产量亦仅13—14万方尺，所值每月約27万余元，全年約320万元。故合計31年該业产值总数当在千万元之譜，較战前反形增加。該业所用原料，最多者为牛皮。干牛皮前由华北、湖北等地运滬，嗣因統制关系，改由香港、广东、广西起运，間有南洋群島之轉口貨，鮮皮則由上海宰牛公司供給，但为数寥寥，无济于事。重以上海改觀之后，牛皮屬軍用品，列入严格統制范圍之內，一时自难恢复。

华北方面，天津亦有制革厂多家，据查共有32家。27年即有20家停工，产量减少20%，嗣后逐漸衰退。

八、造纸工业 上海紙厂原有天章、东西、龙章、宝山、江南、大中华、竟成、美錦等十家，資本額共为4,540,000元，占全国机器造纸业資本总额73.5%，年产毛边紙及連史紙約126,528件（每件25令重約600磅），占全国产量84.2%，紙版約13,440噸，占全国产量32%以上。至事变前上海所有紙厂，其資本額在100万元者1家、50万元者5家、40万元者2家、14万元者1家，最少3万元者，亦有1家。厂內設備，須地位寬敞，用水排水較便，故多設于租界四周及边区。事变猝起，除江南、竟成、天章、东西諸厂免于炮火之厄，龙章事变前迁往重庆外，該业受

損最重者，計有森記、宝山、大中华、上海、美錦等厂。在27年間力足以复工者，仅租界內竟成紙版厂1家，余如大中华厂暫由日华制紙株式会社經營，天章、东西兩厂亦由該会社出面复工，江南由日本鐘紡株式会社設法复工。此外战前籌备中者，如勤益厂迁址开工。新厂有金星、光中、中华造紙厂等。至28年，新厂又有美泰、国华等相繼開設。是年秋冬之际，紙价狂漲，原有开工者，获利倍蓰，于是籌各新設者，又乘机崛起。29年中，宣告成立者，計天丰、大陆、寰球、永安、华綸、鴻昌、中和、天生、神洲、中美、亞洲、竟章等10余厂。綜上所述，則27年新旧厂开工者計8家，共9厂，資本額为3,300,000元。28年增至11厂，資本为4,400,000元。29年上半年大小厂几达30余家，实极一时之盛。但据是年年底統計，开工之厂，大小仅25家之譜，資金統計达500万元。至日商經營斯业者，亦不遺余力，除在天津、济南等地設厂制造外，如天章、江南均由日商經營；他如大中华、宝山、上海皆在辟划中。其先后成立者，尙有上海紙器株式会社、岡田紙器业厂、上海紙公司、大同腊紙厂、东华紙器工业等。上海所产紙張，多系粗制品，如毛边紙、連史紙、黃版紙、灰版紙、白紙版、道林紙、牛皮紙、小腊灰報紙、包紗紙、洋燭紙、火柴紙之类。他如卷烟紙，提花紙版之类，則仅嘉兴民丰紙厂，稍有出产。至各厂产量，战前以各厂开足馬力，則毛边，連史等紙合計可出10余万件，黃灰紙版13,000—14,000吨，蜡光紙等7,000—8,000令。事变后各厂被毀，产量銳减，仅黃灰紙版仍有制造，迨后各厂絡續恢复，新厂設立，紙价一再上漲，于是产量漸增。截至32年，連史、毛边、道林等紙每月产量达3,000—4,000件，紙版1,000吨左右。前者产量較諸战前减少，而后者似反为增加。惟原料昂貴，来源缺乏，况紙价上漲尙不及原料之速，因此經營者頗感棘手，实际产量，多寡不一，制紙原料亦視产品之种类而异。洋紙原料，不外破布、廢棉、蘆葦、稻草、破麻袋等物，30年春季以后，紙漿来源由漸减而断絕，甚或全部仰賴日貨进口，紙厂亦告停工歇业。目前开工之紙厂，产量极为有限。其余如嘉兴等处之紙厂，迄未恢复，造紙厂原有2家，事变后仅存1家开工，生产减退60%。

九、面粉工業 全国有面粉厂123家，但上海一地面粉产量占全国42%，不失为全国面粉业之中心。次之为无锡、天津、济南、汉口等处。事变之初，上海之面粉厂計福新系四厂、及申大、中华、华丰、立大等14处。所有面粉厂，多設于滬西一帶，故战事期間仅有2家遭受严重損失，5家較輕。27年，各厂重整旧业。關北之福新第三、第六及裕通，均改为三兴粉厂，改由日本制粉厂及三井、三菱出資經營。福新一厂及祥新尙拟改为三与四、五分厂。申大在29年由日商木德制粉株式会社及东福洋行接收开工，改为东福。新設者有恒丰粉厂。28年，外商新設面粉厂有应昌、强生2家。截至30年为止，上海共有16家，資本共990余万元。小麦来源，原由各厂分別在产麦区采办，事变之后，战区小麦因受統制影响，皆委各地杂粮行代办。所幸初期存儲原料尙充，尙可勉力維持。28年統制小麦，愈形严密，粉厂原料，发生恐慌，不得不向美澳等国定購大批原料。資力不足之粉厂，遂被迫减工。26年，上海面粉产量原有2,000万包，27年减至1,500万包左右，迨29年，已不滿1,000万包。上海面粉銷路，事变前以华北为最大，每月在80万包左右，嗣因华北划为联鈔流通区域，上海与华北間之貿易，改为物資交換制度，因此上海去路有限，且华北面粉市場，为日商所控制，滬上所产，亦須經日商之手，始能运銷。同时29年因日方封鎖租界，禁止小麦运入华商粉厂，受厄至重，被迫停工，粉价高涨。嗣因当局实行平价发卖，福新、阜丰兩家每日供給5,000包至8,000包，故29年至30年之間，除福新、阜丰兩家因維持平价粉而开工外，余厂多已停工。日軍进驻租界之后，福新、阜丰一度停工，租界面粉之供給，勢不得不仰給日厂。当时因生产数量不足，拟利用停工中福新、阜丰、信大、大中华等厂开工，但恐小麦不足，几經商討，仍由福新二厂專制，供給租界方面民食之需。其余日商在华中方面产量当在1,000万包，华南110万包，滿蒙各100万包。至該业所有原料，悉由华中制粉联合会統一收买，然后配給各厂制造。

十、五金業 据民国24年上海工部局之公报，上海租界內之工厂总数为3,421家，工人計37,704人，其中五金工厂占1,275家，計有工

人21,653人。就百分率言，前者占37%强，后者占12%强，仅次于紡織业和烟草业。同时，上海租界外之五金工厂有720家，計工人16,708人。26年淞滬之役，位于租界外之五金工厂，多数被毀于兵燹，租界中之工厂亦都停頓。迨炮火远离，各地难民麇集滬上，消費頓时增加，而五金类在南洋及华北之銷路亦甚良好，五金工业遂見复苏。据專家統計，自民国26年至31年，上海五金工业之生产力指数如左：

上海五金工业生产力指数表

(民国25年=100)

26年·····	99.6	29年·····	153.9
27年·····	56.0	30年·····	125.0
28年·····	112.0	31年·····	30.0

由此可知五金工业之繁荣始于28年，至29年达到最高峰，30年起，又开始衰退；及至31年遂一落千丈。盖自29年12月11日美国宣布禁止鋼鉄出口时起，五金原料来源逐渐减少，而翌年4月海关复公布禁止物品輸出条例，五金类之輸出亦在禁止之列，五金工业活动至此开始迟滞。及至同年12月8日大战爆发，海禁实施，对外貿易完全停頓，五金工业首当其冲，营业一蹶不振，迄今尙无起色。此因原料取得既甚困难，而五金又为統制品之一种，运銷外埠亦甚不易之故。据32年調查，上海現有五金工厂1,030家，內机械厂820，自由車厂30，螺旋釘厂30，打鉄厂590，翻砂厂180，电机厂30，五金用品厂120，印鉄制罐厂30，电鍍拋車厂200，唯規模皆不大。

十一、电器制造业 上海电器制造业可分6大类：(1)电筒电池制造类，产品以电筒、电池、及蓄电器为主。(2)电机制造类，产品以馬达、发电机、变压器及开关等为主。(3)日用电器制造类，如电扇、电爐、电熨斗之类。(4)电料制品类，产品如銅瓷器裝灯、电料、电綫等等。(5)电泡制造类，以电泡、霓虹灯为主。(6)无线电类，專制收音、发音等机。此外，尙有專代修理电器零件者。上海电机厂电器工业之厂数，大致約有200余家。其中制造馬达及发电机一类，約有60家。制造电灯电筒等类約14家。制造日用电扇、电爐等类約有19家。

制造电料制品类約有 70 余家。制造无线电收发机等类約有 20 余家。按战前某机关曾調查該业符合工厂法之規定者仅 43 厂。資本总额只 3,696,564 元。然据 32 年夏調查之結果，該业資本总额大致約在 500 余万元以上。按外商在滬之电机电器工厂，如中国及永备兩家，資本皆为美金 100 万元，华安資本美金 212,000 元，亞洲資本合华币 125 万元，通用之总資本額为 960 万鎊。华商与之相較，誠屬瞠乎其後。华商各厂中，制造电机者，首推华通、华生二厂，玲奋、合丰、亞南等厂次之。制造电筒、电池者，則以汇明为首，中国、振华、三益、正兴等厂次之，資本各 10 万元至 15 万元之間。制造电灯电泡厂，則以亞浦耳、华德兩家为首。制造无线电收音发音机者，則以亞美厂較具規模，資本亦在 10 万元以上。其余資本在 5 万元上下者最为普遍，小者仅有資本数千元。修理及另件等厂更不足道。該业自事变初起至最近为止，变迁經過与各行业相仿，其情形稍异者即电器制造业，除輕便之电器另件等厂易于恢复外，如方棚电机馬达之类不能仓猝复工。何况华成、华生等厂均曾遭受重大損失，中华又已迁移，当时国内最大之主顧为滬宁杭甬铁路局，非破坏即停頓，一时无法开展。所幸 28 年各业状况好轉，海外侨胞向上海各厂定貨者函电紛馳，重以外汇步縮，无形中助使該业趋于有利。于是除旧厂紛紛复工外，新厂設立亦不在少。但至 29 年起，海外鋼鐵五金来源較前困难，制造成本亦昂，滬浙航运中断，上海之工业发展，重趋饱和点。馬达电机均形成逆态之生产过剩，該业亦随之淪于停工减工之漩渦中。至 30 年，形势愈見严重。31 年，当局收买五金征作軍用，更予該业以致命之打击。

十二、搪瓷业 26 年事变之初，上海一隅共有 14 家 20 厂，如益丰直屬有 5 厂，中华直屬有 3 厂，此外华丰、鑄丰、久新、协丰等均系較大之厂商。統計資本总额当时为 130 万元左右，共有爐灶 68 座，每年产量值 800 多万元，占全国产量 90% 以上。自經此次事变，益丰、华丰、中华、鑄丰、益泰、海丰、永兴等厂均受損失，几及該业之資本总额。27 年，各厂陷于停頓状态，除益丰一部分迁往他处开工外，均准备在上海繼續恢复工作。于是各大厂紛紛开工，并有新厂据新 1 家成立。不

意28年各地需要奇殷，各厂出品供不应求，新旧厂增至19家，产值为1,200万元以上。但該业大小厂商資力相去悬殊，互相傾軋之象，在所难免。其中原有五大厂，为維持地位之巩固起見，力謀分工合作之对策，其势力足以左右小厂。小厂方面資力薄弱，基础未固，加以鉄皮琉璃等舶来原料莫不步步高漲，出品成本均高于五大厂。迨29年春夏之交，南洋一帶之势时張时弛，帶有投机性之小厂岌岌可危，31年进口鉄皮受严格統制，价格暴漲，电力因煤斤缺乏，屢受限制，小厂于此重重压迫之下舍停頓外別无他途。大厂亦因原料无以为繼，被迫減工觀望。31年开工之厂商寥若辰星，按其实际，无非为維持少数熟練工友之最低生計而已。出品均屬零星小件，且系利用剩余鉄皮所制，宜其因陋就簡也。六年来之搪瓷业，可謂极尽盛衰变幻之能事。

十三、火柴工業 我国火柴工业全盛时期，厂数达180余家，事变前数年，火柴业已呈衰落之象，倒閉將半。夷考火柴业衰落之原因，不外下列数端：(1)市場狹隘；(2)生产过剩，資金积压；(3)私貨充斥，市价下跌；(4)捐稅增加，成本加重；(5)技术未精，原料外求，糜費过多；(6)管理不善，效率低下；(7)缺乏团结，自相傾軋。我国火柴业为自謀救济，在民国23年以后，即积极籌組中华全国火柴产销联营社，于民国25年方由中日同业合組成立，呈准双方政府当局，办理全国火柴产销事宜，至此，我国垂危之火柴业暫得維持，翌年8月，事变突发，火柴产销联营社事务，无形停頓。

自战事西移，华中一帶市面逐漸恢复，居民亦相率回里，日用消费品需要既增，工商各业无不呈蓬勃之象，火柴工业亦然。中华全国火柴产销联营社，于民国28年呈准繼續办理全国火柴产销事宜。目前統屬于联营社之社員厂，在华中各地开工者計有下列10厂：上海之中华、大华、大明、榮昌、中国，通州之通燧，鎮江之榮昌，苏州之鴻生、中南，杭州之光华。与联营社訂有生产协定者为：上海之美光厂。該厂本屬美商，現在軍管理中。嗣后火柴生产受联营社之統制，营业安定，引人注目。于是又有在上海之瑞士、瑞明、宏記、福新等四厂之設立，但因法外組織，其营业仅限于上海旧租界地区。

以上各厂除新設4厂外，其生产能力月产2万箱，但現在之生产額，仅及其生产能力30%弱，月产約5千余箱。其余新設4厂，因重要原料及材料須向黑市搜集，4厂合計，月产亦不过500箱。

十四、肥皂工業 上海为我国工商会萃之处，故肥皂工厂亦多，事变以还，劫后殘余之肥皂厂为数尙众，現有皂厂，可分中日兩系，日商方面以日本油脂公司受托經營之軍管理中国肥皂公司为最大，該公司原屬英国資本所办，規模之大冠于各厂，所有设备及生产力占上海肥皂制造业生产40%，其他日系制皂工厂計有第一油脂、前田洋行、久华洋行、上海油脂工业等数家。各厂开工率約为平时之七成強，其中中国肥皂公司(英商經營——編者)之出品占六成至七成，其他四厂占三、四成。各厂合計每月可出洗衣皂10万箱，香肥皂12—13万打。华商方面以中国化学工业社(出品有箭刀皂)、五洲大葯房(出品有固本皂)及裕华皂厂(出品有銀星皂)为主，此外尙有小型工厂30余家。华商各厂生产有限，五洲葯房二、三皂厂因原料不繼，业已停工。其他各厂开工率不一致，平均在三、四成間。南京之肥皂厂，事变前为数亦相当可觀。最多时达20余家。事变后殆全部遭受損害。27年冬，复开始募集資金，重建工厂。故于28年有九州、和茂兩厂之新設，其后設厂者日众，迄今总数已达13家。其中9家为肥皂厂，余4厂系制碱厂。惟規模皆不大，資本最多之九州亦仅40,000元，其次同和为35,000元，大同为30,000元，德和、大东为20,000元，其余更少，全体产量每月約2,800余箱，品質亞于固本、祥茂，所有机器均屬旧式，仅一、二工場使用自动式之印型机，其他俱用手工制造。

上海一隅之工业，当不止上述数种，其余如化学工业、卷烟业、印刷业等，均系重要之工业，但其境遇大同小异。当事变最初数年，各业飞皇騰达，自29年下半年起，由盛轉衰。华北方面，因工业原料缺乏，較之上海各业，更遜一籌。

(摘自刘云勳：“工业”，1944年申报年鑒第665—676頁)

4. 1939年河北、山东、山西、河南和江苏北部 五省市華人經營的工厂統計

业 别	工厂数	資本数(元)	工人数
紡織工业	577	15,596,198	25,258
金屬品工业	145	9,167,358	5,442
机械工业	177	1,471,287	3,246
电气工业	21	4,989,345	703
窑业	149	18,814,751	7,588
化学工业	202	32,958,144	4,094
食料品工业	425	19,770,529	5,464
制材及木制品工业	40	1,242,233	937
印刷品工业	97	1,416,209	1,968
杂項工业	170	7,927,192	9,125
合 計	2,003	113,353,246	63,825

說明：(一)資料来源：根据日本兴亚院华北連絡部政务局調查所：“华北工場統計”算出，1941年4月出版。

(二)該統計包括僱佣工人10人以上之工厂，实际上，包括一部分手工作坊在內。資本数系日本統治时当地伪币。

5. 1940年东北華人經營的工厂統計

业 别	工厂数	資本数(元)	常雇工人数	生产額(元)
紡織工业	10,806	46,310,272	174,448	692,776,490
金屬工业	851	10,543,279	11,758	45,337,958
机械工业	723	16,008,269	13,597	41,147,047
窑业	927	9,265,790	28,047	29,730,912
化学工业	1,558	72,529,663	14,131	95,074,222
食料品工业	2,020	97,438,676	20,155	225,853,567
制材及木制品工业	892	12,168,167	11,012	29,995,414
印刷工业	352	5,885,492	6,119	17,830,723
杂項工业	1,863	26,611,343	26,721	93,170,858
合 計	19,992	296,760,951	305,988	1,270,917,191

說明：(一)資料来源根据伪滿洲国經濟部工务司編：“滿洲国工場統計”，1942年出版算出。

(二)該統計系1940年調查，包括使用职工5人以上之工厂，但电气工厂，軍事工厂除外，实际上包括一部分手工作坊在內。資本数系日本統治时期当地伪币。

(三)杂工业中包括皮革、縫紉、火柴、卷烟、紙制品、竹制品、綫香、毛笔等。

6. 台灣工業統計

历年台灣工業發展趨勢統計①

年次	工業公司資本額(千元)	工廠數	工人數	工業生產額(千元)	糖生產額(千元)	工業生產額中糖業所占之比例%	工業生產額指數
1902	不詳	不詳	不詳	12,064	不詳	不詳	100
1910	不詳	不詳	不詳	52,816	39,119	74.1	438
1914	59,648	1,309	21,859	45,738	35,992	68.3	379
1916	65,127	1,371	24,046	89,376	99,273	79.5	741
1917	73,327	1,493	28,227	123,923	134,187	80.4	1,027
1918	91,481	2,244	40,005	111,804	99,417	68.4	927
1919	128,855	2,424	40,727	129,851	152,148	71.5	1,076
1920	205,749	2,695	48,460	189,336	155,116	72.5	1,569
1921	209,176	2,841	45,043	130,984	84,419	64.4	1,086
1922	210,952	2,791	40,525	133,930	83,311	62.2	1,110
1923	209,588	3,027	41,247	161,992	101,468	65.1	1,343
1924	214,275	3,462	43,633	191,783	126,315	65.9	1,590
1925	214,685	3,983	48,464	193,799	117,401	60.6	1,606
1926	211,244	4,458	52,341	155,803	108,659	58.5	1,540
1927	227,889	4,757	53,749	171,901	94,312	54.9	1,425
1928	209,083	5,182	58,779	210,953	119,903	56.8	1,749
1929	202,513	5,870	62,877	246,751	150,878	61.1	2,045
1930	190,478	6,128	58,330	232,055	152,568	66.2	1,924
1931	190,240	6,094	57,780	132,567	120,720	62.7	1,596
1932	188,575	6,292	60,089	212,603	143,194	67.4	1,762
1933	198,508	6,613	64,743	209,609	126,597	60.4	1,738
1934	200,308	6,776	66,559	215,639	119,725	55.5	1,788
1935	200,192	7,032	67,255	269,494	164,068	60.9	2,334
1936	268,040	7,881	81,589	310,000	171,675	55.3	2,570

原文注：(一)公司資本額包括股分、無限、兩合等三種公司之實收資本及出資額。

(二)工廠數及工人數系就裝有動力設備，或常時使用5人以上之工人之工廠調查所得者。

(三)工業生產額系根據“台灣農業年報”(1937年版)所載，不僅為本表記載之工廠之生產額而已。

(四)糖生產價額1921年以後根據“台灣商工統計”(1935年版)，1921年以前根據1926年出版之“台灣商工統計”，兩者調查方法互異，故此兩時期之糖生產價額，不能精確比較。

本表摘自潘志奇：“台灣之社會經濟”，台灣銀行季刊創刊號第37頁，1947年六月出版

① 本表格包括中國人和日本人經營之工廠在內。(編者)

1942及1946年台灣工人數統計 本省之勞工分布，以往历年均有調查，但自民國33年以后，因轟炸关系，統計数字极不完全。据民國31年（本省工业高度膨脹时期）調查，全省各业員工共計235,095人。所謂勞工福利，实一无所有。工人工資既受严格統制，工会团体更无組織之自由。日人与省胞之工資，亦有軒輊，約成3与2之比。至战事結束时，省内工厂員工人数已大为减少。

台灣省之工厂員工統計

	1942年員工數	現有員工數		
		合計	職員	常雇工人
總計	235,095	236,817	37,813	199,084
工厂 {	工礦处主管	134,295	18,902	115,393
	农林处主管	177,497	8,183	8,183
	專賣局主管		7,094	1,399
	医药工厂		617	119
鐵路	20,564	15,425	7,486	7,939
郵電	4,659	7,086	3,759	3,317
鹽場	—	1,019	753	266
土木建筑	29,331	60,180	5,355	54,825
碼頭	3,044	2,948	—	2,948

本省光复之初，米价波动甚烈，工人工資所得，不能維持生活，各地咸生勞資爭端，尤以去年（指1946—編者）二三月間为最甚。

（摘自国民党善后救济总署台灣分署經濟技正室編：“台灣省經濟調查報告”1947年出版）

台灣企業中的日本資本和我國民族資本比較 台灣的人口，日人仅占5%，而中国人却占95%。为审慎估定这两种人在工矿业中的地位，我們必須知道工資水准，工作情形以及所有关于誰是企业家誰是雇員的一切重要問題，可惜的是有些問題不能解答，因为材料的缺乏。

关于台灣各公司的資本所屬國人之最近所得的報告是1929年的。

	日 本	中 国	其 他	合 計
农 业	4,434	4,962	4	9,399
工 业	180,497	17,786	1,658	198,941
商 业	23,128	28,082	2,033	53,242
交 通	3,186	2,571	25	5,781
漁 业	2,258	1,190	20	3,467
矿 业	12,243	3,441	1,422	17,107
总 計	225,745	57,033	5,161	287,939

(以千元为單位,其他項內所指泰半系来自中国内地之中华民国国民)

日本人在工业上占 90.7%，在矿业占 71.6%，而中国人则为 8.5% 与 20%。这些数字固然不包括个人独自经营企业者（大多数是中国人）在内，但纵使把他们列入去，也不会使情形如何改变，因为这些企业的平均资本是极小的。在另一方面，这个表又不包括政府的企业在内。这些企业实际上可视为日本人的企业，因为主持的重要职员是日本人，其所获利润随时可以移回日本。这些政府企业的资本极大，如上表所见，1921年各公司的资本额为 288,000 千元，而同年国营铁路一项的资本即已达 122,000 千元。除铁路外，政府还有许多各种各样的企业。自 1929 年以来，情势的演变对于中国人愈形不利，新的大公司设立了，旧的公司也将资本增加了。新的公司全是日本人设立的，例如 1929 年在渔业方面日本公司的资本是 2,258 千元，1939 年两家在日本本土设有办事处的公司在台湾经营渔业，其资本额达 65,500 千元。当然这些资本只有一部分放在他们台湾的企业上，但 1929 年各种企业的情形比较 1939 年对中国人更不利，则至明显。

在矿业方面，情形亦正相同。1929 年全部资本才是 17,100 千元，到 1939 年便增至 46,600 千元，这种增加系由于台湾工业，基隆炭矿等公司的活动所致。工业方面有同样的扩充，所有大规模的新企业都归在台湾人口中占 5% 的日人所有，其资本额占总额 95%。在矿业上日人的资本也占总额 90% 以上。如果我们考虑到一项事实，即日本人的企业都是现代化的，而中国人的企业都是规模甚小，设备原始

的，則更可明了日本企业在生产上所具的势力，比各企业比較上所能表示的还要雄厚。还有，台湾各公司的股分并不是自由买卖的，它們都是一些專利的組織，其股分握在日本大公司的手中并不在市場公开出售。

(ANDREW J. GRAJDANZEY: “台湾的經濟生活”
第44-46頁, 1947年大公报出版)

7. 殖民地化下的香港民族工業

(一) 香港——工业上的孤兒

一向被夸称为“东方之珠”的香港，如果从近年来工业上的生产与銷途来看，这颗“珠”，实在已經黯然无光了。在第10届华資工展会开幕的前夕，香港英政府駐英倫代表祈連活回港述职，由工商处副处长晏嘉士，貿易促进官蒙哥馬利陪同，在机場上发表談話，曾乐观地說：“香港厂商出品堪称質料式样第一，英倫以及欧洲国家均极其欢迎。”但跟着又囁嚅气餒地說：“本年度英国进口之香港貨总額較前略減，其原因为英全国本年度人口減低，此項事实必需認清”。香港工业制品是不是已經达到世界第一流，而为各国所“欢迎”，这是另外一个問題，厂商們所注意的銷路方面，却实际上是減弱了。因此，在这官式的“勉勵”与“乐观”之余，一个厂商感慨地对新聞記者說：香港的工业实在是一个无依无靠的孤兒。

如所周知，香港在历史上、地理上都是連屬於中国大陆，但在很長时期內却被人为地和大陆割裂开来。尽管中国大陆有着富饒充足、用之不尽的資源，有着广大无穷、購買力蒸蒸日上的市場，但香港的市場都享受不到。而另外一方面，香港本身就是一个殖民地，在資本主义世界里，它是强者剩余商品傾銷的尾閘，根本談不到发展工业，即使有所謂工业，也不过是手工业与輕工业——从生产设备直至原料，都要取給于外国，而生产品又要远远地向海外寻求市場。在資本主义世界經濟危机日益深重的今天，首先遭遇到困难与打击的，必然是这种殖民地式的工业。以香港資本最雄厚最有規模的紡織工业

而言，一向依賴美棉，在朝鮮戰爭初期風靡一時囤購原料，物價飛漲，美棉輸出定額配售的名單中，竟然沒有香港的分兒，以至原料恐慌，迫得以高價購入質地較差的巴基斯坦的棉花；1951年下半年至1952年，物價回跌，銷場呆滯，港製棉紗不特外銷找不到出路，而且連本港市場也被外紗所侵入奪奪。這就是說，戰爭“景氣”，有生意，有訂單，却缺乏原料；而當世界不景氣時，却受着雙重的打擊，苦頭最大。作為一個殖民地的香港，其工業之成為無依無靠的“孤兒”，不是偶然的現象，而是必然的結果。

從1952年香港英政府勞工處每月公布的工廠倒閉統計數字，我們很清楚的看出香港的工業，不特是一個“孤兒”，而且是一個先天不足、後天失調的孤兒。

月	分	倒閉數目(家)	月	分	倒閉數目(家)	月	分	倒閉數目(家)
1月	15	5月	17	9月	13
2月	9	6月	14	10月	12
3月	18	7月	14	11月	9
4月	11	8月	15	合計	147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數字僅僅是官方統計的數字，實際上有許多沒有登記的小工廠，是在無聲無息之中倒閉下來的，而且，應該指出，即使是勉強把生產繼續維持下去的工廠，絕大部分都是大量的裁人，象鈕扣業、織造業及玻璃業，工人失業人數均超過50%，是說，除了倒閉百多家工廠外，其餘也是半停工或部分停工，工業雕敝情況已達到極嚴重的地步。

(二)日益狹隘的銷場

香港工業製品除了极少数在本地銷售外，主要的銷場是靠海外，特別是南洋各地。然而，隨着“戰爭景氣”的曇花一現之後，1952年帶給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是：淡風、跌風、倒風——嚴重的全面的經濟危機。面對着這個危機的暴風雨，香港工業製品銷場是日益狹隘的。形成港製工業品的市場狹隘的直接因素，主要是：

(1) 在战争政策所造成的共通的經濟危机影响下，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購買力是全面的降落，而作为香港工业制品主要銷場的东南亞地区，其購買力的削弱更是特別严重。东南亞地区大部分都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在經濟危机日益深重的今天，宗主国的壟断資本必然尽力設法把危机嫁到这些所謂“落后地区”身上，因此，在资本主义世界不景气中，东南亞地区的困难是加倍的严重的。

(2) 因为追隨美国的反动的“禁运”政策，使各资本主义国家自食其惡果，貿易萎縮，首先大吃其亏的正是生产原料的国家。在美国的停購、压价的壟断采購政策下，整个南洋群島輸出的主要特产如树膠、錫椰油等，找不到出路，价格狂跌，例如馬來亞的树膠，就跌落了一半有多，社会經濟陷入极度蕭条，人民購買力急降。例如在“禁运”前，印尼树膠工人每年收入在 2,000 多盾，“禁运”之后，收入降至 1,200 盾；因为銷途萎縮，生产减少而失业的工人，則連这輕微的收入也沒有。在这种情况下，香港工业冀望海外的訂單，就憂乎其难了。

(3) 在貿易萎縮、輸出减少的危机面前，各国为了弥补美元缺乏，减少龐大的貿易逆差額，必然要从限制輸入，加强外汇管制，树立关税壁垒来着手。直接地限制了香港工业制品的銷路。

(4) 日貨的傾銷竞争，日趋严重。例如巴基斯坦过去是港紗外銷的主要市場，月銷达 1 万余包，但自与日本簽訂易貨协定，以棉花換取日本的棉紗及棉織品后，1952 年港紗銷巴基斯坦，平均每月仅 2,000 包左右；暹罗的紗布市場，也是在日本“鐘紡”、“第一紡織”等 16 織造厂联营機構的控制之下；日本航运的恢复，更使日貨傾銷变本加厉，以去年 6 月至 9 月香港与日本搪瓷品运費率来比較，高低相差之巨，令人吃惊；日本至印尼的鹹脚，最低者每吨仅收取 24 先令，合港币 19.2 元；香港至印尼的鹹脚，每吨为 110 元，8 折收实，仍达 88 元之巨。在日貨的殘酷打击下，港制工业品不特海外市場被搶夺，甚至本地市場也大受影响，例如 12 磅的机布，受日本 2,023 的低价竞争，由每匹 70 元左右直瀉至 40 元，而香港厂方的成本价則达 45 元。

在这种种的打击与挫折之下，究竟香港工业制品外銷萎縮到什么程度呢？根据香港英政府官方的統計，1952年香港工业制品每月外銷情况如下：

月 分	数 值(單位港元)	月 分	数 值(單位港元)
1951年全年合計	311,717,595	7月	18,118,521
1951年每月平均	25,976,466	8月	15,518,122
1951年 1月	22,225,780	9月	15,167,820
2月	24,187,258	10月	14,515,489
3月	18,468,760	11月	15,671,458
4月	17,176,562	合計	210,522,729
5月	17,749,227	1952年每月平均	19,138,429
6月	21,723,632		

从上表簡單的数字可以看出：一、旺月不旺，淡月更淡；二、全年走势皆向下坡；三、如以平均每月輸出数值而言，1952年比1951年每月减少了 6,838,037元，如引申全部，則减少数额达8,200多万元，这个数额不能不算龐大，尤其是如果拿来和去年輸出数额比較，則減縮数额达1/3弱，那更为惊人了。

(三)美國“放寬禁运”的破產

在論述1952年香港的工业問題时，有些“評論家”們曾再三渲染美国“放寬禁运”，讓大量的物資供应香港，解决香港厂家的原料不足的苦悶問題；而且，对于港制工业品的輸英，也放寬了尺度，容許輸入，一小部分不明真相的厂商，在苦悶或絕望之余，对美国寄以一种近乎幻想的冀望，以寻求自己的“出路”。

如所周知，朝鮮战争所形成的虛假購買力，到1952年已經成为强弩之末，不特如此，而且在虛假購買力消失之后，囤購物資四吐，造成市場的压力，許多当年搶手的貨品，已逐漸成为滯銷貨品了，例如美棉，在1951年初香港紡織工业渴求棉花时，美棉始終不准輸出，而在定額配售的名單中，也特別把香港剔出来。可是，去年美棉生产过

剩，找不到出路，自由市場較官价为低，美国国内棉花价格，要靠政府收購来維持。美政府一方面劝告棉农减产，一方面通过“美援”方式大量輸出，同时，美棉也开始“放寬禁运”，准許輸来香港了，这就是事实的真相。可是，香港棉花价格扳升至每磅5元，美棉的影子都看不见，待全世界棉花价格回落到每磅2元多左右，美棉产大量放盤了。試想这种自私自利的貿易政策，对香港的工业发展会有利嗎？当然不会。而且，还应该指出，香港的公价美汇不易获得，如以自由市价美汇訂購，每磅美棉CIF：香港要2.4元，而巴基斯坦NT棉花每磅CIF只約2.2元左右。試想这样的“放寬禁运”又对香港工业何利之有？

不特棉花是这样，所有英国要“放寬”輸港的貨物，都是香港已解决了供应問題后才“放寬”的。例如鉄皮，在英国鉄皮源源来港之后，美国鉄皮便也跟着大量向香港厂商放盤了。

有些人認為：無論如何，美国还是香港工业制品的主要銷場之一，在每月二千万元的工业制品輸出总值中，美国是經常占了数百万元的。对于這個問題，我們还是利用香港政府官方統計数字来証明。战后多年来，港制工业品輸出，美国是曾居首位的，但至1952年，已經跌至第二、三位了，而且，这种跌势还在持續中。

1952年香港工业制品輸美統計

月 分	数 值(港元)	月 分	数 值(港元)
1月	4,931,410	7月	3,757,698
2月	4,550,096	8月	2,829,790
3月	5,612,041	9月	2,716,390
4月	5,525,211	10月	2,857,475
5月	4,085,792	11月	2,408,146
6月	3,999,771		

以1月分与11月分比較，減縮已超过50%。維持現狀尚惶不暇，又怎能期望港制工业品輸往美国会有增加呢？而且，事实上香港每月輸美的工业制品，几全部为半制品及加工品，在美国政府实施“定

量輸入”制度下，加工品輸美殊非易事，單就最近公布的凭“綜合来源証”輸往美国的办法，每一类获准輸美的加工制品，从产家买入原料之日起，至出口商將貨物付运出口之日止，一直就都要聘請香港英政府公務員从事監督，而聘請这些公務員的費用，又全都是要由产家及出口商負擔的，举例來說，聘請一个稅务帮办監工一个月（每天工作以8小时計），商人就要送給他2,000元。在今天工业生产困难，2,000元并不是一个小数目，特别是香港的加工品制造厂，一般都是規模极小，每月能否賺到2,000元，还成問題呢！

（四）特惠稅與大英帝國的“照顧”

在大英帝国殖民地的香港办工厂的一部分厂家，也曾寄希望于英国的保护政策，使四面楚歌的香港工业，获得一綫生机。英国官方所时时提及的特惠稅，就是目前唯一的名义上对香港工业制品有保护作用的政策。可是，实际上，能够获得这种保护的香港工厂的确少之又少；而且，今天香港工业制品外銷最大的障碍还是东南亞人民購買力的衰弱和日貨傾銷。特别是在美国大力扶助下的日本工业，早就已冲破英磅区的壁壘，席卷整个东南亞，連英帝国本身主要的輕工业紡織品，也大受日本紡織品的打击，更遑論工业制品？

最使香港工业厂家感叹的是，許多英磅集团区域已經不客气地对香港工业制品輸入量漸少，甚至停止。例如巴基斯坦輸入香港紗，1952年仅及1951年数量的1/10，印度对于风灯就停止了輸入。香港駐英代表祈連活先生在倫敦活动了几个月后回来，帶給香港厂家的消息，是一番官式勉励和英国要削減香港工业制品入口量，这是多么令人尷尬的事情。

抛开英国是否照顧香港的工业这点不談，就是今天整个英国的經濟情况也是在风雨飄搖之中，英磅时时謠傳贬值，全英人民都勒紧肚皮实行“飢餓輸出”，又有何余力照顧到这海外小島？美国的“禁运政策”沒有損害中国和苏新国家，却打击了香港，对于香港这种不公平的悲慘的遭遇，英国官方和一般輿論也曾大抱不平，可是，事实上

英国也在大吃“禁运”之亏，“泥菩薩过海自身难保”，这又有什么办法呢？因此也难怪1953年6月英女皇加冕，香港赶制一些紀念品应市推銷，也被一些人大吹大擂，粉飾一番，說是好机会呢！

(五)停工、減產與掙扎

回顧一年來香港的工業，真是困難重重，荊棘滿途。倒閉、停工、減產，凡成為香港工業界的普遍現象。僅就報紙上刊載的比較突出的，也已經够令人觸目驚心了。

棉紡工業——作為香港工業最具規模的棉紡工業，雖然還沒有發生倒閉的現象，但卻全面減產，統計港九共13家紗廠，1951年底開工紗錠共有20萬零2千枚；至1953年3月已減縮至189,000枚。同時，在訂單少、去途弱之下，紗廠的存積棉紗常達15,000包以上，由於資金周轉不靈，紗廠向香港幾家大外商銀行透支或抵押借款，竟逾億元之多，其中5家紗廠因為負債太大，實際上已受了這些銀行方面的控制了。

織布工業——1952年度內，大的織布工廠倒閉或全部停工的有20家之多，直至年底止計算，開工布廠僅得50家左右，較年初減少了20%強，而開工的也不過是半停工狀態。

樹膠工業——港九大小樹膠工廠過去有80多家，現在僅存32家，年來各廠的產銷，都較1951年同期減少了五、六成，有的僅得三成左右。先後公開宣布停工的工廠就有8家，輪工制的有1家。據統計：失業和半失業的樹膠工人，占全行人數80%以上，這是多么慘淡的景象！

塑膠工業——在原料漲價與缺乏、及日美制品打擊下，塑膠產量平均減少40%，塑膠制品售價約降了30%。該業在最盛時期，有化學加工塑膠廠4家，物理加工塑膠廠約50家，直至8月時為止，剩下物理加工的塑膠廠14家，化學加工的塑膠廠1家而已。

搪瓷工業——全港搪瓷的工業，受日貨廉價傾銷的打擊最大，為了和日貨競爭，大廠的售價，1952年比1951年減低至六五折左右，小

規模廠家且有低至五折者。開工爐灶自去年初之43個至6月時已減至38個左右了。

五金工業——風燈工業生產萎縮得最慘，由於香港風燈最大銷場印度拒絕香港品燈入口，香港五家製風燈的工廠（中美、捷和、光宇、榮東、興華）均先後將製風燈部分完全停工，但風燈的存貨，還有10萬支之巨。汽燈生產情況也不見得好，產量僅及“禁運”前的一半。

電筒工廠也愈來愈慘淡，大小三、四十家電筒廠，過半停工減產或改制別貨，最大的兩家電筒廠，每周開工日期，一家減為3天，另一家減為4天。

其餘的五金工業，如表帶減產了30%；鐵釘，去年產量只及前年1/3，如與1950年的產量比較，僅得1/10。

其他工業——肥皂工業每月外銷貨值不及1950年以前1/10；綫轆生產，在日、意貨低價競爭之下，全行每月生產約為1,800噸，僅及前年生產額六成；制漆油工業，因為半數銷量是依靠本地市場，所以營業情況較為平穩，但與往年比較，以現有6家制漆工廠而言也減縮15%至18%。

在淡風籠罩下的香港工業，是在奮力地掙扎，然而，除了停工減產、苟延殘喘之外，一年來香港工業界人士的努力的結果，是相當令人失望的。工業界曾積極地要求英政府的協助與保護，然而正如上文所指出，得回的是一番冠冕堂皇、于事無補的慰勉之詞；有些廠家也曾努力改善生產，提高品質，減低成本，甚至採用聯營方式來向海外推銷，然而在美、日貨品的傾銷面前，這種競爭顯然是軟弱無力；何況各國的限制入口政策，決不是普通廠家所能為力的。於是有些人想到南遷，想到婆羅州，想到南洋各地，但是，不景氣已經籠罩了整個資本主義世界，何處是樂土？這種打算，不特渺茫，抑且冒險，結果還不是談談而已。

那末，香港工業的困難，是不是沒有辦法解決？我們認為：在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日益深刻嚴重的大前提之下，一切舍本逐末的辦法，都是枉然的。但回顧3年來新中國偉大的成就，大建設開始

了,人民生活改善了,一幅工业化的美丽远景已经摆在我們面前。因此,面向大陆,面向祖国,是香港工业唯一的出路。有人說:这是“老生常談”。是的,因为这是不易的定論。許多有远見的爱国的厂家,由港內迁后的蓬勃发展情况,正是榜徨在歧途上的香港厂商的一个光明的启示。

(葆真:“論香港工业困难的贖結”香港經濟專號
社編,1953年經濟年報100—102頁)

抗日戰爭期中國國民黨統治區 民族工業的危機

一 危機之表面化

據32年9月號金融知識載姚曾廢物價生產與流動資金文中稱：“自30年上半年起，後方工礦業的發展進入了一個嚴重的階段”。假如我們用“危機四伏”一語來形容他，並不為過。抗戰最初二、三年間產業蓬勃一時的发展機會已經過去了，繼之而起的現象是新設工廠數目的減少和舊有各廠的出頂及合併。其能勉強支持、努力掙扎的，也大都縮減再生產的規模，甚至實行所謂“以商養工”“以商代工”的辦法。

據秦柳方氏稱：“重慶的工廠本有871單位，目前停工減產者達270余廠”（32年11月中國工業第21期對於戰後工業建設綱領的意見）。衡陽的情況，據32年11月20日經濟新聞週報稱：“若干中小工廠已有無法維持而告停業者。據熟悉衡市工業界人士談，至今年年底恐有2/3以上之工廠，宣告結束。按衡市在經濟部登記之工廠共有76家，在西南居第二位”。桂林的情況，桂林大公報記者曾訪問各民營工廠，“據他們（各廠負責人）說，目前各工廠的情形，最多再維持半年或一年，一年以後，北極路上，不會再看見工廠煙囪冒煙了。几架待價而沽的機器，據他說，再過幾個月，他們只有打碎了機器，使它變成了廢鐵後出賣，其他是絕對沒有辦法的”（33年2月10日該報）。

以下是幾個主要產業部門的危機情況：

鋼鐵業 32年12月24日商務日報載，重慶鋼鐵業加入公會的22家中“煉鐵廠18家，冶鋼廠4家，煉鐵廠停爐者14家，4家勉強維持，冶鋼已有1家完全停頓，其餘3家勉強開爐，但產量則減至微乎其微。致

成本加重，陷于半停顿状态”。钢铁业因滞销停产呼吁救济之声，遍于各报。

机器业 32年11月25日时事新报载，倒闭之工厂有：建筑机器厂、广和机器厂、永胜翻砂厂、上海广利铁工厂、宝泰机器厂、王鸿昌翻砂厂、黄运兴翻砂厂、华兴铁工厂、黄永兴铁工厂等10余厂，非迁川工厂会员厂倒闭者尚不在内。今年1月号中国工业载薛明剑氏(国民参政员、迁川工厂联合会理事、允利实业公司负责人)一文称：重庆市民营机器厂共366家，“本年(32年)2、3月间各区工厂已渐有停工歇业者，至6月底止，调查确实倒闭者已达42家。6月以后，险象更著，因工作缺乏，周转困难而频相停工者日甚一日。以沙磁区而论，该区64家工厂中已有12家停业，约占全区20%。再江北区工厂33家中，宣告倒闭者15家，停顿者2家，合计占该区工厂50%。估计目前全体工厂，正式与非正式停工者，总数已在50%左右”。今年5月18日商务日报载：“最近机器工业凋落依然。4月份5月份两月内停工歇业者已达十余家，规模较大的重庆五金厂及××机器厂已告歇业，小龙坎一带停歇工厂亦在四家以上”。

衡阳的机器业，据32年11月29日大公报称：“仍在停滞中，出品量日益减弱，90余家机械厂停工者已达20余家，目前又有胜昌等无法支持，已告关门，尤以印刷机制造，一落千丈”。在云南，据王振芳氏谈：“最困难者，则为民营机器厂，如政府再不能有实际之援助，则此等工厂，数年来惨淡经营，恐维持不能多久矣。……至铁则积存数千吨，尚待顾主，言之不胜感慨！”(见32年10月31日西南实业通讯载王振芳氏在九十次“星五聚餐会”上講演)。

采矿业 煤矿业的衰落，据32年11月10日商务日报载第二次工业问题座谈会上余名钰氏(迁川工厂联合会常务理事，渝鑫钢铁厂总经理)称：“现在煤业因钢铁之减产，亦已大受影响，如本公司亦有煤矿，在重九节后仅留工人14%，但所产煤已足供本钢铁厂之用”。28日该报载：“煤矿业最大困难，则为储存原料用尽，煤价太低，……现后方各小煤矿已停业者达50%云”。12月23日该报又载：“嘉陵江区

煤矿业各矿今冬产矿量，共为75,900吨，较上年同期最高产量84,200吨，减产8,300吨，约少产9.85%。同义、新新、大同、吉利、协兴等44家，因亏折关系，已告停产，19家亦在减产”。同日该报在经济短评中称，此次“减产和停产的煤矿家数竟达77%以上”。该区煤矿业代表在今年2月18日国民党中央党部中央工商运动委员会召开的工商座谈会上称：“去年12月底已停工的厂矿有44家。今年春节后，续停小厂100余家，现在继续开工的仅15家”（33年2月19日商务日报）。该区至本年2月止，已共亏折1亿5千万元以上（33年4月1日经济新闻周报）。“单以鹽井溪一区而论，60余家就停了40多家，正在打算关门的还不止此数”（33年5月5日新华日报）。该区“上月已减产一万余吨，现天府等大煤矿已在陆续裁员减工”（33年5月6日新民报）。

广西本为矿业很发达之区，据去年3月间该省第一行政区督察专员李新俊氏抵桂时称：“八步本为本省矿业中心，近年因政府法定收锡价格太低，矿山矿工无法维持营业，现全区厂矿80%已关门，数万矿工无工可做”（32年8月新工商第二期千家驹：论发展工业生产）。今年2月25日桂林扫荡报载：广西“全省原有大小矿区800余处，但陆续倒闭，现仅存100余处，大规模机器开采之矿公司原有30余家，又硫磺矿全省原有公司20余家现则纷纷倒闭，无一幸存者”。4月28日广西日报载周哲平桂东之工矿业一文中，叙述该省贺富钟区的八步水岩坝矿业中心之衰落，说该地民国27年有矿厂30余家，马力逾万，繁荣热闹有“小南洋”之称，“但自民国28年以后，已门庭冷落，繁荣场所，化为幽墟，昔日曾发出巨大力量以转动矿机之锅炉，现尚有好几个被弃置而静卧于道旁。据云大部矿机多作废铁变卖矣（因为作机器出售，手续多而反不若废铁之方便易售也）”。该区电力厂规模颇大，现因矿公司大部倒闭仅开一架电机，煤矿已大量减产。4月30日桂林扫荡报载，广西省府发表该省本年矿业情况称：“民营矿业，年来衰落特甚，最近调查，锡矿公司已全部倒闭，铅矿仅有少数人开采”，其余锡、铜、金等矿“率皆勉强开业，艰苦支持”。

全国闻名的云南箇州锡矿，衰落得尤其凄惨。据1月4日至6日

商务日报的范式之感概过箇旧文中称：“往昔在城东煉錫的大爐，共達40左右，今天則能維持開爐，照常煉錫的不到10個；往昔礦工人數已達10余萬，今天僅5,000余；民國27年，計年產錫10,731噸，至今年上半年，1月至6月則共僅800噸。……記者費時3月，親赴老陰老陽諸山，……只見礦礮倒塌，溜口（洗煉礦沙用的）淤塞，廠區伙房，十九拆卸，頹垣斷壁，觸目皆是。昔日各礮有多至4,000—5,000人者，今則僅剩10余人至100人不等，借以修補礮中穴道，免其中墮，致十百年辛勤開采所耗，有達千百萬之資本，拋于一旦。至于草皮尖和沖荒尖，則几全部荒蕪，荒蕪于地，無人顧問，而頹敗淒涼景氣，几疑置身于今之戰場，誰也意想不到這竟是世界第三產錫地，全國第一產錫區也。……目前箇巨大錫生產，已臨總崩潰前夕，各私家廠商，95%已宣告破產或停業。……如政府不迅為救濟，……則至明年今日，箇勢將成為‘無錫’之地”。

湘潭之膏鹽礦據32年8月新工商第二期載吳伯卿湘潭之膏鹽業文中稱，該礦因收價太低，致“只有限制產量之一途，以致前年產量在20萬担以上，但去年1月至11月間，統計尚不足6萬担。目前各礦商均以折本太多，不堪維持，相率停頓，現存開采者，不過5—6家而已，長此以往，膏鹽之前途誠有不堪設想者矣”！

紡織業 去年7月新工商第一期載周宪文論新工商文中稱：現在大后方“以紗錠而論，被奔置的數量就與開工生產者相等”。32年11月28日商務日報載，紡織業“目前主要困難厥為原料缺乏，生產成本不敷，加以資金周轉日絀，工人伙食上漲不已，有若干廠家再三向政府要求，願無條件讓歸國營，某紡織家曾有如下之慘痛語：“請求救濟之呈文不知上過多少，紡織業困難之文章寫了不知几百篇，但結果困難還是困難，政府若再不設法救濟，則大家只好在明年停工”。據32年12月4日商務日報載，重慶最大紗廠紗錠織機數量均在銳減，“根據去年各紗廠招待本市新聞界報告，各廠錠數變動如下表：

厂名	原有紗錠	一年前紗錠	原有布机	現有布机
裕华	43,000枚	35,000枚	500架	100架
豫丰	56,400枚	40,000枚	240架	100架
申新	5,000枚	3,000枚	100架	70架

不过到现在，各厂紗錠已减少很多，有2万枚紗錠能经常开动的厂家，只有裕华和豫丰兩家了”。該文称，重庆各紗厂生产力，“每月平均可产紗4千余件，唯目前，只产紗3千余件”。今年1月号中国工业載張錫昌氏如何挽救工业生产文中称，重庆“小規模的紡紗厂都感到无法再生产，織布厂的生产也在减少，例如北碚的大明紗厂近几个月来，生产大减，原来每月可产布7千匹，現在减少了40%，工人减少了1/3，开工的織布机，仅及原数的1/2”。3月4日新华日报載重庆紡織土布、毛巾、針織各业大小工厂該月份起大都全部歇业，失业工人4万。

昆明紡織业，据32年11月号中国工业載，陶大鏞限价声中的工业文称：“原有織厂30余所，一年以来竟倒閉了20余家”。今年4月15日昆明中央日报称：“第五区(云南区)紡織工业公会會員200余家，拥有織机9千余架，惟自去年3月以来，迄未領获配紗。除一部分尙勉力撑扎外，余多陷于停頓”。今年5月7日华西日报載，毀道斯景气低沉的工业圈文中称：“有名的振昆紡織厂，竟至有1/3的机器在瞌睡。据云南日报的报导，該厂生产最高額每月曾达到2千多匹，現在則降低到500匹，困难的情形，似乎还在增加”。至于桂林，据32年11月号中国工业称，都“以原料来源受阻，商品成本加重不易支持”。

酒精業 重庆去年情况是“共有37單位……今年停工者有3單位，停而再开者有2單位，时停时开者1單位，此外有出卖牌照者，亦有放弃牌照而出讓者，总計此类厂家，当在1/3以上”(11月27日秦风日报工商日报联合版)。今年情况更是每况愈下，3月10日新华日报載，第一区酒精工业同业公会理事長楊公庶招待記者談称，去年年終卖厂的有1/3，今年物价漲而酒精价不許漲，以致“現时同业各厂无论

有沒有資力，都已無法維持，決定在月底先後停工，等原料市場變化”。

昆明原有酒精廠40家，現僅存10家(32年9月1日經濟新聞周刊)。雲南全省極盛時有150—160家，現只剩10余家了(32年11月16日新華日報)。韶關酒精業因不堪賠累，紛紛停業，連省營的酒精廠都無法維持(33年4月14日新華日報)。貴州的也因原料困難紛紛停業(33年5月13日經濟新聞周刊)。西北的咸陽酒精廠以原料及利潤關係，停工幾達8個月(32年10月16日經濟新聞周刊)。成都中國酒精廠每月可出3萬加侖，現僅出1萬加侖(33年1月號中國工業載孫克鴻：成都工廠調查日記)。

煉油業 第一區植物油制煉工業同業公會理事長王震歐氏談，該區“煉油廠國營(按：即國民黨官營)民營各廠計有35家，目前仍繼續開工者僅達4家，而開工4家賠累甚大，宏豐所轄油廠，每日虧蝕即達200萬元(33年4月8日商務日報)。

其他如火柴業，貴州“去年初製造廠計達10家，除盤縣的3廠在去年就相繼倒閉外，遵義的4家也於今年上季關門，其餘三家都呈困頓之象”(32年11月中國工業)。梧州火柴廠每月原產80箱，去年5月實施專賣後，8月份僅產21箱，9月份減至17箱(3月30日桂林大公报社論)。

捲煙業 福建龍岩“在煙類專賣前，全县煙廠40家左右，年產捲煙50萬枚，現僅存9家而已”(33年3月4日經濟新聞周刊)。廣西南寧月產捲煙400箱，去年實施專賣後，至9月僅產30箱(3月30日桂林大公报)。

印刷業 如重慶在年底年初三個月內印刷廠70家停工(33年2月19日商務日報)。

造紙業 重慶各廠大量減產(同上報)。四川夾江縣紙商因統稅太重紛紛停業(32年11月12日新新新聞)。粵北和平縣的紙產量銳減(32年4月中國工業)。福建順昌槽戶呼呼無法維持(33年4月19日東南日報)。

制糖業 括甘績鏞氏談，川糖 29 年产 2,961,000 市担，31 年仅 1,300,000 市担，尙不及原数之半(32年10月16日国民公报)。

絲綢業 四川素甚发达，現已冷落不堪，川南为生产名区，极盛时有織机5千，現仅存半数(33年1月9日商务日报)。

以上为各产业部門停工减产之情况，而减产之前途，亦必为停工。去年4月中央銀行經濟汇报第7卷7期載楊公庶氏生产建設中之酒精工业中称：“减产为停工之初步。盖减产以后，則人工設備无法利用，而管理費之比率增高，亦必难久維持。故各厂家为希图减少人工設備之損失，百計籌貸以謀增产，然債台高筑，息金累累。而管制机关对于此項貸款之息金并未計入核价范围，因是各厂無論增产或减产，同处不利之境，終必趋于崩潰之一途”。此虽指酒精工业而言，其他产业部門情况与此亦完全适用。

危机之另一現象，就是所謂“以商养工”，或者竟移工作商。去年7月新工商第一期載周宪文論新工商文中称，有些工厂故意延長生产品的生产过程，“本来可以3月出产的貨物，現在故意要延長到半年。这意义一方面等于停工减产，另一方面則利用物价的逐日飞漲，借以提高生产品的卖价”，或者“挂羊头卖狗肉”，借籌办工厂的名义，購置机器原料，待价而沽，这种消息常常在报上透露”。同刊載千家駒氏論当前工商业发展的动向文中亦称，厂家宁願縮減生产来囤积原料，因为囤积原料不但可以坐享原料漲价之利，而且可以弥补工厂虛盈实稅的亏項”。同刊載楊寿标氏四川工业发展的檢討文中亦称，有些工厂“維持着工业的名义，而实际靠进出原料品代理运输事业以維持其生命，甚至徒具工厂之名，而实际与商业无异”。

去年12月19日广西日报載星期論文千家駒再論民营工业文中称：“有一种厂家是忙于找門路，講交际，送往迎来，酒食征逐，于是銀行借款，原料运输，头头是道。至若問他厂內生产狀況如何，往往瞠目不知所答。也有的是請某一大有力者做董事長，这种运输、原料、資金才能不成問題，管制也管制不到他們头上。至若老老实实做工厂，然而不善于走門路的，却非关門或卖厂不可。現在一般快要关門

或卖厂的厂家，大半就是这种比较老实的厂家”。所以，所谓“以商养工”或移工作商，一部分是某些投机分子的取巧行为，但一部分却是一些工业家在危机下无可奈何的挣扎的表现。

二 危机产生的几个原因

危机不是一朝一日形成的，早在31年5月，迁川工厂联合会等三团体曾发表宣言式的工业界之困难与希望，列举工业界税捐、资金、原料、运输、管制各方面的困难，对已逐渐表面化与深刻化之危机，向国民党提出呼吁。但是这些困难不是国民党所能够解决的，因为国民党并不愿意解决它。国民党的财政经济政策，正是为了帮助大资产阶级垄断资本对中小资本的剥夺，正是为了向着扩大加深一般民营工业危机的方向前进的。

首先说一說国民党的通货膨胀政策，给与民营工业的打击。誰都知道，通货膨胀使物价狂涨，而物价狂涨的结果，便使产业资金感到不足。32年8月1日桂林大公报载工矿业笔谈称：“因为物价的狂涨，往往弄到卖出的货款买不进原有的原料。不说扩充，就只想维持原有的业务，都非增加资金不可”。前引的杨公庶氏文中也称：“两年以前，每月生产1万加侖之酒精所需流动资金（以二个半月计算）不过17—18万元，现时则需用400万元。成本增加如是之巨，各厂本身资力自难胜任，势必出于贷款维持之一法”。32年9月金融知识转引新民机器厂经理胡厥文氏在47次“星五聚餐会”上发言称：“工厂出品，动需数月之久，过去5—6万流动资金已甚活动，在物价高涨之今日，5万资金须增为500万，过去购买材料可以记账，今日处处非现金不可”。32年8月新工商第二期载西南实业协会调查大后方692厂，有187厂感到资金困难。各杂志讨论资金问题的文章更是连篇累牍。

但巨额的游资及银行放款却都流入商业而不流入工业。29年份中中交农四国家银行对工业的单独贷款也只占其放款的3%（31年9月金融知识一卷五期）。千家驹氏称：“据调查重庆市之流动资金，约

有90%以上是投放在商业上面，而工业则无人问津。……据关系方面之调查，29年年终，重庆市银钱业之放款类别，商业一项在全部放款中占96%强，工矿两业放款则不及1%。31年银钱业放款类别，据60家银钱业3月下旬之统计，……工业放款占7%，矿业占2.6%……商业放款所占百分比，实为80%强”（32年8月新工商第二期千家驹：论发展工业生产）。

产业资金问题日形严重，国民党为了表示愿意解决民营工业困难的樣子而发放的工贷，据32年10月8日商务日报载：“在此次参政会中，据四联总处负责人报告所列贷款之数，已达28万万元，其中仍以民营工业占2/5。但据洞悉内情之人所知，32年度实际贷款之数目仅达7万万元，其余20万万贷放何事、何处，皆无从知悉。就钢铁业而言，在此次参政会上之报告，民营部分占2亿7千万元，官营部分占2亿4千万元（指资源委员会所辖之钢铁厂而言），但实际上民营工厂中包括中国兴业公司所贷之1亿6千8百万元，但中国兴业公司之性质并非全属民营（编者按：该公司为孔祥熙资本所办，董事长由孔自任），而贷款数又如此之大，以致其他真正民营钢铁厂所得之数，堪称寥寥无几。故后方民营工业各工厂希望工矿负责当局能将贷出之数字公布国人，并经各厂证明其公布之数字非仅为公布之数字及会议上报告之数字”。32年11月25日时事新报载：“工业贷款虽定为8亿元，工业界实际所得到者仅1亿元，且其中大多数为规模较大的工厂所借。其余中小工厂，皆因抵押品估价太低，故多未能染指”。因为对于小厂“即工厂调整主管当局亦存着不屑协助的心理。甚至认为‘这许多中小工业，规模不大，机器不够，资金困难，人力尤为缺乏，抗战以后是无法存在的’，因而不予资金上的协助”（32年8月新工商第二期秦柳方：广西的工业建设）。除此而外，贷款手续浩繁，费时甚久，期限甚短，即能贷到之工厂亦视为畏途（前引新工商第二期及32年9月金融知识“产业资金问题特辑”等）。马冠雄氏（顺昌公司渝钢铁厂经理）称：“今天工贷已经不足以救济了”（32年11月3日衡阳力报）。

国民党对产业資金困难的另一个“救济”办法是籌設証券市場，发行产业証券来“吸收游資”。32年11月27、28 兩日时事新报发表了中央銀行經濟研究处座談会証券市場与产业資金問題一文，自己就不能不作了否定的回答：“产业界人士已在大呼危机的业已降临，在这种情形之下，大量吸收社会上的資金，則虽有証券市場的存在，也必然不能达到目的。……不是社会資金找不到投資产业的門徑，而是产业利潤值不得他顧眷”。該文还分析了証券市場成立对当前产业界不仅无利，而且有害的諸因素。因此証券市場虽然宣傳已久，終于还不曾正式出現。其次是发行产业証券，中央信托局，自本年元旦起，发行投資信托証券，总额1亿元，截至最近止，仅銷出200余万元，“因該項証券保息只有一分，紅利还屬于未知之数，承受者自然不多，但即能迅速銷售，在物价高涨情况下，区区1亿元，于事又有何补？”（33年3月建設研究載秦柳方：当前的工业救济問題）。

此外，通貨膨脹使工业界虛盈实亏，据千家駒氏称：“币价低下的程度还过于产业資本所能获得的利潤額，一个工厂在賬面上虽然賺了錢，但由于物价上漲的結果，它以同样的貨幣額已經不能从事同样規模的再生产。……这样資本家反复循环了許多次，生产亦随之而趋于萎縮，最后只有出之于卖厂之一途。近一年来四川卖厂之风很盛，便为此事之說明”（32年8月新工商第二期千家駒：論发展工业生产）。

所以資金缺乏，虛盈实亏的現象，在不改变濫发通貨的財政政策之前，是不可能得到解决的。

第二、国民党的捐稅政策也給了民营工业以严重的摧殘。

捐稅是极重的，最严重的是征收直接稅（所得稅和战时过分利得稅）的“虛盈实稅”問題。現行所得稅不以个人为对象，却以产业單位为对象，因为物价上漲，币值跌落，賬簿上的数字并不能代表真正的价值，但征稅却以它为根据，“工厂所得的是虛盈，而所出的是实稅，資本經過一度周轉之后，就不能进行同一規模的再生产”（同前引新工商第一期千家駒氏文）。

直接稅之不合理，据33年8月1日桂林大公报載蔡經濟氏(立信會計師事務所桂林分所主任會計師)：我国工业受賦稅制度之影响文中称，我国賦稅制度非但不能配合协助工业的发展，反給工业以变本加厉的压迫，直接稅不顧生产者成本，“虛盈实亏，已成工厂普遍現象，而不合理之稅款累积之下，工厂乃不得不以其資本繳其稅款，于是工业生产萎縮之險相环生，資本逃避之惡果乃成。……征稅机关对工厂所得額更有逕行决定之权。……所、利得稅采累进制，一經重行决定純益額，則繳稅每有三、五倍以至10倍于原报額者，設或申請复查或审查，或提起訴訟，則重决定額每又反而超过其原决定額者。邇来更有一种傾向，即以物价为标准，以上年稅款为依据，而逕行决定某厂应繳稅額为上年若干倍者，或以国库艰难为理由，即决定某厂应納稅若干者，……实使工业从事人員，精神头腦，朝夕为此問題所困扰”。而且現行稅則是利于資本雄厚的工厂而偏亏小厂的：“設今有丙丁兩厂，丙厂之資本大，其金額为1,000万元，丁厂之資本小，其金額为100万元，如其生产营业数目同，其費用純益俱为80万元，丁厂即为其資本80%，丙厂則仅达8%，根据条例，丁厂須納所得稅，合純益在50%以上，丙厂則可不必納稅，如是則企业之資本愈小，其納稅义务愈重，資本愈大，其逃稅額亦愈大”。該文还列举直接稅不顧及提高工厂效率等不合理之处多条。

32年5月金融知識2卷2期崔唯吾产业資金問題之根本解决办法中称：直接稅“稅收方法以資本額为基础，而計算純利百分比，累进課稅。故同一純益額，資本額愈小者，稅額愈多，反之資本愈大者，稅額愈少。稅收机关为謀稅額之維持与增加，对于資產价值，以照原价計算为原则，不准照时价重估。……在物价已达50倍以上之今日，……苟不变卖机器原料，即須另籌現金以納稅”。广西日报32年8月1日星期論文胡越中对于中国工业之平凡看法文中亦称工业衰落原因，“直接稅影响为最大，以創辦时資本为依据，予以課稅，非惟盈益无从談起，即欲保有原有資產亦不可得”。

同时，直接稅征收机构为保持稅額，对于資產设备之折旧，亦

不許照时价提存(同上引崔唯吾氏文)。这都是对固定資本直接的剝夺。

为希望使虛盈实稅現象稍得补救，“資產重估”成为民营工业之一致要求，据去年11月16日經濟新聞周报轉載，国民党中央主管机关已拟定办法，准許重估者以与国防民生有关的产业为限，范围甚狭，且重估价值“不得超过其原定資本之8倍”。現物价已漲数百倍至千倍，資本重估值只达8倍，稅額能减几何？但即使如此，至今尚未頒行，还在审議之中(33年4月29日經濟新聞周报)。

去年8月中国工业协会中南区(桂湘粵)分会在桂成立，施之銓氏(中国工业月刊发行人，中国工协中南区理事)迫切呼吁免除与改善直接稅制。但国民党今年稅收，直接稅列为第一項，計72万元(1月1日商务日报)。为仅次于田賦征实征借之最大收入。則改善之无望可知。

其他稅目亦极繁多，稅率亦日益加重。据32年4月号中国工业載秦柳方氏捐稅与工业文中称，除所得稅、利得稅外，其他稅捐重重：首先是營業稅，“依照現行稅法，生产事业須与商号同样負担營業稅。……事实上多半由直接稅局自行核定一个标准，即依照賬簿所記營業額，或以稅局估定之資本总額为确定稅率之依据”。其二，为統稅，产品征收稅者“計有烟卷、棉紗、火柴、水泥、麦粉及火酒等六种，本年起又已增加木材、皮毛、陶瓷、紙箔等四种，而其中棉紗麦粉兩項已于本年2月1日起，改征实物。而現行棉紗征实办法，較之以往，……稅負約增一倍”。其三，为公債与儲蓄，“以29年軍需公債为例，桂林市各工厂，曾接受下列各个机关的劝募：公債劝募委员会、經濟部工礦调查处、軍政部修炮厂、中央造币厂、財政部广西直接稅局、貿易委员会东南运输处、以及公安局、公安分局、甲長等的劝銷。此等机关或系公債劝募的主持机构，或系各工厂的上級或地方主管机关，或系營業往来，而于应付貨款中搭发公債，即能力上不胜負担，亦无法拒絕。又如桂林市各工厂之節約建国儲金，除由經濟部对每一厂指定劝儲額而外，当地劝儲机关，亦經由迁桂工厂联合会或直接稅局等之劝

銷，而分別由各工廠負擔。其次，捐獻次數多，使各工廠應接不暇……頗有不能負擔之感”。其四，為非法定稅捐而其性質類似稅捐之負擔，亦為數不少，“大體言之，一為向中央繳納之員工緩服兵役之證書費，……每人須納證書費100元，二為基層建設費用，各工廠亦須負擔，三為社會風氣不良，無形中加重負擔，……平時工廠購買地產，請求過戶建築房屋，請領執照，目前均需額外費用。而此等事實，自亦未便列舉。……形同稅捐，而負擔亦格外苛重。”

黃炎培氏在今年4月30日重慶各黨派人士第五次憲政座談會上，對於關稅統稅問題稱：“關稅是並不限於出入國境，中央、省、縣到處都征，並不一次為限。既實行統稅，按理就是統一一次征收，現在不僅統一，簡直是‘統二’，‘統三’，‘統四’，甚至到‘統八’都有的”。

在稅捐既苛且擾的條件下，四川夾江紙業即因新統稅而紛紛停業。“此次新增稅額較前加重，且單位品名，課征極為繁復，即估價亦超出現行售價一、二倍，紙商實無力負擔納稅義務，紛告停業”（32年11月12日）。四川絲業空前冷落，因“海關對於絲綢素列為奢侈品，按例須課征戰時消費稅，且由蠶造成絲時，即課稅10%，制成成品時，又須課稅15%，連同營業稅等項，共及40%”（33年1月31日桂林大公报）。

最後，還有關卡林立，到處需索，32年8月1日桂林大公报社論工業界的自救中稱：“甚至省內運輸，亦有意外之困難，在若干地區之‘過關費’，動輒需索巨萬，叫人啞子吃黃連，有苦不敢說，否則下次過關，更是不易”。而其留難的名義，如原料從重慶運來，便說是“物資倒流”，從淪陷區搶購便說是“敵貨”或洋貨。今年2月號中國工業載秦柳方民國32年國內經濟大勢文中，引福建企業公司總經理張慕先氏的話說：“另一位朋友從安徽那邊來，一部卡車途中經過了關卡72次，我不知道他怎能忍受”。4月1日經濟新聞周報載：“沿富春江而上，場口至屯溪水程300—400里，檢查機關30余，苛索殊甚”。又載：“縣級政府，地方機關依法不可征收貨物通過稅，而浙省各縣，均強收通過稅5/1000，雖經禁止，但多巧假名目，如××縣在強征縣稅之後，

发給‘乐善好施’之收据一張，以代捐稅收据”。4月11日青年报載，璋珮紙、食水及其他文中称：南雄紙运韶关，途中須泊仁化統稅局，每日仅放行一、二艘，有宕延数月者，近稅款又加了一倍。

在捐稅重重的高压下，民族工业还能有什么繁荣的希望呢！

第三、国民党的經濟統制政策配合了濫发通貨、加重稅收的財政政策，双管齐下，完成了給民营工业致命的打击。

国民党統治区一切重要工矿事业，从生产到分配的全部过程均在管制机关严格控制之下。据32年7月1日中央銀行經濟汇报八卷一期載曹之瀾泛論战时工矿管制政策文中称：管制“除运输一度称統制外，皆曰管理，殆为免除一般人民不了解之恐懼心理，实际上均帶統制意味。管理机构为經濟部，实际上之管理机构为資源委员会(甲种矿品——按即錫、鋇、錫、汞、鋇与銅)，工矿調查处(厂矿迁移及民营襄助)，鋼鐵管理委员会(鋼鐵)，燃料管理处(煤及木炭)，行政院液体燃料管理委员会(汽油、煤油、潤滑油及酒精)，采金局(金)，水泥管理委员会(水泥)，財政部貿易委员会(桐油及其他出口农收产品)，物資局(一度成立，拟管一切无專管机关之物資)，农本局(原管农产，后限于花紗布。农本局取消后，花紗布管制机构現为花紗布管制局)，平价購銷处(日用必需品)。……管制主要业务有五：一为生产管制，二为交易統籌，三为价格評定，四为运输領証，五为消費限制”。

管制所加予工矿业最严重的摧殘，即为限价收購一項，一般官收之限价，莫不低于其成本甚多，实际就是掠夺，工矿业都因此賠累不堪，停业卖厂的极多。其他如片面限价，方法不善，管制机构弊端百出等更增强了这种摧殘。

例如矿业方面据33年10月30日正中日报社論称：“抗战以后，中央厉行統制經濟，分設主管机关，收購管制，……錫錫等矿，战前既未能充分发展，战后政府以廉价收买，不仅利潤难，維持成本亦难，湘潭鶴鹽矿为湖南唯一食鹽矿产，而鹽局收买价格，恒居以成本之下，再如各路購进煤斤，出价总較市場为低，价款又未必收貨即付，一般煤矿商之受此影响，以致不能振作者，为数不知几何，今日各路存煤无

多，市面有煤荒現象，此豈非其原因之一耶？”又如箇旧錫礦工廠几全部倒閉之主要原因，亦即為收購價格過低，目下資委會核定錫價每噸為11萬元，據錫業公會計算，每噸實需成本31萬元，相差甚巨，該地米價已較戰前增漲300倍，而錫價較戰前上漲尚不足40倍，不僅如此，政府收購又不立付現款，旧欠廠商款項竟達3千萬元之巨（33年1月4日商務日報范武之：感慨過箇旧）。又廣西礦業衰落，亦因收價過低，不敷成本（33年4月30日桂林掃蕩報）。

再如紡織業，今年1月1日雲南日報載張錫昌如何挽救工業生產一文中稱：“12月間梧州、桂林、韶關一帶，20支紗每件徘徊於18—19萬元，而重慶的官價只有19,000元，只及於市場的1/10”，因此一般小廠家不能支持。而且，紡織業原料的棉花，亦因管制收價過低而大量銳減，陝棉產量27年為101萬担，31年度驟降至31萬担，32年度更降為20萬担（32年6月15日大公报社論及今年2月中央銀行經濟匯報9卷3期孟憲章：當前工業問題之癥結及其解決之途徑）。據大公报社論稱：“考其原因，不外由於官定棉價過低，農民不敢再種棉花”。以致各地紡織廠均感棉花缺少，更加上一重困難（32年5月新經濟9卷1期周茂柏：機械工業當前困難及其改進辦法）。不僅如此，而且由於管制的結果，棉花連收買也買不到了，據32年11月27日秦風、工商日報聯合版載重慶五工業團體工業問題座談會紀要中稱：“今年各地棉花，……政府預定收購額為70萬担，按理目前至少須收到30萬担，但現在只收到3—4萬担，與預期之數相差太遠。棉花在統購統銷之下，反而有散匿不出或外輸現象，對棉紡業原料之供應，影響實大”。在該座談會中小型棉紡業曾呼吁“希望予小型廠以生存之機會……希望政府對小型廠之管制稍寬”。又據32年4月中央銀行經濟匯報6卷7期載孟憲章有關前方生產建設各問題文中稱：“寶鷄申新紗廠，因辦理統制之下層人員方法不善，廠方積存千余台紗，不能售出，反須向銀行息借資金，而近距十余里之寶鷄工合數十單位紡織生產合作社，全因無紗可購，停止工作”。就織布業而言，據32年11月號中國工業載陶大鏞限價聲中的工業文中稱：“20支細紗每股限價是

1,400元，而用此細紗織成之細布每匹限價 1,450元。然就成本而論，每匹細布實需細紗1.1股，專就原料計算，已需成本1,540元。再加工資、利息、開支等項，聞實際成本不下1,700元，是每匹按限價發售，勢須虧本200余元，利潤更談不到”。

再就酒精而言，按前行渝工業問題座談會紀要文中稱：“以民國28年為基期，酒精漲價125倍，稅增129倍，酒與糖（制酒精原料）漲189倍，高粱漲164倍，酒精與其原料價值之不相稱，于此可見”。又糖酒均因專賣而售價大增，來源困難，32年7月中央銀行經濟匯報楊公庶文中稱：“增稅專賣之種種刺激，遂使（酒精）原料生產更形萎縮。先就糖類原料言，資內糖產，歷年減少。以29年產量為標準，則30年僅達其1/2，31年僅達其1/3，現據估計，本年增產更形銳減。管制機關收購所給予廠方的額外困難與麻煩，據今年2月號中國工業載，成都中國酒精廠情形稱：“出口經訂約售于某交通機關，驗貨收貨，往往拖延累月。好容易手續辦清，又說款數太多，須向重慶收款。到了重慶，又說經費未曾領到，且等幾天，因此就不能依計劃去再生產”。

煉油業受管制之害據渝工業問題座談會紀要中稱原料之桐油去年9月初價格為每噸9千元，20日後漲起一倍，而汽油限價不漲，每加侖200元，但近已每加侖虧300元（33年4月8日商務日報載第一區植物煉油工業同業公會理事長王震歐氏談話）。而由於統制結果，種植原料桐油之桐農由於政府“實行若干統制辦法……致生意索然。甚至川湘一帶農人，欲伐桐樹而種其他農作”（32年4月中央銀行經濟匯報7卷7期載張禹九：桐油貿易與煉油工業）。

其他如面粉業“後方僅有6家，現各廠家皆為替政府磨制面粉代收手續費，但由機器折耗太大，新式機器又無力添購，現已臨危險關頭”（32年11月28日商務日報）。皮革業生牛皮已至140元一斤，而熟牛皮每斤100元（33年2月19日商務日報）。

管制的其他弊端如“某些原料在國內儲藏量雖然相當充足，可是由於分配不均，往往形成一面過剩，一面恐慌的現象。如五金電料，大部為軍政部所征購，民營工廠無法買到。又如裝盛汽油酒精的大

鉄桶，某些国营机关堆积如山，而各煉油酒精厂却在因盛器不足而叫苦”。又如广西面粉业，因該省麦产不丰，赴湘購買，又受湘省管制，禁粮出口，每年只开6个月(32年8月新工商第2期秦柳方：广西的工业建設)。

但此种管制机构剥夺国内中小工业能力虽然有余，对原料資敌却坐視不管。据32年4月中央銀行經濟汇报7卷7期載孟宪章有关前方生产建設各問題文中称：“过去因統制与收購办法执行未善，……貿委会在皖所設办事处，因机构狭小，資金微薄之故，致对安徽全省各种禁止資敌物品，坐視其資敌而无法搶購”。至于东南沿海物資大量走私，管制机关亦熟視无睹。

但是所謂有实力者，管制是临不到他們头上的。据32年6月中国农民3卷12期合刊載阮有秋今日后方民营工业的危机文中称，現在后方原料动力机械之获得，“主要是取决于許多偶然的实力关系。因此，尽管現在后方有許多民营工业在国防和民生的見地上十分值得重視，而因为缺乏它种实力关系，終于沒有方法获得动力和原料的充分供应”。吳羹梅氏（中国标准铅笔厂負責人，迁川工厂联合会理事）在今年1月4日重庆宪政月报社召集之座談会称：“統制政策只能管到一些較有規模、較有組織的新兴工业，却管不了其他的封建势力。同时，命令可以改变法律，人情可以旋轉乾坤，这是使一般厂家焦头爛額的主因”(33年2月1日正气日报)。

統制政策对中小工业的剥夺与摧殘，几已达到使中小資本不能忍受的程度了，去年10月中国工业“中南区工业协会成立大会特輯”載，新华膏鹽矿公司董事长張銘西氏称：“自民国25年以来，政府对于国内特种矿产，如錫、銻、錫、汞、膏鹽等类，陸續均予管制，其所得結果，生产之减少，矿业日益雕敝，已达破天荒之纪录。……鄙人从事工矿业，垂30年，且为首先倡导管制之一分子。无如近四年来，物价飞騰，而管制当局，对于矿商之呼吁，始終漠視。目前政府收購矿品之牌价，衡以战前及現在物价指数，仅得1/4，殆实远逾人民所堪受之限度，致有今日矿业衰微之結果。……經办管制者，多以私利为怀，

……長此以往，不獨戰時礦業日趨淹沒，即戰後亦無恢復希望”。

尽管統制政策已使大后方民營產業雕敝不堪，已為中小資本所一致反對，但國民黨論客主張更加統制者頗不乏人。還有主張乘此危機，根本吞并小廠、淘汰中小工業的論調。這種吞并小廠的企圖，在實際措施上已在進行之中。據32年12月11日衡陽正中日報載，主管當局正研究緊縮“一切非必要之工礦事業”，今年3月4日新民報載：“政府對酒精業亦主張小廠合并于大廠”。4月1日大公报載：國家總動員會議近曾召集有關機關代表商討，決定取締不必要之產業，“甲、參照前經濟會議時期各機關會商所列不必要之產業名單，斟酌實際情形，核定應行取締之種類，加以取締；乙、雖屬必要之產業，但如設備技術及管理不良，出產不合規格之成本特高者，由主管機關訂定檢查考核辦法，分別裁并或淘汰”。在這樣的方針下，民營中小工廠之被取締淘汰者，必然會很多。

可見國民黨統制經濟政策的結果，必然是中國幼稚的民族工業的根本破產。

（摘自許力羣：“當前大后方民營工業的危機”1944年出版）

抗日戰爭結束初期国民党 統治区的工业狀況

自由区(按即国民党統治区,下同——編者)的工业,完全是在战争中間迁建起来的,亦是在战争的破坏、固有的手工业和地方經濟的限制等等条件中掙扎起来的。就其总趋势論,自27年移設起,到31年的一个短時間内,战时工业在各方面都有猛进的发展;但自32年以后,情况逆轉,陷于时作时輟,此起彼落的慢性危机。33年冬季加紧准备反攻物資,才又在某些重要部門引起产量的增加,但亦无补于整个工业生产的艰难趋势。不过,自由区的战时工业,或民族工业的广泛的致命危急,尙不在战时,而是战争胜利以后。所謂胜利的爆竹一响,后方的工厂便陸續关門,实是毫无誇張的描述。胜利所以引起工业崩潰的原因,首先是收复区的物价猛跌,使后方工业一时由于成本太高不能再生产。政府因忙于接收,也忽略了自己的工业复員,致使一切軍用民需生产的工业更感困难,胜利后的工业情形,可以从下列几个統計上表現出来:

34年工厂登記統計 (單位:厂家 資本千元)

业 別	全 年		下 半 年			
	厂 数	資 本 数	厂 数	占全年百分比	資 本 数	占全年百分比
总 計	732	3,689,681	273	37.30	1,803,917	48.89
冶煉工业	13	51,500	4	30.77	17,500	33.98
机器工业	63	362,608	32	50.79	174,708	48.18
五金工业	17	254,500	9	52.94	28,000	11.00
电器工业	16	60,340	6	37.50	32,000	33.03
化学工业	177	1,349,394	73	41.24	750,574	55.92
紡織工业	102	838,930	40	29.22	406,178	49.49
服飾工业	10	60,100	8	80.00	44,900	74.71
飲食工业	292	577,667	77	26.37	246,597	42.69
印刷工业	15	64,982	9	60.00	56,250	86.56
杂項工业	27	69,710	15	55.56	34,310	49.22

上面关于34年登記工厂的統計，显示下半年开工工厂，在厂数和資本上都沒上半年减少，尤其厂数的减少超过資本甚多，更值得注意。因为登記資本随币值跌落而随时增大表面数字与其实际代表的購買力，是并不一致的。所以总厂数只占全年37%，与冶煉、飲食和电器等工业，皆各占30%左右，是最值得注意的。且此項登記統計，在時間上仍須加以极大的保留。因依工厂登記規則，各厂应在开工三月以內履行申請登記手續，而事实上更多在开工三月以后，才行登記，所以34年的登記工厂，多数都系上年度設立，而下半年的工厂数字，亦多包含上半年所开工工厂在內。我們應該肯定的指出，胜利后自由区工厂設立的停頓趨勢，远在上表所示的程度以上。这里我們可以引用35年上半年的登記数字，以資佐証，35年上半年工厂登記总数，計有工厂39家，及資本 3,657,459.6千元。其中，自由区仅有工厂97家及資本 677,720千元，兩者約占总数的24%及18%强。同时，这些履行設立登記的工厂中，有化学工业31家，飲食品工业27家，紡織工业 9 家，共占自由区厂数的69%。这是在厂数，資本数及工业性質上，表示胜利已將自由区的工业設立，在量上和質上都已一蹶不振的每况愈下了。

再从产量来看。根据經濟部編制的后方工业生产指数，并依产品性質分別改算的結果，有如下表所示：

34年夏冬季后方工业生产指数 (27年1-12月为100)

类	別	夏 季	秋 季	冬 季	冬季較夏季减少之百分比
总	指 数	488.26	458.05	386.41	20.86
燃	料 类	392.85	377.48	334.31	14.90
鋼	鉄 类	840.99	791.96	461.74	45.10
机	器 类	466.17	363.47	205.16	55.99
水	泥 类	235.91	191.44	158.20	44.67
酸	碱 类	404.92	344.64	238.46	41.11
日	用 品 类	602.72	552.34	490.36	18.64
文	具 类	542.46	489.29	427.65	21.16

从上面改制的生产指数观察，如果秋季的数字有过渡的性质，那么夏季的和冬季的正可代表胜利前后的一般趋势了。把冬季和夏季指数比较，则总指数几下落21%，足证胜利对于后方工业的打击是如何广泛。分类指数中，除燃料，日用品及印刷文具跌落20%或20%以下外，其他生产工具或原料，跌落皆在40%以上，尤以机器产量的减少，竟达56%，这又证明胜利给予后方工业的打击，是如何的深入。今年起，经济部已停止后方工业生产的调查和指数编制，所以不能用数字表示危机的发展程度，不过可以断言的，一般产量仍是继续低落，特别是机器钢铁等产量，所减少的恐已达到80—90%的高度了。这种工业的惨败现象，还可以从工厂变动统计上获得另一方面的证明。

重庆工业变动统计 (35年5月底止, 单位: 家)

类	别	共 计	歇 业	改 组	迁 移	增 产
总 计	計	363	344	11	3	5
冶 金	煉	7	7	—	—	—
机 器	器	165	163	2	—	—
电 器	器	29	28	—	—	1
化 工	学	73	63	4	2	4
飲 食	品	1	—	—	1	—
紡 織	織	84	79	5	—	—
雜 項	項	4	4	—	—	—

重庆工业变动统计百分比

类	别	共 计	歇 业	改 组	迁 移	增 产
总 计	計	100.00	94.76	3.03	0.83	1.38
冶 金	煉	1.93	1.93	—	—	—
机 器	器	45.45	44.90	0.55	—	—
电 器	器	7.99	7.71	—	—	0.28
化 工	学	20.11	17.35	1.10	0.55	1.10
飲 食	品	0.28	—	—	0.28	—
紡 織	織	23.14	21.76	1.38	—	—
雜 項	項	1.10	1.10	—	—	—

工厂变动申請，在我国一向是較設立登記更不踴躍。因为除了公司組織的工厂，能在限期内作解散申明外，其余皆会拖長变动登記，或竟无声无息的自动关門了事，所以我們从无較完备的变动統計可用。但这里所引的从胜利起到今年5月的重庆(包括重庆市，巴内江北及北碚)变动統計数字，却有相当的代表性，特别是对于規模較大，技术較精的工厂，代表性更加大些。这因为重庆是自由区的一个最大的工业都市，又是战时首都的所在地，当胜利引起了广大的关厂浪潮后，許多工厂为获得政府收購机器及遣散員工的便利，就紛作变动的申請，其中尤以准予收購机器及遣散职工者为最多。这些都包括在上表的歇业一欄内。依据上表，从去年8月中旬至今年5月的9个半月間，重庆共有变动工厂363家，其中有进步性的改組迁移及增資的变动，仅有19家，其他95%，即344家，皆系停止生产的歇业了。截至今年上半年止，重庆区登記工厂共有1,800家左右，是則胜利中歇业的，即占去19%。而实际上如加上停工或未申登記的中小工厂，重庆区是否仍有半数工厂在工作，即使是縮減产量的維持开工，实是一个問題。再从变动工厂的性质看，亦如生产指数表現的一样，以生产用品的工业为最惨重，如机器，电器及冶煉工业，在各业的相对性上，其歇业厂数的严重性，比百分数所示者更为严重。至于化学工业歇业的多屬煉油酒精厂，紡織业停业的多屬織布厂，只有飲食品业的变动，有一家由他处迁入重庆，恐怕要算一般工业破产声中的驕子罢。

(摘自李紫翔：“胜利后的中国工业”中央銀行月报
新1卷第9期，1946年9月出版)

抗日戰爭結束後国民党統治区的經濟危机

甲 抗战結束初期的危机表現

突然到来的胜利，頗出于人們的意料之外，它給我們整个后方帶來了空前未有的經濟危机：物价、黄金和美鈔一齐狂跌，信用大量收縮，銀根极度紧追，商品銷不出去，生产沒有出路，債務无法清償，債权失去了保障，金融工商各业均有岌岌危殆之势，失业人員日益增加，勞資糾紛日益扩大，其影响已波及多数农村。

这种經濟危机，首先表現于物价的狂跌上。而这种物价狂跌，則是过去若干年来不合理的物价狂漲的必然反动，从8月10日晚上日本請降的消息傳布以后，整个后方市場都受了极大的震动，大家都以为战争需要將要停止，法币流通区域將要扩大，发行数量將会减少，币值將会提高，交通將要恢复，外来物資將要流入，各地域間及各物品間的不合理的价格的差异將会得到矯正，所以有貨的尽量抛貨，有錢的不願买貨，囤积者不敢再事囤积，消費者竭力延迟購買，再加以法币大量流入收复区，还乡者紛紛廉价卖求現，債权者多方追逼还債，更使得物价大跌特跌，直到9月底才得稳住。在这期間，就重庆大多数商品而論，少則跌价40—50%，多則跌价70—80%不等。

物价狂跌，对于工矿业事业的打击最为严重，簡直可以說是一种致命的打击。从30年度起，后方工矿业即已走上衰落的过程，这一次很可能把它們送終。后方許多工厂，因为貨价大跌，貨品銷不出去，逼得停工减产，同时开支又不能减少，債務又被催迫归还，以致陷于进退維谷，走头无路的境地。

目前(1945年)后方鋼鐵业，煉爐尙在工作者仅及33年1/10，單單重庆第九区所屬各鋼鐵厂(共28家)，这次亏损便已經达到10余亿元之巨(11月2日新民报)。机器厂也多紛紛停工，南岸一帶中小厂已

全部停工，只有恒順、順昌、渝鑫、民生、震旦几家尚有生产局小量灭火机定货可做，約1亿元，其他只有少数船隻零件可做（11月5日商务日报），后方17万紗錠开工者不过3/10（11月2日新民报），而花紗布管制局积欠各厂代紡工繳，总計渝、昆、蓉、陝各地，积至8月底止，共計20亿元，延未发给（9月26日中央社訊）。重庆、成都、璧山等地土布业几乎已經完全停工，花紗布管制局拖欠重庆土布业各厂工繳已达130,000,000元，并且还有欠紗。重庆5家面粉厂曾經一再减产，且已停工1个多月，最近才有3家复工。四川9家造纸厂，現在只剩了4家，产量已减到1/3（10月3日中央社訊）。手工紙产量也大为减少，夾江原有漕戶20余家，現在仅存4/10，而且紙質更不如前。重庆市400多家制革厂，小者停工，大者减产。化学工业、玻璃业和猪鬃业，也多紛紛停工。四川40多家酒精厂已經倒閉了一大半，30多家植物油料厂仅存着10余家（11月2日新民报）。自贡、犍乐二大鹽場，产量日益减少，資金周轉困难，灶戶紛紛停火，已瀕于崩潰境地，而川康鹽务管理局竟积欠自贡鹽价达30多亿元，积欠犍乐鹽价达20多亿元，逼得他們出賣黑市鹽，而其价格反比官价少数10元至100元。糖业情形也是异常恶劣，糖房籌措資金十分困难，以致不能开榨。煤矿情形更为严重，不仅多在减产停工的状态中，而且有全部破产的危險。例如江北煤矿已經結束；华銀和华安煤矿，因川北鹽場停产而陷入停頓或半停頓状态；三才生煤矿也已因发不出工資而停工，宝源、燧川、和平、复兴隆各矿，均因缺乏資金，无力生产。据藍文彬氏所談：从32年度限价起到34年8月底止，嘉陵江区各煤矿因限价所受的損失，竟达72亿余元之巨，各矿負債已达30亿元（9月25日新华日报）。貴州在胜利前原有工矿业大小共計1,500單位，現在停工关门者已达60%以上（11月12日新华日报）。昆明、西安关门停业的工厂也已經非常之多，其狀況也日趨惡化。各地厂矿既然紛紛关门停业。失业的工人自然也就一天增多一天。据估計，重庆失业工人約达6万人，昆明約5万人，貴阳約4万人，成都約3万人（10月13日新民报）。就重庆來說，失业工人至少已占全体工人30%，問題不能說不严重。

就是那些在业的工人，也有随时失业的危险。

(摘自施复亮：“論当前的經濟危机”四川經濟季刊
3卷1期第一頁至第三頁，1946年1月出版)

乙 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官僚资本的掠夺是 民族工业危机形成的主要原因

(1)上海市控訴美貨摧殘民族工業座談會

1950年11月17日上海新聞日报主办，在銀行俱樂部举行，出席者：
向宏昌 戴煥堂 張鴻勛 陈敦川 刘仁初 鍾山道 黃祖堯
王子建 吳蘊初 李伯龙 叶元龙 朱鴻儀 沈星德 黃佳秋 浦
慕岐 經叔平 陈丰鎬 陈銘珊 何致广 荣漱仁 乐輔成

主人：各位先生：今天本报举行控訴美貨摧殘民族工業座談會，
承各位先生在百忙中抽空出席指教，我們觉得非常荣幸！

我国的民族工业，在解放以前，一向受到帝国主义的压迫，尤其是抗日战争結束以后，美帝勾結了官僚資本，通过国民党反动派的政权机构，实施低汇率政策，替美帝商品在全国境内开辟了傾銷市場，不但窒压了民族工业的发展，而且到处給以严重的摧殘，使大部分的工业均难以生存。当时的反动政权和美帝互相勾結，民族資本家虽受到这种种压迫，不但无法控訴，連呼吁也受禁止。解放以后，美帝与国民党反动派的政权已被驅逐，一年多来，民族工业在国家經濟的領導与帮助下已奠定了恢复与发展的基础。但美帝并不甘心于自己的失敗，正在以朝鮮为桥梁，企图对我再度实施各种侵略。諸位都是民族工业的先进，过去飽受了美帝的侵略与摧殘，对当前的局势，应怎样处理，根据諸位多年与美帝斗争的經驗，所見必多，請多多指教！

戴煥堂(造紙业)：抗日战争結束以后，反动派和官僚資本勾結美帝，故意抑低汇率，大量进口洋紙，市面上洋紙泛濫，弄得国内造紙业无法生存。美帝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搗垮中国的民族工业，榨取中国的金錢。

大量洋紙进口对造紙业的影响，和其他民族工业一样，不但阻碍

了工业的独立发展，而且因洋紙充斥市面，独占了中国市場，使国内造紙工业的技术停滯在一定的水准，无法更推进一步。

朱鴻仪(造紙业)：我国造紙业工业有60年的历史，但60年来，一直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下，尤其是美帝有计划的侵略下，始終沒有改进和发展的机会。由于美帝的存心扼杀中国造紙工业，我們要进口一些造紙原料，反比进口成品高貴。当时我們为了要发展自己的工业，曾不顧一切向反动政府要求增加木漿进口，减少成品輸入，終以官僚資本和帝国主义的密切勾結，未获接受。

陈丰鎬(制葯业)：中国制葯工业，已有多年历史。抗战时期，在重庆就有36家制葯厂，等胜利之后，搬回上海准备发展业务，但一到上海，大失所望。由于1946年美制葯品大量傾銷，我国制葯工业蒙受极大的打击。这一年美制葯品进口数，价值达1,800万美金。此外，通过官僚資本揚子公司和立达洋行之手，从冲繩島运来3万吨剩余物資。不管我們需要不需要，美貨象排山倒海似的涌来，使上海200多家制葯工厂，到年底就关掉了160家。虽然还有几十家沒有关門，但也是奄奄待斃，境况艰窘。

美貨傾銷，对我們制葯工业的影响极大。过去的慘痛經驗明明白白的告訴我們：美帝是我們的死对头。有了它，就沒有我們过的日子。例如美制葯品，有許多是假葯，劣质的葯品，运到我們中国来，不知害了多少人。象美国制的葯品——吐根粉，最近經本市卫生局化驗結果，証明它是伪葯。但美国政府的法律上，却明文規定这类假葯，虽不能銷之于国内，却允許輸出給別国的人民上当。

在1946年10月所出版讀者文摘杂志的43頁上，刊载着下列4項事实：

(一)美国某大葯厂所制的“配尼西林”，經檢查后發現不合格，禁止出售，但輸出不在此限。

(二)有一批橡膠膏，經檢查后發現未曾消毒，禁止出售，但輸出不在此限。

(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内，紐約、洛山磯等地，竟成为做假葯

的**大本營**。政府禁止這些假藥出售，不准在國內傾銷，但輸出可不受限制。

(四)美國法院審判一滑頭醫生做假藥的罪行，其辯護律師竟聲稱：“只要美國人不吃這種藥就是了，或許別國的人民喜歡這種藥呢？”

從這些事實上證明，他們不僅搞經濟侵略，而且存心欺人，竟至無惡不作的地步。我要告訴大家，這種西洋鏡拆穿之後，我們不應該再迷信“美國制”的藥品了。

最後，我覺得我們從事制藥工業的同人，受美帝經濟侵略的痛苦，可謂創巨痛深，因此我們和美帝之間，勢不兩立。

陳銘珊（制藥業）：對美帝國主義者的仇恨，在一般親身遭受過痛苦者的心裏，是永世忘不了的。抗戰勝利以後，大批的美援物資，包括了大批的成藥，幾百幾千噸的進來，有些是擱置了多年失掉時效的藥品，有些是美國國內賣不出去不合標準的成藥，有些是我們國內足夠需要而可以生產的東西，都整批地運了進來。弄得街頭巷尾，都可以看到美國藥品的攤頭。美帝走狗的官僚資本，象揚子公司、孚中等，還將沖繩島上堆着的一些垃圾都去買了進來。在1946年的一年內，把國內整個的工業打垮了。一個個工廠的煙囪都停止冒煙，我們藥廠和制藥原料的工廠大小約200多家，抗戰勝利後，倒閉了50%以上，存在的幾家也是奄奄一息，售價不到成本，銷貨不夠開支。我們最大藥廠之一的新亞，也就在那一年年底攔了淺。雖然新亞在解放以後，有了很多的進展，但是已經是大傷元氣。我們忘不了這個血的教訓，我們要和美帝國主義者清算，在國民黨反動統治時期，一切都是帝國主義者的勢力，一切都是為了帝國主義者的利益，外匯的配給對帝國主義者推銷員的官僚資本，是有特別權利的；海關的條例，對帝國主義者的商品進口，是有特別便利的。例如立達行一次進來的剩餘物資，就有價值100多萬美金，而其付稅的方式，不是照市價估計，只憑了美方官員和內財政部簽個字，就以很低的稅率放行了。我們從幾十年來美帝國主義壓迫下，一直萎縮到現在，沒有發展的

能。細細的找尋我們的困難的根源，我們失敗的原因，都是受了美帝國主義者直接和間接的壓迫。從1946年1月至11月，單是藥品一項，由25個國家輸入中國，總共是1,800多萬美金，而由美帝國主義者送來的，却有1,480萬美金，占到總額80%以上。

吳蘊初（化工業）：我對於美貨摧殘民族工業的認識，可以用這樣一句話來說明：我們要的東西它不來，不要的勿三勿四貨色却大量運來，而我們自己可以製造的商品，它又大量傾銷，來打擊我們的生產。例如燒鹼、漂白粉，國內都可以製造，美帝偏偏向我們大量輸入。它在太平洋沿岸大量設廠，就是準備賤價傾銷，打垮我們的化學工業的。但是我們需要的高壓機器、青鉛、炭精板、重要五金器材，它又不賣，即使到英、法等他的仆從國家去買，也要取得美國的同意。因為一切的生產品和工具，都被美國托辣斯所控制，它不僅控制了美國，也控制了歐洲。

我們人民並不需要的東西，一方面利用國民黨反動派和官僚資本所謂“合法”的輸入進口，一面又配備沖鋒槍武裝走私，就是這樣，弄得美貨遍地，弄得國內民族工業不得喘氣。

葉元龍（面粉業）：我們面粉工業迄今已有五十年的歷史，過去規模小，現在已經擴大。特別是上海的面粉工業，在遠東也是設備最優良的。可是，解放前，上海面粉工業，原料卻用美國的麥子，這並不是我國沒有麥子，而只是美國不單在工業上的一般侵略，而且還在農業上進行侵略，使我國廣大農村出產的麥子，不能直接用來製造面粉。

柴漱仁（面粉業）：解放前，上海的面粉工業要靠美國的麥子作原料，這是美國對我們進行經濟侵略的結果。現在，在新中國人民政府領導下，上海各家面粉廠都能開工，原料都用國產麥子。而且不僅在原料上我們能夠自己供給，就是製造面粉的機器，我們也能製造。我們已將依賴性變為創造性。我們絕對能自力更生。美國對我國想再進行侵略，是不可能了。

王子建（棉紡業）：棉紡工業最受美帝侵略影響的，雖說在於原料不在於成品，但美帝也並未放鬆了我們。1905年以前，美國絨布曾

來華傾銷，1905年前後，美帝在舊金山虐待我華僑，我國第一次對美施行“杯葛”運動，才把美布抵制出去。抗戰勝利以前，國內棉紡工業，一半屬於民族工業，一半屬於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企業。日帝在我国的侵略地盤，是排擠了英美帝國主義勢力，經過了國際間一番鬥爭而奪到的，並非美帝甘心放棄中國的紗布市場。第二次大戰以後，美國剛從戰時生產轉過來，還沒有傾銷棉織品的力量，其後平時生產逐漸恢復，紗布就有了剩餘，馬上運到殖民地那裏去傾銷。我國棉製品，向有相當數量運銷南洋一帶。1946年起，美帝開始注意南洋市場，利用日本殘餘的300多萬紗錠及美製棉織品運往競售。1947年起，我國棉布運往菲律賓，開始受到限制。我國其餘棉製品如手帕、毛巾等，運銷南洋市場亦相當多，原料都是棉紗，運銷受到限制後，棉紡業間接亦受到影響。解放前，本市已有美帝製紡織品出現，價錢不比中國貨貴。假如解放遲一些，國內紡織工業恐亦難免受到摧殘。

歐戰以前，國內用的棉紗大多是粗支紗，平均不到16支，隨着生活水準的提高，細布需要增加。自後，美棉進口就多起來，所幸農業方面的努力，在中國移植美國棉種，國產細絨代替了美棉。到抗戰前（1936年國產棉達1,500多萬担），國棉已足夠供應國內紡織之用。抗戰結束後，官僚資本與美帝勾結，訂定低匯率，美棉大量進口，使抗戰時荒廢的棉田，無法恢復。那時紗廠是得到“好處”的，原棉便宜，棉紗賣好價錢，大家說是“黃金時代”。現在知道是服了一帖毒藥。國家外匯糊里糊塗的用光，就中外棉占到進口總值的3/4。1947年起，一方面中國棉產得不到鼓勵，一方面要買外棉結不到官匯，棉紡生產開始受到限制。在“救濟棉”“美援棉”等名義下維持生產。1947至48年，就原料供應言，是棉紡業非常困難的時期，1949上半年為尤甚。

何致廣（棉紡業）：過去我們不注意，認為紡織業與美帝經濟侵略沒有什麼大關係，其實成品方面，二十年前美帝絨布在中國銷路很大，抗戰後很高貴的卡其等棉織品，在上海銷售也不少。美帝的闊幅被單價錢便宜，如果解放再遲一些，本市被單織造業將受到美貨傾銷的嚴重影響。在原料方面，更加使人痛心，美帝輸出的原棉，都是自

己国内所不要的，美棉运到我們厂里拆开一看，顏色应当是白的，可是已經变成灰色，不是屑子太多，就是絲毛参差不匀；定購32支用棉应当是29/32吋，但他給我們的是7/8吋。美帝表面上是供应，骨子里是侵略。棉紡厂用的机器油、皮帶等，大多数亦系美貨。美帝用尽方法，使我国工业依賴他們，使我国沒有机会从事改良創造。

浦慕岐(針織业)：美国以我們不需要的貨物，傾銷我国市場，这不是商业行为，而是經濟侵略。美帝及其帮凶，对于我国禁止进口的物品，例如尼隆絲袜，則利用軍艦及空中强盜，公然走私，或由普通走私商勾結不法关員偷运进口。在抗战胜利以前，本市絲袜厂有240余家，工人5,000多人。近郊农民利用农隙加工代制者，亦有1,000多人，月产絲袜共計十万打左右，产销平衡。抗战胜利后，本业慘遭摧殘，直到現在，同业只剩68家，职工1,000多人，月产絲袜一万多打，仍銷不完，即有9/10被淘汰了，只剩下1/10的产销来支撑殘局。本业非但原料(厂絲)可以自給，而且机械器材本国都可供应，所以我們民族絲袜工业的出品，是道地十足的国貨。尼隆絲袜是我們的死敌，我們坚决反对它侵入我国的市場。

黄祖堯(卷烟业)：大批美帝軍用“吉士”、“乐更”、“馬力斯”香烟涌到上海，开始于1945年底，不久以后，貨色愈来愈多，几乎独占丁上海的卷烟市場，我卷烟工业受打击很大。当时我們深恐美烟銷入内地，乃努力邀集同业开拓内地市場，由于工农大众的拒吸美烟，民族卷烟工业才維持了一定的生产。

沈星德(卷烟业)：沒有美帝的原料进口，卷烟工业是可以生产的，国内鳳阳、青州、許昌、簡阳、貴定、昆明，均产很好的熏烟。更以中央农林部的正确領導，今年烟田即可增植250万亩。而所需紙張，国内造紙工业亦可全部供应。因此，美国原料不进口，不仅对卷烟工业生产沒有影响，而且对其他有关工业的发展，反而有帮助。

經叔平(卷烟业)：說起卷烟工业所受美帝国主义的摧殘，就想起屋子里关了一只大老虎——英美烟公司。同时，也必須認清楚：中国的卷烟工业，是在中国人民和帝国主义斗争的夾縫中生長起来的，

以华成烟公司來說，就在五卅中国人民反帝运动中成長和壯大的。

中国的卷烟业虽然有了发展，但英美烟公司却用种种卑鄙无耻的手段，打击民族卷烟工业，最显著的例子，就是大量收买中国人民生产的卷烟，等到发了霉，又贬价抛出，用人为的手段，破坏中国烟厂的信誉。

抗日战争結束以后，大量美烟进口不算，接着，又是大批原料，打击了卷烟工业的生产，也損害了辛勤的耕种烟农。就是这样，逼得中国的工业在当时必須依賴帝国主义的原料。同时，英美烟公司又与伪云南省政府合作，种植烟叶。当时全国卷烟工业虽群起抗議，但反动政权置之不理。

1946年烟叶进口的外汇第一季是1,500万美元，第二季是800万美元，第三季是500万美元，都由以揚子公司为首的官僚資本，委托上海洋行轉手后再卖给卷烟厂，从中获得暴利。卷烟工业者群起反对，伪政府当局見众怒难犯，才由伪輸管会实施所謂外汇定額分配，由厂商直接定货。这一种方式实施以后，我們发现过去1,500万美元的原料，只要400万美元就可买到了。从这里，又可以看出官僚資本所以要和帝国主义勾結的原因。

尽管外汇耗光，所謂救济物資中又有大量烟叶运来。再从馬歇尔計劃来看，自1948年4月至1950年5月，要运卸烟草2亿4千万美元（約24万吨），其中55%輸往英国，15%輸往西德，而对西欧各国迫切需要的建筑、采矿、金屬品設備，在馬歇尔計劃中仅168,000,000万美元。相形之下，可見美帝面目之一斑。

李伯龙（乳品业）：牛乳业八十多年来，和中国的整个民族工业一样，是在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危害下生長起来的。最初受着租界势力的高压管制，抗战期間，經受日本帝国主义的限价搜刮，牛乳价格几乎和豆浆差不多，逼得同业紛紛走上“杀牛养牛”的道路。等待天亮，但是，天亮了怎么样呢？跟着胜利和美帝国主义的兵艦、刺刀一齐涌进来的，是大量的奶粉、淡奶、煉乳……街头到处是牛奶攤，奶粉的价格比我們的牛奶还便宜，牛乳业从此遭遇了比过去日本帝国主义所

給与的更甚的危害和困难，来了比日本帝国主义更凶的敌人。营业惨落，紛紛杀牛关場，全市甲級牛奶場30多家，立刻关闭了仅剩十几家。同业数度向国民党反动政府請願，要求限制美帝乳品进口，但是无耻的反动官吏却說：“美国奶粉真比你們牛奶好，你們还是杀了牛关掉吧！”美帝不仅大量把乳品向我国傾銷，并且盗用“帮助中国改良乳牛品种”的假面具，通过“善后救济总署”运进来美国乳牛近一万头，說是配給“政府机关和慈善团体”，但是这些乳牛却落到了宋美龄、黄郛妻子……之流的手里，馬上升起牛奶棚，与民爭利了。美帝国主义更进一步的勾結中国官僚資本，进行杀害中国的民族工业，同业曾发动牽牛游行請願，但是这計劃当时被反动当局所阻止了。

牛乳业在食品工业中，原是很小的一环，但对民族健康关系极大，八十年来同业奋斗的基础原很薄弱，再經美帝国主义的摧殘，就一蹶不振。据所得資料：在抗战胜利后，美国新聞处曾对我国牛产及牛乳业經營作了全面調查，它們是有更大野心的。从我国各大牛乳业全面遭受摧殘上，就更可說明了这一点，北京牛乳业原有兩千头乳牛，美貨傾銷后，杀了一半；青島原有1,000头，杀了仅剩1/10，美帝独占資本家們想把全中国作为他們榨取的市場。

陈敦川(乳品业)：中国的牛乳事业，除了东北、西北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和即將全部解放了的西藏，比較稍有不完整的基础外，在上海及其他各地虽說已經有了数十年的历史，但遭受帝国主义的摧殘，一直是在萌芽时期，非常脆弱，談不上对民族健康有什么重大的貢獻。美帝国主义的牛奶集团、独占資本家們就看准了这个时机，通过中国的官僚买辦階級要把中国作为他們的独占市場，进行經濟的榨取和侵略，在抗战胜利后，宝登公司的克宁奶粉，康乃新公司的淡奶……大量的流向中国的市場。剛始萌芽的中国牛乳事业，遭受了惨重的打击和損害。

受摧殘最重的特别是上海的牛乳业，鈣奶生厂、福嬰奶粉厂、福民奶粉厂、上海奶品厂，和許多的牧場不是把机器当作爛鉄卖出，就是杀牛减产。未关門的也是苟延殘喘。我个人服务的重庆牛奶場，

远在中国的内地重庆，也遭遇了同样的危害和困难。结果牛只卖去了3/4，产量减少了1/3，在1946年一度几乎倒閉，直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复原。

刘仁初（乳品业）：“美国制”奶粉、淡粉之类的制品，傾銷到那里，那里的牛乳工业就遭了殃。刚才李伯龙先生和陈敦川先生所举上海、北京、青島、重庆等地，不过是其中的几个例子。实际上，美帝国主义通过中国的官僚資本，是把制品傾銷到全中国的，他們的独占資本家的野心，是想摧殘了全中国的牛奶业，把全中国作为它的独占市場，这侵略是全面的，有計劃的，这是我們深刻警惕和不能忘記的。

向宏昌（罐頭业）：罐頭食品是美帝向我国傾銷的主要商品之一，是以所謂“救济”和走私的方式傾銷到我国来的。我国罐頭食品因此受到很大打击。为什么美帝要把这些商品大量輸出呢？原因是美帝国内的壟断資本家唯利是图，不仅在二次大战中，而且在大战以后，拚命制造。美帝所制的罐頭食品，分軍用与普通的两种。軍用的品质恶劣，损坏又多，美帝就放寬了輸出管理上的限制，讓这类商品大量的以剩余物資名义輸出，以获得暴利。在这种情形下，我国罐頭食品工业被迫破产的也有，停工的也有。

乐輔成（罐頭业）：1945年抗战結束，国产罐頭食品厂，經過日寇傾銷压迫后，正待恢复元气整頓内部，重振旗鼓的时候，不料美国貨罐頭食品用軍艦載之而来，不經关税，泛濫傾銷，主要为奶粉、奶品、肉食、水果、以及餅干糖果。当时国貨罐頭工厂，既无相当保障，只有团结国貨团体，展开国貨展覽大会运动，作消极性的对抗。同时官僚資本更推波助瀾，瘋狂地販賣美貨罐頭（如罐頭美貨鹹牛肉較廉于国貨鳳尾魚1/2，因国貨罐鐵原料須依賴外貨），国貨罐頭工业，既受美貨重大打击，再經当时通貨惡性膨脹，及搶購物資种种压害，因此元气喪尽。（書面意見）

黃佳秋（輪船业）：剛剛各位先生都講得很清楚，美帝对中国的侵略是比其他任何帝国主义狡猾得多。如对我们所需要的机器五金則扼住了，不給我們；对于我們的輕工业，則用打击的手段来使我們

无法抬头；而消费品则大量倾销到我们国内来。通过了城市来剥削农村，来抑制民族工商业。

輪船业所吃的苦头往往是牽連到其他工业的。胜利后，美帝借口运输救济品而伸进我们每一条内河，独占了我们的内河航行权，直接影响了我们輪船业的营业，使我们无法维持下去。就以他们卖给我们的船只說罢，十之八九是登陆艇之类的东西，多数是他们的汽车厂在战时改装起来的，有些船的載重为2千吨，但是裝着的引擎只有1,800匹馬力，有的載重只有4百吨的，却裝有3,600匹馬力的引擎。这就是說这些船是完全不适用于普通航运的。而且引擎的構造和配件都很特別，弄得你非依賴他们不可。国民党在临逃时又掠去了一批，因此一直到現在，还存在着一些困难。今年丰收后，貨运繁忙起来了，工具就感到缺乏，特别是油源缺乏，影响到我们的营业。美帝这种遺留给我们的隱痛，我們將永远不会忘記。我們要自己建設起自己的輪船业，来反抗美帝，不許它再来侵犯我们的航运权。

主人：今天听了各位先生的高論，非常欽佩。根据各位的高論，可以归納出四点大家一致的意見：

(一)过去美貨在国内市場的泛濫傾銷，得到好处的只有美国的独占資本与我国的官僚資本，对一般民族工业都是严重的摧殘；虽有个別行业，因廉價原料的輸入，一度获得些微好处，但这种好处不啻是糖衣里的砒霜，棉花里的尖刀，結果还是得不偿失的。

(二)解放后一年的經驗，証明民族工业，不論原料与技术，都沒有依賴帝国主义国家的必要，民族工业者是可以自力更生的。

(三)民族工业自力更生的有利条件，是在人民政府的正确領導与国营經濟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因此，民族工业者必需紧紧地团结在人民政府的周圍，服从国营經濟的領導，努力生产，发揚光大这自力更生的有利条件。

(四)美帝是民族工业的死对头，現在美帝以朝鮮为桥梁，企图卷土重来，再度对我民族工业实施侵略。我們为了爭取生存，要勇敢地参加抗美援朝。

这四点結論，是否可以代表諸位一致的意見，还請不吝指教！末了，我代表新聞日报及几十万讀者，对各位的光臨指教，表示感謝，招待不周，敬請原諒！

（記錄未經发言人过目，如有錯誤，由記者負責。）

（摘自1950年11月20日上海新聞日报。）

（2）天津工商界對美帝國主義摧殘的慘痛回忆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民族工商业家回忆过去半殖民的情景，是一把血泪。我們記得很清楚，六年前在天津买一个茶杯或一件小玩具，背面都有“Made in Japan”的字样，国貨呢？被排挤，被压倒，不能自立。抗战胜利后，“Made in U S A”代替了“Made in Japan”，什么“商約”、“救济”、“剩余物資”通过反动的国民党政府，象血腥的魔手，伸向中国施展經濟侵略。兩三年之間，中国人民誰不認識U·S·A三个字，美貨攤販占領了天津的大街小巷，商店摆着各式各样的玻璃絲袜、玻璃牙刷、玻璃腰帶、克力姆奶粉、花草煉乳、紅光香烟，甚而微至釣魚鈎、扑克牌、乳罩、火柴、大便紙等。美国貨淹沒了我們国貨市場，我們的民族工商业，严重地被打击了，普遍被摧殘得走上停工歇业的死亡道路。

解放以前，买一桶美国奶粉或煉乳，多么輕而易举。就在美国奶粉煉乳充斥市場的时候，天津的牧場奶品商业被挤垮，2,200头奶牛，兩年的封間內，連杀帶卖剩了800头左右。奶由每天产4万磅减至六七千磅。自己的牛奶沒有人要，家家牧場把剩余的奶倒入水溝。1946年底，40几家牧場想掙扎，联合經營天津牧場业奶品制造厂，利用卖不出的奶制成童牛牌奶粉，結果还是被美貨压得喘不过气来，賠累不堪，又停工了一年。牛奶煉制工业遭受同样的命运，比較显著的隆瑞兴工厂出产的百鵠牌奶粉，抗不过市面上的“白罐”（美国軍用），由减产几乎停工。今年春天以后，美国奶逐漸絕迹，隆瑞兴200箱（每箱24小桶）百鵠牌奶粉存貨一下售出，市面供不应求。在本月20日，記者訪問該厂的时候，各处打电话要貨，百貨公司要50箱，不敢答应，

最后决定25日交30箱。过去是无销路，现在感到牧场的奶供应不足了。牛奶煉制工业公会主委朱吏堂說：“希望政府多养牛。”牧场奶牛已經由800头增到910头；石氏牧场今年7月到青島买来十头牛，其他各场也都添了新牛。买牛想起了杀牛的情景，多么痛心，誰逼得我們杀了牛？美帝。有人說咱們奶粉不好，那么請相信几位牧场与粉厂經理說的話：“只要我們能发展，我們就可以改良制成更好的奶粉。”

美国的“剩余物資”涌进中国，很脆弱的天津电工器材工业一蹶不振，美帝掌握了国民党“建設工作”。华北著名的中天电机厂出产的電話机找不到銷路，該厂經理王汰甄几次去見伪交通部次長譚伯羽，一見面就說：“沒有买卖。”那时候中天每月产量平均最多3百部，而且都是投机倒把者买去，“国家建設”有美国貨。解放后，去年一年中天生产5,000部，今年1至10月已經生产8,000部，估計到年底可生产12,000至15,000部，創造了建厂以来19年的最高生产記錄。王汰甄經理說：“美帝又要向中国伸手！要打回去，它想侵略中国，就等于侵略中天，”过去电工器材原料缺乏，但是不一定要死賴美国貨。我們东北已經能制造磁石鋼、磷石皮、絕緣的密腊布，电木粉也开始試做。只有粉碎美帝侵略，和平才有保障，我們才能慢慢的建設起来。

胜利以后不到一年，美国的熟皮随着美帝的經濟侵略大量的廉價向天津市場傾銷，比天津国产品便宜約1/5。私營最大的华北制革公司原来日产一百張牛皮，減至日产三、五張，而这可憐的数目銷售还很吃力。1947年，由上海进口的美国原料皮达28万公斤，重革99万公斤，輕革20余万公斤，皮鞋68,000双。估計此数的1/3涌进天津，天津制革业被压迫的无法生存，联名向伪社会局呼吁禁止美皮进口，伪政府只是下了一道公文，而美皮照样走私进来。据估計，当时天津300家私營制革厂，日产100至150張牛皮（包括底皮与面皮），比照生产能力少10倍。現在已經恢复到日产300張牛皮，比国民党“亲美”的时候增加了一倍。制革业工业公会副主委李威儀說：“制革工业正在欣欣向荣，我們會員在反美援朝大会上决心增加生产，供应軍用皮革，把美帝的侵略粉碎。”

新葯制造工业的基础也是很薄弱的，制点阿斯匹灵葯片，卖不过美国司奎宝厂的出品。美国制葯原料大量廉价到了天津市場，天津各制葯厂从来不敢想自己也做原料，只好利用美国貨做成葯品，这样大大的妨碍了我們自己制葯的工业发展。解放以前，自己出产的葯品約100种左右，銷路滯塞。較有規模的东亚企业公司的化学厂，就是在成本高与滯銷的压迫下，在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停了工。解放后，政府限制了美国制葯原料的进口，天津制葯业 50 % 的原料利用了国貨，葯品由 100 余种增到300多种。很显然的說明了沒有帝国主义的經濟侵略，我們一切工业都会有很順利发展的机会。

帝国主义对天津經濟侵略的主要一环是金融业，它們站在本国对华政策的前面，甚而支配本国对华的政策，擴張他們商品的銷路。以天津外汇业务來說，1948年，6 家外商銀行占外汇总业务量55%以上，而华商（包括伪中国、交通、农工三行在內）不足45%。这 6 家外商指定銀行之中，就有美帝的花旗銀行与大通銀行，这两家銀行是美帝对天津經濟侵略的主力。它們的气焰万丈，大通銀行是伪中央銀行国外部的代理行，操縱汇价，不服从中国“法令”，国民党反动派連問也不敢問。解放后，花旗銀行自动的滾了蛋，大通銀行拒絕驗資，也請它滾了蛋。現在我們坚决执行了“独立自主、保护生产”的外汇政策，扭轉了半殖民的經濟形勢。天津全部外汇，中国銀行已經占第一位，华商銀行占第二位，外商銀行奉陪末席。單以天津金城銀行来看，解放以前，平均每月外汇业务量不过20万美元，今年1至10月已經达到349万美元。这是我們独立自主以后的显著成績，表現了自己的力量。帝国主义想利用金融机構暗中吸吮中国人的血汗是不可能了，要留在中国，就乖乖的服从中国的法令。

零碎的訪問了几个行业，各位民族工商业都是痛心的回忆：誰是冤家？誰是对头？以上事实給我們作了解答。痛苦的經歷，刻划了不可消磨的印象。提高警惕：仇視美帝，它就是我們的最大敌人。（高峰：“誰是冤家，誰是对头——天津工商界对美帝的惨痛回忆”）

（1950年11月22日天津进步日报。）

(3) 美貨傾銷的一頁舊賬

解放前，在國民黨反動派統治的整個時期，美帝對華南的經濟侵略是瘋狂的，單說美帝廉價的商品傾銷，就曾經使華南的工商業瀕於破產。我們永遠忘不了充斥廣州市場的美國貨物，象玻璃褲帶、玻璃雨衣、尼龍絲襪、尼龍牙刷、金山蘋果、金山橙、罐頭牛奶和奶粉、“杜魯門”、“車利士”、“好彩”等牌子的香煙，各種罐頭食物和化粧品……這些美國貨曾扼殺了我們民族工業產品，吸盡了人民的膏血，加上通貨惡性膨脹，官僚資本對民族工商業的迫害，以1947年而言，廣東工廠的倒閉就已在80%以上，商業也陷於極度的衰頹。

受害最烈的工業，如卷煙、化粧品、牙刷、電池等，甚至土產水果，都差不多因為美帝的商品廉價傾銷所擠倒了，這一頁民族工商業受摧殘的血淚史，我們無論如何也不能忘記！

就以卷煙業而言，1947年2月，那時美國香煙如“杜魯門”“車利士”等每包不過賣偽幣400元到450元，而土製香煙如金馬、飛輪等牌子每包賣價亦在350元至400元左右，土煙怎樣能與之競爭呢？卷煙廠家滿以為抗日戰爭結束，卷煙業是可以大大發展，誰知美國煙大批泛濫市場，給他們極大的打擊，好些煙廠停工倒閉了。當時充斥市場的美國煙，大部分又是走私進來的，並且大多數是國民黨匪軍勾結海關稅局集體武裝走私，低價在市面銷售。本市光中煙廠經理陸汝義談起當時的情形，用悲憤的語調對記者說：“當時我們曾要求反動政府查緝私貨，但國民黨稅局和海關互相推諉，置之不理，深怕得罪了美帝。後來，在廠商指責下，只勉強抽拍蒼蠅，卻不敢打老虎，只在市面捕捉販賣美國煙的小販，根本解決不了問題。”據陸經理表示：那時候外國香煙流銷廣州最多時佔總銷量70%以上，其中美國香煙佔多數，國產香煙每月銷不到1千箱，只及解放後銷量1/10，光中煙廠最少時銷貨量不到一百箱，幾乎陷於倒閉。他說：永遠忘不了美帝對我們瘋狂的經濟侵略，並且決不能容許它再來一次！

化粧品工業也受到美國貨傾銷的摧殘，抗日戰爭結束後，美帝化

粧品排山倒海涌來，牙膏、香水、面粉……等充斥市場，使廣州的國產化粧品大受打擊，一家老字號的粉庄攔着自己出品的“斑粉”、胭脂無人過問，飾櫃里也擺滿了美國“蜜絲佛陀”和“荷里活”化粧品。據製造雙妹嘜花露水、雪花膏、頭脂、爽身粉等化粧品的廣生行嚴昭廷表示：廣生行設立到現在已60多年，相繼遭受日寇美帝侵略，該行本市四家行號全受損毀，幾瀕於破產，使廣生行元氣損失了7/10左右。嚴昭廷說：“最忘不了美帝的林文烟花露水，解放前多年來一直侵銷市場，使我國產品備受摧殘。現在化粧品工業在人民政府扶助下，禁絕外來貨品，正走上發展道路的時候，美帝又悍然侵朝，危害我國安全，如果容許美帝侵略魔手伸進來，我國工業就要垮台了。”

本市的製造牙刷工業，幾十年來的產品都是輸出港澳、南洋一帶，甚至遠銷至歐洲荷蘭，平均每年輸出生產總量60%。二次世界大戰後不到一年，由於美制尼龍牙刷的洶湧傾銷，占去了國外銷場9/10，再由於國民黨的反動統治，美制牙刷向國內大量侵銷，國內銷場又陸續被占奪，到1948至1949年秋天，達到了最嚴重的階段。那時德星路的洋雜批發商，每天銷出美制牙刷達3萬支，土制牙刷僅2萬餘支，窒息了本市30餘家牙刷廠商的產銷，使千餘製造牙刷的工人時作時輟，在飢寒交迫中過日子，一些較大的廠家如廣成廠、陳海記、何成記、永榮廠等都被迫減產，勉強支持，營業每況愈下，廣成廠經不起摧殘，一直萎縮下去，終陷於全部停工。時至今日，牙刷工業才得到復蘇的機會，但由於美制牙刷的舊存貨，還占了部分銷場，余患未清，尚要經過相當時期，才能恢復當年的興盛狀態，這是美帝摧殘本市牙刷工業的一筆慘痛的舊帳。

抗日戰爭結束後，美國水果如金山橙、蘋果等也泛濫市場，1947年1月，金山橙每枚僅售300元，使長堤及一德路果販大叫：“金山橙平過桔”。民間年晚“謝灶”，本來都用桔仔供奉，取吉祥之意，那時因為金山橙已取桔仔地位而代之，買金山橙比買桔仔便宜，於是連“謝灶”的人也用金山橙供奉了。據果販追述美國水果沖銷的可怕情形：當時美帝蘋果、金山橙如潮涌進，連家鄉的果農都遭受到打擊。美帝果

品未侵銷時，家鄉花地楊桃一斤可換白米二斤，白欖百枚換二斤，龙眼可換二斤半至三斤半，但美帝果品一侵占后即遭受影响，价格低廉，白欖百枚只可換半斤米，一斤楊桃也換不得一斤米，这一切的灾难，是全华南人民所时刻不忘的，現在，华南人民都很清楚，祇有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才能防止灾难的再度来临。

(1950年11月19日广州南方日报。)

(4) 渝工商界控訴美帝國主義摧殘我民族工業

重庆市工商业界控訴美国經濟侵略对我民族工商业的摧殘。

据統計，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一年內，重庆中、小工厂倒閉了80%，重庆工业协会所屬工厂停工者达2/3。抗战时由南京、上海等地迁来四川的390家工厂，仅剩下20家。渝鑫鋼鐵厂經理李志亲提到那时鋼鐵业紛紛关厂停工的情况时激憤地說：“美制鋼板、角鉄等源源涌来，而那时的国民党反动卖国政府却发出‘西南工业落后，不堪扶植’的論調，把我們一脚踢开。各厂的訂貨都全部解除，使得重庆四百余家鋼鐵机器业除了几家官办的軍火工业外，几乎全部垮台。規模較大的渝鑫鋼鐵厂、中国制鋼公司、中国兴业公司等，都先后减产或关闭。”重庆牛奶場經理陈叔敬說：“当时重庆的奶粉市場为美制克宁奶粉所独占，使重庆牛奶业2/3的出产卖不出去，大家只有宰杀奶牛卖牛皮度日，只我一家先后就杀了40多头。”

由于美国的經濟侵略，各种小型工业及手工业受害最深。重庆市制革业467家，在抗战胜利后就倒閉了337家。牙刷业同业公会理事長叙述該业当时的情况：美制玻璃牙刷象潮水一样地涌来，迫使我們由月产7万打降至8千打。当时我們曾向国民党政府主管部門請求救济，得到的回答却是：“早关门也好，免得将来麻煩。”

美国的傾銷政策是无微不至的，如傾銷紙張，不仅有大量的道林紙、打字紙、拷貝紙，而且連手紙也都运来了。西南几家較大的紙厂，如成都的建国紙厂，重庆的华倫紙厂和溥泉造紙厂等，都是这时倒閉的。溥泉造紙厂經理汪溥泉講述他的紙厂被迫停工的經過称：溥

泉紙厂的卷烟紙曾經暢銷西南，在被美貨侵占了市場以后，我們又把貨物運到西北，但不久美貨又跟踪而至，最后只好停工。

其他如針織、卷烟等業，也紛紛控訴由于美貨控制市場而遭到的破產倒閉的災難。

重慶市工商業界在对美國經濟侵略的控訴中提到：还在抗戰時期，美國就開始打擊大後方的工商業。那時在賣國的國民黨政府內，成立了以美國人納爾遜為顧問的“戰時生產局”，實際上，這個所謂生產局，就是美國絞殺我國民族工商業的罪惡機構。許多工商業家們表示：中國的工商業界不應該忘記這些慘痛的經歷和教訓，應該以實際行動堅決對美帝國主義進行鬥爭。全市工商業界現正以行業為單位舉行抗美援朝座談會，進行時事學習，並簽訂愛國公約。

(1950年11月24日新華社重慶電)

(5) 民族工業的嚴重危機

一年來，據不完全統計，在全國工業中心的上海，大小民營工廠原有3,419家，早在7月份，即倒閉75%共2,597家；武漢工廠，加入工協湖北分會93家中，在7月間，即已倒閉1/2；昆明工廠停歇者，已達半數；重慶大小工廠倒閉亦達1,400家為全數80%以上；成都土產工廠停工90%；在華北，天津小型工廠紛紛倒閉，連第一流的大工廠如永利、久大等，也均在風雨飄搖之中；而青島除官僚資本之中紡所屬各廠外，所有民營工業幾全破產。

棉紡織業 以各業分類來看，輕工業中的棉紡織業，上海棉織各工廠，停工倒閉者，幾達1/2，共1,135家；四川全省土布織戶2萬余家，4/5關門，成都的紡織廠，剩下的只有12%。毛織業主要在華西，78家工廠，只剩下6家開工，尚不及原來的1/10。其中尤以卷烟工業為最，成都烟廠幾完全倒閉，廣州韶關倒閉者亦達90%，河南許昌於8月底1次即關門20多家。他如西藥、造紙、制絲……等業，也無一不陷於歇業減產的厄運之中。

化學工業 化學工業方面，全國聞名的天津永利公司，產量僅及

过去的5%，且已无法维持下去。上海的化学工厂，半数以上陷于停顿状态，其中20几家电化工厂，包括规模较大的天星、天泰、怡丰、中国电化等厂，早已全部停工；再如火柴原料工业，如著名的中国火柴原料公司，战时供给西南各省火柴厂原料，现该公司已先后裁撤贵阳、昆明两大厂，仅余长寿厂，以少量生产勉强维持。上海的火柴原料工厂，已有20余家停工或改业，即规模最大的上海火柴原料厂也包括在内。火柴厂中，小型厂倒闭时有所闻，最负盛名的大中华火柴厂，制造和营业仅及战前6/10。其他如酒精、玻璃等化学工业，也同样大批倒闭，甚至洋燭业因原料白腊市价高于洋燭，竟将洋燭化成白腊出售。

水泥工业 再其次，在重工业中水泥工业全国规模较大、设备完善者，共有6家，现已有1/2计五洲、天祥、上海等3家先后歇业，仅剩启新、中国、华新等3家勉强开工，其中启新产量已减少2/3，还负债20万万元以上。

钢铁工业 钢铁业：四川最大之重庆炼钢厂和威远铁厂均先后歇业。煤矿业在四川240家中，已有180家（占总数3/4）倒闭；而机器业，在重庆区，已有90%歇业。

危机原因 造成工业危机的原因，总括有：（1）美帝国主义对我之经济侵略，以大量美货来华倾销。因关税低和走私漏税，售价常低于国货数倍，民营工厂难与竞争，这是目前最主要的因素。（2）内战日益扩大，不仅交通受阻，原料产品均无法流通，且物价日涨，成本日增，另一方面人民购买力却急趋下降；（3）官僚资本垄断，如中纺握有全国80%以上的纱锭，任意抬高纱价，压榨民营棉织业；（4）苛杂繁重，单是棉花织成布，即要经过17道税；（5）高利贷盘剥；（6）因工业不振而受影响，如煤铁机器等。一般工业界均认为主要癥结在于蒋介石统治集团的卖国内战政策。

（“蒋区民族工业的大危机”，1946年10月18日延安解放日报）

工业十分之八瓦解，失业人数与日俱增 这一年来在蒋介石的统治区，不但没有甚么“工业化”，而且连原有的一点民族工业，也陷

于总破产的边沿。在大后方，原有的工业体系，“是80%的瓦解了”（見9月12日上海經濟周刊吳承禧氏論文）。在所謂“收復區”，以上海為例，該地“原有民營工廠3,419家，倒閉了2,597家，占全數75%；原有國營工廠636家，已倒閉566家，占89%；民營國營合計原有4,055家，已倒閉3,160家，占78%”。（重慶新華日報）成千累萬的老百姓陷于飢餓失業的絕路。失業人數，據公開報紙的記載：北平是79萬人，約占全市人口50%；青島、濟南、南京失業人口在1/3以上；上海失業和無業的人口亦超過4/10，其中原來的產業工人失業者占30萬，超過上海原有80萬產業工人的1/3。

美貨與資本侵略為工業危機主因 事實完全証明了：蔣介石不但永遠沒有力量解決中國工業化這一種大的歷史課題，而且即欲維持僅有的一點民族工業亦不可得。在蔣介石的統治下，民族工業只有死路一條。為什麼目前民族工業會陷于如此劇烈的危機？

造成這一危機的主要癥結，就是美國帝國主義商品和資本的侵略。抗戰勝利以後，廉價的美國貨滾滾侵入我國，形成了淹沒我國民族工業的“國際狂流”（上海染織業家潘士浩語）由於美貨的成本價格低於我國產品數倍，因此民族工業紛紛倒台，只要有什麼樣的美貨進口，什麼樣的工業部門就必然立刻垮下去。比如美國水泥在上海的售價每包法幣僅7千餘元，國產水泥每包單成本就要14,000元，以每包8千元的低價願本出售仍賣不出，上海的水泥廠隨即完全垮台。又如廉價的美國香煙傾銷各地的結果：上海、南京、廣州、韶關、重慶、成都、天津等地大部分卷煙工廠均已倒歇。另一方面，美國壟斷資本已開始在我國海陸空交通事業和五金、石油、電氣等工業中直接投資或設廠，將更迫我民族工業于完全死亡。

目前民族工業危機較35年尤為嚴重 猶憶1935—1937年日貨傾銷與走私的結果，曾造成中國民族工業的大危機，但一年來美國侵略所造成的中國工業危機，較之當時還要嚴重得多。比如上海在抗戰前一年（1936年6月到次年5月）也即日寇政治經濟侵略最烈的一年，各種工廠之倒歇者尚僅111家，而且同年新開設的工廠還有49家；但抗

战胜利以后一年来上海工厂却倒閉了3,160家，至于新開設的工厂則絕无仅有。美国侵略对中国民族工业的威胁之所以更甚于日本，不仅因为美国較之日本有更高的工业技术与更大的經濟侵略力量，而且最主要的是因为：当时日本的“中日經濟提携”計劃因遇到中国人民的抵抗，还没有圓滿实现，但现在美帝国主义却得到蔣介石国民党的完全的“合作”。

蔣美沆瀣一气摧毀民族工業 一年来蔣介石官僚資本集团，为了获得超額的买办利潤，組織了揚子建业、長江、阜中、中国等壟断进出口貿易的大公司，来推銷美国貨，直接为美帝国主义的对华輸出商品服务。不但如此，蔣介石因为要倚賴美帝国主义的“援助”来进行內战，更不惜出卖海关、領海、內河与領空权，不惜頒布引进侵略資本的新公司法，完全摧毀了中国民族經濟的壁壘，完全置中国于美帝国主义的附庸地位。而且甚至发生了这样的怪事：中国本来能生产毛織品、棉布、棉花、水泥、皮革、酒精、蚕茧、煤炭等等，但蔣介石集团不要买这些“土貨”，却向美国及美国控制下的日本大量訂購，結果这些民族工业及工艺农业就垮台了。正如上海金融家張綱伯氏所說的，現在蔣介石官僚資本的真面目，就是“做帝国主义經濟侵略者的先鋒”。

（廖盖隆、黃荊：“当前民族工业的危机和出路”，
1946年10月20日延安解放日报）

在“国营”^①工业扩張和官僚資本壟断工业的情形之下，再加以通貨膨脹、物价不断高漲，35年美貨的大量傾銷，以及政府对工业管制愈来愈紧，对工业的扶助則愈来愈少，于是民营工业必然倒霉，而陷于九死一生之慘境了。

自34年8月中旬到35年5月的九个半月里，在重庆区登記的工厂1,800家中就有344家停业，占登記工厂总数的19%。到了35年的12月，情形更为凄慘，四川中小工业联合会原有會員1,200家，到12月关门者已达80%。工业协会重庆分会有會員470余家，停工者2/3。迁川

^① 国营內的引号是編者加的，下同。

工厂联合会原有会员390家只存100家，开工者只有20家，制革业原有432家，停工者200家，机器业原有372家，自动停业者141家，复员者49家，其余182家均在半生产状态中，金属冶炼业停工者2/3，停业者1/3，夹江造纸业全盛时有8,000家，只剩1,500家。

上海是抗战前全国工业的中心，战后依然是处于全国工业的领导地位，战前上海共有工厂5,525家，从敌人占领上海到投降为止，大小工厂合计约有4,111家（内日本工厂273家）。胜利以后据35年2月的调查，上海各工厂的开工率仅为平时的20%左右。

因为实施了国棉的收购，收购价格过低，棉花的生产从32年的295万市担减至34年的155万市担，减少了47.46%；因为实行以花易纱，工缴过低，机纱的产量从32年的12万件减至33年的6万件，减了一半。土纱产量亦从150万担减至60万担，减少了60%。机布由480万匹减至240万匹，减少50%，土布由1,200万匹减至500万匹，减少了58.33%。

进口限额分配忽视工业原料的重要，使若干工业不得不停工减产。例如橡胶工业原料全国月需3千吨，而输入的限额只有500吨，仅及需要的1/6。卷烟业所分配的原料限额只有800万美元，而英商颐中公司独占得其中的200万美元，使许多华商的卷烟业受到原料不足的影响而减产。

去年(1947)上海各棉纺织厂所利得税总额达800亿元，缴纳方法按纱锭计，每千锭4,000万元，20支纱每件的货物税36年9月为720,900元，12月增加至1,642,100元，占全部工缴17%。

政府的所谓生产贷款或工业贷款主要以“国营”事业或官僚资本所经营的企业为对象，而民营工厂则往往向隅，因此各厂的流动资金不得不向商业行庄甚至地下钱庄去通融而吃高额的利息。例如上海新大绸厂于35年3月时欠债仅1亿元，但至12月时已达16亿元，其中7、10、11三个月的利息负担竟达680,000,000元。

（摘自张西超：“中国工业现势”，新中华复刊第6卷第4期）

丙 各地厂礦停閉情况

(1) 重慶工礦業停閉情况

抗战以前，僻处边陲的西南，崇山峻嶺，政治扰攘，受着天然和人为的阻隔，丰富资源，深厚潜力，无从发挥，諾大的一片錦繡山河儼然一块处女地，八年来，在民族解放战争的自觉的热忱鼓舞下，全民团结抗战的偉大力量才突破了这天然人为的障碍，西南的资源开发了，也就在这基础上建树起战时的新兴工业，各业工厂在西南原野上如雨后春笋的茁長起来，虽然厂屋簡陋，机器设备陈旧，甚至似乎手工业式的生产还够不上称为现代化工业，但是，八年苦斗中的軍需民用都是靠这些工业生产供应的。就以重慶一地来说，据不完全的统计，織布业約产布 3 亿匹，制革业年产皮革 10 万張，煉油业月产汽柴油 600 吨，机油 4 万加侖，嘉陵江区 215 家煤业在 32 至 34 年产煤 224 万吨，其他各地厂矿的生产尙不止此数，象这些工业生产支持了八年抗战而卒获胜利，其贡献的偉大，論功行賞应不在三軍之下。

迨胜利驟临，工潮迭起，美貨涌进，艰苦支撑着抗战的西南工业，随着政治的暗流，經濟的买办政策而面临擱淺的厄运，烽火中茁長的西南工业底蓓蕾，在惨胜声中萎縮了，雕殘了，真令人有“鳥尽弓藏”之感。去年今日，100 多位厂家代表，冒着霏霏的細雨，鵠立于曾家岩行政院的草坪上，从日中守候至黄昏，請宋院長伸出救援的手，队伍里有五六十岁的長者，都为这气得老泪縱橫，可是沒有任何結果就黯然散去了。

二年来，西南工商实业界为拯救工业崩潰的危机，到处奔走呼吁救济，但終于挡不住美貨洶涌而来的狂潮，平息不了物价“工資”爭相激漲的滔天巨浪，更无力扭轉当局一錯再錯的买办經濟政策，乃至怵目惊心的政治的逆流，西南后方工厂紛紛的倒閉了，折迁了，即使是尙在勉力撑持，也是奄奄一息的。

关于西南工业雕殘的实况，根据各方的資料，截至去年 12 月底止，其统计数字如下：（編者按：这个数字是官方统计的数字，不够准

确,实际不止此数。)

川滇黔工厂变动统计(34年底止)

地 域	厂 数	资 本 额 (千元)	工 人 数
共 計	376	368,423	24,068
重 庆	217	173,369	13,528
四 川	105	131,880	8,629
西 康	4	850	142
云 南	19	42,950	806
貴 州	31	19,374	963

在上表发生变动的工厂数字里,有121家是歇业,77家改组,20家撤销,17家转让,36家迁移,18家更名,50家换经理,只有8家是增加资本的。其他20家是暂停相机复业。就以机器工业来说吧,第一区机器工业同业公会在胜利初期有345家会员工厂,但到今年8月止,仅存178家,勉力开工的仅占4.5%,暂停相机复业的占15%,其余全部停闭了,那少数勉力开工的厂并不是生产机器,而是在做修配零件和制造铁钉或承包小型的工程等等,都是混过日子而已。如重庆有名的中国兴业公司,37部工具母机全都停了,福裕钢铁厂只有7部机器在转动,12部停着。战时以承造衡阳大铁桥著名的新中工程公司,现在有48部母机停着,仅开工11部,锅炉四座也一开三停。恒顺机器厂也是略具规模的,它拥有各种刨床、车床、铣床等工具机50余部,而今只有1/3在开工。明亚实业公司机器厂只有6部工具机开工,有22部停着。民生机器厂算是西南唯一全部开工的厂,但工潮纷至沓来,效率低,成本高,连民生公司本身的船只也不愿给民生厂修理,已陷于不死不活的境地。再说钢铁工业更是一蹶不振,如最大的民营钢铁厂算是渝鑫钢铁厂和中国兴业公司炼钢厂了(按中国兴业公司是以孔祥熙经营为主的,属官僚资本,不能算“民营”——编者),但正如渝鑫厂的负责人余名钰所撰“后方钢铁工业的末日”文中所说欲罢不能,“其进退维谷不知所措者十居八九”。且目前钢铁根本就沒有销路,胡子昂一次在星五聚餐会上说:“现在想卖旧存的钢板来维持开支,可是沒有

人要，要想折价卖给政府，政府又不收，迫得每月借债度日”，上月19日何北衡在星五会上讲，修筑成渝铁路时候也说到：“目前后方厂家所产的钢铁，需成本180万元一吨，而外国钢铁，连运费关税计算在内，只需58万元一吨，差额几达3/4。故将来成渝铁路的钢轨和道钉是否在后方厂定做，还是一个問題。”后来有十几个厂家包围何厅长说：“如果连成渝铁路这些简单的钢轨道钉都不给我们做，那我们只好关门改行了”。照公布了的中美商约来看，我们已关税无防，门户大开了，我们的钢铁工业乃是所有各业的工业，怎能与金元美帝国的倾销独占政策抗衡？一定是难站得稳的。

（摘自黄克夫：“搁浅中的西南工业”，西南实业通讯14卷第5、6期1946年8月出版）

联合征信所渝讯：据经济部重庆工商辅导处经济调查所得资料，胜利后，本市工厂停业者达545家，碾米、土布两业尚不包括在内，统计停业工厂之类别如下：纸烟业131家，制革业125家，毛巾业111家，机器业61家，印刷业42家，针织业40家，肥皂业14家，制药业7家，酿酒业7家，电工器材业3家，缫丝业2家，面粉业1家，火柴业1家。

（1943年8月21日北京平明日报）

重庆工业雕弊的原因：据工业界的意见，首先认为政府的政策没有照顾到民族工业，因而外货倾销，特别是关税主持人任用外人，开放内河航行权，四口通商的拟定，工业界到处都在谈论，那种情绪大有谈虎色变之势，没有一个不感着自身的危险性。外国纸烟倾销重庆后，重庆自制的纸烟就无法销售，大感恐慌，纸烟厂80%倒闭。日用化粧品大量到了重庆，重庆的织布业、匹头商就无路可走；纷纷破产，最近玻璃丝绸类的货品，又有由上海倾销重庆，于是重庆的绸布业就大感恐慌。

一位机器厂的厂长批评政府缺点：国内可以自制的工业器材也求诸外国，他提出有力的证据，手上拿一个铁路钢轨上用的道钉，向大家说明，他说：“9月动工的成渝铁路全部器材都向法国买，连这个小小道钉都向法国买，成渝路修筑问题始终没有找民营厂家谈过。”

（彭陶：“窒息中的重庆工业”，1946年7月10日上海文汇报）

(2) 當年艱難辛苦而去，今日傾家蕩產而回

八年抗戰，前方之軍用器材與後方之民生日用品實以重慶各工廠為供給之源，誰也不能否認遷川各工廠無相當之貢獻，故各種事業因之有蓬蓬勃勃之表現，而戰事愈延長，政府之管制法規愈加嚴密，民間各工廠因資金不充及原料燃料缺乏之關係，而日趨衰頹，遂成艱難掙扎之局面，而改善無期，整個工業，竟致一蹶不振，世界大戰期間，各國之生產事業，無不因需求而日現繁榮，中國獨得其反，此中之盈虛消長，不難索得，雖勝利之前夕政府有設立戰時生產局之創舉，期以恢復各工廠製造之能力，然亦事與願違，未收效果。敵寇投降之後，政府取消定貨，各工廠乃一律關門，更留下一筆勝利後之工人遣散費，各廠家尚需變賣生產工具，了此債務，各遷川工廠可謂當年艱難辛苦而去，今日傾家蕩產而回，猶以中小工業廠家受創最甚，實抗戰時代一頁傷心慘目之歷史。

（李燭生：“工業危機之成因與挽救”，1946年7月25日成都工商導報）

在物價飛漲，生產停頓，外國貨充斥市面，失業工人徘徊街頭的今天，記者特走訪民族工業家遷川工廠聯合會理事長胡厥文先生。

談起遷川各工廠的情況，他說抗戰開始，工業界為擁護抗戰，響應政府工業動員之號召，相率遷入後方，遷川工廠300多家，其中重工業的機器、鋼鐵工廠160多家，歷盡艱辛，輾轉流離，損失慘重，仍然本着服務抗戰的決心，排除萬難，在後方建立起新廠址，重新開工，加緊生產，但政府對工業方面沒有適當的措施，幾年來，內遷各廠皆勉強掙扎，幾瀕破產，勝利後，各廠準備復員，政府並未予以協助，迄今僅有極少數廠遷回，有些遷回一部分，有些只是人回了，機器原料並未運回，真正全部遷回的簡直沒有一家，不能遷回的原因，主要是經費困難，勝利後，各廠準備遷回，紛紛遣散工人，這筆遣散費甚大，一部分熟練老工人及職員未遣散。滯留內地，開支也大，各廠多變賣機器以維持，筋疲力竭，情狀甚慘，無力將廠遷回。其次，原廠址及職工居住之房屋多已毀損，遷回也無法復員。

“有些厂將机器統統賣光，單剩几个人空手回来，有些厂賣不掉机器，人也回不来，能够把人送回也就好了，那里还有力量搬动机器。就拿我自己來說吧，我所經營的新民、合作、天中三个厂，迁入内地时沿途損坏失散，到后方只剩了1/3的机器，湘桂战役中撤退下来，大半机器留在金城江，搬不走，有些被炮火毀了，‘有些被敌人运走了，有些讓土匪搶去了，’还有些現在仍在露天下锈爛，在抗战中我这三个厂替政府制造軍火，在民营工厂中，出产軍火占1/2，总算尽了力量貢獻国家，但胜利后，政府并没有帮助我把机器运回来，我自己一个光身跑回来，工厂、房屋多已燒光毀坏，沒有房屋，沒有机器，叫我怎么复員”，他愁眉苦臉地說。

他又告訴記者，迁川300多家厂的总共的損失，簡直无法統計，仅在湘桂一帶就損失了320万万元，这还是半年前所估計的，照現在物价計算起来，就是3,200万万元，胜利后各厂联合要求政府補助，經濟部長很同情厂家，曾答应由政府補助1/10，即320万万元，但行政院未批准，經濟部再三呈文請求，始批准補助費4万万元，即補助1%，照目前物价計算却只1/1000，这笔補助費也尚未領到。胜利后，政府虽有令將所接管的一部分敌伪工厂，优先賣給后方各工厂，但現在行政院長說經濟困难，所接收的敌伪工厂，一律要标賣，經濟部再三請求，才允許給在抗战中特別有功的一些工厂，但究竟留下那几家，價錢便宜到什么程度，賣給那些厂家，也还没有决定，即使买到手，这笔巨大的整理、开办費，后方迁回之工厂也負擔不起。

目下工业界最大的困难有三点：（一）利息高，現在利息已高至20分。（二）成本高，与外国貨之比較，几成6与1之比，美金仅比战前漲600倍，而我国物价指数，已上升至3,000多倍，事实上，許多貨价絕不止漲3,000多倍，国貨不能与外貨竞争，是工业界致命伤。（三）略。

（“民族工业的苦难——記胡厥文談話”，1946年6月13日成都工商导报）

（3）成都工廠倒閉三分之二

成都，是川西的工商业的重鎮，今天工厂倒閉了2/3，失业工人达

10余万人，殘存的工厂都在拖着它們快要死亡的生命，工业家也皺紧着眉头寻找不着一条出路来。

(1946年7月31日重庆商务日报)

(4) 昆明工厂倒閉占總廠數百分之九十^①

抗日战争结束后初期昆明工厂倒閉數有如下表：

“国营”工厂总数	13	倒閉數	5
“省营”工厂总数	19	倒閉數	6
商办工厂总数	45	倒閉數	26

两个月后，据中国工业协会云南分会会长徐博士估計，目前昆明厂家已倒閉的占总数90%。

“国营”工厂，抗战期間，資源委员会在昆設立了不少工厂，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央电工器材厂、中央机器厂、昆明电冶厂、中央无綫电器材厂昆明分厂、昆明化工材料厂昆明分厂等几家，这些不仅是昆明同业設備、員工最优良的工厂，在全国也可算是数一数二，除昆湖电厂外，上述这些工厂有的已經迁离，有的暫停工作等待撤移或清理。

云南“省营”工厂情形虽較良好，可也被迫減縮产量，并且不得不撙节开支了，裕滇紗厂現已停止夜工，辞歇了不少工人，員工薪給也被裁減，高薪員工和熟練工人都被裁去，厂方雇用低薪員工和女工来代替。

(1947年密勒士評論报 2月号，本文引自經濟通訊)

(5) 廣東民族工業的倒閉數字

广东的民营工业，自去年春初开始衰落后，一直沉落，其間虽屢

^① 国营和省营中的括弧是編者加的。

經當局與廠商之努力挽救，迄未見有起色。本年2月金融波動之襲擊，嘗一度加速其衰落行程，使大部分工廠由收縮營業而至全部停工。最近復遭全省大水災之侵害，殘存者亦已瀕于奄奄一息，在呻吟中等待死神之降臨。

據省府統計，本真民營工廠經核准復業者有215家，連同在登記中者約有400家左右。（此數字約為戰前的1/5）但目前（指1946年）并能勉強維持營業者不足100家，而其中有把握支持過今年者只有一小半。

粵省民營工廠90%以上集中廣州，分布于河南，西村，芳村等工業區。據筆者日前實地調查，本省之五大民營工業——紡織、橡膠、卷煙、火柴、制糖——其目前仍經常開工之工廠，統計如下：

織造廠	43家	火柴廠	11家
橡膠廠	19家	糖廠	5家
卷煙廠	8家		
合 計 86家			

以上6種工業，復員初期均曾蓬勃一時，廠號之多，為數近千（包括各種小型工廠），而目前所余不及1/10，且大部分在極度艱難中掙扎。據多數廠商云，他們在光復初期所獲之利潤，年來已賠貼殆盡，如果不為“招牌”着想，則早已改營他業矣！

至于其他較重要的工業，如碾米、煉油、釀造、化學製造等，每種之工廠數目，其仍正常營業者不足五家。其能維持不致虧負者十无一、二。重大而獲利較易之工業，其一蹶不振如此，其餘平常不甚發達之工業，其危機之嚴重，可想而知。

嘗考粵省工業之衰落，其故概與全國各地一致。如官僚資本之侵蝕，外力經濟之沖擊，金融波動，稅捐繁雜……等。然其最大之原因實由于洋貨之傾銷。此害全國皆然，而以粵省為尤甚。蓋此間毗連港澳，向為走私販子之蕃殖地，而主持緝私工作者有名無實，或“有心無力”，以致走私洋貨充塞全省，深入各墟場。發育不全且備受摧殘之民族工業，其出品不足與洋貨敵，固不待言，而主持稅務者又從而鞭

難之一——既不能防止私貨之入口，復任意打劫土貨之經營，百般舞弊，諸多勒索。處此眾患齊侵之下，民營廠商其不焦頭爛額者幾希！

現據調查洋貨之進口，每日報關入市者已在數百億元以上。而經常由廣九鐵路往來之私販，為數達3千多人，其所携來私貨動輒以億噸計。似此情形，民營工業又如何不衰落？怎能避免總崩潰！

（行健：“垂危的廣東民營工業”，經濟週報5卷4期）

（6）解放前夕的廣州工業蕭條狀況

十多天來的慶祝狂歡之後，傳來更令人興奮的消息，即國民黨反動派殘余匪幫最後盤踞的港口，華南的政治、經濟、軍事中心——廣州解放了，這個消息更鼓舞着全中國人民，加緊生產支前，肅清殘匪，只是最短期間的事了。

廣州地當東西江與珠江的匯合點，依山近海，形勢雄壯；水陸交通，均稱便利。是粵漢、廣九兩鐵路的起點，南達港澳，入海可通我國沿海各埠及南洋各地，內地湘、贛、閩諸省南部與粵、桂、黔等省全部出產貨物，均以此為集散吞吐口。它不僅在政治和軍事上具有重要價值，更在經濟上具有重大意義，當蔣匪在滬、寧、杭諸地解放時，逃往廣州，建立偽府，夢想受帝國主義無恥的援助，“東山再起”。事實又給了有力的證明。儘管帝國主義者勾結走狗匪幫對新中國建設作種種阻撓，我們人民的武裝迅速進軍就是肯定的答復。廣州的解放，使華南和長江流域溝通，粵漢鐵路腳接華中、華北以及東北，而各海岸港口也由點綫延長，對於敵人的封鎖，必將徹底打碎。

解放前的廣州，因反動匪幫集於華南一隅，所表現的是對人民更殘酷的壓榨掠奪，諸如濫發偽金元，膨脹達天文數字，無何准許銀元流通，復發行銀元券，以進行掠劫人民物資，由於偽幣的急劇貶值，因之金鈔外幣充斥市場，其中主要為港幣，次為美元。多種交易媒介，致使經濟紊亂，人民生活益苦，而蔣匪豪門因此搜括愈多。一般工商業停工倒閉者十之七八，茲將本年元月份工商業的情況列舉，可見一般：

业 别	全部停頓 (%)	局部停頓 (%)	全部开工 (%)	业 别	全部停頓 (%)	局部停頓 (%)	全部开工 (%)
針 織	30	60	10	玻 璃	31	50	19
电 池	20	50	30	机 織	22	47	31
化 工	20	70	10	石 印	5	16	79
印 刷	30	50	20	制 釘	2	11	87
橡 膠	20	60	20	化 妝	20	65	15
漂 染	25	55	20	卷 烟	2	15	83
煤 油	20	60	20	餅 干	无	51	50
鋸 鋸 業		20	30	火 柴	35	65	无
机 器	15	70	15	汽 水	5	95	无
土 布	19	67	14	肥 皂	5	65	30
榨 油	15	58	27	成 叶	无	65	35
碾 米	无	4	96	漆 油 顏 料	3	57	40

其中工业以橡膠业最惨，橡膠制成品主要銷售上海，上海解放，貨物不能运去，停工橡膠工厂，至解放前夕已达9/10以上。

其次火柴业亏折，年来受輸管制度之限制，与金融之波动，业务日走下坡，因原料之补給困难，成本加重，金融与物价不安定，形成坐吃山空，且其成品之銷途多为西江及南路一帶，但年来西江手工火柴业极为发达，无需仰給于广州。南路运銷亦少，因此本市火柴业几可謂全行亏折，很多因亏折創深，宣告倒歇。

玻璃业大小型工厂店号共有54家，其原料来源多采自石叻、安南等地，最近輸入原料甚少，外銷力弱，至全行均告不景气。

航业因反动派断絕对华东、华北的航运，且原料之电油柴薪价昂，各項稅率提升，水客帶貨入口，均因不合化算，而告停頓，或將帶貨数量减少，致营业普遍轉淡。

(經濟周報資料室：“广州經濟概況”，經濟周報 9 卷16期)

(7) 抗戰結束後奄奄一息中的福建工業

提起福建的工业，过去，就只有摇头的份“目前，可連这一点”的“小摆设”，也都維持不下去了。

为了要更深切地明了閩省工业界的实况，和劳資的动态，記者当

赴郊区訪問了几个稍具“規模”的工厂，但，它能予記者的印象，是“可憐”兩個字：在蜀江兩岸那些被称为“工业区”的所在，也只为疏疏落落的烟囱，远远的去，天可見憐！有的簡直跟我們的臂膀一样的瘦削，而更慘的是其中在冒烟的，十不及一，实在有点令人目不卒觀。

首先，在參觀已有三十多年历史，在本省算是最大規模的福电鉄工厂的时候，刘栋业厂长也只搖搖頭，他送給記者一本小冊子，書名“困苦奋斗的福电鉄工厂”，从这本小冊子里，可以看得出該厂这30多年走了一段怎样可悲的道路：在30多年前，該厂原为福州电气公司附屬的一个机械修造厂，后来，逐渐在德、美兩國購到大批工作母机，和許多精密仪器，規模粗具，迄到民国23年才正式設厂，承接各方訂制各种机械，28年便因战事被迫內迁南平，直到胜利后才复員新港，可是，复員甫告完成，不料国内工业危机，日趋尖銳……最近市場波动更劇，本厂面临难关，更形严重，战时主持这个厂的多种原动机，工作母机等，还可以分銷东南各省，对于战时后方建設，不无微功，可是現在，困难更千百倍于战时，在重重的难关之下，且不說有什么貢獻，單是要使机器繼續轉动下去，就已是一件极伤腦筋的事。

“我本来是学机工的”精悍短小的刘厂长，搔着光秃的头，似有无限感慨，“可是現在我每天不能有多少的时间在厂里：我必須办外交，理財政。”

工人要吃飯，机器要燃料，米一石卖到6,800余元，柴每担也要5百多万，沒有錢，就毫无办法，要借得到貸款，就非各方面都兜得轉不可。这时，办一个厂即使不流于官僚化，至少也要做到市儉化，要不，就休想干得下去。

照道理，以“福电”的设备（包括模工場，鑄工場，鍛工場，合作工場，机工場，鉗工場，还有各式車床，刨床，煤气引擎馬达，熔鉄爐……。）在业务上是不会有問題的，事实上却是問題累累，該厂目前有150多人技工，每日可以有3千工作小时，但实际上很少做到2千工作小时，本来是以“制造”为主要业务，如今却以“修理”为經常工作，为什么呢？——缺少資金，缺少市場！

資金不够，就周轉不灵：沒有原料，生产自然无法开展。銀行透支，每次至多10余亿，如今的10余亿够做什么？蒸汽錘輕輕地錘一下，也就要花5—6万元，結果廢鉄权充原料，許多重机器只得暫時賦困，工人和机器都空看肚子，生产自然要萎縮下去，可是，为了要維持这么一个空壳，又不得不想办法支撐，把原料卖掉是一个办法，低价拋售存貨也是一个办法，可憐的是，現在一般工厂連原料和存貨都沒得卖，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僥倖借到行局的貸款，也不敢直接用于生产，最妥当的办法是拿去买黄金套外汇把所获得的盈利，用来補貼工厂損失，实行“以商养工”生产反成副业，“投資”“变作”“投机”本末是完全倒置了。

即使为了生产品，也找不到市場。

这又是錢的問題，币值的不安定，不但使工业生产的成本无以估計，商业也以市价的变动过大，不能進貨推銷：再次，一般的購買力由于通貨膨脹的影响，致消費銳減，生产无法增加，这是一个惡性的循环，工业需要大量生产，才可以使成本減輕，人工节省，可是配合大量生产的，是大量的消費，一个工厂的生命，靠貨物的源源暢銷以維持，如果貨滯銷，就不能获得必須的資金，以再購買原料，繼續生产。

我們所參觀的面粉厂就是这一例，这个厂，經過一年多的籌备，剛开兩個多月，这几天就停了。論資金，他有10万多元美金；論設備，都很新式；論产量，每天可以出粉500包，（每包50磅）这样，有办法的一个厂，結果还是讓机器空着打瞌睡，虽然福建不是产麦区，原料的供应成問題，这几天工人正鬧加薪又罢工了，但最大的原因，还是每月1,000多亿的周轉金，实在支持不开：就是支持得开，長此以往，也沒有办法，因为它一天可以出品500包面粉，却找不到500包的市場，減少产量嗎，所得又怕不够开支，老是賠本兒下去，这个无底洞几时填得滿？在目前的局面誰也不敢說，停办，本錢却已下得大，办也不是，不办也不是，直弄到啼笑皆非的地步，福建工业界目前的处境，也就是这么尷尬！

可是，有了市場，也仍不是有了出路之謂。

事实上，目前多做一笔交易，便是多一次亏本，譬如，今天收了一宗定货，货款是1,000万元，由于物价剧烈的变动，到了付货之日，这批货说不定已值得5,000万元，市场的变化，使产品的价格，追不上原料，在这种情况下之下，多卖不如少卖，从事生产不如囤积原料，然而，工业变成商业，根本丧失了存在的意义，如没有市场不得了，不要市场又要不得，左右为难，出路还是摸索不到。

因此之故，当我们参观闽江下流轮船公司的造船厂时，除了一些锯木机器在有气无力地、懒洋洋地蠕动着之外，看不见一些造船设备，也不以为怪了，在目前，造船当然不如锯木有利可图。

但，锯木厂也没有开工，原因是工人加薪的需要没有被采纳，大家都不来上班。他们要求的是：每日白米一斗三升，折合法币，每月就3亿元左右，这数目，在我们这些劳心者看来，不免要伸舌头，但仔细一想，其实又算得什么！谁无父母子女？谁能学得四川杨妹？——可是，资方又有他们的困难（已为上述），工人要生活，工厂要生存，可是又都被窒息得喘不过气来，说穿了，彼此都是可怜，劳资不协调，结果势必加深危机，把工业带上完全毁灭的道路上去。

尽管“工业化”的口号叫得多响，摆在工业界的面前却是难关重重，有钱的不搞商业而搞工业，在目前简直是大傻瓜！旧的站不住，新的不敢来，有人希望通过新成立的工会，取得生产贷款，但这又岂止是一个“钱”的问题！

在到处碰壁，面面不讨好的情况之下，福建的工业是奄奄一息中！

（方长：“奄奄一息中的福建工业”工业月刊5卷12期）

（8）江西工厂关闭在半数以上

赣省工业战前基础原未稳固，近年来则因受物价及金融波动之影响，相继停闭之工厂达93所，迄今仅存72所。赣省建设厅为挽救工业之危机，刻商请四联分处举办实业工贷中。

（1948年2月12日国民党中央社南昌电）

(9) 青島工廠只有四分之一在苟延殘喘

青島工業請願團尹致中等一行昨抵京，今晨赴經濟部請願，因陳啟天部長赴滬，定下星期一再當面陳述，該團下午續向社會、糧食兩部請願。據尹氏對記者談，戰前輕工業區之青島，如今變得10個煙囪，有9個不冒煙，全市1,400余家工廠，除1/4尚在半開工狀態下苟延殘喘外，其餘均棄業停工，工潮迭起，生產萎縮，經濟日蹙，倘政府不迅予救濟，則危機當益加重，前途實不堪想象。

(1948年2月1日天津民國日報)

(10) 南京絲綫業歇業者達半數

工業不景氣下，著名之南京絲綫業，每況愈下，原有200余家，現歇業者達半數，主要原因，為成本昂貴，國外市場又遭受打擊，資金周轉不靈，絲綫業六十余家，今聯名呈請貸款，以緊急救濟，如不准即停業。

(1948年2月21日北京平明日報)

(11) 抗戰結束後天津工業之隆替

抗戰前，天津為洋貨涌入土貨輸出之門戶，其工業尚極幼稚，除少數化工，紡毛紗廠外，僅有小型之絲織廠而已，“九一八”後，其規模較大之紡織業先後為日人收買。“七七”以還，天津在日人經營之下，為補給軍需之需要，對於工業之發展不遺余力，今海河下游煙囪林立之景象，皆八年來我國民在日人驅使下，以血汗贏得之成績。

勝利以後，天津之敵偽工廠260余單位，凡發電，電機，化工，紡織，鋼鐵，橡膠，制呢，制革，造紙，金屬，釀造，窯業，紙烟制葯，機械，礦場各門類無所不包，統由經濟部接收，時值工業化之呼聲，高唱入雲，國人咸表興奮，群謀投資於工業。以當時之情形推測，若能把握時機，就原有基礎，力謀生產，則有裨於國計民生，曷可勝言，乃匆匆兩年來始則接收紊亂，大失民心，繼而戰爭大起使全盤經濟動蕩。終

至使人对工业之經營，望而生畏。况原料匱乏，电源困难，捐稅苛重，銷路滯塞，外貨充斥，在在皆使天津民族工业遭受极大之威胁，实非始料所及。

关于敌伪产业之处理，前經濟部特派員办公处于去年2月初曾揭示三大原則：(一)規模較大者暫由部管复工；(二)規模較小者标售民营；(三)发还原主或移交其他机关。就此三类分析兩年来之結果，部管复工者約有40單位(后于上年10月16日移交处理局事业單位監理委員會管理)。此类工厂虽大体开工，然不过維持工人生活，尙无有充分發揮生产效能者。其标售民营者据去年8月天津工业月刊之統計，192家中仅有29家开工，其余完全拆卖或改为商店者达96家。在处理当局固已达到補助国家財政之目的，然对于購者开工之監督則全未負責，似屬有背国家注重工业建設之本意。至移交其他机关者，其規模最大者为中紡七紡織厂資委会之中央电工器材厂，制車厂，机械厂，紙漿造紙厂，化学工业公司等單位，其中經營較有成績者当推中紡7个厂，其盈利及生产均甚可觀，其余各厂，則上焉者勉可維持現狀，下焉者日趋沒落，几至不可开工。

此外关于民营工业，按一般統計，全市大小达1,200家，其中規模較大者，以紡織漂染为主。棉紡織业之恒源，北洋，达生三厂，毛紡織业之仁立东亚兩厂，均极負盛名。此外为启新洋灰，久大精鹽，永利制碱，厂址不在本市，仅設有总事务所，此等工业自抗战至今大多生产銳减，近来尤无发展迹象，实亦环境使然。

总之今日無論国营抑民营工业，均感受同样之困难，即原料与器材之缺乏。若干化学原料，非舶来品不能应用，值此外汇枯竭之时，进口有限額之規定，需要者自不能滿足，其在國內可获得之原料，民营厂多因資金短絀，暗息过高，而无力儲备，以致影响原料陸續之供应，国营事业所需資金較易获得，惟津市之国营事业，以輕工业居多，迟早仍应划归民营，若时局常此抗掣不安，前途甚难光明，国营民营殆皆不能超出时代逆流之外也。

虽然，当此危急存亡之秋，吾人深望在政治方面，当局速謀縮短

战乱之时日，同时在工业之本身急求三年之艾。今日民营厂须待政府及社会之援手，如核给外汇之便利，贷款之增加，金融机关之投资是，至于国营事业在本身，则应扫除机关化之恶习，而代以商业化之经营，紧缩人事，减低成本，此外若能在各工厂间取地域连锁之经营，会计集中，以赚钱者，补助亏累者，俾得共存。尤为国营工业渡过难关之道。

(勝茂椿：“复员后天津工业之隆替”工业月刊第5卷第2期)

(12) 抗日戰爭前後福建工業的變遷

本省工业以手工业为主，其著名者如造纸、榨油、制糖、瓷器、纸伞、漆器、砖瓦、织布等。新式工业则仅有衣食及其它日用品，如肥皂、腊燭、汽水、碾米、锯木、罐头、火柴、印刷等，且均集于沿海人口稠密之福州、厦門、晋江、龙溪等重要城市。

福州为本省省会所在地，全省经济、政治之中心，与外洋接触甚早，故工业较为发达，新式工业亦较多，其中规模较大者当推馬江船政局、福建造纸厂、福州电气公司、建华火柴厂、迈罗罐头公司等家，其余虽名曰工厂，实则仍为小工艺店之变相。民国24年，厂家总数(大小工厂手工艺匠铺合计)共为2,565家，資本总额6,680,000元，惟資本在1万元以上者仅75家。兹將战前福州工业情形列表如下①：

类 别	家 数	資 本(千元)	資本一万至十万元之厂数
合 計	2,565	6,688	75
木材制造业	493	276	40
家具制造	292	89	15
冶 煉	214	167	40
机械及金属品	260	102	19
土 石 器	42	16	1
建 筑 业	197	239	3
动力工业	1	1,300	1
化学工业	137	436	5

紡織	138	129	1
服用品	79	50	1
皮革橡膠	70	134	1
飲食品	272	2,333	50
造紙印刷	50	1,118	4
飾物儀器	113	149	3
其它	207	149	2

战前厦門工业統計

类 別	家数	資本(千元)	类 別	家数	資本(千元)
鉄制家具业	1	10	食品业	3	2,400
自來水	1	2,000	制糖	4	20
肥皂	6	125	冰及汽水业	4	600
棉紡織	2	180	合計	21	5,335

除福州、厦門兩地外，可得而述者为晋江与龙溪，晋江工厂共計73家，而資本总額仅70余万元。龙溪工厂25家，資本尤少，仅6万余元。此等資金薄弱之工厂实际上均屬于小工业之类。

抗战起后，海口封鎖，舶來品无法輸入，而厦門失守7年，福州淪陷兩次，原有工厂除小部分內迁外，其余多为敌所毀，民生需要益感困难。27年由建設厂先后派員創辦鉄工厂、工艺厂、造紙厂等14所，至29年9月为加强生产，乃合并上列各厂，成立福建省企业特种股份有限公司，資本总額計1,500万元，所屬工厂29处。

是时，其他民营工厂亦紛紛設立，共謀供应日常必需品，据31年調查所得，全省民营工厂計有43家，資本总額达290余万元。

截至34年止，全省合于工厂法規定之各业工厂共計82家，資本57,511千元。

抗战胜利后，外貨大量傾銷，战时本省应运而兴之各項工业，乃隨战事結束而告衰落，尤以“公營”工业經營困难，不堪亏损而先后解体，民营工业亦漸感不支，相繼倒閉。

① 資本数千元以下四舍五入，由于这样結果总数可能略有不符。

1946年底全省合于工厂法之工厂数

类别	厂数	类别	厂数
纺织	4	卷烟	9
机械	7	陶瓷	1
化学	17	矿冶	1
饮食品	7	燃料业	1
印刷	7	水电业	35
农产品加工	12		

(国民党福建省府建设厅编：“福建经济概况”，145—155页)

(13) 箇舊錫礦的崩潰危機愈來愈嚴重

箇舊錫礦在从前兴旺时曾有48大厂，72小厂，这72座公私大爐，到去年春天只剩下6—7座了，并且还不过是时断时續的在那兒熔煉。随着箇錫的崩潰，錫沙所含的錫的产量也减少了，27年箇旧产錫1,280噸，28年820噸，30年280噸，31年120噸，32年錫的产量只有35噸了。

工人的人数更是减少得可憐，昔日各峒有多至4,000—5,000人者，現在只剩10数人至百人不等。在民国27年有工人10万人以上，28年有8万多工人，29年有5万多工人，30年只剩25,700多工人，到了32年的上半年有17,596人，6月至9月有5,100人，10—12月便减少得只有2,230人了(去年也在3千人以内)，矿商大小戶数由27年的5,000戶，28年的4,000多戶，31年的1,000多戶，减到32年的670戶；現在的实数还要减少1/3(見去年4月12日本报)。矿商的破产几达90%以上。流离失所的工人数达10万。就这样，在短短的10年中，箇旧市况完全改觀了，到如今只剩下了荒涼殘破的峒穴和倒塌了的千千万万的火房！下厂、南防各县直接間接因錫厂崩潰而失业者約达百万人之多，县城不能举火者也达千余家之众，民生雕敝，达于极点，往昔人烟輻輳之区，現已成蔓草荒烟之地，以昔例今，实屬一落万丈，不可同日而語！

(黃醒：“箇錫的命运”1945年3月2日重慶新华日报)

据汉書地理志似远在汉时即知箇旧有錫，有謂云南箇旧錫始于元时，或謂始于明时，俱不能确定；但清代以前箇旧錫业不关重要則可断言。清乾隆間，云南之鑄币局开始用錫，于是錫业渐兴；清末，海禁大开，国际市场开拓；产錫外銷，則云南箇旧錫业一振。此数百年間，錫矿采煉皆用土法，直至1913年始用新法采煉，业务蒸蒸日上，箇旧錫业在政治上的重要性也日益加强。由于昔时所产之錫成色不高，不能直銷外洋，多由粵商收买运至香港，掺入馬來亞錫化煉后轉銷外洋。1918年开始輸出矿砂，1921年箇旧临屏铁路逐段通車，交通便利，生产渐旺。

1931年，云南省政府將箇旧錫业公司的提煉部划出，另組箇旧煉錫公司，招股250万，購買新式机器，所煉出的錫品質高至 99.7%—99.9%，足与倫敦巴黎組織市場媲美，至是外国錫市場亦有云南大錫之市場，嗣后其他各厂也相繼購置新式机器采煉，因此产量逐年增多。1938年年产量达10,731公吨，为箇旧产錫最盛时期，其时有工人15万人左右，大的厂尖工人达3,000人左右。1940年后，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腐敗，恶性通货膨胀及四大家族官僚資本的穷凶极惡的剝削，使矿商迭遭亏蝕；同时由于滇越铁路交通中断，外运成本加重，使滇錫市价远較南洋产錫为高，国外錫商遂不向我訂購，錫产滞銷，厂矿紛紛停工，工人渐次流散，到1944年，箇旧錫产量銳减到1,600吨，往昔在箇旧城东煉錫大爐共有40个左右，后来能維持开爐照常煉錫的不到10个，工人也只剩5,000余人了。

1944年9月，美国强盜伸出掠奪的魔手向我訂購箇錫，以最低之价格，强向錫业訂立合同，自1944年9月至1946年3月，在此1年半內，共訂購大錫1,900余吨，价格为錫1公吨易黄金18市兩，按当时黄金黑市价格計算，1公吨合伪币374,000元，米价每升（箇升）合伪币140元，与1940年6月以前收購錫牌价1公吨合伪币8,736元，米价每升合伪币0.22元相較，米价已漲至600余倍，而錫价仅合40余倍，在美帝国主义应用高压的政治手段和壟断資本在旧中国的特权竭尽压榨剝削的能事，以致我国錫业亏折甚大，这亦是箇旧錫业崩潰主要原因

之一。

胜利后，世界各国忙于复員，滇錫无人收購，直至1946年4月以后始有外銷；但箇旧錫业历年遭受亏蝕，資金匱乏，所剩数矿厂，年产量仅达1,000吨左右，頻于崩潰的云南箇旧錫业曾数度向反动派政府呼吁救济，欲图复兴；可是国民党反动派置民族工业于不顧，集中全力將全国資源用来发动反人民的血腥战争，进攻解放区，使我国箇旧錫业一蹶不振。

（許汉中：“我国的錫业情况和展望”，中国工业新 3 卷 5 期）

（14）抗戰結束後綦江鐵礦業的沒落

綦江的鐵矿，在四川铁的总产量中占着很大的比例，开采以来的情况也一直很良好，而在抗战最艰难困苦的时间里，綦江铁所給予国家在制造武器方面的贡献，是难以計算的！然而，胜利的成果，綦江曾經些微地方分享过么？

省参議員吳举宜先生是綦江最大一家民营煉铁厂东原公司的主持人，他說：綦江的鐵矿区有土台，白石塘，大罗墟，麻柳灘，苏家开等 5 个，土台区蘊藏最丰估計約有 400 余万吨，其他 4 区共有 500 余万吨，总计綦江鐵矿蘊藏不下 1,000 万吨。

綦江生铁每年产量在战前約 9,000 吨，自民国 27 年政府將矿权收归国有以后，由于种种不合理的管制，产量已一天天减少，去年产量仅 5,000 余吨，原来的 14 家民营煉铁厂，現在只殘存东原、联一、三益和、义兴荣、裕和祥、鉦兴荣、协記等 7 家，其余的，全倒閉了！原来的 17 座兩吨至 5 吨煉铁爐，現在也仅仅剩下来 11 座在使用，东原公司年产 5 千吨的纪录，亦被迫銳減了 7/10，年产还不到 1,500 吨！

現有熟練工人 2 万多，現在工作的只有 5 千多人，而那 15,000 多工人于熬受了几个月的失业痛苦之后，現在都紛紛轉业务农，在毫沒有重工业基础的中国，这是多么令人痛心的現象！“其实痛心的还不止此”，吳参議員回忆着过去底无限辛酸很沉痛地想望着将来，他說：連眼前这殘破雕蔽的現狀，怕也維持不了多久呢？接着他举出綦江

民营煉鐵厂当前所遭受到的危難事实。

經濟部的綦江鐵矿，所开采的鐵矿，在包工制下面，每吨成本不到5千元，售与国营鋼鐵厂只照成本加点運費，而卖給我們每吨却要20,500元，这个国营机构是以日采500吨的设备开在綦江的，开矿以来的最高日产量是300余吨，目前仅用矿工100人日采数十吨，但所用职员却依旧是300余人，工役200余人，这些冗余的员工开支，便加高了矿砂的成本！每产鐵一吨所需的費用为矿砂3吨加運費合8万余，燃料3—4吨費用70,000余，人工制造費用至少30,000，总计每吨鐵的生产成本是18万余，白口鐵运到重庆去只能卖18万余，每吨就必需賠补約100元，从綦到渝的運費。而一般工厂作翻砂用的灰口鐵，每吨能卖25万元，約有20%的賺項，但战后各工厂多已倒閉，那里卖得出去。長此以往，民营煉鐵厂总有一天是会全体关門的！如果政府能把橫加在民营煉鐵厂肩上的无理重負減輕些，把矿砂售价减低一半，民营工厂少受压迫，才可望稍有生机。

“可是”，吳参議員焦心到更远的难题，“这一点生机无论如何是經不起外来的摧殘的！”他十分感慨地說：“在目前我們只能以农具，鹽鍋，鐵鍋的微小需要来做生产鐵的数量，标准产量有限得很，这种現象是不是国家不需要鐵的生产呢？不，建国期中对于鋼和鐵都大量的需要着，如成渝鐵路就需要几万吨的鐵軌，而重庆大渡口經濟部煉鋼鐵厂就可以制造，照我們民营厂家算来，每軋鋼軌一吨，需費不过50万元，虽然在美国鐵軌每吨只需70元美金，但加運費运到重庆，与国产价也就相差无几，为什么不獎勵民营厂家来承造呢？听說法国沒有这許多鐵軌，还向比利时借了些，自己能够造，又为什么一定要讓外国人去东拼西湊呢？將來美国便宜鐵一到，我們只有通統歇业了！”

（乃鼎：“綦江鐵矿的悲哀”，1946年6月26日成都工商导报）

1947年国民党統治区工厂統計

业 别	厂 数	职工共計	職員数	工人 数	使用动力		合于工厂 法之厂数
					馬 力	千 伏 安	
总 計	14,078	771,650	89,251	682,399	827,272.4	162,211.3	3,312
飲食品制造业	1,379	108,297	17,305	90,992	74,661.0	14,547.3	326
紡 織 业	3,773	337,734	24,907	313,127	329,213.5	36,408.5	1,089
服用品制造业	1,783	51,981	7,117	44,864	8,482.4	20.0	290
木材制造业	156	4,497	429	4,068	4,693.5	60.0	42
造纸印刷业	1,669	38,569	7,866	30,703	56,624.3	2,489.0	251
化学工业	1,553	78,905	12,189	66,716	80,423.3	9,841.5	410
土石品工业	152	15,731	2,277	13,454	117,676.3	24,965.0	69
冶 煉 业	494	28,747	3,258	25,489	65,781.8	12,252.2	108
机 械 业	1,505	36,392	4,403	31,989	26,774.4	61,041.0	223
五 金 业	682	21,893	2,572	19,321	20,670.5	161.5	217
电工器材制造	303	16,213	2,731	13,482	7,093.6	42.8	130
交通用具制造	269	12,380	1,791	10,589	4,845.5	255.0	47
杂 項 工业	360	20,311	2,706	17,605	30,362.3	127.5	112

說明：(一)上表是国民党全国經濟調查委员会 1948 年 4 月发表之“全国主要都市工业調查初步报告提要”，这项調查在 1947 年 9 月初开始，1947 年底大部完成。(二)此项調查包括合于国民党所訂之工厂法（即使用动力，工人在 30 名以上）和不合于工厂法之工厂（即不滿三十人或不使用动力者）。(三)业 别中各項內容如下：飲食品制造业包括碾米、面粉、糖、烟、茶、榨油、罐头、糖果、餅干、酿造和清凉飲料、畜产品等；紡織工业包括棉、毛、絲、麻紡織及染整、紗錢、毛綫、軋棉和打包；服用品包括針織、市襪、皮毛成品、鞋帽、襯衫、防雨用具、皮帶、鈕扣等；木材制造业包括鋸木、三夾板、木器、竹制品和包裝用具等；造纸印刷包括造纸、紙漿、制版、印刷、鑄字和紙制品；化学工业包括火柴、皂燭、肥料、制革、橡膠、酸鹼、漂白粉、藥品、顏料、油漆、酒精、搪瓷和塑料等；土石品制造业包括陶瓷、水泥、玻璃、石棉制品、石灰、軋石和磨粉、坩鍋及土泥器皿；冶煉工业包括金屬冶煉和非金屬冶煉、軋鋼、翻砂、煉油和合金之制造等；五金业包括制罐、制釘、制針、五金用品、建筑材料、金屬箔片、金屬絲繩和鋁制品等；机械业包括各种机械之制造和修理；电工器材制造业包括电机、电訊器材、电器用具、电瓶等；交通用具制造业包括水陆各种交通用具零件之制造；杂項工业包括仪器制造、鐘表、度量衡、热水瓶、牙刷等日用品和文具、煤球制造等。(四)不包括外国在华工厂，仅限于国民党統治区。

1872—1921年的中国矿业

編者按：(一)原文污蔑中国少数民族之“迪化”改为“烏魯木齐”；(二)原文清朝年份一律改为公元年份。

吾国五十年前之所謂矿业，仅限于貴重之金品，若煤若铁，今日国人之所視為根本实业者，在当日仅以为农余之附产而已，与国民之經濟无与。惟金銀銅鉛鋅錫，久为国家之所注意，且半为政府之所專利。然銀为吾国所不产，金則困于苛稅，錫則阻于交通，惟銅与鉛鋅，乃鼓鑄货币之原料，自乾隆3年以部款100万兩經營川滇之矿，至6年解銅之額达63,314担，至38年，达135,000余担，而分解各省之余銅，尚不在其列。鉛鋅产額，亦皆十倍于今。其盛况可想見也。嘉道以还，吏治廢弛，矿业漸衰，然每年解京之銅，尚不下60,000—70,000担。迨滇中乱作，秩序蕩然。銅厂汉回，复相仇杀。官逃丁沒。銅廢山封120年来之經營，乃毀于一旦。自咸丰8年至同治13年，16年間，未尝煉一斤之銅，一担之鉛。光緒初叶，虽屢有恢复之嘗試，而自元年至13年，共产銅不过83,700担，尚不及乾嘉盛时一年之供額。其后唐炯任为督办，竭公私之力以經營之，先后用款30余万，而近三十余年，每年产銅不过万担，鉛鋅称是。追忆乾嘉盛时之景狀，不能不歎息于破坏之易，而建設之难也。

光緒4年，以資本27万兩，(至光緒8年增至120万兩)設开平矿务局于津。是为吾国以西法开矿之始，亦即京奉铁路开創之始，开平之外，文忠之所提倡者，尚有热河四道溝之銅矿，朝阳金厂溝，黑龙江漠河，山东招远之金矿，嶧县之煤矿。

綜溯近世紀矿业之历史，可分为三期。自光緒之初，迄于甲午，士民固陋，甚于官府，資本集合，难于聚沙，开創提倡，端賴当局。是

为官矿时代。甲午以还，国势骤弱，慢藏诲盗，外力内侵，矿权给许，动以省计。是为外资时代。日俄战生，国民自觉，风气所趋，波及于矿，外籍所撰，或贖或拒，官府所创，旋改为商。迄于民国，矿法改良，资本渐集，公司制兴，是为民矿时代。然此三时代，虽情势各异，而界限相重。一时代中其所建置，或一成而不废，或名存而实亡，故至今商矿之外，仍多官矿，华商之外，不乏外商，而官商又尝合办，中外不妨联资，组织既烦，头绪益杂。兹为叙述便利起见，仍以官矿外资民矿为目，先略举其历史，再分考其地点资本及兴废年月，各列为表附焉。

一 官 矿

开平矿务局，为近代矿业之嚆矢，前既已略言之矣。然当日李文忠奏请设局之时，其资本220万两，实多为广东人唐廷樞之所召集，故奏案以官督商办称。同时修铁路，开运河，购地设厂，经营秦皇岛海港，规模极为宏远。至庚子年，总办张翼，为德璀林所诬，转售于胡华，遂开今日开滦中外合资之局。同时文忠所提倡者，尚有热河之四道沟铜矿，开办于光绪13年，黑龙江漠河之金矿，开办于光绪15年，山东嶧县之煤矿，开办于光绪6年。四道沟铜矿，开办3年，用款48万而停歇，嶧县之煤，今已改为商有，惟漠河则尚为江省四大官矿之一焉。闻文忠之风而兴起者，为光绪11年，贵抚屠某之清溪铁矿，光绪13年唐炯之东川白锡腓铜矿，光绪21年，四川之冕宁麻哈金矿，同年湖南巡抚陈宝箴之官矿局，而张文襄之汉阳铁厂，亦发起于光绪16、17年之间，是为官矿之第一期，其后清溪麻哈皆各费银数十万而停歇。东川改用土法，汉阳铁厂，亦于光绪22年改归商办，惟湖南官矿局，至今尚存，则水口山铅锌矿之功也。

庚子以后，疆吏鉴于川黔之失败，困于赔款之摊派，不复敢轻尝试矣。至光绪30年，清廷有矿政调查局之设，复置矿务议员，官矿之议乃复活。于是31年，有广西之富贺煤矿，陕西之延长石油矿，33年，有山西之涑川铜矿，江西之贛州铜矿，余干煤矿，广西之官炼锡厂，34

年有吉林之磐石銅礦，宣統元年有直隸之鷄鳴山煤礦，雲南之箇舊錫務公司，宣統2年有四川之彭縣銅礦，而湖南官礦局，亦推廣改良以新法采水口山鉛鋅，漸獲厚利。北洋大臣所辦之黑龍江金礦，于庚子年為俄人所占者，亦于光緒33年陸續收回，于宣統3年，改歸江省自辦，耳目較近，收入驟增。是為官礦之第二期。然迄于今日以上所舉十有二礦，其未停辦而尚能獲利者，惟湖南黑龍江兩局。

民國成立，礦法重修，礦權主張開放，依法領照者遂多。然3年收鐵礦石油為國有。故是年特設籌辦全國煤油事務處，與美孚公司訂約，合資探礦，四年財政部復有采金局之設，派員調查，建議開采。農商部亦于是年立黑龍江梧桐河金礦試驗場，湖北復設官礦局，開采大冶象鼻山鐵礦煤礦及其他金屬。其後采金局于五年取消，煤油事務處因探礦失敗，美孚廢約而裁撤，梧桐金礦改歸商辦。現中央政府所直屬經營者，惟對德宣戰後，收回之井陘礦務局，及7年所成立之龍煙鐵礦公司，然前者為暫時制度，後者為商官合資，未可遽舉為官礦之成績也。

此就其年代言也。至其辦法，則殊不一律。購機建廠，雇員招工，資本營業，一出于官，是為完全官辦之礦，如湖南之礦務總局，湖北之官礦公署，彭縣銅礦，延長石油，以及鷄鳴山煤礦是也。開辦或借官力，營業則為公司，資本之來，半由招股，是為官商合辦之礦，如箇舊錫務公司龍煙鐵礦公司是也。開采之方法，營業之盈虧，一切任之于商，官不與其事，亦不負其責，惟其所采礦物，所制金品，悉歸官收買，不准私售，間或為之設廠招工，而專其販賣食物之利，按工定稅而分其每日所得之金，其名目或曰官督商辦，曰官辦，曰包辦，要皆不副其實。茲改名之曰民辦官收，如黑龍江吉林新疆之金，廣西富賀之錫，貴州銅仁之銻是也。茲就農商部有案可稽各礦，照上所言，分類列表，其中外合辦及商辦各礦，雖政府派有督辦，或附有官股而事權不在政府者，仍分見于外資民礦，不列本表，以期名實相副焉。

(一)完全官办者

矿质	省份	地点	矿区	资本	主办者	成立年	最近产额	备考	
金	湖南	会同县漠溪	23,400方丈	40,000元	湖南矿务局	1913	700兩	盈	
"	"	平江县黄金洞		300,050兩	"	1897	1,000兩	亏	
"	"	桃源县藤叶溪			"	1914	100兩	亏	
鉛錳	"	常宁县水口山	100方里	約500,000兩	"	1907	錳9,684吨 鉛3,104"	盈	
"	"	常宁县松柏陳厂		71,600兩	"				
錫	"	新化县錫矿山	60亩	50,000兩	"	1915	聞已暫停	亏	
"	"	沅陵县銀矿坑			"	"			"
"	"	淑浦县管叶塘			"	"			"
鉛鋅銅錳	"	常柱县白河			"	"			"
錫	"	临武县羅坪		20,000兩	"	1912	2吨	"	
煤	湖北	阳新县炭山麓		800,000兩	湖北省署	"	19,215吨		
鉄	"	大冶象鼻山		共用 500 万元	湖北官矿公署		69,191"		
銅	"	大冶阳新			"				亏
煤	江西	萍乡湘东			"				"
金	山东	沂水紅石橋		8,000元	山东省署	1915	1,200兩	盈	
銅	四川	彭县大宝山	799亩	41,000兩	彭县铜矿局	1911	124吨	"	
煤	河北	宣化县鷄鳴山	36方里	500,000兩	京綏铁路局	"	63,894吨	亏	
"	广西	富川賀县西麓		595,000元	富賀官矿局	1907		"	
"	江西	余干县楓港		約200,000元	余干官矿局	"		"	

(二)官商合办者

矿质	省份	地点	矿区	资本	主办者	成立年	最近产额	备考
錫	云南	箇旧县馬落革	3,460亩	商股 760,000元 官股 2,640,000元	箇旧錫务公司	1909	620吨	亏 ?
"	"	箇旧 煉厂				"		"
鉛錳	"	东川县矿山			东川矿业公司	1913	各600吨	盈

鐵	河北	宣化龍關	500萬元官商各半	龍關鐵礦公司	1913		尚未開煉
煤	"	臨城	3,000,000佛郎	臨城礦務公司	1905	265,040噸	原為中比合辦收回後尚未開辦
"	"	宛平齋堂		齋堂煤礦公司	1915		
石油	新疆		官股30,000兩 商股5,000兩	新督楊增新發起	1915		

(三) 民办官收者

礦質	省份	地點	礦區	資本	管理機關	成立年	最近產額	備考
金	黑龍江	漠河	2,820畝		漠河金礦局	1889		盈
"	"	奇乾河	1,026畝		奇乾河金礦局	"	25,479兩	"
"	"	觀音山都魯山	5,600方里	80,000元 37,700兩	觀都金礦局	1891	4,100兩	"
"	"	呼瑪縣庫瑪爾河	10,538畝		庫瑪爾河金礦局	1903	1,036兩	"
"	吉林	依蘭縣三姓		80,000元	同前	1915	142兩	亏
"	熱河	承德縣三道灣				1916		"
"	新疆	于闐等五廠			鄉約包辦		3,571兩	盈
錫	廣西	富川賀縣		136,000元	富賀官礦局	1909	200噸	"
"	湖南	江華上伍堡	100方里	192,000兩	湖南礦務局	"	60噸	"
錳	貴州	銅仁梵淨山等處			銅仁官礦局	1910	聞已暫停	亏

(四) 民办而官商合收者

礦質	省份	地點	礦區	資本	管理機關	成立年	最近產額	備考
金	黑龍江	呼瑪縣余庆溝	344,600畝	40,000盧布	黑官商合辦公司	1911	25,479兩	盈
"	吉林	綏陵凉水泉密山興隆溝		官商股小洋 合10,000元	吉林省署	1915		
銅	雲南	東川項家各廠		官股100,000元 商股200,000元	東川礦業公司	1913	500噸	盈

上列四表，均系民國 6、7 年存在之礦。近年來外省對於中央報

告，漸不完備，其中有无变迁，无从稽考。然軍兴以后大概有減无增，可断言也，溯自光緒初年至今，官营矿业之失敗銷滅者，殆数倍于現存之官矿。但其成立，或在农工商部設部以前，部中无案，而本省旧档，或毀于兵，或散于吏，其兴廢历史，不尽可考。茲搜集其存案可稽，及散見于公私文牘者，为列表如下。

官矿之停办或改归商办者

矿质	省份	地点	資本	开办年月	停办或改办年月	备 考
煤	湖 南	湘潭县小花石	82,200兩	1896	1900	停办
"	"	宁乡县青谿	84,500兩	1896	1900	"
"	黑龙江	嫩江县甘河	136,300兩 36,000元	1905	1921	甘河煤矿局所办民国十年停办
"	黑龙江	呼蘭县金怀馬	50,000兩	1905	1921	金怀馬煤矿局所办民国十年停办
"	湖 南	醴陵县豆田	5,500兩	1896	1897	"
"	"	宁乡苦竹寺	31,000兩	1898	1900	"
"	"	醴陵棵樹山	35,000兩	1898	1901	"
"	"	芷黔县黃坡	50,000兩	1898	1900	原兼办铁矿后均停办
"	"	鶴綠江流域平山	30,000兩	1907		以煤棧太深停办，原定为官商合办商股未招
"	河 北	山太平山蒙山 密云县东智庄	15,000兩	1908		原为官商合办
金	四 川	冕宁县麻哈	300,000兩 100,000元	1895年开 1914年复开	1915年复停	現归商办机器廢置无用
"	"	鹽原县木襄		1895	1911	原为官督商办因出产衰微而停
"	湖 南	沅陵县大有溪	4,700兩	1897	1898	停办
"	"	会	3,500兩	1899	1914	"
"	"	辰州洞樹面	12,100兩	1913		"
"	河 北	密云县桃園		1912		
"	热 河	平泉州密云乡		1899		改归商办
"	"	承德县碾子溝		1904开办 1911复开	1915复停	停办
"	"	灤平县八道溝				停办
"	黑龙江	湯原县梧桐河	40,000元	1915	1919	改归商办
"	新 疆	阿尔泰山哈图山	240,000兩 20,000元	1899年开 办未几停 1903年复开		初为华俄合办后为官商合办
"	山 东	招远玲瓏山				改归商办
銅	云 南	东川县白錫腰处	約100,000兩	1887	1889	唐洞官商公司用日本人所开

銅	熱河	灤平縣四道溝	480,000兩	1887	1895	李鴻章開辦置機器出銅共十餘萬斤
"	湖廣	永定縣大米界	1,500兩	1896	1907	停辦
"	"	桂常縣	24,200兩	1896	1899	"
"	"	石門湯家台	5,200兩	1897	1898	"
"	江西	贛州龍下長桃嶺	約200,000兩	1907	1908	購置機器出銷837磅硫化銅644磅
"	山西	開高嶺于瀆釋縣銅互溝	36,600兩	1907	1911	恩壽所設之川銅礦公司
"	江蘇	句容銅冶山		1895年開辦1906年停, 1908年復開		曾購機器因亏本停辦
"	吉林	磐石縣石咀山	銀30,000兩 錢25吊	1908	1922	吉林省署所辦1921年停辦
"	湖北	竹山縣四果樹		1905		停辦
"	"	竹山縣印家台	20,000兩	1908		1913年為五丰五盈兩公司所有
"	"	陽新大冶	52,000元	1912		
"	新鄂	庫車	官股5,000兩 商股5,000兩		1915	馬紹武承辦因每日出銅三斤虧折停止
"	"	烏魯木齊南山	2,000兩			廣濟銅礦公司所辦現完全停辦
"	"	馬喀爾泰山				哈什觀察使王炳坤委彭水年辦, 虧折停歇。
鐵	湖北	漢陽鐵廠大冶	500數十萬兩	1891	1896	改歸商辦
錫	湖廣	清溪	30余萬兩	1885	1893	潘撫奏辦因無煤停止1898年陳明遠接辦未果
"	湖南	桂陽縣野鹿灘	26,800兩	1912	1914	停辦
"	"	臨武縣香花嶺	80,000兩	1914	1915年9月	改歸商辦
鉛	"	衡陽縣三官町	200兩	1896	"	停辦
"	"	桑植國營嘴山	2,600兩	1896	1897	"
"	"	瀏陽縣曾家灘	800兩	1898	1897	"
"	"	麻陽縣潭石約	1,400兩	1900	1897	"
"	"	桂陽縣虎形山	13,700兩	1904	1905	"
"	"	興寧縣大脚嶺	2,400兩	1905	1905	"
"	"	長河城外提鉛煉廠	170,600兩	1909	1910	"
"	"	常寧縣呼頭	1,800兩	1913		"
"	"	瀘溪縣	2,200兩	1896	1897	"
"	"	辰谿縣	2,500兩	1896	1897	"
"	"	益陽縣西村	145,600兩	1896	1904	華昌接辦
"	"	沅陵縣牛婆溪	8,200兩	1897	1898	停辦
"	"	安化縣木李坪	31,400兩	1900	1904停	華昌接辦
"	"	芷江縣羅田坪	26,000兩	1900	"	停辦
"	"	沅陵縣銀礦地	26,000兩	1893	1900	1915年復開
"	"	安化縣仙溪	4,300兩	1899	1900	停辦
"	"	邵陽縣龍山	1,900兩	1899	1900	"

礦質	省份	地點	資本	开办年月	停办或改办年月	備考
鐵	湖北	安化		1913	1921	原为湖北官矿公署所办
"	"	武昌煉鐵厂		1913	1921	1921年停办
"	"	新化邵阳兩县收砂局	327,900兩	1905	1906	停办
"	广西	梧州煉厂全省官局	200,000兩	1906	1910年9月	1916年王祖同改归官办未果
"	广东	曲江縣賴老頂等	200,000兩	1910	1911	宝昌公司官商合办实亏約20,000元停办
硃砂水銀	湖南	鳳凰厅猴子坪	47,100兩	1912	1914	改归商办
硫磺	"	慈利	13兩	1901	1914	停办后改归商办
"	"	彬州	348兩	1906	1914	"
硝磺	"	辰州	1,000兩	1896	1897	"
石油	陝西	延長	290,000兩	1906	1922	陝西省署所办1922年停办

綜觀以上各表，五十年來停办之官礦，所費資本，有效可稽者，不下千萬。其現存之礦，除官商合办者，开办未久，成敗未見，姑不具論外，其民办官收者，資本不过百万，每年獲利，計亦不下百万。然括穷民汗血之資，且因以为功，苛政虐民，以是为甚。至于完全官办之礦，資本可考者，銀270余万兩，洋580余万元。而当民国5、6年歐战期中，金屬騰貴時，亦仅彭县之銅礦獲利4万，湖南礦務总局獲利48万元。其他亏折实数，虽不可詳，然計算当亦不下数十万。

二 外 資

甲午以还，国势浸弱，外侮之来，不可终日，发其难者，实始于光緒24年之曹州教案，而膠济鐵路30里內之礦权，亦随膠州及鐵路之敷設权，同入德人之手。同年英商福公司攫取山西平定盂县及潞澤之煤鐵，明年德商瑞記洋行得山东之五礦。当时士大夫分为仇外改革兩派。言改革者，頗以外資輸入为可行。故李鴻章西使，英人摩爾根以中外合办之說进，遂有光緒26年四川会同公司之約。立約者以开采委諸外人，而政府坐享其利。后因庚子事件，約不果行，然是为中国政府与外人合資办礦之始。至于以私人資格与外人合办者。則光緒22年。已有門头溝之中美煤礦。固不自摩爾根始也。自庚子事件，

直隶开平煤矿，經德璉琳而移于英人之手，外人之要求矿权者，踵且相接。溯其方法，不外四端，一因铁路之敷設，而傍及其附近之矿权者，如光緒 29 年之中俄南滿協約，光緒 28 年之中俄吉黑煤矿協約是也。撫順烟台之烟煤，即根据前者而移于南滿鐵道會社，滿州里札賚諾尔之褐炭，亦根据后者而归于东清鐵道公司，要皆引膠濟鐵路之条件为先例。二与政府直接交涉，取有全省或其一部之矿权者，如福公司之于山西，瑞記洋行之于山东五矿，隆兴公司之云南七府是也。三指定矿地得政府之特許者，如凱約翰之銅官山鐵矿，立德乐之四川江北煤矿，科乐德之外蒙金矿是也。四先向私人訂立合同，事后由政府追認者，如直隶之井陘臨城各煤矿是也。

以上各矿，其原起皆在日俄战争以前。光緒30年以后，国民奋起，力图挽回，爭路爭矿，遂成政治上之运动，外人对吾国之观念，亦因之而一变。于是向之所攘夺者，或因失败而消灭，或得巨款而放弃、或經交涉而改組，以迄于今，其完全为外人所有者，惟奉天之撫順烟台，吉林之寬城子等煤矿，及外蒙之金矿而已。唯民国3年10月大仓洋行矿师为盗所杀，遂以合办热河阜新煤矿为賠償条件，4年5月，日本以东三省九矿为二十一条要求之一，盖犹有庚子諸年之遺風焉。又自民国3年，修正矿律，外資不过半数，法所不禁。虽各国政府，屢以条件过酷为言，不肯公然承認，然其私人之照章合办者，实繁有徒，盖近年来矿业之新局也。茲特詳考与外資有关各矿，就其性质历史，分別为表如下。

(一)完全外資者①

矿 質	地 点	国籍	矿 权 者	最近产額	备 考
煤	辽宁撫順千台山	日本	南滿鐵路會社	3,064,958吨	初为中俄合办，日俄战争后为日本所占，1909年由中國政府正式承認
"	辽宁辽阳烟台	"	"		

① 按山东之煤鐵矿，近由華盛頓會議，改归中國政府所特許之公司承办，其資本中日各占一半。茲以历史关系暫列上表。

矿质	地点	国籍	矿权者	最近产额	备考
煤	吉林宽城子	日本	南满铁路会社		1902年俄人所有，日俄战争致归日本，因煤质劣未开
"	山东濰县坊子村	"	日本政府	130,000吨	1900年北京条约让与德人，1914年为日本所占
"	山东淄川县龔山	"	"	504,250吨	"
鉄	山东益都金嶺鎮	"	"	34,165吨	"
金	外蒙图市兩盟	俄			1903年9月俄員柯乐德呈請試办，1912年柯乐德被逐近又与美商訂立合同案尚未結
錫炭	滿洲里扎賚諾尔	"	东清铁路公司	1,200,000吨	1902年中俄条约

(二) 中外合資者
(甲) 有特別契約者①

矿质	地点	性質	矿权者	資本	成立年月	原因	最近产额	备考
煤	河北临城等县	中比合办	临城矿务局	3,000,000法郎	1905	1902年鉅案而盜賣	265,045吨	現比国部分已由华商收回惟原約未廢現暫归农商部合办
"	河北井陘县關頭	中德合办	井陘矿务局	中德各250,000元	1896	退鳳起与汪納根私办	418,691吨	日俄战争后大仓所占
"	辽宁本溪县	中日合办	本溪湖煤鉄有限公司	中日各1,000,000元	1910年4月	"	409,729吨	"
鉄	辽宁本溪湖庙兒灣	"	"	5,000,000元	"	"	鉄48,800吨	"
金	热河建平县翟家地城子山平泉县王家村	中英合办	平远金矿公司	中英各400,000兩	1911年	王紹林、孙世勤与伊德所立合同于庚子年为德權林盜賣	4,416,010吨	政战停工
煤	河北开平灤州	"	开灤矿务局	中英各2,000,000磅	1911年12月	庚子年为德權林盜賣	福公司561,834吨	兩公司分采合銷
"	河南修武沁阳焦作	"	福中公司	福公司1,240,000磅	1915年合并	豫丰公司借款20万磅	原公司734,895吨	"
"	热河阜新县新邱	中日合办	(周圭璋与今井邦三) 大兴公司 (顧志康与河野久太郎) 大新公司	中原公司5,000,000元	1915年10月	賠償大仓	{ 尚未出煤	"
"	"	"	"	"	1915年10月	"	"	"
銀銅	吉林延吉县天宝山	"	天宝山公司	中日各500,000万元	1916年9月	程光第私借中和公司款項	銅100吨	政府派有監督
鉄	辽宁辽阳县長嶺	"	長嶺鉄矿公司	1,000,000日元	1919年	政府特許	尚未采矿	"

① 临城已列入官商合办表，茲因原約未廢，且为历史关系，故复見于此。又阜新煤矿及天宝山銀銅矿，表面虽系遵照矿章領照，然历史与尋常不同，盖其初起时均有契約关系也。

(乙) 二十一条所要求之九矿

矿质	地点	国籍	矿权者	矿区面积	最近产额	备注
铁	辽宁海城盖平及辽阳鞍山等地	中日合办	振兴公司	共8处 25方里	163,596吨	泰日宣于汉冲及鍊日助出 各煉厂则为南滿鐵道會社所 有
煤	辽宁本溪湖田什付溝	"	孟凌云与 凌日龟吉 彩合公司		65,244吨	1916年5月7日之換文言明 “中国政府允諾日本國臣民 在七列各矿除業已探或开 采各矿外速行調查选定即准 其探勘或开采，在矿业条例 确定以前仿照現行办法办 理”(按現行中外合資办法) 惟至今尚未全数領照
"	辽宁本溪湖牛心台	将来中日合办				
"	辽宁錦县暖池塘	"				
"	辽宁海龙县杉松崗	"				
"	辽宁通化县鉄厂山	"	曹庆山与 峰巖良充			
"	吉林省城附近紅窑	中日合办				
煤鉄 金	吉林甸樺夾皮溝	将来中日合办				

(丙) 遵照矿章領照者

矿质	地点	性質	矿权者	发照年月	面积(亩)	最近产额	备注
煤	河北宛平門头溝	中英合办	通兴公司	1912	4,770	現不出煤	原为36亩后兩次 增区旋改名門头 溝公司并收并通 兴
"	"	"	裕懋公司	1914年 8月	4,486		
金	吉林东宁县綏芬支流	中俄合办	綏芬金矿 公司	1913年 10月	2,800		
煤	吉林县火石嶺	"	裕吉公司	1915年 6月	670		合同未批准
"	吉林額穆县望宝山	中英合办	郭哲臣与 李賴	1915年 11月	420		
"	安徽怀宁县董家冲等处	中日合办	中日实业 公司	1916年 4月	8,467	1.843吨	
"	河北宛平楊家坨	"	楊家坨煤 矿公司	1917年 2月	560	30,000吨	
銅	鳳城青城子小边溝	"	刘鼎臣	1918年 1月	1,820		与日人森峰一合 办
煤	撫順县东五十里石門寨	"	張順堂	1918年 4月	933		与日人降八十一 合办
"	撫順县得古土口子	"	姚銘勛	1919年 6月	1,598		"
"	撫順	"	大興公司	1916年 6月	921		日人飯田义一合 办
"	西安县北五里許半截河子	"	鄭立賢	1919年 1月	4,297		与日人守田辰得 合办
"	西安半截河子西嶺地方	"	楊魁元	1920年 3月	1,711		与日人松本健次 郎合办
"	西安孟河亮东北	"	梁北璠	1920年 3月	3,662		"
"	錦州县大窩溝龙尾巴等处	"	陈应南	1918年 12月	5,378		日人安川敬一郎

矿质	地 点	性质	矿权者	发照年月	面积(亩)	最近产额	备 考
煤	锦 西 沙 窝 屯	中日合办	李潤身	1919年3月	2,931		与日人守田辰得合办
磁土	复县南兴乡五湖嘴	"	孙以萍	1916年6月	1,620		与日商章津制次郎合办
铅	开 源	"	馮竹初	1919年7月	451		与日人筱崎軍吉合办
"	本 溪 吉 祥 峪	"	孙世荣	"	631		与日人浅田龟吉合办
煤	克 山	中俄合办	馬燕卿	1920年4月	5,040		
"	"	"	"	"	5,175		
"	章 邱 普 济 鎮	中日合办	旭华公司 管象坤	1921年2月	435亩		与日人岡崎忠雄合办

(三)經政府贖回者

矿质	地 点	前矿权者	成立年月	贖回用款	現矿权者	附 录
煤 鉄	山西盂县平定等处	英商福公司	1899	銀2,700,000兩	保晋公司	本地官紳請求集資
鉄	安徽銅陵县官山	英商凱約翰	1904	520,000元	經鋼公司	以逾限廢約
煤 鈔	四川江北厅	英商立德乐	1905	220,000兩	江合矿务公司	
各矿质	山东五处	德商瑞記洋行	1899	340,000兩		
"	沿膠济路十里内矿权	德国政府	1898	210,000元		
"	云南七府	英法云南兴隆公司	1902	1,500,000兩		債权至今未了
磷	东 沙 島	日本政府				日本强占交涉撤消
煤	湖北阳新县炭山灣	法商蒲尼		800,000兩	湖北省署	黎副总统提議

(四)經政府取銷或消灭者

矿质	地 点	矿 权 者	成立或发起年 月	取消年月	备 考
煤鉄砂	貴州銅仁	奧商戴瑪德	1899	1905	試办期滿营业失敗
金	福建邵武	法商大东公司	1902	1907	因不繳照費
煤	江西余干	中日实业公司	1914年7月	1915年2月	贖省以重復力爭取消

煤 金 石 石 金	江西平城乐	順濟公司	1914年	1918	標照逾期取消原 為中日合辦 唐元湛呈請中英 美合辦迄未實行
	遼寧海龍海	查盧亞子金礦公 司	1910		
	河北樂平縣	泰丰金礦公司		1918	
	河南道源縣		1914年3月	1918	
石 石 金	青石嶺 熱河豐寧寬 蕩 河北遷安熱 河建平平泉	周家鼎李士偉與 美商訂立合約		1918	以上三礦均于對 德宣戰時取消 部批修正合同事 遂中止

(五) 案未結者(附議訂合同中央尚未核准者)

礦質	地點	國名	備考
金	黑龍江右岸	俄	1901年訂立草勘草約, 1907年取消兩國互索賠償, 迄未解決。
各礦	四川	英	1898年四川礦務局與摩爾根訂立合同, 逾限應廢, 累次爭執未決。
石油	新疆	英	1920年中華礦業公司(中英合辦)呈請有案, 因新疆反對未決。
煤	廣東	英	英商嘉素于1920年與廣東省訂立勘礦合同, 中央未准。
煤及石油	山西	英	1920年福公司與山西省署訂立合同, 中央未准。

(六) 有借款關係者

礦質	地點	公司	開辦年月	欠款數	債權者	抵押品	備考
煤鐵	湖北大冶漢陽 與江西萍鄉	漢冶萍 公司	1884年6月	12,000,000 日金	日本八幡 制鐵所	新田 財產	訂有40年供 給礦砂及生 鐵合同 遵照鐵礦暫 行條例
鐵	安徽繁昌桃沖	裕公 公司	1914年7月	200,000元	中日實業 公司	礦砂	

按礦商之借外資者, 不止于此, 如安徽當塗寶興公司之于開礦, 當塗利民福民公司之于日本均有售砂借款關係, 惟遠不及上列兩礦之重要耳。

上所列七表, 雖不敢謂全無遺漏, 然光緒初年至今外資礦業之有案牘可稽者, 實皆具備。茲綜觀其結果, 完全外資之礦, 大抵由于外國政府之強求, 其國籍今仅限于俄日, 而尤以日本為最多。中外合辦之礦, 有特別契約者, 初皆由于私人之結合, 其名目或為借款或為合資, 而事權則無不完全操于外人之手。且無論完全外資, 或中外合辦,

其資本之國籍，无不与所謂勢力範圍有关，故在云南者为英法，在四川者为英，在山东者前为德，而今为日，在东三省者，則非俄即日，其利害得失，可令人深長思矣。尤可异者，贖回礦權，公私所費，共計洋70余万元，銀560余万兩，其分期交款者，尚有利息。（如隆興公司）故合計当在1,000万元以上。然當日讓与礦權時，政府固未得分文，取得礦權者，亦未嘗有所設施也。蓋此輩大抵非業礦之人，初未嘗有一定之礦，惟指某某省某某府某某鐵路為模範，而以其礦權為投機之具，間或于其中有所發見，則售其餘各地之礦權于吾國政府，以為資本。故福公司得款275万兩而開煤礦于焦作，膠濟鐵路公司，收費210,000萬元，以開煤礦于坊子巒山，而吾國官吏之任交涉者，猶以收回利權為功，誠可怪也。

自民國3年礦業條例頒布以後，中外合資，遂有定律，然迄今7年，照章領照者，90%以上，殆為日本國籍，且均在山東與東三省。其章程合同雖均以中日資本各半為準，然資本之來歷，事前既無從稽查，事權之分配，事後尤無從干涉，名實之不副，固其宜也。民國以來，朝野之所注意者，莫如鐵礦，故民國3年有鐵為國有之政策，非經政府特許，不能領照，其用意未嘗不善。但吾國煉廠過少，礦石苦無銷路，有礦而無廠者，勢不能不借出口以自給，于是售砂借款，遂為采鐵礦者唯一之生活，而條件之苛刻，事權之旁落，亦不可免。如表中所列之漢冶萍與裕繁公司，均為契約所束縛而不能解脫，蓋將來吾國鋼鐵事業發展之大障礙也。

三 民 礦

50年前之重要金屬品，若金銀銅鉛，均為政府所專有，開采不得自由。乾隆盛時，銅與鉛錫，視為要政，民辦官收，頗著成效，前既略言之矣。若金若銀，則內地原無佳礦，邊徼又為禁地，雖無苛政重稅，固亦不易言發展也。惟云南人吳尚賢，曾于滇邊之耿馬開采鉛銀，遂致巨富，然卒為滇中大吏所捕，瘦死獄中。私采金銀，懸為厲禁，其后無復敢問津者。若煤與鐵，則政府視為農余之生計，初不干涉。故其

并采之权，大半操之地主。然其时交通不便，迷信复深，地主居奇，外人裹足，既无法律之保障，亦无事业之可言也。迨光緒初叶，李文忠督直，始有提倡开矿之举。又以創兴海軍，缺乏燃料，故尤注意于煤。然其始款則出之于商，而事則操之于官，故开平矿务局以官督商办称，即山东嶧县之煤矿，亦开始于光緒五年之官窑总局，其法律手續，均根据于奉案，其專权則出于北洋通商大臣，非尋常商民之所敢过問者也。厥后路矿設局，欽簡督办大臣始漸有开放之議。然所立章程，均多苟簡窒碍，不能实行。直至光緒33年，張文襄入樞府，始有大清矿务章程之規定，是为吾国矿法之嚆矢，其內容多参照各国矿律，頗以保护提倡为主义，然其第十八款規定，凡各矿所得利益，“除开支一切用費外，淨存余利，业主（即地面业主）应得十成之二五，国家酌提十成之二五，矿商应得十成之五，”国家与地主，坐分矿商利益之一半，又孰肯以資本心力为他人作牛馬者。况开矿領照，必先得地主之同意，为迷信者开阻撓之門，奸猾者留敲詐之具，宜商民之裹足不前，毫无成績也。盖官吏之勒索，与地方之牽制，为矿业发展之大障碍，終前清之世，不能革除。茲就呈部立案各大公司，考其資本数目成立年月，矿质产額，同列一表。而附以各矿质領照注册面积之总数，以供参考焉。

重要民矿一覽表

公司名称	矿质	股本(万元)	地点	注册年月	最近产額(吨)
中兴公司	煤	500	山东嶧县棗庄	1905,9	683,112
汉冶萍公司	煤鉄	2,000	湖北大冶汉阳与萍乡	1908,2	鉄 824,491 煤 790,168
江合公司	煤	20万兩	重庆	1909	?
賈汪公司	煤	200	江苏銅山賈家灣	1915	143,093
六河溝公司	煤		河南安阳	1907	232,618
柳江公司	煤	72	河北临榆柳江	1918	94,492
天源公司	煤	15	山东章邱埠村	1919	尙未出煤
井陘正丰公司	煤	17.82	河北井陘	1919	82,974
山西保晋公司	煤	300万兩	山西平定阳泉	1906	185,560
鄱乐公司	煤	100	江西鄱阳乐平	1919	尙未出煤

公司名稱	礦質	股本(萬元)	地 點	注册年月	最近產額(噸)
長興公司	煤	220	浙江長興	1920	1,840
普益公司	煤	30	安徽鳳陽蚌埠	1922	13,000
同寶公司	煤	300	山西大同胡家灣	1921	尙未出煤
中和公司	煤	24	河北磁縣		5,000
怡立公司	煤		河北磁縣		24,148
北票公司		500	熱河朝陽北票	1921	尙未出煤
昌明公司			江西吉安		13,230
華豐公司			山東寧陽		37,761
華昌公司	錫	150	湖南長沙	1908	近已暫停
裕繁公司	鐵		安徽繁昌桃冲		62,220
寶興公司	鐵		安徽當塗		44,389
揚子機器公司	煉鐵		湖北漢口	1920	約日出100
裕盛公司	鐵		湖南湘潭	1916	4,658

領 照 數 表

礦 質	探 (畝)	采 (畝)	礦 質	探 (畝)	采 (畝)
金	93,607.5	187,813	鉛	5,473	3,980
銅	24,594.4	20,138.5	石	166	7,893.9
鐵	22,973.9	141,558.6	石		1,080
鉛	32,624	42,966.5	石	554.3	6,025.9
錫	6,348.1	9,254.7	土		2,269.7
煤	1,804,020.9	1,468,836.9	土	50	18,706.9
石 棉		16,535.7	鉛	2,139.8	2,700
重晶石		55.5	銀	1,537.4	32,400
硫化鐵		1,297.5	錫	30,705.3	19,571.3
顏料石		156.9	銅		1,572
銀	7,600.2	5,831.2	石	1,858.6	850
鉍	4,301.1	5,841	磷		133.7
錳		295.4	磷酸灰		2,179.5
云 母	61	1,097.9	大理石		60
硫 磺		3,217	鉍	1,098.3	5,484.2
銅 鉛	1,075.8		鉍 鉛	554.1	1,253.6
銀 鉛	2,700	960	鉛 銅	255	
水 銀	2,417.5		銅 鉍 鉛	295.6	

綠松石		26	磁 灰	170	148
鐵 錳		806	雄 黃		64
煤 鐵	30		石 灰	810	
錫	1,784	13,385又5里 44丈9尺	鉛	3,671.9	
錫 砒	1,219	96	硃 砂	726.5	
鉛 錫	52		金 砂	8方里56由8丈	163
鉛 錳		277	總 計	3,225.47方里	3,749.6方里
鉛 砒		136			
鉛 錫	384.6				

民矿之历史，多极复杂。兹限于篇幅，不能详述，仅举汉冶萍与中兴两公司为例，以类其余。盖不特其成敗得失，有关于吾国国势之盛衰，且其因革变迁，实足以代表时代之潮流也。

光緒16年，張文襄督兩广，議設鐵厂，使駐英公使薛福成轉請英國梯賽特厂，代為計劃。然于原料之來源，矿石之性質，初未遠計也。迨机爐購定，文襄去之鄂，繼任者為李翰章，頗不善其所為。文襄乃移其厂于湖北。适光緒20年，盛宣怀以所发现之大冶鐵矿献之文襄，其明年文襄遂建厂于汉阳。然有鐵矿而无焦炭，鐵不能煉。初文襄告戶部，得200万即可周轉，至是用款500万，而鐵未出，部中頗有違言，文襄大困。乃于光緒22年，奏請交盛宣怀招商承辦，每生鐵一吨，納銀一兩，以為还本之用。照章程应招商股100万兩，督辦由商股公舉，鄂督奏派。23年，盛宣怀添招股200万兩，督辦厂事，24年，始从德国矿师言，借德款400万馬克，以經營萍乡煤矿，于是燃料有着，規模稍具焉。然文襄原定鋼爐，与矿质成分不合，故所出鋼軌含磷太多，为京汉鐵路所拒。乃于光緒30年，以日本所預付矿石价日金300万元，建筑新厂。光緒33年告成，次年奏准組織汉冶萍公司，完全改归商辦，至宣統3年，先后收股約1,000万兩，而負債倍之。辛亥革命，全厂停工，盛氏出亡，經費大絀，遂有民国2年日本制鐵所1,500万元之借款，預約于40年內供給日本鐵矿1,500万吨，生鐵800万吨，其价值以日本制鐵所購入价值为准，并不得于国外另借他款。民国4年5月，日本二十一条要求中，复有“此后汉冶萍公司之不得收归国有，倘該公司与日本資本家商定合办时，应即照准，又不使該公司借用日本以外之外国資本”等語。盖自有民国2年之合同，汉冶萍公司，不复能自由独立矣。近六、七年来，虽因鐵价驟增，年分紅利，然汉阳产

額，因南北戰爭而屢減，大冶新廠，因歐洲大戰而停頓，公司之前途，正未可遽取樂觀也。

中興公司之歷史，與漢冶萍似同而實異，蓋亦始于官督商辦，繼于借外重資，然卒以辦事人之忠誠，值時會之順利，而成今日振興之局。溯其原起，則亦倡始于李文忠。文忠于光緒6年奏辦嶧縣礦局，派戴華藻以2萬金先辦土窯，成績頗著。至21年，因水患淹沒工人300余名，為東撫秉李文所封。22年，由直督裕祿直隸礦務督辦張翼派張蓮芬接辦，議添招德股，改名為華德中興公司。其後德股未集，改用華股，至31年收股80萬兩，改名為中興有限公司，呈部註冊，34年，自修台棗支路運煤，張蓮芬復辭兗州道員，專任公司總理。棄官營業，毀家紓難，五十年来，一人而已。民國4年大井新成，忽招水禍，張君未几病歿，幸繼任者善承其志，又值歐戰，煤價驟增，遂獲厚利。年来增加產額，添開新井。民礦中成立既以中興為最早，成績亦當以中興為最著也。

歐洲戰爭，其影響之及于吾國礦業者，至重且大。蓋戰爭期中，礦物金品，價值驟增。北方之業煤者，因得借以立足。中興之成功，既已如上所言，其他如河南之六河溝，河北之怡立柳江，江蘇之賈旺，安徽之烈山，无不因之而獲利。六河溝煤礦，且以其余力收買臨城礦務局比國之借款。

南方之金屬礦，與北方之煤礦同受歐戰之影響，故湖南之錫，民國3年不過值200萬餘元，至五、六年，殆值千萬。其他如錫如水銀如鋅鉛，產額既有增加，價值亦皆驟漲。其尤可驚異者，厥為鎢礦。鎢之發現，始于民國4年，至6、7年，則江西湖南廣東所產几達4,000余噸，價值1,000萬元。世界產鎢之國，除美國外，殆以吾國為最盛。所可惜者，南方金屬各礦，開采均用土法，組織初無規模，成則互爭，敗則瓦解，故歐戰既停，銷路忽滯，改革無術，失敗接踵，與北方之煤礦相較，然後知新舊之不能相容，土法之不易持久也。

(摘自申報館“最近之五十年”(1872-1921)一書
丁文江著“五十年来之中國礦業”)

1912—1918年中国的近代矿业

民国元年我国境内采矿已甚风行，西法开矿业计有31家之多：

		煤矿	煤铁矿	铁矿	铜矿	铅锌矿	锑矿	金矿	石油矿	锡矿
合 河 山 广 东 江 河 山 重 湖 云 四 湖 热 陕	計	17	2	1	4	1	2	2	1	1
	北	4								
	东	4		1						
	西	1					1			
	北	4	1		1			1		
	西	1			1					
	南	1			1					
	市	1								
	北		1							1
	南				1					
川						1	1			
南								1		
河									1	
西										

(注)表中系包括开滦(中英合办), 峰县, 富贾, 余干(江西), 鸡鸣山(河北), 临城(中比合办), 井陘(中德合办), 撫順(日资), 辽阳(日资), 宽城子(日资), 濰县坊子(德资), 淄川(德资), 扎賚諾尔(俄资), 中兴, 六河溝, 重庆江合, 山西保晋等煤矿, 益都金嶺鎮(德资)之铁矿, 汉冶萍, 本溪湖等煤铁矿, 山西陳州, 贛州, 磐石, 彭县等铜矿, 湖南官矿局之铅锌矿, 长沙华昌, 广西官立煉錫厂等錫矿, 漠河, 平远(热河建平)等金矿, 延長之石油矿, 箇伯之錫矿。

产量以民初之每年产额有如下表：(民国5年)

金 (兩)	108,630	錳 (吨)	1,900	砒 (吨)	1,000
銀 (兩)	29,200	錫 (吨)	81,600	硫 (吨)	770
鉛 (吨)	1,441	銻 (吨)	純銻10,400	明矾(吨)	16,200
	砂9,684		生銻16,100	石膏(吨)	27,120
鋅 (吨)	1,360	汞 (吨)	314	石油(吨)	500
	砂27,242	銅 (吨)	2		
銅 (吨)	1,342	鎢 (吨)	2,000		
鐵 (吨)	355,750	煤 (吨)	15,584,000		
	砂1,338,520				

民国7年全国矿业調查：(欧战期間)

一、国人資本者

采金业 13 处(湖南会同、平江、桃源, 山东沂水, 年产 62,827 兩
热河承德, 黑龙江漠河, 奇乾河,
观音山都魯山, 呼瑪, 吉林依蘭,
穆陵, 新疆于闐)

采錫业 5 处(湖南临武, 江华, 云南箇旧, 广西富川賀县)
年产1,082吨

采鉛銻业 3 处(云南东川, 湖南常宁)
年产 鉛 10,284吨
銻 6,704吨
(內一处未詳)

采銻业 4 处(湖南長沙, 新化, 沅陵, 溆浦, 貴
州銅仁)

采銻鉛銅錫 1 处(湖南常柱)

采銅业 3 处(云南东川, 湖北大冶阳新, 四川
彭县)
年产624吨
(內一处未詳)

采鉄业 2 处(河北宣化, 湖北大冶)
年产69,191吨
(內一处未詳)

采煤业 16 处(河北临城, 宣化, 临榆, 宛平, 磁
县, 湖北阳新, 江西余干, 萍乡,
广西富川賀县, 山西平定阳泉,
年产2,506,345吨
(內五处未詳)

江苏徐州,河南安阳,四川重庆。)

采錳业 1 家(湖南湘潭) 年产4,653吨

二、外人資本者

采煤业 11 家(内7处有华資在内)(奉天撫順, 辽阳,本溪,山东濰县,淄川,直 (内2家未計在内)
隶临城,井陘,开平灤州,河南修
武,沁阳,焦作,热河阜新)

采鉄业 2 家(内一处有华資在内)(山东益都 年产172,965吨
金嶺鎮,奉天本溪湖庙兒溝)

采金业 1 家(有华資在内)(热河建平)

采銀銅业 1 家(有华資在内)(吉林延吉天宝山) 年产銅 100吨

采褐炭业 1 家(黑龙江滿洲里扎賚諾尔) 年产 1,200,000吨

当欧战(民5至民9)末期中国曾对德宣战,在华德国矿穴依法均可由我接受,但因日本占我膠济綫(包括坊子,博山二煤矿及金嶺鎮鉄矿),故該省德国产业无法移交(三矿后均由日本政府經營)中国官方实际接受者,祇井陘煤矿(有华資在内)一处耳。

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由于鉄价暴漲,中国本部唯一之大型鉄矿,龙烟鉄矿(直隶宣化龙烟及烟囪山)开始成立,日产矿石500—700吨,获利甚厚,乃由政府与商人合办,但欧洲和平后,該矿即因市場日促,复因历年战争,致厂务不能发展,湖北之大冶鉄厂亦因向日借款关系,每年廉价向外运出大量矿砂,而自身則因此亏损甚巨。

民族工业集中的五种形式

(编者按：关于民族工业的集中情况，已见下述“民族资本创办和经营的若干厂矿”各个企业，故本书不单独另辟一节。请参阅该节各厂矿资料。)

在將近三年的長期抗战中，由于事实的需要，民营工业的組織上，产生出一个新动向。新动向唯何？即民营工厂之“联合生产”是。生产物品的种类各有不同；联合程度的深淺各有不同；联合的动机亦各有不同。我們如以联合的动机为分类的标准，目下工厂之联合，約有五种。茲各举一事例，以明其联合的性质与内容。

一、由于机器的利用而形成的联合 这种联合，可以保卫大武汉时供应兵工器材为例。当时由上海及其他各地迁移武汉的工厂，临时复工者，共有66厂。其中承造軍用品者，占2/3，計44厂。惟各厂皆系匆促迁来，机器設備，未能俱全，故力能承造一种兵工器材全部工作之工厂甚少，大多数只是一种器材之局部工作或零件。这种事实，使机器有相互补充作用的厂家，彼此联合，共同承作。某一机器厂，缺乏制造精細五金之工具，乃与一科学仪器制造厂相联合；因无电焊之設備，更与一电焊厂相联合；因无翻砂之設備，更与一翻砂厂相联合；于是由翻砂以至于精制及电焊，皆得在此联合生产中完成。当时承造軍用品之44厂中，曾形成四个集团，(以关軍需生产，未便指名)每一集团，以一較大工厂为中心，包括5、6厂以至10余厂不等。各种迫击炮彈，炸彈，地雷，水雷，防毒面具等軍用品多賴其生产，以为兵工厂之輔助，裨益抗战，实非淺鮮。至其联合办法，約有二种：(一)是于每次承接工作之后，即按所屬各厂生产能力，分配制造。以承接迫击炮彈及手榴彈为例，使翻砂厂担任翻鑄彈壳，鑽床多之工厂担任釘眼，車床多之工厂担任車制。如斯分工合作，得完全一件产品。惟此种联合，各厂厂址既不相連，每每每一件物品，須往返运送，時間脚力

自多亏损，以致增高生产成本。在訂制机关，已嫌單价太高；而在承制工厂，未必有多少利潤。而管理各自为政，生产技术难期标准化。其因某厂鑽眼或車工不良，以至連帶翻砂者須重为翻鑄，亦間或有之。此为最松懈之联合。(二)是各厂机器合并，集中同一厂址，自可較节省开支，齐一标准。惟經營管理上，亦未能統一，其联合程度較前一种稍进一步，但在生产效率上，仍大有改进的余地。惜因时期較短，即行再迁，其联合程度，止此而已。現在迁川各厂之联合，則有以机器估价，作为股本，改組为一新公司者。

二、由于承攬工活而形成的联合 这可以湘西楚胜染織联合公司举例。当广州失守，武汉撤退之际，經濟部工矿調整处鉴于將來軍事重心，將移湖南，曾督導122家小規模工厂迁移湘西，俾得随軍事之轉移，为灵活之供应。此百余厂中，以机器工厂为最多共50家，外有23家为紡織染业，先后在湖南各处复工生产，以承做軍医署之綳帶为主要业务。惟是各厂資本較小，信用未立，承攬工活，甚屬困难，故多由某城大布店轉包，工活利潤无形为轉包商分夺而去。且工活攬到，又因流动資金竭蹶，不能預購足用原料，盈亏亦殊无把握。各厂有鉴于此，遂決議合組楚胜联合公司，其办法詳訂于公司章程內，要点如下：

(一)公司总資本定为若干元，作为若干整股，每整股分为若干小股，每小股100元。股东每一整股有一权，数人可共認一整股，推定一人行使其股东权。

(二)各股东厂家原有之机器，一律注册，以后承办各种生意，均照机分攤，各股东不得任意推諉，或强派，并不得勾誘或煽惑。如查出此种情事，即將联座整股資本充公，并受相当处分。

(三)公司經手人承接各种生意，以每次所得贏余10%为負責交际費，40%为公积金，其余按股攤分。

(四)零星生意，以100元以內为限，各股东得私相接洽，但須在公司声明，否則查出將貨充公。其超过100元以外者，归公司所有权，盈余交际費，照上述所訂。

(五)承办各种生意，向有規定，各股东不得任意偷工减料。如查

出此种情弊，即將該整股联座股款充公，并負賠償公司損失及罰金之責。

(六)公司承接生意，工資皆一律普通計算。

(七)公司进出銀錢貨物，均由經理人負完全責任，但在此非常时期，如遇天灾盈亏等情，各按天命。規定以五，八，腊为清算期，盈亏年終結核，照股均分。

这种联合，不但充裕了流动資金，增强了公司信用，且免去竞争弊害，保障产品成色，及工資水准，頗蒙政府嘉勉。惟組織成立未久，即发生糾紛。經查糾紛的原因，乃由于集股各厂，所納股本之多寡，并非与各厂織机数成正比例。当生意攬到后，即由公司扣下一部分利益，再按各厂机数之多寡，分配工作。所扣利益，用作一切开銷外，如倘有余时，即按各股东股本多寡均分。至按机数多寡分配各厂工作所得盈利，則归各厂所得。該公司負責人，系股本多而机数少者，致有时生意攬到后，并不分发各股东厂家工作，而轉包他厂。由于轉包所得之利益固仍屬公司，但股本少而机数多之厂家則蒙受損失；反之股本多而机数少之厂，則得利独多。嗣經政府派員指导改善，乃得圓滿解决。一种初試的联合，自不免发生意想不到的困难，倘能善为导引，不难日趨有功。

三、由于求原料自給而形成的联合 这可以某市机器业同业公会所組織的协合煉鉄厂，和川黔火柴工商业联合会，及大中华火柴股份有限公司合組之中国火柴原料厂举例。鉄为机器工业所用之原料，其他工业所需作业机之制造修理与配备，亦非鉄不可，至兵工厂之需鉄，更不待言。惟是我国鉄矿虽丰，而开采甚少，平时已嫌不敷机器工业与冶煉工业之用。抗战以后产鉄区域，几全陷于敌手，来源断絕，而后方存量有限。迁至內地某省工厂223家，以机器业为最多，計96家，首先注意到这个問題，故发起組織机器业同业公会，同时即由同业工会共謀用鉄之自給。其計劃有二：一为治标，与原有土爐合作。土爐所产之鉄，俗称白口，以冶煉时温度較低，至含硫成分过少（仅0.2%）質地坚硬，不易車制。如欲利用土鉄，必須提高冶煉温度，將含

砂成分，增加1%至2%，使白口成为灰口。机器业同业公会，乃決議共同投資与多数之土爐，使裝設动力，鼓送热风，并将一部分之爐壁改用火磚，更与以技术上之协助，俾冶煉温度提高，铁质即可合用。二为治本，即合組协和煉铁厂股份有限公司，自行煉铁。計同业参加股东者，約30余家，共出資本之半数，由經濟部工矿調整处借款协助半数，完全依照公司法股份有限公司之規定办理。惟股东利益不在營利之多少，而在（一）所用原料之能以自給，无須外求；（二）購用生铁所出代价，可較市价为廉；及（三）冶煉技术有專家指导，铁之品质，保証适用三点。至火柴原料厂之发起，乃因政府明令改制安全火柴，惟其重要部分之必需原料品，如赤磷（包括硫化磷在內）上等牛皮膠，氯酸钾，錫粉等类，往昔皆仰給舶来品，現因外汇及运输关系，入口不易，拟設厂自制，以謀火柴原料之自給自足。由川黔火柴工商业联合，与大中华火柴股份有限公司发起組織，股东皆系火柴业同业，現已認股者11厂，完全依照公司法股份有限公司規定办理。惟有兩点值得特別提出者：（一）其业务，除制造上述原料品外，尙附設“杂药”配合工厂。“杂药”为配合药剂，品类及用量均較繁伙；而配合工作，非俱有技术經驗之人不能办，絕非一般小規模火柴厂所能自理。此同业合組之工厂，資本雄厚，規模較大，有力聘請專家，專司“杂药”配合工作。將火柴所需各項药料，除赤磷，膠，氯酸钾，等品，实际应用稍异，不能預加入內者，得指明配量用法外，悉行按定式調和完善，以备各火柴厂随时取給使用。（二）其籌募股款方法，除各同业厂家自由認定之股款外，尙有附征股款办法。各同业工厂無論自由認定股款与否，一例按出品售价，每箱附帶征股款10元。自由認股，与附征股权利，一律平等。附征股款，呈請財政部，于征收統稅时，負責代收，汇交指定銀行。在未起征前，所缺股款，呈請經濟部工矿調整处，予以协助借貸，將來即以附征股款，随征随还。

四、为解决运输困难而形成的联合 此事发起于迁川工厂，僉以抗战时期，后方工业建設之机器工具及原料，虽在力求自給，但仍不免由滬港迁运，及自海外入口，而仰給西南公路之运输。惟是西南

公路，車輛有限，官商待輸物資甚多。亟宜自行籌辦運輸，方能迅速復工，增強生產。遂決議合組運輸處，自修運輸汽車，呈准駛行西南各公路，專供會員工廠運輸器材之用。處中經費，由該會有運輸需要之會員工廠，自由認定，計認股者34廠（內遷川工廠31家在川工廠3家）。裝載噸位之多寡，即依各廠家所認繳經費之比例，為分配標準。年終結算，得有盈餘時，除提存公積金、息金、職工獎勵金、及公益金外，按所出經費額，攤還會員工廠。並明定如經費損失過半時，得由理事會召集臨時會員大會解決之。

五、為新建工業區而形成的聯合 經濟部工礦調整處以遷川工廠及在川增設工廠，日漸增多，如使仍搜集原有工業市區，有違防空疏散之旨。爰于長江沿岸，勘定地區，圈購土地，劃為新工業區，協助新遷及新建各廠，建廠于此。惟原屬江岸荒坡，人且鮮到，一旦要建廠其地，大之治安，交通，用電，小之零星購買日用品皆成問題。各廠生產部門，雖各不同，而其對於上述問題，則有同等要求，必須群策群力，共謀解決。遂共同決議組織某某工業區公共事業籌備處，先由各廠按用地面積，每亩攤費若干元，為公用準備金，計劃進行下列諸事：（一）交通。與附近都市聯絡交通，由各廠投資合組一公司辦理之。本區內交通，則建臨江及廠與廠間之馬路，費用攤算。（二）治安。廠內警察，由各廠自僱，待遇一律。碼頭及交通警察，向地方機關請派。所有廠警待遇標準及自願警之人數與崗位，各廠共同商定。（三）碼頭。擇定適當地點，建築碼頭，並備起重機，費用公共負擔。（四）用電。先請電力公司設法供電、徐圖各廠自設發電機，即由本區內之機器廠，盡量增製煤氣機，以應各廠需要。（五）用水。先以鐵管伸入江中抽水，至一高處，建總蓄水池，然後以水管或水溝分配各廠使用。（六）廠房建築。各廠廠房建築設計，互相取得聯絡。（七）勞工福利。各廠在不相妨礙原則下，自行雇用，待遇標準一律。並籌辦診療所一所，建築費與開辦費，由公用準備金撥支；經常費，由每月每廠就診人數攤派。消費合作社一所，除自用品之購銷外並有理髮室、食堂、及浴室等。建築費及開辦費，先由公用準備金墊借，將來招股撥還。

（摘自盧郁文：“民營組織之新動向”，新經濟第3卷第6期1940年3月出版）

附录：抗日战争时期民族资产阶级 向国民党呼吁解决困难文件

(1) 工业界之困难与期望

領袖有言：“无科学即无国防，无国防即无国家，”运用科学，以实现国防建设者，则为工业。现在国家之组织，不问遵循何种主义，无不以开发工业为要务。国父所著实业计划，伟大周详，无与伦比，然一言以蔽之，则为“国家之工业化”而已。

国家之建设，固有赖于工业之开发，工业之发展，亦有赖于国家之强盛独立。举世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国家，有能为工业国者乎？朝鲜、台湾、安南、缅甸之人民，有能为工业家者乎？印度在1926年后，独立运动抬头，始稍稍奠定民族工业之初基。吾人如不健忘，当犹忆民24年春间，敌人曾提出所谓“中日经济提携”口号，诱我降服，而其最高原则，即为“工业日本，农业中国”。我政府国民深知非工业无以谋国家之生存，一致反对，遂终有“七七”事变之爆发。故此次抗战，谓为国家独立而战固宜，谓为工业自由而战，亦无不可。在战争过程中，敌人摧毁我工业，不遗余力。我工业界初亦有翼在敌人铁蹄下苟延残喘者，今则尽化乌有矣！工业为独立国家之光荣事业，工业家为独立国国民之神圣工作，我工业界实有同感焉。因此，吾人敢为下一转语：“无国家即无工业！”

我后方工业界在国家保护之下，迄今犹能呼吸自由空气，以从事于此独立国国民之神圣工作，饮水思源，自惟感奋之不遑。回顾沦陷区同业之备受蹂躏，更当警惕之有加。我后方工业界尤多间关万里，历万险，冒万难，以迁来此间者。当其开始迁移之际，早已具与国家同休戚，共存亡之决心。生死以之，义无反顾。历史之教训如彼，自身之意志如此，其谁顾唯战时暴利之是图？此当为社会之所共谅者。

實言之，我工業界之所期求者，厥唯生產力之保持與發展。工業生產力之保持與發展，為抗戰所切需，為建國所必具，而非僅為我工業界自身之利益。大勢所趨，民生主義之須徹底實現，已無容疑。我工業界類多深明大義之人，對於三民主義之擁護，早矢赤誠，誰復再斤斤於本身之利益？“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國家強盛，社會安寧，乃足以言事業之發展；而國家之強盛與社會之安寧，則又有賴於全國國民之協力。我工業界亦唯求盡國民之天職而已。本此原則，敢將我工業界當前之困難及其所望於我政府及社會人士者，申述如次：

甲、關於稅捐者

戰時稅捐，原以收縮通貨，穩定物價為最大前提。故稅捐之課征，必為通貨膨脹之所在，而課征之足以刺激物價者，則須力求避免。兩年以來，農產價格之高漲，遠過於自制工業品及一般商品。故通貨之膨脹，已不在都市工商業，而在農村土地。然捐稅之課征，則工商業仍遠重土地。田賦征實之後，地主負擔，平均仍不過地租收入5%，故此種形勢，依然存在。稅捐重心，究應如何重建，及應否採用稅捐以外之方法，為收縮通貨之主要手段，實為當前亟待研討之問題。

然我工業界之所特引為危懼者，則為所有資產，多數為日損月耗之房屋及機器。依法定百分率提存折舊準備，則因原價與現價之懸殊，勢將無法除舊以布新。再執此以計算盈餘，繳納稅款，則虛盈實稅之結果，流動資金日拙，將使生產逐步低落，而終于無以為繼。欲圖補救，非不斷增資，即須相互合併，以圖力量之增強。但言增資，則須求新舊股東權益之平衡，即須重估資產之價值。資產重估之結果，復見虛盈，復課實稅，則增資之收入，或不足以償稅捐之支出，是又不如不增資之為愈。合併之進行，雙方亦須重估資產之價值，仍須繳納法定之稅捐，則其得不償失之情況，且較增資為更甚。此為直接稅所引起之困難。

以言間接稅，則其影響物價之嚴重，亦為甚值注意之問題。商人之轉嫁稅款，恒須加計利潤；故課征者少，轉嫁者多，已成通例。因此

通貨之借稅捐之課征而收縮者較少，而依物價之高漲而膨脹者則較多。就通貨觀點而言，已屬得不償失。就財政觀點而言，則其得失，須視漲價之商品，是否為國防民生必需品及國庫支出增加之多寡而定也。

由上所述，吾人謹提出下列之意見：

一、稅制之改進，固為建國所切需，然在物價高漲之今日，稅捐恐已不能再為收縮通貨之主要手段。時賢主張提存租谷8,000萬担之價值，或為當前平衡預算，收縮通貨，穩定物價之最有效方法。甚至即退一步發給一部分金公債，亦屬利多害少。如能實行，我工業界自亦願同時依照地租提存百分率提存其所得利潤，以共謀渡過當前經濟難關。惟有須補充者，即提存辦法實施之後，必須擴大農貸工貸，以調劑農工業金融，使不影響生產而後可。

二、所得稅及過分利得稅，原須以個人所得及利得為課征之對象，始能達平均財富之目的。若以產業組織為對象，則損害組織之發展者多，而影響個人之財富者微，實非得策。我國社會組織不密，調查不周，對人征課，困難自多。然如因此而遽以僅有之產業組織為對象，則人人厭棄組織，相率化整為零；向之組織不密者，將演變而為無組織，危險何堪設想！平時如此，物價高漲之今日尤然。如能先改為對分派利潤課征（即對股東紅利及職工酬勞金課征），將來再進一步對個人之綜合所得利得課征，則在目前，即可與產業組織以救濟，而在將來，更可得資本積蓄及稅制合理之善果。一轉移間，利害之趨勢迥異。民生主義之理想，對於個人財富，固應求其均平，而對於產業組織，仍須求其擴大。現代之產業，必須為大規模之經營，早為經濟學者之所共認，而國家為管制之便與生產效率之高，自亦應鼓勵此種發展也。

三、間接稅之增加，須極端審慎。對於國防民生必需品，尤不能任其因增稅而刺激市價。消費稅之施行，如用以代替前方各省重迭之課征，自與物價大有裨益，然若在內地遍設關卡，加重貨運之負擔，則又甚非物價之福。嚴密外綫之防范，便利內地之運輸，在當前實屬

极端必要。

乙、关于资金者

通货膨胀进入一定阶段后，工商业流动资金，日趋窘迫，原为历史上各国共通之现象。我国目下物价之趋势，原料之高漲，往往速于工业成品之高漲，故工业界当每一度再生产之际，即已感资金之不足。我国工业投资，素极消乏。后方工业战后之地位，以及民营工业在整个工业建设中之地位，迄今倘未有明文之保障，亦足使投资者裹足。益以近年来虚盈实税之影响，拥有资金者，相率化整为零，以从事于商业上之囤积，或存放比期款项，以谋较大之利润，并保持资金之活动。孰复愿冒巨险，博薄利以投资于工业？一面资金需要，随再生产之度数而累增，而另一面资金来源，反益陷枯竭，我工业界欲求维持其生产额，诚有心余力绌之感矣！

当此抗战进入决定阶段，海口完全封锁，战时经济须谋彻底自力更生之际，政府社会之所期望于我工业界者，倍极迫切，而我工业界资金周轉，日陷艰窘，每一念及，实感寢食之难安。痛苦之深，遂不觉呼吁之切，我工业界多能以实事求是自励，决非故为无病之呻也。

为求工业资金问题之解决，我工业界深知政府不欲通货膨胀，与夫金融业不愿资金之多数冻结，均有其不得已之苦衷。故认为正本清源之道，端在吸收社会游资，以供工业生产之用。然治标之計，仍非扩充工贷不为功。而欲吸收社会游资，则又非特予工业投资以合理之鼓励不可。本此原则，吾人谨提供下列之意见：

一、建立产业证券市场，使工业能借股票之发行吸收社会游资，以辟自力更生之资金来源。一面并请政府另拨美金借款一部分作为股票发行之保证，以坚社会之信仰。或由政府发行产业投资信托证券，在证券市场出售，由政府与工业界之合力，求其推行尽利；即以所获得之资金，供工业上周转之用。

二、政府为谋产业之发展及国家组织之进步，亟应鼓励有限公司之组织。为求税务行政之便利及一般管制之贯彻，更应力求公开

公司(Public Company)組織之发达，是亦非有証券市場以便利公司股票之公开发行不可。同时，前述稅捐改以个人为課征对象之建議，更須求其迅速实现，使人民不以产业組織为畏途。

三、在稅捐改以个人为課征对象之建議尙未实行之前，对于因增資或合作之必要而重估资产价值所表现之虛盈，应免于課征所得稅及过分利得稅，或將所收稅捐发还，作为补助費。

四、在証券市場尙未发达健全之前，工貸款額，仍須扩大，且应由專責机关或專業銀行，以通常业务方式，負責推行，以求其效果之宏大。查民营工矿事业之生产价值，全年当不下百万万元，(29年为47万万元，年来物价倍增，估計当不下100万万元，)而貸款总額，仅一万数千万元，尙不及2%。此一面足以表示貸款數額之过微，实有扩充之必要，另一面亦足証生产浪費之說之无据也。

五、后方工业在战后整个經濟建設中之地位，及民营工业在整个工业建設中之地位，均应与以明令之保障，以期經營之安心与投資之踴跃。

丙、关于原料者

海口全部封鎖以后，若干仰給国外之工业原料，益感缺乏，亦为当前工业上之危机。五金电料自經軍政部征購后，民营工厂，困苦万狀。国家在战争时期，軍事第一，本屬理所应然。然如能尽調剂盈虛之能事，使民营工业稍得便利，則同屬国力之增張，自亦为我賢明政府之所乐聞。本此意义，謹提供下列之意見：

一、所有后方缺乏之工业原料，应有一地位較高之机关，負統籌之責。不問国营、省营、民营工厂，均須报告其存量于此統籌机关，并接受其支配；使能調度自如，有如中央銀行之集中准备以謀合理之运用。同时严格限制此項原料之用途，使无絲毫之浮濫。

二、可能自造之原料，应由国家尽力予以獎助，以求自給。

三、保障今后运商之利益，并便利其运输，俾能以种种方法，由淪陷区輸入必需原料。

丁、关于运输者

运输便利，则商货来源畅旺，物资问题，自可减少其严重性。商人如无意外之烦扰，不特乐于营运，且可减低成本，则物价自亦可稍稍稳定。我工业界原料之获得与成品之销售，均有赖于运输之便利；故期望运输之改善者，至为迫切，仅供意见如下：

一、关卡之设置，不应仅以增加税收为目的，而须同时顾及对于物资及物价之影响。因此，内地关卡，应尽量移设外线。市为一经济单位，市区之内，工商业有互相依存之关系，尤不能设立关卡于其间，强加支割，使市民负担，失其平衡，市之发展，受其影响。

二、严禁任意扣留商货，甚至擅作充公罚款之处分。关卡扣留商货，须于24小时内，将案移送法院办理（商货仍存扣留关卡，以免转运之耗资）以期人权物权，同得法律之保障。

三、军事机关及地方政府所设检查机关，须明定其查緝之标的，绝对不许干涉合法货运。

戊、关于管制者

工业界本身须有健全之组织与严密之管理，故亦热望国家组织之健全与管理之严密。我工业界对于政府战时统制管理之设施，诚如蒋委员长所言，但望其更加严密，更加周到，更加彻底而决无任何之疑虑。唯其严密周到彻底，然后刁顽者不敢玩法以自私，贪渎者不敢枉法以自肥；人民之牺牲，即为国力之增强，而无丝毫侵蚀浪费存在于其间。如是则不仅抗战动员，得充分集中力量之效果，政治益臻清明，且可树立建国久远之规模。本此意义，谨提供意见如下：

一、管制机构须求一元化。管制为战时紧急措施，必指挥灵活，行动敏捷，乃能适应战时之需要。而欲达此目的，又须机构统一，权责分明，始能收如身使臂，臂使指之效果。否则机构重叠，政令纷歧，推诿留难，在所难免。战时有限之人力，因而浪费于往返中周折之，战时宝贵之物资，因而有消耗于腐蚀，损毁于炮火，甚至遗弃资敌者！

人民之損失大，則供獻于國家者必微；人民之阻碍多，則趨赴國家之号召者必遲。理有固然，無俟詳述也。

二、管制工作之執行，須由行政機關負責。戰爭為政治之延長，戰時“軍事第一”之要求，仍須運用原有行政機構以達成之。交戰國雖有特設戰時內閣者，然其政令之執行，則仍一賴原有之行政體系；宣告入于緊急狀態之區域，有交由軍事長官負責者，然其命令之實施，亦仍假手于原有之行政機構。良以人民之觀感，喜單一而厭紛歧，而行政為專門技術，更非率爾摻操觚者之所能勝任也。我國行政機構，誠欠充實，行政效率，亦感低微，然此須于戰時充實之，提高之，而不宜另起爐灶，否則系統先已紊亂，重迭矛盾，其何能免？如能一面由軍事機關遣派人員，協助督促管制工作之推行，一面改革公文程式及辦事手續，使管制工作盡量業務化，有若郵政鐵路，及海關之辦法，其結果當可圓滿多多也。

三、對於工業更望其能為全面之管制。就範圍言，則由民營、省營以至國營工業，須有統一平衡之管制。就程序言，則由原料之獲得，職工之維持，資金之周轉，以至產品之分配，須有周密合理之管制。信能如此，則原料因統籌而充裕已如上文所述，職工不至因流動過頻而損耗其生產力，產品不至因資金困難或核價過低而減少，工業動員之力量，自可倍增。然此必須有一職權甚高之機關負責執行而後可。

以上所陳，均屬犖犖大者，如能採擇施行，不但工業生產，可以突飛猛進，商業運銷，亦可發展滋長。深信必可使目下最嚴重之物資問題，獲得甚大之裨益。我工業界但求戰時物價能臻穩定，戰事經濟漸趨好轉，則在經營上獲益已多。經濟危機克服，抗戰勝利可操左券，我中華民國，自將成為世界上強盛獨立國家。我工業界能在國家保護之下，繼續為國家盡生產建設之微勞，即屬大幸。愛國未敢後人，貢獻力量，惟恐不及，謹掬愚誠，期補高深于萬一。惟是一隅之見，挂漏必多，仍望海內賢達，賜予教正，不勝幸甚！

（民國30年6月中國西南實業協會、遷川工廠聯合會、重慶市國貨廠商聯合會
聯名發表：“工業界之困難與期望”，引自“中國工業”第6期）

(2) 工业界关于协助政府安定物价之共同意見

我国抗战迄今已入第六年度，領袖英明領導，全国精誠團結；內則水旱不興，外則得道多助，胜利之期已不在远。惟于种种乐观現象中，独有物价一端，迄今犹日趋严重，而莫能已。当局既劳心焦思，力謀所以妥善解决之道，有識之士亦莫不殫精研究，或座談討論，或发为文章。本会同入托业工矿业，爱国之心，未敢后人，謹亦以多次集議之結果，向我政府我同胞直陈所見，以备采擇。

物价上漲之原因，其始自为通貨之增加与物資之减少所致，演变至今，則不尽然。目今通貨数量增加之倍数，远不逮物价增加之倍数，已为識者所公認。以言物資，除一部分軍需物品及工业器材未免缺乏，应亟行設法补救外，如就粮食而論，今年后方稻谷秋收之結果，据主管机关之估計約达 68,000 万石之巨，較之往年，增加 1/10，計值当不下千万万元，以与一二百万万元之通貨数量相較迥乎远矣。何况貨币价值之穩定，对内决于生产物資之丰蓄，对外决于海外准备金之盈絀。我国海外准备金战前尚不足 2 万万美元，今則增至 10 万万美元之譜，縱觀世界各国当战争时期，無論借得外債几何，然其海外准备金，未有不繼續消耗，以至枯竭者。其于战时犹能增加至五倍之多，如我国者，誠屬罕見。凡此均足保證法币之安定，似无足以刺激物价之理由。而物价犹能繼續上漲者，通貨与物資而外，政治及社会种种方面所形成之心理作用，为其主要之因素，可以断言。

此項因心理作用而構成之物价飞漲現象，苟不从速設法制止，影响所及，上自国家財政之收支，下至人民日常之生活，无不受其严重压迫。我全国公務員教員士兵，及其他依薪資为生之工作者，日感窘蹙，难安职位，固已早成事实。即掌握物資之农工商界，所謂水漲船高，亦只限于一定程度之漲落，一旦堤破水决，必有同归于尽之一日。言念前途，殷忧何极。抗建大业，日趋艰苦，此岂諱疾忌医之时乎？

將如何彻底解决此不应有而竟有之严重問題，本会同入以为其

原則有三：

一曰、政府与社会应合力以謀解决也。盖有主張而无政权，社会固无能为力，然以此現象之普遍，与群众心理之紛紜，亦似非仅恃政府一紙文告与数道命令所得一时收效。惟有朝市同心，官民合作：一面由政府召集工商产业界及有关人士，宣告彻底統制之决心，会商切实有效之办法，从而頒布限制工价租价物价之命令，完成統一严正之执行；一面由社会发起响应政府安定物价之运动，利用各业組織，扩大宣傳，發揮社会力量，协同动作。于因勢疏导与合理調整之中，施行严格制裁之法；真理揭之于前，政权盾之于后，則令无不行，禁无不止。舍此决无他道。

二曰、安定物价应有全面之措施也。同人托迹工矿，本从业之实际經驗，站报国之經濟崗位，認為当前安定物价之有效政策，必須为全面之紧急措置。故切望我政府各部門，更能通力合作；切实負責，在指定期間内：（一）对于公營之邮电交通公用事业專卖物品之价格。及各項捐稅之征率，宣告不再增加；（二）对于生产攸关之粮食及其他重要物資，限制其全部价格，不再上漲；（三）对于工資租价，市場利率，予以稳定，不再变动。我工矿界亦願自相誓約，于可能保持生产力之条件下，对于产品决不加价，以为社会倡。至各业中，如因特殊情形偶有成本不敷，或不及法定利潤情事，自应由政府仿照各国先例，予以补助，以資維持。

三曰、一切經濟設施应以物价为中心，以图兴革也。物价变动，既以物資通貨为其起因，而人心动摇，益成泛濫之势，則欲謀稳定，凡足使物資增加，通貨紧縮及人心安定者，均应竭力推行。反之，即应竭力制止。謹举其犖犖大者，以貢獻政府：

（一）对于我国之生产及公用事业，应有整个計劃，官办民营，明文規定。其应归民营者，应由政府指定事业范围，尽量獎勵人民經營，以期奠定生产之永远基础。至于寬貸資金，保护稅制等政策之实施，亦屬刻不容緩之举，以期獎勵生产。

（二）对于公私生产設備，应謀彻底之調整，互通有无，互补盈絀，

以期充分动员生产力量。并严限不必要之扩张及添置，以期节约物力。

(三)对于必需之物资，除应奖励生产外，尤应多方奖励购运。其统制检查及税收制度中，有足妨碍生产阻滞运输，甚至未免发生助长囤积之反作用者，应立予修改或废除之，以期增加物力。

(四)对于稀有之材料，无论公私存储，均应集中管理，合理分配，并严格限制浪费，以求延长供用时期。其尚有未登记者，应延长登记时期，切实保障物权，以促成其登记。至居心隐匿不报者，则永远禁止其进入市场，一经查获，立予充公，以免物资逃避。

(五)对于市场游资，应开放外汇及生金银之自由买卖，设立证券市场，使为无害而有利之活动，以减轻其对物价之压力。

(六)对于通货应限制法币之法偿力量，凡大数偿付，须用支票转账以节省钞券消耗，而限制非法交易及非法授受。

(七)对于人心之纠正，政府除继续维持其合理之发行额外，应随时公布法币之安定及物资之供应情形，以坚定人民信念，破除人民恐慌。此外对于全面统制物价及取缔囤积居奇之动因，统制检查之执行办法及结果，尤应广事宣传，使知所守戒。

本会同入再三考虑，以为解决此项问题，方面既甚复杂，方法又非一端。同人所愿概括一言，即我工矿界誓竭至诚，秉承政府意旨，奉行政府命令，除努力增加生产，供应军民需要外，一切愿追随各界之后，以求全国人心之安定，整个社会经济之稳固，抗战最后胜利之早日到临，以答最高领袖之惕厉忧勤，与前方将士之苦战牺牲。谨掬微忱，至希公鉴！

(迁川工厂联合会、西南实业协会、国货厂商联合会、中国战时生产促进会联名发表：
“工业界关于协助政府安定物价之共同意见”，引自“中国工业”12期)

(3) 后方工业界对目前紧急情势宣言

抗战胜利以来，于兹两月有半，吾人由狂欢而徬徨，由徬徨而焦

忧，今則已由焦忧而面临岌岌不可終日之危机。我后方工业界之生死固不足惜，然今后和平建国之成敗，实即决定国家存亡之关键。爰本国民立場，簡陈后方工业界目前緊急情勢如下：

(一)关于經濟方面者 自日寇投降后，后方經濟，陷于动蕩不安之状态，物价暴跌，信用紧縮，营业中断，告貸无門。然員工生活必須維持，零星材料仍待补充，利息之負担日重，开支之紧縮无方。經多方呼吁，政府始有50亿元緊急工貸之貸放，惟其核定之數額，大抵均不足兩月余来一切支出之半数，其余仍須向各方拼湊高利貸借，方勉可应付。时至今日，政府定貨及收購之款40亿元，以办法未定，尙未实行，后方各厂矿已至无物可押，无款可借之境地，即欲飲鴆止渴亦不可得矣。

(二)关于生产方面者 在此时期，一部分尙有定貨未交清者，虽仍須繼續工作，然对定貨制完后之前途毫无把握，一部分无定貨可做者，更只得减少生产，在絕對亏损之情形下勉求維持員工之生活，后方工业普遍之蕭条，实由于政府未能采納吾人在历次呼吁中之各种主張，以致劳資双方，情緒极端不安，紛爭时起，再加以政府处理之失当，乃愈益加重劳資双方对于停厂失业之恐慌。目前情形，在生产效率上已极度降低，仅及战前30%，資方既已失去管理能力，劳方亦难以提高生产情緒。瞻念前途，不寒而慄。夫劳資合作，为我国工业化前途人力上必要之基础，今日之环境既如此恶劣，在余勇犹存者既一籌莫展，心灰意懶者甚至願以其厂产貢獻于国家，但求保全性命，只身还乡，其沉痛之情，豈楮墨所能宣哉？！

(三)关于营业方面者 机器鋼鐵业自胜利后大抵未获再接定貨，紡織业則花紗將罄，政府勢將停供，煤矿业缺乏流动資金，化工及其他机制日用品銷路，以收复区与后方价格之悬殊，亦陷停頓。各业对于营业前途，实已均頻絕境。吾人亦深知后方之出品，目前不如收复区出品或舶来品之价廉而物美。然此系抗战后方尙不願見此微弱之后方工业陷于毁灭，則含抛弃算盤主义，从速普遍大量定貨及收購成品之外，別无起死回生之道也。

以上所述，即系目前后方工业界之紧急情势，設不速謀挽救，其毁灭实不待旋踵，盖亦昭然若揭矣。吾人于此尚不憚向国人陈述者，工业界固有发国难财之輩，然絕非数經播迁，不避难苦，迄目前仍在坚持生产之吾人，則可以断言。投机取巧者与敌伪合作，腰纏纍纍，固絕未在后方見此輩之蹤影，在历年来工不如商，商不如國，國不如投机之情形下，当初从事生产事业者亦多已知难而退，改营他业逍遙于工业苦海之外矣。吾人之房屋机器設備为从事生产而添置，吾人之借款債務，亦逐年历月而增加，时至今日，一堆破銅爛鐵，实难解除債台之重压。帳冊俱在，可資明証，吾人深欣輿論界人士重視此一事实，主持公道，与吾人作同样之呼吁，用張正义。

抗战胜利，复員錯乱，經濟組織，突形脫节，工厂紧縮或关闭者时有所聞，失业工人日日增多，形成严重之經濟恐慌。内地各大都市如重庆、貴阳、昆明、成都、西安等均有此种現象。

軍需或民用工业，大部停工。50亿元紧急貸款，杯水車薪，难济于事。据中央社发表，至10月31日止，重庆区产业工厂723家中停工者达201家，产业工人55,180人中，失业者已有17,130人。

如重庆市規模較大之裕丰紗厂，正漸次縮小范围，最近花紗布管制局分配該厂之棉，煤焦管理处分配該厂之煤，均不敷生产需要甚巨。該厂出紗虽由每日42大包減为15大包，但在花紗布管制局仅收十大包，于是該厂被迫停工減产。初則解雇工人达1/3，繼則減縮工作，再則削減工資，而劳資双方均感苦痛。

川省各大小紙厂均以資金缺乏，原料工資成本过高，大半停閉，或則減产，借維現狀。就手工紙言，夾江原有漕戶2千余家，現仅存約4/10，且多因成本过巨，偷工減料，紙質益劣。就机制紙言，全川原有9厂，日产量不足20吨，現已停閉5家，仅余4厂繼續生产。

工业界面临危机，生产困难，失业日众，劳資問題，极为严重。据工人請願团估計，目前重庆市失业工人已达55,000人，包括建筑、玻璃、机器、印刷、猪鬃、煉油、化工等业，其他尚有国营工厂裁减之工人約2万人。此外成都約30,000人，昆明約5万人，貴阳約4万人，西安區單同官煤矿已有万人。

（“中国工业”第31期“工业界有关工业复員問題文獻”第27—32頁）

二、民族資本創辦和經營的若干厂矿

1936年以前上海238家工厂主要 創辦人出身調查

編者按：下列表格，其資料來源，關於工厂、設立年份和創辦人是根據（一）1935年國貨事業出版社編：“中國國貨工厂史略”；（二）農商部“農商統計”和農商部歷年工厂登記；（三）日本東亞同文會編：“中華民國實業名鑑”；（四）本書第一種第一部分“辛亥革命前民族資產階級創辦工厂一覽表”和後述民族資產階級創辦和經營的各個工厂匯編而成。其主要創辦人出身的資料則除根據直接調查材料外，還參考“中國國貨工厂史略”，中國機制國貨工厂聯合會編：“中國國貨工厂全貌”，上海機聯會出版：“工商史料”，上海征信所編：“上海工商人名錄”，“民國名人圖鑑”，“上海百業人才小史”等書編成。

這個統計表所收集的工厂雖然是只有當時上海華商工厂的一小部分，但都是規模較大的工厂，并特地注意到收集華僑、技術人員和工人學徒出身創辦的較具規模的工厂。由於當時上海是我國工業的中心，因此，這個表格是有代表性的，從這裡可以看出抗日戰爭前中國民族工業的資本來源的性質。

這裡所說的創辦人出身，是指他還沒有創辦工厂以前擔任的主要經歷而言，同時只是統計其初創時的廠名及創辦人，至於創立以後的改組更換廠名則沒有加以統計。

這個表格所收集的工厂總共238家，其中做官出身或退職官僚創辦的工厂計有24家；屬於買辦和在外商洋行擔任過高級職員出身的有40家；屬於流氓、牧師、和尚出身的6家；屬於商人或工厂主出身的69家；屬於銀錢業出身的23家；屬於華僑出身的11家；屬於工程師、技師、教授商店工厂職員等出身的48家；屬於技工、學徒和手工業者出身的17家。

厂名	設立年份	主要創辦人	備注
上海制炮局	1861	李鴻章	
江南製造局	1867	曾國藩	
倫章造紙廠	1891	李鴻章	
華新紡織新局	1891	唐松岩(道合)與商人合辦	
華盛紗廠	1894	盛宣懷(天津海關道)與聶緝轅(江海關道)等合辦	
裕源紗廠	1894	朱鴻度(道合)	1894年借與日商內外棉紡織會社
大德榨油廠	1896	盛宣懷派東方匯理銀行買辦朱志堯設立	
裕通紗廠	1898	朱幼鴻(朱鴻度之子,浙江候補道)	1917年由劉柏森租辦
阜丰面粉廠	1898	孫多森(候補道,後兼任中日實業公司買辦)	
上海華商電燈公司	1904	翁子文(上海馬路工程總局太守)	
日暉織呢廠	1906	鄭孝胥等(安徽按察使,後任偽滿洲國國務總理)	官商合辦,1909年停閉,1919年由郭某租辦,後又為劉鴻生收買改名中國毛紡織廠
龍章造紙廠	1906	龐元濟(四品京堂)	清政府補助六萬兩
聚來元記機器面粉廠	1907	傅筱庵(中國銀行監督,後又做北洋政府財政部駐滬特派員)、盛竹村、孫衡甫(四明銀行經理)等辦	
利興烟草公司	1914	包彥生(江蘇省諮議局調查員,上海閘北防疫所長),原為張竹卿所創,1911年為包等接辦朱鴻儀等接辦	
自明染織廠	1914	譚文琦(前清惠工部部員,江蘇省立工業學校主任教員)	
利用造紙廠	1915	陳蓉軒(江蘇省高等檢察廳看守所所長)	
大中華紡織股份有限公司	1919	聶云台(聶緝轅之子)	1924年售予永安改為永安第二廠
華丰紡織公司	1921	聶云台、王正廷(北洋政府外交總長)、錢新之(交通銀行經理)等辦	
中國鐵工廠	1921	聶云台、葉宗敬(錢庄主)等辦	
雙輪牙刷公司	1921	趙鐵橋(招商局督辦)所創,經理為張羣	
驥記電動機製造廠	1926	劉鳳麟(國民黨警察局教官)	
益中福記電器製造廠	1929	聶云台、黃奕住(南洋華僑、中南銀行經理)等辦	

上海和泰五金厂	1929	华祥勋(官僚)
西門子床厂	1931	徐蔣堂(官僚)
同文书局	1882	徐雨之(英商宝順洋行副买办)
源昌机器五金厂	1883	祝大椿(怡和洋行买办)
上海織布局	1890	郑官应(太古洋行买办)、龔寿图(道員)等办
瑞綸絲厂	1894	吳仲伯(保裕保險公司买办)
源昌机器碾米厂	1893	祝大椿字兰舫, 怡和洋行买办
华兴机器面粉厂	1900	祝大椿
景綸紡織厂	1902	徐雨之
求新机器造船厂	1907	朱志堯
振華紗厂	1907	怡和洋行大班鄒福和吳祥林(怡和买办)合創
同昌紗厂	1908	朱志堯、沈仰高等办
公益紗厂	1910	祝大椿
同昌榨油厂	1910	朱志堯
精益眼鏡公司	1910	張士德(美商美高洋行光学部主任)
上海磚瓦厂	1912	朱志堯
上海华商水泥公司	1920	刘鴻生(开灤买办)、朱葆三(平和等洋行买办)
美亞織綢厂	1920	莫麟清(絲厂兼藍璧乐洋行买办)
中国唯一毛絨紡織厂	1919	朱葆三(平和洋行买办)、方椒伯(泰陸銀行經理)等創办
紫光电气广告社	1921	周家声(日商中兴洋行买办)
信誼化学制葯厂	1922	謝克明(德商爱理司洋行买办)、鮑国昌(怡和洋行买办)
竟成造纸厂	1923	王叔賢(王一亭之子, 一亭为所謂“上海閩人”曾任日清汽船公司买办)
三北机器厂	1923	虞洽卿(华俄道勝銀行买办)
德龙寬紧帶織物厂	1923	顧海藩(洋行跑街)
中华煤球公司	1926	刘鴻生
江南造纸厂	1926	吳耀廷(正金銀行买办)
勤丰染織厂	1927	顧吉生(隆茂洋行买办)、李学暢(棉布商)
久丰織綢厂	1927	胡廷光(洋行職員)
华丰精瓷厂	1928	刘鴻生、李拔可(日本留學生, 上海水泥公司工程師)
章华毛紡厂	1929	刘鴻生

原为德人創办, 1902年为謝、包等收买。

厂名	設立年份	主要創辦人	備注
華品烟草公司	1929	夏巨川(花旗、大美烟公司買辦)	
振興毛絨紡織廠	1929	顧錫元(洋行職員)	
仁丰染織廠	1930	朱賽陶(天綸洋行布匹部兼會計部主任)	
大中華火柴公司	1930	劉鴻生	
天元味室	1930	楊秉襄(海羅洋行買辦)	
玲奮電器機械廠	1931	鮑國樑(盛京洋行買辦)	
中漢玻璃廠	1932	鄭鍾漢(曾在陳英上處任職,永興、協隆洋行買辦)	
上海漢成電器廠	1933	鄭鍾漢	
天香味室	1933	何維石(百利洋行買辦)	
天然協記鮮味品廠	1934	瞿永剛(美晨時洋行買辦)	原為王眉峰所創, 1934年為瞿接辦。
安眠思床墊廠	1936	張孝行(美高席夢思公司營業部主任)	
光中造紙公司	1936	虞洽卿	
中西大藥房	1887	黃楚九(流氓騙子)	原為顧松泉所創, 1915年為黃楚九收買。
中法大藥房	1889	黃楚九	
光華髮柔紙廠	1929	林志道(牧師)	
佛慈大藥房	1929	太虛和尚及其弟子馮劍光等	原為李書平、余伯陶所創, 1929年由太虛接辦。
九福制藥廠	1931	黃楚九	
正德藥房	1934	黃楚九後代和味星五所辦	
燮昌火柴廠	1890	叶澄衷(學徒出身, 後在上海開商店)	
立大面粉廠	1909	顧馨一(永慎和、大正杂粮行股東)、王一亭等辦	
上海科學儀器館	1910	林滌庵(同丰恒記工業原料公司股東)	
申大面粉廠	1910	顧馨一	
瑞和磚瓦公司	1911	湯斯盛(商人及銀行股東)、邵爾康、王一亭等辦	
大有面粉廠	1912	顧馨一等	
达丰染織廠	1913	王言宇(均泰顏料號股東)	
信昌面粉廠	1914	顧馨一等	
泰康罐頭食品公司	1914	乐汝成(食品店主)、庄安康等辦	
生和隆榨油廠	1915	何彥生(商人)	

华丰香皂厂	1915	陈志廉(洋货店主)
鸿裕纱厂	1916	郭子彬(上海早期鸦片商)
大明眼镜公司	1916	比福皋(亨得利钟表公司经理)
中华第一针織厂	1918	謝子楠(进出口商人)
振华油漆厂	1918	王云甫(顏料号店主)、乐振葆等
冠生园食品公司	1918	沈冠生(学徒出身,曾任食品店主)
屈臣氏汽水公司	1919	郭唯一、翁耀衡(进出口商人)
华福制帽厂	1919	陈吉卿(洋货店主)
合兴机器制造厂	1919	顧馨一、饒錦华
振昌棉織厂	1919	陈順元(百貨店主)
振丰棉織厂	1919	王運勛(商人)
永豫纱厂	1919	許松春(棉花商)、叶鴻英(元大、信康等錢庄股東)
大丰紡織公司	1920	陆維鏞、吳麟书(棉紗商人)
統益纱厂	1920	吳麟书、胡耀廷、邵声濤(崇安紗号店主)等创办
益丰糖瓷厂	1920	叶吉甫(万昌成珠宝商人)
緯通纱厂	1921	陈玉亭(上海早期之鸦片商人)
振泰纱厂	1921	王自宇、余葆三等
久記木材公司	1921	張效良(杂粮行股東)、朱吟江(怡和洋行买办)等办
中华机制紗管厂	1921	郁坤和、許松春(棉花商)等办
穗丰豆油厂	1921	吳叔生(杂粮店主)
世界书局	1921	沈知方(中华书局經理)、毛純卿(慎成洋紙店主)等办
公勤铁工厂	1921	黃耕伯、顧馨一等办
崇信纱厂	1922	邵声濤(棉紗商人)
华成机制帆布厂	1923	項学惠(慈帆行店主)
德和电池火漆厂	1924	周义生(商人)
中国华成烟草公司	1924	陈楚湘(福和烟公司股東)、戴耕莘等办
江明电筒电池制造厂	1925	丁熊照(棉布商)
中国瓊浦耳电器厂	1926	胡西園(商人)
緯輪毛織厂	1926	黃錦揚(洋貨店主)
上海織造厂	1926	徐立民(嘉兴繅絲厂長)
宝华綢緞厂	1926	錢績熙(緯成綢厂長)
裕村綢緞公司	1926	錢績熙

1918年售予永安公司改名永安第三厂

原为英国人所創后为郭等收买。

原为德国人所創,后为胡收买。

厂名	設立年份	主要创办人	备注
中国华东烟草公司	1926	黎学东(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經售店店主)	
冠益制帽厂	1926	張靜叔(典当商)	
耀华电筒电池厂	1926	張承禧(米粮店主)	
中国振华电气厂	1926	張节阶(粮棉商人)	
华成电器制造厂	1927	石成章(电料店店主)	
公兴祥皮件厂	1928	陈慕三(杂货店主)	
精大电筒电池厂	1929	賀祥生(米粮店店主)	
天益毛織厂	1929	曹世炎(兴祥棉織厂曹巨卿之子)	
中国亚尔登电器制造厂	1929	夏鴻生(皮箱店主)	
傅祥記染織厂	1929	傅鳳祥(进出口商人)	
太乙麦精厂	1929	王正余(棉布店店主)	
萃众烟公司	1930	王瑞麟(和兴烟公司經理)	
德余电器制造厂	1930	周义生(商人)	
亞光电木制造公司	1930	張惠康(电气技师,曾任三北机器厂厂长)	
中孚化学制造厂(顏料制造)	1932	邱彭年(汇利錢庄股東、德和潤顏料店主)、王鵬程(豫康顏料号店主)、王作霖(复昌祥顏料店店主)	
协康橡皮制胎厂	1932	袁炳元(进出口商人)	
大东毛織駝絨厂	1932	邱信益(洋貨店店主)	
上海紡織印染公司	1932	章榮初(棉布商人)	
大明火柴公司	1932	邵善修(榮昌火柴厂主邵尔康之子)	
大中华造纸公司	1934	刘行瀛(紙商)、駱煥堂(紙商)	
上海經綸慎記毛織厂	1934	李傅才(洋杂货店主)	
协昌棕織地毯厂	1934	項蓮孫(帆布店主)	
中国毛絨紡織厂	1934	陈志康(洋貨商人)	
华成鑫記电池厂	1935	高东鑫(綢緞商人)	
中国华一工业社(电器)	1935	朱鑑麟(印刷厂股東)	
美錦腊光紙厂	1935	毛勛(紙商)	
上海电池制造厂	1936	陈廷璋(电料商人)、吳玉民(錢庄賬員)	
裕丰面粉厂	1904	朱斗文(大華銀行常務)	
合記教育用品社	1909	林康侯(前清秀才,新华、中华汇豐銀行經理)	

南 阳 燭 皂 厂	1910	張梅軒(学徒出身,曾任万生銀樓經理)
福新第一面粉厂	1913	榮宗敬(錢庄主)
申新紡織总公司	1916	榮宗敬(錢庄主)
元丰恒記面粉厂	1916	榮宗敬、丁梓仁等創辦
維大紡織用品公司	1919	徐靜仁、聶云台、穆藕初、李銘等創辦
合兴机器制造厂	1919	叶鴻英(錢庄主)、顧馨一、王宝崙等創辦
福新第八面粉厂	1919	榮宗敬
宝 源 造 紙 厂	1920	刘拍森、陈光甫(上海銀行總經理)
聚 山 磚 瓦 厂	1921	錢新之(交通銀行經理)、聶云台等办
勝 船 蓄 电 池 厂	1922	魏达剛(銀行職員)
大 华 造 紙 厂	1923	叶蔭三(叶鴻英之子)
鼎 新 染 織 厂	1923	姚义璋(光中銀行、汇大錢庄股東)
大中华赛璐珞制造厂	1928	朱如堂(銀行股東兼买办)、姜俊意等办
駿 大 油 墨 厂	1928	叶蔭三
中国福新烟公司	1928	丁厚卿(光华銀行經理,元丰米店主)
通明電池制造厂	1929	翁輔卿(錢庄主)
光 华 印 刷 厂	1929	林夢周(銀行職員)
协丰益記紡織公司	1930	俞佐廷(县財政局長、天益錢庄經理、四明銀行經理)、金潤庠(民丰华丰紙厂經理)
上 海 味 中 厂	1930	叶蔭三
上 海 灯 泡 厂	1933	林康侯、孙谷臣(同仁昌魚行店主)等創辦
裕华化学工业厂(肥皂)	1934	梁壽齡(上海工商銀行襄理)
上海广生行化妆品公司	1903	林煒南(华侨)
南洋兄弟烟公司	1905	簡照南(南洋华侨)
上海膏植牛奶公司	1916	馬应彪(华侨)
永安紡織有限公司	1916	郭乐、郭順兄弟(澳洲华侨)
中国內衣染織厂	1920	黃鴻鈞(美国华侨,曾任廣昌洋行、宝成紗厂工程師)
中华国民制糖厂	1921	馬玉山(美国华侨)、勞敬修(泰和洋行买办)等办
关勒銘自來水笔厂	1926	关偉林(美国华侨)

原为五洲藥房項繩武所創,后为張接盤。

原为祝蘭紡所創,后为叶收买。

厂名	設立年份	主要創辦人	備注
大中華橡膠廠	1928	余芝卿(留日華僑)、薛福基(留日學生)等辦	
廣東兄弟橡膠廠上海分廠	1929	丁鳳輝(南洋華僑)	
馬玉山糖果餅乾公司	1933	馬玉山(馬玉山之弟)	
華菲煙公司	1935	林書賓(菲律賓華僑)、李清泉(菲律賓華僑)	
中國化學工業社	1911	方液仙(技術人員)	
中華書局	1913	陸費逵(報館主筆)、范源濂(北洋政府教育總長)	
中國蓄電池製造廠	1914	胡國光(電報局職員)	
開林油漆廠	1915	周元泰(機械化學工程師)	
德大紗廠	1915	穆藕初兄弟(學徒出身,曾留學美國回國後辦過改良棉業試驗場)	
家庭工業社	1917	陳蝶仙(報館主筆)	
厚生紗廠	1918	薛寶潤、穆藕初	
華通電業機器廠	1918	鮮德甫(上海英工部局電氣技師)、王慶余等辦	
浦東電燈公司	1919	董世亨(日本留學生,地輿學者,南京電燈廠長)	
錦丰搪瓷廠	1919	董世亨	原為美商經營,後為董收買。
中華玻璃廠	1919	方騰(中華職業學校教職員)	
上海熾昌製膠廠	1921	吳蘊初(漢冶萍化驗師)	
讓茂化妝品廠	1921	翁榮炳(肥皂廠技師)	
康元製纜廠	1922	項康元(孤兒院教職員,馮玉祥部下做過運輸工作)	
民生紡織公司	1922	史量才(申報館主筆)、徐采丞等辦	
天厨味精廠	1923	吳蘊初、張云逸(醬園主)	為張云逸出資經營,吳擔任技術工作,張死後歸吳獨營。
王志記襪廠	1924	王志香(襪廠技師)	
紹敦電機製造廠	1921	蔡叔厚(紗廠技師)	
中華鐵工廠	1925	張立顏、傅守朴(二人都是中華職業學校教職員)	
中國大東煙草公司	1925	孫立山(南洋煙公司營業處主任)	
永固油漆廠	1926	陳次平、陳廣順、沈慈耀(三人都是金陵大學同學,陳廣順與沈曾留學美國,學技術)	

鴻发仁記毛紡織厂	1926	蔡瑞卿(日暉制泥厂技師)
新亞化学制葯厂	1926	許冠羣(會計師)
新中華实业社(化妝品)	1927	李龙淵(上海工部局化驗師)
中国鈕扣厂	1927	郑坤秀(上海電力公司技師)
丁飞電池厂	1928	饒丁飞(青浦县監獄印刷電池部技師)
永丰文記五金电器厂	1928	刘繼文(兵工厂技師)
寰球鉄工厂	1928	王宛卿(留日学生,上海兵工厂技師)
新业机器公	1928	李云泰(浙江大学教授)
光中染織厂	1929	張迭生(滬章染織厂工程師)
普球实业社(灭火机)	1929	吳明之(益利汽水厂技師兼經理)
华德電池厂	1929	唐兆熊、李庆祥(美商奇異安德生电气厂技師)
中央香皂厂	1929	李北海(中国針織厂職員)翁榮炳(美丰肥皂厂技師)等办
上海机器厂	1930	顏耀秋(商务印书館技正)、毛毅可(兵工署職員)等办
平安实业工厂(灭火机)	1930	張仲杰(震旦机器厂技師)
国民帆布厂	1930	穆銘三(兵工厂職員)
中国制釘公司	1931	顏伯威、錢祥标(留美学生,中央大学教授)
天原电化厂	1931	吳蘊初
大上海軋髮刀剪厂	1932	吳伯生(留日学生,曾在日本工厂任技師)
合众电器公司	1932	俞庆庵(交通大学教授,电报局工程師)
天成玻璃厂	1932	陈永富(学徒出身,曾任滋康玻璃厂技師)
申一膠帶厂	1933	穆銘三
大鑫鋼鉄厂	1933	方积藩、余名鈺(留美学生,做过县长,到江西等地开过矿)
新光內衣織造厂	1933	傅良駿(技工出身,曾任法商电市电灯公司職員)
振丰电器制造厂	1933	牟子寬(同茂电料行職員)
中国农产化学制造厂(醬料)	1933	沈紫岩(大学教授)
中国鉛筆厂	1934	吳舜菊(日本留学生,曾在日本工厂实习)
无敌香皂厂	1934	翁榮炳(肥皂厂技師)
商务印书館	1897	夏粹芳、鮑成昌(印刷工人出身)

厂名	設立年份	主要創辦人	備注
大隆機器廠	1902	严裕棠(鐵匠出身)	
五洲大藥房	1907	夏粹芳、項松茂	
梁新記兄弟牙刷公司	1908	梁日新兄弟(牙刷手工業者)	
森林藤柳器廠	1914	吳春泉(又生昌藤器店學徒出身)	
華生電器廠	1916	楊濟川(棉布店管賬)、叶友才(洋行管賬)	实际出資人為祝蘭紡(電燈廠主,揚子保險公司經理)
新民機器廠	1921	胡顯文(漢陽鐵工廠技工)	
第一牌牙刷公司	1925	尹而白(牙刷作坊工人出身)	原名日光牙刷,尹接辦後改現名
新中工程公司	1925	支秉淵(橫昌洋行技工)張延祥(久勝洋行技工)魏如(慎昌洋行技工)等辦	
金城工藝社(圖畫顏料)	1926	黃菊森(糧店學徒出身)	
國華化學工業廠(電池)	1929	叶友才、邱震棠	
正興電筒電池廠	1928	王洪正(鴻泰機器廠工人出身)	
民生橡皮廠	1931	張佑民(科發藥房技師)、唐和衷(進出口洋行練習生)	
中華國瑞瓦斯總行	1931	羅國瑞(技工出身)	
三友制革廠	1933	徐福明、蘇德勝、陳如林(三人都是制革廠技工)	
裕康新記鐵廠	1934	傅隆才(該廠為其父所創,其父是學徒出身)	
福華玻璃廠	1936	張繼芳(中華鳳記玻璃廠學徒)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統治区 民族工业若干厂矿簡表

(編者按：下表是摘自国民党中央、中国、交通和农民4个銀行联合办事处秘书处于1942年5月—1944年8月編的“工商調查通訊”(油印本)。材料的選擇是以民族資本創办的厂矿为主，不包括官僚資本的工业(凡后述已介紹民族資本經營的各个厂矿此处也从略)，但由于抗战时期工业的变化，不少民族工业參进了官僚資本投資，故这里也包括一部分官僚資本参加投資或現役和在野的官僚与民族資本合办的厂矿在內。这个材料是很不完全的，因为当时四联总处只調查了一些較具規模和它資金融通有关的厂矿，許多中小的民族厂矿被遺弃不加以調查。但这个簡表有些材料还值得參考，故特摘录于此以备讀者參考。)

机器及冶煉工业

上海机器厂

民国19年在滬創立，資本5万元，設厂于滬东楊樹浦，初制小型柴油機，其后技术改进，乃添制兵工零件制造机、碾米机及抽水机等，至25年資本扩充为40万元，27年至28年迁至重庆，資本增加为65万元。

董事長：虞夢紹，滇緬公路局駐昆办事处主任。

常务董事：胡选之、林大中。

董事：顏耀秋，中华織业学校織工科主任、商务印書館工程师，曾任迁川工厂联合会理事長五年。凌翼支，欧亞航空公司秘書、李祖薰，上海科发葯房總經理、庄仲文，經濟部企业司司長。

監察：吳可敬，同济大学教授、徐世民。

經理：顏耀秋(兼)

新中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該公司成立於民國15年，原屬合伙經營方式，最初僅代人計劃承包工程，15年增資開設機器工廠，廠址設上海閘北，專制內燃機、抽水機，17年始改組為股份有限公司，資本亦僅5萬元，18、19兩年曾兩度增資為20萬元，“一二八”淞滬戰役遭受重大損失，減資為12萬元，26年復增資為30萬元，“八一三”滬戰再起，乃將機器遷祁陽籌設分廠，30年因業務發展，復增資為100萬元。全廠職工約740人。

常務董事：黃炎，上海濟浦局建築部總工程師、費福燾，復興公司衡陽分公司經理、魏如，曾任慎昌洋行技工、張延祥，呂謨承，王振芳，昆明中國銀行經理、叶友才，華生電氣公司經理、陳明燦，華生五金號經理、庄仲文，經濟部企業司司長。

監察：裘燮均，長壽龍溪河水電廠工程師、聞維干，中央無線電廠經理、鍾兆琳，交通大學教授。

經理：支秉淵，曾任職於慎昌洋行技工和技師，與胡厥文、周錦水同為西南民營工業界領導人。

新昌實業公司

新昌實業公司，實收股本200萬元，27年成立，在四川江北設機器廠，28年春在榮昌又設煉鐵廠，以自煉之鐵，鑄造各種機器，股東中除金城銀行為投資股外，其餘股東中間有留學海外新近歸國之技術人材，在公司擔任技術職務。全體職工200餘人。

董事長：徐建邦，曾任西北實業公司工務部長。

常董：陳德祥，曾任高級職業學校校長。

監察：鄧直夫，曾任正太鐵路工程師、王旭杰，曾任西北實業公司煤礦工程師、孫文藻，曾任西北製造廠工務處長、盧存仁，曾任河北法商學院院長、王思東，金川酒精廠經理。

廠長：劉潤身，曾任天津工學院機械科主任。

西京建中機器製造廠

系吳寶山、陳甫山、鄧玉泉等三人發起，集資20萬元，30年元旦正式成立。該廠系合伙經營方式，經理吳寶山為漢陽兵工廠出身，後由

陝西機器廠敦請入陝服務，副經理陳甫山，鄧玉泉亦曾于機器工業界任職經年，全廠職工90多人。

益大機器廠

該廠系前濟南成通紡紗廠機器製造部之一部分，“七七”事變發生，乃遷運入陝，至30年春始得復工，由宋達軒、徐議廷、張韶九、張銘三、張梅山、燕汝南6人合夥，各出資6萬，總集股本36萬元于30年6月正式成立，職工50人。

經理：張銘三，曾任濟南成通紗廠鐵工部管理員。

廠長：張梅山，曾任濟南成通紗廠鐵工部主任。

開源興業公司機器廠

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運用南開基金創辦，而其主要事業為機器廠，即附設于重慶沙坪壩南開中學後，由張氏之子張錫祥任總經理。

機器廠于30年10月成立，成立後又于成都設立分廠，與成都新華公司合作，名曰新華機廠，又于自流井設立分廠，與新華合作，名曰華源機廠。本廠職工130多人。

董事：張伯苓，南開大學校長、何廉，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所長、黃子堅，西南聯大師範學院院長、喻傳鑒，重慶南開中學主任、王文田，重慶南開中學女中部主任。

監察：倪乃如，南開大學秘書長。

總經理：張錫祥，前新威礦冶公司總經理、成都新華公司總經理。

美藝鋼鐵廠

原設上海，當時名稱為美藝鋼器公司，以製造鋼床、鋼廚及鋼鐵用具等為業務，系朱瘦菊獨資經營，19年春即在上海楊樹浦路設廠，23年秋復在南京山西路及揚公井設立分廠及發行所。資本220萬元。“八一三”後，美藝亦奉令遷廠，先是遷至漢口，27年復行遷川，28年1月抵渝，先後設廠于重慶中一路及江北觀陽門等處。

經理：朱文奎，廠長：朱大篋。

中國實業機器製造廠

上海旧厂系23年创办，26年迁川，董事长郑镇昌，实际主持者为经理朱明德，朱曾在上海商务印书馆任职17年，管理制造华文打字机部分工作，积多年经验与研究兴趣，乃决计自行集股设厂，股本为5万元。该厂原系中小商人合资经营，股本尚留上海者为多，重庆亦有若干商人加股。

公益纺织、面粉机器制造厂

公益厂为申新四厂福新五厂之相关事业，厂设江北黑石子，该厂为有限公司组织，实收资本250万元，董事长荣德生仍在滬，由李国伟代表主持，经理李冀曜。

董事长：荣德生（申新纺织公司总经理）

董事：荣一心、荣尔仁、荣熙仁、华栋臣、李国伟、吴稚暉、章剑慧、李冀曜、黄亦清、荣毅仁。

监察：荣研仁、龔培卿、厉无咎。

经理：李冀曜。

西京建工机器厂

该厂于30年11月间由王宝斋、王旭初二人发起筹设，31年1月正式开工，系合资经营性质，实收股本15万元。

总经理：王宝斋，曾充铁工厂经理15年。

厂长：王旭初，曾充技正四年。

姚顺兴机器厂

姚顺兴机器厂系由曾在江南造船厂服务之姚掌生独资经营，民国15年创立，初系小规模制造五金机件，资本2万元，滬战起后，奉令迁移武昌，旋复奉令迁常德，28年迁渝，迭经增资，据称1943年实收股本150万元。

经理：姚掌生，曾任江南造船厂技师。

厂长：贺圣德，曾任职恒昌祥机器船厂。

同昌动力机制造厂

该厂系鄂籍技工商人多名所组成，其前身为4个小厂，即汉阳合记机器厂、汉口张义兴机器厂、宜兴宜大昌机器厂与重庆建华机器厂

合并改組于30年7月成立，厂設于上龍門浩灘子口一號，各以機器材料作價入股，并籌流動資金，就中石昌友之合記機器厂占股較多，共推為同昌主持人，惟以感資金周轉不易，乃商得川陝鄂貿易公司總經理周文達同意，由周加股并任同昌董事長，而石昌友仍任經理，实际主持业务。全部职工120多人。

东原实业公司

26年間綦江經營鉄厂业务人士吳举宜、張笏堂、赵其光等鉴于組織零散，力量單薄，乃商洽同意合組公司，除以13个鉄厂財產估價作股外，并公开召募，于26年7月組織成立，最初股本仅20万元，28年增为50万元，29年增为200万元，30年增为400万元，31年增为1,000万元，全体职工有1,500多人。

董事長：黃季陆（国民党中央委員）。

常務董事：黃季陆、吳举宜、張笏堂、熊蔭村、陈韶光。

監察：刘理华、陈焯輝、陈光輝。

總經理：張笏堂。

精勤鉄工厂

該厂成立于28年，为川省地方士紳籌办，迭經改組，扩充設備，現已收足資本160万元。

董事長：王政平，亞西实业銀行董事長，上川鋼鉄公司常董。

董事：曾俊臣，大華实业公司董事、郑哲丞，建華实业公司董事、李懋卿、曾麟書、張鵬翔、朱尙奎、严勵精，曾任招商局及民生公司机械工程师、余子文。

監事：严子逸、曹觀瀾。

經理：严勵精（兼）。

中國制鋼公司

由胡光燾、崔唯吾、黎超海、毕天德等发起，集資600万元，后增至700万元，勘定煉鋼軋鋼兩厂厂址于江北董家溪，于1942年6月正式成立，职工70多人。

董事長：朱必謙，厚記兴业公司總經理，重慶市參議員。

常务董事：崔唯吾，大川实业公司常董、尹致中，大川实业公司總經理、陆叔言，华西兴业公司總經理、彭用仪，福华工矿公司經理。

監察：胡仲实，华西兴业公司及中国兴业公司常董，华安煤矿公司總經理、張靜愚，財政部稅務署長、黄凉尘，宝元渝副總經理。

經理：黎超海，英国考尔夫斯冶煉工程師。

建國工業社桂林机厂

該厂由施之銓獨資經營，民國26年設厂重慶時資本50萬元，專事製造鐵木織布机及小型面粉机，29年設分厂于大墟，30年復增資50萬元，迁桂林碼頭街，是年專造刺刀，并接軍需署及粵建厅定貨，本年(1943)增資50萬元，現有資本共達110萬元。

自力式紡織机制造厂

該厂主人李紫玉，曾在上海某紗厂工作，厂由李君獨資經營，于民國28年开始設計制图，29年8月始在桂林各机厂分別試制成功，30年5月間在長沙新江河成立工厂，开始制造，資金20余万元(由李君向外界借貸者)，湘北二次战事爆发后，厂迁桂林，至31年3月始全部复工。

啓文机器厂

該厂为獨資經營，厂主李翊生，民國8年創业于上海，初为印刷所，其后逐漸扩充，自造鉛字及印刷用具等，民國18年改称啓文机器厂，資本为16萬元，“八一三”后迁汉口，后迁重慶，29年年底迁桂林。

培基鉄工厂

該厂于31年3月由謝达、黃鍾岳(广西省政府委員)等发起開創，立会于桂林孔明台广西銀行，隨即認股繳款，着手籌備，开始时先試制胜家式縫衣机及水表。該厂額定資本總額为20萬元，实收159,000元。

新生机器厂

該厂經理褚財根及厂长董邦金曾在上海開設中和汽車活塞厂，

后以江浙皖各地需要該厂出品甚殷，乃于南京、杭州、宣城等地組織公昌机厂專造汽車零件，供該处交通机关使用，“八一三”战后，公昌机厂迁往長沙，因資金困难，迫將工具出售。嗣复集資100万元設厂衡阳，廢續开工，31年2月又設总厂于桂林，而以衡阳为分厂，規定80万元为桂林总厂資本，20万元为衡阳分厂資本。职工衡厂33人，桂厂60人。

君武机厂

該厂于29年4月由馬君武(广西省政府委員)、盛致、孙文彬、董运聰等发起籌备在九华山九华街附近租地造屋，同年冬正式开工。該厂职工178人，董事長廖竟天，經理盛致。

宝泰机器厂

該厂系独資經營，經理張宝泰，原設汉口，已有14年之历史，后迁長沙，大火后再迁衡阳，28年又迁桂林，职工40余人。

求精机器厂

該厂为袁潤瑛、沈駿声等所发起，32年3月由袁君主持籌备，額定資本200万元，实收120万元，有职工18人。

希孟氏軍需机械厂

該厂系由丁希孟独資經營，最初設于上海，民国25年开始籌备，当时資本5万元，翌年开工，“八一三”战后內迁汉口，改为軍需机械厂，28年10月南迁桂林，繼續制造軍需用品，惟目前則正从事于紡織机之制造。

湘衡机器厂

湘衡机器厂創立于民国18年8月，实为衡阳机器工厂中創辦最早者，当时股本仅5千元，因衡市交通不便，营业未見发达，仅工人二、三十人，粵汉路通車后，业务逐漸进展，29年增加股本25,000元，至32年物价暴漲，銀根紧迫，又复增加股本325,000元，1943年股本已达35万元。全厂职工140人。

該厂系合伙經營，重要股东为譚元琳、刘素楨二人。譚兼任經理。

民生機器鐵工廠

衡陽民生機器鐵工廠系浙贛鐵路及萍鄉煤礦撤退員工聯合組織而成，于28年6月1日由劉善庭等7人開始發起，經6個月之籌備興建廠屋，裝置機器，于29年1月正式成立，劉善庭任第一屆經理，額定資本40萬元，專制自用母機，如車床、刨床和其他工作輔助機等。全廠職工約100人。

衡陽生建機器廠

生建機器廠系由周繼健、劉仲欽、劉奎煥3人發起，30年9月成立。周氏原為中大教授，專研機械工程。該廠額定資本40萬元，另借款25萬元。全廠職工50多人。

求實實業公司衡陽機廠

民國30年10月盛致、鍾少航、李向榮、王勁初等發起組織求實實業公司，初期計劃先設立機廠製造農業機具，由盛致等負責籌備，資本額定50萬元，31年4月正式成立，全廠有職工50多人。

現代機廠

該廠為馮驥獨資經營，後改為有限公司，資本20萬元，廠址在衡陽西門外，32年增資至80萬元，全廠職工25人。

新民機器廠

（請參閱後述“新民機器廠”）

建興工程器材廠

該廠創始於民國29年10月，當時資本3萬元，30年3月擴充資本至55,000元，31年度再增資至8萬元，全廠職工20多人。

云章機器廠

民國28年春由何倬雲發起，邀集胡封岳、劉立暹、潘克伍、歐陽純、劉楚醒等商議籌辦汽車修理行，五月即告成立，設廠於衡陽小西門外，推歐陽純為經理，定名為云章機器廠，定資本為15萬元，全廠職工50多人。

華中鐵廠

民國27年，郁人龍獨資創辦該廠於漢口，從事軍用元鋏之製造，

同年秋，內遷桂林，繼續承制軍用器材，29年改為合夥經營，當時資本6萬元，30年7月增為25萬元，32年1月再增為50萬元，全廠職工120多人。

熊發昌翻砂廠

民國24年熊發昌設該廠於上海，抗戰後內遷長沙，專為第11兵工廠擔任翻砂工作，長沙大火後遷桂林，造手榴彈壳，後以11兵工廠遷渝，乃在北极路設廠，增資購機擴充為機器與翻砂二部，承造公營工廠之鑄品為主。該廠獨資經營，有工人20多人。

中興鐵工廠

17年設立於上海，為陳炳勛獨資經營，抗戰後遷至漢口，再遷長沙，三遷桂林，1943年資本為50萬元，職工40多人。

中國動力機製造廠

該廠經理湯仲明，戰前對於動力機曾作長時期之研究，并試造仲明式動力機，試制完成後，呈准經濟部專利10年，并于29年冬與友人合夥籌設該廠，30年春正式成立開工，創立時資本10萬元，1943年增至36萬元，有職工40多人。

沈宜甲無煙煤氣機製造廠

該廠為沈宜甲獨資經營，成立時資本12萬元，31年增至50萬元，有職工40多人。其經理自兼廠長及總工程師。

義昌機械製造公司

該廠為上海華昌機器鐵工廠與華義貿易公司合組而成，設於桂林，資本100萬元，職工80多人，製造電機機械、彈子鎖及其他金屬製品。

允力工廠

該廠為有限公司組織，31年6月由李源森、李日華、施歷楷等發起，同時該廠開工，資本原為15萬元，後增至50萬元，全廠職員5人，技工20多人，採包工制，廠方自僱工人5人，學徒數人。

六河溝制鐵公司

六河溝制鐵公司為國內有名之煉鐵廠，民國7年由王正廷（國民

党前外交部長)、李晋等发起，成立于汉口谿家磯專煉生鉄，民国 27 年，汉口撤退，总公司迁至重庆，另在桂林設立机器厂，分翻砂及机器兩部，暂时經營机器之制造，数年来完成大批印刷机、絞煤机、打风机及各种工作机，公司实收股本100万元，桂林机厂之資金由公司撥給 35 万余元，1943 年公司董事長为王正廷，机厂厂长張松齡，全厂职工工人数十人。

明新机器厂

31 年秋，中华营造厂楊經理，六河溝机厂总工程师刘其昌等发起組織明新机器厂，并由刘氏任該厂經理，向六河溝机厂訂購工作机器，同时利用南华肥皂厂旧址厂房，积极裝修整理；历时 4 月籌备始成，于 32 年 1 月正式成立。創設时原定資本額为 120 万元，收足 100 万元，該厂为公司組織。职工 40 余人。

湘華煉鉄厂

該厂于 30 年夏由湖南大学校長胡庶华发起，額定股本 430 万元，推冶金教授王子佑籌設，至 31 年 11 月下旬决以先行收到政府机关 50 万元及商股約 130 万元之資本勘定厂址于衡山雷溪市，該厂 1943 年距开爐之期已为时不远，全厂职工約 70 人。

董事長：胡庶华，国立湖南大学校長。

常务董事：周錦水，华成电机制造厂經理，技工出身、赵君迈，衡阳市長。

監察：王規吾，广东乐昌商会會長（兼總經理）、方人矩，湖南民生物品購買处处長。

厂长：王子佑，湖南大学冶金教授。

渝鑫鋼鐵厂

（請參閱后述“渝鑫鋼鐵厂”）

大川实業公司

該公司于 27 年由尹致中等发起，以由滬运重庆之机器及物資当时价值約国币 100 余万元作为基金，并在渝集股百万元，共 200 万元，勘定厂址于重庆黄沙溪平安街，修建厂房，先后于 28 年及 29 年春全部

开工，公司分制針、机械、石棉三厂，至32年股本已增至400万元。全部职工370人。

常务董事：熊蔭村，宝元渝總經理、黃凉尘，宝元渝副總經理、崔唯吾，甘肅省銀行總經理。

監察：宋海涵，水利委員會工務處長、孙燮阳，宝元渝總計核。

總經理：尹致中，曾任青島冀魯制針廠總經理。

廠長：孙則远，資源委員會工程師、胡慎五，大中工業社技士。

大明實業公司富國機器造船廠

該廠系大明公司于31年5月發起，32年2月成立，由公司撥款500萬元為資本，設廠于重慶沙坪壩，製造淺水輪與修理船舶機件為主。

常务董事：蕭振瀛（華北政務委員會委員）、彭秉澄、吳國華、鄭永和。

監察：甯芷林、楊明善、劉童次。

總經理：彭秉澄兼，彭為貿易委員會專員。

崇福煉鋼廠

該廠于30年8月由自貢市士紳顏心奮等發起，股本1,500萬元，均已收足，股東多為顏姓家族，32年8月正式开工，有职工50多人。

常务董事：顏宪阳，現任自井永通銀號董事長，双福井經理、顏心奮，現任富榮實業公司董事長，崇福煤礦總經理、顏伯馨，現任自井場商聯合辦事處產銷股主任干事、顏繼阳，現任永通銀號經理自貢銀行常务董事、劉佩瑤。

監察：顏復初、顏紹霞、鄒玉田、顏君毅、顏紹蘭。

總經理：顏心奮（兼）

順昌公司重慶鐵工廠

該廠原設于上海，系25年夏將順昌石粉廠及順昌鐵工廠合并而成，石粉廠創于民14年，專制各種工業用粉，鐵工廠創于20年，原為石粉廠添置修理機械之用，后漸擴充。“八一三”后，順昌即將廠開始遷離上海，27年始全部遷渝，資本150萬元。

經理：馬冠雄。

德和机器厂

該厂于28年組織成立，合伙性質，为吳仲亞、胡宗銓等发起，实收股本30万元，有职工47人。

吳仲亞为昆明德和公司總經理，胡宗銓为云飞汽車修造厂厂长兼本厂經理。

乐山鉄工厂

31年8月成立，由陆鳳書、李子健等发起，厂設乐山，实收資本50万元。全厂职工19人。

常务董事：鍾履堅，乐山全华公司經理、黃远謨，嘉格輪厂經理、陈曙光，嘉格紙厂經理。

監察：刘裕周，商会会長、刘恩釗，武汉大学教授、刘元昉，鳳翔絲厂經理。

和济昌鋼鉄工厂

該厂創辦于民国前8年，系合伙組織，总厂設江西鉛山县，分厂設浙江常山县，生产各种鋼鉄兵工用具，資本原仅4万元，至24年增为100万元，27年增为200万元，30年增为500万元，33年增为1,000万元。重要股东为張富生、許桂宝等。有职工530多人。

億中实業公司

該公司原于民国3年在山东烟台成立，25年改組为股分有限公司，股本总额99,000元，專办工艺出品，經營国际貿易，31年将总公司內迁，增資为1,000万元，于西安北門外創設机器厂，32年9月宣告成立。全厂現有职工約100人。

常务董事：綦紹武，烟台政記輪船公司經理、黃烈卿，烟台同泰銀号經理、譚恩溥，烟台东兴公司經理、孙靜軒，烟台东兴公司副理、孙德忱，烟台慕理商行經理。

監察：刘滋堂，中华基督教会牧师、曲明堂，真光女中教务主任。

總經理：孙伯巖，任亿中公司經理29年。

厂长：李子源，曾任紗厂总工程师。

民生煉鉄厂

該厂于31年8月由支秉淵、周錦水、赵君迈3人发起組織，股本实收355万元，厂設湖南祁阳。

董事：赵君迈，衡阳市市長、支秉淵，新中工程公司總經理(兼總經理)、張銘西，新华膏鹽矿公司總經理、江国章，复兴銀行經理、龔宝強，大华貿易公司經理、魏如，新中工程公司总厂長、周錦水，华成电器公司經理、周才叶，华成电器公司副理。

監察：許吉安，金城銀行經理、張延強，联資公司經理、樊景云，大中机器厂經理、伍蔚湘，新华膏鹽矿公司經理。

晨旦机器鉄工厂重慶分厂

該厂創于民国7年，設总发行所于上海，制造厂于无錫，并于南京、汉口、杭州設支店，为无錫薛震祥所經營，專制各項消防器材，行銷国内。抗战后迁渝，31年复先后設第二第三制造所。全厂职工200多人。

總經理：薛震祥，技工出身，曾任上海百司洋行華籍經理。

經理：薛威麟，曾任本厂秘書渝分行主任。

申新第四紡織公司、福新第五面粉公司宝鷄机器制造厂

(請參閱后述“申新、福新、茂新所屬企业”)

西京机器修造厂

民国26年成立，額定股本100万元，厂設西安，專事交通器材及紡織、水利、航空等机件制造及修理。为西北高級机械科职业学校学生实习工厂。

董事長：韓光琦，陝西省財政厅長。

常务董事：王惟之、張德樞、夏舜卿、竇蔭山。

恒順机器厂

(詳情見后述)

中國金屬制片厂

該厂設于小龙坎对江石馬乡，系渝鑫鋼鐵厂相关事业，实收股本400万元，于31年7月成立，該厂为公司組織，董監余名銓(渝鑫)、庄仲文(經濟部)、刘潤生(渝鑫协理)、刘华平(渝鑫)、李恒峻(裕和隆記

号經理)、李恭先(長安企业公司經理)。經理余讓泉(曾任渝鑫鋼鐵厂工程師),总工程师余名鈺(渝鑫總經理)。

高峰煤氣爐制造厂

高峰煤氣爐制造厂系獨資經營,設桂林,厂主为徐去非,徐氏初办循軋机厂,后对煤氣爐制造加以注意,乃研究試制,31年4月購置机器籌設制造厂,同年11月正式营业,資本6万元,职工25人,徐氏自任經理兼厂长。

華成电器制造厂

該厂为西南名厂,創辦及主持人为周錦水。民国21年开始籌集股本,并擇定江苏南翔鎮为厂址,当时資金額5万元,22年正式成立,23年增資为30万元,26年再增資为60万元,“八一三”滬战后迁汉口,汉口淪陷迁至衡阳。全厂职工300人,学徒占半数以上为187人。

周錦水,曾在德国瑞生洋行当过学徒,后升为工程師,随德人在汉口設分行。該行下有制針、制釘及制革諸厂,第一次大战时周曾代德人主持机器厂,1918年創錦記电器公司,1933年与华生电器厂股东合設华成电器厂。

華生电器公司

(詳情見后述)

大華电器厂

該厂原設上海,于26年由現任經理沈佩巽发起創辦,股本160万元,抗战后內迁重庆,于30年7月成立复工。

該厂系合伙組織,總經理曹竹銘,經理沈佩巽。

永安电磁厂

該厂原名永安电器制造厂,系董志卿一人創辦,抗战后将机器运川,設厂于重庆市小龙坎对岸之石門,当时董志卿因資本有限,遂于28年5月邀由刘鴻生、陶桂林等发起另集資10万元,修建厂房及高温耐火磚爐窑,并更为今名。29年6月正式出品,資本数增加为100万元。全厂职工有100多人。

常务董事:陶桂林,馥記营造厂經理、乐頌云,永孚电料行經理、

余讓泉，中国金屬制片厂經理、董志卿，永安电瓷厂經理。

監察：陈汉清，律師、李韻清，汉口帮号經理。

厂长：周鈞陶，曾任工程師。

華新电器厂

32年1月成立，由吳和孚、潘金榮等发起，厂設渝黃家壩口，主制小型电机及变压器，实收股本100万元。該厂系合伙組織，有职工40多人，吳和孚兼總經理为实际主持人。

紡織业

民治紡織染厂

民治現有机器原屬上海大新紡織厂，因受时局影响于民国27年即告停歇，28年荣宗敬兄弟等即拟將該厂机件迁渝，嗣以資金及运输問題均待策划，复經一年酝酿，至29年底决由福民面粉公司負責籌备，所需資金亦由福民尽先認股，如有不足再酌收外股。30年春开始办理迁运工作，至11月間方有一部机件抵渝，嗣与理治紡織厂訂約合作，遂訂名为(福)民(理)治紡織染厂。

民治現有資本400万元，其分配系理治140万元，福民75万元，另招新股185万元。

常务董事：吳晋航，和成銀行總經理、戴經尘，建业实业公司董事長、浦心雅，汉口交通銀行經理、戴矩初，义丰錢庄經理、高志敏，美趣时行總經理。

監察：曾俊臣，蜀益烟草公司董事長、邓子文，重庆銀行經理、周介眉，崇德公司經理、沈笑春，重庆交通銀行副理、蔡鶴年，永生錢庄經理、刘仲衡，光裕錢庄經理。

厂长：高士愚，英国理治大学毛紡織學士。

西北毛織厂

成立于29年1月，厂址設于涇阳城內，最初系試办性质，采合伙經營方式，資金仅兩万元，正式开工后，即感不足，曾增資三次，但亦不

过30万元，本年（1942）决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扩充资本额为200万元。全厂职工有140多人。

总經理：赵崇鳴。

义成紡織厂

义成紡織厂于民国28年由焦甫义、吳成襄、何伯良、樊立齋、王耀堂、王耀西、党寒波等7人发起組織，29年6月正式成立，征集資本50万元，初定厂址于涇阳东关，嗣以原有厂址过于狭小，不敷应用，于30年6月迁城内西大街。

常务董事：樊立齋、何伯良、王耀堂、王耀西，党寒波。

总經理：吳成襄。

西安民生工厂

民生工厂总厂設河北邢台，民国23年間設西安分銷处，推銷綫毯毛毯等出品，25年秋于西安成立分厂，由天津購到提花机14部，即行开工出貨，1942年有职工130多人。

董事：張懿卿，日本京都高等工业学校毕业、楊庆升、范繼賢。

監察：孙長佑。

經理：赵蔚林。

厂長：刘庆升。

申新第四紡織公司成都分厂

（請參閱“申新、福新、茂新公司所屬企业”）

天水官泉毛織厂

該厂前身系官泉紡織合作社，有紡織、毛織兩社，于28年8月开办，股本1万元，31年1月合并兩社改組今名。

董事：郑嗣康，曾任校長政訓处长、傅美容，官泉职校毛紡教員、庄以清，曾任章华毛織厂會計。

監察：李敬夫，曾任团长軍政訓处长。

經理：李嗣康。

長安大華紡紗厂

該厂由石家庄大兴紗厂、武昌裕华紗厂合組而成，23年在西安購

置房地，在欧洲各国及日本購置机器，至25年春完成开工营业，原股本600万元，現(1943年)实收1,800万元。总公司設重庆。

董事長：苏汰余，为重庆永利銀行董事長、西安富平化学公司負責人，宝鷄大新面粉公司監察，庆华顏料公司大股东。

監察：黃道安、譚振作，董監均一貫經營商业者。

總經理：石鳳祥。

厂长：張万里。

川康毛織公司

公司由楊榮三、盛紹章、陈梓材等发起，主要股东除发起人外，有聚兴誠銀行、蜀华公司、刘自乾、黃师讓、刁文俊、徐节庵、邓华民、左伯民、王达甫等。

該厂設立之动机，系由蜀华实业公司于民国24年发起，自抗战軍兴，太原淪陷，西北毛織厂解体，其厂长王达甫来川，乃与盛紹章洽商拟办一小規模300錠之毛織厂，后經楊榮三提議改为600錠，預計資本50万元，于27年10月成立籌备处，30年5月正式开工。全部职工350多人

董事長：楊榮三，重庆聚兴誠銀行董事長。

董事：苏汰余，裕华紡織公司董事長、陈梓材，成都聚兴誠銀行經理。

監察：刁文俊，通惠实业銀行董事、成訪莘，重庆聚兴誠銀行秘書。

總經理：盛紹章，蜀华实业公司總經理。

厂长：王达甫，太原西北毛織厂厂长。

宝兴第四染織厂

該厂設于成都，由黃凉尘等籌办，为宝元通主办生产事业之一，于29年5月接收成都前翁华織厂，于30年正式出品，实收股本100万元。全部职工48人。

重要股东：熊卿村、黃朗齋、黃凉尘、宋伯坛、王鏡初、狄富午、徐建成、易仲郭、王法岩、叶則可。

廠長：黃朗齋；經理：狄宮午，曾任寶元通經理。

協成紡織廠

協成紡織廠設于四川南充縣龍門場，于28年2月由鄒懋勛、韓忠元等發起，收足股本6萬元，于同年8月成立，全廠有職工近100人。

該廠為合夥經營，以出資人為最高機關，決定任用經協理監察及會計，經理得聘用工務主任、業務主任、總務主任等。

經理：韓忠元，江蘇政法學校畢業。

中國普達織造廠

30年冬港變後，中國物產公司以土產結匯事業全告停頓，該公司理事會決定投資工業，開辦紡織廠，31年5月，由該公司經理楊錫仁、湖南經理勞用宏、桂林主任董若鈞負責籌設該廠并由該公司暫撥資金200萬元，作為創業費。廠設桂林。

華義麻織廠

該廠為華義貿易公司所經營，資本100萬元，成立於31年12月，有職工139人。

新渝紡織公司湖南紗廠

該廠由孫立巳、張邦輝、孫學翰、邵相清等5人於30年6月間發起籌設，為有限公司組織，31年4月開工，有職工60人。實收股本30萬元。

江西新生紡織染廠

該廠由王德輿於30年11月發起，額定股本80萬元，均收足，采公司組織，全部資本由各股東自行認繳，31年12月正式開工。全廠職工700多人。

常務董事：王德輿，前南昌恒安錢莊經理、陳卓堂，前南昌義升恒錢莊會計、周揚禪，前南昌益大錢莊經理、張樹齋，前南昌德昌祥錢莊經理、崔鍊吾，前江西裕民銀行吉安分行經理、熊云藻，前南昌橡皮公司經理、余厚基，前吉安县商會常委。

監察：晏清泉，前南昌德厚錢莊經理、毛耀卿，前聯業莊金華接運處經理、傅錦元，天衣莊經理。

經理：熊云藻(兼)。

華新紡紗廠

該廠于31年秋由李星五、修荊庭、趙華叔等發起籌設，額定股本200萬元，均已收足，勘定陝西郿縣梅惠渠，利用水力發動紡紗，并購置地基，建築廠屋修通水道督造紡紗機于32年初正式開工。全廠有職工53人。

常務董事：趙華叔，經緯工廠股東、李星五，前天津東亞毛織廠營業長(兼總經理)、修荊庭，經緯染織廠董事長、王嵩山，日升汽車公司經理(兼經理)。

監察：侯丹甫，前靈寶中華打包廠經理、劉繼芳，寶鷄萬興號經理。

福牲紡織公司

該公司于29年初由陳伯顏、白詠盦、張自生等發起籌設，額定資本400萬元，設廠于湖南沅陵，31年5月正式開工。全廠有職工378人。

常務董事：房璜，曾任軍政部被服廠主任(兼經理)、張自生，曾任軍需處長被服廠長、劉方伯，曾任隴海鐵路站長。

監察：邱心佛，軍需處長兵站經理處長、陳伯顏，礦師、梁上棟，國民參政員，曾任實業部商業司長。

經園紡織廠

該廠于31年2月由滕典文、李麗君等發起，實收資本150萬元，廠設四川宜賓觀音灣，有職工140多人。

廠長：李麗君，曾任北滿被服廠主任技師。

太華紡織廠

該廠于32年1月成立，由吳斌、裴有藩等發起，實收股本2,000萬元，有職工150人。

董事兼經理：吳斌；監察：周潤蒼，昆明商會理事長。

泰華毛棉紡織廠

32年4月成立，毛虞琴、徐滋叔等發起，實收股本700萬元，有職工180多人。

董事：毛虞琴、徐滋叔、王銘軒；監察：黃子益、張瑞占。

大道生庸民染織工厂

創立于21年2月，系合伙性質，由周景西、周潤蒼2人发起，实收股本400万元，設厂于昆明南城，并在玉溪設立分厂，有职工200多人。

主要股东有張质齋、周潤蒼等，張現任云南兴文銀行行長，周任昆明市商会理事長及省參議員，并兼任該厂總經理。

大牽毛呢紡織厂

該厂成立于32年1月，由石鳳翔、苏汰余、毛虞岑等发起，实收股本800万元，厂設長安中正門外，有职工130多人。

常务董事：苏汰余，大华总公司董事長，裕华紗厂董事長、毛虞岑，德泰祥經理、徐治平，大华紡織厂副理。

監察：張万里，大华紡織厂厂長、徐滋叔，华兴铁工厂經理、徐节庵，大华总公司會計。

經理：刘益远，曾任經濟部駐陝工礦調正处主任。

福民实业公司毛紡織染厂

31年籌設成立，厂設江北紅砂磧，实收資本800万元，有职工63人。

常务董事：戴鳳藻，建华实业公司董事長、浦心雅，重庆电力公司總經理、沈笑春，重庆交通銀行副理、熊蔭村，宝元渝經理、周世恩，順記五金号經理、楊管北，中华实业信托公司經理。

監察：李其猷，重庆上海銀行經理、張誦月，宏昌电料行經理、刘贊廷，义丰公司經理、龔培卿，申新四厂會計主任、厉无咎，申新福新营業主任、曾俊臣，蜀益烟草公司經理。

總經理：袁国梁，大通公司總經理。

大成棉毛紡織厂

該厂系于30年2月由前山西新絳县之大益成紡織公司移出一部分資金所創辦，故組織上直屬于該公司所管，31年1月正式成立，实收資本145万元。有职工140多人。

兴華紡織公司

32年6月成立，为陈騰云、罗厚卿等所发起，厂設西安玉祥門外，实收股本200万元，有职工56人。

常董：陈騰云，第六集团軍西安办事处处长。

監察：李聚五，西安聚盛信經理。

總經理：張亨軒，綏远兴隆毛織厂經理。

永明紡織厂

31年3月籌設成立，32年2月开工試紡，为李庄寿、傅錫禹等所发起，厂設湖南祁阳，实收股本594万元，全厂职工60多人。

常务董事：傅錫禹，曾任广西紡織厂厂长。李庄寿，曾任恒丰紗厂工程师。曾振志，邵阳万能鋸木厂經理。

監察：汪約礼，桂林建国貿易公司會計主任。李嶽麟。

經理：周云，曾任大中机器厂經理。

利民織布工厂

31年3月成立，由江春华、歐阳輝等发起，設厂于湖南洪江新街，实收資本100万元。全厂职工40多人。

經理：王朝金，历任洪江各錢庄經理。

裕華紡織公司渝厂

該公司民国10年成立于武昌，系由苏汰余发起，計有紗錠42,000枚，布机500台，27年8月迁渝，28年7月复工，經数次增資，实收股本1,200万元。有职工3,280多人。

常务董事：苏汰余，大华紡織厂董事長，大兴紡織厂總經理。張松樵，前楚兴公司官布局經理。黃师讓，利華煤矿公司總經理。

監察：黃道安、朱有孚、孙志堂，均为重要股东。

經理：汪文竹，曾任大兴裕華紗厂厂长。

沙市紗厂

民国19年6月成立于湖北沙市，27年11月內迁，30年5月复工。

江西民生实业社

該社系32年4月由曾逸凡、余浩吾等发起，設厂于吉安古南鎮西門內等地，分紡織、印染、釀造、金工等部門，全厂有职工230人。

常务董事:曾逸凡,吉安华中百貨公司經理,泰和东南百貨公司董事長,吉安西头业公会理事長。張郁,江西民生火柴第三厂經理。陈卓堂,江西源源長銀号副理,江西企业公司董事。
監察:譚遐齡,莫永秩,曾超凡,吳輝廷。
經理:孫子敬。

勝利絲織厂

該厂于26年10月由南充士紳張慕韓、苏志宏、朱永康、蔣东升、尉鳳征、尉素秋等6人发起籌設,先后集資30万元。全厂职工45人。

董事:尉素秋、張仲友、袁曙东、蔣殿卿、陈冥爐。

監察:韓堯勛、蔣仲、蔣志宏,曾任政治部主任。

經理:張慕韓。

普益經緯公司

系錢天鶴、王士强等发起組織,成立之初,資本仅6万元,民国15年在杭州开工制造,18年迁滬,26年以上海战事爆发迁回杭州,复以战局影响与航委会保險傘制造所同时奉令迁湘,27年3月在長沙复工,时未半載,奉令迁川,擇定乐山护国寺为厂址。

該公司最初因籌設于杭州,公司現有董事、監察人暨公司重要職員均系浙省人士,目前(1942年)共有职工180余人。

常务董事:張久香,上海永华公司經理。董榮清,上海中一化工公司經理。

監察:張澹如,上海东南信托公司董事。樓卓夫,曾任安徽鳳阳县長。陆梓樵,上海章华毛織厂會計。

總經理:王士强,上海錦云絲織厂經理。

經理:王建侯,广东紡織厂西厂主任。

面粉工业

西安華峰面粉公司

民国24年3月由刘海樓、杜秀升、陈华民等发起組織,当推刘海樓

氏主持籌備，旋即正式成立辦事處，着手購地基建屋，并向德國米亞克工廠訂購粉機，于上海交貨循海路運至連雲港，經隴海路運陝，共時隨來德籍機師一人，并于天津聘請技工20余人趕辦裝置，于25年3月間正式開工出粉，至于公司資本最初為30萬元，嗣于民國28年增資為60萬元。

常務董事及監察人：金頌陶，鄭州金城銀行經理。杜秀升，曾任開封商會主席多年，國民參政員。劉海樓，開封大中火柴公司經理。陳華民，商界多年。王旭若，商界多年。田思需，曾服務教育界。魏亦亨，開封商界。岳正庵，開封商界。

總經理：杜秀升。

西安成豐面粉公司

該公司系濟南成豐面粉公司之分支機構，25年3月正式成立，有職工560多人，重要股東有王冠東、苗星垣、張景韓、焦振西、周品三；廠長王扶九，曾任濟南浦益糖廠經理及成通紗廠常務董事；經理苗星垣，曾任濟南泰華、同聚長等糖棧經理并創辦成通紗廠。

泰記和合面粉公司

該公司系由福記和合面粉廠改組而成，該廠原設河南許昌，為無限公司組織，27年以時局影響遷陝，30年4月改組為股份有限公司，資本為100萬元。職工100人。

監察人：張瑞占，曾任律師、法官等職。薛廉甫，服務商界十餘年。

經理：毛虞岑，歷任面粉廠董事長及各大銀號經理。

大新面粉公司

大新面粉公司系民國23年在河南鄆縣成立，發起籌備人為河南紳商楊靖宇、黃自芳、翟鴻飛、徐滋叔等，27年1月由鄆遷往陝西寶鷄，于寶鷄斗鷄台勘定廠址，建築廠房，安裝機器，于28年7月復工，資本原為10萬元，29年增為30萬元，31年又增為90萬元。全部職工約100人。

董事：楊靖宇（兼經理）。黃自芳，曾任廠長。翟鴻飛。

監察：盧崇榮，曾任陝西富泰銀行經理。蘇汰余，大華紗廠董事長。

建成机制面粉公司

31年7月成立，厂設成都外东大觀堰双碑，成立时即开工出粉，全体职工100人。

股东：荣鴻元、蔣鼎五、荣尔仁、荣一心、戴經坐、黄亦清、穆伯廷。

董事：李国偉，复兴第五面粉厂經理、申新紗厂汉口分厂經理。章劍慧，复兴第五面粉厂副經理、申新第四紗厂渝厂經理、公益紡織面粉机制造厂董事、迁川工厂联合会理事。华邇英，复兴第五面粉厂总工程师。蕭寿眉，大川銀行經理。何致中，申新第四紡織公司成都分厂籌备副主任。

監察：华栋臣，申新第四紡織厂、福新第五面粉厂副經理。龔培卿，申新第四紡織厂、福新第五面粉厂稽核組長。瞿冠英，申新第四紡織厂、福新第五面粉厂厂長。李冀曜，公益鉄工厂經理、申新第四紡織公司成都分厂籌备主任。袁国梁，福民面粉厂總經理。

福康面粉公司

該公司系由李曉东、王介石等于26年初发起創辦，先籌足資本150万元，至30年9月始行正式开工，旋以郑州事变，即告停止，嗣于31年2月复經工礦調正处电令迁陝复工，至32年2月始大部迁运完竣，乃勘定西安車站复兴路为厂址，并續募資本，已实收2,200万元。

常务董事：謝鉴泉，現任西安市常会理事長。張伯駒，現任鹽业銀行董事長。李曉东，曾任天津謙牲銀号董事長。

監察：孔紹周，河南省商联会主席。章寿堂，曾任河南鹽务处長。

田一明，現任白水新生煤矿常务董事。

總經理：刘千忱，曾任天津謙牲銀号董事。

复兴面粉公司

(見后述)

民丰面粉厂

該厂于32年1月由牛揖唐、賈曉农等发起，同年4月成立，設厂于西安中山門外，实收股本285万元。

該厂系合伙經營，有职工37人，常董牛揖唐，曾任成丰公司营业及工务主任；監察賈希正，曾任裕华棉織厂經理。

永丰面粉厂

成立于32年8月，由陆天池、崔魁梧、于松乔等发起，实收股本300万元，設厂于西安习武园，有职工70多人。

常務董事：陆天池，重庆中华实业公司董事。王宝康，中国通商銀行西安分行經理。崔魁梧，中孚油行經理。

監察：刘級三，义聚泰鉄工厂經理。暢汇川，西安合隆义銀号經理。

總經理：于松乔，曾任上海郵政管理局局員。

經理：孙亨超，曾任中孚油行經理。

厂长：邓松吾，曾任駐陝粮政局第一制粉厂厂长。

晋丰磨粉工厂

31年1月成立，設厂于西安东关，实收股本20万元，該厂系采合伙方式，經理曹彬，厂长荆雨生。

三泰面粉公司

28年11月成立。厂系毛虞岑、徐滋叔等发起，初集股本10万元，30年年底迁褒城，兼营碾米，增資至500万元。全厂有职工80多人。

董事長：杜月笙。

董事：毛虞岑（兼總經理）、徐滋叔（兼經理）、陈荣常（兼副經理）、王志莘。

監察：刘宦、王明軒、黃应祺。

惠民实业公司

該公司創立于23年，原仅經營碾米业务，迄32年3月始由李琴鶴、袁国梁等发起改組，增資为1,000万元，除將旧碾米部分扩充外，并就原址增設机制面粉厂，至33年1月正式开工。全厂現有职工74人。

常務董事：李琴鶴，瀘县县銀行董事長。楊管北，重庆中华信托公司總經理。李惟城，瀘县美丰銀行經理。

監察：蕭寿眉，成都大川銀行協理。沈佐卿，重庆裕生公司經理。

總經理：袁國梁，重慶福民公司總經理。

經理：蔡社平，曾任重慶大通公司經理。

面粉、碾米廠廠長：吳錚，曾任大通公司廠長。

寶成面粉廠

32年8月由開謀廣、吳建本等發起，33年2月成立，廠設西安街仁路，實收股本250萬元，有職工25人。該廠系合伙性質，經理開謀廣主持廠務。

化學工業

中國化工企業公司第二廠

中國化工企業公司系金城銀行與永利化學公司范旭東所創辦，負責人為金城銀行重慶分行經理戴自牧及永利公司范旭東。資本100萬元，均已收足。

第二廠系孟心如負全責，孟系民八留德，曾任同濟大學校長，近十餘年均在中央大學工學院任教授。

永新化學工業公司

永新化學工業公司渝廠，系抗戰發生後由滬遷渝，30年正式開工製造。

天原電化工廠

（請參看“吳蘊初和他的化工事業”）

總經理：吳蘊初。

董事：吳儀，天廚味精廠副經理。徐國懋，金城渝行副理。李祖芬，金城渝行信託部經理。王毅靈，金城天津分行經理。吳傲，天廚味精廠出納。

新興化學煉染工廠

該廠由嘉定綢商陳厚坤等合資創辦，於民國23年成立，廠設樂山北門外護國寺內，全廠職工近80人，主管人大致多屬股東。

董事長：黃遠模，嘉裕碱廠廠長及經理。蒲濟川，嘉裕公司工程

師。談建章，龍興絲廠及天源電機綢廠經理。施步階，商會會長及嘉格公司經理。王懷仲，嘉樂紙廠廠長。易華軒。

監察：羅肇基，豫大亨藥號經理。

經理：陳厚坤，曾任龍興絲廠、天孫綢廠廠長。

永固化學工業廠

該廠初由張雅齋、何崇峇、趙華記3人籌備，因缺少專門人才未能成功，乃由鄭壽芝、陳錦漢2人於30年10月中接辦，額定股本100萬元，收足50萬元。董事長李萃靈、總經理鄭壽芝，廠長兼工程師陳錦漢。廠設桂林，職工10多人。

維華化學工業社

該社系合夥組織，31年底由錢耀山、李國光發起，以製造肥皂為主要業務，經3個月之籌備，於1943年4月間正式開工，資本12萬元全數收足。全廠有職工近30人。

金華化學工業社

公司於23年由范旭東、鍾履堅等發起組織，設廠南京，以機器製造醬油、調味粉及醋類為主，抗戰後首遷沙市，27年續遷四川樂山，加入新股，建廠復工，由黃梅化學工業研究社專家監製醬油及酒類，29年春為供應後方需要創辦動力酒精廠，31年復添設胡豆瓣工廠，32年夏季開始籌設重慶分廠，擬大量製造酒精和醬油。全廠有職工147人。

常務董事：范旭東、楊端六、鄧華民、孫學悟、王文達、鍾履堅。

監察：方善培、楊孝慈、楊子南、林君潛、鄧君直。

總經理：鍾履堅兼。

大地化學工業公司

該公司於32年3月由杜月笙、程如山等籌備發起，額定資本300萬元，均已收足，同年11月正式成立開工，廠設重慶李子壩，有職工112人。

董事：杜月笙、傅沐波、郭景琨、梁子英。

監察：蔣相臣、薛威麟、譚福。

總經理：程如山；經理兼廠長：曾伯良。

立辛化学厂

該厂系由張叔荃、曾七云、陈志亮等于30年8月发起，10月正式成立，股本30万元，生产硝酸、硫酸銹及鉻黃，有职工10多人。

常务董事：張叔荃，前富华公司业务科長。曾七云。陈志亮，前仰光桐油提煉厂主任。

監察：曹天受，現任滄聚興誠銀行副理。沈伯銘，美亞綢厂會計主任。

中國工業煉气公司

該公司于21年由郭外鋒、郭成恩、陈受昌、李永成等发起，次年成立煉气厂于上海，以制造氧气流质、氧气、氮气溶液、炭氫气为主，24年成立电煉厂制造电石及矽鉄，28年迁川，在瀘县建立煉气厂，开始供应后方氧气，30年完成后方电鎔厂，于四川長寿利用水力发电大量制电石、矽鉄及錳鉄等供应后方軍需之用。該厂实收資本400万元。

裕民实业公司制鹼厂

該厂于28年上季由藍复初、唐希堯等发起，实收股本50万元，設厂于四川彭山县青龙鎮，全厂有职工100多人。

常务董事：胡玉笙，曾任四川兵工厂会办。張桐溪，現任普益地產公司總經理。孙少芝，曾任成都县立中学校長。

監察：馮月樵，現任开明書店經理。柳伯倫，現任万盛源号經理。

蔡佛裔，現任益华字号經理。

總經理：藍复初，利昌公司成都分公司經理。

三一化学制品厂

該厂系于31年10月根据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研究結果，知滷水中除食鹽外，尚含有氯化鉀，硼酸化合物，遂由范旭东、孙穎川等发起籌設工厂，提煉制造，实收股本100万元，于32年2月正式成立，厂設四川自貢市，有职工58人。

常务董事：張子丰，黄海化学工业社副社長。楊子南，久大制鹽厂厂長。范鴻疇，久大公司协理。

監察：鍾履堅，金华化学公司總經理。彭九生，黄海化学工业研

究社理工部部長。

廠長兼經理：趙如晏。

永利制碱公司

(請參看“范旭東和他的化工事業”)

建誠化工厂

該廠系合夥經營，31年10月間，由胡達民、胡時淵、余順家等發起，設廠桂林，32年2月正式開工，實收股本200萬元。製供氯酸鉀及機油，全廠有職工100多人，常務理事胡時淵，總經理余昌菊。

大千化學工業廠

該廠于32年6月開工，為賈若萍所發起，廠系合夥性質，出產衛生皂、肥皂及香皂，實收資本600萬元，有職工19人。

大興工業股分兩合公司

公司設重慶民族路，分公司及製造兩部，製造廠設江北陳家館，為迂川工廠之一。該廠以製造肥皂、牙膏為主，實收資本400萬元，總經理為謝濟川。

中國藥產提煉公司

中國藥產提煉公司系28年由渝市金融界多人發起創辦，股本30萬元，嗣于29年與華僑陳嘉庚合作，增資至100萬元，舊股東增資至50萬元，陳嘉庚獨認股50萬元，用數個戶名代表。

公司創辦動機系鑒于西藥來源日稀，擬用國產植物藥料從事提制，俾供後方需要。

董事長：周季悔，董事：陳嘉庚等9人，監察：郭兆麟等四人。

經理：蔡喆生。

競生公司五嶽皂廠

該公司原名“競業”，成立於光緒32年，設廠長沙，民國20年改組，易今名。長沙大火，全廠被焚，股東乃重新集資設廠於衡陽，不久長沙廠亦恢復，作為分廠，該廠經理為文任武，副理龔壽年，經營方式系勞資合作，勞方亦居于股東地位。(編者按：這種所謂“勞資合作”的經營方式，實則即資本家剝削和麻醉工人的一種巧妙的形式。)全廠

职工60人，实收資本80万元。

大明公司中國勝利酒精厂

民国31年3月，該厂主要发起人蕭振瀛、彭秉澄等籌集資本国币600万元，接頂原內江中国胜利酒精厂，隶属大明股份有限公司，該公司职工共約140人。

常务董事：蕭振瀛，曾任天津市長。彭秉澄，大学教授。邱三英，香港裕华銀行副理。戴承基，机器厂經理。

經理：郑大光，曾任軍需主任。

重慶慶兴酒精厂

30年12月成立，由邓廷珠、陶繼侃等发起，实收股本50万元，系合伙性质，有职工近50人。

协和化学工業公司潤滑油制造厂

該厂系于31年7月由山西銘賢学校校友等发起組織，設四川江北头塘，原名协和潤滑油制造厂，資本10万元，至32年4月始改組更为今名，經陸續增資，現已实收100万元。全厂职工30人。

董事：武士彬、何天德、史昌燮、刘允中。

監察：齐宪周、刘宗武、楊子厚、賈应麟、刘耀宇。

經理：毛鴻恩，曾任銘賢学校講師及中国化学公司工程师。

大成實業公司

29年8月成立，由董澄农，施嘉干2人发起，实收股本460万元（其中云南省政府加入1/3有限股金），屬下有嘉农面粉厂，設昆明夏窑，并設利工电石厂、农村紡紗厂、新成煉油厂、复兴亞水泥厂，全公司有职工200人。总經理董澄农。

宏丰企業公司大明煉油厂

宏丰公司創設之初，經營运输貿易諸业务。30年10月籌备添設煉油事业，31年1月正式成立大明煉油厂，厂址南岸覺林寺。厂务主持人为經理王震欧，厂长鮑忠濤，副厂长陈伯平等。全厂职工70多人。

董事：鮑芝岑，四达商行总經理。王震欧，申新四厂專員。鮑忠濤，四明保險公司副經理。朱永祥，上海德基行經理。邵葆

汉，上海兴順志記商行經理。

監察：楊儀真，中国农工銀行股東。鮑賢源，上海和記行經理。郁东明，宁波泰和行股東。

經理：王震次，曾任福民公司駐港印代表。

廠長：鮑忠壽，曾任四明保險公司副經理。

劍力动力油厂

該厂于29年春由黃劍白、黃克力发起籌設，預計資本为30万元，31年9月增資至60万元。职工66人。

經理：黃克力，曾任零陵电灯公司工程师。

建成煉油厂

該厂为唐亦民、徐伯璽等負責籌設，29年5月于渝中华路先設办事处，后于海棠溪建厂，9月即开工生产，后加战争区域扩大，由經濟部加入股本。該厂初时資本为10万元，1942年增至60万元(內50万元由經濟部撥付)，全厂職員14人，工役40余人。

董事兼經理：唐亦民，副理唐晋書，总工程师徐伯璽。

監事：陈树周、潘宜之、尹銳光。

該厂每月出产汽油煤油各1,200加侖，柏油4公吨，其汽油均銷售液体燃料管理委員會。

民国30年6月止純益202,820元。

新源煉油厂

32年1月成立，发起人胡西園、胡元佐等，厂設渝市小龙坎，实收股本300万元，有职工80多人。

常务董事：胡元佐，庆丰皮帶厂經理。胡西園，西亞电器厂經理(即亞浦尔灯泡厂經理——編者)。任善祥，丽华实业社經理。周知行，青年服裝公司經理。

監察：陆一齋，重庆皮帶厂业务主任。胡昌綬。刘乐山，协兴酒精厂經理。

總經理：任善祥，丽华实业社總經理。

華府兴業公司煉油厂

31年4月籌設，廠設涪陵荔枝園，提煉代汽油柴油，實收股本600萬元，全廠有職工178人。

常務董事：寧芷邨，四川平民商業銀行總經理。黃墨涵，聚興誠銀行總經理。董時進，大新農場董事長。

監察：陳銘德，新民報總經理。楊銘九，新華農業公司總經理。劉仲衡，光裕銀行經理。

總經理：閔陶笙，中原煉油廠董事長。

廠長：李正毅，曾任重慶大華煉油廠廠長。

中南興記火柴公司

該公司前身系河南開封大中火柴公司，24年遷陝，改組為中南火柴公司，資本5萬元，30年改組，始定今名，並增資為60萬元，31年復增為240萬元。全廠有職工350多人。

常務董事：劉海樓，西安秦豐煙草公司董事。陸君谷，中國旅行社經理。周敬熙，重慶建業營造廠經理。

監察：徐治平，西安大華紗廠副理。周文達，川陝實業公司經理。

經理：馮尙文，農本局福生莊副理。

秦昌火柴公司

23年1月成立。前身為山西新降縣之秦昌火柴公司，22年由段連岑、段庭泉等發起將一部分機器遷運至陝西華縣改定今名，28年遷寶鷄東關。實收股本為150萬元。

董事：段捷三、趙作肅、李承順、段庭泉。

監察：段月安、李存齋。

經理：段連岑實際主持廠務。

華業和記火柴公司

該公司系於28年2月由劉鴻生、翁文漪等發起，同年4月成立，實收股本50萬元。全廠職工有166人。

常務董事：朱元海、徐謨君、孫耀文、孫棣華、沈佐卿、翁文漪、顏福慶。

監察：陳漢青、夏厚丞。

協和新火柴公司

該公司系由西安協和火柴廠改組而成，該廠于民國18年開辦，資本2萬元，至24年因股本虧折無余，乃由舊股東讓與沈佑卿等維持，并添招新股，增添資本至20萬元，于26年正式成立。抗戰后遷寶鷄鎮，名為分廠，股本復增為200萬元。全廠有職工360人，股東代表沈佑卿，經理方子京。

利華橡膠廠

該廠系由蕭伯修、劉振聲等發起組織，原意為維持中國工商橡膠廠之撤退工友，因蕭氏原任中國工商橡膠廠工務主任，“八一三”戰事爆發乃遷桂，惟以原料動力種種困難，無法復工，遂告結束。但為維持少數外鄉工友生活，乃創設利華補胎廠，集資1萬元，承盤桂林中華補胎行全部工具原料，專以修補汽車胎為業。31年夏，派員赴南寧鼓勵當地商人赴越偷運橡膠，不二月，即有大批生膠進口，該廠隨即建造廠房，添置機械，從事于橡皮零件之製造，更名為利華橡膠廠。32年資本擴充200萬元（實收150萬元）并在衡陽、柳州兩地設立營業所。全廠職工100多人。

建新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窯業廠

建新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系于29年2月間由晉商杜玉六、李存齋、張劍清、趙德清、薛鴻林等發起籌設，以經營窯業、鋼鐵製造業為範圍，先辦窯業廠，當收股本10萬元，同年3月，勘定廠址于同官縣南黃堡鎮，30年1月正式開工，31年度增資至80萬元。

董事：張劍青，律師。李存齋，秦昌火柴公司董事長。閻象辰，義盛公號副經理。楊慎五，謙三堂經理。李子明，義興盛經理。王濟生，蔚興公經理。范久安，義盛公經理。

監察：趙德青，明盛源經理。謝佑初，同盛興經理。蔡文中，篤慶昌經理。

經理：薛鴻林。

蜀益機器磚瓦製造廠

該廠設于巴縣大渡口，于28年年底開工，實收股本100萬元，經理

侯揚麻，全厂有职工110人。

京華磚瓦厂

厂設重慶白沙沱，27年1月籌設，有职工39人，經理兼厂長為賈孟霄。

華生耐火材料公司

該公司系由嘉陵江文化基金會創設，30年9月开始籌備，工厂六所，所得利潤擬專作發展文化事業獎勵科學研究之用。實收資本50萬元。

常務董事：李崇根，華銀公司董事。孫越崎，天府公司總經理。吳錫瀛，重慶電力公司總工程師。趙璧光，華銀公司經理。盧子英，北碚管理局局長。

監察人：苟屏邦，華銀公司董事。李樂元。周雁翔，民生公司總務處副經理。盧爾勤。

中國窯業公司火磚厂

厂由胡組庵、陳松泉等發起，原設鎮江，“八一三”後內遷長沙，長沙大火後，遷零陵，28年5月正式開工，實收股本200萬元。全厂有职工100多人。

董事：程年彭、胡西園、胡定梅、王瑾士。

監察：庄志卿、周開甲。

四川窯業公司

32年1月籌組成立，設公司辦事處於重慶，厂分設江津及牛角沱，生產日用瓷品、電瓷及耐火磚，實收股本600萬元，有职工160人。

董事：梅心如，立法委員。王敬叔，曾任四川稅務總辦。周欽岳，重慶市參議員。

監察：曹擇岳，通惠銀行總經理。

經理：梅戒吾，上海中心公司經理。

建中平片玻璃厂

衡陽產制玻璃之厂家雖多，然大都系制普通器皿及理化儀器，其出產平片玻璃者，僅建中一家。查長沙原有大明玻璃厂專制平片玻

璃，長沙战事发生，該厂一部分工人乃撤退至衡阳，31年1月由刘少庭、蕭衡浦、吳耀华等发起，組織建中玻璃厂，仍制平片玻璃。該厂額定資本20万元，其中1/10(2万元)为劳方虛股，18万元为資方投資，如有余利，劳方可得10%。全厂职工35人。

三友玻璃厂

該厂系由彭吟伯、陈炳生、張华山3人发起組織，并由3人合伙經營，故名“三友”。三人原于27年在長沙成立制造机构，附設于万恒玻璃厂內，嗣以長沙疏散，所有职工乃迁衡阳，独立設厂营业。原有資本1万元，迁衡后增至5万元，1943年額定資本30万元，实收10万元。

鴻記和兴玻璃厂

該厂于32年2月由章兆鴻、彭汉民、王在德等发起，系合伙經營，設厂于桂林六合路，推章为經理，額定資本25万元。全厂有职工30多人。

瑞華公司

該公司始于26年夏初由李文彬、蔣相臣等先发起籌設瑞華玻璃制造厂于渝市化龙桥，27年5月正式成立，8月增設机制磚厂于巴县童家溪，至30年元月乃改名为瑞華企业公司，并成立总公司。2月复在江津順江場添設机制廠，資本原額定300万元，32年增为600万元。全厂职工約600人。

常务董事：李文彬，同心銀行董事長。蔣相臣，民新紙烟公司經理(兼總經理)。胡孔富，昆明宝庆行經理。邱子揚，重慶市商会执行委員。沈芷人，华一实业公司總經理。裘玉麟，电力厂总务科科长。仇秀敷，顏料棉紗兩公会主席。毛百年，川康銀行昆明分行經理。董介眉，德新字号經理。

監察：陈德恕，泰丰錢庄經理。舒次范，同心銀行协理。

慶華皮革制造厂桂林厂

該厂由胡昌綬、应庆甫等发起，系合伙經營性質，30年8月在桂开始籌备，經經濟部工矿調整处中南区办事处之协助，商得桂林市政府之同意，撥租碼坪街黄金岩山麓公地为該厂基地，32年年底开工。

該厂股本总額为40万元，全部收足。职工有64人。

建國貿易公司建國造紙厂

該厂創設于民国30年7月，額定資本40万元，实收30万元，厂設桂林南門外，制造紙板及書面紙等。

宏文造紙公司

該公司于32年7月由荣德生、李国偉等发起籌备，額定股本1,000万元，均已收足。勘定宝鷄10里为厂址，并向申新公司宝鷄鉄工厂訂購机器，于同年年底开工。負責人李国偉，历任鉄路工程师、申新第四紡織公司、福新第五面粉公司經理等职。

新華搪瓷厂

該厂前身为上海振华机器厂，“八一三”战事发生乃迁汉口，汉口告急，迁至重庆，28年秋，將一部分引擎冲床等搬至衡阳，設厂經營搪瓷工业，由經理陈韻馥独資經營，資本20万元，职工近30人。

江南电化工業公司

該公司前身系江南化学厂，于31年底由陈宗琦、曹熾昌等发起，接收重新組織，設于四川江北董家溪，实收股本200万元，公司分膠布、电池、机器三厂，有职工56人。

董事：程天放（国民党駐德大使）、陈宗琦、李軒如、鍾秉庸、馬家甫、黄釗。

監察：徐章、曹熾昌。

總經理：崔联三，曾任大陆电业公司副經理。

印 刷 业

龍門联合書局

公司发起于民国18年4月，經发起人会推定郑西谷、田定庵、严幼芝3人为籌备員，当时資本額为10万元，一次收足，經三次增資，至目前資本总額为300万元。最初选定上海尙文路龍門書院前民房20余間为厂房，故定名为龍門書局，后因与同业文华書館等合并營業，故改

称龙门联合书局，太平洋战争发生后，在成都、重庆、桂林诸处筹设分厂。1941年7月间成都分厂正式开工。

常务董事：沈溯明，交通大学教授。郑西谷，甘肃教育厅长。田定庵，滇緬铁路财务处处长。胡敦复，交通大学教授。严幼芝，本公司总经理。

监察：賈佛如，中华职业学校校长。廖茂如，国立师范学院院长。

大業印刷公司

該公司于22年春由李厚祚发起筹办，資本500万元，厂原設上海，“八一三”后設分厂于香港，欧战爆发后，复設第二分厂于仰光，迨緬甸吃紧，將仰光厂迁川，于31年7月复工。全厂有职工370人。

常务董事：李厚祚，前中国銀行天津造币厂厂长。李祖永，稅务署秘書。陈庶青，鹽业銀行总经理。

监察：吳有香，錢庄經理。李祖范，中国化学工业社总经理。

总经理：李厚祚(兼)。

經理：張星联，鹽务总局科长。

京華印書館

該館系前南京京华印書館，于抗战后内迁，在渝市城内及北碚小龙坎化龙桥等处分設五厂，30年10月將4个小厂讓与財政部，另由杜月笙、王春先等发起就余留之小龙坎天星桥分厂并加購原新民印書館厂屋机件于31年1月改組成立，資本为200万元，有职工153人。

常务董事：王春先，曾任武汉印書館及京华磚瓦厂經理。王毓英，曾任南京京华印書館經理。沈笑春，重庆交通銀行副理。

监察：江万平，會計师。屈用中，交通銀行信托部副理。余誦盤，医师。

經理：王毓英。

东南印刷所

該所系于28年3月由王造时发起，原額定股本15万元，后增为30万元，創辦“前方日报”于江西吉安，又收买当地新記印刷所加以扩充，9月正式开工。全厂有职工78人。

南方印書館

該館原名進化書局，系25年由叶波澄集資50萬元創設于上海，自組印刷廠，編印社會科學及大學參考書籍，抗戰後遷渝，又增資50萬元。全館有職工200多人。

總經理：叶波澄。

新蜀報社

該社系于民國9年由鮮英、袁斌、陳愚生等發起，初集資本萬餘元，收買前渝市中西印刷所原機件租賃房屋，次年2月創刊，後迭經改組增資為160萬元，以四川本省而論，為歷史較久之地方報紙。全社職工100多人。

常務董事：鮮英，歷任師旅長。鄧華民，通惠實業銀行董事長。曹撐宇，通惠實業銀行總經理。

監察：康紀鴻，通惠實業銀行董事。藍堯衢，利昌公司總經理。

總經理：周欽岳。

文通書局

該局現(33年)為黔省最大之印刷所，創于宣統元年。宣統3年初正式開始營業，系獨資經營性質，開辦時實收資本60萬元。

立信會計圖書用品社

該社成立於30年6月，為潘序倫所發起，初時規模甚小，資本僅6萬元，至33年已增資至600萬元，社址設重慶小什字，有職工77人。

常務董事：管錦康，立信會計專科學校事務主任。李朋三，立信會計專科學校秘書。劉芷林，永利銀行副經理。

監察：陳文麟，立信會計事務所會計師。王逢辛，立信會計事務所會計師。

社長：潘序倫，立信會計事務所主任會計師。

其他工業

溫州百好煉乳廠

該厂創始于民国17年，系由吳伯亨发起，独資經營，原額定資本24万元，嗣因經營得法，逐年均有盈余，利潤所得及資產总值已百数十倍于此。1944年該厂有职工200人，为当时后方罕有之煉乳厂。

蜀益烟草公司

蜀益烟草公司設于重庆陝西路，制造厂則在干厮門外，系27年3月籌备，同年9月开工。籌备时实收股本50万元，28年8月增資至100万元，29年扩充为250万元，30年再扩充为500万元。全部职工260多人。

董事長兼總經理曾俊臣，四川威远人，經營鹽业有年，为公司实际負責人。

大通烟草公司

該公司設于重庆南岸五桂石，系由楊錫祺、段纘怡、王恩东等于30年1月开始籌备，实收股本100万元。

董事長：王恩东，金城銀行重庆管轄行副理。

常董：楊錫祺，三才生煤矿公司襄理，原任大通經理。

經理：段纘怡，中国銀行渝行職員。

厂长：陈庸之。

建華机器鋸木厂

該厂系蔣作均氏独資經營，資本300万元，自29年10月开始籌备至本年(1942年)6月始正式成立开工，职工共約80多人。厂址設重庆。

總經理：蔣作均，应城石膏股分有限公司及鄂西煤矿公司總經理。

新華衛生材料厂

該厂于27年3月由張振东、王星辰等发起，同年11月正式开工，实收股本30万元，厂設西安西关，有职工60多人。

經理：張振东，曾任西安協和商行經理。

永潮黑濾井

該井为韓佑之所有，过去并未見功，即行停廢，于民国28年增产

时期由張毅甫出資承頂，籌集資本200萬元，繼續籌辦，費時四載，于33年3月發現黑油。該井有职工共50人，井位于自貢市涼高山。

海湧井晒鹽廠

31年3月成立，系合伙經營，主要股東为刁果先、刁相儀、楊必言等，廠設自貢市西場，實收股本100萬元，有职工52人。

大冶工廠

33年1月正式成立，由李子庭、方仁倬等發起，系合伙組織，股東8人，內3人系經辦中新工廠者，廠設于重慶南岸瓦廠灣，軋制鋅板、銅皮、鉛綫等，實收股本600萬元。全廠有职工40人。

經理：方仁倬，交通部工程師。

廠長：李子庭，第一飛機廠工程師。

中國標準國貨鉛筆廠

(見后述)

煤 礦 業

天府煤礦公司

(請參看“盧作孚和民生實業公司”)

三才生煤礦公司

公司由黃瑾瑩、但懋辛、傅汝霖、黃明安諸人發起，實收股本800萬元，于29年7月接收旧三才生煤礦，成立后即正式產煤，全體職員134人，技工、粗工、伙役共約2,000人。

重要股東：傅汝霖、但懋辛、楊曉波、黃明安、黃瑾瑩、胡子昂、胡仲實、王德郵。

常董：黃瑾瑩、但懋辛、傅汝霖(中國實業銀行經理、曾任中國興業銀行總經理、國民黨中央委員)、王德郵、胡仲實。

監察：胡子昂、楊曉波、田习之。

經理：薛桂輪。

陝西台水新生煤礦公司

該公司系于民國26年2月由劉子威、李子楨等人發起，是年3月征集股本5萬元，開始籌備購置機器，后增資至15萬元，復以添購機器需款，又增資至60萬元。有職工500余人。

常務董事：韓仲魯、徐裕如、田一明。

監察：劉楚林、費與天、高翰丞、李象九、張建伯。

經理：劉子威，曾任營長、團長、保安大隊副。

蘭記協力煤廠

為國民黨已故中委石青陽之子石孝先獨資經營，礦區在重慶南岸鷄冠石，該礦系于30年2月以93萬元購得。該礦因獨資經營，組織亦簡，除石孝先負全責外，實際辦事者為其叔石重陽，職員20多人，工人自100余至300左右，隨農家季節忙閑而異。

蜀江礦冶公司

該公司系于31年5月接受前新記蜀江鐵廠改組成立，實收股本300萬元，經營開采鐵礦及煉鐵事業。公司設于重慶千厮行街62號，廠礦均在江北縣龍王鄉，負責主持者楊萃文。職工近500人。

董事：余蘊蘭，人和公司董事、重慶市參議員、榮昌鐵廠董事長、1923年曾任川軍第一軍軍長。康步七，人和公司、實華銀行總經理。張咸熙，振裕銀號總經理。

監察：彭崧高，厚生興業公司經理。彭生輝，聚安銀行總經理。蒙笙甫，江合公司監察。

總經理：楊萃文，人和公司董事長及聚安鹽號協理。

福源礦冶公司

該公司系29年10月開始籌備，先收股本60萬元，決定在萬源石塘鄉設置煉鐵廠，30年5月增加資本40萬元，同年9月開成立會，選舉董監事，呈請註冊，復于31年6月增加新股100萬元，合共200萬元。

董事長范伯方（兼廠長），曾任煉鐵工程師。全廠職工143人。

華銀煤礦公司

（請參看“盧作孚和民生實業公司”）

興國工礦股分有限公司

興國工礦公司起源于天成機器工廠，民國18年創立，于22年間曾一度附設煉油、酒精、搪瓷諸業務（現已停辦）25年接收四合公司南董鄉礦區成立礦廠，同年8月產煤，27年6月合併義中和公司及天成工廠為管理委員會，28年7月增設磚瓦廠石灰窯，29年1月改稱今名。該公司實收股本300萬元。

常務董事：李文彬，同心銀行董事長及本公司董事長。沈士靈，曾任經協理兼本公司總經理。何良弼，曾任技士主任。劉家賢，曾任經理。藍孟霞，義大煤廠經理。陳駿如，曾任秘書、廠長。
監察：曾子高，律師。何劉國英，李竹斌，曾任工程師。

復興煤礦廠

該礦廠23年由余自舒、余德光等發起，礦區在四川榮昌，25年改組合辦，初辦時資本30萬元，經陸續增加，實收資本至300萬元。全廠有職工500多人。

常務董事：余蘊蘭。余伯舒，榮昌縣參議員、榮昌鐵廠董事。余德光，德興煤礦廠廠長、福昌鐵廠董事。

監察：余重華，四川水上警察局沱江分局局長。余伯衡，永興廠董事、德興煤礦廠廠長。

經理：余順章，曾任德興煤礦廠經理。

廠長：余順昭，曾任星火火柴公司經理。

河南禹縣中峰煤礦

該礦于19年10月由王鳳林、王清運等開始籌備，20年3月正式開工，實收資本30萬元，全礦職工190人（井底采掘工人不在內）。

經理：王鳳林，歷充禹縣契稅局長。

張芭馬煤礦生產運銷合作社

該社于民國27年由賈執中等發起，將隸為縣屬張溝原有之永丰、三和、變泰、恒丰4廠及沐川縣屬芭蕉溝之丰康煤廠等依照合作法規聯合組織，于28年冬正式成立，總經理賈執中，實收股本340多萬元。

宜民煤礦公司

該公司于28年5月由沈樂峰、何耀先等發起，初集資10萬元，以何

耀先为代表呈准四川省政府取得宜宾县屬之真武、翠屏兩山采矿权，创办和昌炭厂，嗣29年4月，因就地駐軍与伤兵医院开掘防空洞，发现煤层，遂自由开采，旋地方人士恐各部发生爭端，乃商得原发起人之同意，移轉矿权于宜良煤矿公司，从新組織，同年11月正式成立，收足股本100万元，股本中，公股占15%，系宜宾县政府所有。职工有450多人。

常务董事：呂輔周，县參議會会会长。解維哲，县參議會副議長。張允文，光裕銀行經理。

監察：邓天翔，县財委会主任委員。任又村，中学教員。唐秋帆，县參議會秘書。

河北、山东等地民族工业的资本来源

(编者按:本文作者使用“官僚资本”这个名词,是指现役或退职的官僚,把他们做官挣来的钱投之于工业,和依靠官僚权势以发展工业而言。)

华北地区民族工业资本的发生和形成过程,同我们在中国近代工业发展史上所看到的中国其他地区的民族工业资本的发生和形成过程是完全一致的。中国各工业部门中有一部分近代化,这不仅不能否定官僚资本的存在,相反地倒是官僚资本的存在对中国部分工业的近代化起了推动扶植的作用。北京很长时间内都是华北的政治中心,在这里,官僚和军阀在他们掌政的时代积蓄了大量的财富,虽然是分散的,但无可怀疑,这些财富在中国工业发展初期是起了很重要作用的。

这个华北地区的官僚资本对工业部门的投资倾向,并没有因为袁世凯去世及袁死后中央集权的崩溃而有所改变,它仍然掌握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的地方势力派——督军的手中。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倒不是由于中国官僚已经强烈地意识到有必要把对工业的投资作为国家的政策,必须贯彻实行,而是由于除了官僚以外,其他人没有资本。

清朝官僚对工业的投资,最初有1906年所创办的采取官督商办形式的灤州官矿公司。这个公司在创办当时的大股东,是由以袁克定(袁世凯的长子)为首包括周学熙、龔仙舟、李士偉、陈一甫、李頌臣等有名的官僚组成的。1907年中国最大的洋灰工厂启新洋灰公司成立了,这个公司和灤州官矿同属于一个资本系统,即北洋财团。这些官僚利用他们的私人财富并以政治背景为后盾,日渐插手于更多的新的盈利企业,无止境地追求着高额利润。

这个官僚資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达到了发展的最高峰。在民国初年至民国10年左右的很短的时间內，以掌握政权的官僚、軍閥和在野的退休官僚及旧統治势力为主，繼續設立了10多个大公司。这些公司毫无例外地都和当时的政权有着密切的联系，并集中地設立在中国的各个城市。特別值得注意的現象是在野的豪紳是工业資本的源泉，他們为了財富积累的安全，都是在租界內进行資本活动的。另外，就是在各工业投資部門，官僚資本在紡織业方面占压倒的优势。1922年，天津共有6个华商紡織公司，其中由官僚資本創办的就占4个，即安福派投資的裕元紡織厂，以直隶派曹琨为代表的恒源紡織厂，以王克敏、屠振鵬、吳鼎昌为大股东的裕大紡織厂和周学熙、楊味云派的华新紡織厂。此外，在天津紡織厂成立之前，在山东济南府，当时的实业司長潘复早在1916年就創办了魯丰紗厂，为中国官僚資本向紡織业投資的先驅，其中以周学熙为代表的华新紡織厂規模很大，除天津設有本厂外，在青島、唐山和河南省汲县还都設有分厂。

下表所列举的都是重要的大厂，至于其他若干中、小厂和虽然是大厂但資本系統不清楚的均从略，未列入这个表內。

官僚支配下的华北主要工厂

名 称	所在地	設立年月	主 要 出 資 人
华新紡織厂	天津、唐山 青島汲县	天津本厂1918	周学熙、王克敏、楊味云、李士偉、李士熙、 王筱亭(唐山)、周志复(青島)、龔仙舟(汲县)
		唐山分厂1922	
		青島分厂1918	
		汲县分厂1922	
裕元紡織厂	天 津	1918	倪幼丹、王克敏、馮耿光、王祝三、陆宗輿
恒源紡織厂	天 津	1918	曹琨、章瑞庭、田中玉、陈光庭
裕大紡織厂	天 津	1921	王克敏、屠振鵬、馮耿光、張勳
魯丰紗厂	济 南	1916	潘复、靳云鵬、王占元、田中玉
自新洋灰厂	唐 山	1907	龔仙舟、周学熙、顏惠庆、袁心武、盧开瑗
耀华玻璃厂	秦 皇 島	1922	龔仙舟、周学熙、袁心武、盧开瑗
石景山煉鋼厂	北 京	1922	陆宗輿、徐世昌、張新吾、張勳
溥益糖厂	济 南	1930	靳云鵬、潘复、袁良、曹汝霖
利中制酸厂	天 津	1933	宋哲元、商震、万国宾

由于当时中国政治形势的不稳定，无论开办工厂或经营企业，都必须和中央或者地方的政权有联系，或者接受它们的保护，否则就将遭到极大的困难，这种情形在内地表现得更为显著。因为在内地设厂如果不具备这个前提条件，就经受不起地方政权的苛敛诛求，就根本不能存在。

根据上表，可以指出两点：第一、12个工厂中的7个厂集中在河北省。第二、上表所列的各个工厂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一个资本家往往在几个工厂有投资。形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同乡的帮派关系，政治上的集团关系以及除同乡的、政治上的关系之外的在追求利润上的一致性。例如由新旧官僚和在野的豪绅所投资经营的唐山启新洋灰公司，它在董事的阵容上就充分地表现出了投资关系上的错综复杂的情形：

1933年启新洋灰公司重要董事名单

	姓名	籍贯	经历
董事长	魏仙舟	安徽	中国实业银行及耀华玻璃厂董事长
董事	颜惠庆	江苏	现任驻苏大使
董事	孙章甫	安徽	前交通部次长及吉长铁路局长
董事	王筱汀	河南	前启新洋灰厂经理
董事	石松岩	天津	盐业银行副经理、耀华玻璃厂监察人
董事	周笑之	安徽	周学熙之子
董事	袁心武	河南	袁世凯之第六子
董事	卢开琨	湖北	卢木齐之子，开滦矿务局及耀华玻璃厂董事
董事	王仲刘	河南	王筱汀之子，前北京政府之参议员
董事	陈范有	安徽	前经理陈一甫之子
董事	袁凤錕	河南	袁世凯之第八子
董事	俞翹梧	天津	前京汉路局长
董事	吴少皋	广东	开滦矿务局化学技师
监察人	周笑	安徽	周笑之的外甥，唐山华新纺织厂经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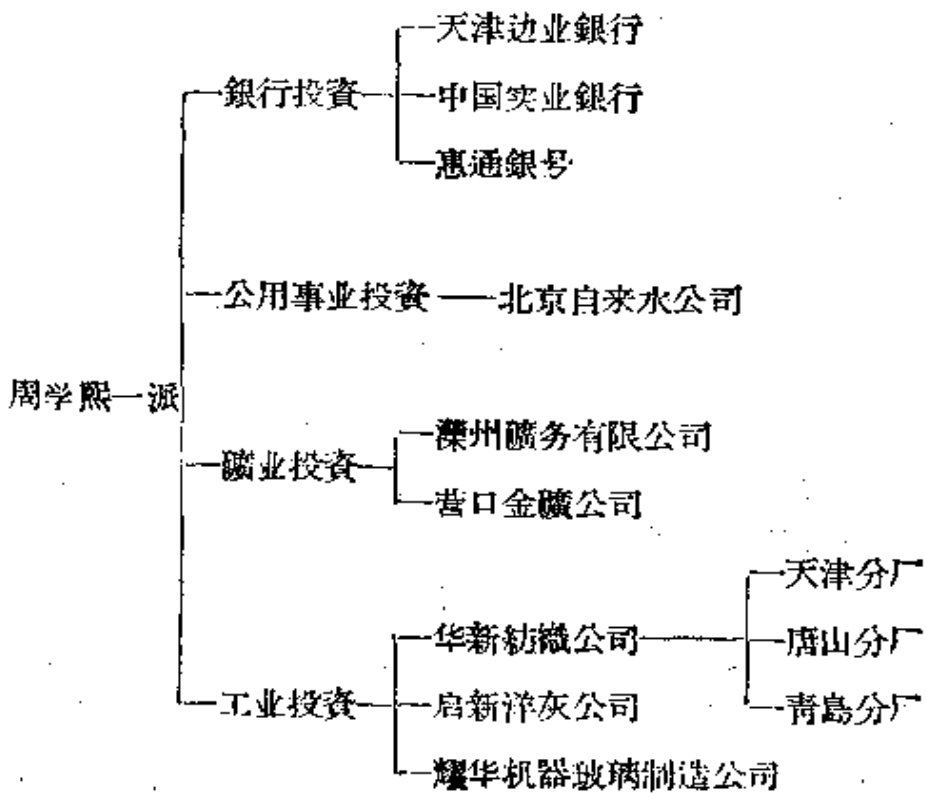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公司的大股东周学熙、卢木齐等是官僚资本

經營企业的典型，而龔、顏、袁、盧等官僚豪紳則組成了这个公司的董事會，并且他們的兒子和外甥又都按照世襲的制度参与这个公司的事务。

其次，我們把在1925年左右在平津实业界显露头角的、由著名的官僚投資的企业，画成3个图表，作更进一步的考察吧。

在这里，我們首先需要下面图表中所列的3个实业家的出身，做簡單的补充說明。周学熙曾先后历任前清末年的直隶鹽运使、北洋工艺局总办，1912—1915年間历任陆、段、徐3个政府的財政总長；这是一个在官場中享有大名而后来又在实业界飞黄騰达了的人物。龔仙舟，安徽人，1915—1920年間曾任北京政府的財政总長，1924年又任段祺瑞政府的內务部長兼交通总長。倪幼丹，前安徽督軍倪嗣冲的兒子，倪嗣冲在实业界拥有很大的潜力，而倪幼丹則是一个在皖系官僚中掌握政治、財政大权的人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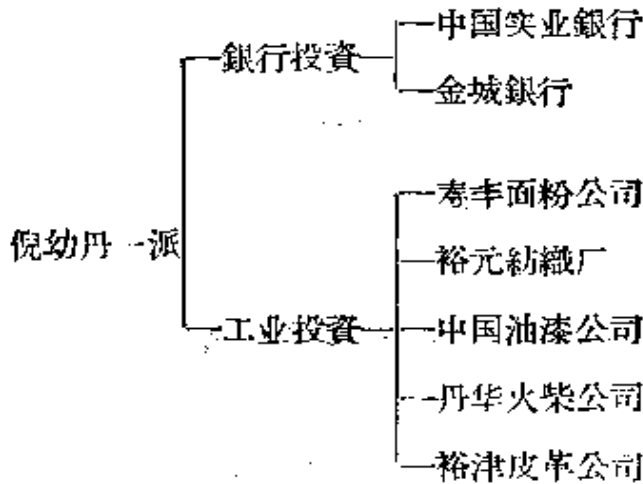
例一



例二



例三



除上表所列举的 3 个系統外，屬於官僚資本的还有：清末的大官僚袁世凱一派对开灤煤矿、启新洋灰、耀华玻璃的投資，前江西督軍陈光远一家对华新唐山紗厂、启新洋灰、鹽业公司方面的投資，直隶派的領袖曹家(曹錕、曹銳)对恒源、北洋紗厂事务的干預，新交通系的領袖曹汝霖退休以后在金融、矿业方面的活跃，作为財政总長、銀行總裁的王克敏在实业界方面的活动，等等。这些例子是不胜枚举。

的。

但是，这些由官僚資本所創办的各种企业和工厂，是好景不常的。它們随着官僚們在政治上的失利，依次地走上了分崩离析的道路。正如橘朴所說：“荣枯盛衰之不常，是中国官僚資本的特点，也是弱点。官僚資本之缺乏稳定性，其原因有二：第一、近代金融資本都是政权的背景和支柱，而在中国恰恰相反，官僚資本則是以政权为其背景和支柱，这就注定了它的不稳定性。第二、官僚資本的企业机构拥腫，經營不善，管理无能，制度腐敗也是沒落的一个重要因素。”（見橘朴：“中国社会研究”200頁）天津华商4个紗厂的沒落过程，刻划了官僚資本衰頹的具体形象。这几个紗厂，由于它們的大股东——曹錕、潘复、田中玉、倪嗣冲、齐燮元、靳云鹏等人在政治上的失利，工厂本身經營管理的腐敗无能，再加上当时金融界一般的不景气的影响，日益沒落，最后终于沒有发展成为民族資本的强而有力的一个主翼，但在华北民族工业資本中是成了一个側翼的，这在現在还可以看出比較显著的痕迹来。

*

*

*

济南，早在清代就已經成了一个具有中世紀規模的繁荣的地方市場，因大量的財富在这里集散而殷盛。很早以前，土著的商业和高利貸資本就在这里进行了資本的原始积累，而当德国人占据膠州灣、青島发展成为买办的城市以后，济南这个內地的地方市場的民族土著資本也开始了买办化，在买办化的前提下，桓台、章邱、寿光的地方帮和历城帮的資本积累起来了，这些資本作为第一批的工业資本在济南的工业中占据了統治的地位。济南的官僚資本和其他地方的官僚資本走了相同的道路。在这里，虽然曾經有过潘复的魯丰紗厂、袁良的溥益紗厂以及由官僚資本所支持的民安面粉公司及其他公司，但由于它們本身的停滯性，沒有发展成为这个城市工业經濟的主流，后来终于并入了新兴的桓台、章邱兩派的民族資本之中。从田中玉、郑士琦的和平时代到張宗昌登台以至韓复榘当政的1929年以后，是桓台、章邱兩派在工业方面稳步发展的时期。現在我們闡述一下以

面粉、紡織工业为中心的济南民族工业資本的特点。

在济南有这样的說法：“穿衣向章邱，吃食問桓台”，“金章邱、銀历城、鉄打的長清”。章邱、桓台帮在济南的經濟机构里占绝对的压倒优势，它們执掌着这个城市工商业的樞紐。桓台帮壟断了紡織厂和面粉厂，而粮谷、煤炭、棉絲布匹、杂货和金融則是章邱帮的势力。^①

据山东工商报告說：“济南的大部分粮棧殆为桓台县人所壟断，綢緞布匹业章邱人占十分之六至十分之七。他們由于多党关系互相帮助，对商情十分灵敏，其他同行业者不敢追随其后。”这一句話对上述情况作了恰如其分的說明。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紡織厂和面粉厂的資本系統：

济南紡織面粉工厂資本系統表 (1936年調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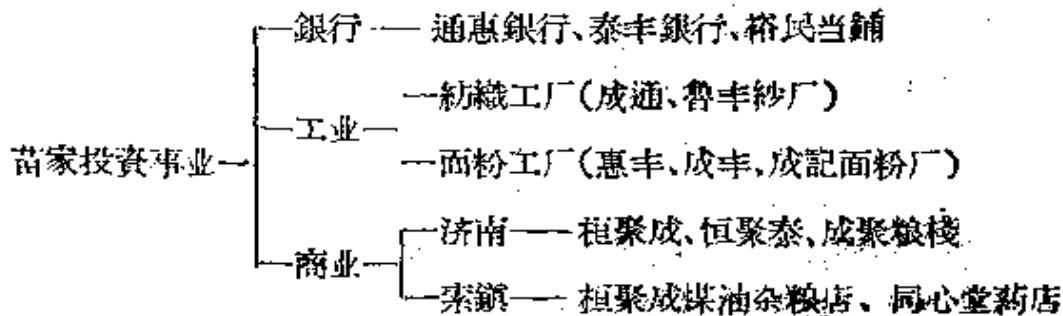
厂名	資本 (千元)	設 年 立 月	所 有 者
仁丰紗厂	2,000	1933	桓台帮之穆伯仁、崔景三、馬伯齐等出資
成通紗厂	1,500	1932	桓台帮之苗杏村經營，經理为苗星桓
魯丰紗厂	1,860	1916	初为旧官僚潘复經營1936年为苗氏家族承繼
茂新面粉厂	400	1919	榮宗敬
华庆面粉厂	400	1921	寿光帮張龙采
丰年面粉厂	752	1919	章邱帮張景宗和济宁帮
惠丰面粉厂	500	1918	桓台帮穆伯仁、苗杏村
宝丰面粉厂	300	1929	桓台帮之李际恩
成記面粉厂	500	1931	桓台帮苗杏村、苗蘭亭
成丰面粉厂	845	1921	桓台帮之苗家出資經營代表人为苗星桓

这个桓台帮的产业資本是怎样集中和发展的，它經過了一个什么样的資本积聚过程，又帶有什么样的特点呢？我們且举出这个帮

① 章邱帮的势力，自民国初年以来发展到了操縱当地金融界的程度。以章邱人張子衡所主持的山东商业銀行(由該帮孟家財閥投資)为首的、虽然資本零散但为数众多的錢庄資本曾經在一个时期里称霸于金融界，占据了压倒优势的實力地位。民国17年，由于張宗昌的失利，加上紧接着爆发了“五卅事变”，以經營土特产品和金融为主要业务的山东商业銀行破产倒閉，章邱帮不少的錢庄也都在这时走上了沒落的道路。虽然如此，章邱帮还拥有很大的势力。如該市共有錢庄48家，章邱帮就还占有22家。

派的代表者苗家来作一些說明。

苗家的发展，是由于苗杏村的努力。苗家原是桓台县索鎮的富农，这是一个兼营公聚成煤油粮店和同心堂藥店的乡紳。可以想見，苗家是靠商业和高利貸資本的积聚而进行了資本的原始积累了的。民国初年，苗杏村曾在他的伯父在济南所开办的桓聚成粮棧当过掌櫃的(經理)，恰巧在济南这个城市日益繁荣的时候，苗杏村的伯父死了，于是他便繼承了伯父所經營的事业，后来由于桓聚成生意兴旺，发了大財，因而以后他便插手在以下所列举的工商业部門之中了。



欧战以后，伴随着济南这个城市的商业經濟的繁荣，苗家在金融及工商业界展开了广泛的活动。上表所列的通惠、泰丰銀行虽因張宗昌督办的苛政而倒閉，但在韓复榘执政以后，工商业方面的經營和投資却是稳步发展的。另一方面，自从苗杏村当了省參議會議員和商会会长以后，随着他的社会地位的提高，加上得到当地強而有力的金融機構——民生銀行的协助，以及向其他公司的投資，因此苗家的企业是一帆风顺的。关于苗家現在的資產总額，一般估計是180万元，一說为120万元。其資產構成，对企业的投資占85%。其余的是不动产。除了直接投資之外，向民生、中国、上海銀行借款投資的也不少。苗杏村于1940年去世，現在苗家的代表是苗杏村的两个侄子苗蘭亭(苗杏村哥哥的儿子)、苗海南(苗杏村弟弟的儿子)。

济南的民族工业就是在以乡土关系，即所謂“行会的紐帶”作为基础的桓台帮和章邱帮的买办、商业資本为中心而发展起来的。

(李公綽摘譯自三品頓忠：“华北民族工业之发展”，第45-56頁，1942年，日本中央公論社出版)

江浙財團的起源及其發展過程

一 概 說

中國有代表性的財閥，一般認為是所謂“浙江財閥”。我們的前輩對於浙江財閥有過如下的說明。

第一、主要以上海為根據地的浙江籍的金融業者及實業家的總稱。這是一種狹義的解釋。按照這個解釋的浙江財閥，又分為籍隸寧波、紹興等地的浙西幫和籍隸南潯、湖州、嘉興、杭州等地的浙東幫。

第二、主要以上海為根據地的江浙兩省的金融業者及實業家的總稱。這個解釋比起第一個解釋來是廣義的，按照這個含義，也許稱之為上海財閥或江浙資產階級更貼切些。

第三、凡以上海為根據地而進行活動的金融業者和實業家，並包括財界、政界的巨頭，不論其籍隸浙江、廣東、江蘇或其他省分，統稱之為浙江財閥。按照這個含義，與其稱之為浙江財閥，倒不如稱之為中國新興資本財閥更為切合實際。一般人所說的浙江財閥都是指這個解釋的含義而言。

以寧波幫為中心的江浙鄉幫的同鄉集團，形成了上海資產階級，形成了浙江財閥。這個財閥形成的主要原因有三：第一、是上海城市的发展；第二、是江浙各地的土著資本積聚和集中的发展；第三、是擔負國民革命任務的浙江軍閥的发展。所謂上海城市的发展，意味着隨着中國殖民地近代化，上海成了買辦城市，同時也成了工業城市。在這個過程中，起了最重要作用的是以寧波幫為中心的江浙各鄉幫的土著資本，而江浙各鄉幫土著資產階級的发展，到了1927年，很容易地就促使以蔣介石為首的浙江革命軍閥右傾了。到此，所謂南京政府和浙江財閥的聯合勢力成長起來了。

（李公綽摘譯自山七金男：“浙江財閥的基礎的考察”，55、65頁，日本中央公論社出版）

二 从金融活动开始

初期的江浙財閥，其性质，在于地方性的及基尔特性的。是总括的对于浙江（所謂浙江，并不專限于浙江，可以說是浙江、江苏，或者說，不論地域，凡是在上海的都包括在內。）在上海的实业家的集团的称謂。所謂財閥，也并不是指“財閥金融資本，康采倫”，或者高度資本主义国家的独占形态的財閥。

浙江財閥的特征是：他从买办資本发生而以民族銀行資本为骨干的，就是銀行資本家的集团。例如：上海市商会的構成分子，最主要的是銀行业同业公会，当1934年，公会代表21人中，浙江占10人，江苏占9人，湖南及安徽各1人；看了这种事实，也便可以明白了。

那么，这样的銀行資本集团，是如何形成的？这集团形态，向如何的方向发展，关于这，王承志在中国金融資本論中，有过詳細的分析。

中国的銀行，有着好几个銀行集团，而所謂江浙財閥，在商业界、金融界掌握着最大的权力，其地位也比其他財閥为优越。实际上，所謂江浙財閥，只是在上海金融市場角逐的一部分人，可掌握着金融上的权力，而无可与匹敌者。

从实际情形上来分析，除了有超然地位的各銀行之外，国内各商业銀行，从其性质及动态上来看，可分为南北东西的四大財閥。这四大財閥反映于实际上的，便是各地华商銀行的分布状态及消長盛衰。

华南財閥，在福建、广东及南洋方面活跃，握住华侨金融的樞紐，負着疏通南洋侨胞与祖国的經濟关系的使命。华北財閥是20余年前的新兴势力，当北京政府时代，居金融界的領袖地位，其发展的迅速冠于全国銀行，而利用联合营业的优势，給各方面以威胁。迨南京建都，金融中心是由上海独占了，这种活动，也渐渐的移到江苏、浙江、安徽方面，于是，与华东財閥的营业竞争，互作秘密的策略，表演白热化的战斗。华东財閥，即江苏、浙江、安徽的当地人銀行，一方面有着長久的历史，且得地利、人和，最初是在上海建树基础。及国民政府成立，其势力日益增大，成为其中坚的便是有名的所謂江浙財閥。至

于华西財閥，因为諸銀行設立的日子淺，实力上也較遜，且其活动偏于四川一隅，所以，不能成为一大势力。

中国的銀行业，除与政府有关系的之外，实际上，华北、华东兩財閥，为左右全国金融业的骨干，而兩者的中坚，即所謂“南四行系”及“北四行系”。

华北財閥，分为直魯系与北四行系。屬直魯系的，有边业銀行、东华銀行；屬于北四行系，为鹽业銀行、大陆銀行、中南銀行及金城銀行。

华东財閥，分为南四行系（也称南五行系）、宁波系、安徽系。屬于南五行系的，为中国銀行、交通銀行、上海商业儲蓄銀行、浙江兴业銀行及浙江实业銀行。屬于宁波系的，为四明銀行、通商銀行、垦业銀行。屬于安徽系的，为中孚銀行、中国实业銀行。

华南財閥分为福建系与港粵系。屬于福建系的，为华侨銀行、中国兴业銀行；港粵系的，为四海通商銀行、广东銀行、东亚銀行及国民銀行。

屬于华西財閥的，为聚兴誠銀行。

所謂“南四行系”，只是金融界习惯的名称，并没有具体的組織。四行系，是在江浙区域最活跃分子，不但有長久的历史，而且其財力的巨大，也压倒其他各銀行，成为“江浙財閥”的領袖，自成一個系統，成为中国金融界最大的势力。

据以上所述，江浙財閥的势力及其地位，已大体可明白了。

形成中国近代的民族資本的基础，是前清末年以来的“官僚資本”，与帝国主义經濟侵略下培养出来的所謂“买办資本”。這兩者，随着中国的資本主义成長而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民族資本的形态。因此，所謂江浙財閥，从其产生上来看，是买办資本的集合，尤其是当地人銀行資本为其骨干。

那末，为什么在中国，未見产业資本的发达，而只見銀行資本发达的呢？換句話說，江浙財閥（以民族銀行資本为骨干）为什么能够成立，能够发展的呢？这，当然，是由銀行資本与政府資本相結合而成立发展的，其虛偽的繁荣是建筑在对于公債及地产的投机事业上。

的。并不是由产业发达而蓄积资本的，而是由于参与政府的公债政策及地产交易的投机事业的；就是，与生产事业毫无关系，单单由于资本的流通以膨胀资本，而作虚伪的积蓄的。江浙财阀的膨胀，在于与政府公债的关系。

（“重庆灵魂的浙江财阀”“中国内幕”第三种1941年4月，新中国报社出版）

如說中国财阀，則江浙财阀当居首位。事实上，它有支配的权威，故本篇研究，以江浙财阀为中心；同时兼及于财阀之全貌。江浙财阀，是以金融资本为中心之财阀。上海为江浙财阀之根据地。兹先研究上海之金融发达史。

上海，1842年依南京条约辟为商埠；在英租界設立当时，可视为金融机关或财阀者，惟山西票号而已。然此山西票号，因外国银行之設立，銀号或錢庄业之簇起，国内新式银行之发达，其势力，不久即行消失。

兹先述錢庄之发达。統計光緒初年之最盛时，南京北市合計，业此者有400以上，此种錢庄业，形成上海金融界之支配的势力。此等經營人大部分因地域的关系，多出身自宁波、绍兴、苏州、鎮江等处。

迄光緒7年（1881）中法战争勃发之际，财界极其动摇与混乱，遂一时减为20余；惟媾和条约成立后，复增加至百余。然經過此次之創期的动摇，結果，錢庄业发生显著的变化，今日之所謂江浙财阀之基础，即筑于此时。

当此动摇期，出身于浙江、江苏之錢庄业者之对立势力加以淘汰；苏州、鎮江等之江苏系遂为绍兴、宁波之浙江系所压倒，而居于次位。此种势力淘汰之原因如次。

第一、宁波、绍兴系之金融业者，数量方面无条件的較江苏系为优越。

第二、上海开港时，浙江系先与外商交易，而蓄积有巨額資金。

第三、上海錢庄业屢遭变故，輒受影响，变化层出，其主要原因如次：

（一）光緒20年，因营口市場恐慌之影响，即中日战争，旅順、大連、营口之天字号錢庄相繼倒閉；上海金融界亦受影响。

(二)光緒24年起，宣統元年止，有橡皮股投机之反动。

(三)辛亥革命之影响，当辛亥革命勃发时，全国震动，上海北市之錢庄业，激滅之余，为数不到五十。

(四)此后，上海金融市場逐渐入于安定时期，后虽有欧洲大战及世界恐慌，然其安靜状态亦未变化，惟此不过为相对的比较說法，因世界恐慌之深刻化与国内經濟之崩坏，遂致錢庄之危机不可避免。然此事瞬息万变，本編未能為詳細之調查。

惟此之际，宁波、紹兴系之执此业者，着着进展，而确保其独占的地位，不容忽視。

其次，就国内新式銀行加以考察。新式銀行与錢庄业立于对立的地位；国营者，如大清(中国銀行前身)、交通兩銀行創設当时，其代表人物为焦乐山、倪錫畸等，悉为鎮江系人物。四明銀行为純粹民营銀行，由上海宁波出身之朱葆三、孙衡甫等巨商所經營；此金融机关尝被目为宁波、紹兴系之根据地。浙江兴业銀行因建設浙江鐵路(現在之滬杭甬鐵路)而創設，其实权操于宁波系之盛竹書、叶揆初之手。浙江实业銀行民国元年創設，当时为官商合办，其后归民营；以李馥蓀为中心，而形成所謂浙江系之主要金融机关。

此等国内新式銀行，自清末迄民国初年，其势力并不如浙江系錢庄势力之巨大，乃周知之事实；民国以后，逐渐增大而有今日之状态，浙江系曾將上海之士著新式銀行之大半收归其掌握之下。关于浙江金融財閥发展之原因，可举如次之各项：

(一)民国初年以来，上海財团之有力者多为浙江系。且政治的势力亦多为其所把持。民国初期，上海都督陈其美(浙江吳县人)，为浙江革命党之首領；其势力在上海风靡一时(蔣介石当时不过为彼之參謀)。被目为浙江財閥中心人物之張靜江(浙江吳兴人)，現为国民党之元老。曾任財長的宋子文，其原籍亦屬浙江(宋子文原籍海南島，但有些人却以为他是浙江人，是不确切的——編者)。上海財界之耆宿而曾于民国 16 年任国民政府署理財政部長的錢永銘(原籍上海人)，其他如王正廷(浙江吳兴人)等等，不胜其数。此等人物，对于江

浙財閥今日勢力之育成，曾有極大之功勞。又上海財界之中心為江浙財閥之干城的上海總商會；其它閩北商會、上海縣商會、上海銀行公會、上海錢業公會等，其實權皆操之于江浙系人物之手；例如，嚴筱芳、周佩箴、朱葆三、宋漢章、傅筱庵、虞洽卿、方椒伯、沈聯芳、王曉籟、王一亭、錢永銘、張公權、虞文溥、秦潤卿等，即其代表者。

江浙系資本家，早已躋于本國之資本家的先鋒地位，而業已具備積極活動之條件。

(二)江浙金融界之此等有力者，由共存共榮之見地，以橫的結合，而努力確保其獨占的支配勢力。因此，彼等歷代與軍閥勾結，而努力獲得其政治的權力。例如，上海都督陳其美下台以後，與北京政府要人結托，尤其與梁士詒一派合作。孫傳芳為五省聯軍總司令時，亦與孫結托，更國民黨北伐以來，完全收握于自己之掌中，負擔國民政府之公債，而其勢力亦反映于政體上矣。

中國銀行與交通銀行，入民國後，其初握實權之鎮江系資本家之勢力，次第轉換為江浙系，宋漢章、錢永銘、盛竹書等為中心幹部，由江浙系人物經營，事實上形成江浙財閥之地盤了。

又，民國17年，宋子文財政部長創設中央銀行為“國家”銀行；也完全由江浙系人物占據，是不待言。此等特殊重要銀行，既為今日江浙財閥之重要中樞機關，其支配的獨占地位益可了然。以上略述上海金融界之發達，江浙財閥之發展小史，亦一瞥之矣。同時，江浙財閥之為金融財閥之就里，更為窺其梗概矣。

茲概觀上海各種企業之發展，而簡單探尋財閥角逐之迹。

三 江浙財團與企業關係

自1842年，上海開辟為商埠以來，不久即為對外貿易之中心地。先從商業部門，或原始產業部門觀之。輸出貿易之重要者，絲、茶居首，次為毛皮、茶葉、木材、雜糧等。

在上海最初掌握生絲海外輸出者，系外商屬下之廣東買辦，然因地理的關係，其支配權次第歸于浙江系；今日浙江湖州人，已奪得其利權。

茶業之經營，亦由廣東人着手。至於現在，廣東系亦尙保持優越勢力。安徽系次之；江蘇系、浙江系，近來漸次抬頭，但不及廣東系。

毛皮、藥材等，系浙江系所占有，雜糧、油类等，江蘇系、浙江系互相角逐；但江蘇系稍見優勢。

其次，輸入貿易方面，金屬、染料、棉布、棉紗、砂糖、機械、雜貨等外國輸入品之經營，數十年來，為寧波人絕對獨占，逐年有增長之勢。

工業方面，自然可以說全部是輕工業。輕工業之主體為制粉、紡織。

制粉業。斯業之最初設立者為阜豐面粉廠，30餘年前，由山東巡撫孫家鼐創設於上海。繼起者，有中興、華興兩粉廠。現在營業狀況較佳者，唯阜豐廠而已；中興、華興早已合併於福新面粉廠，由無錫人榮宗敬所經營，上海有7個工廠、漢口亦有分廠，可謂中國制粉界之支配者。

紡織業。光緒14年，盛宣懷創設三新紗廠，是為創始者。該工廠，民國元年以後，為革命政府所沒收；民國2年，登記為英國籍。歐洲大戰之際，遭遇歷史的發展期，乃周知之事實，振華、申新、永安、大中華、華豐、溥益、緯通、厚生、統益、恒大等各工廠，約計70萬錠。現在占優勢者，為廣東系郭樂、郭標等所經營之永安紡織公司，與制粉界之支配者榮宗敬所支配之申新紗廠；寧波系、江蘇系、湖南系等，亦有相當勢力。

制絲業。約在40年前，創設於蘇州河畔一帶。當初為湖州系所支配；十餘年來，其霸權，移于無錫系；近時土著制絲業，陷于絕望的不振，然占有支配的地位者為無錫系。

機械鐵工業。其勢甚微，為寧波系所支配；當初不過為小規模舊式工場；最近七、八年以前，大隆機器廠設立以後，斯業方踏進新式化之第一階段。工廠主嚴裕棠，支配人及其他皆寧波人。

造船業。南市有求新造船廠，20餘年前，由上海系之朱志堯所創設；今為中法合辦。

煙草業。有中國南洋兄弟煙草公司、中國興業煙草公司、華成煙

公司等。南洋、中国兴业、华成公司皆属于广东系。其余之大小烟工厂多为浙江系之投资。

四 各行业人事调查

海运业——开始最大者，为现国民政府管理之招商总局（事实上为浙江系，今后益增厚其色彩），此外，最有力者为三北轮船公司与宁绍轮船公司。此两者均属于浙江系，宁波、绍兴系。

一、三北轮船公司——创设者为浙江财阀之台柱虞洽卿。所有汽船，为凤浦、伏龙、宁兴等，合计20只；最大者2,700吨，最小者1,700吨。平均二千二、三百吨。

二、宁绍轮船公司——创设时由上海之宁波、绍兴出身者所经营，与当时独占上海之英商太古轮船公司相对抗。现在之船只，为新宁波（2,200吨），绍宁（1,900吨），甬兴（1,400吨），经营宁波、长江航路。主权者为上海著名之实业家袁履登，宁波人。

制糖业——上海之砂糖业者，大小五、六十家。最大规模者为厦门之黄炳记、禎祥、日兴行、黄日兴、聚德隆等18家；均为华侨出身所经营，办理爪哇直接输入。

与厦门帮对抗者，为宁波人方氏经营者，即元益、元裕、元惠和、方本和元泰恒、裕大恒等10余家，非特与爪哇，且与日本之贸易亦甚大。方椒伯、方稼蓀为方氏之代表，为上海财界著名之人物。此外，镇江系之元和、仁和、广源，虽亦为第一流，但不及厦门、宁波系。

海味行——大小有50以上，大部分为宁波系之经营，资财约10万两。设立于新开河之东盛公、东源、源记、震新等，最著名。

米谷油业——最大者称为“行”或称“号”，约20家，主要者集于南市豆市街。小者，南北市无数。资财上10万两之大者，大抵为上海人之经营。其中宁波甬江出身者李氏之新丰行最有名。但于此等之经营中，金融关系非常重要，因今日与浙江财阀有不可分之关系；“行”“号”之经营主，上海系多；支配人、职员多出身于宁波、绍兴。

酿造业——大规模者，在上海南北市百余家，小者无数。

最主要者为福建路之張崇新醬園，与新開路之張振新醬園，均有百万兩以上之資本。浙江系張逸云(先代)之開設者約有70余家之醬園，受其支配、店号“張”者，为張家单独經營。标“万”字者，为間接共同經營。完全处于独占状态。

調味粉业——張崇新醬園張逸云(浙江人)13年前資本金20万元；法租界菜市路，創設天厨味精厂，为中国制造“味之素”之头一家。不久，程齡孙(安徽系富豪)投資50万元，開設中国振泰公司工厂于法租界。

其次，宁波人方液仙(砂糖主方椒伯之甥)，原为天厨味精厂发起人之一，創設中国化学工业社于小沙渡。

民国15年，叶墨君(杭州人)与孙春荣(宁波人)共同出資創設天一味母厂于翰明路集賢里。

葯材行及葯店——合計2百数十家。大部分为浙江系。主要葯材行，在南市咸瓜街；如元丰潤、元大、元升、日新盛、裕大等(最大資金四、五万兩)。大葯店，如蔡同德、胡庆余、王大吉、奚良齋等，資金二、三十万兩。

人参业——上海参行，大小有4千余家。南市咸瓜街为中心市場，殆全部为宁波系。阜昌、元昌、阜大、德昌等最有名(資本約五、六十万兩)。

顏料业——約80余家。大半为浙江系。今日上海之主要顏料业者，均大战当时获巨利者。如瑞康盛(宁波系貝潤生經營)、咸康潤(宁波系薛宝潤經營)、恒丰昌(苏州秦涵琛經營)、德和潤(鎮江系邱省三經營)等，資金四、五百万兩。二、三流者，資金約有10万兩，現狀尙好。

棉花业——上海从事于棉花业者，合花行或花号，共計60内外。軋花厂10余家，花行上海系最大；花号汉口系占优势。宁波、余姚、南通花号次之，其資力，大者有五、六十万兩。纖維产业，一般浙江系居于劣势，然自金融关系則構成密切的支配关系。

軋花厂之最大者为益泰順記(厦門路)，系浙江薛文泰之經營。

紡織業——紡織業浙江系方面比較不振，今試述與浙江系有直接關係者如下：

一、大丰庆記紡織有限公司——資本金150萬兩。寧波紡布業界之巨頭徐庆云，與上海錢庄業界有力者秦潤卿之共同經營。

二、厚生滋記紡織有限公司——資本200萬兩。寧波系顏料業主薛寶潤與貝潤生共同經營。

三、振華利記紡織有限公司——資本30萬兩。寧波系薛文泰經營。

四、振泰紡織有限公司——資本80萬兩。寧波系朱葆三經營。

五、崇信紡織公司——資本150萬兩。寧波系邵声濤與蘇州吳麟書共同經營。其中有英國資本。

六、華丰紡織有限公司——資本200萬兩。由王正廷、錢永銘發起，但現在由日華紡紗廠所經營。

棉紗業——大小百餘家。江蘇系與浙江系立於對立關係。廣東系、四川系次之。最有勢力者為益大號。系江蘇系吳麟書所經營。資本500萬兩。次為福大號（寧波路）與宗德號（天津里）均為浙江系。前者為徐庆云（資本300萬兩）所經營，後者為邵声濤（資本百萬兩）所經營。

棉布業——大小300餘。以辦理日本製品與英國製品為主。大者百萬兩內外。第一流者為五、六十萬兩，第二、三流者約10萬兩。

最著名者，為杭州系，陳、步兩姓所經營。法租界公館馬路之日新盛、日新增（以上為陳晉軒所經營），協祥、小東門之恒丰（以上為步翰承所經營）等是。資本百萬兩。寧波系萬成永、源茂盛（以上南京路）、正大（天津路）等，稍有遜色，資本50萬兩。此外，寧波系徐承恩經營之裕康、裕春等，亦屬相當。

又兼營棉布業與染織業者，有達丰染織廠、綸昌染織廠，主要出資者，萬成永號之店主李學暢，其他大部主要之棉布商亦為該工廠之股東。

制絲業——上海制絲工廠約有五十餘家，大抵非自己之工廠，多系從他人貸借而經營者。

規模最大者，約有五百數十釜，最少者二百釜內外。其流動資本極為貧弱；最大者，不過20萬兩內外。故原料之購入，工場之經營，必須有金融界之通融。

經營人無錫系最多。次為浙江。最有力者為湖州系沈聯芳。

次就生絲商加以考察。特別有力，稱為絲棧者20余家；為湖南系經營者如泰康祥、同康泰，寧波系者有寶元祥。

綢緞業——大小200余。蘇州系以外，殆為浙江系湖州、杭州、紹興與寧波系。其中著名者，為南京路之老九章，小東門內之阿福昌及悅昌文等杭庄（杭州綢緞店），資本四、五十萬兩。現已組織綢緞銀行。

五金業——即金屬製造關係者，大小百六、七十家。大半為浙江系、寧波系葉氏經營之新順記、老順記、新順泰（各100萬兩左右）最有名。最近占勢力者為瑞昌順（寧波系楊氏經營）、順利（寧波系徐悉順經營），凌駕乎老順記等，資本約百萬兩。

錫、鋼鐵業——大小100余，寧波系占半數。資本四、五萬兩左右，實力雄厚之利昌鐵號（寧波系戴耕集經營）、可織鐵行（寧波陳學昌經營）、宏永錫號等比較著名。

銀樓——南北市60余家，有大同行（一流之老鋪）與新同行（二、三流店）之區別。大概為寧波系經營。

大同行特著名者，裘天寶、老鳳祥、楊慶和、方九霞、費文元（以上在南京路）等是；資本三、四十萬兩。新同行10萬乃至20萬兩，彼等亦經營金融事業。

石炭業——上海煤炭商大小200余家，大抵為寧波系、紹興系所占。主要如下：（一）義泰興煤號，開業以來已有26年。紹興系杜家坤為最大之股東。杜氏死后，因嗣子杜啟明年少，由經理沈錦州監督之。資財300萬兩左右，為上海石炭業之巨子。（二）源泰煤號，寧波系劉鴻生經營，為開灤礦務局之買辦，系與開灤煤礦之有力連結者。為上海煤炭界之第一人。資本800萬兩內外。（三）源記煤號，為浙江紹興系韓菽根所經營，與劉鴻生齊名，資本約300萬兩。（四）此外，泰記、裕昌、元一、人和新、三和新、升和集等，資力20—30萬兩內外。

（摘自湯怡譯、日本森次助著：“上海財閥之鳥瞰”，1935年經濟評論第2卷第1號）

中国资产阶级的分析

(编者按：本文有个别地方虽与前述介绍江浙财团的材料有重复之处，但重点不同，在这里着重分析江浙财团的人事情况及说明其在中国资产阶级中的地位，故仍选录于此以供读者参考。)

中国资产阶级的中心，不用说是浙江系财界，握着浙江系财界支配权的，为浙系金融業者。这里，我们的分析，就不能不对这种金融机关，加以解剖。

现时存在中国的金融机关，为中央银行，和含有特殊银行与普通银行的新式银行；及以无数钱庄（北方谓之银号）为中心的旧式金融业。钱庄是以前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为基础的金融机关，其营业，带普通商业银行的性质，资本不大，专以经营者的信用为本，而伸其实力于中国商人间。新式银行是国民政府成立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自民国元年以来，在上海所设立的新式银行数，以盐业银行、大陆银行为始，渐达20余行，然在以前，不过是以中国最初之新式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光緒23年盛宣怀奏请设立者）及由光緒30年至34年间所设立的大清、交通、浙江、浙江兴业、四明等行为主，在国立银行中，为半官的银行而已。外国银行虽吸收多量的中国存款，然属汇兑银行。因之，对于工商业的金融，主要的还是靠着无数而持有永久习惯的钱庄。到光緒34年，李鸿章所经营的茂善源票号没落；欧战后，外国银行之资金收回；这些银行谢绝对钱庄的拆票（短期放款）；加以对外国银行存款之不安，遂引起集中资金于钱庄的努力和倾向，把钱庄的地位提高；同时，在大规模的基础上，集中存款，而筹设了可以执行新的金融机关任务的新式银行。所以，新式银行与钱庄，到现在仍结着密切不可分离的关系，对各个商业营金融事业的，都是这些可称为新式银行的背景或外廓的无数钱庄。不特此也，新式银行的经营，亦是由这些钱庄经理所主持，例如中国通商银行的最初经理，

就是在上海北市信用最厚的承裕錢庄經理謝綸輝。

我們現在就代表浙系財界的各个金融机关，由人的結合，来分析其支配網：

(1) 上海中央銀行(民國17年10月5日設立)

这是国民政府的国家銀行，直接由國庫支出資金2,000萬元，而授与下列的特权：

- (一) 依兌換券條例，发行兌換券——紙幣；
- (二) 國幣(硬貨)之鑄造及发行；
- (三) 办理國庫事務；
- (四) 募集内外公債，及办理其他事業。

該行總裁为財政部長宋子文，副總裁为鎮江人陳光甫，他是銀行業出身者，兼任上海商業儲蓄銀行董事兼總經理。

該行創立時，由民間选出理事監事多人如下：

(甲) 理事

榮宗敬(無錫人)錢庄匯利庄主人，申新紡紗廠及福新麵粉廠的主宰者，棉紗王兼面粉大王。

錢永銘(上海出生)字新之，銀行業出身，上海總商會會董，交通銀行常務董事，中南、大陸、鹽業、金城四行聯合準備庫主任，中興煤礦公司總經理，華丰紡紗有限公司的創辦人，浙江系財界的中樞。

陳光甫(見後述“銀行與工業”節)

(乙) 監事

李 銘(浙江人)字馥蓀，浙江實業銀行董事兼總經理，中國銀行董事長，交通銀行董事，江漢關二五附稅國庫券基金保管委員會主席，浙系財界之巨頭。

秦潤卿(浙江慈谿人)錢庄業出身，福源錢庄總經理，中國星業銀行董事長，亞浦耳燈泡廠董事。

貝祖詒(字淞蓀)蘇州人，上海中國銀行董事兼行長。

徐陈冕(浙江人)浙江实业銀行董事及交通銀行董事。

虞洽卿(宁波人)染料业出身，三北輪船公司經理，荷蘭銀行买办，上海証券物品交易所理事長，上海公共租界市參事會會員。

中央銀行的總裁，現在还是宋子文，副總裁已易浙江兴业銀行的徐寄廬(現任上海銀行公會常務委員)。他在上海財界占重要地位并不久，最近始忽膺显职，今年1月3日郭标死后，且繼任为上海造币厂長了。該行理事及監事中，从实业界选出者如下：

(甲)常務理事

叶琢堂，中国銀行董事，上海市銀行理事。

陈光甫。

吳鼎昌(字达詮)江苏人，鹽业銀行總經理。

夏 鵬(上海人)繼父业从事新聞事业，現任商報的經理。

(乙)理事

張嘉璈(浙江人)字公权，中国銀行副經理。

錢永銘(見前)。

荣宗敬，他拥有12所制粉工厂，分布上海、汉口、无錫、常州等处。

每日制粉能力在8万袋以上，又有上海申新紗厂及其他16所紡紗厂，亦分布上述四处。其所用的劳动者，达6万人，在紡紗界稳居重鎮。現任上海商业儲蓄銀行董事，中和儲蓄銀行(1931年7月开业)、中国銀行董事。(去年5月所补选繼吳毓曾之后)

周宗良，中国銀行董事。

(丙)監事

李銘(見前)，虞洽卿(見前)，貝祖詒(見前)，王敬禮。秦潤卿。

胡孟嘉(浙江人)字祖同，繼盛竹書之后而任交通銀行上海分行長，現任同行總經理，国华銀行監察，上海銀行公會常務委員。

唐寿民(鎮江人)上海商业儲蓄銀行、国华銀行董事，交通銀行經

理兼上海分行長。

(2) 中國銀行

这是准国家銀行(这是还未改組前的說法,改組后已落入蒋孔宋陈四大家族之手——編者)可以发行鈔票,当初資金声称为600万元,民国5年因反对袁世凱的停止兌現由北京宣告独立,民国17年当創設上海中央銀行时將資金減为2,500万元(实收2,000万元),以500万元为政府官股,使其代理国庫之一部,大体与日本的正金銀行之职能相似,而以汇兌銀行性質为中心者(1929年在倫敦設立支店)。此銀行之有今日,多得力于張公权、宋汉章2人。張为总經理,宋为常务董事,李馥蓀为董事長,貝祖詒則为行長。董事中有周宗良、李穉蓮、叶琢堂、徐寄簪等,去年5月,董事吳毓曾死后,又以荣宗敬繼之。宋汉章乃浙江余姚人,当上海中国銀行改革之际,极力活动,且历任上海总商会長,上海銀行公会長,現已退隱,只任新华銀行董事而已。

(3) 交通銀行

光緒34年,因司理鐵路、邮政、电信、航空等交通部所管事业,乃在上海創設分行。民国17年中央銀行創設时,迁总行于上海。資金为1,000万元,政府官股200万元,代办国庫之一部,其职能如日本之劝业銀行、兴业銀行。以前交通系領袖梁士詒,久任該行总裁,現在总裁为胡孟嘉,副总裁为梁晨嵐,总理秦潤卿,襄理赵叔馨。此外,常务董事为陈光甫、李承翼、錢永銘,董事为李馥蓀、唐寿民、周作民、張公权等。

浙江系財界的金融机关,尙有浙江兴业銀行。該行系于光緒32年,由浙江鐵路公司所設立,嗣后公司成为国有,而公司的股票却变成了民有。資金号称250万元,发行鈔票。浙江人叶揆初,及中央銀行監事徐陈冕,互任該行总經理及董事,該行已故总經理盛竹書且跃任交通銀行經理。次有以中央銀行監事、中国銀行董事長李馥蓀任常务理事兼总經理之浙江实业銀行(发行鈔票号称資金200万元)。次有

在北市极有信用之承裕錢庄經理謝綸輝开始經營，而以盛宣怀遺族为大股东的中国通商銀行(資金号称250万兩)。次有以宁波人孙衡甫为總經理，与錢庄界关系极深的四明銀行(資金号称150万兩)。这些都是浙系財界的金融机关，这种密切的人的结合，不只是浙系財界，且形成中国金融界的中樞。至于浙系財界之支配金融，其强力究屬如何？試看浙江系財界以外的有力銀行，如大陸(天津系)、中南(福建系)、金城(江苏系)、鹽业(江苏系)等四行，亦由浙系財界長老錢永銘任四行联合儲蓄会及准备金庫主任，与浙江系財界結着的密切关系，即可知矣。

在浙江系財界以外，尚有可称为浙系支脉的广东系財团，与多半由华侨所支持的福建系，及江苏系等，然除开各个的产业部門，都不是浙系的敌手。上列各部門的財团，都是以上海为中心，現在依其支配系統，略加說明：

浙江系 中央、中国、浙江兴业、交通、四明、浙江实业、中国通商、永亨、道一、中华劝工、百汇、煤业、江南、大陸等銀行；中央、通商等信托公司。

江苏系 江苏、上海商业、鹽业、金城、华大等銀行。

广东系 广东、香港国民、东亚、新华、工商、中华、国华等銀行。

福建系 中南、和丰、厦門商业、正大等銀行。

安徽系 中孚銀行。

山东系 东莱。

中国实业銀行表面上虽說在浙江系直屬以外的銀行，而实际上不与浙江系財界发生关系者，乃甚少。如江苏系銀行中，江苏銀行的陈光甫，他是溝通上海商业儲蓄及交通銀行，而与浙系財界結着不解的姻緣，这是大家都明白的事。李銘加入了上海儲蓄銀行，即与江苏系的陈光甫、郭标(百貨店首創者)、荣宗敬等握手；同系統的鹽业、金城等行，与福建系的中南銀行等，又与中国銀行系的大陸銀行相联合，創設四行联合儲蓄会及准备庫。譚荔蓀(大陸)、胡笔江(中南)、吳达銓(鹽业)、周作民(金城)等，乃与錢永銘(联合准备庫)結合。此

外，广东系的新华銀行，参加了胡孟嘉、張公权、宋汉章、秦潤卿等；国华銀行中，胡孟嘉又占着監察員的地位。这样看来，中国全境内的重要銀行，与浙系沒有关系而独立存在的，是絕无仅有了。

錢庄业

浙江系 元甯、元盛、仁亨、永聚、永余、求丰、安康、安裕、同安、同春、同余、同丰、志裕、志誠、均泰、承裕、和丰、恒大、恒祥、恒隆、恒兴、恒賚、春元、厚丰、益昌、均康、益慎、寅泰、裕大、裕成、敦余、义生、义昌、义兴、瑞和、源昇、廣裕、滋康、滋丰、宝丰、鼎盛、征祥、衡九、衡通、达源、宝大、同泰、信成、信孚、信康、信裕、順康、福泰、福康、福源、汇和、聚康、恒余、鴻祥。

江苏系 大德、長盛、怡大、致祥、慎益、庆大、庆成、鼎元、鼎康。

广东系 存德、同泰。

粵省潮州系 益大、益丰、乾元、德和、鴻胜、鴻丰、宝和。

福建系 福泰、信康。

煤炭业

浙江系 义泰兴、源泰、泰記、通記、升和、裕昌、元一、三和新、人和新，合計其余中小煤号共150家。

江苏常州系 上海煤业公司。

广东新会系 来成煤号、荣新煤号。

安徽系 华北煤业公司。

航运业

浙江系 三北、鴻安、宁紹、恒安、文記、元一。

江苏常州系 招商局。

江苏通州系 大达、大通。

山东系 政記、肇兴。

棉布业

浙江系 日新盛、日新增、源茂号、万成永、裕丰昌、談誠記、陈兴記、履泰和、正大、华丰、文昌祥、裕康、裕春、鼎昌、恒

康、協祥、長丰、姓昌、恒丰、合昌(浙系占过半数)。

紡織业

浙江系 振華、厚生、大丰庆記(徐庆云、秦潤卿)、振泰、崇信、华丰(本屬錢永銘現委其經營于日华紡織社)。

江苏系 申新、三新、溥益、同昌、純昌、民生、經緯。

广东系 永安、鴻裕、鴻章、緯通。

湖南系 恒丰。

报关业

浙江系 复和、瑞記、慎裕、招商渝、大丰永、南滿公、新昌元、新昌隆、公益、太古渝、恒茂公，合計中小同业共 80—90 家。

广东系 太古輝(福泰)、永安長等十数家。

山东天津系 益順盛、益順恒、东順記、通聚隆、怡順昌、天泰昌等共 20 余家。

四川浙系 大川通。

上海浙系 怡和渝。

他如鉄工业，現在还是江苏无錫系占多数，宁波系次之。砂糖业以屬于厦門帮的南洋华侨出身所經營者为最有势力，如黄炳記、順祥号(中国糖业大王郭春秧所經營)、日兴行(中南銀行大股东兼董事黄弈住所經營)、黄日兴、聚德隆等，握有糖业界的霸权。宁波人方季揚为抵抗这种霸力而創設元益、文裕、方惠和、方华和、元恒泰、裕大恒等大糖号，他不但从爪哇直接輸入，对于日本糖亦广事交易。鎮江人所經營的元和、仁和、丰源等，比較上述二者，皆居劣勢。百貨公司則为广东系之先施、永安、新新、丽华四公司所独占。

此外浙系財界的主要人物中因身为买办階級的关系与外国資本相結合者亦多。下列各人是与外国資本深为結合而为买办階級中之中国資產階級的最有力者。

虞洽卿 (荷蘭銀行买办)。

王一亭 (日华汽船会社买办，三井上海制造絹絲社長，东亚制

麻社总管，华大銀行董事，竟成造紙有限公司董事)。

徐庆云 (大英銀行买办)。

刘鴻生 (上海开灤矿务总局买办，开灤售品所經理，源泰煤号主人，义泰兴煤号大股东，中华碼頭公司大股东，上海水泥公司大股东兼总理)。

朱子奎 (三井銀行买办，已故上海財界大好老朱葆三之子。按朱葆三是泰和洋行买办——編者)。

洪滄亭 (美国烟草公司买办，华成烟草公司股东，华达烟草公司主人)。

李諒东 (三菱商事会社上海支店买办，賢記洋紙号主人，龙章造紙公司股东，庆元糖杂货号主人)。

何耿星 (三井物产会社上海支社金物部重要职员，鴻裕五金号大股东兼經理，上海印染公司大股东，仁亨、兴記兩錢庄之經營者)。

浙江旁系

顧馨一 上海人(三井上海制造絹絲会社監察員，华大銀行总經理，永大米号主人，上海特別市商人团体整理委员会委員)。

陈炳謙 粵人(祥茂洋行买办，中国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大股东)。

吳耀庭 苏州人(橫濱正金銀行买办，南京路裕丰永金号主人，江南制紙公司董事，振泰、福泰兩錢庄之經營者)。

王宪臣 苏州人(麦加利銀行买办，鼎元錢庄經營者)。

顧棣三 苏州人(朝鮮銀行买办)。

胡耀庭 广东人(美大洋行生絲部买办，新新公司股东，怡大錢庄經營者)。

更有买办关系以外的关系，而从事于与直接外資合办事业的人物，列举其重要者如次：

虞洽卿 (万国儲蓄会董事，中华懋业銀行大股东)。

王世澂 (字莪蓀，福建省出身的法律家，英美烟公司法律顧問，中国銀行董事)。

沈成式 (字崑三，自1923年以来，即任英美烟公司董事，大生紡

織公司董事)。

徐新六 (浙江人,中国通商銀行董事,英美烟公司董事)。

严錫繁 (江苏銀行董事,万国儲蓄会董事)。

陈宾兴 (英商业广有限公司——怡和洋行系統——董事,南洋烟草公司董事,怡大錢庄的吳麟書死后,繼吳而为怡和洋行的顧問委員)。

貝潤生 陈光远(字秀峰)(据我們的記憶所及,他是中华懋业銀行的大股东,本銀行于1920年6月为华美合办事业而开业的。以徐世昌、黎元洪、段祺瑞等为股东,后来陷入与交通銀行相同的命运,目下正在整理中)。

王錫昌 (福建人,江苏銀行董事,与他所經營的美国航空会社有密切关系)。

蔡欽生 (浙江兴业銀行董事,日本宝山玻璃厂总管)。

現在处于浙系財界卵翼之下,而常与浙系財界爭雄者,为广东系財界。其中成功者,多半是当初在外人商业之下,从事于买办任务的人物,經營輸出貿易的华侨,就中經營鴉片事业者,可說是構成今日粵系財界中的过半分子。这些鴉片事业經營者,因为近10年来,烟禁甚严,又多轉移为錢庄业經營者,如信裕、信孚、信成、聚康(陈青峰为大股东)、宝成、益大、乾元(陈玉亭所經營)、鴻胜、鴻祥(郭子彬大股东)等为其主要的錢庄。

以粵系財界为中心的新式銀行,有广东銀行(資本金 1,000 万兩)、东亚銀行(1,000 万兩)、和丰銀行(2,000 万兩)、香港国民商业儲蓄銀行(500万港币)、国华銀行(150万兩)等。

在工业界,烟卷制造业中,有中国南洋烟草公司(东亚銀行大股东兼香港总行總經理簡东浦之兄簡照南所創設)、中国兴业烟草公司、华商烟草公司;紡紗业中,有永安紡織公司(郭标为大股东兼总理,他是南洋华侨的成功者)、鴻裕紗厂(鴉片商郭子彬所創設,現已卖与永安紡紗公司)、緯通紗厂(鴉片商陈玉亭所經營)、鴻章紗厂等;百貨店中,有先施公司(以南洋华侨成功者、現香港国民銀行大股东之黃炳

南为大股東兼監督，南洋華僑出身之鄭昭斌為上海總經理）、永安公司（以郭樂為上海總經理，郭標為香港及廣東永安公司的大股東）、新新公司（廣東銀行大股東兼理事長李煜堂為大股東兼監督，又美商美大洋行生絲部買辦胡耀庭亦系股東）、麗華公司等。最後，我們不可忘記的，尚有那帶着浙系財界密切關係，與郭家相對立，以香港為根據，而與滙豐銀行結有深密關係的何東（字曉生，入英國籍），他曾任怡和洋行香港火災事業的買辦；現在，占着電燈公司、電車公司、中國電力有限公司、青洲洋灰公司等董事之席，是滙豐銀行的大股東，有名的香港第一富豪。

但是，廣東系財界，無論從數量上說，或從內容看來，終非浙系財界之敵，不但如此，目下他們的工業自身，其金融亦要仰給于浙系財界，漸有立于浙系財界支配之下的傾向。即論粵系的新式銀行，亦與一般帶着強性的商業色彩之浙系銀行相反，多為帶着滙兌銀行的色彩，以期避免與浙系的對立。他們是浙系的支脈，而負着浙系財界構成上之主要分子的任务。

浙系財界獲得支配權的經過，不用說是浙江財界有力者，如張靜江、虞洽卿、李馥蓀、秦潤卿、錢永銘等，與國民政府有力者宋子文等個人關係，占重要元素；而浙系財界的組織過程，及其所組織的浙系財界，與國民政府的關係，亦甚重要。

前面說過構成浙系財界的中樞者為金融，這種金融的中心，則為錢莊與銀行。本來，浙系財界的金融機關為錢莊，這些錢莊的金融，是仰給于外國銀行的。歐戰期間，外國銀行的資金多收回，同時，乃發現了以浙系財界為主力的新式銀行，例如把光緒 32 年浙江鐵路公司所設立的浙江興業銀行、浙江官錢局，變更組織，改為省金庫，而另設浙江實業銀行以代之。這些新式銀行的創設，多屬半官商，漸次的為浙系財界有力者所取代，而成了他們的金融中樞，有些是專司生絲的金融業。

浙江系財界的勢力，自從中國、交通等官立大銀行，實質的歸了浙系財界支配之下以後，于是乎突飛猛進了。上海中國銀行，本是繼

承前清大清銀行之后的准國家銀行，民國5年，袁世凱將中國及交通兩銀行執行不兌現政策時，該行上海的行長宋漢章，副行長張公權，起而反對，舉行股東會議，與北京脫離關係。交通銀行亦任命了錢永銘為上海分行的經理，民國11年，調任北京總行總理，另任浙江興業銀行的總經理盛竹書為上海分行經理，這樣下去，就漸次的變成了浙系財界的金融機關。

現在，上海的錢莊，於民國9年統一於上海錢業公會，銀行則於民國7年統一於上海銀行公會。前者是上海錢莊業者所共同組織，後者是依照財政部公布的銀行公會章程，比較各地方先行組織的。

依這種情狀而結合的浙江系財界，是構成對於國民政府很有力量的金融機關，1927年5月以後，南京政府所發行的內國公債，達9億7,200萬銀元，未償還額尚有7億1,700萬銀元。這些公債，不用說是由浙系財界推銷了大部分。他們一方面使南京政府容易發行公債；他方為期基金保障及保管制度之完備，乃與政府協謀，於民國16年5月，糾合浙系財界之有力者，組織江海关25附稅國庫證券基金保管委員會，這委員會，即將國民政府的財政強力化，又確立了浙系財界的地位。委員會的主任為李馥蓀，副主任林康侯（上海銀行公會董事），委員中除虞洽卿、王曉籟兩浙系元老外，所有浙江財界的有力者，都網羅無遺。

浙系財界的活動機關，更有上海總商會，於光緒28年由嚴漱芳、周金箴所創設，初名上海商業會議所，這時候，即已負着為浙系財界活動中樞的運命。民國9年以後，金融資本之代表者，公然出就要職，同年，錢業首領秦潤卿出任副會長；民11，銀行業重鎮宋漢章任會長；民13，浙江財界的大老虞洽卿出任會長；民15，同為浙系財界、與虞氏爭雄的傅筱庵就任會長。到民國18年，總商會對於排斥日貨，與商民協會傾軋的結果，宣告解体，新成立上海特別市商人團體整理委員會，變作了常務委員虞洽卿、王曉籟、裴雲卿、秦潤卿等浙系財界的獨裁機關。

（摘自雷耀岑譯：“中國資產階級的分析”，時事月報第7卷第1、2期，1932年出版）

抗日戰爭前后上海若干民族 資本集團的新旧組合

（編者按：這篇論文有些觀點是錯誤的，它划分財團的标准也不完全妥當；但這篇論文提供了許多資料，并將抗日戰爭前后中国民族工業集團的產生和新的組合作了系統的介绍，故把它轉录于此，在选录时作了某些删节。）

上海的企业界，自己用了“某某系”，或者“某某集团”的名义来标新立异，自我宣傳的，也不过是最近几年来产生的新鮮頑意兒。在从前尽管有人替我們大吹大擂，宣揚所謂控制全国金融的“浙江財閥”，然而根据我們知道的，“浙江財閥”实际上并没有这样一个具体的機構。了解所謂“浙江財閥”的內容，只觉得他們的散漫，不合作，以及种种內在的矛盾，事实告訴我們，他們为求各个的生存，免不了劇烈性的竞争，真所謂“貌合神离”，“各行其是”了。

至于过去那些企业家，說起来也叫人可憐极了。誰都夢想不到我們民族工業的战士，还得仰仗着所謂“浙江財閥”的雨露恩澤，来支持他們的作战力量，幸运的工业家，便成了他們的角逐的对象，倒霉的則是到处碰壁，告貸无門。他們不知道工业本身的重要性怎么样，也不考量这种工业的前途怎么样，大家都是“只求近利，不为远謀”，因此五、六十年“振兴实业”的成績始終在紡織等輕工業的圈子里面打滾，其余的部門，那就“瞠乎其後”了。民族工業發展，都受了很大的影响，粗具規模的企业財團，更覺得是屈指可計。照“七七”事变前夕的实况說起来，过去的中国工業，本来可分为北方与江浙兩大集团，它們可以說是鴻溝为界，不相侵蝕。北方集团是拿灤东和平津兩

工业区的主要工厂作为中心；江浙集团的骨干，那是上海及附近地区的首要工业。它們的分道揚鑠，各謀发展，維持了相当長久的时期。就說在国民政府奠都南京，金融重心萃集上海的时候，还保持这样一种风格，直到民国 20 年以后，环境的轉变，华北的企业財困才动搖了他們的信念，于是北方的实业家，也追隨着他們的金融家，开始向江浙地域轉进，于是中国工业的兩大堡壘，产生了划时代的合流傾向。下面列举的，便是几个主要的体系。

一、启新华新系 这是現在在上海活跃的久安集团的母系，中心人物是周学熙氏，主要工业是灤东地区的土石工业和北方各省的华新紗厂。唐山的土石工业，包括启新洋灰公司，及其主办的江南水泥公司（在南京），和租办的大冶华記水泥厂（在湖北），耀华玻璃公司（本来是中比合办，“九一八”后改組为中日合办），灤州矿务公司等。华新紗厂有工厂 4 处，分布在唐山、天津、青島和汲县（河南），再添上平津一帶的公用事业，例如天津济安自来水公司等。中国实业銀行本来也屬于这一系的范围，可是因为办理不善，民国 24 年由政府維持接办。同时 4 家华新紗厂，在“七七”事变以前，也很有些变化：有一所归外商收买，有一所据說由外商投資合办，还有一所（那是青島厂）又迁設上海，改組为信和紗厂。

二、永利久大系 天津塘沽是中国化学工业的中心，也是久大精鹽公司的誕生处、永利制碱公司的发祥地。第一次欧战后，他們接办青島的鹽田事业，組設永裕鹽业公司，又撥資設立黄海化学研究所，創导化学研究工作。民国 24 年又将永利制碱公司扩充为永利化学工业公司，承办硫酸銨厂，厂址在長江下游北岸，浦口附近的卸甲甸。久大精鹽公司在海州产鹽区設立分場。战后他們的重心內移，已經在五通桥那边，重建他們的新塘沽。

三、茂新福新申新系 这一体系，簡称三新系，是无錫荣氏昆仲主办的面粉及棉紡織工业。申新紗厂共有九厂，除三厂設在无錫，四厂設在汉口外，其余的都在上海，是国人自办紡織业里面范围最大的一个体系。茂新、福新都是面粉厂，茂新开办較早，有工厂 4 所，除第

4 厂設在济南外,其余的都在无錫。福新共有 8 厂, 7 所在上海, 只有第 5 厂, 設在汉口。三新系的开办紗厂, 最初目的, 就在粉厂面粉袋布的自給, 所以紗厂的設立, 都在粉厂之后, 而且粉厂的所在地, 大概也有紗厂的設立, 而不相分离的。战后在上海新办的合丰企业公司, 主办紗厂、絲織厂、鉄工厂, 这是三新系第二代的新事业。

四、刘鴻記系 刘鴻生氏是包銷开灤上海区的煤斤起家的, 先后创办上海水泥公司, 章华毛織厂, 大中华火柴公司(民国 19 年由上海及鎮江的榮昌, 周浦的中华, 苏州的鴻生等四火柴厂合并創立, 后来又收并九江的裕昌, 杭州的光华, 收买汉口的燮昌, 改称炎昌, 现在有工厂七所)。中华碼頭公司, 中华煤球公司, 元泰煤公司, 柳江煤矿公司(“九一八”后已被收买)等事业。又接办賈汪煤矿公司, 改組为华东煤矿公司, 設立中国企业銀行, 以为該系資金調整的机构, 又为了強調該系各事业的管理統馭, 籌設中国企业經營公司, 这是我們所知道的中国实业史上第二家控股公司, 可是为了各公司人事上的牽制, 中华企业經營公司并不能發揮他的功用, 唯一的成功, 便是他的联合購料一部分事业, 后来中华企业經營公司无形解散, 采办事业便蜕变为顧丽江采办处。

五、天厨系 天厨系是中国化工事业史上第二个重要体系, 他是上海甬帮造醬业巨擘張逸云氏和化学家吳蘊初合作的事业。从天厨味精制造的成功, 进一步計劃主要原料“鹽酸”的供給, 天原电化厂的创办, 就为这一种計劃的實現。主要出品是“鹽酸”和“漂白粉”。又开办天盛陶器厂, 制造貯藏鹽酸的瓷罐。在实业部計劃硫酸鋇厂的时候, 他們同时进行天利淡气厂的設立, 已經正式出品了。还有一个研究团体, 叫做中华化学研究所。“七七”事变后又在香港开办天厨味精的香港工厂。

六、大生系 南通張季直氏的事业, 以紡織工业和鹽垦事业为主体, 先后在南通、崇明、海門三地, 开办大生紗厂一、二、三厂及一厂的副厂(二厂已于中日事变前由债权人拍卖抵償債務)。又在通泰各地, 实行鹽垦政策, 組設了不少的鹽垦公司, 此外又在南通当地办理电

力、面粉、榨油等各种事业，开辟南通上海間的輪运事业，溝通兩地的水道交通，开办淮海实业銀行（已停頓），調节各項关系事业的金融事項。大生系的全盛时代，南通一帶是中国著名的实业模 范区，張氏也是中国第一个实业大王，不幸的是“好景不常”，張氏的整个事业，都遭受了事实上的限制和不景气的襲击，几乎一蹶不振，全給摧毀了。

七、通孚丰系 我們提出通孚丰系，就因为它在面粉工业里有悠久的历史 and 优良的地位。阜丰面粉厂是上海面粉工业史上第一家面粉厂，由老厂扩充，添办新厂，又先后接办裕通、信大、信記、祥新等几家面粉厂，加上“阜記”复工，形成了和茂新、福新对峙的局面。在河南新乡，他們又办了通丰面粉厂，在山东烟台办了通益精鹽公司，还有一家通惠实业公司，这是中国第一家控股投資公司，投資于本系的各項事业，所謂“通孚丰”，“通”便指通惠、通丰、通益，“丰”不用說是阜丰、通丰，至于“孚”字，那是指中孚銀行，它是通孚丰系的金融机关。

八、美亞系 这是比較單純的一个体系，他的特点，絲織工业成了它的主体，美亞織綢厂是十多家綢厂綢庄等合并組成的公司，是中国范围最大的絲織工厂，設立不久，又把不动产的投資划分起来，另創美兴地产公司，除了美亞和美兴，还有美恒紡織公司和鑄亞鉄工厂。后来为了推銷美亞底出品，又開設了开利綢緞公司。

九、永安系 粵帮郭氏的永安系，是以百貨业起家的。永安百貨公司，有雪梨、香港、上海等数处，接着又办永安水火及永安人寿兩保險公司，在上海創辦永安紡織公司，从一厂扩充到四厂，又收买緯通紗厂，籌設大華印染厂和香港的維新織造厂，又把永安公司的銀业部，改組为永安銀行。这一体系，不但是百貨业的巨擘，而且又是紡織业的一支生力軍。

十、銀公司系 中国建設銀公司成立以后，不久便因中国銀行的增資改組，取得了密切的联系（按这个系統是屬於宋子文官僚資本的，不能算民族資本——編者）。他們的初步計劃，很想把茂新福新申

新系的事业，接收过来，可是并没有成为事实。于是先从中行系原有的中国棉业公司扩大改组，作为发展棉纺织业的据点。收买建设委员会经营路矿电气事业，改组为淮南矿路公司（经营淮南煤矿及铁路）和扬子电气公司（经营戚墅堰及首都电厂）；承办成渝铁路，组设川黔铁路特许公司；广东银行的增资复业；设立华南米业公司；改组南洋烟草公司和汉口既济水电公司，带上了浓厚的政府色彩。可惜的是计划中的不动产抵押银行并没有实现，整顿汉冶萍煤铁矿公司的工作，也没有开始。

上面所說的是“七七”事变以前中国企业财团的一个概略，这十大体系也不过就个人想到的写了下来，恐怕免不了错误挂漏。但是从这一些不完全的资料里，可以看出中国工业界的一个轮廓，也可以看出过去的工业动态。从这方面所得的概念，纺织工业无疑的是中国工业的翘楚，在北方，过去是华新系独占的局面，至于江浙方面，又成为申新系、大生系和后起的永安系割据的状态。其次是面粉工业，那是茂新福新系和阜丰对抗的格局。要是把这两门强差人意的工业，剔开不計，那末剩余下来的，就觉得失去了陣容整飭的观感了。

二

“七七”事变爆发以后整个中国工业，都起了骚动，这一阵骚动，从工业的全面来说，或许还没有过去，可是单就上海一地看来，到了27年秋天，因为战区远离了上海，邻省的交通又逐渐恢复，残存在上海的中国工业，就重整旗鼓，肆意活动。这几年来，他们受了战时暴利的孕育，物价猛涨的刺激，以后环境上的种种便利，在上海近郊的战争里受了损失的，都在短期内复兴起来，那些不受损失的，更造成了空前的业绩。于是为了事业的开拓，增资便成了结集资金的不二法门，资本增加的结果，又得增大扩充生产部门来消纳过剩的资金，这末一来，扩充、增资，增资、扩充，便互为因果，更番演出，湊集在这一个乱烘烘场面里的，同业之间，又在资本数量上，出品种类上，以及其他的方面，起新的角逐。换一句话说，同业间的竞争，也从游击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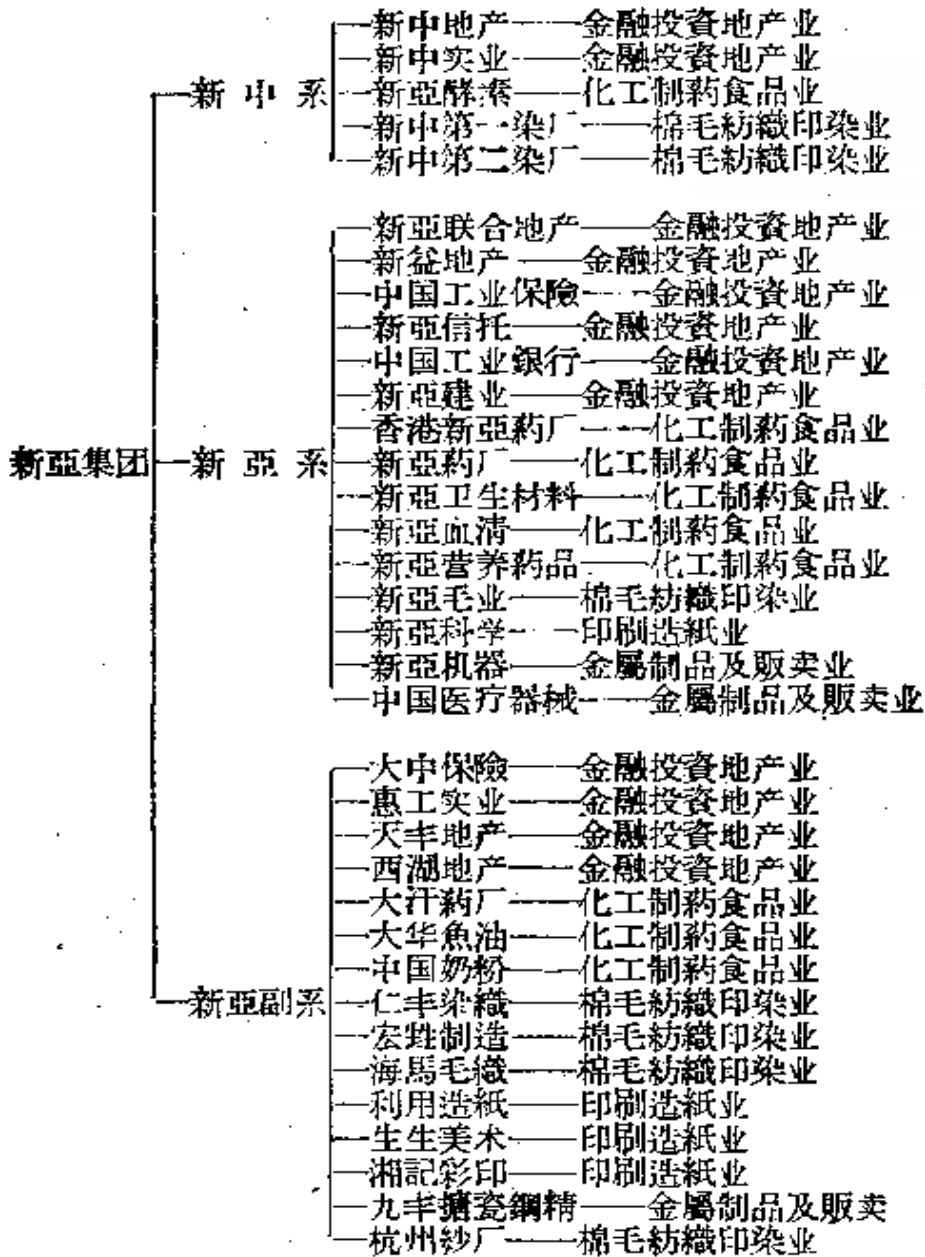
的資本战、出品战，轉入了全面爭霸战的时期。

自从民国30年終，远东战争展开了新局面之后，华商股票繼洋股之后，得到了資金市場的青睞。上海的企业家抓住了这样一个机会，他們的爭霸战也展开了更广大的局面，除了过去的角逐，又添上了附屬事业战和股票战。附屬事业的扩充和增添，好似雨后春笋，新股票的推行和哄抬，也是层出不穷，附业和新股的发展，造成了新兴企业財团的初步形态，更进一步，在通貨一元化实现之后，又演出了企业公司新兴的热流。民国31年秋冬之交，企业公司的創設，便成了风起云涌盛极一时的状态。有的只不过是投資公司的性质，也有的却蘊藏了控股公司的意义。新兴企业財团就拿这一种企业公司作为基础，以为拓殖的新据点，完成了具体化的姿态和积极化的活动。大家“招兵买馬，屯草积粮”，老股票的哄抬，新公司的創辦，旧組織的吸收，收买的、合作的、改組的，有种种不同的方式，这样地热烈，依然是由于少数企业家称王爭埤的意念。因此观察他們的扩充，頗有“抓到籃里就是菜”的作风。既不問工厂的地位怎么样，也不管事业的前途怎么样，只要是有一些机械设备的工場，便給他一个夸張性的宣傳，再来一个过量的增資扩充，那些充斥市廛的游資，也就“色不迷人入自迷”地自上釣餌。在那一个时期，新股票的攫夺，瘋魔了上海的經济社会，誰都是发瘋那样爭取新股，这一种急性的膨脹，便形成了32年春天华股的反动。等到华商証券交易所复业以后，企业界的活跃，又燃起了第二次火焰，企业公司的新潮，也澎湃奔騰，不可一世，一年以前的故事，又加意渲染，重新搬演一次。今年上半年的股市一蹶不振，就是自食股票恶性膨脹的后果。经历了这二次的天演淘汰，有些所謂“寒热股”“空头股”之流，終久流露了他們的破綻，上海棉毛，瑞泰毛織，大华畜植，屈臣氏葯厂，华成实业等几家公司底清算，中原染織和森茂化工的内哄，都是很好的实例，同时加入各大財团的工厂公司也因为旨趣的轉移，有的是另謀发展，退出原有的集团，有的实行“跳槽”，由“甲財团”轉入“乙財团”，这一种演变，或許可以把各財团的烏合陣綫，澄清起来，稳定起来，乐观一些說，上海的新兴企业財团，或許已

从急性的膨胀时期，进入了整飭内部机构的新阶段。悲观一些说，那末尾大不掉的苦痛，已经压住了他们的肩头，到今天真叫做“哑子吃黄连，说不出的苦”。照前一种说法，那是可喜的现象，照后一种说法，也总有彻底清算的一天，我们对于任何一种事态，都不希望长时期酝酿下去，这一个不可捉摸的“闷葫芦”也该早给人家一个正确的解答。下面是五大新兴企业财团的概略：

一、新亚集团 新亚是成长最迅速、膨胀最快捷的一个集团。中日事变前夕的新亚药厂，还不过是一个资本不满30—50万元的组织，想不到不满10年的发展，完成了一个范围最庞大、机构最复杂的体系。照现在的情形说，集结在这一个财团之下的公司厂商，有35家之多，各公司的资本总额在10万万万元以上。其中股票已在证交上市的，计8家，合计资本约为4万万余元。从体系说来，可分为新亚系、新亚副系和新中系三大系统。新亚系是新亚建业公司成立以前原有的联系公司以及新近创办的嫡系事业，我们列入这一系统的，有15家公司，包括以新亚定名的药厂、港厂、血清厂、卫生材料厂、机器厂、建业、信托、毛业科学、联合地产、营养药品等6公司，以及新益地产、中国医疗器械公司、中国工业银行及中国工业保险公司等。新中系是新亚酵素公司和以“新中”定名的实业地产两公司以及第一第二两染织厂，这5家在新亚集团中，似乎是一个独立小组，自成一個單位。还有新亚副系，那是新亚建业公司加入投资或者合作投资的各公司厂商，也有15家之多，这也可以说新亚集团扩大时期收容的杂牌军队，各有他们的特殊背景，大多数是把原有的事业增资改组的。至于新亚集团底投资部门，根据我们的分析，可分为5大类：第1类是金融投资地产业，共有银行信托公司、保险公司、地产公司等12家；第2类是化工制药食品业，包括新药酿造及食品制造工厂共9家；第3类是棉毛纺织印染业，计有纱厂、染织厂、棉毛织造厂等7家；第4类是印刷造纸业，计有印刷厂3家，造纸厂1家，计4家；其余的3家，属于第5类金属制品及贩卖业。下面是本集团的体系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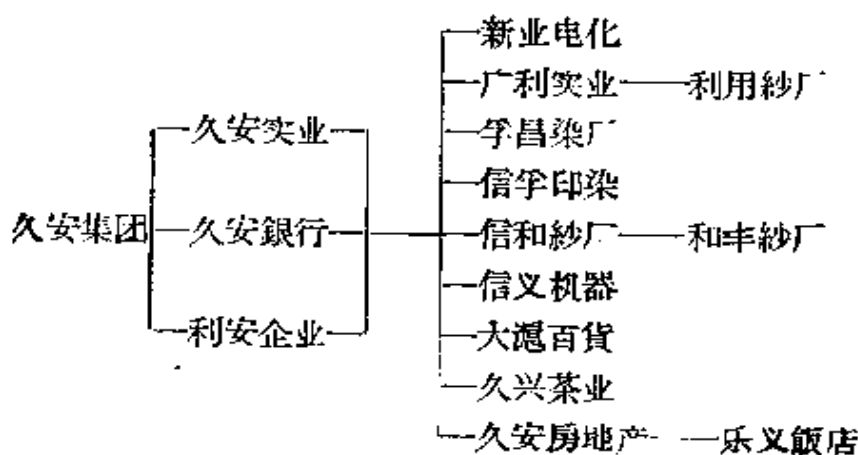
图一 新亞集团体保图



二、久安集团 久安集团是启新华新系的第二代。中日事变以后青島的华新紗厂把机械設備迁移到上海，投奔到英人信昌洋行經理郭梅軒氏的旗幟之下，挂起了英商牌子，用了信和紗厂的名义，在上海复工。久安信托公司，也在上海設立分公司。不久之后，信和紗厂增資扩充，股票在上海众业公所上市开拍，引起了上海資金市場底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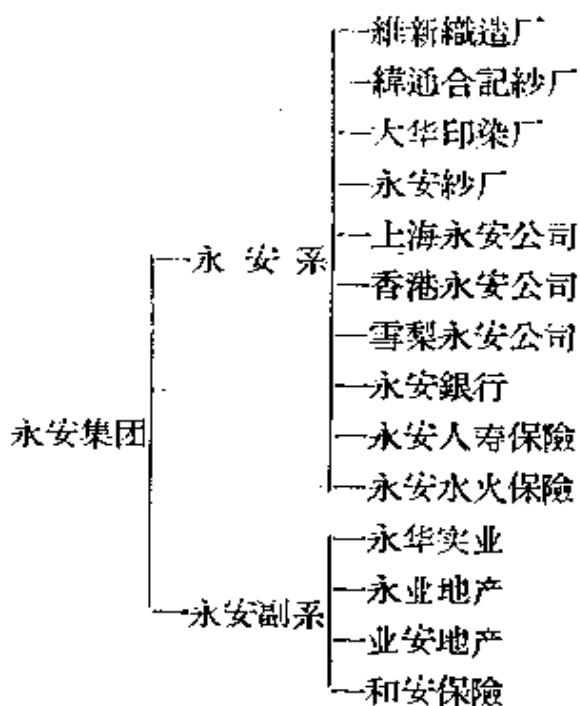
烈注意。并且为了业务的需要，投資設立兩家附屬公司，那就是信孚印染厂和信义机器厂。太平洋战争扩大以后，信和紗厂因为挂牌英商，是敌性国家的产业，由日軍接收管理，过了一年多才解除軍管理，发还改組为中国法人。在信和軍管理的时候，他們的主持人并不中止他們的活动，久安实业公司就在这一个时候宣告成立。除了投資給原有的信和、信孚和信义 3 厂外，又接盤一家染織厂，組設孚昌染織厂，投資于华一造船厂，改組为华一工程企业公司，和广勤紗厂合組广利实业公司，接办江陰的利用紗厂，設立新业电化厂。久安信托公司在改組为久安銀行的时候，把信托投資部分的业务，給划分出来，組設了利安企业公司，这是久安实业的姊妹公司。証交复业的时候，他們又在久安銀行、久安实业与利安企业 3 个机构的合作之下，努力扩充，大滬百貨、久安房地产、久兴茶业等 3 家公司，都是去年的新兴事业。久安集团的膨脹，到这一个阶段，似乎也告一段落。到了今年，体系上的变迁，比較上差一些，久安房地产公司收买了义商的皇家飯店，改称为乐义飯店，信和紗厂投資于宁波的和丰紗厂。可是华一工程企业公司却脱离了久安的体系。久安集团底发祥事业，是棉紡織业，因此他們的新兴事业，大多数还不脫这一个范围。这也可以說是久安集团的唯一特色。現在隶属久安集团旗幟下的公司，共有 10 多家，資本总额底合計約在 6 万万以上，已上市的股票，計 7 种，合計資本約 3 亿 8,000 万元。他的体系图如下：

图二 久安集团体系图



三、永安集团 永安集团就是上面所说的永安系，从当前证券市场中的地位说，真是天之骄子。红极一时的三大热门股，这一体系却占了两种。不过这两种股票，在中日事变以后，香港注册的永安公司转变为美国注册的公司，永安纱厂也归美国注册的大美企业公司接管经营，而且一部分股票，也曾掉换大美企业公司底股票。近几年他们对于新事业底推进，并不怎么积极，添办的新公司，就我们知道的，只有4家，大半是合作性质的。其中两家是地产公司，还有两家是保险公司和实业公司，上市的股票，现在有4种，资本合计约6亿7,000万元，体系图如下：

图三 永安公司体系图



四、国货集团 国货集团这一名词，有悠久深长的历史，最初的机构，是上海的金融界和国货界同人合组星五叙餐会，已经是十二、三年以前的故事了。星五叙餐会的具体成就，在九家国货工厂合作支持之下，创办了上海中国国货公司和一个联合的运输机关，致力于机制国货的提倡和推销。后来又在政府的奖赏之下，合资组织中国国货联合经营公司，用投资的方式，统驭本国及海外的中国国货公司，

于是产生了“国货集团”底名称。我們現在所謂“国货集团”的意义和从前有些不同。现在这一个集团，多少帶一些綜合的抽象的意味，他并不象其他的集团一样，有一个中坚的人物，领导一切。所以結集在这一个体系下面的厂商，都可归納于 3 个独立的体系，从事个别的活动，所謂独立的 3 个体系，就是（一）国货系，（二）美亞系和（三）康元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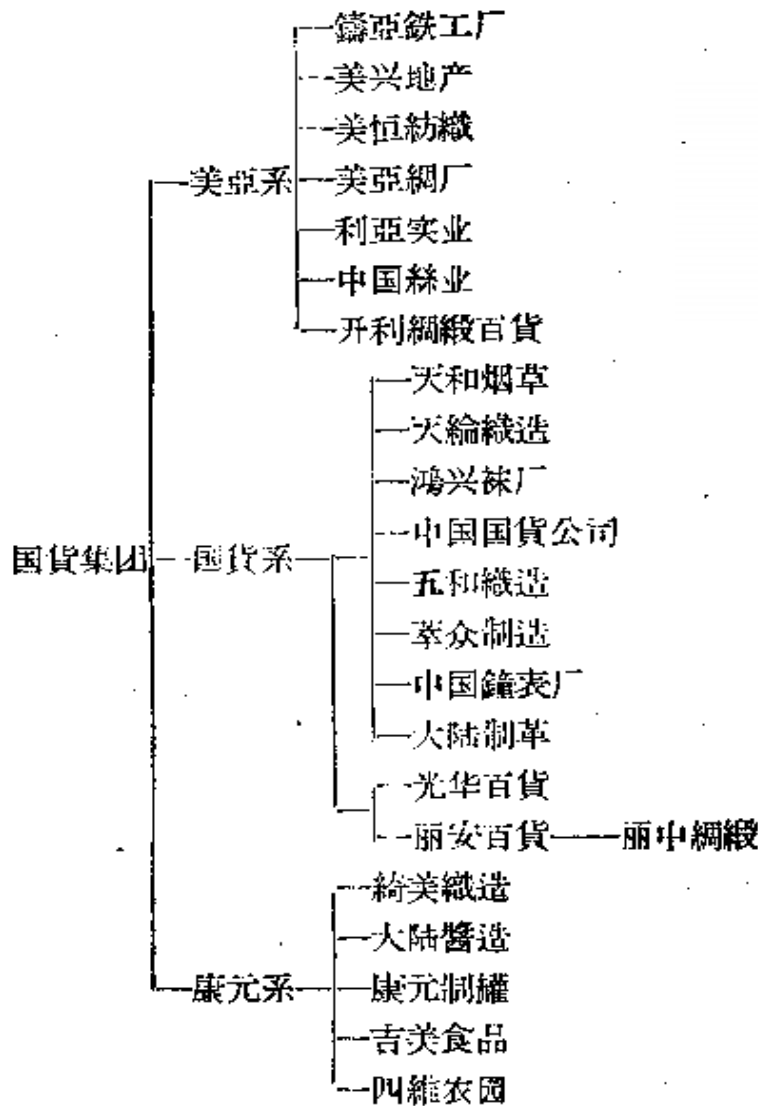
（一）国货系 拿中国国货公司和它的首腦部分作为中心的一个体系。国货公司、萃众制造和五和、鴻兴兩織造厂，構成了他的骨干，关系的事业还有中国鐘表厂、大陆制革厂、天綸織造厂及天和烟草公司等 4 家，还有兩家新兴的百貨公司，那就是光华百貨和丽安百貨，也可以附庸在这一个体系里面的。本系的关系公司共 11 家，已上市的股票倒占了 9 种，資本总額約 2 亿元。

（二）美亞系 这就是上面提起的美亞系。这几年来美亞系的动向，还保持过去的作风，站立在发展絲綢工业的立場，力求本位事业的发展。新兴的事业，增添了利亞实业公司和中国絲业公司，上市的股票就是美亞、利亞和中国絲业，而且美亞綢厂又是熱門股三鼎足的一支。3 种上市股票的合計資本，約为一亿余元。

（三）康元系 康元系的发展，正和美亞系一样，也有他的专业部門。康元制罐厂本来以鉄印制罐为主要业务，兼营罐頭食品及醬制菜蔬，近年的动态，除了綺美織造以外，便側重这一部門的，大陆的醬油醬菜，吉美的罐頭食品，四維农园的化学菜蔬都不脫这一个范围。上市的股票有康元及綺美兩种，合計資本不滿 5,000 万元。康元的特色，和新亞集团有很密切的联系。

我們說明了国货集团的內涵，再把他們結集起来，作成下列的体系图：

图四 國貨集团体系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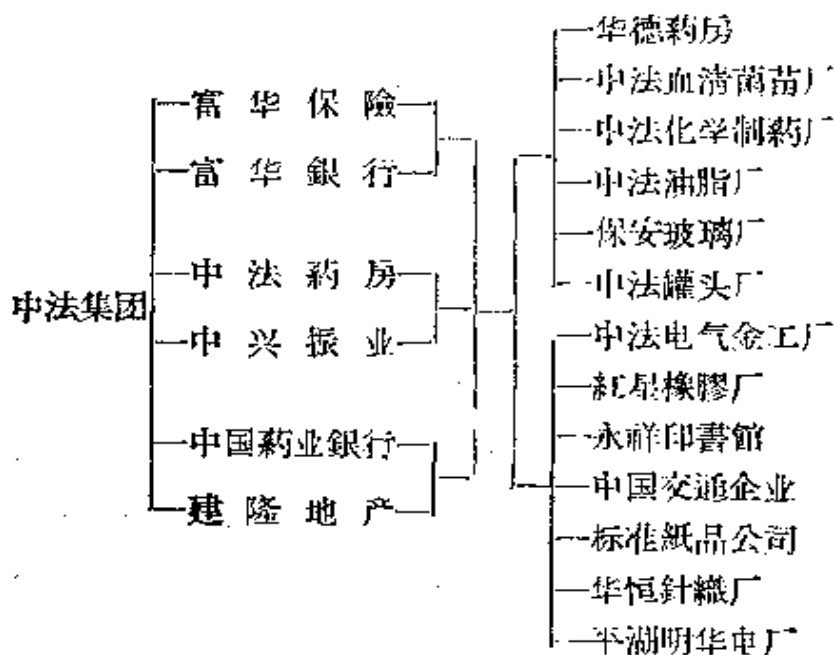


國貨集团的关系厂商公司，共計23家，已上市股票計有14种。上市公司的合計資本約为3亿5,000万元。从过去的联系來說，他們和新亞集团，有密切的人事关系。說不定还可以称为兄弟集团。

五、中法集团 从新兴各大集团的首腦公司說来，中法葯房是以历史悠久著称的，而且从他的性質講，也是以制葯事业作为发展中心的一个集团。它和新亞集团是上海新葯业底兩大壁壘，兩者間的角逐爭埧，也是无微不至，极尽其軋轢竞争的能事。它的活动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期的对象还不脫和新葯有关的事业，制葯厂的扩充，并定名为中法化学制葯厂。油脂厂和血清菌苗厂的开办，华德葯房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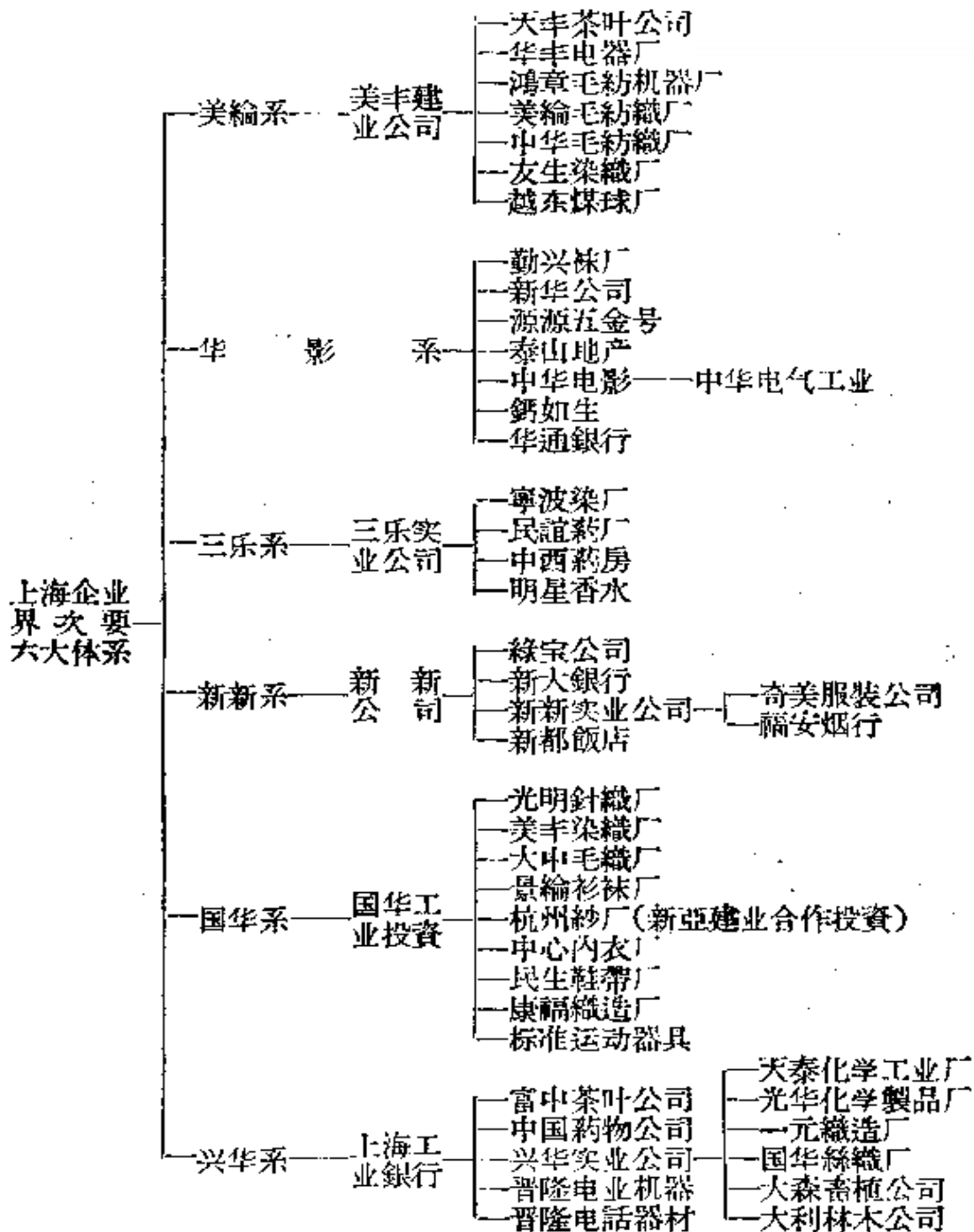
收买,都没有逸出这一个范围。自从远东战争扩大以后,他们的动态也开始转变,这是第二期。最先开办的新兴事业,那是上海三輪客車公司(现在改称中国交通企业公司),其后又办了富华銀行和富华保險公司,最后又产生了中国药業銀行,保安玻璃厂和标准紙品公司。去年的企业公司狂潮,中法系的中兴振业公司是始作俑者,中法集团的活动也由此进入了第三期。紅星橡膠、建隆地产、华恒針織、中法电气金工等厂的設立,平湖明华电气公司和永祥印書館(永祥是三乐系的,今年因为增資問題才轉入了本集团)的增資扩充,都属于第三期扩充的范围。綜合这三期的扩充,中法集团的关系公司,也有20家左右,已上市的股票有七种,合計資本总額約为2亿2,000万元。中法集团的体系图如下:

图五 中法集团体系图



除了上述的五大集团以外,我們还可以就次要一些的湊集了六大体系。所謂六大体系,那就是(一)兴华系、(二)国华系、(三)新新系、(四)三乐系、(五)华影系及(六)美倫系。这些体系,有的还在長成之中,有的已到了整頓陣容的阶段,如果照它們的性质來說,国华系以棉織工业作为活动的园地;三乐系則以新葯及化妆品作骨干;美倫系偏重在毛紡織工业,其余的三系都属于多方面的活动,不过有一点

要說明的，所謂華影系並不是一個具體的組織，這是一群有密切關係的企業家，在他們的共同興趣之下，從事企業界的活動。我們為了顯明起見，才選定了市場里歷史較長的中華電影聯合公司來作為代表，擬定了“華影系”這一個名稱。現在把他們的事業，合併起來作成了六大體系的總圖：



上图列举的厂商公司，共計50家，其中上市的公司占21家，資本合計約127,000萬元，連五大集团包含的公司100多家，上市公司40家，共得关系的公司150多家，上市的公司占40%，計61家，上市公司的合計資本約为30亿余元。目前的上市股票約150余种，資本总数約計70亿余元，那末我們罗列在这11个体系里面的，在家数和資本方面，都在40%左右，而且比較重要的股票，大概都在里面了。

三

我們分析了上海新兴企业財团的内容，事实告訴我們，所謂五大集团的据点，不脫以紡織及制葯两种工业作为支柱。永安久安及国貨三集团屬于棉絲紡織及共加工整理与棉織品工业的部門，新亞中法不用說都是靠新葯的制售发财的。这五个集团，除了永安以外，它們的发展，說得長一些，都是“七七”事变以来的新兴局面，可是急性的事业膨脹，还不过二、三年的历史，这一种急性膨脹，一方面因为环境的促使，另一方面也是主持的領袖人物的作风所致。在这种情势之下，企业財团虽給湊集起来，但是不健全的机构，尾大不掉的现象，却使他們天天过着窒息苦悶的生活，这种不幸事态的发生，就为了財团組織的过程和目的，受了几种不良因素的支配。这几种不良因素，也可以說就是上海新兴企业財团的病态。现在潜伏在企业財团里层的病菌，据我們看来，約有六种：

(一)速成性：新兴企业財团的成長，我們曾再三提出，是二、三年来的空前杰作，新事业的創辦，原有事业的增資合作，真所謂双管齐下，戮力拍演，才点綴成这样一个熱鬧的場面。可是我們認為遺憾的，这些財团的結集構成，時間方面总觉得短促一些，一个事业的成功，并不能單靠僥倖取巧，也还要合于生存的条件，才可以不受淘汰。英国俗語說：“羅馬不是一天造成的”，一个企业財团何尝不是一样，現在加速成，就象浮萍一样，只会随波逐浪，苟且偷生在这一个乱烘烘的时代，有一天环境不变，浮萍还是一顆不重要的浮萍，絕對不会开花結果。

(二)烏合性 現在的企业集团,我們已經在上文說明,大多數都是短期間扩充長大的;所以新專業的創辦,新分子的吸收,有的是湊熱鬧,好象人家都已走上了这一条路綫,自己怎么能够失去这末一个机会,也有的是攬地盤,好象是关系的事业愈多,便愈显得集团的偉大,因此来者不拒,照單全收,只凭一些錦上添花的傳言,便互相利用合作增資,根本沒有从事业的本身加以周密的考量。这样地胡謔杂湊,怎末能够树立整齐健全的陣容。而且他們的結合,目的不过是互相利用,有一天利用的目的已成了过去,或利用的动机不能貫徹,自然会发生离心运动,而造成貌合神离的現象,說不定整个集团,便因为少数分子的异貳,会引起了分化的作用。

(三)重复性 从过去这几年上海企业界的扩充方式來說,似乎可分为三种形态,就是(1)化生式,(2)再生式,(3)共生式。化生式是从母公司的某一部分的机构,化生而成为独立性的企业;再生式是把已經停頓的工場,收买过来,增資扩大;共生式則就小范围的企业拉攏合作,共同經營。企业的初期活动,是化生式居多,最近二、三年的扩充,才采用后列的兩种形式来完成財团的陣容。实际上一个企业的发展,尽可不采用化生式的方式,而把本位的事业,逐步膨脹,象現在那样巧立名目,“一佛化三清”的策略,增加管理上的困难。至于再生式和共生式,大抵是本位以外的活动,运用較多,可是我們所感覺的,在同一体系之內,性質相同的事业,如果有数个單位的共存,也不是妥当的办法。这一种事实的存在,或許另有其不得已的原因,但是为了整个集团的发展,时常因为人事的关系,与业务的参差,使首腦分子发生歧視,因此引起各單位間的誤会与磨擦,要是这一种誤会与磨擦不能及早消除,說不定还会酝酿更严重的事态,即使財团本身不致起分解的作用,那末結党树派的傾向,也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事业重复單位过多的財团里,如果沒有組織严密的管理干部,要保持一个健全的体系,就不很容易。

(四)爭强性 不用說,这一些新兴的企业財团,他的結集动机,純粹是同業間爭雄的爭斗。爭强的方式,从資本数額的斗争,轉入了

出品种类的斗争，譬如象制药一业，他们的竞争，照我们外行人的看法，假定也可以分期的话，那末至少可以有“赐保命”“维他命”“噬唑”等几个时期。在每一个时期里，新药同业大家竞赛似的赶制同一性质的出品，现在同类的出品，如果调查一下，那真琳琅满目，等到出品的斗争成了过去，又开始第二次资本战，在“增资”“拉股”（拉招股票）的两种场面之下，有时还添上了一支插曲，这就是溢价股的“溢价战”。等到资本战成了尾声，又转入了附业的投资战。附业的投资战，也可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本位附业的投资战，另一个是外行附业的投资战，这样的兼程并进，渐渐地树立了企业财团的姿态。不过企业财团底姿态树立之后，他们的争强争坝，也更进一步，从同业的争斗，展开了新的局面，谁都是雄心勃勃，打算高居企业盟主的宝座。所以过去一般企业家的争斗，从个人主义的立场说起来，就是这么一套。大家想沾名钓誉，在同业中为争取领袖一席的虚名，便不惜用种种方法争奇斗妍，来筹集资金，扩充实力，以求实现。至于目前的实现之后，又怎么样？他们又拼命想法保全他们的地位，只要地位能够保全，便能满足他们的欲望，他们把这欲望的满足，可以说认为第一生命，事业的成就，反成了次要的考虑。

（五）囤积性 这几年以来，囤积的风气陶醉了上海的男女，一般合于潮流的典型上海人物，便整天在囤积物资的圈子里打滚，以求实现他们的淘金好梦。可是自从物资统制的政策逐步强调之后，囤积物资在多方面受了限制。为了避免这一种束缚，企业财团便从扩充投资企业的部门，来适应环境上的需要，达到囤积的目的。譬如说我们有了家染织厂抓在手头，那么我们不但可经营棉纱、棉布的投机，连带还可以囤积染料以及需用的各种工业原料，至于工厂本身能否开工，那是另外一回事，倒并不注重的。又如设立一个小范围的零售百货商店，那末呢绒、布匹、华洋百货的囤积居奇，就可以畅所欲言。又象丝绸公司茶叶公司的组织，也都是囤货的机关，茶叶公司还只能做红绿茶的投机，丝绸公司的活动，就不一样，乾繭、生丝、人造丝、绸缎及其他丝织品都可囤积。繭行、繅丝厂、织绸厂也都可以收

买。这样看来，囤貨家的活动，真是无微不至。

(六)投机性 上一节囤积性講的是物資囤积，这一段投机性是說股票投机。股票投机是这几年最盛行的新花样，自从“七七”事变以来，前几年是外股投机，近几年又轉变为华股投机，所謂华股投机，在散户方面，是希望买了股票可以賺錢，在企业家方面又是設法抬高股票的市价，然后陆續卖出，坐收漁利，这两方面的目的是一样的。华股投机的初期，因为没有法令的束縛，所以发展得很快，企业家的連环增資，都能够順利进行；新公司的設立，新股票的发行，也能够得到美滿的結果，于是你仿我效，一窠蜂地，在股票投机的园地里寻求出路。

(摘自石濶：“上海新兴企业财团底輪廓与批判”
上海中国經济第2卷第11期，1944年11月出版)

張季直和他創办的企业

一 張孝若叙述他的父親创办企业的經過

中国人自古以来有两条路应该走的：第一条路是科举，科举最高的目的是状元。第二条路是做官，做官最高的目的是宰相。所以在中国有一个最隆重的联属名词叫“状元宰相”。大凡人走完了第一条路，就该赶紧走第二条路，假使第二条路再走完了，那就名满天下荣宗耀祖了。我父亲点了状元以后，按理他该照历代相沿的足迹走，努力再走完这第二条路，岂不是好。可是他竟没有去走，偏偏去开辟另一条新路走。其中有許多原因，也就是开辟这新路的动机：第一，我父在光緒20年点元以后，不到几时祖父就去世了，那时我父精神上感受了异常的刺激，对于名场的欲望自然就低下来。第二，看看中国国势，一天比一天的危迫下去，朝局用人政事，也是一天比一天的紊乱黑暗；就想到日本是一个小国，何以反走到中国前面去？它怎样强的？怎样救贫救弱的？因此就推想到要中国不贫不弱，救醒它起来，除掉振兴工商业，决没有第二样办法。恰好通州家乡是个出产好棉花的地方，就想到去开纱厂。第三，大凡读书人，人家叫他是“书獃子”“书蠢头”，都是形容读书人不灵巧不会做事的名称，我父一想偏偏不相信，一定要做一个能够自立能够做事的读书人，替向来的读书人出出气，争争面子。第四，因为甲午那一年，我父在京好几个月，有一回看见太后从颐和园回到京城里，适逢大暴雨，地上的水积深了一二尺，大小文武百官，也有七、八十岁年纪的老臣子，都跪在水里边接驾，上面的雨先落到帽子上边的红纬纓，再从那里滴下来，滴到袍挂上，一个个都成了落汤鸡，还好像染了鲜红的颜色。那边太后坐在轿子里，连回头都不回。我父一看，心上就难过起来，觉得这种官，是有志气的人该做的么？还是回转身去做老百姓罢！因为这几层缘故，所以我父

就下了决心，不要做官了，就振作他的精神来开辟他的第三条路。

在中国的社会，要做事就和官脱离不了关系，他能够帮助你，也能够破坏你，如果民间接事，能得官方帮助，那自然就事半功倍了。那个时候恰逢着張公之洞做兩江总督，他向来对我父很信重，先請我父总办通海团練，結束撤防后，接下来就和我父說到振兴商务等事，我父本来認定这条路走，所以一談就談得很投机，很融洽。到光緒22年張公調任兩湖总督，兩江总督換了刘公坤一；到任后，我父就和刘公商議办通州紗厂。本来張公在南京时，因为中日訂了馬关和約，內中有允許日本人在內地設工厂的一条，就想自己捷足先登去办厂，不要等日人借口。就計議在長江口的南北，苏州、通州二处，各办一厂。苏州厂請陸公潤庠办，通州厂請我父办。我父因为和他的本意非常适合，而且希望国强，一定要着实做到普及教育和地方自治的兩件事；然而沒有錢是办不成功的，于是就决定先办实业，有了錢以后，再办教育和地方自治，就立刻答应了去兴办这件事。当时有沈燮均、潘鶴琴、刘桂馨、郭茂之諸人，都一齐来贊助，（本有陈維鏞、樊时助二人，后来退出）就开始接洽招股本訂章程等事，而沈公其时尤异常出力。直到9月27日才决定选择通州唐家閘的陶米坝做厂基。因为唐家閘离城只有15里，出長江港口很近，水道也便利。到10月18日又决定股分由官商各任其半。到光緒23年2月24日才决定3个月內集30万造厂屋。但是机器一层还是沒有着落，就想到苏省款买来擱置在黃浦灘上的机器；这付机器本来是湖北省买的，运到上海后，張公已到兩江，因为江苏要办厂，就用籌防局款子，向鄂省轉买；虽然买来了，还擱在黃浦灘，有蘆席盖在上面，日晒夜露，渐渐生起锈来。我父就再三和总督商量，拿这付机器作为50万官股，搬到通州厂用。到光緒25年4月才开了車，出了紗。

从光緒22年3月到25年，这4年間，我父奔走南京湖北通滬各处，白天談論写信籌画得手口不停，夜間又苦心焦思，翻来复去，寢不安枕；官紳的接洽說話，一天几变，捉摸不定。有錢人的面孔，更是难看，推三阻四。上面的总督虽然贊助，而底下的官員沒有一个不拆台。旁

人也沒有一个不是看好看。所謂人情冷暖，世态变幻，我父是亲尝而身受了，又是气愤，又怕办不成功。在集股籌款的时候，以一个穷讀書人，虽有了名，但是名不能当錢用；試問从哪里能够叫人家相信呢？而且这边籌到款用，那边又不够了；今天籌到款用，明天又不够了；天天过年30夜，弄得万无法想的时候，常常跑到黃浦灘对天長叹，看江也是長叹，眼睛里的泪同潮水一样涌出来。有时候旅費不够，也卖过好几回的字，厂款分文不去动用。

（摘自張孝若：“南通張季直先生傳記”，第67—72頁，1930年2月出版）

大生厂既获利，乃次第办各項实业，于光緒29年办广生油厂，光緒31年成立資生鉄厂。宣統元年复兴面厂（原名大兴），光緒29年大达内河輪船公司，其后母子相生，而阜生蚕桑公司、电灯厂、電話局、火柴厂、碾米厂次第成立。紗厂、油厂、面厂俱仰給于农作，故又于光緒27年于沿海垦荒，创办一通海垦牧公司，繼后复有大有晋、大豫、大賚等之产生。

（摘自“20年来之南通”，上編第20頁）

大生厂办有成效以后，又陸續办了油厂、面厂、鉄厂、絲厂、輪船公司。凡适合于通州农产工业的制造和利用，及增加人民地方的便利和幸福，无不一一依次着手，这都算是大生厂的兒孙了。

我国自古以来是以农立国的。大凡世界上土地广大的国家，沒有一个不是以农立国的。在中国不要說是十八省以外有待垦辟的荒地，就是江浙一帶人烟最稠密的地方，也到处可以找到沒有垦殖过的荒地。我父等到大生紗厂办到根基渐渐稳固，营业又渐渐有了起色，于是就立刻把眼光轉射到农垦上边去。就想到光緒21年的夏天，因为办团練到过东海边，看見通、海二境交界的沿海边的地方，有一大片的荒灘，荒弃可惜，就想用那片灘地，去实行他第一步的农垦事业。本来自从雍正初年起，一直到光緒中季，常常有很多的上諭，叫人們去开辟荒地，为国家兴利益。我父就認為极好的机会可以着手进行，于是就和刘公坤一經过好几次的接洽商量，并且替他做好“拟变通开垦海門荒灘奏略”上到政府以后，就奉旨批准了。到了光緒26年的秋天，

乃決定着手興辦，定名通海垦牧公司，乃派了陸師學堂的畢業生江導岷、章亮元、洪杰諸君，攜帶應用的儀器，到那邊去測量，等到全部的圖繪成以後，就訂定公司各項章程及招佃章程，一共改了六、七次方才定局。本來是一片荒灘，擺在那裡什麼人也不管，但是等到有人來開垦，大家就都眼紅起來了。

到了第10年，公司的經營漸入成功的境地；我父在股東會上關於公司成立經過的歷史，說得十分詳盡：通海垦牧公司自光緒27年冬開辦至今，足10年矣；以地之僻而工程中阻而未完，遲至10年，始開股東會。……鄙人又當臚序本末為各股東陳述……中日馬關約成，國勢日蹙，私憂竊嘆，以為政府不足惜，非人民有知識，必不足以自強；知識之本，基於教育，然非先興實業，則教育無所資以指手，故自營心計；從通海最優勝之棉產始，從事紗廠，自22年至25年，千艱萬險，幸底于成。……因念紗廠工商之事也，不兼事農，本末不備，輒毅然擔任；期辟此地廣植棉產，以厚紗廠自助之力，但其地兼鹽營民灶四種之糾紛；……其時所用測繪及各委員臨勘駐督之費，皆鄙人獨任籌墊，圖成估工，擬章集股；……此為創辦垦牧公司之緣起。

光緒24年以後，我父回到南通決心開辟他的新路；又碰到兩江總督劉公坤一，劉公當時也是一朝重望，齒德俱尊，好像中流的砥柱；對於我父，又是一樣以國士相待，言聽計從。興辦紗廠，雖然是和張公之潤開其端緒，然而竭力的促成，全仗着劉公推心置腹。後來繼續興辦垦牧公司，又是他一手幫助成功。我父以前沒有翁公，成名沒有這樣大；後來沒有劉公，成事沒有這樣快；翁、劉二公著實是我父的真實知己了！

我父在光緒29年游日以後，就感覺到一國漁業和航政的重要，漁業和航政的範圍到那裡，就是國家的領海主權到那裡。假使只有海而沒有漁業航政，試問主權從那裡表現出來，等於空談；我國政府和人民都極應該注意，一致挽回已失的權利和發展沿海的漁航業。海岸綫雖是很長，但是向來聽其自生自滅，人民沒有力量去問，政府也沒有決心和計劃去辦。我父在7月間先在通州呂四沿海辦了一個漁業公

司，規模很小，宗旨是把當地漁人和漁商團結起來，改良他們的用具和方法。到了年底就和總督魏公光燾、滬道袁公樹勛商計創辦全國漁業公司，預備大規模的聯合南北洋着手興辦；如果一時不能實現，就先從南洋做起，定了計劃，成立了一個江浙漁業公司。同時還請了魏公奏設南洋漁政專員，做提綱挈領的機關。不久我父又認為維護領海主權，要先造就航政人才，大則可以建設海軍，小則可以駕駛商船。就和魏、袁二公商定在吳淞辦了一個商船學校，找地點造房屋，着實也忙了一年多。

（摘自張孝若：“南通張季直先生傳記”第69—83頁）

二 張謇敘述大生紗廠創辦經過

光緒33年(1907)7月23日通州大生紗廠第一次股東會議事錄

總理張季直先生報告開會宗旨，繼報告經理本廠12年歷史：

通州之設紗廠為張謇投身實業之始。光緒21年(1895)乙未中日事定前，部督張屬蘇鎮通紳士招商集股設機廠造土貨，謇亦承乏。謇愚不自量，念普魯士之報法，畢士馬克歸功于教育，欲興教育，赤手空拳，不先興實業，則上阻旁撓，下復塞之，更無凭借。既承前督部之屬，9、10月往來通州、海門、上海，招商勸導，會粵人潘鶴琴，閩人郭茂之，連同通州劉一山，海門陳楚濤，寧波樊時勛，議設紗廠于通州。先是數年，盛杏孫觀察創立華盛廠，因購用通棉數多，欲于通州設廠，彼時通州鄉人，尙未行用機紗，念通民向以紡織為生，若設紗廠，將盡奪織婦之利，其時布商收布，凡見參用洋紗者，必剔出不收，以是建議以為不可，既而機紗之來通消售者漸多，工漸便之，商收亦漸多，復念風氣之來既不可遏，與其以本地生貨輸出境外，而仍用其制成之熟貨通之利日外溢不宜，乃因劉、陳二君之介紹，見潘、郭與談，潘、郭計定紗錠2萬，集股本60萬，由謇更舉沈君敬夫合劉、陳三君為通董，任通州集股20萬，潘、郭、樊三君為滬董，任上海集股40萬，通股不足，滬為任補，語載合同，謇自任通官商之郵而已，是年12月初，稟請督部奏咨立案。

廠基歷相數處，以唐家崩地介內河外江之間，交通較便，故定基

于此。丙申春購地，地價由通董籌付，旋歸畫墊基，浚港筑岸，建造行棧及監工駐宿之房，已用2萬余，而潘、郭股不應，機亦不定，屢致詢問，則言通股有若干，滙股即有若干，滙股40萬立時可有，又言通股須交滙管理，通董許可有款即次第存潘，久之，潘、郭仍不應。7月，睿親至滙集董會議，樊、陳辭董。9月，郭率工頭至通，規定廠基，郭稱集股不易，由睿增舉蔣君書箴、高君立卿，仍合6董之數，會督部劉忠誠公，以鄂督前定瑞記地亞士之紗機40,800錠歸江南，廢閣不用，棧上海楊樹浦席棚中三年，日益鏽壞，令桂道嵩慶賤價出賣，郭稔于桂，受桂之托，告于通董，議用官機估價，或以官機估價合股計此機于光緒19年，鄂督在武昌認息借瑞記地亞士洋行款所定，機至上海運鄂，鄂督調江，則又運江，江不能設，則又運滙，隨機洋匠一人，月俸400金，前後凡5年，凡運鄂、運江、運滙之費，棧于上海地租、棧租、保險之費，洋匠月俸之費，洋行月息之費，統計近83萬兩，潘、郭既有此議，則屬潘、郭考察機可用否，潘、郭言可用，則又請桂道委員并另請洋匠會同公估，照蘇綸新機價，止值48萬兩，委員要50萬兩之成數，議粗定，潘、郭忽以官有股必干涉掣肘，即有約不足信，翻悔不用，主自購，且有集股須緩至來年之說。方議粗定時，睿同在上海，及不用之說發見，則睿已至江寧，書函往返，辨釋自任，官有干涉，睿獨當之，必不苦商。潘、郭持益堅，且謂如用官機，則滙股不願，而官執前議為讓，桂道并許協助集股六、七萬，雖不盡可信，然竟罷，則通股已用之款終不可救。10月，得潘、郭決絕訊之日，反復籌慮，徹夜不能寐，繞屋而走。念官機值50萬作股，商股亦須50萬，今通董已集之股五、六萬，及桂所許約10萬，用官機，則合官商已60萬，執60萬以号召40萬，數已過半，若不用官機，仍如潘、郭60萬之議，潘、郭又且前且却，與通董不能相信而合力，僅執通董五、六萬之股以号召，是以一望十，形勢益絀。然通董力薄，如何能任集50萬之股，勢須睿任，睿襄人也，向于富人無所交涉，一旦違願求人，人不親不信，而我徒自貶。即有應者，而不如數，則事終不成，我何苦為人役，不如已願。又念己則教育終無所憑，且安所望世有第二之願為人役者，且入通股人大半，亦因信我，我畏難而奔之，已

購之地，已建之屋，將貨于誰，豈非入股人因我而喪資，世復誰與我。百念紛紜，往復上下，遂覺張睿與紗廠結合為一，成敗共之，然猶不能決。次晨約鄭君蘇堪過我，告以潘、郭前後差池之故，及竟夕所慮之事理，鄭君躍然曰，定用官機耳。于是電約通董沈君、高君、蔣君至江寧，告以故。議定後，與桂道商訂，官商合約，歷兩旬之久，至11月初簽字，仍潘、郭、沈、蔣、劉、高6人，通、滙各任集股25萬，是為官商合辦，而責任乃專在睿矣。

訂約之日，憑眾與桂道重申前許助集六、七萬之說，桂唯唯云四、五萬可致，復為言前說六、七萬，今說四、五萬，5萬，中數也，請如約，桂復唯唯，自此四面奔走，陳說通州設紗廠之利，所勸集者不及2萬，賴揮莘耘觀察助集2萬餘，合計銀13萬餘兩。是冬六董會議，潘、郭仍以集股不易為辭，於是通董任34萬，潘、郭任16萬。丁酉規建廠屋，潘、郭仍持緩議，而工程待用孔亟，通董不得已，聯潘、郭名請撥官款，潘、郭遂謂既用官機，復請官款，滙股頓散，即有亦不交。於是沈、蔣、高聲明，潘、郭前後閃爍支離，不能共事，請退，潘、郭亦請退，桂道以為通董退則全局瓦解，堅留之，許潘、郭退董，交還通董集存之款。計潘、郭發議，至此20余閱月，始終未交一文，未辦一事也。方潘、郭由40萬縮至25萬，而16萬，詭狀大著，不待推測，然丙申秋冬之間，上海紗市敗壞，華盛、大純、裕晉或欲停辦，或欲出賣，几于路人皆知，凡以紗廠集股告人，聞者非微笑不答，則掩耳却走，誠亦有此況狀，故雖恨潘、郭之狡，未嘗不原其怯。而我本未有可以為世信用之實，又未嘗不內訟，故沈、蔣、高之與潘、郭決絕，蓋遲之久，而又久至于3年，且以為商認之50萬，潘、郭雖縮至16萬，固猶有此16萬之希望也，至必不可合，則希望絕，50萬完全之責并于一身，而已集之股滯于18萬，艱阻不進，此為一險。

于是一再求助于江、鄂二督及桂道，及凡相識之人，有冀其可助而言之者，有明知其未必有益，而姑言之以僥倖者，所更非一，未暇殫述。旅滬不忍用公司錢，主于友人賣字自給，風儉黠吏陰嗤而阻弄之者比比皆是。然而聞謗不敢辨，受侮不敢怒，閉目塞耳，遷程盲進，會

盛太常以受江、鄂兩帥之托，函告江督將華廠大純、華新等廠租與西商，即以租價與通協合，江督令桂道約去省面商，即以為此真挽救之一大關鍵也。至省商明值50萬之官機由盛與審合領分辦，通領20萬，止須商股25萬，冀集股較易，而負責較輕。議定，而盛慮官商合股，有效必見奪，復至寧溝通，而堅約之，由盛與審與官訂紳領商辦之約，復與盛訂合辦之約，各領機25萬，各認集股25萬，通廠25萬，外新股活本盛亦任之，并許代籌活本，以25萬為限，約用印文，由江督咨總理衙門，私以為要約堅明之至矣。是冬購備磚瓦木石及諸用具，搭蓋儲機棚廠，次年戊戌正月動工建廠，購電燈滅火機，上下執事工役，日五、六百人，用款日繁日緊，而各路許入之股不至，其時桂官徐州道執前許助集5萬之說，屢催不應，如潘、郭訝焉。知桂者語審，桂受鄂督命亟脫閣置6年之官機，非憐以協助資本之口語，事或不諧，無以報鄂督，今機受主，桂事畢，予乃望其言之有效耶？猶不信，白劉忠誠公，司因桂適之省，語之桂，質言有此謾語，忠誠讓之而已。而5萬之望消滅，然猶恃盛也，面許25萬之活本，即不應約載，同籌之新股活本即減半，亦得125,000，更減之，亦得62,500，久之寂然。如桂屢催屢請執約，告急之書几于字字有泪，亦請江督言之，盛百萬騰閃，迄不應，而25萬之望消滅。其時所集之股，則已次第支給于造廠運機，所存无几，此為一險，時則戊戌3月也。閏4月初入都散館，5月27日到衙門，29日請假，6月初2日出都，30年利舉之幻夢于此了結。入都之后，廠事悉賴沈君敬夫維持，紮掙至冬廠已垂成，機裝過半，花亦開收，而資本止有四、五萬，既須收花，又須給造廠裝機，一切未完之工價，備開車未完之物料，心口相商，筆舌俱瘁，所共忧患者止敬夫一人。往往甲日籌得一、二萬，乙日已罄，丙日別籌，而丁日又須還甲。所遇之人，前若潘、郭，后若桂、盛，以為官不可信，而号为商者如彼，以為商不可信，而号为官者如此，始而尤人，既而自怨，終知自怨無益，惟有備進，而進無寸援，退且万碎。不得已，以為是項官機乃為了鄂督經手之事，走鄂哀之，鄂督商盛暫助挹注，不效。復哀之江督劉忠誠公，公苦之，會褚給諫有請振興商業凡官皆得入資公司之奏，同時為電滬、鎮、蕪、九四道

淮运使海分司劝入股。他人不論，蕪道袁爽秋故人也，以为睿不当任此事，亦不应独分司，徐星槎应集二万，江督刘忠誠公复为电各督銷，独正阳沈受蒼观察应焉。然每日收花銀圓率以万計，数万金之款数日而罄，仍不給于用，又哀之忠誠公，公以为厂利通海，通海地方存典公款可以存厂，为电通海地方官籌画 6 万千，是为 25 年春間事。次第撥到者，仅海門 2 万千，通州 1 万千，厘捐总局撥存銀 1 万兩而已。統計厂棧电灯灭火机已用去 17 万余兩，而官机鋼絲絨棍皮帶繩索筒管之类，朽腐损坏十居七八，修补增購之費官任而商墊，不墊則机不全，机不全，則出紗少，亏耗多，墊則收花之本益絀，是商本即集足 25 万，节节騰挪，能供收花者止 4—5 万，而豫計 20,400 錠之机，每日出紗 37—38 箱，需花 120 石，需銀 3,000 元，加以煤油、物料、人工薪水、火食、零支、息金以千元計，每日須 4,000，一月即需 12 万元，以 3 个月計，非 36 万不敷周折，何况商股尙未集足，則所絀更巨。先是江督电至通，通州知州汪直牧即日电复集款 1 万候撥，而以电示各城董令議籌撥之法，合計通州公款 3 万余千，存典生息供乡会試宾兴公車用者 1 万有奇，余供善举之用，汪复稟于江督，列陈他善举不可撥，独宾兴公車可撥。刘忠誠先后以电稟見示，惟汪与睿訊則言并无 1 万的款，前电姑应大府命令，能否得 1 万不可知，当为尽力，而当时通州紳董不知紗厂与地方相关之利益，且有所承望，唯唯否否，推官主持，反对者且昌言公款归厂將无着，有諸生而博徒者某少年，大書公揭，揭州城門，約日开明倫堂大会排阻，其族某副貢則全具通学 3 百余諸生名，由紳董稟阻于州，州先索觀其藁，不合令易，易面进仍不合，則为易而与之，既进之明日，州悬牌大斥副貢某等抗違宪令，阻撓地方大利不合，旋举其事白江督；另稟言睿營紗厂不治輿論，于是紳董有悔言，某副貢及豫名某某及睿戚族之諸生駭然，紛紛来函以匿名告，刘忠誠亦以汪密稟示屬自慎。某少年旋因他案被下獄永禁，既汪令沈君敬夫特具領狀，撥公款 1 万，还期一年，躊躇竟日，受之，而謁驟如故，厂終不成之謠复四起，此又一險。

至此直有履險維幽分寸失足之勢。己亥春，奔走宁滬图別借公款

不成，圖援湖北蘇州例，以行廠機器抵借不成，告急于各股東不答，告憚觀察，復言廈門某富人可入股20萬，卒亦不成。時已3月，上年匯款到期，若不還，則益失信用，後路且絕，無已以所收8萬金之花，漸次運滬售賣應付，一面仍預備4月14日開車，廠中各友相顧貽愕，獨沈君敬夫贊助無退志，既開，日冀出紗之多，而用花亦多，益難，周轉哀于江督，則呼之詞俱窮，謀于他人則非笑之聲隨至，無已，請江督另派股富員商接辦。函牘再上不可，而其勢岌岌，朝不保暮，無可如何，謀以廠出租于人，有介于嚴小舫、朱幼鴻者，至滬就之，以官商本50萬，年息八厘，租期3年為索，嚴、朱以實股不及45萬，須按實數，審以辛苦5年，開辦費不及萬，有應得創成之價值，嚴、朱願別酬5千，審以是用貨取且廠租于人，而股東不能得官息外之利，不可。越數日，嚴、朱益短其數。詰之，則言利鈍無把握，詞色甚怠，實不堪受。願念坐困圍城，矢盡援絕，曾無一人顧惜，不若全師而退，俟租人得利，借得自明，3年後猶可為股東收回也，乃稍貶所索，以遷就之。而嚴、朱所以要挾之者益進，于是上海之慰惜者，獨何梅孫、鄭蘇堪二君，每夕相與，徘徊于大馬路泥城橋電光之下，仰天俛地，一籌莫展。既念田橫不屈于漢高，彼嚴、朱非漢高，而審尚不至為田橫，何苦因此。適沈君敬夫書來勸回，翌日即返定計，盡花紡紗收花，更續自轉，至不能有花紡紗，則停車而閉廠，以還股東，此己亥八、九月事也。此又一險也。

坐是一決，轉覺心神寬泰。10月後，滬上紗滯如山，而通銷獨暢，各路籌調亦漸響應，以為得慶更生矣，不意次年庚子4月後，義和團事警，商市不通，五、六月紗忽壅滯，又一大窘。千方百計避蘇滬紗并占之路西，而南昌、九江北，而徐州、宿遷，請于江督謀通銷法，兩月事成，而銷路已開，是年即有餘利。填還開辦費，綜計自議辦至開車前後5載，閱月40有4，集股不足25萬，用于工程機器者歸入成本，用于開辦費者，為各股東官息17,000余，存匯款息6千余，運機擦機工6千余，用于洋匠裝機監工之酬勞及供給5千余，用于上下執事夫役津貼伙食川資訊力一切之費14,000余，以存庄回息抵出1/4，實止9,300余兩，審與董事皆未用分文也。

开办費以辛丑春填清，遂有余利分紅。方開車之始，審自定章，余利作13成，十成归股東，三成归辦事人，复以三成2/10成归經理人，八成則董事及各執事派分。念此5年之中，忧患艰危，審由自取，而勞苦，則董事各執事諸人共受之，諸人何為者，且无以自明，区区之不為私利，故定章如此，憚觀察致書嫌董事以下分紅太优，慮違初心未之改也，是年辭江寧文正書院归，專理厂事用厂公費。

厂之官利无年不付，余利自庚子始，綜計庚子、辛丑、壬寅、癸卯、甲辰、乙巳、丙午7年，除每年应付开支正息外，所获余利，每股共125兩有奇，旧于余利中，先提公积、保險、折旧3項，以厚厂之信用，力憚觀察主改并折旧于公积，以厚股東之余利，7年共有公积336,000兩，其審所得之二成紅獎，初由審議分一半酬股東，憚觀察昔年协助股本之义，繼沈君、蔣君、高君、徐君四董議（初分六董后因节省并為四），由審分5厘以酬股東。憚觀察是時盛太常所領之官机尙閣置在滬，而零碎借用者不少，願皆在華盛浦东棧中，不似昔之在席棚內受上兩旁風土蝕水浸之患矣。甲辰擬增錠，江督知之，乃屬完全保存此已折之机，复集商股33万，增厂以容之，至是鄂督所購之机已全，桂道脫卸之計真畢，桂自願入股2万，可伤也。尤可伤者，己亥夏車已开兩月矣，候补道朱某犹言于刘忠誠公，張審乱要錢，大帥勿為所蒙，厂在那里，那有此事，至是亦入股1万。癸卯改余利為14成，以一成為师范学校每岁之補助，所多一成蓋分之股東，分之辦事人，辛丑以后，辦事人半有股，不全分股東之余羨也。去年八月以前，余利若干，九月以后，关东布壅，紗亦随滯，目前稍稍活动，計上海苏州各厂积紗若干，通厂积紗若干，上年滬苏厂利若干，通厂余利若干，可以推考，審愚不自量，受各股東重托十有二年，幸未有辱損于股東之处，历届虽有說略奉报，然始終不知厂在何处，作何狀者，股東中殆十居八九。審年已55矣，精力日退，意兴日減，度能為各股東効牛馬之勞者不过三、五年，抑恐此5年中人事或有更变，不能久肩斯任，从前厂初办時，国家尙无商部，无公司商法，今則日漸开通，各股東可执商法以經營一切，故特开股東大会，將12年中个人对于股東亲受之历史，撮举大要，為各股

东言之，睿非以是自为表襮也。中国实业通州紗厂勉强可占一位，不特望各股东于此厂将来发达无穷，并望各股东扩充他业亦发达无穷，将来及他业之經理人才具必10倍于睿，所不待言。設或有如睿所遭遇1%者，各股东以睿所言推之，以正当之感情对經理人，則各股东此厂将来及他业日兴日盛必可操券，是則睿所为各股东貢墜露輕生之益者也。各股东諒之。

（“通州兴办实业史”，111至126頁）

三 張睿叙述大生崇明分厂创办經過

人有恒言，成敗論人，以成敗論人者，常人也。然古今中外論人，鮮不依于成敗，自下走觀之，論成敗亦正須有人耳。下走为通厂謀巩固謀发达而設崇厂，于今10年矣。始以承通厂发达之后，稍获資本家之信用，故不一年而得投資者60余万，視通厂之集股，难易迥殊矣。然自開車至今又6年，營業之进步，乃不逮通厂，而營業之焦瘁差同。曩固不敢言，營一事而未底于成，为人言之，听者必忽焉，今粗有效矣，且謀擴張，乃不得不原始要終，举所历之曲折原委，各为股东告，为未为股东者告，以期易达擴張之的，觀縷而述，幸終听焉。

分厂由下走发起，集股銀80万兩，度于崇明北沙永泰沙，開設分厂，譚君莘耘，刘君聚卿，王君丹揆贊助之。自甲辰6月起至丙午春，共收股銀609,500兩，另由通厂商股余利，从丙午年任入10兩股，股銀63,000兩，至今未到銀10兩，从丁未年任入20兩股，股銀12万6千兩，至今未到銀100兩，3共股銀798,390兩。至丁未年冬，开股东会議，招足百万，而陸續仅收股銀67,400兩而止，实共股本銀865,790兩。各股本自附入日起息，按年8厘，年年支出，中間虽經股东会決議，递迟2年发给，以厚运本之力，而其款复認利上之息，周年6厘，計甲辰至壬子股东所得利息，共銀538,660兩零3分4厘。

股款初定时，聞山西有官办紗机12,000錠，因庚子之变而擱廢。7月間，由張君退庵率同洋工师，亲至太原，勘佔鍋鑪3具，零件不全，約銀8千兩。汽机1具，零件亦不全，約銀15,000兩。紡紗机坐井彈

花机，約銀 2 万兩，卷紗木軸等件，約銀 5 千兩，通連軸大小皮帶盤熱汽管等件約銀 6 千兩，共計規銀 54,000 兩。价殊不貴，即为購運擦洗修補，加置鍋鏞 1 具，又于次年派郁芭生君赴英考察，擇購最有名之好華特白而厂紗机 14,000 錠，共为 26,000 錠，多雇机匠，赶速配裝，所有自来水管灭火机等，一应俱全，得于丁未年 3 月初 5 日，全部開車。

办机之时，一面度定永泰沙地勢較高之处，先購熟田 165 亩有奇，濬河填基，开深 7 尺 3 寸 8 分弱，面广 3、4 丈不等，为田 29 亩，划分厂地馬路，为 107 亩，以河泥 12,840 土方，加高 2 尺，又分工房市場，为 28 亩 9 分强，計日程工，自甲辰 10 月初 10 日起，至乙巳正月 17 日止，任束勗儼君，而吳君和卿佐之，凡 97 日而告竣，嗣添置厂东西田地 97 亩余，以为扩充地步，复于三和港口买地 25 亩，設立帳房棧房，又于川洪港口买地 44 亩余，为上下物料寄頓煤炭之用，今川洪江水冲击，由西而东，其地恐將淪陷，煤場又必另擇处所矣。

基础既立，建筑斯兴，以机器无处陈列而稽核也，先起花棧 3 进，共 45 間，而磚瓦必自如臬丰利掘港等处購运，河淺运艰，赴工不及，乃置小磚机，日夜造作，复从上海平湖常熟各路，配齐磚石灰料，南京上海，备办西木洋松，亲自繪图，規定紡紗洋式楼房引擎汽爐水櫃飞花洞升运梯繩子街等 586 間，烟囱烟烘水井进出水管全具，洋楼办事处执事楼花紗行棧物料所工匠間等 356 間，厂东小洋房厂西平房三和港口房棧等 24 間，先后动工，力求坚朴，自乙巳 5 月始至丁未 2 月，連閏共历 22 月，任章希瑗君董之，下走不时往来其間，而土木之工乃成，在事督工之人，无不勤憤者。

当日工程之浩大，事务之紛沓，所用之执事，仅 30 余人，除徐君亮星延自贛省，总司帳目，津貼每月 14 圓外，其他自 1 圓至 5 圓不等，又自通厂調用熟手，如吳君和卿諸人，在滬則林君蘭蓀諸人，俱由通厂支俸，办分厂之事，而同心一致，趋事赴功，亦云敏矣。岂非人力，丁未開車而后，踵通厂故事，开正式股东会，決議进行方策，举下走为总理，而張退庵君协助之，以章希瑗君長营业，吳和卿君長考工；徐亮星君長會計，王冠生君長庶务，分所办事，各尽其能。未几而章君之官，

戊申，屠君械材繼之，未几屠君改办实业，即由張君退庵兼之，次年以事冗艰于四顧，公推刘君厚生任之，兼坐办事，兩年半后，刘君自就营口銀行事去，无人承乏，分厂同人冀营业发达，非資老成有經驗人不可，仍推張君退庵主之。

工厂营业，生貨为因，熟貨为果。分厂自庚戌春以前，进貨食多，不暇研究潮次，其存棧者，每致亏秤，其随时用者，暗耗而不覺，而紗色即不免闔滯，故与魁盤同开，非貶2圓，无人顧問，其时售数，且不得多，罕有至2千箱者。庚戌秋后，注意去潮，而次貨犹不能尽剔，故售价仍无起色。辛亥秋，与正厂各选派調查員，詳考滬上各厂工，銳意整頓，气象頓易，銷路浸广，价目提高，虽当光复之际，輟工之久，是岁結帳犹余36,000兩。股东会中以厂业日起有功，而办事人仅食低廉之俸，无以酬以往之勤，鼓將來之氣，于是有提14成之2为獎金之議。壬子，紗价与魁平，而多鎮零銷时或过之，爭相購办，一盤至达万箱之数，惜錠少而出紗不多，不能供人所求耳。第6届帳略，結共余息18万兩，以抵从前亏短外，仍贏3万余兩，此非一朝夕之故也。营业有时会，計劃有奇正，亦非一手足之力也。同謀厂利則公，各顧名譽則奋，今且以花紗关系于工作之要，列表明之：

每紗一箱用花数					
丁	366斤	己	3,485斤	辛	3,443斤
戊	3,457	庚	3,469	壬	3,472
每紗一箱售價数					
丁	1,075元	己	1,343元	辛	1,541元
戊	117	庚	1,459	壬	1,448

壬子用花多者，下沙水灾，花质薄弱，加之滬厂爭購，小販和水，乾者不可多得，潮即不免风耗也。其售價小者花本輕，而紗布亦从而降也。再以收花各表申明之：

秋庄每石花价					
丙	8元25	己	11元81	辛	1,204
丁	895	庚	1,355	壬	1,119
戊	947				

淨花价		
丙 22元77	己 31元31	辛 3,015
丁 2,471	庚 3,448	壬 3,011
戊 2,490		
春庄每石子花价		
戊 9元67	庚 1,377	壬 1,267
己 11元09	辛 1,424	
淨花价		
戊 27元08	庚 3,646	壬 3,429
己 2,889	辛 3,564	

紗出于花，其美惡不可不辨，紗成于紡，其工作尤不可不精。丁未開車伊始，崇之男女工，未习其事也，因派各执事駐通厂肄习，归而教导工人，并向通、滬、苏、錫各处，招徠良工，为之导师，日渐月摩，力求細致，久而生者进于熟，又久而熟者能求精矣。而工料初犹費也，日省月試，力求節約，久之而浮用除，实用且可省矣。惟出紗之數，終嫌其少，乃严賞罰以懲劝之，另加鐘点，不令少休，和花必极其均匀，成紗必极其光洁，日夜孳孳，不敢自暇逸，考工之人，亦云劳矣。今列紗錠工料各表以明之：

每錠出紗12支數		
丁 1磅106	己 1,164	辛 1,199
戊 1,075	庚 1,139	壬 1,292
14支數		
丁 9分424	己 974	辛 981
戊 878	庚 91	壬 1磅098
每日出箱數		
丁 52箱	己 643	辛 638
戊 54	庚 638	壬 754
每箱工料費		
丁 13兩03	己 830	辛 908
戊 9兩04	庚 834	壬 676

辛亥費多于庚戌者，光復乡民惊恐，到工者稀，工作时時間断也。抑又有說，熟貨之良楛，固視乎生貨之优劣，而進貨之操縱，亦視乎儲貨財力之丰嗇。譬如市有貨物，遇者适无資，无以致之，再過而已。

不可得，花亦何独不然。丁未未開車，已慮及此，丙午秋庄花价甚廉，所办入者，不过7千余石，平时无可預备者，即賴临时之补救，遂有急不暇擇而迁就者，此当日紗色之滯紗价之絀所由来也。嗣后年复一年，每为收花計，而賤价售紗，至己酉而困难已极，調款勁需通厂作保，且須以棧花抵押，息亦甚重，負息重則获利薄，是年奋力經營，幸余4万兩，庚戌則仅余1万兩，辛亥易大債为小債，負息少而贏利較胜，得余36,000兩，壬子易長債为短債，負息輕而贏利遂丰，乃得余18万兩，負息之多寡，为贏利之优絀，亦商业之公例也。更为表以明之：

調汇利除回息每紗1箱派數

丁	4兩87	己	298	辛	305
戊	377	庚	317	壬	14

此非謂財多而賈反不善也，用己之財則己之善，用人之財則人之善，知其未必善而必期其善，是在經營之致力矣，是又可合前后表而参考之。

營業考工会計3部，皆所以开源之道也，而不节其流，則源虽远而流不長，庶务之支銷，亟当相提而并論矣。俸給日用飲食，一成而不易者，儉无可儉。地方应酬杂項，游移而无定者，可省即省，分而布之則易闡，合而举之則易明，今以每紗一箱計，列表备覽：

薪水工資食數

丁	1兩997	己	1,198	辛	1,815
戊	1,223	庚	1,051	壬	1,045

食用除租余數

丁	1兩963	己	753	辛	1兩536
戊	9錢48	庚	62	壬	9錢17

辛亥所支皆多者，停工久而虛糜重也（壬子用項有房屋特別修理），房总而論之，分厂办事人之心力，不可謂不况瘁，其較之通厂而效力犹殊者，时异地异，未可并为一談也。論地位則通介江河，貿易不出本处。論人工則通习紡織，女工不待远求。成立早此9年，物料价賤數倍，成本輕乃过半，花紗之利，厚至3分，此通厂开办費2万余，

而分厂所以費 9 万余也。己亥庚子之后，关庄布暢行，魁盤一开，获利以 10 数万計，至丁未戊申之际，东三省日布竟銷，通布銷減而紗滯，寿紗一盤，亏本常一、二万計，盈絀悬殊，此通厂連年贏数 10 万。而分厂所以蝕一、二万也。經此重挫，元气大伤，时以危苦之誠，策厉执事，执事諸人，乃无不战战兢兢者，当亦为人所共諒矣。

今試合 6 屆之帳略說略觀之，未開車前，專事工程，无从取利，即以股本給官利，計自甲辰至丁未 3 月初 4，共付官利 91,470 余兩，开办費所謂 96,540 余兩，非純費也，官利居多数也。開車以后，虽始營業，实则失利，乃借本以給官利，計自丁未 3 月初 5 至戊申年終，又付官利 120,550 余兩，而兩屆之亏，120,550 余兩，非真亏也，官利占全数也。凡始至今，股東官利，未損一毫，递退发息，則又利上加利，以对股東薄乎否也。

有謂泰东西各国商业，获利若干，皆以本年營業为准，赢利若干，即派利若干，提獎若干，无所谓官利，即无所谓余利，由是而言，分厂无所谓开办費，并无所谓亏本，即可謂之无岁不贏，有贏即应有獎，是办事人固应年年得獎。虽然，各国自有习惯，有他国之习惯，乃有他国之公例，烏可以概中国，且亦賴依此习惯耳，否則資本家一齐蝟縮矣，中国宁有实业可言。

今所欲为股東明言之者，紗厂必謀擴張耳，擴張則必有利耳，請核各表，皆以每紗 1 箱为根据，出紗多則开支少，开支少則贏利多，分厂限于机器，有余勇而无可買，假如添錠 14,000 枚，除加監工几人外，一切可以因仍，計費用第增十之一二，而熟貨可溢十之三五，合所溢出之貨，攤連帶而增之費，平均便輕，此稍明計学者皆知之矣，不及时而亟圖之，吾恐己之应有而为人所有也。（下略）

（录自“張季子九录”实业录卷 5，第 8—13 頁）

四 張謇呈請清政府禁止朱曉在海門設紗厂原文

（1904 年）

竊維工商实业，无不以統系而成，以傾擠而敗，各国鑒于此，故

凡业必有协会，官亦必为平亭，史記所謂利导整齐，亦即此意。中国工业商情，本极睽离涣散，自上海洋商始設紗厂，接踵而起者9家，各不相謀，人自为計，时乎买花，則9家爭买，而价必抬高；时乎卖紗，則9家爭卖，而价必落賤，且工人朝夕彼此，工价动辄居奇，以是上海紗厂之利，往往不及他处。通州自光緒21年始建設紗厂，其时风气未开，上下疑阻，难难竭蹶，5年而后告成，又2年而后能自立，又2年而后发达。29年冬，議建設分厂，按通州海門与崇明之北沙三境毗連，农家皆以种棉为大宗，而分厂之設，所以不在海門，而在崇明北沙之久隆鎮地方，距通州唐家閘正厂陆路160里，盖其間棉产之盈虛，紗市之衰亡，运道之通滯，商情之好惡，固尝一一籌之，欲使棉产則供多于求，紗市則求多于供，运道則因其通而开其滯，商情則迎其好而避其惡，必間隔一海門全境，而后有相成之勢，无相犯之嫌也。嗣皖商已革浙江候補道朱疇，以爵譜名，請在崇明增設大有紡織公司，荷蒙大部囑念大生分厂，恐致兩相侵損，垂詢利弊，当即呈复，复蒙批飭上海总商会，令朱商另行擇地布置在案。查朱商为上海9厂商之一，傾挤之患，固尝身受，而大部維護通海崇实业之案，又所深知，岂容以衿臂夺食之謀，为入室操戈之举？乃近聞朱疇复在海門境內通海桥地方，購度地基，建設紡厂，称已呈部，期在必办，人言凿凿，事必有因，無論地势所在，必于通崇2厂营业有侵損之患，即謂通厂获利已优，思染厥指，独不念风气开自通入，崇厂甫經成立，遽尔因羨生貪，因貪生妬，貪妬所蘊，生此賊害，既商情所不洽，亦公理所难安，何况竞争之世，必有报施，該革道今日但知挤人，設他日通崇兩厂，即以所受挤者协力还之，于該革道亦何所利，而必为此損人不利己之行为，毋乃利令智昏之甚者乎？即除崇明本沙外，江北如靖江泰兴等处，皆可設厂，与通崇各不相犯，該革道尽可图維。相应呈請大部，伏乞俯鉴商艰，查照前案，仍飭上海总商会，轉飭該革道另行擇地建設，各安实业，不胜迫切待命之至！

（“張季子九录”实业录卷2，第19頁）

五 耀徐玻璃公司的創辦

江苏宿迁县，产玻璃矿砂，数千年来，华人无知之者。光緒28年，父老見西人出重价購砂地，密取砂样，来告鄙人，当寄駐比国使署，交化学家考驗，始知为上等玻璃原料，遂与李君伯行、陈君潤甫、張君季直、袁君海观、丁君衡甫、余君寿平、黄君伯雨等，出資選購砂地3,263亩八分三，此为購地之始，后遂奏准設立耀徐玻璃公司，以該处产砂，尽在耀徐購用範圍之內，西人已購之地191亩，亦一律收回。維时金君拱北仲廉昆仲，留学英国，即馳書恳其就近調查欧洲各国制造玻璃之法，适英商李德立君来，称其友福斯德君新发明專利玻璃机器，用汽力吹筒，不用人力吹筒，工速費省，巧妙絕倫，遂复函恳金氏昆仲亲往詳查，及得复書，果称福斯德君机器实为各国所无，并开具价目單預算表甚詳，較之他人調查，亦似核實，至是发起諸君，始約福斯德君来华面議，此为調查之終。

福斯德君長于西言，不諳華語，发起諸君中，惟李君伯行嫻于英國語文，遂由李君与之詳晰研究，李德立君亦精中國語言文學，彼此磋商，均无异議，乃于光緒31年9月26日，訂立合同，以每星期出平片滾片15万方尺，每日出瓶罐3万个为度，嗣是購厂基，运材料，建厂房安机器，造熔爐烘爐，工程甚巨，事极繁瑣，華匠非素习，課工甚不易，历兩寒暑，始克告竣，內經风雨巨灾，損失工料不少，并有洋匠一人，豎立鉄梁，墮地折骨，已成廢疾，此外运料关卡阻滯，尤非笔所能罄。

光緒30年腊月，工竣試火，經40日之久，始能出貨。初出平片，有炸裂之弊，繼有泡点之弊，实验数月之久，始知弊在熔爐短小。遂停火修理，就熔爐前面加長6次，次年4月底完工，复試火如前，至6月，所出平片始能洁淨。当出平片洁淨时，福斯德君請鄙人派人監視，按照鐘点筆記出数，每点鐘可出平片520尺，以此推算，每星期可出75,000方尺，加以滾片出数，可符合同15万方尺之譜，鄙人責令試足一星期再統計，福斯德君則称每机一部，每班須用洋匠4人，日夜三

班，須用洋匠12人，必欲四部機器全開，須用洋匠48人，今來洋匠4人，僅敷試機一部之用，苟能將藝徒48人教習嫻熟，或聘足洋匠40人，定能按星期與合同出數相符，鄙人再與辯論，福斯德君竟於是夜私將機器拆去，并帶洋匠回滬，赴訴領事，其前試瓶罐器皿，亦係依此計數，均不可恃。

鄙人追蹤至滬，與在滬發起人商定，延請高易律師，預備訴訟，律師面詰福斯德君，仍一味強辯，乃責以私拆機器之非，須由按察審判，福斯德君竟稱現已生病，急須回國就醫，蓋西例民事訴訟，不能拘留病人也。律師亦稱似此狡猾西人，各國實不多見。嗣經英國領事調解，飭令福斯德君仍派洋匠四人往宿廠裝機，苟如前此試驗相同，即可作為完備，并留四人教習中國藝徒，6個月內，可以畢業，再開全機，福斯德君所有照合同未能完善之處，願將後備大罐機二部，及包工剩餘物料，一并奉送耀徐，不另索價，所有耀徐欠福斯德君餘款亦一并清付，作為了結。發起諸君公議以前籌款，股東既不與聞，以後訴訟，股東更難接應，欲開會則福斯德君又難久候，只得遷就息事，遂由律師書立議結憑據，邀同領事，四面簽字完結。發起諸君所以遷就了事者，原因福斯德君機器製造玻璃，已與洋貨無異，能開全機，即可獲利，詎料藝徒學習6月之後，居然得12人，可與洋匠并駕齊驅，又20余人次之，又20余人，均可為副，此外40余，學習製造器皿瓶罐，亦皆卓然可觀。及開全機後，乃知竟有大謬不然者，蓋每班做工八時，已將熔汁用盡，再用余汁，泡點復現，屢試皆然，若僅做工八時，至次日再做，則汁又潔淨如常，由此觀之，是熔爐僅能化8時之料，而不能化24時之料，福斯德君省儉工料，故將熔爐改小，應無疑議耳，第前案業經簽字完結，未便復控，只有忍受其愚而已。

此時情形最為窘迫，當定機開辦之始，集股不及10萬兩，福斯德機器一項，連運費已近30萬兩，厥後造廠房，建棧房，筑儲物寄宿各房，又及10余萬兩，厥後始陸續招至43万余兩，而每年調款利息，數已不貲，最痛心者，自福斯德君試機驗料，以至教習藝徒，約近2年，每日需煤40噸，每噸約費10元，此2年中，即消耗28万余元于無何有之

多，此外消耗藥品洋碱人工，為數尤巨，在西人視此本極尋常，而華人急于見功者，何堪于尚未獲利之時見此重大之虧耗耶。一時謠諑煩興，調款維艱，几无以自立矣。

先時適有日本島田玻璃廠技師益田熊太郎，欲參觀耀徐廠，經資君價商令來華，抵宿廠後，察看情形，亦深怪熔爐太小，惟稱砂質過于比產贊嘆不置。該廠所用上砂，購自比國，運費極重，議購宿砂，鎮江交貨，每年能銷一、二萬噸，可獲余利若干，以資補助，似亦不無小補，而發起諸君恐于賣礦物議，遂借詞却之。

統計共集股本43萬兩，用出之款，已及百萬，以前商請股東添本，均不答復，近來發起諸君，并有知難而退者，鄙人至此，亦意冷心灰，不願再犧牲此身于實業中矣。繼思中國貧弱至此，苟不自實業入手，則國必日蹙，民必日困，安有富強之日，吾輩創辦一事，何可有始無終，況製造玻璃，各國皆易，何以吾國獨難，今成效既著，只因爐小不敷工作，苟能添本改造大爐，何患不能發達，因與發起諸君決議，再聘奧國工程師，研究得失，以圖改良。

迨奧國工程師韋斯彙君至廠，亦稱機器靈妙，砂質純潔，无可疵議，惟平片熔爐，實不合用，須另建造，器皿熔爐，費煤過巨，尤須改造，發起諸君以經濟困難，實難同時并舉，因決議先購定烏魯門器皿爐，俟見功效，再購平片熔爐。

（“耀徐玻璃公司經理許久香報告書”，東方雜誌
第7年第9期，1910年9月出版）

爰有英商卜內門洋碱公司美人李德立，于光緒28年，來宿遷購置白馬澗一帶砂地，為數約占200畝，并將白砂帶至英國化驗，認為宜制玻璃，嗣經張季直諸氏發啟，創辦耀徐公司，購置砂地約4千畝，李德立所購之砂地，亦轉讓于耀徐公司，廠基經張季直勘定，以井頭鎮距白馬澗不遠，且臨中運河，為最相宜，資本原定規50萬兩，嗣因範圍太大，旋又續招新股30萬兩，第一次工程師為英人福司德，所有一切機器，亦均購自英國，第二次工程師為奧人韋斯彙，其所經購機器，則均為奧產，英奧兩國機器，值價約25萬元，該廠房屋有大厅9間，2

厅5間，鉄房1所，平房50間，机器有大鍋爐兩只，碾砂机3部，車床大中小各1部，刨床鑽床各1部，自來水机1部，夾石机1部，引擎1部，窑爐7座，旧式吹平片机四部，当日开机时，所制造之窗片玻璃，帘板玻璃，型板玻璃，以及其他各种出品，頗为精良，迭經南洋劝业会江苏物品展覽会及巴拿馬万国博覽会审查合格，給予优等獎章。

民国元年，該厂即行停閉，停閉原因：(一)大权握于英奧工程师手中，华商对之无可如何，(二)英奧二工程师所采購之机器，皆为英奧二国所不用之旧式机器，生产效率不高，且花样較為單純，(三)工程师配料时，不許中国工人参加，且永不傳授，因而工人欲求进步而不可，(四)資本周轉，亦欠灵通，(五)管理不甚得法。

当該厂开工时，直接及間接賴以維持生活者，不下5千余人，艺徒即达500，井头鎮各商店，因以兴起，面粉公司亦相繼成立，至今則一片荒涼，面粉公司已无遺迹可寻，該厂則无一完整房屋，大門外有木雕耀徐二字，亦只留殘痕，机器只遺輪廓，零件多已損毀，或已遺失，大鍋爐及窑爐均已傾圮，且已不能修好，据云近来，因整理无期，无人負責，拆毀被窃者日有增多，耀徐玻璃厂且曾駐兵数次，每次均有損毀，現时整理愈难矣。

該厂停閉后，初由发启股东許九香負責保管，后許九香逝世，由发启股东黃伯雨負責保管，黃伯雨則委職員刘儒珍及許植夫合管，今黃伯雨已死，刘、許二氏承繼保管責任，現厂中有工人7人，駐厂看守，以厂有田地為生活報酬。

据英国卜內門洋碱公司美人李德立云，白馬澗一帶之白砂，足供世界百年之用，良非虛語。耀徐玻璃厂現有砂地4,800亩，散在白馬澗(南白馬澗及北白馬澗)峒嵒山及站溝各地，砂地至今仍為該厂財產，由刘儒珍及許植夫經管，白砂出賣，另以沈潤光為管理員，白砂自澗道中挖出，必須淘洗，去其粘土，每6人為一組，淘工系由管理員沈潤光雇來，每淘一噸，給以大洋二元五角，每人每日約得2角，耀徐玻璃厂收地皮費，每噸1.5元，由刘儒珍及許植夫保存管理員复雇人以手車運砂至井头鎮运河碼頭，每噸1.15元，由井头鎮沿中运河及里运河

过江，至鎮江，每噸運費 5 元，鎮江至上海，每噸運費 2.8 元，至上海另有下力費，若以管理員為中心而論，成本每噸白砂為 13 元有餘，“一二八”以前，上海用耀徐之白砂者，30 余廠，每噸可售至 18 元，“一二八”後，只餘 20 余家，每噸低至 14 元，管理員所獲利益，因之減少，若就耀徐玻璃廠而論，以每年銷砂 400 噸計，每年可得地皮費 600 元，每年田賦須交約 380 元，可淨得 220 元，管理員所得利益，亦歸為劉儒珍及許植夫所有，劉、許二氏，連地皮淨得每年約 1,500 元上下，而今耀徐玻璃廠之經營，只此而已。

（勾適生：“耀徐玻璃廠參觀記”，1935 年 1 月 31 日中央日報）

附：商部奏創耀徐玻璃公司准予立案折

竊臣部於光緒 30 年 7 月 12 日接據江蘇在籍臣部頭等顧問官翰林院修撰張謇，在籍安徽候補道楊鼎霖，前廣東惠潮嘉道丁寶銓，湖北候補知府黃以霖，候選知府林松唐，在籍翰林院編修陳同禮等聯名呈稱：徐州府宿遷縣境三台、嶧山、銅嶧等處向產玻璃砂料，屢有傳教外人前往采驗，經德、比兩國名廠工師分化考驗，砂質純良，若不早自經營，無異慢藏誨盜，且宿遷地當南北要沖，運道水陸皆通，又距嶧山等處窯窰甚近，煤炭、石灰足供煉製，人多游手，工價尤廉，就此建廠間稱利便，爰議立耀徐公司，購置砂地 3,600 余亩，先集股本銀 50 萬兩，以便建立巨廠，肇興大利，惟事屬創始，風氣未開，撓奪阻撓，均未能免，呈請奏咨立案准予專利 20 年，即將該縣境內產砂之地次第由該公司照時價核購，以便隨時擴充，不得零售他人，并通飭地方文武照章保護等情，呈請奏咨前來，臣等竊維玻璃一項，于製造之法，中國素未講求，凡宮室、舟、車、器用所需大半來自外洋，據海關貿易冊進口貨，玻璃片料器燈器項下光緒 26 年值關平銀 991,000 余兩，28 年增至 1,847,000 余兩，利源外溢，年逾一年，且時價日漲比前加倍，臣部有鑒于此，當于工藝官局舊設之玻璃料力籌展拓，特采順屬房山縣玻璃礦石，延致廣東及山東博山縣之著名工匠來京選料精製，思為挽回利權

起見，令該紳張睿等請創設耀徐玻璃公司，意在振興實業，洵堪嘉尚，擬請准予立案，并准其在徐州境內專辦十年，即飭令該紳等妥速籌辦，惟是淮徐一帶，風氣初開，創立公司事宜誠不免有攙奪阻撓情事，應請飭下兩江總督、漕運總督、江蘇巡撫通飭所屬實力保護，不得稍存漠視，一面由臣部諭令該紳等按照臣部奏定公司章程，切實辦理，隨時咨報查核，謹奏，光緒30年7月17日奉旨依議欽此。

（東方雜誌1904年10月第10期，167—169頁）

申新、福新、茂新公司所屬企业

1. 榮宗敬榮德生略傳

一、榮氏兄弟的錢莊學業

榮氏兄弟出自无錫下榮一族。其父熙泰，母石氏，生長子為宗錦，又字宗敬，次子德生。家里只有旧屋二間，作為祖產，榮母每日搖花織布，早晚辛勤。宗敬生于同治12年8月初2，德生生于光緒元年7月4日。

榮父隨其親戚朱光耀赴廣東，榮氏兄弟也到廣東。朱仲甫光緒11年發表了磨刀口的厘差，榮熙泰便往幫忙，修金31兩8錢。後來朱仲甫成績好，調三水河口厘金大差，年收18萬兩，第二年又加收了4萬兩，極得嘉許。

榮宗敬14歲，便奉他父親之命，由粵赴申，就到南市鐵錨廠學生意。後來不到鐵廠，15歲那年去學錢莊，在永安街的源豫店。榮德生也想學生意，14歲那年，寫信給哥哥，代找學徒位置，但他爸爸不准，因為他父親命載“45歲有學入泮”，希望榮德生繼續讀書。榮宗敬還是替他找了生意。榮德生15歲那年，到上海永安街通順錢莊（方姓）作學徒。店里有二個先生，三個學生子。有位竇先生，對榮德生說：“學徒三年出師，時間極快，你要學點本事，否則人家說我這先生沒有本事。”於是教一歸一除，學會八十一歸，又教除法乘法、飛歸法、開方、積算。那時他的待遇是壓歲錢2元，每月有月規錢200文。

榮熙泰由廣東告假回家，到上海看見二個兒子的學業很好，看看書算都還滿意，但是他還不贊成榮德生學生意，要他回去讀書。16歲的榮德生回答說：已經學了生意，回去讀不好書，要被人笑話，不如學生意，將來或有上進。到那年底榮德生加了1元錢壓歲錢，錢莊

的朱經理，叫德生跑街，收錢收銀，入批水，南北公值，于是德生对批水、算写記賬，水票格式漸有經驗。因为記賬結算办法好，一看每日收入支出，便知道一年营业盈亏。17岁那年又加了1元压岁钱。那时天天吃粥吃飽，一定要粢飯团三文，或者兩文拼买五文。荣宗錦19岁那年滿师，到生泰蓉当先生，專營无錫江阴宜兴汇兌，生意很忙。

荣德生18岁，快滿师了，若在原庄，薪俸很低，便想他途。他父亲既在厘金館，便命他赴粵。19岁那年他到了广东三水河口，派为帮賬房，月薪每月20元加余費2元，伙食局中供給。学生子就此肥缺，心中甚快，原来做官不难，而且荣称“师爷”。他在那兒，处处小心，每日600—700兩，十天一解，收入解出，每旬旬結。程帳房因荣德生帮忙，替他捐了监生。

荣德生20岁那年12月回家結婚，到上海去看荣宗敬，到南市一看，店門紧閉，原来天津有貨色因甲午中日戰爭失利，而告倒閉。以后，又回广东到职。有人鼓动他捐从九品，不要滿于师爷职位。他22岁那年，因为父亲生病，又看馬御医門庭若市，便立志学医，日夜讀葯書，不想去广东。但是他与哥哥随父亲去滬时，却发现了另一生意——开錢庄。

广生錢莊，就由父子三人与友人开办，設于鴻昇碼頭，股份300元，自出一半，招入一半。宗敬为經理，德生管正帳，收入汇款每日数千，后派德生为无錫的經理，兼營江阴宜兴汇兌。那年，他父亲逝世，店中有大危机，因为人人都說荣氏弟兄年幼，恐难支持。結果特別小心，才算轉穩。那时荣德生月薪8元，加上田产，才够开銷。店中汇兌生意頗佳，加汇常熟、常州、溧阳，年底分紅，有30元。股东因为开业三年沒有錢賺，退股，于是只剩下1,500元股本，由荣氏兄弟自开。

广生錢庄，因行新銀元，內地押用每千搭20元，后为三七塔，汇款申出厘大，錫补厘小，日有盈余。但荣德生仍想做厘官，一度赴粵，在船上有和尚看相，說他不宜仕，不宜讀書，將來有异路。朱仲甫叫他管

“补抽帳务”，于是当总帳房，这个补抽稅局，每年仅48万兩，总办月俸100兩，每年有4万元，当时，他很羡慕做官，因为做錢莊，一年絕賺不到9万元。荣德生26岁那年，有人为他看相說是：“气色已露，不是官不是商，地位高于道府，但是无印。25至35露头角，45大佳，名利双收，此后一路风光。”他便看事业杂志，連“美十大富豪傳”均看过，以找他的新事业。后来因为厘金归商人包去，他离粵返滬。宗敬叫他留店，并且說汇款利益很好。那时正是八国联軍入京，小麦裝运天津，卖给外人有暴利，因此內地到上海汇款很多，每日汇5千元，可盈利200元。

二、面粉事業之發軔

荣氏弟兄經營实业，是光緒26年开始的：他看到各业都很平淡，只有面粉厂增裕、阜丰最好。他們看到这十年来，已兴起許多新事业，如太古糖厂，业广地产，火柴，罐頭，食品，电灯，自来水，矿业，都大賺錢，实不胜羡慕。在广东，他补抽204种稅，留心其銷場，以吃穿二項貨物最为好銷。朱仲甫也来上海，厘金已掉差，說是：我从政数年，看去乏味，余正欲作实利事业，你看做什么事业好。荣氏兄弟說做面粉生意最好。那时有四家粉厂：天津的貽米謀、蕪湖益新、上海美商增裕，和阜丰。朱仲甫說：“正合我意，我看不納稅的貨物只有面粉，洋人条約載明，仿制成功，必爽快。”于是到增裕參觀，四周看过，但不准上楼看軋粉間，洋人关照过了。阜丰也从不准參觀，訪問天津蕪湖也无法知道詳細，只知本錢要3—4万元。于是去瑞生洋行問价錢，当时美国机器四百筒十几万，半数起碼，要7—8万，英机与法磨搭用，300包起碼，不滿2万。这时荣德生又碰上一个看相人，他說：“先生紋路已現，必定恭喜，大富之局也！”他兴冲冲去看朱仲甫，决定从300包入手；集股3万元，各認一半，由朱任立案，荣任購地，在产麦区，如无錫办厂、但是荣宗敬主張15,000元之中，兩兄弟各出3,000，其余另招亲友。那年錢庄生意好，結余4,900兩，便加入投資。地址則擇定西門太保墩，購地17亩。厂名保兴，股名朱大兴，伍永茂。荣氏兄

弟各3,000,又榮秉之3,000,城內零股6,000。合成为10股,每股3,000元。后另加3股。

榮宗敬則在上海定機器,買了一個60匹馬力引擎,石磨子4部,麥篩三道,粉篩二道。正好动工修建廠屋,太保墩地產忽然起訟,說是圍人公地,又說是烟窗聳起,于文風有碍。弄得縣長來勘,常州府亦來勘,后来总算和解,將米不准將駁岸升出,煤灰不許入水,不許放回声。廠房共去2萬,機器23,000元,股款39,000,已透用4,000元。幸賴當時錢庄生意好,那年余5,000兩,可以挪用。

光緒28年保興正式开工,每日用麥30—40石,每石出粉2包多,日夜出粉300包,每石开支0.4元,袋扯0.2元。一出粉生意就不好,几天積了數千包。有人說機器粉不如土粉,點心店不敢用。價錢比土粉低,二號賣1.4元,三號1.3元,四號1.1元,利息只有0.2元。當時只有開麻油食鍋店的王禹卿,幫銷粉到天津。

朱仲甫總經理,因為死了兒子,很傷心,廣東厘金商又要恢復,于是出讓保興股子,榮德生要爭氣,決定收股改做,如此,祝蘭舫搭4,000,張某搭4,000,榮氏兄弟增入股至2萬有零,共為5萬元資本,而且將保興改為茂新,以榮德生為經理,榮宗敬為批發經理。

茂新一開始,即碰上日俄大戰于東北,面粉銷路特別好。但是石磨粉不如機器粉,故生意不及華興、阜豐、增裕的好,華興為祝蘭舫所辦,有機子,德生常問匠頭其機器是什麼樣子,匠頭引他去看,于是將要點記下,擬改為鋼磨。

現代工業必須機械化,信風水的榮德生也苦苦追求面粉機子,以期能夠競爭。但是機子要十幾萬,不易找到。后来榮德生去找宗敬,于是大膽的向怡和洋行取樣本,講明三個月交貨,十八寸軋英機六部,每日出粉500包,連同石磨可出8百包,計銀4,000兩。光緒31年,機器造好裝置成功,實現了第一個計劃。結果,每日可以賺500兩,年底余66,000兩,榮德生快活非常,于是將股本改為6萬元,每股100元,計600股。

三、振新紗廠之嘗試

榮氏兄弟之從事紡織，首為振新。光緒31年，榮德生看到上海振華生意好，他約了7人，在無錫辦廠。即張石君、叶慎齋、鮑咸昌、榮瑞馨、徐子儀等7人，每人認3萬元，實招27萬元。33年開車，榮德生任監造，開幕后就沒有事了。

面粉事業，突然不利，麥貴粉賤，外粉竟銷。這時廣生匯兌已減，新創江源。榮德生兼任紗粉兩廠外，還要自己做收繭生意，每年賺3,000元。振新紗廠也不大順利，不久即欠30萬兩，于是由榮德生任經理，榮德生努力推銷棉紗并自己去低價收花，稍見轉機。榮宗敬做面粉，大拋期貨面粉，船沉，拋出粉照交，拉扯庄款達5萬，終將廣生停歇。光緒33、34年，茂新也連虧2萬余兩。股東將股票以10余兩出售，榮宗敬與王禹卿自己購入。振新亦由榮宗敬任董事長。

榮德生每次到上海，均要物色雜誌和樣本，回來看看。後來討得美商恒豐洋行的樣本，新代理白乃里司最新式的粉機。榮宗敬便去問價。因為是新機子，價格很便宜，而且為了推銷出去，還可以放款。榮德生日夜思想美國機器，有此機會決定“欠入，賺下還錢，才有發達之日。”但是廠房却需現金。于是決定將舊廠房拆改，而且接洽金融界幫助。榮德生與王禹卿又去問課，得“拔茅連茹”四字，卜課人說三年中必定發財回來，機器定好，共10萬，先付二成，二年中付足八成。機器宣統2年裝好出貨，新粉取“兵船”牌，品質好，推銷易，又特別注意質地、粉色、經綫、分量、外貌裝璜、顏色，仿外粉及同業之式樣，于是兵船與華興、阜豐一樣好銷。武昌起義那年，生意不好做，無錫工人逃散。有一天榮德生出去喝茶散心，正夕陽西下，日光返照牆上，見水噴三、四尺高，他認為麥子受潮又受熱，失晒熱傷，粉色經綫不會好的。他取麥一看，果然，從此有了要訣：熱壞麥子不收。因此品質特別好，比各廠都好銷。那年銀根緊，榮德生吃不過錢庄的勒壓，茂新買了禪臣德國式大鐵箱，不開往來戶，而要“自往自來”，看省利息多少。元年袁世凱召工商會議，榮德生赴北京，提出三案：一為擴充紡

織，一為設母機廠，制輪船、火車，農礦軍械，資本1,000萬，自鑄鋼鐵。榮氏認為張謇的棉鐵政策，與此相仿。那年秋間，他寫了一本無錫之將來，印1,000冊，銷售一空。那年賺10萬多元。

新機成功，榮德生又想添新紡織機。德國靄益奇廠及申泰理司廠，開出價錢，按最新而最省的計劃，要添錠18,000，脫而共1,350匹發動機一，共計英金33,250鎊，每鎊合銀元10個。振新的董事不願添貨，仍然用欠債法購置，約定上海碼頭交貨，六個月交貨付一成，其餘九成，每三個月交一成，二年十月可以交清。那年振新失火，但仍余6萬元。民二工程師來裝，當時怡和紗廠的工程師來參觀，認為每部紗車單獨馬達運轉，日本中國均以此為首創，電機省煤，3萬錠只用23噸，常出70余件，每日可賺600元。其氣概比公益、怡和都新。

四、福新申新的創設

世界大戰期間，榮氏兄弟的事業才開始飛黃騰達。

上海福新面粉廠是民元計議的。浦文汀兄弟要辦米廠，榮氏兄弟主張做粉廠，決定租地租屋購機，由小做大，取名福新，榮氏兄弟各出1萬，浦氏兄弟出12,000元，王禹卿8,000元，合成4萬元。以榮宗敬為總經理，王堯臣（禹卿）為經理。福新廠定美國機器200筒寬，裝齊可出貨1,200包，民2年開工，立即賺錢。於是辦福新二廠，租用中興，以丁梓仁為經理，集股3萬元，每日可出2,000包。那時茂新的面粉“兵船”牌已比老牌值價，其要訣是用上等好麥。福新一、二廠的辦麥出品，完全照茂新辦法。民3年將中興買下，福新又添福三。

那年政局稍安定，各廠均有錢賺。榮德生認為“作事較易，思想寬大。”

振新又要添2萬紗錠，但是董事會沒有通過。董事會里的榮瑞興，已有異心，時時聯絡董事，主張另聘總經理，叫榮德生為廠經理。那年開董事會，榮德生主張在申開二廠，在寧開三廠，四廠在鄭州，董事會急於分紅，不贊成擴充。民4年董事會要降他為副經理，榮德生辭職，繼任者為張叔和，張叔和主張榮在上海另謀發展，榮氏將振新

股份割讓，与茂新股份互調，振新归荣瑞兴，茂新归荣德生。

申新于民4年創立，股本30万元，荣氏兄弟六成，張叔和二成，潘調卿一成。以荣宗敬为总經理，荣德生为經理。定机費17万元，連地30万元。

无錫的茂新于民5年租惠之開設二厂，次年收購，出粉1,600包至2,000包，月月賺錢。申新在汉口礮口設五厂，資本30万，以荣宗敬为总經理。福新二厂又添設四厂，日出4,000包，又于山东济南設茂新四厂、又租幸兴为福新第六厂。申新紗厂生意极好，决定購机，結果以40万元收購旧机9,200錠，地27亩，为申新三厂，当时是荣宗敬力主扩充，德生勉强入股四成。民6年計算，申新一，賺了40万，申二微余，福一二三四均余，福六亦有利。紗价較粉价上漲尤速的緣故。

五、申新在艱困中掙扎

欧战結束，荣氏兄弟更努力扩充。定好华特紗机3万錠（188,000磅），購美制电机1,600瓩。集股250万元，开申新三厂，申一也添美錠25,000，布机400台，新老机共38,000錠。申二添美机，共为34,000錠。添設福七，集股30万元。民8年最为賺錢，申100余万，那年才建筑三新总公司于江西路。但荣德生認為“进此屋后，反不若三洋輕桥为靜，口舌甚多。”

福新的面粉有一个时期，曾远销至英国。民10，英国借口有杂质禁輸入！化驗有皮屑，其实完全因为英国面粉工业已經恢复。这时荣德生已感到力阻，以为“財才兩缺”，荣宗敬已招股，創立申四。福五30万元，申四为28万左右，不敷甚巨，由上海墊出。那时上海正在办交易所，多至105种，荣德生从不参与，認為坏世面。周肇甫为黄沙石子磚瓦交易所主任，他問道：“是否以黄沙石子堆存交貨？”交易所后来紛紛收歇，只存5个，那年交易所拋貨，压低紗价，花价則揚，申一只賺60万兩，申二不賺，申三賺35万，市場已漸聞風警。

民11年紗价为交易所掌握，难于自主。只有面粉，稍可自足。但

茂福申三厂均欠款累累，金融界已看透这空架子，至年底便缩手，欠市款300万兩，尤以福二、福七、申三、申四欠得最多。出清存货，11月底仍欠200万，12月20日借款成功，才透一口气。荣氏兄弟所遇危险，一在光緒34年，一在民元，一在民11年。

由于外貨再来，紗价日跌，只有面粉可以支持。民12年茂三停工，福新二、八不全开，四停工，申三人事调整，这时研究变法——加强工作效率以自存。但是荣宗敬还要买厂，德大紗厂有老錠18,000，新錠1万，欠債60万，被債权人以60万拍去，归錢庄經營，以65万卖给申新，改名申五。常州紗厂二次拍卖，則无人过問。同时荣德生不大去上海，將錫济归他管，滬汉归荣宗敬。到13年齐盧战发，上海各厂因市面不行，已停工，无錫也半数停工，14年才复工，而且租常州紗厂为申六，开足18,000錠。又將兴华面粉厂买来(中国銀行經手)，改为福三、六，原来的六、三、一，改名为福三，这正是在艰辛中掙扎之年代，其时花价50兩，紗价160兩，产地收花，勉敷成本。

民16年北伐軍过滬，荣氏兄弟認了百万元的公債。那年面粉銷淡，紗价不好，荣德生主張立銀行部，以吸收資金，而且主張有現錢不如添机器。以此資金，凡屬申新一律革新添机，永安亦添机以招徠顧客，竞争甚烈。18年永安添新机，荣宗敬主張亦購新式潑来特机，荣德生主張少买一点，荣宗敬不顧，买了4万錠，为申八，由申一出資。上海楊樹浦英商的东方紗厂，有5万錠，布机400台，織机全副，定价175万兩，荣德生反对买，但荣宗敬因叶派堂的慫恿买下，押入汇丰，集股50万兩，荣氏兄弟共六成，叶四成。

民19年統稅增加，粉稅由四分加至0.1元，紗稅由1.5元加至8元以上，各厂每年納500万元以上。三年便达1,500万兩。荣德生在申三，特別注意节省开支，“以勤儉为主，附以平心守古語，所以經營之事业利多害少，随意指揮。驕奢用私心，患得患失，所以事业易于变动。”这是他的心得。民20年花賤，美花每磅由0.22元賤至0.1元，再至0.052元，洋麦由1.3元跌至0.5元。各厂不能不加意改良，并求自治，方法为添机器，改方法。惟荣德生自謂申三“所請非專家，以有誠心，管人不

严，以德服人”，对于人关照家屬，使工人努力工作，申六的常州紗厂退租，另購上海厚生紗厂，改名申六。楊树浦三新紗厂为中国最早創辦之厂，为盛宣怀改为己有，后將厂出卖，价40万兩，荣宗敬又主張买，德生也贊成，本拟分給各厂，但看到清花机新貨，不忍拆散，即組申九，以吳昆生为經理，到那时为止，申新有九个厂，50万錠子，布机3,000台。

民21年为申新最艰辛之年。申九迁厂借款5百余万。交易所有人拋空，外国人在操縱，申新改用印棉，品質亦次，銷路已減。另一方面稅收日大，所欠机款逐日到期。而且外汇高漲，要还的銀元增多。所欠一度达千万，民22年荣宗敬痛喪孙，生偏中风，二月始愈。那时申新已大不如前，銀行看看数目大，統改为押款，因此申新一——九，茂一、二、四，統統押出，只福一、三、七未押出，还能活动。福新厂已改由王禹卿專管，那时永安办好花，出品好，申新相形減色，申三另立好做商標，不在交易所开市，銷路尙佳。申三立自治区，添女工宿舍，布机已至1,500台，紗錠7万，动力有3,200瓩及4,200瓩电机2座，資本达500万元。申一、二、五、六、九亦朝此改良，民23年紗价益小，重庆只售160元，要貼水脚。申三則自收太仓、通州、陝西、山东花，售紗与常州紗厂。3月底，上海較无錫紧，請王禹卿設法。6月28日，到期款500万，非有現款300万不能过。荣託宋汉章設法，以契紙有价証券携至中国銀行做押款500万元。后来王禹卿、李升伯、陈光甫、張公权會議，由荣德生主持，以各厂經理为委員，荣德生長子偉仁协助，希望由改良而能够賺錢还債，每日由荣德生自錫写信給偉仁，分头交办。那时連花号都不願送花，于是專用通州棉，花好紗貴，銷路轉好。其間陈光甫曾約見行政院長，請发公債，結果未成。那时五百万借款，只出200多万，其余不肯再付，因此債務仍巨。后来全靠自己改进。年底結算，申三賺錢，福新微賺，申新先亏后略足抵，大势已轉，改进总公司不再办花，由各厂自办。終于渡过了最艰困之年。各厂債務直至民26年抗战后才漸清償。

抗战爆发，荣宗敬走香港，民27年病逝于香港，享年66岁。荣德

生則留滬，抗战胜利后即退休，由荣鴻元繼任總經理。荣德生民35年曾被綁一次，出事后則息影家園，不复問世矣。

（“紡織周刊”第8卷第27期741—748頁）

2. 茂新福新申新創業史

上海和長江三角洲聚集着中国80%的工业。自遜清以来，实业人材輩出，但以張季直、荣宗敬、荣德生兄弟規模最为宏大。无錫这个小上海，产生的人材，尤其不少。先有周舜卿氏，遜清时在无錫創立中国通商銀行，并开办鉄厂，这是无錫工业的萌芽。然后有楊、唐、荣三个系統；楊藕芳受張之洞影响，在无錫創立业勤广勤二个紗厂，唐氏家族則創立了广丰丽一个紗厂，以产阴丹士林布聞名。薛福成之后人，則以永泰絲厂的生絲聞名全世界。但綜合无錫工业傳統的，却推荣氏家族，在紡織业面粉业易，均占領導地位。

以面粉起家

荣氏紡織事业的創造，是在面粉事业获利以后，故为了叙述紡織事业的兴起，必須追叙其面粉事业。

无錫的梅园和益园，存有石磨四付，这就是荣家起业之物。光緒25年冬季，荣宗敬之弟德生因朋友仲甫的介紹，就广东补抽稅局的总帳，当时外人食品的面粉，竟可以免税，实际中国人也吃，故进口数量特別大。光緒26年庚子事变，荣德生返无錫，荣宗敬在无錫开广生錢庄，見增裕阜丰兩厂汇款收購麦子，生意頗佳。时德生又不想做官，朱仲甫又告老返乡，乃商量开办实业，决定設面粉厂。并擇定无錫西門外太保墩有荒地20余亩，一水滌洄，交通便利，建粉厂极为合适，于是荣氏兄弟集股經營。經過刘坤一的贊助，打破了阻碍，太保墩上竖起粉厂的烟囱。由朱仲甫招股，分13股，每股3,000兩，共39,000兩，叫无錫保丰面粉厂，光緒28年2月正式开工。明年朱仲甫去广东，无意再办，即另招新股35,000兩，面粉厂改为茂新。荣宗敬駐滬任銷售，荣德生經理厂务，此时粉厂系用石磨。出货的面粉很白，有人認為有

毒，要摻土粉，才能銷行，生產量日增300包。開工後的兩年，艱辛極了。光緒30年才添了六部英國鋼磨。清光緒34年又創茂新第二廠于無錫惠山濱。宣統2年，再行擴充，設12部鋼磨，並克服了資金的困難。宣統3年大水，糧麥易磨壞面粉，乃特加注意，產品特良，銷路大暢。民2年茂新基礎漸巩固，添了12座美國鋼磨，民3年又在一廠之旁添了第三廠。

歐戰爆發，外粉不來中國，茂新的產品供不應求，又加了12座鋼磨，每日出粉8,000包，盈餘加為資本，資本額增為120萬元。於是茂新就由無錫發展至上海，組織福新面粉廠。民4年創福新一廠于上海新閘橋，廠地15畝，建六層樓的鋼骨水泥建築，保險設備俱全，機器全是美貨，每日夜用麥2,400担，出粉4,800包。出品為綠寶星，綠兵船，紅寶星。福新二廠成立於民5年，設莫干山路，最初租用中興粉廠，資金1,000萬兩，粉機1,000筒。民8年創立茂新四廠于山東濟南，民7年設三廠于上海小沙渡路，設四廠于二廠附近，又創五廠于漢口橋口。民8年創設六廠于上海新垃圾橋，9年設七廠于上海大通路口，八廠于上海東京路。其中漢口福新五廠，資本300萬元，由李國偉主持，有鋼磨22座，每日出粉6,000包，產品為牡丹，民14年鋼磨擴充16部，每日加產5,000包，成為中華面粉廠之巨擘。

榮家共有12家面粉廠，戰前每天供應10萬包面粉，當時全國總產量60萬包，到民國18年止，它們握有了全國1/6的產量。榮宗敬發軔于無錫的三個茂新廠，集大成于上海七廠，漢口一廠。上海共日出8萬包，漢口出12,000包。榮宗敬因此有面粉大王之稱號。

棉紡織業的締造

榮家開始營棉紡織在光緒32年。榮宗敬兄弟鑒于日俄戰爭時紗布昂貴，利用茂新面粉廠盈利，創立振興紗廠，股東有榮瑞馨，榮華生，鄒靜山，資本30萬元，紗錠12,000枚，經營並不樂觀，榮宗敬將振新的資本與榮瑞馨在茂新的股本對調，退出紡織業，專營面粉。歐戰發生，榮氏又利用茂新的利潤，于民國4年成立申新紡織無限公司。

厂基为白利南路，以30万元买来一个油厂，设备只有12,376枚纱锭，布机250台，另一个轧花工厂。民国5年纱业大赚钱，申新收买上海恒昌源纱厂（原日商日信）为第二厂，设上海宜昌路。民国9年，申新一厂又拆为南北二厂，生产力增加5倍。民国8年在无锡西门外五洞桥建申新三厂，并投资专纺废花的民生纱厂。民国9年创设四厂于汉口礄口宗关。

民国10年到20年，世界大战已结束，受洋纱竞争，纺织业渐不景气，但申新反利用时机扩大事业。民国13年创设五厂于上海杨树浦高郎桥（收购德大隆记纱厂），民14年设六厂于常州南门外。系租办武进常州纱厂，后迁至上海，民国18年购英商杨树浦东方纱厂为七厂，八厂为一厂同仁于民国19年公议将盈余拨款订购英国Platt整套新纺机五万锭，装于一厂之旁，厂房机器完全新造，系申新完全新创之一厂。九厂于民国9年创立，购盛升颐氏之三新纱厂机器，在澳门路新建厂房开工。

民国20年申新的规模到了顶点，当时直接控制9个厂，合办有一个厂。控制之纱锭达433,120枚，布机4,777台。到抗战前夕，申新锭子为619,688枚，布机5,982台，锭锭49,738枚，资本约在3,400万以上。（其中有21万纱锭系收购而来，甚至有英商纱厂和日商纱厂。）股东为王堯臣，丁梓仁，浦文汀，浦文渭及荣氏家族。

申新采各厂分别负责制度，各厂厂长总揽厂务，上海各厂厂长每日中午必赴总公司向荣宗敬总经理请示。但各厂仍个别经营，会计独立，各有股本，照股分红。总公司实为荣宗敬威望之化身，当时各厂采购及销售成品都在总公司进行，故总公司成为申新花纱布的市场。

申新因连年扩张，过于迅速，所需资金多向银行通融，而将各厂仓库、机器、房地产抵押借款。1929—1930世界经济恐慌，农村凋弊，纱布滞销，申新情形极为困难。当时上海银行界贷款申新者甚多，如交通、中国、上海、浙兴、中一信托公司等，尤其上海银行投资最巨，对申新之放款竟占其存款80%。由于纱价猛跌，1932年因在美麦面粉

交易上失敗，二廠五廠曾一度停頓，後由各銀行會同組一、二、五、八廠銀團管理。又申新七廠，有紗錠5,284枚，綫錠13,440枚，布機449台，價值500萬，以200萬押于匯豐，22年負債累累，匯豐曾將該廠拍賣，為日商豐田以250萬元所得，後由中交及上海銀行界以250萬元贖回，組集益銀團管理。六廠亦如此，九廠則由交通銀行管理。當時申新負債達34,000萬元，各廠均已押出。但榮宗敬在如此艱難困苦中，並不氣餒，仍克服困難，繼續奮鬥，幸賴無錫三廠及福新茂新面粉廠各單位營業較佳，互相挹注，得以渡過難關。

迄25年全國經濟好轉，農村丰收，通貨膨脹開始，紡織業亦稍有轉機，紗布供不應求，營業甚佳，債務償還過半，惟26年八一三戰爭，申新之復興乃告中止。

抗戰爆發，申新五、六、七廠處戰區，先後停工，為敵人占領，抗戰勝利後始復工。一、八廠在滬西周家橋，國軍退出閘北時，受敵機轟炸，損失甚巨，遂即停工。淪陷後敵人占領，由日商豐田紗廠接收，為敵管理開工。八廠機器一部分歸并于一廠，一部分被搬往豐田紗廠，故八廠已不存在。二、九廠因為在租界，繼續開工，太平洋戰爭後為日軍占領，軍管理四個月後發還。因棉花缺乏，只局部開工，其工廠整理部分（機器廠）工作母機，如德國制之精細車床，均為敵人劫奪。

無錫三廠，在國軍撤退時，事起倉卒，未能遷搬，將公益機器廠工作母機遷出一部至淪復工。三廠織布部分，被敵人澆油焚毀，焚燒一空，紗錠亦部分損失。勝利後才接收開工。

漢口申新四廠自武漢撤退，將紗錠分別運至寶雞及重慶成都三地開工。其中寶雞約兩萬錠，成都數千錠，重慶萬餘錠。勝利後留原地，漢口則另定新的紗錠，籌備復工。

抗戰期間，維持總公司，而將戰前債務償歸者為二、九兩廠。

（“紡織周刊”第8卷第27期741—748頁）

申新紡織系統是華商紗廠里面發展得最快而規模又最大的一家。到了抗戰時代，申新在后方的發展依然不弱，漢口的4/5的紗錠

在宝鷄开工，陝西还办了兩個煤矿，成都有一个面粉厂，重庆除了这个分厂以外，还有一个小規模的福新第五面粉公司分厂和一个鉄工厂，專造紡織机和面粉机器。

荣宗敬，荣德生和他的家族們投資棉紡織工业，远在光緒32年（1906年）。那时候他們趁着日俄战役紗布昂貴的时机，利用他們在无錫經營茂新面粉厂所获的盈利，創立了一个无錫振新紗厂。当时加入資本的伙計还有荣瑞馨、荣华生、鄒靜山等人，計有資本30万元，有紗錠12,000枚。当年即行開車。經營了几年，发展并不很快，荣宗敬氏乃把他在振新紗厂的股本和荣瑞馨在茂新面粉厂的股票掉換，暂时退出了紡織业，而專心于面粉业，可是这几年来来的經營，給他日后的事业以不少經驗。

民国3年欧战爆发，这給予本来退出紡織界的荣氏兄弟以巨大刺激，使他們来重作紡織生涯，恰巧他們在經營面粉事业上也賺了不少錢，当然有重整旗鼓的資金力量，次一年申新紡織无限公司便在上海宣告成立，这也就是中国紡織史上唯一的紡織无限公司。

申新紡織无限公司的規模开头并不宏大。成为該公司出发点的上海陈家渡白利南路紡織厂，不过是30万元收买的一个油厂厂基，里面只安裝了紗机12,376錠，布机250台，另外还附設一个軋花工場。当民国5年开工时候正是中国紗布飞黃騰达的时候，申新也大大得利。民国8年收买上海恒昌源紗厂（原日商日信紗厂）为第二家，旧厂則改称第一厂。民国9年第一厂又扩充为南北兩部，生产力为开工时的五倍有余。

民国8年，申新已在无錫組織第三厂，因机器迟到，到民国11年才完工開車。同年更投資于專紡廢花的民生紗厂。又在汉口建成第四厂，就是迁到后方的申新底子，这时的生产力为開設时期的十倍。

民国10年中国棉业开始蕭条，一直到民国20年都不見好轉，但申新的事业却比以前更为輝煌。这正是天造地設的大企业产生，大企业家成功的最好时机，因为在工业不景气中，只有有魄力，有才干的

大企业家，才能勉力支持，而小厂，次等企业家便被恐慌洪流所淹沒了。民13年在申新第三厂增布机，民14年收买上海德大隆記紗厂为第五厂，并租武进常州紗厂为第六厂，民16年投資于上海恒大隆記紗厂，又在第二第三第五各厂增加紗机。民17年在四厂加建布厂，在第五厂增加布机，民18年收买上海英商东方紗厂为第七厂，民19年在上海創辦第八厂，并在第二第三第四各厂增加紗錠，又在第三厂加布机，民10年，租办之常州紗厂为原主收回，乃又購得上海厚生紗厂补为第六厂，又購上海三新紗厂为第九厂，并在第一第三第四第五各厂增加紗錠，第五厂增加布机。

民国20年可以說是申新的黄金时代。当时直接控制的有九厂，合办的有一厂，租办的有一厂。直接控制的九厂共有紗錠 433,120枚，布机 4,777台。到了民26年抗战前夕，申新九个厂子的紗錠，已陸續加至619,688枚，布机 5,982台，此外尚有綫錠 49,738枚。

当民国14年(1925年)租立第六厂时，有人曾估計过申新的投資額，約为634万元。据民国 19 年普通投資标准計算，每紗机一錠需 50元，每布机一台需630元，那么民国26年申新九个工厂的总投資額，約在 3,400万元以上，这真是华商紗厂中間最巨大的企业了。

申新紡織事业的成長是民国 5年到民国20年这16年的事。荣氏兄弟靠着他們的長才，与原有的基础，趁欧战繁荣时期，立下了初步基础。又趁战后工业蕭条，紗厂紛紛倒閉，申新又得到擴張的机会。結果，在这16年期中，他們的紗錠增加了34倍，他們的布机增加了18倍，他們的資本則增加了73倍。分析申新九厂生長的方式，在他們全部机紗設備里，有 209,464枚是收購其他紗厂而得来的，換言之，申新扩大再生产过程的推进，几乎有一半是靠集中方式来完成的。在日商紗厂不断地擴張程序之中，中国倒閉紗厂沒有全部被日商收去，并且还收买了一个日商紗厂，一个英商紗厂，荣氏兄弟是值得我們贊許的。

到抗战发生，敌人对于这个勁敌的基业，有的是用炮火毀灭了，有的在强迫方式下合作，有的在征用下沒收了，有的是在中立国的旗

旗下維持了一個時期；只有後方兩個廠子，還在為榮氏兄弟爭一點面子，為國家盡一點責任。

（摘自“戰時申新在後方培育的幼芽”新世界月刊六月號）

3. 申新的旁系事業

拿榮氏家族來說，申新今天規模的如此龐大，實為宗敬先生高度的事業擴充欲所促成，但是由於申新各廠的分立制，以及榮氏家族每個組成分子的干練作風，除了申新本身業務的擴充開展外，它還樹立了許多旁系事業。這些事業，或為榮氏家族創辦投資，或與各廠有關，總之，是與申新及榮家有休戚相關的密切關係的。

以鴻元先生來說，他們弟兄辦有鴻豐紗廠，鴻豐面粉廠，鴻茂倉庫打包廠。建新航業公司，是各廠都有投資的，董事長榮鴻元，經理華伯忠，是德生先生的七女婿。現在有輪船二艘行駛沿海及長江。天元實業公司也與各廠有關，總經理是榮研仁。經營紡、織、染和進出口業務，申新集團的進出口貿易事項，利益又可不外溢了。榮一心及其姊丈唐熊源又經辦合豐企業公司，也是做紡織、鐵工、絲織、貿易等業務，此外在計劃設立中的有中國嫘縈公司，這是由各廠聯合投資，專門紡制人造絲的廠，預定資本約合美金300萬元，將來擬設廠於蘇州望亭。

一八廠方面，正設計創辦一電機製造廠，二三廠則擬在湖南衡陽設立分廠。九廠準備在香港設分廠，現已興工，鎮江分廠亦在計劃中。此外，九廠還收購了中華第一針織廠，出品在上海針織業中已頗負盛譽。

四廠除了寶鷄、成都、重慶三分廠外，寶鷄自設鐵工廠，甘肅天水辦一毛紡織廠，另投資民康實業公司（經營紡織及化工業務），另在寶鷄設宏文造紙廠，成都設建成面粉廠（上海已有分廠），此外又投資上海國光化工厂（曾制肥皂），最近四廠聽說在上海龍華已擇址籌設宏文分廠。

六廠則收買了國光印染廠，不久即將改稱為申新第六紡織印染

厂。

还有德生先生第六婿楊通誼主持的广新銀业公司，与申新也有密切关系，这是申新系統中唯一的金融機構。

(“紡織周刊”第8卷第27期741—748頁)

4. 申新紡織公司占全國紗錠的比例

1925年				
	成立年份	地点	紗錠	布机
申新一厂	1916	上海	38,880	1,110
申新二厂	1919	上海	35,400	—
申新三厂	1921	无錫	51,000	904
申新四厂	1921	汉口	17,600	273
申新五厂	1925	上海	31,160	—
申新六厂	1925	常州	14,264	—
合計			188,304	2,287
全国华商紡織厂			2,033,588	13,859
全国英商紡織厂			205,320	2,348
全国日商紡織厂			1,302,676	13,981
全国中外紡織厂			3,541,584	30,188
申新在全国华商紡織所占百分率			9.2%	1.65%
申新在全国中外紡織所占百分率			5.3%	7.5%

(朱仙舫：“申新在中国紡織界之地位”，茂新、蘇新、申新总公司三十周年紀念册，第33—34頁1929年1月出版)

申新集中經過及1935年在全國之地位

榮宗敬氏于1935年5月11日招待記者時說：鄙人在40年前，見舶來品日盛一日，利權外溢，遂有創辦實業之思想，維時吾國商辦實業無多，而洋粉洋紗之運銷于吾國者，為數已巨，于是邀集同志，籌辦面粉廠與紡織廠，迄今歷30余年，創立面粉廠12廠，紡織廠9廠，創立紡織廠尤較面粉廠為困難，民國4年，創立申新一廠于上海白利南路，

民國8年，創立2廠于上海宜昌路，同時創立3廠于無錫西門外五洞橋，民國9年創立4廠于漢口礄口宗關，14年購置楊樹浦德大紗廠為第五廠，又租辦六廠于常州南門外，嗣後紡織業受世界不景氣影響，一落千丈，如上海楊樹浦之厚生，楊樹浦路之東方，及三新，相繼清理，鄙人憫工人之失業，毅然出而維持，先後改組為申新六、七、九廠，今日招待諸君之地為申新九廠，即由三新紗廠蛻化而成者也。現有紗錠59萬枚，布機5,000余台，每日夜可出紗綫1,300件，布10,000余匹。

申新在中國紡織業之地位，全國紗錠、綫錠、布機總額如下：（一）綫錠，4,611,357枚，內華商2,637,413枚，日商1,790,748枚，英商133,196枚。計申新占全國紗錠總額12%，占全國華商紗錠21%。（二）綫錠，408,560枚，內華商135,860枚，日商272,700枚，計申新占總額12%，占華商總額37%。（三）布機，39,565台，內華商19,081台，日商17,592台，計申新占總額12%，占華商總額26%。

（摘自1935年5月12日上海申報）

5. 茂新福新系統占關內華商面粉廠的百分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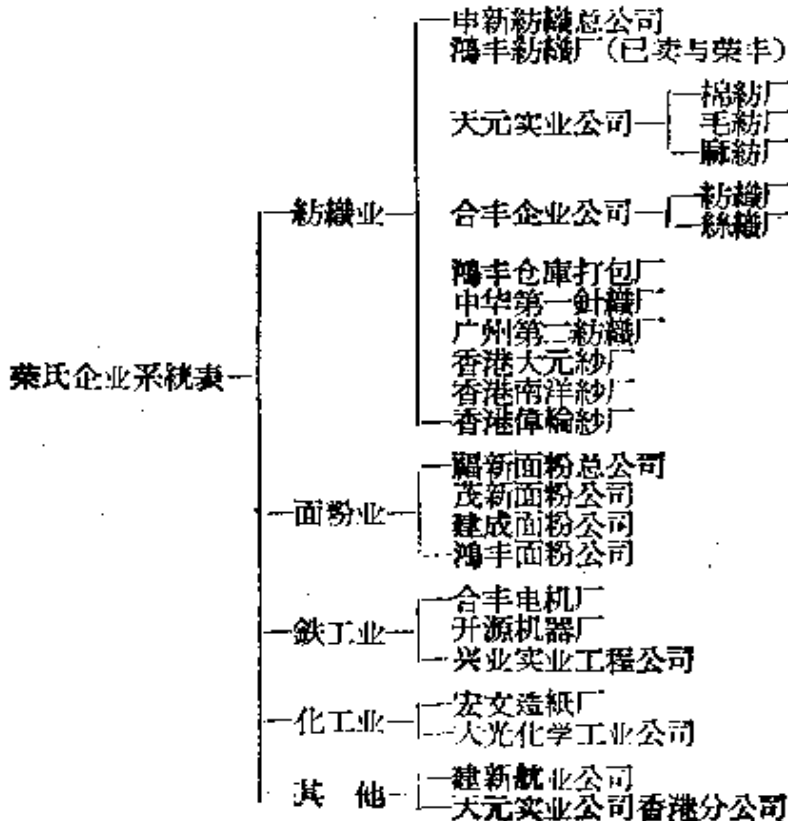
據1937年7月20日上海大公报雜章：“中國面粉工業近況”一文轉載的調查材料，計江蘇、浙江、安徽、湖南、江西、湖北、河南、山東、河北、山西、察哈爾、綏遠、四川、廣東、廣西、福建關內16省，共有華商經營的面粉廠122家，其中有附屬廠及資本數不詳者計6廠，其餘116廠，共有資本29,474,060元。在122廠中有報告設備的工廠數計98家，共有鋼磨1,264部。在122廠中之生產量據有報告者119家，每日產量為295,024包。根據下表統計，茂新、福新公司所屬面粉廠計有12家，資本數9,010,000元，則占關內16省面粉廠總資本30.5%；鋼磨數363部，占關內16省磨數28.6%；日產量92,660包，占關內16省日產量31.4%。

茂新、福新公司所屬面粉厂統計表

厂名	所在地	創办年度	經理	資本(元)	鋼磨(部)	每日产量	職員人数	工人数	备注
茂新第一、三	无錫	1901	荣德生	1,200,000	36	7,000	36	240	原名惠元, 1916年租与茂新, 1918年被收买
茂新第二	无錫	1916	陆輔臣	500,000	24	7,000	24	160	
茂新第四	济南	1919	張文煥	250,000	12	1,300	21	79	
福新第一	上海	1913	王堯臣	500,000	15	4,200	20	80	原名中兴, 后为福新收买改名福新第二
福新第二	上海	1914	丁梓仁	3,000,000	125	34,500	76	494	
福新第三	上海	1926	王堯臣	660,000	42	9,660	30	100	
福新第四	上海	1913	丁梓仁	—	—	—	—	—	
福新第五	汉口	1918	荣月泉	1,000,000	39	11,000	22	180	原名华兴, 1916年租与福新, 1919年被收买
福新第六	上海	1919	查仲康	400,000	18	4,000	20	126	
福新第七	上海	1920	王堯臣 王禹卿	1,500,000	52	14,000	37	240	
福新第八	上海	1919	丁梓仁	—	—	—	—	—	
合計				9,010,000	363	92,660	286	1,699	

注(一)福新第二厂的資本数、磨数、产量和职工人数都包括第四、八厂在内。
 (二)福新第三厂的資本数、磨数和福新第六厂其資料来自茂新、福新、申新总公司三十周年紀念刊。
 (三)各厂所在地、創办年份、經理、职工数及备注資料来源与注(二)同, 但磨数和日产量則根据磨夫: “全国面粉厂設備及产量表”, 1937年7月19日天津大公报。

附(一) 荣氏經營的企业系統表:



(摘自“申新福新事业調查”)

附（二）申新各厂簡况

申新第一第八紡織廠

申新第一厂在上海白利南路，創辦于民国4年，民国5年开工，資本300万銀元，首任厂长严裕昆先生，严氏逝世后由荣偉仁，王云程，荣尔仁等分任厂长。抗战前共有紗錠72,800枚，布机1,500台。

8厂系位于1厂之傍，系1厂同人就盈余项下撥款籌建。于民国19年創立，机器購自英国潑来脫厂，迄26年共有紗錠5万枚，一切业务行政厂务均受1厂管理，故1、8兩厂实为一个單位。

“八一三”滬战爆发，1、8兩厂适当軍事要冲，遭敌机轟炸，投中炸彈6枚。时厂中尚在开工，工人死伤200余人，职员亦有数名受伤。嗣即停工撤退，由国軍据守，与敌軍隔苏州河作战，后遭敌軍占領，委託丰田紗厂軍管理，迨胜利后始告接收，8厂受敌軍轟炸拆卸，所有机器設備房屋全部毀灭，現已不复存在。1厂紗錠只剩4万余枚，布机1,000台，被丰田拆去紗錠及馬达100余匹，迄未收回，綜計1、8兩厂房屋机器損失2/3。系上海申新各厂中牺牲最大之厂。

胜利后經努力修补，現已恢复紗錠47,836枚，布机1,050台，現任經理王云程，协理荣鴻庆，厂长駱仪甫。現有工人約2,600人。

申新第二第五紡織廠

申新2、5厂亦为一个單位。2厂在上海小沙渡宜昌路，創立于民国8年，系購自恆昌源紗厂，第一任厂长为朱仙舫先生，战前有紗錠41,000枚。

5厂在上海华德路高郎桥塊，原为德大紗厂，民14年为申新購得。由朱仙舫兼任厂长，战前有紗錠49,000余枚，綫錠12,000枚。

2、5兩厂民国24年时因經濟不景气，曾一度停頓，后由上海及中国銀行为主体之申新1258銀团管理，以委託經營之方式，聘荣尔仁为厂长，改組复工，不料滬战复起，5厂因陷战区，遂即停工，工厂因在租界，仍繼續維持，在战争初期，亦曾中有流彈，鋼絲車部分稍受损坏，

惟即修复。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軍进驻租界，曾遭占领，停工4月余，后虽发还复工，惟整理部分之工作母机，均被劫去。

5厂于民31年发还，接点后厂房紗錠設備約各損失一半，綫錠及办公室，物料房，仓库，工房宿舍全毀，剩余机器主要配件完全散失，修补整理迄胜利后始局部复工。至35年年底开齐。同时向美国HMB公司定購2万余錠，36年春末已到达裝竣，大部开工，俟另件到后，即可全部开工，連旧有紗錠整理后，全部可达6万紗錠。（現有紗錠56,216枚，綫錠5,040枚）。厂房宿舍亦在兴工修建中，將來并拟建設織布厂，2、5厂各設織机500台，現已有最新式的DRAPER厂制自动織机100台到滬。

2厂在抗战时期积极从事生产，迄31年，已將所有前欠債务完全还清，1258銀团亦因此宣告結束。

2、5兩厂經理現仍为荣尔仁，协理顧鼎吉。

申新第三紡織廠

第三厂位于无錫西門外，梁清溪兩岸。河之东南为紗厂，东北为布厂，西岸为公事房，职员宿舍及发电，軋花，修机等部。創設于民国8年，建屋裝机，迄11年春紗厂始正式开工。10月布厂正式开机，向由荣德生先生任經理，副經理荣鄂生先生。連年扩充，迄战前共有紗錠71,000錠，布机1,478台，发电机3套，容量共达7,200瓩，軋花車有80台，为战前无錫最大紗厂。

抗战軍兴，3厂为国輸將，除代織軍布外，复制就大批軍服，捐贈国軍。迄无錫淪陷，厂中尚留有軍衣，为敌軍所悉，恨之切骨，乃澆油縱火燒毀。除紗厂厂房因系鋼骨水泥，未被燒毀，損失約2万紗錠外，其余布厂，軋花厂，仓库，公事房全部燒毀。敌軍占领后，將該厂发电机复工，供給无錫全城电气，复又將1,600瓩之发电机2座劫夺他运，淪陷期間，紡紗部分从未开工。

胜利后，該厂收复，仅剩殘破紗錠5万枚。重要配件均毀缺不全，4,000瓩之发电机，亦被使用陈旧。能率上只有一半。劳工区之工房

亦破旧不堪，經兩年來之整理，紗錠修復开工者已有61,000錠，布机720台。厂房重建，电力添置1,000瓩新机2座，已可开工，另柴油引擎400瓩2座，150瓩1座，新筑油池設備，可貯油千余吨，电力除自給外，尚將余电分售，威墅堰电厂，轉售当地工业之用。

3厂現任經理榮一心，协理唐熊源。工人約3,400人，現正另建容納4万紗錠之厂房，向美国定購之4万新紗錠已到厂，正在裝置中，同时建造面积50万平方英尺之新仓库一所，軋花厂亦裝竣，所購最新式的康梯能脫尔式的軋花机，每小时可軋5包棉花。

申新第四紡織厂

战前概況——申新4厂地处汉口礄口宗关，系購地建造，紗錠亦系向慎昌洋行所定，于民国11年开工，經理李国偉，战前共有紗錠6万枚，布机1,000余台，漂染厂1所，发电机2部，容量共4,500瓩。

內迁經過——民国27年武汉危急，4厂奉政府命撤退內迁，即將紗錠設備拆卸，計10,000錠运抵重庆，5,000錠运抵成都，25,000錠迁抵陝西宝鷄，其余20,000錠因未及拆迁，淪陷敌手。后不知被拆运何处，迄未寻获。布机迁出400台，300台宝鷄重庆100台发电机3,000瓩1部亦迁赴宝鷄，另1,500瓩1部則裝船后翻沉江中。其余布机，整染厂均被敌人毀拆，損失殆尽。抗战期間，申新在宝鷄設鉄工厂，自制紡机，曾造紗錠8,000枚。又因敌机轟炸，在山洞內开掘工場，裝置紡紗設備，成为中国唯一的地下工厂。重庆厂受敌机轟炸，亦有相当損失。

各厂現狀——胜利后內迁各厂，仍照常生产，現淪厂有紗錠10,080枚，布机80台，蓉厂紗錠3,200枚，布机30台，宝鷄分厂紗錠26,000枚，布机460台，現正計劃从山洞中搬出，新厂屋在建造中，汉口4厂厂屋战时为敌軍占据，改充汽車修理厂，胜利后由軍政部接收，迄今年3、4月間始完全讓清，尚須大加修葺。李国偉先生胜利后即返汉口主持复厂工作，抗战时定購美国紗錠20,000枚，瑞士制4,000瓩发电机1座，均已到达，現正裝置中。今后計劃汉口拟恢复60,000錠，已向国外訂購，布机1,000台，拟在宝鷄自制。

4厂現任經理李国偉，副經理华棟臣、李冀耀、章劍慧、瞿冠英、李統劫，汉口厂长房无咎，宝鷄瞿冠英，重庆黃乙青，成都孙鎮域。

申新第六紡織厂

第6厂原系租办常州紗厂該厂地处小南門，因周轉为难停業，榮總經理出資15萬元租办，原約滿后又續租2年，于民国20年退租，另將上海厚生紗厂購下。嗣將紗錠設備迁上海楊樹浦河間路29号，并加意扩充。迄26年已有紗錠73,000枚，綫錠5,500枚，布机900台，“八一三”滬战爆发，因适处战区，翌日即不能进出，办公室房屋全部燒毀，紗錠損失数千枚，布机2、3百台。嗣由敵軍管理委託上海紗厂开工。原存棉花及紗布制成品，均被劫盜取用。33年日軍发还，机件損失不堪，經整理修補，至胜利后方开工。办公室重建，新添自动布机100台，紗錠改裝大牽伸，現有紗錠65,040枚，綫錠4,812枚，布机628台，工人2,300名，扩充計劃已定英国P L A T T紗錠20,000枚，明年可到。今年3月間又收买毗連之國光印染厂繼續工作，暫時沿用國光厂名，不日即改并一体，称为申新紡織印染第6厂，仍用双喜商標，此为申新各紡織厂附設印染設備之先声。

6厂經理榮鄂生先生，本任3厂副經理，因租办常州紗厂，調任6厂經理，主持迄今。

申新第七紡織厂

7厂在上海楊樹浦路468号，原名瑞記紗厂，系由德商創辦，欧战后并与英人安利洋行經理，改称东方紗厂，民国17年夏，以連岁亏折，勢难支持，停厂出售，申新乃于18年1月購入，旋即开工，华商收买大規模洋厂者，以本厂为嚆矢。

7厂接办时共有紗錠53,844枚，布机455台，迄战前未有增添，抗战发生后，該厂因在敵軍区域，被日軍占据，委託日商公大紗厂經營复工。迄33年始发还，紗錠被拆剩30,000余錠，机器配件亦多散失，胜利后复工。去年購得瑞士利他新紗錠10,000枚。已有5,000裝裝开

工，其他俟配件到各区即可开工，現該厂共有紗錠445,836枚。（开工者40,000枚）。綫錠8,400枚，布机295台。

7厂總經理榮鴻元，經理榮鴻三，廠長榮錫忠。

申新第九紡織厂

申新9厂系購自盛宣怀办之三新紗厂，原址在楊樹浦路87号，有紗錠69,000枚，綫錠880枚，布机1,000台，申新于民20年4月接办，后因房地產发生糾葛，榮宗敬先生乃將澳門路原拟建造面粉厂之地基划出建造鋼骨水泥厂房，并將三新設備迁入，任吳昆生为廠長。抗战发生后，申新各厂中，能托庇租界繼續开工者，仅2、9兩厂而已，9厂經連年扩充，紗錠最多时曾达14万枚，为全国紡織厂中（国营紡建公司亦在內）拥有紗錠数最多之厂，太平洋事变后曾被日軍占領4月，整理部分貴重工作母机多被擄劫，該厂現有紗錠130,380枚，綫錠14,278枚，該布机817台。

該厂現任經理仍为吳昆生先生。

（摘自山禾“申新各厂概況”紡織周刊8卷27期，1947年11月出版）

附（三）榮毅仁談申新受帝國主义和官僚資本陷害

榮毅仁回忆过去說：中国的民族工商业大都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間帝国主义稍稍放松对中国的侵略的时候发展起来的。我的父亲和伯父也是在这个时期开始創辦和发展了自己的企业。这些年代，全国人民掀起了反对帝国主义的爱国运动。我父亲一辈人，梦想着办工业，救国图强，当战争結束以后，加上連年内战和外国資本主义經濟危机的影响，我們的企业就遭遇到了很大的困难，父亲一辈曾經把希望寄託給北伐以后的国民党政府，可是蔣介石上台后对我們的第一手，却是无端通緝了我的伯父榮宗敬，敲詐了10万銀元。1934年，当申新最困难的时候，我父亲以价值3,000—4,000万元的财产抵押給中国銀行和上海銀行，簽訂借款500万元的合同，当时官僚資本的头子宋子文想乘机挤垮申新，吃掉我們的企业；当銀行只付了280

万元时，他就强制停止繼續付款。直至抗战胜利以后，蔣介石的淞滬警备司令部特务还把我70岁的父亲荣德生綁去40多天，勒索了20多万元美金的贖金，还给所謂“破了案”的警备司令部送了更多的酬劳。

荣毅仁接着說：国民党統治下的中国，黄浦江里停滿了美国兵艦，美国貨像海潮一样地涌来，我們的棉紡厂用的大部分是美国棉花，中国的工业破产，农村破产，馬路上美国兵橫冲直撞，北京的女学生被强奸，我父亲的实业救国的理想破灭了。

（摘自“訪上海資本家荣毅仁”，重庆工商1956年1、2期合刊）

聶云台和他經營的工業

聶其杰字云台，湖南長沙人，光緒6年生。曾國藩之外孫，其父聶緝槩曾任江海關道、江浙巡撫、江南製造局總辦，並先後與唐松岩、盛宣懷創辦過華新紡織新局、華盛紡織總局。其杰2歲時，其父帶他到上海居住，延師習英文兼攻讀土木電氣化學等科，25歲接辦上海華新紡織新局。1917年被舉為赴美國商業考察團副團長，他勸美國棉業專家來華調查並任專門顧問。1919年創辦大中華紗廠，又發起組織華商紗廠聯合會，被舉為會長，後又做過上海總商會會長、1926年又任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及顧問^①。茲將他經營及投資的工業列舉如下：

一 恒丰紡織新局

原名華新紡織新局，創始於前清光緒16年，由李鴻章、龔仰蓮等招股奏辦。彼時因辦理不善，營業未能發達，光緒32年由大股東湯、聶（緝槩）2家包辦一年，改名復泰，頗獲利。而股東僉主拍賣，始由聶緝槩氏於光緒34年出資承購，易名恒丰紡織新局，極力整頓，於民國4年起改用電力，此為我國紗廠改用電力之始^②。

該局初時僅有紗錠7,008錠，1892年增至2,016錠，1894年又增布機50台，至1921年時紗錠已增至4萬枚，布機354台，年產10支、16支、20支紗12,800包，產布15萬匹，該局在前清末年被收買後由聶云台任總經理，其弟聶潞生任廠長。1934年後，每年虧折，至1936年春，因積

^① 許晚成編：“上海百業人才小史”461頁。勃德：“中華現代名人傳”62頁。

^② 1920年10月25日上海申報。

欠浙江兴业銀行款，无力偿还，停工，同年9月出租与浙江兴业銀行与中棉公司接办，改称恒丰中記紡織新局^①。

二 大中華紡織厂

公司之发起，始于民国8年6月，时值五四运动之后，全国抵制日貨，中国紗厂所出之貨，供不应求，于是聶君云台因同人之敦促，发起此厂，于8、9月間，訂購机器，勘定厂基于吳淞蘊藻濱，是年10月12日，开創立会，9年7月1日，在农商部注册，10年11月試車，11年4月14日正式開幕。

公司厂基，在宝山县，屬蘊藻濱北岸，东距黃浦江口及淞滬火車站，約數百碼，水陆运输，俱极便利。

本公司資本，原定規元90万兩，旋改为120万兩，均已一次繳足，民国10年，增至200万兩，彼时續增之12,000錠，尙未計及，不在此預算之內也，現在45,000余錠裝竣后，本厂地基、房屋、机器、电厂、并一切設備在內，共合銀289万兩，每万錠合成本銀60余万兩。

(1922年4月15日申报)

昨日(16日)为大中华紗厂第三届股东会开会之期，厂址在吳淞蘊藻濱，是日由該厂預备專車，計到会股东約300人，共8,100余权。午后二时振鈴在該厂公事房开会。首先推定鮑武昌为临时主席。次由董事長兼总理聶云台君报告本厂經過情形略謂：本厂籌办及今2年有余，茲試將經過情形分別报告(一)厂基：初定蘊藻濱，原有地价人工二者較上海楊樹浦一帶为廉，当时本厂基址購进每亩去价平均不过350兩，全厂占地150亩，共价不过五六万兩，近已漲至2,500兩，照时价可值銀37万兩。(二)机器：初購英机34,000錠，后因英国罢工交貨延期，适本公司厂屋竣工已久，为急于开厂并減省成本及开繳起見，又添購美机11,000錠，現本厂共45,000錠，連电机厂及一切設備在內平均扯价每万錠仅65万兩，現今新厂訂購紗机每万錠費至

^① 冰：“中国紗厂之調查”，上海总商会月报1卷4号，实业調查第1頁，1921年7月出版。严中平：“中國棉紡織史稿”，342頁。

90万、100万或120万兩者。(三)营业：本厂自去冬始開車12,000錠，近已开至22,000錠，屈指至今約及3月，除开繳外，約盈余58,000余兩，尙有8千錠业已裝好試車，約下星期开足。再有一万錠抵申，不日亦可裝齐，其余五千錠，均已起运在途，預計阴历5月以前，45,000錠均可开齐。以現在花紗时价計算，除开繳外，每年約可盈余90余万兩。本公司原定股本200万兩，据昨慎昌洋行技师核实估計本公司资产，照价应值二百余万兩等語。次由監察人鮑咸昌报告上年賬(略)，通过。次投票选举董事及監察人，次討論增股及募債案，議决股本增至300万兩，并予董事会以募集公司債或借整款之权。再次攝影选举，开票之結果，計董事7人：聶云台、聶慎余、尹任先、聶管臣、鮑咸昌、任筱珊、盛蘋臣。監察人以盛竹書、俞寿丞二君当选。

(1922年4月17日上海申報)

16日午后一时，大中华紡織公司假座上海总商會議事厅开第一次股东临时会，該公司已繳股分总数計15,486权，是日到会股东共8,447权，已逾过半数。

由总理聶云台君报告公司現况，略謂，本厂自4月以后，陸續开至25,000錠，尙有2万錠，亦已到滬，惟尙未裝齐，据會計师克佐时洋行，所結财产，負債賬目，截止阴曆5月15日止，余利有47,000余兩，今日最重要者，因股款齐，一方面請商决优待新股办法，一方面請商决向銀行团借款条件，为目前应付，俟股款招足即可偿还借款。

經股略为討論，旋主席以借款額170万兩及借款大綱付表决，通过。

次討論发行优先股案，首由主席說明优先股之利益，与普通股比較如次(一)优先股年息一分，比普通股多二厘，(二)每年优先股官利，無論公司有无盈余，均須照发，派利时先发优先股官利，有余再发普通股官利，而分派紅利，仍与普通股一律待遇，(三)公司解散时，处置财产，先尽优先股分派，各股东略有討論，旋用票决。

結果贊成者，6,270权，反对者697权，大多数贊成优先股案成立。

(1922年9月18日上海申報)

三 大通紡織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于1920年2月，厂址在江苏崇明，資本64万，該厂主要股东为姚錫丹(請參看中国水泥公司)、胡耀廷(广东人，买办出身。怡大錢庄股东)、聶云台、瞿宏声、黄稼疇、杜少如、刘亭卿等。設備有紗錠1万枚。总經理为姚錫丹。

(見“农商部注册商业公司汇記”，上海总商会月报2卷1期調查41頁，1922年1月出版。及上海总商会月报1卷4号，实业調查第6頁)

四 華丰紡織公司

成立于1921年，地点在吳淞蘊藻濱。資本100万兩，初期有紗錠1万枚，布机300台，該公司董事長为王正廷，总經理聶云台，董事錢新之、吳善卿、李伯葆、陈光甫、林守坚、林康侯。監察管趾卿、李馥蓀^①。1926年被日本日華紗厂吞并，改名为日華第八厂^②。

五 維大紡織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1919年成立，地点在上海，資本20万兩。大股东为：徐靜仁、聶云台、穆藕初、李馥蓀、陈光甫、荣宗敬、刘柏森、吳寄塵、周緝之、薛文泰(宁波人，棉商兼厚生紗厂主)、楊翰西等。

(日本东亚同文会編：“中华民国实业名鑑”891頁)

六 中國鉄工厂股份有限公司

1921年成立，厂址在江苏宝山县蘊藻濱，資本30万元。該厂产品主要为制造紡織机器，主要股东有荣宗敬(申新紗厂主)、徐靜仁(安徽当涂人，曾任溥益紗厂总經理)、薛文泰、聶云台、郑培之等。

(見“农商部注册商业公司汇記”，上海总商会月报3卷3号，調查第22頁，1923年3月出版)

① 見華商紗厂調查及1920年8月2日申報。

② 严中平：“中国棉紡織史稿”358頁。

七 益中福記机器变电公司

該公司成立于民国11年，为聶云台、黄奕住(福建南安人，南洋华侨，回国后曾創辦中南銀行、厦門自来水公司和电话公司等)、黄浴沂(奕住之子)、許江水等发起，厂址在上海浦东，資本30万兩(初时实收5万兩)，該厂經理为楊景时，厂长刘錫祺，职工300余人。产品共分电料、电机及电器三大类。

(摘自奇雷：“益中公司制造厂參觀記”，商业杂志2卷8号，1927年7月出版)

八 泰山磚瓦公司

創辦于1921年，发起人为黄首民、錢新之、聶云台、胡宣明等，初时資本仅5万元，在浙江嘉善开厂制造青紅磚瓦，后增至資本100万，实收25万，并在上海附近新龙华設第二厂，建造美国式窰墩12座，国民党政府及上海市政府在抗战前曾給其制造薄面磚專利权10年。

(国貨事业出版社：“中国国貨工厂史略”27頁，1935年12月出版)

刘鴻生和他的企业

一 刘氏自述創辦工業的起源

我們这一輩的人大概都会有同感，人生的經歷是复杂曲折的。我并不是生在一个資本家的家庭中，記得19岁我讀完圣約翰大学一年級时，我多年守寡的老母几乎把家当变卖光了。为了担負起家用，我踏上了社会，吃了所謂“洋飯”。不久，我作了开灤煤矿的买办。开灤煤矿当时在英国人的手中，銷路不好。我曾絞尽腦汁使开灤的煤在長江流域上打开出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由于国外工业被战争破坏，各国工业都受了战事影响，国内工业包括外商工业有了突然发展，煤的需要量大大增加，因此开灤的煤大量傾銷。按照合同，由于煤的銷售量增加，我的收入突然大增。同时，战事期間，輪船缺少，我租了輪船运煤，获利很大。短短几年的推銷煤炭工作使我突然从一个貧寒的大学生成了百万富翁。究竟多少錢落入外国人的腰包呢？老实說，我当时并没有想到这点。40年后的今天，回想起来觉得这是最使我痛心的事。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内出現了轟轟烈烈的爱国运动。那时候我还很年青，虽然口袋中的鈔票很多，但我毕竟是一个中国人，特别是在短短的买办生涯中，使我感到外国人瞧不起中国人。我觉得中国之所以受气，是因为沒有工业，沒有科学。因此就想利用口袋中的現鈔作点事。同时，在我作推銷煤炭的工作中，使我接触到了生活的另一面。我押着煤船逆江而上，在沿長江的小鎮上推銷煤和收賬的日子中，有一次几乎被成千的以打柴为生的山民包圍起来打死。因为价廉的煤夺去了他們的生計。这件事多少使我感到“一人享福、万人受苦”的日子是过不太平的。

我的第一个企业是鴻生火柴厂。鴻生火柴厂的火柴出来后，推銷工作立刻受到障碍。因为市面上充銷着“鳳凰牌”的瑞典火柴和“猴牌”的日本火柴。为了要和外国火柴竞争市場，我用高价請了化学工程师来改进技术，提高质量，压低价格。同时和火柴同业組成了全国火柴联合会来共同抵制外貨。經過了一年多的斗争，国貨火柴在市面上取得了优势。但是真正使我第一个企业成功的主要原因，是那时的爱国运动推动了企业的发展，因为当时每个人都願意买国貨。

当中国火柴在市場上打垮了“猴牌”并使“鳳凰牌”火柴的銷售量受到限制以后，火柴企业在国内就大有起色。国内火柴企业就彼此竞争市場。这时我感到这样下去新厂不断出現，那么鴻生火柴厂总也要受到威胁。因此就想法子迫使几个較大規模的工厂和鴻生厂合并，成立大中华火柴公司，在全国各地設立事务所，掌握了广闊的市場。当时的許多小厂，吃不住这样的竞争，有的被挤垮了，有的被我們收买了进来。不到几年，我就被称为全国的“火柴大王”。

我相信所有的資本家都有这样的一条癖好，那就是总希望一个企业变成两个，两个变三个……。

我办企业获得成績后，信心鼓舞着我又去投資了水泥业、毛紡織业、搪瓷业等等。在我40岁上，已經拥有不少企业的全国知名的实业家了。

大約27年前，我結識了一位年青的地质学家丁文江，他告訴我在徐州附近的賈汪煤矿，煤量很大，煤质量也很好。他对我說这井煤矿將來可以抵得上开灤的煤矿。說实話，我在开灤工作了20多年，总盼望自己能拥有一井煤矿和开灤抗爭。因此，我用200万投資到賈汪煤矿去。然而由于当时的路局掌握在軍閥手中，治安，运输，开采都有很大困难。煤矿一直沒有很大的发展，这位地质学家的預言在他生前并沒有实现。直到20几年后的今天，煤矿公私合营之后，在苏联專家的帮助下，在賈汪煤矿真正发现了新的矿苗，現在正很快地发展业务。

在1926年左右，中国市場上充滿了外国毛紡品，我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收买了一家旧的毛紡厂。当时我想出品高級呢絨在国内无人

竞争，就可以取得原料。但是这家毛纺厂成立后却年年亏本。后来，在我一生中最有兴趣的企业是毛纺业。朋友们说我对毛纺业着了迷。原因是我当时一定要想尽各种办法使我的章华厂的呢绒能找到市场。我亲自研究了毛条、纺纱、染整等各种技术，为的是使得呢绒在质量上抵得过外国货。但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上海，穿得起呢绒的人们，习惯性只认识外国货。尽管章华的呢绒在质量上已能与外国货相比，却仍然找不到主顾。那时我把呢绒卖给在上海的呢绒商包括外商，他们采取冒牌的手段，把章华的商标剪掉，冒充外国货，这样一个措施使得上海各大商店中都采用了远比外国货价值低廉的冒牌外国货——章华厂的出品。

接着我又投资创办了企业银行。朋友们称我为“点金石”。我自己也常常说：“我的企业只有开的，没有关的”。的确，在旧社会中我算得上是一个精明强干的资本家。可是有钱的人不结交几个当时的大老板是站不住脚的。而我这块“点金石”对大老板们也还有些用处。早在30多年前，我和T. V 宋（即宋子文）交上了朋友。

1932年，世界经济危机的余波传到了中国，当时银根正紧，宋要我出来在上海维持场面，作招商局总办。他一口允诺我在企业上的一切问题由他包下来。宋是中国真正数一、数二的大老板。在这样的互惠条件下，我放下了自己的实业出去作了官。1935年国内许多厂矿纷纷倒闭。刘氏企业的全部产业已都抵押在银行中。外面风声传说刘鸿生要倒，银行首先来要求回收债款。我不得不去找宋谈话，希望能将全部财产换抵押给中国银行。那真是我一生难忘的一个夜晚。宋忽然改变了面孔问我：“你用什么作抵押呢？”

“我全部企业的股票！”

宋嘲笑地说：“O.S.（即刘鸿生的名字）的股票如今不如草纸了！”

我回到家中告诉孩子们“船沉之前，吃饱了米的老鼠总是先跑掉的”，我只不过作了宋的伙计而已。

那一年，我们差不多天天过“年三十”，总有人来逼债，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我的亲人也对我失去了信心，连我的弟弟也要从我的账房

中提取他11万的現金存款。我当时不得不送90多万的銀行股票到他那兒去作抵押。在旧社会中，人为了錢可以变得冷酷无情的。

一年以后，市場从蕭条轉到好轉，朱派人示意給我，要支持我組織企业大托拉斯，我不敢再冒險。

1937年，中日关系已經非常緊張。大敌当前，不得不去掉了賺錢的念头。抗日战争爆发后，我丢下了在上海的企业，逃往香港。蔣介石打电报要我去重庆，他并給我一張空头支票，答应偿还我企业上的一切损失，如果我到内地去办厂，当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援。当时，我相信了他的話，就通知我在上海的企业用行贿的办法，把企业中机器偷运出来。

我到了重庆之后，很快的就发现了一条規律，所謂大后方的企业，事实上是由官僚資本控制的。我在重庆办的中国毛紡織厂、火柴原料厂及在蘭州办的西北毛紡織厂，都有官僚資本投資。我原来在上海是大老板，到了重庆却成了大老板的伙計。我并没有得到蔣政府的支援，倒为当时的大老板賺了一笔国难財。到了抗日战争胜利之后，美貨大批运到西南、西北，那边的两个厂已經完全失去了市場。为了維持这个企业，我曾向四联总处貸款，回答是只能借工人解雇費用。

回到上海之后，我到善后救济总署作署長。許多朋友都劝我不要去搞这个事情。然而，“不入虎穴，安得虎子”。講老实话，我当时觉得担任这项工作可以同朱子女等官僚交换条件，就此对自己龐大的企业可以借借光。我的企业当时都需要外汇，需要机器。因此我們又再度合作了。不久我发现善后救济总署中的一些机器器材都是从菲律宾、南洋一帶运来的所謂“战后剩余物資”，全是些殘缺不全的机件。用这些机件是无法使工厂冒烟的。后来，虽然我的水泥厂裝备好美国机器，仍然无法开工。即使短短的开工，也无法和市面上大量傾銷的美国水泥竞争，美国水泥50公斤一包只售1.8元。我們自己的水泥成本都达3元。然而这时我們的碼頭生意却大发其財。棧房里堆滿了美国水泥、毛紡、面粉等物資。最后，我們的水泥厂只好

关了門，变成一引倉庫，專存美国的剩余物資！

如果从生意人的角度說，那几年我确实是賺了一笔錢。但是从一个搞实业的人來說，我的企业在那几年中几乎全部停頓了。因为当时只要生产，必定賠錢。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投机。由于币制不稳定，市場上的風暴很大，每天拿起電話来，可能賺进几十万，也可能賠成个穷光蛋。1948年蔣經国搞的金元券政策从我們的手中撈去了大量的美鈔和黃金。当时我的一个老朋友的兒子被关了进去，用几百根金条向蔣經国贖了出来。

（摘自“为什么我拥护共产党？——刘鴻生先生在逝世半个月前对新聞記者的談話”1956年10月4日上海新聞日报）

二 刘氏企業的開創和規模

宁波，在1842年的时候，被英国看中了，南京条約里面，宁波是五大通商口岸之一。刘鴻生先生从小就生長在这商埠里。宁波人最大的兴趣，是喜欢經商，而且經營得非常成功，現在很多工商界的領袖，大半是宁波人，自然，刘鴻生先生也是其中的一个。

他走出了学校，第一个职业是当了一个学校里教师。不久，离开了教师生活，担任了工部局里翻譯工作，这工作对于他比較适合些，在大学一年中，他对英文下过苦功，現在他能講流利的英語，能写純粹的英文，能閱讀專門的原文書籍，这一年的辛勤是沒有白費的。因为工作的关系，結識了一些外国朋友，尤其是在华商人，因为他刻苦耐勞精明能干，后来就被介紹到英商开灤煤矿公司作事，这是他投身工商界的开始，也是这以后事业发展的先声。

开灤煤矿公司的业务并不发达，營業清淡得很，刘先生来了以后，辛勤的工作，办事認真，不辞勞怨，很得公司当局的信任，并且他研究业务不发达的原因，計劃推广业务的方法，后来他担任推广业务的工作，他亲自出馬，想了种种方法，使开灤的煤业发展起来，终于在很短的时间內，开灤的煤，暢銷于无錫、常州、鎮江、九江一帶了。因此，开灤的主持人帶着胜利的微笑，称赞刘先生是个了不起的人才。

同时与他合作，設立开灤售品处。歇战后，公司的营业更发达，賺了很多的錢，刘先生也得了一笔酬劳金和售品处的紅利。他时常想，中国要强盛，非发展工业不可，所以凭着他自己的經驗，先后創辦了中华煤球厂，华东煤矿公司，他觉得我們燒煤的办法不大經濟，所以他改用机制煤球，中国的机制煤球，刘先生是創始者。

接着，他办了一个华商水泥厂，当时銀行界很不願意投資工商业，这时候使他在資金的周轉上为了难，幸得徐新六先生帮忙，渡过了这个难关。后来他組織中国企业銀行，是具有远大的眼光的，为什么？还不是为了解决工商业的資金問題。

我們知道，刘先生除了办煤厂水泥厂外，还有更輝煌的火柴厂，中国火柴大王的称呼，并不是偶然的。刘先生先后办了鴻生火柴厂及大中华火柴公司，規模虽不算頂大，它的生产額也占全国火柴生产額的1/4，这数目也就可观了。后来在香港創辦大中国火柴厂，規模宏大，設備完善，出品精良，不但暢銷国内各省，連南洋加拿大一帶，也爭先購用，中国火柴，取得了国际市場，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刘先生的事业心一直在向前进，永远沒止境的，在民国16年的时候，他創辦了章华呢絨厂与华丰搪磁厂，出品很好，可与洋貨媲美，后来我們穿的西服料子，和用的一些搪磁器皿，大半是章华与华丰的出品。在上海，刘先生还有几个碼頭和堆棧，不說別的，一个碼頭的小工就有2,000多。

（摘自林鷗：“天才的实业家刘鴻生”，載“新商业月刊”第1卷第1期）

刘氏由当买办轉到办工业，他主要的經營是煤业、火柴、水泥、毛紡織业，故有火柴大王之称号。

年輕时，刘氏在上海圣約翰大学讀書，但沒有毕业就当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的翻譯；其后在开灤煤矿局任职，因經營有方升任經理，他对民族工业极力提倡，利用煤層，首創机制煤球。民国15年，大中华煤球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他自己任总經理。該公司共計有3个制造厂，第一厂是在上海浦东董家渡；第二厂在浦东周家渡；第三厂是在虹口，这三个厂日产煤球4百余吨，成为上海市民基本燃料。

民國16年以後，瑞典商人控制中國火柴市場，劉氏痛恨外貨在中國跌價傾銷，致小火柴廠受打擊而停頓，他認為要戰勝外資只有集中資本成立大機構才有辦法，因此他聯合日商對抗瑞典托辣斯，民國19年，集資組織大中華火柴公司，先收買小廠，合併小廠，增加其實力，與外資競爭，這個公司合併了熒昌、鴻生、中華三公司，民國22年收買漢口燮昌廠改為熒昌。九江裕生公司也成立了，那時候該公司已有工廠7所，資產總額達560萬餘元，在民國20年就獲得純利54萬元，出品銷遍長江流域及南方各省，各商埠都設分銷處。劉氏又創設國營火柴聯合營業社，從事火柴“生產限制”及“價格的限制”。形成托辣斯的獨占。於是中國的火柴大王就在國內市場站穩了腳根。

劉氏為了要抵制舶來貨的毛織品，於民國18年在上海辦章華毛絨紡織股份有限公司，利用中國固有的羊毛原料，製造各種毛呢。資本50萬元，其大部分機器系接收日暉織呢廠，新機來自比國，該廠有毛織機72架，每年出品約值20萬元左右。

此外，劉氏還從事於水泥業，民國7年就籌辦上海水泥廠。

瑞典的火柴大王雖被劉氏打潰了，但日本又進一步的壓迫中國市場，日本火柴是不許劉氏的大中華火柴公司發展和存在的，他的章華廠的毛呢在上海沒人買，使他不得不費盡心機去開辟銷路，這里面包含着一般國貨求生存的故事。劉氏曾拿出一筆資金在復旦大學招幾個學生穿章華呢制的服裝，作為活動廣告，始終無甚銷路，乃設法剪去標頭，放在西服店當作舶來品賣，這樣才獲得很好的銷路。他還有一個搪瓷廠，也無銷路，劉氏乃與南京路三大公司商量，使用德國貨的標頭在大減價中大量賣出。這種情形，使劉氏憤恨國人之迷信外國貨，不用國貨，但在这里，引起他對民族獨立之認識。

（摘自傅華：“火柴大王劉鴻生”，經濟導報1947年13期）

三 大中華火柴公司所屬各工廠簡況

大中華火柴公司系熒昌、鴻生、中華等火柴廠合併而成，自民國19年成立以還，因資本雄厚，人材集中，出品優良，銷路廣大，在今日

国产火柴业中，直可称执盟主之权威者焉。茲將大中华火柴公司合并前之各厂史实略述于下：

(一) 榮昌厂 該厂成立于前清宣統3年，資本5万元，工厂在上海浦东爛泥渡，專門制造紅头火柴。民国5年，設第二厂于浦东陆家嘴，制造黑头安全火柴，并增加資本为15万元。民国9年，設第三厂于鎮江新河，增資为40万元。民国13年資本增加至60万。后因爛泥渡第一厂失慎，并入第二厂。馴至民国18年，全年出品数量已达71,000余箱，盛銷于長江及閩粵等省。

(二) 鴻生厂 該厂成立于民国9年，初系无限公司組織，迨民国15年，始改組为有限公司，現有資本50万元。工厂設于苏州，制造黑头安全火柴，盛銷于滬宁路沿綫。

(三) 中华厂 該厂成立于民国9年，初系合伙性质，資本10万元，至民国12年，改組为股份有限公司，資本为30万元。工厂設在南汇县周浦鎮，制造黑头安全火柴，出品行銷于安徽江苏兩省。

上述三厂于民国19年7月1日合并成立，翌年，又有九江裕生火柴厂加入合并，該厂資本50余万元，于是大中华之范圍与实力乃益加充实矣。

大中华厂成立后，各厂之改进狀況有如下述。

(一) 上海榮昌厂 該厂占地30余亩，內分东西兩部。厂中除各种制造火柴之机械应有尽有外，并备有发电机，动力机，修理机，及自来水塔等；而烘扇用蒸汽管，糊盒用貼招机，尤为該厂之特点。其他如消防設備堆貨倉庫，亦皆完备周密。19年并入大中华后，齐梗房屋，全部改造，又加添施轉理梗机，梗枝損失，較前銳改。排板房自改用动力及改良管理方法后，生产效率乃大增。又磨磷机亦改用新式球机，不但印刷比前优美，而成本也节省不少。

(二) 鎮江榮昌厂 該厂占地数十亩，制造机械頗完备，合并后，齐梗机，排板机，磨磷机，均經改良；管理方面，也較前进步多多。

(三) 苏州鴻生厂 該厂占地40余亩，內分火柴及火柴梗兩部。制火柴梗，自鋸木至成品，皆用新式机械，有晒場10余亩，凡鴻生及鎮

江榮昌所需之梗枝均取給于此。制火柴部分，除有磨礮、糊盒、軋碎、升降、旋轉、理梗等新式機器外，并有柴油引擎，蒸汽鍋爐，及发电机等，厂中并設設備完全之試驗室一所，專司分析原料，研究出品，合併后，各厂原料，也都在苏厂化驗。至于出品，除安全火柴外，并有紅梗黃頭及硫化磷火柴，此为其特殊出品。

(四)南汇中华厂 該厂占地約30余亩，厂屋虽屬旧式，但裝盒房之寬軒明朗，实为他厂所不及。設備方面，除各种新式机械外，又有自凿之自流井一口；而各部工作之連絡，殆为大中华各厂之冠。

(五)九江裕生厂 該厂占地30亩，厂中水电完全自給；合併后，各种机械，皆有添置，在長江中部，确可称为設備完善之一大厂。

此外，大中华尙收买有汉口燮昌火柴厂及添办东溝梗片厂以为发展之用。茲將該兩厂内容披露于下：

(一)燮昌厂在汉口日租界，占地30余亩，21年大中华为发展長江上游营业，并节省運費起見，故以40万元代价將該厂收买，改名为大中华汉口燮昌厂。惜該厂买进不久，即遭水灾，致无法开工。聞最近已在改建房屋，添購机器，預料不久当可着手制造矣。

(二)东溝厂在浦东占地30余亩，屋宇皆新建，專制造大中华各厂之盒片及火柴梗。厂內設備，自鑿木以至成品，均用新式机械，如拔拍克鍋蓋，及自行設計之四格齐梗机，尤具特色。全厂各部全用电力，每日出貨，約在百包以上，現尙在繼續改进中。

大中华火柴公司各厂之改进姿态，皆已明了，容將其产销現狀，概述如下：

溯自19年大中华成立以来，該公司大部分的精力，虽多致力于質的改善，但其产量究竟逐渐增加，此殆屬事实。平均燮昌滬厂及鴻生厂，每日出貨150箱至200箱，燮昌鎮厂，中华厂及裕生厂，每日各出貨100箱，合計全厂日出火柴700箱以上。

至該公司之营业区域，遍达江苏、浙江、福建、安徽、江西、湖北、河南、广东、广西、四川、山东、山西、河北等省；在南昌、汉口、九江、蕪湖、南京、鎮江、苏州、汕头、福州、厦門等埠，該公司皆設有分銷处，其

余各埠均委託經銷。近年來南洋各屬地，亦正在進行推銷中。

該公司總經理劉鴻生君，協理為徐致一君，襄理為陳九如，林兆棠，趙逸青三君，均係一代實業專家，集中如許人材，通力擊划，宜乎其營業之欣欣向榮也。

雖然大中華火柴公司成立後，國產火柴之聲勢為之一壯，市價亦一時回漲，第我國火柴業之危機尚多，例如（一）外貨之傾銷以及就地設廠製造，（二）同業粗制濫造，互相競爭，產銷不相適應，供過於求，形成過剩現象，凡此足以使國產火柴致命，故大中華今後當積極與同業合作，設法救濟，互謀統制火柴之現實，則該廠之發展，方興未艾也。

（“中國國貨工廠史略”第30—83頁，國貨事業出版社1937年2月出版）

四 華丰搪瓷廠

華丰搪瓷股份有限公司，創於民國17年秋，由海上實業巨子李拔可、劉鴻生、李直士諸先生共同發起，集合資本30萬元，在浦東周家渡，自建規模宏大之製造廠，占地17畝有奇，從事大量生產。

迨至26年秋，中日戰起，因廠址位於浦東，工作遂告停頓，其後國軍（即國民黨軍隊——編者）西撤，該廠淪陷敵手。28年秋，該公司繼續努力，在上海馬白路（即新會路）另行購地，自建新廠，即今之華丰第二廠，繼續大量生產，運銷南洋各埠，旋太平洋戰起，外洋航綫告斷，致原料完全斷絕，迫使廠中工作停頓。

民國34年8月，勝利來臨，該公司乃重行整頓，而浦東總廠，亦由中樞（即國民黨中央——編者）審核發還，經全部修葺竣事，并自置發電設備，現正努力恢復戰前之生產量。而該公司在閘北金陵路復自置基地14畝，建築廠房機器設備。計該公司共轄3個廠，總製造廠在上海浦東，第二廠在新會路，第三廠在閘北秣陵路。

華丰搪瓷公司戰前向實業部註冊之資本為30萬元，每股100元，計3千股。太平洋戰後至民國31年，原有資本，折合為偽幣（即中儲券——編者）15萬元。是年10月，增資偽幣235萬元，連同原有股本，共

为伪币250万元。分5万股，每股仍为50元。32年11月，增資伪币3,250万元，原有資本合为伪币3,500万元。分350万股，每股10元，老股1股升給30股，認繳35股。35年6月，股东会議決調整資本为国币（即国民党伪法币——編者）3,500万元，每股100元，共分35万股，普通股优先股各半，又以現金增資31,500万元，由各股东認繳足額，总計資本为35,000万元，共分3,500万股，每股10元。36年5月股东会議決又复重行調整資本为42亿元，計分4亿2千万股，每股10元，普通优先股各占半数，全部股票已經核准上市活跃异常也。

华丰搪瓷公司创办人之一，李直士先生，福建閩候人，日本东京工业專門学校毕业。民25年奉国府命令派往日本調查工业，为工业專門委員，战前曾任上海水泥公司工程师兼总务处长，現任华丰总經理。該公司行政系統，由股东会产生董事会，由董事会聘任总經理及副經理，总攬公司大計。組織分总务、會計、营业（現在全部营业委合成百貨公司总經銷）、制造四科，办理一应业务。①

据1947年“华股手冊”所載，該公司董事長为李拔可。董事罗郁銘、李士直、韋增复、柳克昌、王韞如、徐堯文、徐乐天、刘祖法。監察人柳克純、朱頌盤、武書麟。总經理为李士直，經理刘祖法②。

五 章華毛絨紡織厂

章华毛絨紡織厂，創立于民国18年10月，为上海实业巨子刘鴻生先生所创办，初名裕华織乃改定今名。章华厂开办之初，即就浦东周家渡，租地建屋設立制造厂，积极裝置内部設備，时适有上海第一毛織厂拟出盤于人，按該厂成立于清光緒22年，因厂設日暉港，原名日暉織呢厂，共有織机40余座，惜开办未久，于宣統2年即告停頓。至民国8年，乃以債務关系，收归国有，出租于商人郭建侯承办，始改組为第一毛織厂。然經營数載，卒以营业不見起色，至17年間，遂議決出

① “中国国貨工厂全貌”第136—139頁，1947年10月出版。

② 中国徵信所編：“华股手冊”第166頁，1947年10月出版。

盤，章華廠即派工程師前往該廠，將其機械逐一檢查試驗，型式效率均屬可用，乃全部盤受，運往浦東新廠裝置。當時并以原機不敷應用，復向比國訂購新機，從事補充，開始工作。前年（1933）為擴充針織，并擬多制細貨，以供市場需要起見，曾向上海中國工廠添置駱駝絨機4座；又向德國哈納門廠添購梭織機20座。計全廠共置洗毛、烘毛、梳紡、并綫、梭織、針織、經紗、漿紗、染綫、染毛、染匹頭及漂白、漂洗、縮呢、烘呢、吸水、拉毛、剪毛、燙呢等各式機器百數十座。

該廠最初因設備關係，其出品以軍衣呢為主体，而馬褲呢、華達呢等副之，21年冬，程君年彭繼任經理，為適應國內市場之供需起見，乃亟變更方針，將紡紗織造二部工作划分，于織造部添置機器，加開夜工，利用現成紗綫，多制哔嘰、馬褲呢、西裝呢等繁瑣細貨；而紗部則多制駱駝絨，以一部分出售，余供自用。另再擴充針織，增加駱駝絨生產，同時將原有之蒸汽動力，改為電氣馬達傳動，遂使梳紡間不受他部牽制，得以單獨加開夜工。支配既臻合理化，機器即不致停頓，原料亦無虛耗，不獨出品能合銷路，抑且產量突增，成本亦隨之低減，因此22年度之營業趨勢，即呈突飛猛晉之姿態，殊屬好現象，其時貨品銷行已由長江流域，推展至于華南華北，雖國內購買力薄弱，售價降落，然全年銷買額，仍能較21年超過2倍以上。復以國貨運動漸見活躍，并經政府協助，通令軍警、交通、教育各機關，于添制制服時，盡量採用國呢，于是大宗需要接踵而來，雖日夜雙班趕制，仍苦供求不濟。

章華廠在此種營業膨脹之形態下，實覺有設置分廠及分店之必要。于是在23年春，適有天津市黨部所辦之五三工廠，因开办未久，旋即停頓，由該市五三救國基金保管委員會負責保管，經該會議決出租，并与章華協商租賃條件，該廠乃派技術人員赴津試驗機器，認為可用，遂與訂約承租，改組為章華天津分廠，以專供紗綫駱駝絨為工作，使于供給滬廠自用外，并得將余額分售各駱駝絨廠借廣銷行^①。

^① 國貨事業出版社編：“中國國貨工廠史略”第1—3頁。1935年12月出版。

章華滬廠在“八一三”抗戰軍興以後，浦東廠陷於停頓狀態，旋被侵占。其前曾拆遷一部分機器，運至重慶，組織中國毛紡織廠特種股份有限公司，並在上海華山路長寧路，設立二分廠，工作不輟。一面向英法等國訂購新機，借以擴充設備，增進生產。勝利後，經將浦東廠復員，改稱第一廠，華山路稱第二廠，長寧路改稱整染工場。又在南京規復發行所，並向英美諸國搜集新式機械設備資料，作改進之準備。

章華毛絨紡織公司設總事務所於上海四川中路，在總經理以下，分設總務、會計、營業、製造4科，為我國毛織廠之巨擘，設備素極完善。現第一廠在浦東周家渡，面臨黃浦，交通便利，系一紡織整染兼備之全能毛紡織廠。該廠備有鋼絲機6套、圓梳機2台、粗紡機2,170錠，精紡機2,400錠，絨綫機3,344錠，織機91台，整染機全套計50余台，現有男女工550人，月出各種呢絨哔嘰4萬碼。

第二廠在滬西華山路，機器方面主要者有鋼絲機2套，精梳機8台，精紡機2,000錠，織機50台，全廠馬力共計220匹。專司紡毛織造工作，現有男女工250人，月產呢坯25,000碼，該項呢坯送往長寧路整染工場整染後，以供市需。

整染工場在長寧路，備有整染機器全套，馬力120余匹，月可整染呢絨4萬碼，現有男女工130人。

章華毛絨紡織公司出品，在戰前有天津分廠之駝絨紗，供本外各埠駝絨廠製造駝絨之需，抗戰軍興，天津淪陷，津廠機器全部被毀^①。

六 上海水泥公司龍華廠

本廠創立於民國9年12月，至12年8月正式出貨。廠址位於上海龍華鎮之南，機器設備大都採用德國G. Polysius出品，以象牌為商標。當初開工時，每月產量僅3萬余桶，其後屢經改進，陸續增產，至民國25年，平均每月產量已達5萬余桶。八一三滬戰爆發，前方軍需

^① 摘自上海機聯會編：“中國國貨工廠全貌”第144-147頁，1947年10月出版。

孔急，本厂仍照常日夜生产，充实国防。迨闻北大場相繼陷落，南市已入紧急状态，本厂遂遵令撤退。至同年11月9日，龙华被占，所遺厂房、設備、机器、材料、原料、成品尽入敌手。其时厂存煤炭4千余吨，灰石3万吨，鉄渣石膏各1千吨，熟料13,000吨，水泥3千吨，損失不貲。

本厂被敌占领后，由日本小野田水泥制造株式会社經營，直至抗战胜利为止。在此8年淪陷中，敌人既不知机械之保养，复以适应其侵略急需，恣意运用、过度消耗，致成百孔千瘡，不可收拾之象。胜利以后，敌人撤退，同年12月奉經濟部苏浙皖区特派員办公处核准发还，竭力整理，先行恢复水泥部之生产。翌年7月，第二号旋窑修复，滿望劫后更生，奠复兴之始基。詎料外貨傾銷，市場混乱，加以丁潮澎湃，虽竭尽全力防范，仍难挽回狂瀾，不得已于8月間停窑，至10月被迫全部停工。惟念水泥工业为国家建設之本，与鋼鐵业并无軒輊，而需要之殷，尤过于其他一切工业品。本厂有鉴于此，虽已被迫停工，但仍积极擘划，以待时机重振旗鼓，借使我国工业幼苗，不致夭折。乃于36年春再度集資复业，至5月而局部开工。經九越月之惨淡經營，除第二号窑照常生产外，复將第一号旋窑設計修复。惟因电力燃料，供应不裕，尙未能达理想之境地。

本厂机器陈旧，經敌人过度摧殘，几达不可收拾之境况。目前虽竭力予以修整，漸謀恢复战前生产量；惟战后人工高昂，原料騰貴，尤以仰給于国外之材料，因币值降落，及外汇困难等种种关系，价值之高，几已不能負担。是以成本奇重，亏蝕日增，而市場之消費，直接受國家不安定影响，銷路亦远遜于战前。

（摘自“上海水泥股份有限公司龙华厂概况”，載中华民国水泥工业同业公会年刊40頁，1948年出版）

該公司为刘鴻生于1920年所創，現任董事長为李拔可（前清举人，曾任商务印書館經理），董事：刘鴻生、刘吉生（鴻生弟）、徐靜安、朱如堂（浙江吳兴人，圣約翰大学毕业，曾任保裕保險公司买办）、楊奎侯、竹森生（浙江嵯县人，浙江兴业銀行經理）、刘念仁、刘念智。監

察人刘念义、叶起鳳^①。

資本，初为120万，民17年4月增至1,505,100元，20年6月复增至1,638,600元，23年复紅利撥充股本，增資至200万，26年再增至250万，在淪陷时期，又增至中儲券500万元。战后，初由經濟部接收，旋奉准发还，35年6月15日起复工，同月29日將資本調整为法币500万，36年3月經股東常会通过，增資至80亿元，并將票面由100元改为10元。

該公司厂基143亩余，厂外有地21亩余。龙华沿鐵路有地4亩，战前原建有发电間、工房棧房、職員住宅、工友宿舍等，原造价約五、六十万，厂內有軋石机生料磨，淘泥机水泥磨，煤粉磨石膏机各1座，50尺長旋窑2座，裝桶机全部，发电机1座，1千HP柴油引擎1座，1960HP蒸汽透平机1座，汽压机3具，拔伯葛鍋爐4具，及輕便鐵道碼頭等。此外又自备駁船40只，在湖州陈灣里及鎮江磨箐山均置有山石，青浦佘山置有泥山，截至34年止，全部固定資產帳面列值600余万元。

該公司專制及发售象牌水泥，在“八一三”战前，每日产量約1,600桶(每桶170公斤) 25年全年产量約60万桶，營業額約200万元，純量380,300余元。26年自1月至战事发生时止，共銷貨30余万桶，約值一百七、八十万元，获利30万元。战后工厂被占，生产久告停頓，35年6月复工，惟去年美貨水泥来华傾銷，該公司營業頗受打击，年終決算，受有亏损，今年來业务发达，每月約可产水泥六七万包云。

(摘自“华股手册”154至155頁，中国征信所編，1947年10月出版)

^① 董監事名單內括弧是編者加注的。

宋偉臣和他經營的工業

宋偉臣，字渭潤，浙江鎮海人，1866年生。稍長，處事勤敏，為多黨父老所器重。年23，為同鄉叶公（即叶澄衷——編者）所賞識，得在上海創設燮昌火柴公司，此實為中國製造火柴廠之鼻祖，時賴君盡謀碩劃，經營締造，得告成立，旋即管理廠務，干練異常，營業遂蒸蒸日上。6年後，君以廠務發達，孜孜求擴張不遺余力，以漢口居長江之沖要，為九省之通衢，水陸交通日見便利，乃赴漢口作實地調查，謀設第二火柴製造公司，不一年而廠宇落成，近則通銷本部各處，獲利豐厚，為漢口實業冠。宋又以漢口通商大埠，火患頻警，施救乏術，乃組織漢口水電股份有限公司。宋鑒於我國製造銅元所用原料皆購自外洋，為挽回權利，以湘鄂富於礦產，曾開采銅礦兩處，煤礦一處。未几又創辦燮昌硝磺製造廠于漢滬兩埠，民國3年被任為參政院參政。

（摘自勃德：“中華現代名人傳”第68頁）

茲將宋偉臣經辦之工業錄后以供參考：

一 漢口燮昌火柴廠

該廠自光緒23年8月間，宋偉臣即創辦此廠。合資80萬兩，其大股東為上海豪商叶澄衷。軸木之材料多為日本產，亦有來自湖南、江西者，鹽酸加里則專由英國輸入，燐亦如之。硫黃則多取自日本，箱木及紙亦用日本制，常雇工人約700人。每人每月洋4元。（膳由公司供給）日雇工人作盒，1,000者給錢50文，裝入千盒者，給錢100文。包裝千盒者80文。貼盒100者給錢11文，此等製造只用人力不用機械。平均計算每日製造50箱，多銷售于湖南、湖北、四川等省，因河南、陝

西、山西等省尙參用日本火柴，所用中国火柴仅得其半数。^①

(效彭：“武汉自办工业之状况”，中华实业界10期，1914年10月出版)

二 既济水电公司

創立：汉口商办既济水电公司于光緒34年由宋偉臣創立，其位置在大王庙，事务所在太平路水塔桥口。初由兩湖总督出官銀30万元，后又从事募集，逐年增資，从日本兴业銀行借850万元，今改为股份公司，每股10元，約有500万元。專營水电之业，自来水已遍設于中国街市，漸及英俄兩界，今夏預备推及德日租界。电灯則專設于中国街市，共有16燭光25,000个。供給材料者为科苦公司制品，原动馬力为75馬力，机械之数为水管式汽罐2台，排水机2台，发电机3台，其汲水力，一時間36万瓦，一日之貯水量50万格罗，每人用水費每月約0.2元。內有美国技师1名，中国職員6人，职工55人，电綫延長共有157,406碼。其主要職員：宋偉臣为总办，王海帆为副办。

(效彭：“武汉自办工业之状况”，中华实业界第10期，1914年10月出版)

1930年情况：該公司，系于前清光緒32年6月，呈准兩湖总督張之洞开办。电厂設于大王庙河边，水厂則在韓家墩。至33年9月，水电兩厂，相繼竣工，开始营业。34年呈請农商部注册立案，并准独营。該公司原定股本300万元，作为30万股，每股10元。嗣因营业推广，于宣統元年扩充資本为500万元，实招足洋3,465,940元。至民国12年将該公司历年盈余利益，合成1,534,060元，分給各股东，即以紅利为股本，填給股票，合成500万元之数。电厂一部約估值为250万元，历年来营业发达，电汽容量，增加不少，机件依量添置。最近股东會議議決再添置6千基罗瓦特容量。21年冬季即可发电。

电厂內部設備情形，除新訂之6千基罗瓦特发电机及鍋爐外，原有机器，分述如下：水管式鍋爐8座，計B.&W.公司制造者6座、400匹馬力者4座、750匹馬力者2座、Stirling公司制造者2座，每座500

① 据日本东亚同文会編之“中华民国实业名鑑”所載，燮昌火柴厂于1931年2月为大中华火柴公司收买。

匹馬力。汽輪發電機，Brown Boveri公司製造者2座各3千基羅瓦特，General Electric公司製造3座各1,500基羅瓦特，容量共計10,500基羅瓦特。

既濟廠兼營水電，其總資本額為500萬元，電廠資本假定為250萬元。負債資產各科目，水電混合，頗難分析。據該廠19年份全年經濟報告，其電廠方面之固定資產，約500萬元，除股本250萬元外，以用戶保證金及借款墊足。現有借款，共約200萬元。本年添加機量6千基羅瓦特所費當在200萬元左右似有急行添招股資，或發行公司債券之必要。19年全年收入為263萬元，支出為2,386,000元，相抵尚余24萬餘元，足付官利（計20萬元）之用。惟支出方面，未將折舊扣除，而借款利息一項計60萬餘元，捐稅一項計31萬餘元，呆賬一項計17萬元，公司純利之減少原因，或在於此。

該廠19年全年發電為39,963,690度，最高負荷為10,200基羅瓦特，每度發電成本為6分4厘，耗煤2.92磅（煤價每噸平均18.3元）。電燈價每度0.22元，電力每度售價洋0.12元。包燈計分2種，25瓦特者每月每盞洋3元，50瓦特者每月每盞洋6元。電燈用戶21,394家，全年用電11,168,390度，收費2,239,321元。包燈用戶1,640家，計5,801盞，收費105,586元。電力用戶291戶，接用馬力計2,401匹，全年用電1,093,397度，收費112,347元。此外電廠自用2,555,000度，水廠用電7,907,378度，均未計價。19年全年統計竊電及路線損失甚大，占55%，其配電制度實有改良之必要。19年份查獲竊電案件達3千餘戶，凡與廣州市情形相同，殊可驚駭也。

（摘自國民黨建設委員會編：“中國各大電廠紀要”81—85頁1931年出版）

借日債經過：漢口既濟水電公司營業已歷10年，外表頗呈日臻發達之象，依公司法律，每年應開股東常會，遇有重大問題並須開特別會。惟該公司則僅於每屆發息時給予股東營業賬略一紙，是以局外人多不明其內容。辛亥漢口戰事，該公司營業本大受損失，電綫水管多半毀壞。次年，該公司總理宋偉臣遂以全部產業抵借日本興業會社日金150萬元，以資整理，當時股東以未征求同意曾表示反對。宋以稟准

財政部立案為詞，實則系借款稟由財政部作擔保也。水電公司本為一特種商業，為保全借外債之信用計，其擔保本應由農商部負責，乃由財政部越俎代謀，箇中原因已費入案解。近聞宋偉臣又稟請財部以擴充水電營業，添置新機等項需款續向興業會社籌措日金100萬元，援案懇請擔保，并謂該公司新舊產業共值590萬元，以之抵借新款日金100萬，舊款150萬，比債額盈一倍有餘。財政總長陳蘭生以此借款由部擔保，負責甚重，究竟該公司產業是否足值此數，以及現今與將來營業狀況何如，非先行查明未便率准，特令行湖北財政廳長張壽鏞詳細調查呈復以憑核辦。張廳長遵令派員至該公司調查清楚復部云：該公司所有產業與稟請部清單符合，實值銀490萬，加以此次新借款添置之機器共計590萬，以後地方如果安靖，營業確有把握，借款本息不難到期清償，此呈到部，該公司借款必可簽印成交，惟漢口股東聞知此事，以該公司營業既日形發展，擴充基金即漢口難期招足盡可于他埠募集，何必借貸日債授權外人，且此事關係至巨，又不聞召集股東會議議決，僅由該總理與三數董事擅自定約，水電為民生日用必需，豈可抵押外人致生流弊，刻正聯合紳商共籌阻止。

(1916年12月22日上海申報)

三 燉昌硝碱厂

該厂為宋偉臣、吳蘊初于1921年共同合辦，地點在漢口，吳蘊初擔任技術，實際出資人為宋偉臣。專制鉀綠養三。初時資本為2萬元。

附：叶澄衷略歷

叶氏名成忠，字澄衷。先世居浙東之慈谿縣。后迁鎮海沈郎橋，遂家居焉^①。其先業農。6歲孤。兄弟3人，成忠居仲。9歲，就塾師讀，未半年，以貧故輟業。11歲，佣于油坊，主婦遇之無狀，怒去之家。鄉人倪姓見而憐之，允挈往上海，需齋斧錢2千，母洪氏指秋禾為質，得成行，遂荐至法租界雜貨肆中習業，居3年。肆主頗不治事，

^① 摘自清朝野史大觀卷8，1915年中華書局版。

去^①。时上海海禁大开，帆船輪船麇集于滬濱，成忠自黎明至暮，掉一扁舟往来江中，就番舶以質有无。外人見其誠篤敦謹，亦乐与交易，故常获利独厚。同治元年，始設肆于虹口，初肆規甚微，然节飲食，忍嗜欲，与佣妇同苦乐，又能擇人而任事，故数年間肆业日益远大，乃推广分肆，殆遍通商各埠，又在滬北汉口創設繅絲厂（厂名綸华絲厂創于1895年——編者），火柴厂（名燮昌火柴厂），光緒己亥年（1899）10月在滬病歿，卒年60^②。

① 摘自商业杂志2卷3号，1927年3月出版。

② 摘自清朝野史大觀卷8，1915年中华书局版。

永安公司的事业系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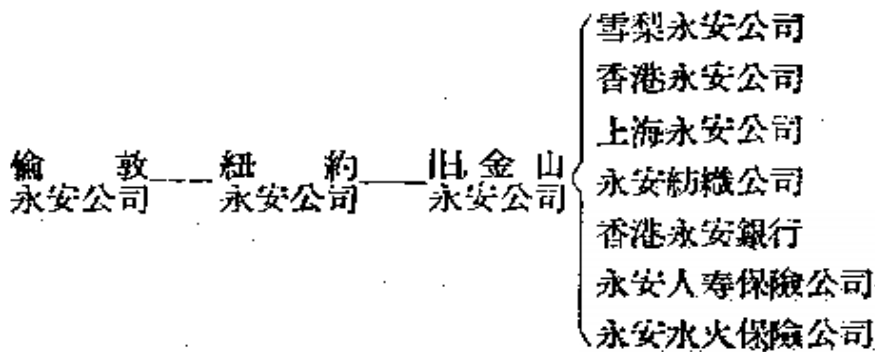
一 永安事業系統

永安公司的事业系統，性質上有若干点与申新相象：申新是荣宗敬、荣德生兩弟兄創辦，而永安是由郭乐、郭順兩弟兄創辦；申新是从面粉工业发軔投資到紡織工业，而永安則从百貨商业开始投資于紡織工业。不过申新是純粹由国内金融商业萌芽而崛起的民族工业資本，而永安則是由华侨海外經商发达而投資于祖国的工业。在組織上，申新是股份无限公司（有几个厂是合伙或独资），永安則是股份有限公司，永安是中央集权制，申新是各厂分权制，所以虽然郭家对于永安的控制或許比荣家对于申新的控制更有力，但在企业的組織和經營管理方面，永安还是比申新来得进步和現代化。

永安事业的創辦人是郭乐先生，郭是广东中山县人，現年75岁，早岁赴澳洲雪梨埠謀生，創立永安商店，營業日趋发达，嗣后昆仲相繼前往，亦进該店服务，旋为发展业务，又回国先后招股，設立香港永安百貨公司，民国10年又在滬創立永安紡織公司，都由郭乐任董事長兼总监督。其介弟郭順先生，現年64岁，早岁亦往澳洲，追隨乃兄从商，一面讀書，一面做工，后返国襄助乃兄，專心办理永安紗厂。他在租界时代曾任上海工部局华董，現（指1948年）任上海永安公司常务董事，永安紗厂總經理，第六区棉紡織工业同业公会理事長，抗战胜利后，即赴美国。

在郭家主持下，永安集团的範圍，遍及国内海外，工商貿易金融各业，茲將永安各公司列表述后：

永安公司事业系統表



以上各个公司，股東多數相同，主要的股權當然操于郭氏家族之手，所以總監督都是郭樂先生，各公司的主持人也全部是郭家，例如上海永安公司的總經理郭琳爽，永安紡織公司的副總經理郭棣活，都是郭樂、郭順先生的令侄，永安紗廠各廠的廠長，永安公司各部的部長，几全部都是郭姓。因此各个公司之間，联系異常緊密，有困難時大家團結互助，資金亦可互相融通，所以永安公司和永安紗廠平常依賴銀行借款處甚少。

永安倫敦分公司是民國22年設立的，當時業務主要是代香港及上海永安公司採辦貨物，同時將一部分中國出品輸往英國，民國28年郭樂赴美，又先后在舊金山和紐約設立分公司，當時國內外匯率順利于出口，即將國貨大批運銷美國，同時採辦美貨供永安公司銷售，所以永安公司的英美百貨，較其他任何公司豐富俱全，營業及獲利額，也在各大公司以上。

永安創立迄今已有30多年歷史，在這30多年中，不論在百貨業或紡織業方面，都已奠定穩固的基礎，獲得優良的成績。研討其所以臻此的原因，有下列各點：第一是聯號的互相協助，如永安紗廠是雪梨和上海永安公司投資創設的，在國內紡織業不景氣，處境最困苦時，永安紗廠靠着聯號的幫忙，調劑資金，非但安渡難關，并在營業稍有轉機時，即收買其他負債過巨，無法支持的紗廠，永安二廠、三廠、五廠都是在这种情形下擴充的。第二是組織的健全，永安虽然是股分有限公司的組織，但實權都操在郭家之手，郭家又以郭樂為重心，弟

兒子侄分別掌握各部門的業務，團結而無內爭，因此可專心一志於事業之發展，不受人事摩擦的牽掣，在組織系統上，永安中央集權制和又分門負責制，如永安紗廠在總經理副總經理之下，又分設業務經理和廠務經理，業務經理負責總務運銷、營業、會計、股務、秘書等工作，廠務經理則專管各廠的製造業務，此外印染廠又另設印染經理。各廠則設廠長、參事（等於副廠長的職位）、和总工程师，職權劃分清楚，效率當然也能發揮。第三是經營管理的科學化，永安的重要職員雖大部是郭家的人，但他們對於事業都很認真，對管理和技術也很重視，因為郭家的子弟大都留學國外，所以管理經營方式，頗受英美企業的影響，永安紗廠和永安公司職員的待遇一般都比同業為優，工作效率也較其他同業為高，這是永安成功的因素之一。

（摘自青波：“永安公司與郭氏家族”紡織周刊9卷4期57—58頁）

二 永安紡織公司及其所屬各廠概況

永安紡織公司系由華僑郭樂郭順諸氏所發起，創立於民國10年6月，其初資本為600萬元，民國19年增為1,200萬元，民國31年增為6,000萬元，翌年復增為12,000萬元，民國35年增為12萬萬元，36年7月增為600萬萬元。20餘年來極力經營，漸次擴充，先後設立第一、二、三、四、五廠及印染廠，自紡自織自染。現有紗錠錠24萬枚，布機1,540台，漂染整理機械236台。二廠則自建發電廠，自行發電，備有發電機四部，鍋爐兩座。地產計576畝，房屋面積300萬平方英尺。另有總倉庫一座，計體積250萬立方英尺。

八年抗戰，永安紡織公司除第三廠外，其餘各廠相繼淪陷。房屋機器遭受損毀，花紗布匹以及各項物料喪失一空。其損害之巨，直難數計。勝利以還，各廠漸次復工，修理廠房，添配機件，購置物料，經兩年之努力，其生產能力已達戰前之水準。并向外國添購最新式紗錠布機鍋爐發電機等，約值美金數百萬元，作為增加生產及改良成品之工具。現在該公司之負責人為：

董事長郭樂，總經理郭順，副總經理郭棣活，經理李孝植、郭植

芳、郭棣超，第一厂厂长郭植芳，第二、四厂厂长郭焯鋸，第三厂厂长郭兆常，第五厂厂长彭順，印染厂厂长郭焯民。

共有职员480人，男女工友8,200余人，月产棉纱5,900包，棉布48,000匹，色布3万匹。

(1) 永安紡織第一廠

永安第一紡織厂，位于楊树浦西湖路，系澳洲华侨郭乐郭順梁創諸君所发起，籌备于民国9年冬，資本征募初期本定国币300万元，而后因投資者踴跃，認股增至600万元，10年6月开創立会，隨即勘定厂基，鳩工建筑。11年夏厂屋机器均次第完成。随于9月試車，10月呈請农商部注册，13年11月正式开幕，其时首任經理兼厂长为梁創君，首任总工程师为駱乾伯君，駱君留英，攻讀机械工程，嗣因駱君調任二厂工程师，一厂工务由雷炳林先生主其事。雷君留美，曾任南通紡織学院教授。16年夏厂經理梁創君謝世，由郭益文君繼任厂长。郭君南通紡織学院毕业与雷工程师誼屬师生，通力合作，厂务蒸蒸日上。不意26年秋又值中日战乱，該厂陷于战区，厂务停頓者3年，頗受損失。抗战前共有紗錠44,160枚，纜錠4,000枚，布机1,200台，工人約計3千人，其設備之完善，規模之宏大，誠紡織业后起之秀也。

一厂由于淪陷时，为日軍所占用，改为日本陸軍野战病院，經數年之劫夺，凌亂不堪。迨31年冬季始发还，收復点收时，布机全部拆卸，堆置一隅，如一堆廢鉄，至倉庫及办公室物料房內所存貨物、用具等，均遭日人运走，只剩空樓几座而已，幸紗厂全部机器，尙称完好，現在運轉紗錠有40,160枚，纜錠2千枚，日夜工作，生产甚佳。至布机由凌亂堆中，重行裝配，頗費心血，最近又添購丰田式自动織机50台，全部生产者，共計有1,300台，尙有一部旧机，在整理裝配中，一俟裝竣，可得布机1,500台，其他另有刮絨机3台亦在整理中，紗支以20支金城为最著名，布匹以12磅大鵬細布銷路最广。

一厂設備战前之破坏者，經修理完好外，战后之新建設，計有三层鋼骨水泥大厦一所，工人飯堂3所，职工消費合作社，哺乳室，医药

室各1所。

一厂現有男工 517 人，女工 1,928 人，共計在籍工人 2,445 人，每月生产 20 支棉紗約 2 千件。12 磅平布，約 57,000 匹。

(2) 永安紡織第二、四廠

永安第二、四厂地址吳淞蘊藻濱，二厂毗連，同屬一个單位，第二厂原为聶云台創辦之大中華紡織公司，有紗錠 3 万枚，因連年亏蝕，負債巨重，抵押于銀团，民国 13 年由永安將其全部基地房屋机器收买，改組为永安第二厂，接办后不久市面好轉，營業即有起色。后又添置紗錠 2 万枚，民国 18 年，在工厂旁空地自建新厂房，定名第四厂，有紗錠 7 万枚，故滬战前二、四厂共有紗錠 12 万枚，滬战中二厂机器大部被战火燒毀，一部被日人搬遷，厂房幸未毀損，胜利后工厂厂房又被空軍部队占置器材，底层部分迄未迁出，乃將工厂剩余紗錠約 2 万合并于四厂，連同四厂机錠現共有紗錠 89,304 枚，綫錠 29,200 枚，发电机 4 部，发电容量共 7,100 瓩，現仅发电 3,600 瓩，紗錠开足 85,000 枚，綫錠开足 2 万枚。

第二、四厂厂长焯錕，总工程师陈守一，有职员 81 人，工人 2,100 人，厂房后尚有空地兩方，拟添建布厂，已訂購自动織机 1,000 台。

(3) 永安紡織第三廠

永安第三厂在淮安路 491 号，原系鴻裕紗厂，永安于 17 年購梁，改为第三厂，有紗錠 5 万余枚，布机 200 余台，抗战时永安一厂二厂四厂均陷入战区，被逼停工，独三厂因地处租界之内，幸未遭蹂躪，繼續从事生产，30 年太平洋战起，工厂亦曾一度停頓，但不久仍恢复开工，現有紗錠 52,828 枚，布机 244 台，并附設机器厂一間，修配制造本厂紡織机械零件，三厂現任厂长郭兆常。

(4) 永安紡織第五廠

永安第五厂在楊树浦平涼路 545 号，原系緯通合記紡織公司，民

國 21 年永安投資該廠，與陳鯉庭合資經營，惟內部管理經營均由永安負責，民國 35 年永安又出資購買，改為第五廠，現有紗錠 32,256 枚，廠長彭順。

(5) 永安印染廠

永安紡織公司因鑒於僅有紡織二部而無印染加工設備，並非完備之紡織工業，乃於民國 23 年在第一廠後面建造廠房，添設印染廠，所有漂染機器均向英國各廠定購，式樣最新，惟正在裝置過程中，“八一三”滬戰即爆發，致該廠未能充分發揮效能，戰事中一廠雖被日人占領，印染廠機器幸無重大損失，勝利後即逐漸整理恢復，36 年始局部開工，現有漂染整理機器 236 台，每日產量約 3 千匹。廠長郭焯民。

(6) 永安紡織公司在抗戰中的損失

紗廠原為我國民族工業之一，其資金總額固相當龐大，即技術方面，亦年有改良，以故錠子逐年增加，出品暢銷全國及南洋群島一帶，在戰前，已堪與日寇并駕齊驅，爭一雄長，故日寇恒視之如眼中釘，時思摧殘以為快。21 年“一二八”之戰，其導火綫，亦由於紗廠，由三友實業社竹籬畔之小火，其結果竟引起日寇第一次犯滬之戰爭。是後也，吳淞永安第二紗廠以位在戰區蘊藻濱一帶，備受敵艦之轟擊，損失頗重。事後經慎昌洋行之估計，計為規元 1 百餘萬兩，此僅指房屋，機器，及電料三項而言。至於廠中之物料及原料，既在制品，半制品等，尚不在內。戰後，經五載之努力，甫將全廠修復，不料該廠又遇“八一三”第二次戰爭，其後，淞滬再陷，二、四兩廠，備受敵兵蹂躪。即一、五兩廠，亦飽受摧殘，甚且霸產經營，直至日寇投降，方將物歸原主，從事修理。兩載以還，以各廠陸續付出之修繕費用，計開：

- 一廠為國幣 160 餘億元，
- 二廠為國幣 37 億 2 千萬元，
- 三廠為國幣 40 億，
- 五廠為國幣 12 億。

截至近月为止，合計支出已逾250亿元，此后添新补旧，亦需修復費用仍多。一公司如此，其他同业，亦大略相同，足見敌方昔日予我損害之巨矣。

(摘自1948年1月出版紡織周刊9卷4期：“永安紡織公司概況”，山禾：“永安各厂概況”)

三 郭爽琳談永安系統企業的歷史情況

我是永安公司的資本家。我的上一輩在国外經商，同其他僑胞一样，受到了帝国主义的种族歧視，当时滿怀着振兴实业，挽回利权的心情，盼望祖国的强盛。1918年在上海開設了永安公司，1921年創辦了永安紗厂，就妄想“实业救国”了。到底成不成呢？乾脆地說：不成的。在旧中国的民族工商业，遭受到帝国主义、官僚資本主义的摧殘和压迫，要想“实业救国”是絕對不可能的。

比如，我們永安企业，在6年以前30年过程中，是处在既貧困，又落后的半殖民地的国家里，經歷着慘痛的命运。

永安紗厂，在1929年和1936年先后遭受到英国、日本棉紗傾銷我們市場和資本主义国家发生經濟危机的影响，面临崩潰的边緣。在抗战时期，永安紗厂所受到的机器、物料、紗錠的破坏，加上日本侵略者盜窃了棉花、棉紗、布匹等，損失值計人民币2,000万元以上。

永安公司过去長期地推銷外国貨，助長了外国貨的傾銷。这不但不能挽回利权，相反的，利权外溢了，还打击了祖国的工业生产，危害了人民的利益，与我們“实业救国”的宗旨，背道而馳了。

我們新建的永安大楼，原来計劃是开国貨商場的，因为遭受到美国剩余物資的傾銷，把国貨压倒，計劃也无法实现。我們所經營的除百貨商場之外，还有酒樓、茶室、咖啡室、旅館、戏院、彈子房、跳舞厅、溜冰場、游乐場等等，完全是为了享乐至上的寄生階級而服务的，而且在那紙醉金迷灯光酒影之下，不知腐蝕了多少男女青年。

在旧上海大馬路上的四大公司，都是我的同乡和亲戚所开的（先施公司經理是我的連襟，大新公司經理是我的妹夫，新新公司經理是

同乡),但因为同行关系,在見面的时候,大家只談談客套,敷衍敷衍。背地里派人去暗中調查商品价錢,互相削价傾銷,他們卖一块錢,我們卖9毫錢;并且用大減价,大賤卖的号召,爭夺营业。还僱用女銷貨員。我們的“康克令皇后”就曾轟動一时。此外在每年大年夜那一天,我們还随时可以解雇职工,职工的職員是沒有保障的。这一套腐朽落后的經營方式,是用来达到自己唯利是图、自私自利的目的的。

过去,我們把永安公司、永安紗厂的股票在証券交易所流通,买进卖出,企图通过投机,賺些鈔票。但是被官僚資本操縱了,一时漲停板,一时跌停板,我們自己也控制不住,真是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米,賺錢的希望落空了。

永安公司在敌伪时期,遭受到很大的損失。日本宪兵搶去棉布1,600匹,肥皂兩千箱不算,还制造恐怖,在公司屋頂花园花盆里放置了好几顆炸彈,突然爆炸,立刻把我們公司封鎖了24天,使我們不能营业。这个損失是无从估計的。在封鎖时期,我夫妻兩人,住在永安大楼,不能自由,提心吊胆,我們的生命也是很危險的。

在反动派統治时期,由于伪金圓券的貶值,我們的商品被掠奪一空,損失严重,总值等于4万兩黃金之多,伤尽了我們公司的元气。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我們以为日本不敢同美国作战,所以为了防止日本侵占企业,曾向美国注册,冀望保护。但是在上海淪陷的时候,正因为挂了美商招牌,反而被日本侵略者派駐了監督官,管理企业,把我們公司的全部現金,搬到台灣銀行去,我們要支付一块錢,也要經過日本監督官盖章批准。

我批判一下:为了追求厚利,我們的爱国热情都消失了。为了追求厚利,連自己的亲戚都无情了;为了追求厚利,做出虛伪号召,混水摸魚;为了追求厚利,不顧妨碍风化,侮辱女性;为了追求厚利,不管职工死活,造成失业。这完全暴露了資本主义制度的腐朽和資本家剝削的本质。这些可耻的行为,今天是行不通了。

(摘自郭奕琳在上海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會議上的发言1955年12月27日上海新聞日报)

盧作孚和民生实业公司

一 盧氏略歷和民生公司的發展歷史

民生公司，这一个川江航业的牌坊，曾有过它的黄金时代。20年前它能插足于長江各口岸，不但不会被外輪淘汰，反而一天天有長足的进步。这一企业是与盧作孚有密切关系的。

盧作孚由于創辦民生公司而出名的，他一生的經歷是极复杂的。沒有出洋留学，沒有进过洋学校，只在四川合川的瑞山書院讀过書。他的科学知識完全是自修得来的。他甚至学到能看英文，能講英語。他曾經当过中学教員，教过数学，担任过四川誠报的主笔。五四时代，曾参加少年中国学会，在楊森的防区瀘县担任永宁示范区的督学，在已故刘湘的防区担任过民教館的館長，但他对于航业特別有兴趣。民国15年以前，外商輪船借軍閥混战，中国輪船不敢入川江的当兒，長驅直入，操縱了內河的航业。在这种情况下，盧作孚在合川发起組織民生公司，最初股份虽有5万元，但实收仅得8千，于是不得不湊借資本，在上海合兴厂造一艘民生輪。盧作孚氏自备旅費赴滬，接这只船回来^①。

在民国15年当嘉陵江水碧綠的秋天，民生公司第一艘新船——民生輪便由滬开进川来。这只75呎長14呎寬，5尺深的淺水輪，裝了德国的90匹馬力的柴油引擎，航行于渝市合川之間，民生公司就靠这

^① 据1944年11月新商业一卷一期孔祥光的“民生实业公司案攝說：民生輪船，民國15年夏季船已完工，而5万元的股款仅收到8千余元。上海的造船厂須付錢后交貨，股東們对于航业的信心，由于现实的蕭条与各輪船公司的失敗，故不甚堅強，非要看一看輪船后交股款。結果據說盧作孚氏，借貨了合川民众教育館的經費，才算把“民生”駛入川江，航行于重庆合川間。

一只船和一条航綫来开展它的事业。

当时，北碚一带土匪横行，而該地又为盧氏家族住地，盧担任北碚峡防局局长，致力于三峡治安。这样使别的船只不敢行的地方，民生輪竟能安然通行。民国18年民生公司的輪船已增加3只，从渝合綫扩展到渝涪綫。民国20年，民生公司从合川移到重庆来。盧氏获得了刘湘的賞識任川江航务局长，从此盧氏在政界中更是一帆风顺了。民国24年做了四川建設厅厅长（在任一年），七七事变后做了交通部次長，在职先后5年，中間兼任全国粮食管理局局长1年。在办实业方面，盧作孚是有一套办法的，这表现于：

第一，他对于公司的管理和人事上，的确用了不少工夫，他着重船長的訓練，取消买办制度，采用了集中管理，又确立了船中的人事、物料、收支等管理法。在表面上，他提出了許許多多漂亮口号，高呼“公司的困难职工来解决，职工的困难公司来解决”在这些口号之下，不少有为的四川青年就跑进民生公司，为民生公司流汗流血了。但盧作孚却是非常自私的，他要职工們尽心尽力为公司服务，而对于职工的生活，却不給予适当的照顧。在物价高涨的时候，民生公司的职工所得的薪水是低到养不活家的。所謂“服务高于一切”的口号完全在对民生公司的职工开玩笑。

第二，他对于資力薄弱的輪船公司，完全采用大魚吃小魚的办法，靠着四川軍閥的势力吞并了四川各輪船公司的船只。民国20年，他合并了7个公司，接收了11只船；民国21年他整理重庆宜昌間的航业，合并了4个中国輪船公司，1个英国輪船公司，接收了7只船，并伸展了航綫到上海；民国22年，又接收了3只輪船，合并了3个中国輪船公司，購了1只太古船，1只美孚船；民国24年接收了美籍捷江公司的5只輪船，在5年之中总共合并了15个輪船公司，接收了42只船。航綫已扩展到9綫，总吨位24,000吨。民国25年，上海各造船厂造船的数目，它占了第一位。

第三，他投資于各工业部門，企图借此来支持民生公司，便利民生公司的发展，这表现于独資创办江北民生机器厂、合川水电厂、三

峽染織廠，抗戰后又投資于遷川工廠的大鑫鋼鐵廠、周恒順機器廠、三峽染織廠則與大成紡織廠合作改名“大明”，成為後方最大布廠之一。此外如天府煤礦公司、華英煤礦公司、富源水電公司、長安保險公司、嘉陽煤礦、江合煤礦等10余家工廠，亦都有民生公司的投資。

為了資金的周轉與企業的發展，民生公司成立不久，盧作孚便找到了政學系的大本營——金城銀行，作為大股東，利用金城的資本，政學系的經濟勢力來鞏固民生公司的基礎。從此以後民生公司就落入政學系的手里，民生公司所經營的一些單位都有著金城的股份了。

民國24年秋天，盧作孚代表民生公司，范旭東代表永利化學公司，對加拿大借款各1,500萬美元，這筆款子必須經過政府的擔保才能到手，當時的行政院長宋子文與政學系有著很深的矛盾。因此使盧作孚與范旭東都碰了一鼻子灰，范旭東為此而急得病死了；政學系的張群乘機活動；這筆借款才能成功。民生公司因此發了一筆洋財。當時是以法幣20元折合美金1元的官價匯率來計算，而且沒有利息，訂10年還清。

為什麼加拿大政府這樣慷慨呢？因為加政府想投資四川水利。這筆借款就是它進四川的釣餌。

民生公司也有過光榮的史迹，那就是在抗戰初期，為了協助工廠遷建，民生公司不但在敵機轟炸下犧牲了一部份船隻，而且犧牲了許多職工的生命。截至民國32年年底止，民生公司協助蔣政府搶運60多萬噸的軍需物資。可惜的是這些物資並沒有拿去抗戰，卻留在後來打內戰！

民生公司雖創立龐大的事業，但從民國28年以後便逐漸走向下坡路，拖延到勝利前後已經奄奄一息了。因為在戰時物價飛漲，燃料被統制，還有航運限價的不合理，使民生公司年年負債，下表便是它每年的債務數：

年 期	債 款	年 期	債 款
民國28年	438,267元	民國32年	8,250,497元
民國29年	519,221元	民國33年5月	180,000,000元
民國30年	1,258,647元	民國34年	(未詳)
民國31年	2,822,477元	民國35年	13,500,000,000元

在物价飞漲中，民生公司的債務更增加了。因为收入是不敷支出的。像上海的分公司有10只輪船，35年1月总計收入8万万余元，仅薪津一項的支出就要5万万元，剩下来的不够煤油兩次开支，照35年1月計算，上海10只船，修理費就得付出10几万万元，因此每月負債数万万元。

国民党打內战的軍运，給予民生公司以莫大的打击。民生公司80--90只船中有60%是被南京政府扣去运输兵士和軍粮，进行打內战的，平均每天有10几艘輪船应差，35年軍差的輪船費与成本相較，損失达63亿余元。

(摘自怀庶：“中国經濟内幕”40—45頁)

民生公司是在1926年成立的，股本只有5万元，从一条57呎長，14呎寬，90匹馬力的“民生”小船起家，專营重庆到合川的短航客运。那时川江航业，已由极盛而进入了衰微时期，若干中国公司在外国輪船公司排挤下，均陷于負債累累，轉向卖船的紊乱危殆局面，而民生公司在同样环境下，竟能渡过困难，并不断地发展，为时不久，就成为川江首屈一指的輪船公司，在長江也仅次于招商局，其主要原因何在呢？

一、自公司創辦起，一直是依靠封建势力、軍閥維護，利用职权、勾結官僚起家的。首先壟断航綫，由重庆至合川、至涪陵是民生公司專航的，其他輪船不許参与，这样来取得高额的利潤。

二、采用資本主义經營方式，攏絡高級職員，剝削一般职工，并更进一步施用麻醉欺騙手段，喊出所謂“服务社会，便利人群”、“职工困难、公司解决，公司困难、职工解决”，甚至“个人的工作是超报酬的，事业的任务是超利益的”等荒謬口号，使一般青年职工蒙受欺騙，从

而达到以低工資剝削剩余劳动价值，扩大牟利的目的。但是事实上曾經替軍閥包运鴉片、軍火，难道这是符合所謂“服务社会，便利人群”嗎？在与外国輪船公司竞争的时候，职工倒是替公司解决了問題，而公司的回答是：一遇业务困难，便是裁員减薪，职工福利仅是一个好听名詞，只是极少数总經理所滿意的人所享受的，何尝真正解决过职工的問題呢！归根到底，仍是資本主义的本質，唯利是图，只顧自己的擴張，不顧危害社会利益，也不顧职工的死活。

三、利用时机，乘人之危，吞并同业。民生公司的經營方法，在川江干綫上利用了地方政治力量来壟断大宗貨源，对食鹽、食糖压低运价，并改善設備来抵制外商。在抵制外商这方面来看，應該說是做得不錯的，但同时用这一套来与同业竞争，以致若干小公司在外商輪船的侵略与民生公司强大势力压迫下，紛紛倒閉。在这时候，民生公司反以伪善的面貌出現，来替債权債務人解决問題，乘机收購船舶，并不惜以卑劣的手段拉攏分化債权債務当中的人，仅仅以少許的現金与大部份的股票来达到收購的目的。更可耻的是在抗日战争中，把逃难到川江的小輪船，乘人之危，一个一个的吃掉了。

四、勾結官僚資本，倚靠伪政权的庇护。为了滿足收买和建造更多的船舶，就必须取得更多利率低的資金，办法是通过伪中国銀行總裁張公权，以及和伪財政部的关系，发行兩次公司債，第一次是100万元，第二次是8,000万元。同时为了取得其他特殊利益，进而拉攏伪政府要人乃至宋子文等入股、当董事，进而建立关系，来达到勾結的目的，以便大发国难財。在抗战时期及胜利初期，軍事物資运输頻繁，为了邀好伪政府，以最低运价承运，運費仅及当时外商公司1/10，又儲备燃料，五金及运输亏损，向伪政府申請外汇，申請補貼，借以达到扩充資产的目的。另外，借口在抗战期間船舶損失太多，无偿取得中型登陆艇6只。这些都是一般民营輪船公司不可能得到的好处，因为他們勾結官僚的技巧不如民生，所以他們就得不到这些好处。这段時間，由于民生公司的股票升值和不断的增新股，資本总额已达伪法币8,000万元，后来又升值到100亿元。当时民生公司拥有江海

輪船 136 艘，載重 3,700 余噸，有吞吐量 4 萬余噸的港務設備，還有附屬事業機器廠、電水廠、印刷廠等等。它的實力與聲勢，在航業界僅僅次于抗日勝利後宋子文所把持的官僚資本招商局，並且從它投資到煤礦、鋼鐵、木材、機器、水泥、貿易、保險以及新聞等等企業看，投資範圍之廣，戶數之多，也足以證明它為了達到壟斷的野心，已經走向資本主義托辣斯發展的道路。本來，這樣有利的事業，官僚資本是十分注意的，並用盡方法來想把它吃掉。民生公司為了維持性命，就不得不用盡心機來對付，有時利用宋子文來對付孔祥熙，又有時利用孔祥熙對付宋子文，有時則利用政學系對付孔宋，可以說，經常是在恐怖中過日子。為了不甘心被官僚資本吃掉，最後就利用帝國主義資本作護身符。在 1945 年，盡量在美國活動資本，企圖勾結美國造船大王凱撒到中國來合辦船廠，並通過反動政府、中國銀行擔保，向加拿大借款加幣 1,200 多萬元，在加拿大建造一批新船，來壯大自己力量，來對抗官僚資本勢力的侵吞。但它帶上了這個美金借款的枷鎖以後，在業務上更加遭受官僚資本招商局的排擠；反動政府又和美帝國主義簽訂了所謂“中美通商航海互助條約”，只許美國海船裝運秦皇島的煤，使得沿海華商輪船無貨可運。而我們企業內部無計劃地盲目地增加船舶，不切合生產需要，以致機構臃腫，人員冗多，同時制度不合理，管理落后，貪污浪費和海損事故嚴重，開支龐大，生產效率低，因而自 1939 年到 1949 年，除 1947、1948 兩年外，收支都不能平衡，虧損逐年增加，公司經濟情況已陷於非常的嚴重困難境地。在這時的民生公司，業務極端困難，外債 3 個月要付一次息，一年要付一次本，眼看到期還不出，就是企業末日臨頭，悲慘的命運難免。那時真是一天到晚著急，晚上睡不著覺，黑暗的命運正等待著我。

從此可知，中國民族資本家走資本主義道路是沒有前途的。

（童少生：“從腐朽落后垂危的局面得到新生”，
工商界 1955 年第 12 號第 42—43 頁）

二 航运事業的初創和發展

公司經營航業，胚胎于民國13年，是時盧總經理作孚在成都辦通俗教育館，公余之暇，嘗同朋輩討論此問題，并曾正式會議進行辦法。民國14年11月11日于合川縣開始籌備，是時目的，只在辦一航行合渝之小船，與在合川辦一電燈廠，股額定為5萬元，僅收得8千餘元，即到瀘向船廠訂造民生船一只，大僅70噸零耳。當盧總理由渝赴申，隨身所帶旅費200元，亦借自友人；船訂妥後，股本不易收入，各期應交船廠之款，皆系告貸而來，其備極困難之情形，可以想見。

當開始籌備之初，有籌備人，無籌備處。及合川電廠機器回川，始租得合川城內一極小之蔣王廟，前殿作工廠，後殿為公司。15年7月民生輪船冒洪水之險回川，于宜渝間發生危險多次，總經理在船抱與船共存亡之決心，沿途照料引水，卒安抵渝。

當在蓉倡營航業之初，渝合間尙無輪船，及民生回渝，已有小輪多艘，惟皆木壳，且更較小，故民生航行渝合綫後，營業甚佳；時用人亦最省，船上經理除辦船上事務外，到渝并須辦岸上事務。是年11月水枯，民生輪改航渝涪綫（由重慶到涪陵），乃設辦事處于重慶水巷子匯元棧，僅租房間1間，前後兩進；人員則連茶房只三數人耳。在此艱難締造之時，人皆有事業無權利，總經理月薪30元，協理月薪15元，辦事處主任及船上經理月薪皆10元，董事監察與車馬費皆4元，而又須實際辦事。一群事業上良友，絕不畏事苦，亦絕不計待遇，當時各方面，尤其是政治方面，爭相物色人材，待遇與地位皆較為高，却無一人忍離此事業以去者，此種重事業輕私利之精神，至今成為風氣。

輪船營業以來，收入尙旺，第1年股東分紅即到2分以上，因此人樂投資，16年遂擴充股額為10萬元，是年冬增訂民用小輪船一艘（是年合川電廠亦擴充到80瓩羅瓦特之電力，能開燈4千盞）同時為修理輪船及電廠機器起見，在江北青草壩創辦機械廠，次年冬正式開工。

17年公司投資同鄒東琴、王伯安、譚謙六諸友及璧成組織長江公司，收買順慶輪船1艘，更名長江，同時并交由本公司代辦，自此始有

輪船航行重慶叙府嘉定間(本年又投資5千元于北川鐵路公司),時股本亦增加到15萬元,至19年9月接收長江輪船,更名民望。

(二)整理時期 川江航業,最初供不應求,一時獲得奇特之利益,人目為黃金航綫,遂釀起盲目之競爭。至民國十四五年後,船舶過多,供過於求,演成衰敗景象,重慶上游各輪船公司為救此險象計,協定按照噸位分攤水腳,輪船依輪次開班,常有一兩個月始航行一次者,因此損失不堪,至于不可支持,本公司乃倡人力財力集中,化零為整,合併經營之議,19年10月福川公司首先贊成合力經營,將福全輪船并入本公司,更名民福;次年元旦九江公司繼之,又并入九江合江兩輪及鐵四船一只,輪船更名民治民安,斯3船者,上游之優秀,洪水航行渝叙嘉綫,枯水航行渝萬宜綫,自是本公司始參加重慶下游之航運矣。

事業逐漸擴充,總公司在合川遙治,有鞭長不及之虞,20年元旦遂由合移渝。是年4月并入通江公司船舶通江、青江、岷江,3艘及木質四船1只,輪船更名民有、民享、而折毀岷江;同月又接收蓉江,更名民選;5月接收乘風、定遠,更名民殷、民約;9月接收日籍長天丸,更名民強;10月接收利通,更名民覺;本年10個月間,收并輪船至10只之多,大有將上游航業整理就序之望矣。旋上游局面變易,計劃因以停頓。

重慶下游之航業,亦因盲目競爭之結果,衰敗不減于上游,本公司整理上游時,同時即作整理下游之準備,至21年4月接收涪鄰、福順兩輪,更名民康、民主;7月接收永年,當時系掛意旗,故船名仍舊,後更名民俗;(24年意阿發生戰爭,國際予意以經濟裁制,本公司乃下意旗。)8月接收川江公司產業,蜀享改名民貴;新蜀通僅機器爐子救起于黃浦江中,船壳就江中廉價售去。川江公司,川江航業之鼻祖也,前清光緒末年官商合組而成,時本公司周董事孝懷任四川勸業道,力排眾議,歷盡艱辛,始克成就。開航以後,營業亦佳,惜民國以來,不謀進取,將獨霸川江之好機會空以度過,致使中外航商紛起角逐,僅圖保守者終不能自保,惜哉!

英籍有皮托謙輪船者，為旅宜英人皮托謙君所有，以負債之故，是年（21年）9月將船售與本公司，因船壳太旧，乃拆出其機器建造宜申船民族號；船壳則改作駁子，12月又接收萬安輪，更名民究；是年又接收長寧小船，更名民寧；并租到南通、元通、昭通3輪，自是本公司之航運，插足長江中下段矣。

21年本公司大量接收輪船，為長足之進展，次年仍本一貫政策進行，5月接收涪江、蜀安，更名民法、民意；10月接收衡山，更名民信；而民享因機器船壳皆太旧，本年拆毀，另造新船一艘以代之；旧民享之船壳，改作駁子；機器則击碎，售與鍋廠。本年并接收庆吉，亦因旧坏，將其拆毀。

23年2月接收蜀都，更名民裕；接收鎮江，以船老拆毀；6月接收美川，更名民众，現又更換機器，改名民联，專行申宜綫矣。本年本公司有更值得記述之一事，英籍萬流輪船在長寿县屬之柴盤子沉后，本公司就其現狀，廉價買得，撈救脫險，就民生廠自行改建，將船身接長為219尺11寸，命名民权，本公司撈救大船，此為第一次，在川省建造1千噸以上之輪船，又開一新紀元也。本年又買飛鷹1只，更名民豹；及航行宜申間之意籍光耀輪船1只，于去年年底下旗，更名民泰。

24年內收買輪船較有成績，除2月接收永丰輪船，后更名民夙外，6月12日買美商捷江公司之宜安、宜昌兩船，其泰、宜興、宜江、泄灘、四駁及鐵圍船1只，而捷江大班伙也提私人所有之其春輪，亦同時解決。宜安改名民政、宜昌改名民彝，去年均加以改修，其春命名民鐸，駁子曾暫時命名：宜江改民聚，宜興改民蘇，其泰改民泰，旋均廢去。提出引擎，另造民運、民立，船壳改鐵駁，編列號數。當時議買之初，本系全部，中間以同業爭購，曾一度相持，致太古公司得漁人之利，將精粹之宜丰、宜平、其平三輪選購以去。本年并買嵯峨兵船，將其拆毀。而意籍永游買得，旋即沉沒，是冬向保險行買得，將機器鍋爐撈救脫險，裝入民政；是年又買彝江1只，更名民和，至去年則僅收買常平小輪1艘，更名民庆。

溯本公司之收并輪船也，一方固在集中船舶整個經營，一方尤重在集中人材，通力合作，其嚶嚶求友之情，無時或敢有懈，以此之故，先后并入輪船大小凡數10只，其間除光耀略有誤會，發生爭執，旋即和解外，其他一切均極和諧。

24年冬起，為本公司之造船時期，從前雖間亦造船，但為數殊微不足以代表一個時代也。此造船時期為時1年又數月耳，其所表現者，有去年1年建造大小輪船本、元、康、憲、勤、儉、秉、蘇、熙、運、德、律、視、昕14艘，總計噸數7千5百餘噸，在現有46艘輪船中，占34%以上，此外并改造舊船彝、政、聚、聯4艘及新造油駁4艘，故去年上海各船廠造船總數之和，本公司忝列第一，然而在去年世界造船2,251,200餘噸中，則又丘垤之于泰山，規模雖待擴充，以之修理輪船，則尚勉可供用也。今年為時未久，其正着手規劃建造者，有4百噸載重量之油駁4只，150噸載重量之貨駁4只，150呎長之拖船1只，165呎長之輪船4只，190呎長之輪船1只，280呎長之輪船1只，皆本年下期或明年上期始能航行者。截至現在除正建造尚待命名7艘外，共有輪船46只。

（“民生實業公司11周年紀念刊”第84—89頁，1937年3月出版）

民生公司在抗戰中最艱巨的不是運輸，而是如何準備運輸。在抗戰開始時，民生公司有46只輪船，中有32只都是以柴油為燃料的；江陰封鎖，柴油斷絕了來源，第一大事即為搜求柴油。從香港、廣州，從揚子江沿岸，盡量購買，總共得了4千多噸，但是漢口、宜昌撤退一役即用去了2千多噸。民生公司46只輪船，戰前一半以上在上海修理，五金材料完全取給于上海，一部分外國製造的機器，其配件主要取給于國外；戰爭開始以後，這些完全斷絕了來源，而修理的重担，又須攔上自己的兩肩；搜求五金材料和擴充民生機器廠，就算是第二大事了。從上海、香港、漢口等地盡量購買，得了五金材料2千餘噸，但是漢口撤退的第二年，因為必需改造和建造若干輪船，即使用1千餘噸，公司使用柴油的輪船，如果全部動員，每月即需3百餘噸，宜昌撤退後剩餘之2千噸柴油，只够使用半年，半年之後，只好宣布大部分輪船

停航了，必貽揚子江上游交通運輸，以極大的困難。好在民生公司一向習慣於改造輪船，於是盡量在宜昌及宜昌附近接收揚子江中下游，逃難而無所依歸的輪船，準備將其鍋爐機器及船壳，徹底加以配合及改善，使能勉強航行於揚子江上段。這樣先後接收了輪船60余隻，但可以配合改善，而適用的無多，於是決計訂造以煤為燃料的新船，先後共15隻，和油為燃料的淺水船2隻，以期後方航運絕對健全。

因為有這一些新船和購買而整理的舊船，填補了揚子江上游各長短航綫的需要，原來燒油的輪船，就可以停了大半。而只使用了吃水最淺的燒油的船，節省了大半的油，和必需的自國外所取給的配件。至在漢口宜昌撤退以後，剩下來油和五金材料和配件，不但支持了這幾年的使用，一直到今天，而且還支持了這幾年的虧折，一直到今天。假若沒有當年的若干油、五金材料和配件的準備，而完全靠今天的大量的高價的收購，來供給全部使用，或且無法收購，則其虧折及其航行的困難更不堪言。

民生公司為了戰時的需要，增加輪船最多的時候，為民28年。共有輪船116隻，30,400余噸。那時收購的舊輪，達到了最高額，訂造的新輪，則尚未完成。後來新輪先後17隻，陸續加入航行，並先後購得海關輪船4隻，應共有137隻，36,000余噸。但事實上數目卻降低了，現有輪船為98隻，26,000余噸。其原因：一部分是揚子江中下游的小輪，不適於上游航行。拆卸了20余隻；一部分是揚子江上游，主要的輪船被毀了15隻。這被毀而沉沒的輪船，以施救人員的努力，已救起8隻，且已收復7隻，再加入航行了。還有數隻尚在萬難中施救，或在萬難中掙扎修復，以為今後運輸的準備。

（盧作孚：“民生實業公司如何在戰時服務”新世界月刊1944年6月號）

三 民生實業公司投資事業

本公司投資數額，截至28年底止，共計202萬余元，較27年底投資數額170萬余元計增加30余萬元。投資事業共達25個單位，範圍及於工商兩界。計為：

鋼鐵机械业	76万余(元)	棉織业	22万余
造船业	12万	銀行保險业	9万余
煤矿业	41万余	其他各业	20余万
铁道汽車业	19万余		

以上各业，除与公司业务密切相关者，如鋼鐵机械及煤矿等外，并包括經濟建設之基本工商业。

(摘自董少生：“抗战中之民生实业公司”，
西南实业通訊第2卷2期1940年8月出版)

航业是民生公司的主要事业，但民生公司的事业，究不止于航业，伴随着航业发展的，为其直接經營的机器事业——民生机器厂。战前即随航业逐渐发展到可以胜任46只輪船当中一半較小的輪船的修理，战后更发展到胜任全部輪船的修理，加上新購輪船数十只的整理，再加上新輪十几只的建造。机器和厂方設備数倍扩充，为抵御敌机的侵襲，一方面向地下深入，一方面向周圍疏开，都算在短时期中完成了。現有一半机器在最坚固的石层下面工作，分厂最多的时候有五个，分布在30里的途程間，算是后方最大的一个民間机械工厂，而且是唯一优良的鍋爐制造工厂。在抗战期間造了20几个鍋爐，为了輪船火車发电和煉油用，民生公司間接投資最早的，为与航业有关的煤矿。它协助嘉陵江边几个煤矿，建筑了一条輕便铁路，組織了一个北川铁路公司，并促成了这几个煤矿根本合并起来，組織了一个天府煤矿公司，抗战开始后，又促成这煤矿和铁路与河南的中福公司彻底合作，改組为天府矿业公司，获得了中福公司的机器和材料的帮助，将这矿山完全机器化起来。現在每日产量超过1千吨，每日运量亦超过1千吨，供給战时首都需要燃料1/3以上，也供給民生公司需要燃料1/3以上。战时首都所需的燃料4倍于战前重庆所需的燃料，即是說天府現在的产量已超过了战前重庆需要的总量。它还在积极准备扩充，使产量比現在增加50%，运量比現在增加100%。而这一位主持的人才孙越琦君，同时主持了几个后方重要的煤矿，并主持了中国唯一的甘肃石油矿，成为战时中国的一位煤油大王了。当着我在汉口与孙越琦君商量天府北川与中福彻底合作的时候，不过五分鐘，

即一切決定；不過一星期即調集了兩隻揚子江上游的大輪，運出中福撤退到漢口的全部機器和材料；到達天府以後，不過半年就完成了廠房建築，鐵路改修，地下工程擴充，和機器安裝等工作；可見一切行動是何等的緊張。在漢口撤退之前，有一個從上海搬到漢口而不能再搬的大鑫煉鋼廠，有一個從漢口搬到宜昌，而不能再搬的周恒順機器廠，民生公司各幫助了它一半的資本，促成它們搬到重慶。還有一個常州的大成紡紗廠，僅僅搬出了布機，民生將自有的三峽染織廠提出與它合併，促成它搬到北碚。後來這幾個廠在後方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大鑫名稱變成了渝鑫，是遷川工廠開工最早的一個，主持的余銘鈺君是一位工業上的大膽者，他不但煉鋼；他也冶煉與煉鋼有關的原料如鈔鐵和錳鐵，也製造和煉鋼有關的材料，如火磚和碳精。他作人不肯作的事，為自己造軋鋼機，同時也為其他鋼鐵廠造軋鋼機。周恒順的機器廠名稱，變為恒順機器廠，成為僅次於民生機器廠的一個最大的機器廠，主要製造蒸汽引擎，吸水機，打風機，其數量各以10部計。曾幫助了政府和許多民間事業，也曾幫助了民生公司，主持恒順廠的周茂柏君也兼主持民生機器廠。他的頭腦相當精明，對內對外都多辦法，因此形成了後方機器業當中的一個權威。三峽染織廠的名稱變為大明，完全交由大成紗廠的人經營，是後方一個最大的布廠。自從政府實施管制紗布之後，完全向政府領紗，為政府織布，其幫助亦自然在政府。

（摘自盧作孚：“民生實業公司如何在戰時服務”新世界月刊1944年5月号）

茲將該公司在工業方面的自營和投資主要單位列後：（1）民生機器廠：該廠創始於民14年，至民17年，已有輪船2艘，因感於各輪修理為不可避免之事，而渝埠各廠，又皆規模渺小，且以主權他屬，不能運用自如，乃決自辦一廠，專作修理自有輪船之用。是年7月，設廠於江北縣。當時僅有車床4部，鑽床牛頭鉤床柴油小引擎各1部，工作人員，亦僅十餘人。本公司輪船數量，與年俱增，修理事件，因以日繁，於是機廠之規模，遂有擴大之急需。18年，職工增至20人，19年工作日繁，工人增至50餘人，24年全廠職工已達273人，資產在23年已增至

38萬元^①。

根据新世界1944年5月号“后方最大的机器造船厂——民生机器厂”一文所载，该厂设备由抗战前之26年30几部增加至工作机数百部，该厂设有各种重型母机多部和船塢。又根据西南实业通讯2卷1期周茂柏：“一年来之民生机器厂概述”一文所载，截至1939年11月底止该厂职工人数已增至1,297人，固定资产达111万余元，流动资产已达330余万元。27年7月至9月3个月制造收入仅10万零8千余元，至12月底止制造收入即激增至37万5千余元，計較前3个月增加3倍有奇。

(2)合川电水厂：创办于民15年，初仅装置15匹馬力之臥式柴油机一部，11基罗瓦特之直流发电机一部，开始营业。資本方面由总公司撥基金10万元，至1937年固定资产約10万元，所提各項折旧已近10万元，全厂职工43人，开办之时，电灯仅开半夜，灯費以16支燭光計算，每盞每月1元5角。若以电表計算，則每度3角6分，灯数以50盞为限，后因电量不敷，乃改装蒸汽机发电，灯額增至4千盞，全城遍安街灯，通夜发电。灯費以16支燭光計算，每盞每月1元8角，燭光大者，电費照加，电表每度4角5分。当时因川局系防区制度，合川为武胜、銅梁、大足、璧山等县之政治中心，商业发达，市面熱鬧，电灯营业因之兴盛电費收入最旺时，每月达5,200余元。民国20年以后，防区制打破，合川頓失政治地位，加以天灾人禍，农村破产，城市商业蕭条，电灯营业随之不振。现在灯数約3千盞，每月收入不及4千元，自来水收入，夏季每月約1,200—1,300元，冬季每月約5、6百元。

(見“民生公司11周年紀念刊”第131—132頁)

本厂营业以发电为主，售水次之，碾米則系附屬业务。历年来以居民用电已达相当限度故各項收入，每年均增加无几。但28年5月轟炸后，渝市疏散人口，合川居民驟增，于是用水、用电，及碾米之需要突增。故本厂自创办以来以28年为最发达，統計本年上期电費收入

^① 資料来源見“民生实业公司11周年紀念刊”111—112頁。

30,349元水費收入6,178元余，碾米收入2,832元余。惟收入數字雖較上年增加，開支方面亦復增加不少。下期（同年下半年）電費及水費均按成本略加提高，各項收入乃見增加計電費收入35,600余元，水費收入11,100余元，碾費收入2,800余元，本年獲純益7,900余元。截至28年底止，本廠資產總數為33萬9千余元。

（童少生：“抗戰中之民生實業公司”西南實業通訊2卷2期1940年8月出版）

（3）天府煤礦公司：該礦開采歷史已達百年以上，商辦礦場甚多，但皆用土法開采，運輸不便，不能大量發展。1925年由該區各礦場出資合組川北鐵路公司建築輕便鐵路（民生公司投資于鐵道），1933年沿綫各礦場以資產為股本，加入民生和北川兩公司合組天府煤礦公司，選舉盧作孚為董事長，聘劉宗濤為總工程師兼經理，同年9月改聘邴少琴君為經理，陸續接收各民辦礦場，1938年4月由民生公司與英商中福公司總經理達成協議，由中福以遷川機器折價加入資本。

該礦重要股東為：民生公司、中福公司、趙資生、唐建章、文化成、李仙根、張藝耘等。常董盧作孚、文化成，監察趙資生、唐達章、張麗明，總經理孫越琦。

（1942年國民黨四聯總處工商調查及國民黨經濟部檔案）

（4）三峽染織廠：該廠為三峽團防局組織于民國17年，初為團兵習藝之用。民19年盧作孚任三峽團防局長出川考察時，在上海購置12匹馬力之柴油機二部，三星棉鐵廠之鐵輪機30部、電力機6部、撚紗機2部、導筒機2部、印花機1部、織襪機20部。并派人赴上海學習染織事業，歸來後，于雙十節擴大組織，改名三峽工廠，設門市服裝兩部經營之。當時因鑒于峽區地瘠民貧，謀生不易，乃招收峽區貧民入廠習藝，使有恒業。嗣因中國西部科學院成立，為穩固文化基礎計，乃于1933年5月，將該廠撥歸科學院辦理，不久該廠出品銷場日旺，需要增加，常有供不應求之勢，乃更從事擴充，添購動力，增設機械，安設自來水池，建築廠房并添招男女工人。辦理不及3年，因財力及人力關係漸感困難，乃商請民生公司接辦，遂于1936年8月正式接收，

由民生公司撥基金 10 萬元作資本。

(見“民生公司 11 周年紀念刊”第 141 - 142 頁)

(5) 渝鑫鋼鐵廠原名大鑫鐵工廠，1939 年加入民生公司資本，改名渝鑫鋼鐵廠，當時資本為 200 萬元。董事長盧作孚，總經理余名鈺。(1942 年國民黨四聯總處工商調查)

(6) 恒順機器廠，創於光緒年間，為周茂柏之父所創，1939 年由民生加入資本，董事長改由盧作孚承任，董事周蒼柏、周仲宣，經理周茂柏。該廠職工在 1942 年時 340 人，資本 100 萬元。

(1942 年國民黨四聯總處工商調查)

(7) 合川華銀煤礦公司，成立於 1939 年。該地礦區甚多，原系當地居民用土法開采，1938 年由合川團總張雲毅、羅子章等發起將各土礦合併，加入新組公司之資本，定名為華銀煤礦公司。資本初成立時僅 30 萬，1940 年增資至 150 萬，重要股東為民生公司及金城銀行和天府煤礦公司。該礦董事：孫越琦(天府代表)、羅子章(合川團總)、戴自牧(金城銀行代表)、晏陽初(教育界)。總經理趙璧光。

(國民黨四聯總處工商調查材料)

周星棠和他所屬的企业

周星棠名以燦，星棠为其号。1877年生，浙江绍兴人。其父母早期迁居汉口，因而周亦生于此地。周氏为銀錢业出身，20岁后，先后創建晋安、阜通等錢庄于汉口，其后曾一度兼任日本住友銀行买办。1923年，被选为汉口总商会会长，后又一度为北洋軍閥湖北省長蕭耀南之顧問。1926年，北伐軍占領武汉后，周氏轉兼任汉口特別二区（旧帝俄租界）維持会主任。

周氏为武汉有名的資本家，他的基本企业除錢庄外，在抗日战争前还投資于工矿企业，如石家庄大兴紗厂董事長、汉口第一紡織公司董事長、庆华顏料厂董事長，及豫丰紗厂、中兴煤矿公司董事。此外，周氏和国民党关系亦甚为密切，在抗日战争前，周氏首任中央銀行理事、中国农民銀行理事等职^①。

茲將周氏投資的兩個工业單位摘录如下：

1. 漢口第一紡織公司

日来此間唯一之大紡紗厂——汉口第一紡織公司，酝酿停工，引起各方严重之注意，記者以此事关系地方紗业之兴衰及国民經济与主权之得失，特分訪于各关系机关，茲將詳情分志如次：

汉口第一紡織公司，建自欧战时期，为前汉市商会会长李子云所創辦（后为周星棠接办。——編者），先籌資本300万元，李氏自任經理，未及一年，已获利120万元。厂内机件均系最新式，設備亦頗完善，平均每日可产紗11万磅，約276包，产布18万碼，約4,500匹，产力之

^① 本文資料来源(1)日本外务省情報部編：“中华民国、滿洲國人名鑑”第159頁。

(2)勃德：“中华现代名人傳”第107頁和調查材料。

强，实为武汉第一。欧战结束后，外货涌进，纱业大受打击，加之公司内部意见分歧，另易经理，遂致营业无法挽救，一落千丈，乃由浙江兴业银行结合安利英及老沙逊两洋行具同借给银250万两。

安利英洋行借款成立后所得之权利为：甲、全部生产为债务之抵押品；乙、以后有贷款之优先权；丙、派员驻厂管理仓库；丁、凡该公司添配机件、购配零件及厂用物件均归安行承办；如该行缺物，而厂方需要在即时，可向它行采购；但必须交纳5%佣金与该行。上项苛刻之条件，遂束缚整个之纱厂发展矣。

历年损失：16年武汉政府经济封锁后，受兴业银行之操纵钞票折现之剥削，致元气大伤，宣告停业，而兴业等行保全押品价值计，遂自取而代管，嗣后向该厂索还代付保险维持用费及借款偿还延期损失银达14,304,972两之巨。18年元月，以工人失业过久，政府严加督责，遂多方设法借款复工，仍受安利英洋行苛刻条件之支配。总计自复工以后除第一年度获利30万两，第二年度亏折890,982元，第三年度亏折160,800元，第四年度折111万余两，第五年尚未给账，全部亏折达380—390万以上。

失败原因：据该公司股东会某君谈，该厂亏折最显著之原因有四：（一）抛买美棉，美棉纤维长细，系纺较细之纱及精密之布所用，我国各纺织厂之用纱，均系20支以下，故出品不同，20年抛购美棉20余万包，迄今尚未销售，致亏折达于百万以上。（二）抛购印棉，印棉较我国棉为劣，而价格又高，非国棉缺乏时不宜多购，上年武汉所存国棉甚多，而又购进大批印棉，其价格高于国棉每担10元以上，此项损失，为数颇巨。（三）煤炭价高，纱厂耗煤约300余万吨，现时所用者9/10为开滦煤，其煤价既高，又不及本省大冶之产品，此中损失，年约万计。（四）修改厂基与机件，纱厂所购之物件机件，均系英产以受安利英洋行苛刻条件之支配，无形间蒙受莫大之损失，虽其他洋行之价格较廉，亦不得采购也，以上各项均系人的关系，以致影响公司之亏折。

管理不善：据纺织工会负责某君告记者，该厂亏折之原因，并非

由于生产工具之粗劣，工人技术之不精，与工資过高，工人太多之故，实以經營不善，管理不問，管理人員之另有計劃，以致影响营业之衰落。今該厂不图根本补救之术，而借口减裁职工改組内部，以达停閉之目的，豈知該厂职工原有1万余人，18年复工，尚有9千余人，去年减去1,600余人，今年又裁去605人，截至現在止，全厂之男女工人，除幹工临时工人2,200人外，合計不过4,700余名，以紗厂之範圍論，此数实为最低工人限度。

(摘自1936年6月15日武汉民报)

該厂設于1916年1月，額定資本600万元，实收420万元。設備，計有紡錠88,000枚，綫錠2,240枚，布机1,200台，1933年有職員200余人，工人7,868人。

主要負責人：董事長为周星棠，經理宋立峰，協理李貢廷，厂长毛麟長、聶守厚。

(見中华民国实业名鑑487—488頁)

2. 慶華顏料厂

乐作霖氏是湖北沔阳人，尝在上海卜內門洋行担任顏料部的經理，推銷英国顏料公司的顏料有十多年之久。他自己虽然不是化学家，但是因为和顏料貿易的关系这样深，所以对于顏料工业和顏料化学有深切的認識。同时也認識了不少的技术人才。他在卜內門服务时，深深感覺到中国顏料工业應該設法提倡，所以当时就和恒信洋行的华經理，留美化学專家王柱东先生，合办了一所上面所提到的华安顏料厂，資本仅有20万元，規模很小，只出硫化青一种。乐氏自己亦在华中办了一个顏料推銷机构，华安全部的出貨都由他經銷。

抗战发生以后，乐氏見到后方顏料因德貨之断絕而致价格飞漲，深感后方顏料之缺乏，因此創辦了庆华顏料厂。庆华的董事長是前汉口商会主席賀衡夫氏，总經理由乐氏自兼，此外有兩位热心贊助的常务董事，一位是裕华大兴大华三个紡織公司的董事長苏汰余氏，一位是川鹽銀行的石竹軒氏。庆华的規模确不很大，但是已經远过于华

安。它的資本由200萬元陸續加到1,000萬，資產已有好幾千萬元。廠址現設李家沱，廠地80畝，廠房幾百間，員工200餘人，每天產量為顏料20担，仍在不斷擴張中。

（摘自“中國有機化學工業的曙光”，載新世界1944年7月號）

慶華顏料廠是由周星棠、樂作霖、賀衡夫等發起組織，初創時資本僅20萬元，最近增為400萬元。董事長為周星棠，經理樂作霖，廠長朱紫光。全廠共有職員12人，技工33人，粗工55人，僕役30人。

該公司連舊有并新增各機件設備，計主要設備共有熬煮鍋三座、紅料鍋一座，干燥機二座等各種機件合值九十餘萬元。

該公司為后方特有之顏料製造廠，以開辦未久，規模不大，尚未能大量生產，故恒感供不應求，計本年1至5月止，制成硫化元青為557石，每石合60公斤，硫化碱1,485桶，每桶合25公斤，平均硫化元青每石約6,500元，現增售價為每石9千元，硫化碱售價每桶約500元，現增售價為每桶600元，最近已由經濟部統制，所有出品均須由官方支配，舶來顏料來源斷絕後，該公司地位更行重要。

該公司去年底純益為33萬餘元，本年2月至5月純益為186萬餘元，兩共約220萬元。

（1943年7月國民黨四聯總處工商調查第89號）

薛明劍和他的企业

薛明劍，江苏无錫人，40余岁（曾任申新紗厂无錫分厂副經理——編者）。民国7年，由荣德生与薛发起創設允利实业公司，制造碳酸鎂、碳酸鈣、漂白粉、燒碱、电石、磚瓦和石灰等。設有工厂6所，自备有原料、矿山、輪船等，資产数百万。他与荣宗敬关系相当深。

抗战爆发，允利公司資产全部淪陷。薛明劍抵达国民党后方后，利用吳稚暉关系恢复允利公司。薛氏除自己出資外，并得到下列各方資金的帮助与合作：吳稚暉（以保安公司公費贊助。現为該公司董事長）、李养吾、陈子山、徐赤子、樊立之、厉无咎（申新第四厂主持人）、胡鳴玉、鮮伯良（重庆面粉业巨头）、邓燮康等。

可見他所拉攏范围自国民党元老要人，以至江苏民族資本家，四川地方資本家都有，国民党經濟部工矿調整处也予协助。自10万元发展股金至百万元。1945年資金已逾千万。其活动力頗大。

允利公司是采取母子公司形式的，亦即“投資公司”形式。子公司已有20多个。总經理由薛明劍担任。其下分六个处：（一）面粉业总管理处，（二）碾米业总管理处，（三）棉鉄业总管理处，（四）无錫工厂保管处，（五）合办工厂管理处，（六）會計稽核处。各管理处分別管理各子公司。允利投資于各子公司，資本占各子公司資本1/10至5/10，其余資本系吸收各子公司所在地之資金以至职工的資金。其所經營范围，則主要是面粉工业，其次为碾米、棉鉄工业。薛氏在1944年于重庆創辦“中国面粉业技管人員訓練班”，以訓練其所需用面粉工业人材。

允利在国民党大后方复业之初（1938年左右）曾与复兴鉄工厂合作承制兵工器材。复兴鉄工厂系荣宗敬民国5年在无錫所办之公益

鉄工厂改名，1941年复兴厂与荣氏之申新紗厂、福新面粉厂机器部合組“公益紡織面粉机器制造厂”，薛氏投資万元。

薛明劍的另一主要活动是与“江苏同乡会”的联系。薛氏原来活动基地是“无錫同乡会”，并自1942年前后出版“复苏”刊物，报导淪陷后江苏情况及国民党大后方江苏同乡动态，該刊物有时登載对苏北八路军造謠污蔑的文章。

此外，薛氏是国民党三、四届的国民參政員，又是中国工业协会、迁川工厂联合会的理事。

（摘自羊： “国民党統治区工业界人物介紹”）

允利实业公司，并不是抗战以后的产物，不过在抗战中更加发展了。笔者与允利总公司的当局和它各工厂的負責人員，都有十几年的認識。苏省淪陷后，一别已四年多。这次到渝參觀迁川的工厂，知道允利依然在大后方繼續复业，已有了机械、面粉、碾米、紡織、营造等一二十个工厂开工，尙在征求各省同志，企图达到人尽其力，財尽其用，使各地的土产原料尽成制品的目标。

允利公司，創始于民国7年，由无錫面粉大王的弟弟荣德生，和实业家薛明劍等发起，以制造碳酸和綠气等化学物为主要出品，在以小上海出名的无錫工厂中，也算新穎的工业，天虛我生办的家庭工业社所用化粧品原料，多半采購該公司的出品，頗負一时盛名。抗战事起，撤退不及，全部淪陷。民27年，經吳稚暉之倡議，恢复生产，以容納江浙入土，从事后方实业为主旨。数年来，已有20余工場設于四川西康湖北甘肃等处，从事生产，容納职工不下千百人，仍由薛君总其事，移总公司于重庆。

现在公司的最高权威，是吳稚暉；他对这小小特殊的公司則爱护惟恐不周。他在民国初年，就主張借人力財力于异邦，拿来发展我們的生产。抗战事起，彼又眼見他少时常居的故里——无錫——許許多多工厂帮了后方不少的忙，故乡淪陷，一部分工厂的内迁，也由于彼极力的主張。允利公司，是他眼看生長的工厂，也是他主張内迁的一个厂。27年的年头，在四川碰到了不少的故乡熟人，他就毅然决

然的担任了公司的董事長，提倡利用流亡的人力，做大后方制造物資的淵源，現在这—个公司，已有了制造母机等工厂—二十所。

允利各厂的主管人，多半是教育界出身，抗战后流亡到后方的人士。万县面粉厂經理系华晋吉先生，白沙面粉厂經理系刘佐汉，長寿碾米厂經理系李正—先生，厂长系沈济之，在陪都，有米厂都是孙晋勳兼管，奉节鉄工厂的經理为周劍文先生，重庆有机器厂經理王汝龙，厂长孙齐衡。

(摘自霍重衡：“介紹逃徙中的允利实业公司”，
1942年中国工业第10期)

穆藕初創辦棉紡事業略史

一 穆氏經歷

穆藕初，諱湘玥，民國紀元前36年生于上海，家世業棉，14歲為棉花行學徒，20歲始學習英文。民國前12年，考取江海關服務，與馬相伯、李叔同（即弘一法師）、尤惜陰、錢新之先生等創滬學會，實習槍操，提倡尚武精神，為上海辦商團之始。民國前6年，任上海龍門師範學校監學，次年任蘇省鐵路公司警務長。民國前3年，承朱志堯先生借資1千元，并由元配金夫人售金飾相助，自費赴美，入威斯康辛大學肄業二年，轉伊立諾大學，民國2年畢業，得農學士學位，升坦克塞司農工學院，次年畢業，得農學碩士學位。先生回國後，首譯美國戴樂爾之科學管理法，同時着手改良及推廣植棉事業。先此曾有熱心人士試種海島長絲棉及埃及棉，因缺乏專門知識，屢試無效。先生以當時吾國各紗廠所紡之紗，以12支至20支為多，創議種1/4至一英寸之美棉，較為合用。除自辦穆氏植棉試驗場外，并捐資購買美棉種子20噸，分送各省宜棉區域試種，并自撰改良植棉淺說，印送數萬冊，以指導農民關於植棉所必需之知識，親自辦理改良植棉及推廣事業3年，因所辦紗廠事業日益擴大，工作日繁，特商由華商紗廠聯合會組織一植棉委員會繼續其事，先生被推為委員長，負監督指導之責，并委托南京國立東南大學農科負研究改良推廣植棉之責，由鄒秉文、過探先先生等主持，每年補助經費2萬元，在全國各省設立植棉試驗場12處，前后繼續7年，實為我國改良及推廣植棉事業之萌芽時代，而由先生個人之努力奠定基礎者也。

先生每辦一事，必集中精力以赴之，于辦植棉事業如此，于紗廠事業亦然，民國3年留美回國，是年冬即與胞兄恕再先生等創辦德大

紗廠。后于百忙中翻譯美國克拉克之日本的棉業一書，定名中國花紗布業指南，斥資印行，以作借鑒。民國4年，德大紗廠開工，出品之佳，為上海各紗廠之冠。于是先生辦理紗廠之名譽大著。民國5年，復創辦厚生紗廠，民國6年開工。該廠完全購自美國薩柯勞惠爾廠之紡織機器，辦理益見完善，因而國人欲新辦紗廠者，皆自參觀先生之厚生紗廠為入手，且多派員至廠實習，無形中厚生不啻為在華美國紡織機器之成績展覽會及實習工廠。自民國6年至7年之短期間內，國內定購美國紡紗機達75萬錠。均由先生直接間接介紹慎昌洋行定購。華商紗廠紡42支紗及32支42支雙股綫，均自先生所辦之廠始。而先生對於我國紗廠事業之貢獻，固猶不止此。良以原來華商各廠，均用工頭制，向無專門之紡織工程師，一切工作，均由工頭支配，效率頗低。先生辦紗廠之始即事必躬親，日間則監督指揮工人裝置機器，夜間則規劃紗廠內部各車間各報告之式樣。以前各紗廠均向無報告，及先生創制之報告式樣出，遂為後來各廠普遍採用。其時紗廠事業，日益發展，而無同業組織以保護共同利益，先生乃于民國4年發起組織華商紗廠聯合會，先生被選為董事之一，其后改良推廣植棉事業由該會捐資辦理，實種因于此。民國8年，先生創辦豫豐紗廠及中華勸工銀行，先后成立。民國9年，又創辦上海華商紗布交易所，次年開幕，章程規定理事長由股東選舉，任期3年，成立后先生即被推為該所理事長，迄今連任六次。因先生之經營得宜，營業至為發達，成為全國花紗市場之中心。綜計一日中之交易，其最高紀錄棉花達30萬担，棉紗達15萬包之多，交易價值共計4、5千萬元。

民國17年，先生奉孔祥熙之約，任南京國民政府工商部常務次長，次年冬，工商農礦兩部改組為實業部，仍任為次長，辭未就，后改任中央農業實驗所籌備主任、農產促進委員會主任委員。民國30年任農本局總經理，以調整后方花紗布之購銷供應為任務。

（摘自華云程：“穆藕初先生傳略”，農業推廣通訊第5卷第11期）

二 穆藕初經營投資之紗廠

厚生紗廠

1917年开始建筑，1918年6月底开工。厂設上海楊樹浦。資本定額120万兩，先收3/4，計90万兩，股東為穆藕初、貝潤生、薛寶潤、吳善庆、凌煥曾等五人，除穆外，余四人皆系業顏料業。

該廠在1918年初創時設有紗錠16,000，系由慎昌洋行代向美國買來，工人900余，職員30余人。此廠由穆藕初任總經理，董事長為薛寶潤。1922年紗錠增至40,340錠，工人數亦增至2,434人。

該廠在1930年因營業不振停工，至1931年11月售與申新公司，改稱申新第六廠。

(資料來源：(一)申報1919年3月6日(二)上海總商會月報2卷10號(三)嚴中平：“中國棉紡織史稿”353頁)

德大紗廠

1915年6月开工，廠設上海楊樹浦。資本60万兩，該廠為穆杼齋所辦，股東計有穆藕初、陳子馨、劉汗卿、劉襄孫、許松春、顧聲溢等，董事長為穆杼齋，經理穆藕初，協理張蓀潤。

該廠創始時計有紗錠1万枚，每日可出16支粗紗30大包，到1922年統計時，紗錠增至16,000余枚。1925年4月因經營失敗售與申新公司，改稱申新第五廠。

(資料來源：(一)1915年6月22日申報(二)上海總商會月報2卷10號(三)嚴中平：“中國棉紡織史稿”352頁(四)北京農商部1920年登記冊)

恒大紗廠

該廠系由德大紗廠總經理穆杼齋發起，邀同陳悅周(德大紗廠股東，恒源花廠股東)、湯蘊齋(德大股東，三林塘商會會長)、朱子灝(江蘇省議會議員)、馮蓮生(周浦商會會長)、黃季純(大成綢莊莊主)、儲湘泉(儲湘記紗號主任，江西資本家)、張峰岡(裕春祥紗號主)、楊文卿(萃豐洋行經理，蘇州資本家)，穆藕初等亦參加投資。資本為50万

元，发起人担任25万，其余一半另招股。董事長为穆抒齋、董事穆藕初、湯蘊齋等。

該厂于1919年7月开工，厂設上海浦东。初創时計有紗錠1万枚，1922年增至10,360余枚，工人618人。

該厂于1918年10月由陈子馨、何允梅、荣宗敬、李升伯等租办，改名为恒大隆記，1930年9月由陈等收买，另行改組，改名为恒大新記。

(資料来源：1919年7月8日上海申报、上海总商会月报2卷10号，严中著：“中国棉紡史稿357頁）

豫豐紗厂

1919年在河南郑州成立，資本200万兩。該厂为穆藕初所創，董事長穆藕初，并聘留美学生顧維精为总工程师(后为厂长)，吳文欽为协理，初創时計有紗錠3万枚，其后增至56,400多錠，布机234台，并綫机5,600錠，設備俱系向美国購買。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經濟恐慌来临时，該厂陷于困难，先由美国慎昌洋行租办，后于1934年3月中国銀行加入股本，据說中行股权占90%以上，該厂实际上已成为中国銀行的产业。

(資料来源：1930年6月7日申报，新商业1卷2期45頁。国民党四联总处工商調查材料)

恒大紡織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1919年成立，厂設上海，資本20万兩，該厂为徐靜仁所創，股东有聶云台、穆藕初、李銘、陈光甫、荣宗敬、刘伯森、吳寄尘、馬輯之等。

蕪湖中一紗廠

該廠原名裕中紗廠，創辦于民國8年，至26年1月改組為中一紗廠，廠址在蕪湖，資本金100萬元，實收30萬元，系合資組設，總經理趙志游，協理唐斌。廠基面積30畝，廠屋式樣為磚瓦屋，建造于民國8年，共有7幢，造價84,000元，動力有蒸汽發動機一部，500匹馬力，成本2萬元。機器有精紡錠子18,400錠，成本368,000元，現值736,000元。出品紗支，分10支，16支，20支三種，每日平均產量約40件，行銷安徽全省及南京等地，商標為四喜三多。運輸方法，分江南鐵路之陸運，以及長江輪船之水運。原料組綑棉花，採用附近烏江，合肥，安慶，東流，江寧等地之花，每日平均約銷用150担。職員約30人，男女工人約1,000名，重要債務人為上海銀團，抵押借款60萬元，“七七”抗戰損失估計30萬元。

該廠在劉晦之、寧秋泉等主辦以後，即以裕中紗廠不動產向中國實業銀行作為透支抵押。厥後因流動資金周轉不靈而停工。民國23年繼由陳君集資接辦，旋受市面不振資金缺乏之影響而解散。中國實業銀行以債權人關係接管該廠之不動產，債權人方面委託上海會計師謝霖清理，將該廠出賣所得償清債務。民國26年趙志游氏以中一實業公司名義向中國實業銀行談判收買該廠。斯時因裕中紗廠所負中國實業銀行之債務甚巨，索價過高，以致一時不克成交，惟雙方同意先以租用名義由中一實業公司接辦後，再進行談判購買問題。中一實業公司旋于民國26年2月簽訂租約，先行修理，于4月間起開工一部分，一面整理，一面磋商收買。8月間事變遽發，該廠遂于12月間停工。

民國27年5月下旬日本委託裕中紡織株式會社經營，同年6月

初开始管理，并即整理工場，修理破損之建築物及机器。当时該厂之一部分为日陸軍医院所借用。迨至28年2月1日，中一公記公司与裕丰紡織株式会社簽訂第一次合办經營之契約，同年4月1日开始出品。29年4月16日簽訂第二次合办經營之契約，12月1日簽訂第三次合办經營之契約。該厂代表人唐斌，赵浩兩君子30年3月25日申請发还，至5月31日获准，其解除附約有三点：（一）將工厂經營权归还中一实业公司。（二）管理期間并无任何費用。（三）確認日方受託者裕丰紡織株式会社与中一实业公司所屬之中一公記公司間之合办經營契約。

該厂現有資金分兩方面出資，中一公記公司方面系以余存之棉花4,260担作为出資，裕丰紡織株式会社方面則負担其他之流动資金。出品仍分10支，16支，20支三种棉紗，每月約出240件，原料为上海裕丰紗厂在庫棉花以及安徽省棉产地之原棉。日本技师六人，男女工人440人。銷路仍以安徽全省为主体，南京一帶次之。

（来源：“蕪湖中一紗厂之概況”，企业周刊第一卷第17期，1943年5月出版）

恒源紗厂

天津恆源紗厂最初的名字叫“直隶模范紡織厂”，1920年开办时由曹錕之弟曹健亭主持，官商合营股金400万元。后来发行股票；由北洋軍閥及其亲友收买，改为私营股份有限公司。当时有紗錠37,000枚，上打梭織布机240台。

該厂开办的最初几年，因为帝国主义无暇东顧，营业很好。后来帝国主义的侵略越来越凶，恆源的情形就每况愈下。加上主持人是軍閥出身，貪污腐敗，工厂衙門化了。例如当时一个管煤过秤的，月薪只有十块钱，可是过了几年却在天津买了十多所房子。所以在1928年，恆源处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得不关了門。

1929年又重整旗鼓，調整了内部和人事，向銀行貸款开工了。但是由于厂內組織、管理、技术上的問題重重，大的环境又日趋恶劣，“九一八”后日本紗布大量向天津走私，这个先天不足，后天失調的厂子，到1934年因为全部财产抵不上欠銀团的外債，不得已又第二次关了門。

1936年厂子押給銀团(押給北四行——編者)，由誠孚公司代管业务(誠孚公司詳情見后述)，第三次开了門，經營上由封建的經營方式变为資本主义的經營方式，业务剛剛抬头，又碰上“七七”事变。天津淪陷，恆源更遭受到直接摧殘。起初日寇威胁利誘，用“合作”的名义要生吞恆源，沒有达到目的，便无耻的采取收买恆源股票的方法，也沒有成功。最后惱羞成怒，用献鉄的卑劣手段，把該厂机器拆走了1/3，更用配棉的办法限制該厂購料，使該厂在1942年只能开800个紗錠、40台布机，造成大部分工人失业，不失业的也餓不住嘴，下工之后許多人去蹬三輪。

好容易盼到胜利，结果更是一团糟。新来的劫搜经理，是个少爷出身，对工业一无所知，但任用私人，压迫职工倒是内行。当时事务人员中有四大家族，工务人员有十三太保、四大金刚，这一群不学无术的狐群狗党，把恆源陷入旧企业中典型的混乱厂，在解放前外欠一千件纱。

（李锡智：“恆源纱厂的历史及其发展道路”，
1951年6月7日天津进步日报）

景綸、景福衫袜厂

一 景綸衫袜厂

查該厂初由杭州吳季英姻家独力創辦，原名云章衫袜厂，由丙申以迄辛丑，連年亏耗，力不能支，壬寅(1920年)春，吳君季英去世，乃由其姪子常君偕同經理人倪庆甫君并工程师西人 軋拉士君就商于余，余念私义則誼关姻婭，公义則事关实业，允許合股，共同估价厂基、机器作元3万兩算，余亦划現洋如其數，共作資本6万兩，于十月朔日改名景綸，添派汪少云君与倪庆甫君同为經理，初不料云章厂基早經前股东質于洋商高易也，事后知得，不得已墊款取贖，繼又聳办袜机，拓开厂屋，添購左近基地，营造电灯引擎、爐間暨漂烘各房，迨袜机到申，始知价需万金，日出袜仅五、六打，而貨复不佳，蓋所办者老式无用之机器也。此时倪君早經辞，軋拉士亦无顏存留矣，所有厂事遂任汪为經理，汪于商务精明，惜乎貪做生意，甲辰夏秋間，汪糾同股东吳子常，墊銀10万兩，充当奥商龙兴洋行买办，不3月墊款4—5万无从追还，且从中影跋本厂牌号，挪用庄款，事敗汪竟远颺，子常負債纍纍，挪款亦經余認墊，而子常遂不能一日安心矣。次年乙巳，另派同乡譚瑄生为經理，丙午抵制美貨，本厂創織錦地桂地等項衣衫銷路稍通，然逐年結賬仍多亏折。戊申春，子常去世，其弟子猷即余婿也，留学欧洲，聞耗归来，集其从弟儻之等清理家务并及厂事，乃于9月中邀友来申結賬，自壬寅10月至戊申9月杪止，共結亏元85,700余兩，是时余所墊款項計有17万余兩之巨，吳氏昆季一再恳求并股，不得不勉如所請，于是戊申10月朔日，景綸厂遂为余个人之营业矣。是年冬，南洋庇能广安号主梁乐卿函索本厂貨品，并願担承銷路，余即許可，乃寄去各种汗衫2箱，明春得复，极蒙獎誉，謂足与洋貨頡頏，

源源定办。同时香港兴隆号亦有大批定货运往南洋销售，南洋华侨遂知有上海景綸汗衫矣。5月間，老友梁和奉鄂督陈，委赴南洋爪哇招織呢厂股份过瀛見余，乃囑瑄生偕行，由爪哇而庇能，而石叻各埠，借广招徠，是后也往返三閱月，定貨5百余打，皆双綫桂椒地等上品貨，惜此种机器不多，出品亦少，一时不及赶办，且机器織布各有不同，針織分巨細，綫有精粗，貨料全靠外洋运来，成做之衣又全在女工，女工或来或不来实无一定期限，此中为难情形非当局不悉，唯定貨要紧，要余复添購上貨机器数部以期赶速起貨，无如年終結賬仍亏官息3千余兩，盖瑄生忠厚有余，經營数載仍无起色，遂亦知难而退矣。庚戌正月，乃延鮑君味蕪司理厂务，徐霞村副之，于是年春稟請商部注册，商标存案次第举行，或挽已失之資，希得无穷之利，其在此乎，是为記。

（采自徐雨之記：“与吳氏合創景綸紡織厂于上海——光緒28年”，徐愚齋自叙年譜第103-105頁）

景綸衫袜紡織厂股份有限公司，創立于清光緒22年，距今已有50余年历史，为我国內衣工厂之首創者，亦为中国第一家之針織厂。初創时系由武林吳氏独資經營，資本規銀5万兩，原名云章袜衫厂。其时国人鮮有服用針織衫袜者，且外貨充斥，故云章营业，毫无起色，亏折甚巨。至光緒28年，吳氏无意經營，始由香山徐雨之氏，斥資收买，改名景綸。

光緒31年聘譚瑄生任經理，竭力經營。翌年国人初次抵制外貨，景綸創制之桂地衫椒地衫与錦地衫，始引起国人注意，銷路漸增。惟逐年結賬，仍屬亏蝕不貲。自光緒28年至34年，損亏总数达85,000兩之多。幸徐氏毅力过人，虽經挫折，不稍退畏，且續增資本，积极改进。

宣統2年徐氏自任經理，創制今日盛行之卫生衫，此时景綸出品之銷域，已扩展至南洋、香港等地。惟产量不多，供不应求，因再向欧美添購新机，增加生产，民国元年不幸徐氏病逝，乃由餘姚徐霞村繼任經理。徐君干练有为，业务漸入正軌。乃于民国6年，改組为股份有限公司，資本增加至168,000元。陸續訂購新式机器，改良出品，于

是产銷年有进展。民国19年停办織袜部分，俾集全部精神資力，于汗衫卫生衫等之織造，因力量集中，事业遂有发展，而营业亦蒸蒸日上焉。

民国22年震村逝世，方由徐雨之氏文孙雨孙繼任經理。家学淵源，尤以留英研究該业多年，学驗俱富，任职后貢獻殊多。民国26年增資至24万元，正拟扩充业务，建造分厂，事逢抗战事起，遂告停頓。时厂址适当战冲，險象环生，因排万难，將一部分机械，內迁陪都开工，一面勉力支持滬厂工作，以維职工生計。

民国33年与南市恒通紗厂合作，移一部分織机至該厂，俾由其供紗織制布坯。34年夏，盟机轟炸江南造船所之役，殃及池魚，織机成品，均有損毀。胜利后，逐步整頓，已复旧觀。現該厂基础巩固，努力改进技术，增强产力，以永奠公司久远之基。同时自战时迄今，因物价飞騰，謀使資金运轉圓滑起見，曾陸續增資，以至今日，資本总额已达国币10亿元矣。

景綸衫袜厂組織，在总經理副經理之下，分設厂务、营业、总务、會計、貨仓五部。董事長徐敬直先生（广东人，兴业建筑事务所主任）、董事徐雨孙、徐敬方、徐練甫（浙江人，同康烟行董事）、張文魁（江苏人，国华工业投資公司总經理，中心內衣手帕厂总經理）、郑根初、張文波、丁佐成（浙江人，大华科学仪器公司經理）、徐振东（江苏人，新华銀行經理）。監察叶謀豪、陈招悅、鄧启堯^①。总經理徐雨孙副經理徐練甫。

現任总經理徐雨孙，乃雨之文孙也，年42岁，英国李頓派克学校毕业，現任上海国产厂商联合会理事，上海机制国貨工厂联合会监事，內衣織造工业公会理事，国华工业投資公司常务董事，并为忠实基督徒。任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各重要机关董事，及所屬时兆月报总編輯。

工厂方面自置基地，共9亩有余，自建工場厂房40余間，机器設

^① 董监事名單中的簡历是編者加的。

备，拥有湯姆金織机24部，哈格織机14部，台毛罗織机2部，棉毛織机6部，罗紋織机20部，胜家各式縫衣机100余部，24—40錠紆紗机14台，套口机20台，軋光机2台，絲光机1台，拉絨机2台，搖乾机3台，立式臥式鍋爐2座，电气动力20余座，計馬力百余匹。并自建自流井水塔，及最新式蒸气烘房。

該厂制品以金爵、鹿头、藍鷹、飞鷹、米鼠为商标，出品有汗衫、卫生衫、棉毛衫、錦地衫等，莫不拥有絕大顧客，风行国内外也。該厂現正謀逐步扩充，恢复战前状态，最高产力，日产各式內衣3百打，銷域遍及全国及台省南洋群島等地。

(摘自上海机联会編：“中国国貨工厂全貌”
2至4頁，1937年10月出版)

二 景福衫袜厂

景福和景綸，在市場里，是被呼之为姊妹股的。景福衫袜的历史，虽远遜于她姊姊景綸，而總經理也还是从景綸里出来的，但后起之秀，倒也不比景綸来得落后。甚至反而景綸有些望尘莫及。自証券交易所开业以来，每日成交額，至少总在10万股左右，而景綸則膛乎其後，远不如她妹妹来得热絡也。

景福的創設，还是在太平洋战争后，其前身原名景福織造厂，創于民国26年，由徐文照、徐云庆、魏炳荣等合伙組織，最初租賃閘北中华新路华純厂厂房，战事发生后，乃迁徐家汇路。数年間营业尙称发达。到民国26年12月間，才集資伪币(中儲券下同——編者)1,500万元，改組为景福衫袜織造厂股份有限公司，以織造漂染与銷售各式四季針織內衣衫袜匹头等为主要业务，后因工料价格上涨不已，原有資金不敷应用，乃于32年11月及33年4月間，兩度增資，第一次增資由伪币1,500万元增至5,000万元，第二次增資由伪币5,000万元增为伪币2亿元。胜利以后，复又根据“收复区各种公司登記办法”之規定，于1947年4月25日，召开股东临时会，調整資本为2万万元，分2千股，每股10元。

厂址設于徐家匯路，自置基地約 8 亩半左右，有大小工場120余間，內部設備現拥有針織机43台，各式縫紉机120台，紆紗車 2 台，丰田織布机40台，140錠筒子車 1 台，花綫車、卷緯机、整經机、拉毛机、軋光机等15台，并有完全之漂染設備乾燥設備等。

該厂出品，均以飞馬为商標，計有麻紗汗衫、棉毛衫、卫生衫、运动衫、童衫、女衫及各种背心等。据該厂負責人稱，目前产量平均每月生产內衣 12,000打左右^①。

負責人：

董事長兼總經理：徐文照，浙江餘姚人，曾任景綸衫袜厂协理。

董事：朱秉彝、胡云飞、徐云庆、魏炳荣、章子舟、徐云甫、楊文明、曹祿賜等。

監察：金昌詒、史济謂。

經理兼厂长：徐云庆，浙江鄞县人，曾任永丰棉織厂副經理。

协理：葛紀元，上海人，曾任蕪湖益大杂货号經理^②。

附：徐雨之略歷

徐雨之，广东澳門內乡人，买办出身。其簡历如下：

15岁时(1851年)随其叔父到上海，到苏州書院讀書，因“数月苦无所得”，折返上海見其伯父(名鈺亭，是当时英帝国主义販卖鴉片的宝順洋行的买办)，其伯父叫他不要念書轉学生意，于是便在宝順洋行跟洋人当学徒。至咸丰 6 年(1855)，升任該洋行帮賬，1858年与同事曾寄圃等合办“紹祥号”，包攬各洋行絲、茶和棉花貿易，1859年又在温州設立潤生茶号，1861年繼曾寄圃为宝順洋行副买办，同年，和芸軒在上海合設宝源絲茶号，又在法租界設立順兴号，經營烟叶、白腊和桐油的貿易。同年捐了光祿寺署正官銜，翌年捐員外郎等官銜，1868年离宝順洋行自設宝源祥康茶棧，并买了大批房地產。1873年，奉清朝北洋大臣李鴻章之命，和买办出身之唐廷樞办理招商局。光

^① 張一凡、張安友：“股票要覽”，第51至53頁，中國文化服務社1947年7月出版。

^② 聯合征信所編：“上市股票厂商概覽”第26頁，1947年2月出版。

緒2年(1876)，与唐景星、陈夔南集股25万兩，創立仁和水險公司，1878年，集股50万兩開設濟和水火保險公司，1882年与其从弟秋畦宏，集股創辦同文書局，并奉北洋大臣之命辦理貴池煤鐵矿，1898年，接办广东中山县天华銀矿，1891年奉北洋六臣命回开平矿务局辦理矿务，1892年奉北洋大臣命辦理热河建平金矿，其后在广东創辦过自来水公司，光緒28年(1904)，与其亲戚創辦景綸紡織厂。

(本文根据“徐愚齋自叙年譜”整理)

三友实业社

三友实业社創始于民国元年4月，初为合伙組織，由陈万运、沈九成、沈启涌三先生集資創辦，故定名为“三友”。設厂于上海北四川路，小屋一椽，以制造棉綫燭芯为事业之发軔，并以“金星牌”为出品燭芯之商标，最初資本仅450元而已。

棉綫燭芯，一名洋芯，系制造洋燭之一种主要原料。物虽至微，但当时各地，对于洋燭一物，应用至为普遍，国人仿造亦众，但对于此項中心原料(燭芯)，尙鮮有注意及此者。在金星牌国貨燭芯問世以前，流行于市場者，仅有日商中桐洋行独家專營之出品，供稀需众，营业殊佳。陈沈諸先生，彼时执业虽殊，(一业商貨、一业柏油蜡燭、一业烟壳)，但感慨夫利权外溢之堪虞，思有以杜塞漏卮挽回利权于万一，志趣既同，因有三友实业社之設立。

民国4年3月，因业务需要，增資至8,400元，改組为无限公司。时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后之第2年，战事綿延，外貨供应漸稀，国外如南洋等地，所需燭芯，亦惟我国是賴。时金星牌燭芯，在国内市場，已有相当声誉。本埠英美洋燭制造商，如亞細亞火油公司，及美孚洋行等，为供应各地需要，相繼向該社大量添訂。該社为接受大宗定貨，增加生产，乘时推广銷路計，因于是年12月，繼續增資至3万元，并改組为股份有限公司。5年2月，举行股东創立会，此为該社成立股份有限公司之始。

該社自改組为股份有限公司后，扩充設備，銳意发展，营业蒸蒸日上。原有工場，不敷应用。乃于民国6年，迁厂至上海引翔港地方，同时鉴于毛巾一物，为人生日用所必需，而市上除日貨鉄锚牌毛巾外，尙鮮国貨替代品，乃有三角牌毛巾之制造。以其出品精良，不遜

而走，遍銷中外。其后該社复先后应营业需要，增資扩充，于民9年起，陸續增制各种日用棉織品，如不退色布匹，及現時已司空見慣之全幅被單，及透涼罗紋帳等，皆为該社所首創。举凡漱洗、沐浴、客座陈設，以及衣着睡眠所需，莫不毕备。

17年冬，盤买杭州拱宸桥紡織厂一所，并添設漂染部，成立为該社杭州制造厂，公司資本，至20年止，累增至国幣200万元。

21年淞滬抗日之役，該社引翔港上海制造厂，遭敌縱火蹂躪，損失惨重，无法复工。不得不移注全力，发展杭厂，悉力經營，規模略具，乃以国难未已，时閱五載，而“八一三”战事又起矣^①。

26年抗战发生后，杭厂被占，棉織工作停頓，乃暫行兼售国药。31年起又販售各种棉織品，31年11月將杭厂出讓与国华工业投資公司，滬埠光复后，配合政府生产复員政策，在車站路及北苏州路恢复棉織工厂，徐图复兴，35年3月增資至5,000万元，今年(指1947——編者)4月27日經股东常会通过，增資至10亿元，每1老股送9股，認繳10股。

該社現任董事長为王云甫(浙江鎮海人，鐵业出身，其父为瑞隆顏料号店东，父死后承繼其父产业并曾任中华劝工銀行、华商电气公司、开成造酸厂董事等职)

董事王家珍、金宗城(浙江鎮海人，上海商业銀行經理)、王丽蓀(恒义升衫袜厂协理)、黄济元、張純誠、郑宜亭、乐嘉祥、陈万运、張文魁、章鼎峙。監察人岑子厚、刘廷黻^②。

① 摘自“中国国貨工厂全貌”第15—16頁。

② 摘自“华股手册”第82—83頁。董监事名單中括号的簡历是編者加的。

美亞織綢公司

執絲織業牛耳之美亞織綢廠股份有限公司，創辦于1920年，由莫觴清獨資經營，初創時規模甚小，廠址設上海徐家匯路久成里，1922年改為合夥組織，由蔡聲白擔任總經理，添置新機，大事擴充，仿造歐美新式絲織品。1933年，將聯枝各廠合併，改組為股份有限公司。抗日戰爭爆發時，略有損失，但營業照常，抗戰結束後設總管理處于上海天津路，各地分支機構恢復生產。

該廠創辦人莫觴清，浙江吳興人，商人出身，曾做過蘆璧樂洋行買辦，錦成、錦華、廣源等縲絲廠主。茲將該廠發展概況分述如下。

一 創辦及發展經過

該廠初創時，規模很小，僅有織機12台；到第二年，蔡聲白由美國理海大學得工學學士學位歸國，擔任該廠總理後，營業便駸駸日上，而範圍也一天天的擴大：計民國13年，在閘北交通路設第二分廠；14年在小沙渡路設天綸美記分廠；15年在杜神父路設美孚廠，同時，由全體職員投資又在斜土路設美成廠，而斜土路的天綸美記總廠，也在此時成立；到民18年，發展更速，在一年中，先後成立共和路的美利廠，瞿真人路的美生廠，和徐家匯路的南新廠；19年又在橫濱路設一久綸廠。總計該廠歷年分設的聯枝綢廠，共有九處之多，在上海的公共租界法租界以及南北市，均有美亞的足跡！此外，關於印染煉紋工等附屬工作，該廠也不仰求于人的，計民國17年設有美藝染煉廠，和美章紋制合作社；20年又設美經經緯廠。因為各項工作均有專廠負責的緣故。

民國22年春天，該廠的組織是變動過了；本來是合夥性質，自22年起，已改組為股份有限公司。重定資本280萬元，並將聯枝各織廠，一律改稱美亞分廠，而染煉經緯制紋等廠，也都加上了美亞字樣。至

于織机，已增至1,200余台；职工合計3,600余人；并在天津路二五六号設有总发行所。其規模之宏偉，不仅在織綢界中堪稱首屈一指；便是在整个国内工业界中，也可以算得是一家数一数二的大工厂了！

在十余年前，我国織綢界中还沒有人想到改良，而美亞的蔡声白先生，却第一个采用美国阿脫屋特式的絡絲机、并头机、打綫机、以及克劳姆登式的全鉄电力織机，制造最时式的綢緞，使国产絲綢的面目一新！

美亞織綢厂的行政中樞，是总管理处，在总管理处之下，分总务、技术、营业、财务、采办、設計等六处；另外，还有一个秘書室。而各处之下，又分若干科。至于各厂，均設有厂长，各对总理負責。

在該厂組織中，最值得介紹的是訓練檢查和試驗三所。訓練所專司职工的入厂訓練，主持工入夜校及运动、娱乐、图书、暨其他职工福利事件；檢查所專司原料及生熟成品的檢查；試驗所專司新織物的研究分析事宜。

美亞厂的出品，分單縐、双縐、閃色織品、絲絨、乔其、普通葛縐、印花綢、緞、縐、袍褂料等十类，总計有400余种之多；而且时时有新出品問世，現在，每天平均可出1,000匹以上。

美亞厂的銷路，在以往十余年中，除民国20年及21年，因受东北事变与上海中日之战的影响，比較19年度略見減縮外，其余各年都有增加，茲列表如下：

历年銷貨統計

年 分	銷 去 匹 数	营 业 金 額 (元)
1920	1,000余匹	30,000
1921	2,000余匹	60,000
1922	8,000余匹	300,000
1923	10,000 匹	400,000
1924	21,000 匹	1,000,000
1925	43,000 匹	1,800,000
1926	70,000 匹	2,700,000

1927	70,000余匹	2,800,000
1928	120,000 匹	3,700,000
1929	130,000余匹	4,000,000
1930	190,000 匹	5,700,000
1931	150,000余匹	5,200,000
1932	160,000 匹	4,300,000
1933	270,000 匹	6,020,000

銷路的区域，兩廣占25.68%，上海占23.60%，印度占19.50%，天津占4.53%，長江一帶占4.16%，閩汕占3.92%，北平占3.82%，四川占2.74%，山東占2.63%，云貴占2.25%，江浙占2.13%，歐美占1.38%，陝西占2.84%，其他各地占3.72%。

最近，該廠對於南洋的市場，也在積極開拓；雖然，在那邊的外貨勢力很大①。

二 合併各廠

美亞織綢廠，向系合資開設，所出各種綢緞通銷世界，近議籌商合併已經多時，最近始正式公布，計由美亞、美亞第二、天綸美記、美孚、美生、美利、美興織綢廠、美隆綢莊、美綸綢緞局、美章紋制社、美成絲織公司、商新、久綸織物公司、美經經緯公司、美藝染煉整理工廠等10個綢廠及經緯廠染煉廠制紋廠，并三家綢莊合併改組為美亞織綢廠股份有限公司，收足股本280萬元，本月14日在湖社開成立會，選出莫觴清、蔡聲白、徐冠南、童莘伯、高事恒、劉梓彝、龔良偉、莫如德、陳玉笙九人為董事。周湘齡、沈體仲二人為監察人。該公司現有電力織機1,200台，捻絲機15,000錠，年產綢緞30萬匹，每年營業達800萬元。年來國產綢緞雖求過於供，而洋貨仍充斥市上，欲求國產綢緞之大量推銷，非有大組織大資本之機關不足以敵外貨之侵蝕②。

① 摘自上海機聯會：“工商史料”，第1集98—104頁，1935年12月出版。

② “紡織周刊”，3卷12期386頁，1933年3月出版。

三 抗日戰爭前董監事名單

董事：莫騷清、蔡声白(浙江湖州人，清华大学毕业，美国理海大学机械工程学士，民9返国入美亞)、徐冠南、童莘伯(浙江嵊县人，杭州甲种工业学校毕业，曾任职于杭州緯成絲織公司，1924年入美亞任該厂技师)、高事恒、刘梓癩、龔銀緯、莫如德、陈玉笙。監察人周湘齡、沈礼仲。總經理蔡声白①。

四 抗日戰爭后的情况

“八一三”战后，上海關北、南市各厂分移至香港、广州、汉口、重庆、天津、乐山、五通桥等处設立分厂。30年秋增資至法币400万元，32年1月增資至中儲券1,000万元，同年8月再增資至中儲券4,000万元。战时为便利管理起見，就全国分为五区，各設区管理处，均隶属于总管理处系統之下，华东区管理处設在上海，华南区管理处設香港，华西区管理处設重庆，华北区管理处設天津，华中区管理处設汉口，胜利后均改为分公司，滬杭被敌强占各厂均已发还，34年11月調整資本为法币4,000万元，36年5月增資至36亿元，內32亿元由美亞股东增認，其办法为固定資產升值26亿元，現金認繳56,000万元，合每一老股送65股，認14股，其余4亿元作收購美兴地产股份公司之用。

1947年董事長为蔡声白，董事：莫如德、童莘伯、龔銀緯(鑄亞铁工厂董事)、邱鴻書(利亚实业公司董事)、黄榕庭、孙瑞璜、沈体仲、程慕瀾。監察人邱伯銘、沈熊柏②。

抗日戰爭结束后，該公司在上海計有第二厂、第四厂、第六厂、第七厂、第九厂等五个厂。在苏州設有第三厂，杭州設有第八厂，乐山設有染煉厂，其余香港、广州、五通桥、天津、汉口均設有分厂。主要設備，上海有織机268台、絡絲机10台、并絲机12台，撚絲机45台，搖絲紓机9台、花綫机2台，翻絲机12台，漿絲机4台，烘絲机3台，倒筒机

① 中华民国实业名鑑596頁。括弧內的注系編者加的。

② 中国征信所編：“华股手册”，116頁，1947年10月出版。

1台，縫紉機17台及踏花機6台。漢口有電力織機60台，香港有100台，重慶有86台，天津有50台。

營業額：28年法幣561萬餘元，29年法幣1,125萬餘元，30年約法幣1,400萬元，31年約法幣2,000萬元，32年中儲券2,273萬餘元，33年中儲券5億元，34年約法幣11億元^①。

^① 聯合征信所編：“上市股票廠商概覽”，40—41頁，1947年2月出版。

孙多森和他的面粉工业

一 孙氏簡歷

孙多森，字蔭庭，安徽寿州人，我国机制面粉业之創始者，清末民初有名之实业家。孙氏貢生出身，初領为候补同知官銜。1901年升候补道任上海电报局帮办。其后历任上海商务总会协理兼京师劝工陈列所名誉贊助員、直隶(即今之河北省下同)省商务議員、北京自来水公司协理、宪法研究所副所長。在袁世凱做直隶总督时，孙氏曾任启新洋灰公司协理、直隶工艺局总办。此后，又历任灤州官矿公司协理、漁业公司监督和兩江总督端方时期之并陘矿务局总办、南洋劝业会协理等职。宣統末年，孙氏曾为代表遜清議和代表唐紹儀之隨員，并历任安徽省劝业司長。民国成立后一度被任为中国銀行總裁。

孙氏是官僚出身，从做官而至兼办企业，但他和帝国主义也有一定連系，在民国初期时当过中日合办之中日实业公司买办。

二 阜丰面粉厂之創設

孙氏的基本企业为阜丰面粉厂，1896年籌設于上海，是国人自办机制面粉业之首創者，在阜丰还未設立时，市場上銷售的都是“洋粉”，阜丰成立后，国人在国内各地創辦面粉厂便日漸增加。阜丰成立初期資本仅30万兩，在孙氏的官僚势力哺育下，成立之初即获得清政府准予免稅專利权，其后更乘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机会，阜丰业务日益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阜丰虽与其它民族工业一样遭到帝国主义的排挤打击，但依靠它的良好設備和官僚买办力量渡过困难，其后在抵制外貨期中又发展了业务，并先后吞并上海的祥新、裕通、信大、新 乡的通丰和蚌埠的信丰等面粉厂成立了通惠实业公司，該公司除投資各面粉厂外还与中孚銀行联成一起

号称“通孚丰”财团，中孚是孙多森之弟孙多钰创办，多钰为美国留学生，毕业回国后曾先后任吉长铁路工程师、滬宁铁路局长，1935年创办中孚，为中孚的董事长。

阜丰面粉厂从创办时的资本30万两，逐渐增资至100万两，至抗日战争前拥有资本300万元，资产总值千余万元。据日本“中华民国实业名鑑”所载，阜丰在抗战前的总经理为孙景西，大股东为孙穉筠、孙勉成、孙履平、孙章甫、孙养儒、孙景西、孙陟甫、顧竹侯、龔景張、寿景周，从这个股东名单上看阜丰主要是孙氏家族的事业^①。

阜丰面粉厂筹组于光緒22年，发起人为孙多森氏，总公司初设于北东京路15号，建厂房于莫干山路38号。该厂正式开工日期是光緒24年(1898)，迄今已有50多年的历史。它在规模上，不但是我国最大的一家；而且它产品的商标，即“老車牌面粉”，也风行全国，而其粉质精良，更是中外人士所称誉。阜丰的厂址是很大的，厂地面积有70亩之多，麦仓是民国26年10月建筑完成的，这座仓象一座大楼，是由24座鼓圆形的水泥大仓和14座小仓组成的，分列为三排，初看的人，往往误会为是榨油厂里的瀘油池，实则是儲麦仓；大仓每座深达6丈6尺，可儲小麦16,000担，总共儲麦量当达50万担之巨，足够阜丰一个月之用。机械設備，也至完美。諸凡运麦、計量、篩麦及吸灰等部門，均系利用机械自动管理。按現有工人数，約共500多名^②。

該厂在抗日战争前机器設備有美国出品26部，英国出品五、六十部，平均每年可出面粉約850万包，麩皮96万包，其最近3年盈余如下：21年258,267元，22年258,442元，23年305,173元，尙有繼續增加之勢。閩北光复路之裕通阜記公司亦为該厂經營，系于民15年端阳节向已故富紳朱幼鴻租入，裕通今有資本50万元，經理为孙仲立，厂长为薛琴舟^③。

① 見“阜丰面粉厂調查材料”及参考日本东亞日文会編：“第三回中国年鑑”，第1007頁。

② 上海現代經濟通訊社編：“上海區面粉工業概況”，第9至10頁。

③ 摘自中国聯合征信所編：“上海面粉業概況”，1935年12月25日上海申報。

通孚丰（通惠实业公司、中孚銀行和阜丰面粉公司）所屬面粉厂

厂名	所在地	创办年份	資本(千元)	鋼磨(部)	日产量	工人数	备注
阜丰	上海	1898	3,000注(1)	91	24,700	500	
信大阜記	上海	1921	500	16	6,000	100	原名信大机器面粉厂, 后为阜丰收买
祥新阜記	上海	1921	500	12	3,500	80	原为龔心銘等所創, 后为阜丰收买
裕通阜記	上海	1904	500	24	6,000	120	該厂为朱汝鴻所創1926年为阜丰租賃后被收买
通孚	新乡	1919	500	18	5,000	230	原为袁紹明等創办, 后为阜丰收买
信孚	蚌埠	?	250	11	2,600	?	抗战时期为阜丰收买
合計6家	—	—	5,250	172	47,800	1,030	
关内面粉厂共計122家注(2)	—	—	29,474	1,264	295,024	?	
通孚丰所占比例注(3)	—	—	17.6	13.6	16.2	?	

注(1) 資本数、磨数和产量根据磨夫：“全国面粉厂设备及产量表”1937年7月19日大公报。但信大阜記和祥新阜記的資本数原文有錯誤，根据“中华民国实业年鑑”修正。其余所在地、创办年份、工人数根据“中华民国实业年鑑”。备注則根据調查資料及上海申报。

(2) 阜丰資本数根据“全国面粉厂设备及产量表”。

(3) 根据1937年7月20日上海大公报雜章：“中国面粉工业近况”，注(3)根据注(2)一文結合这个表格算出的。

天津寿丰面粉公司

所在地：总公司 天津意租界河沿路。

制造厂 第一厂，天津意租界河沿路；第二厂，天津河北赵家场；
第三厂，天津河北梁家嘴。

分銷处 北平前門大街。

營業种类：面粉制造。

設立：民国22年7月。

登記：民国23年1月在实业部登記。

資本：国币170万元。

組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倪幼丹，安徽人，前安徽督軍倪嗣冲之子，現任天津裕元紡織公司董事；

周作民，江苏人，年54岁，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經濟学部毕业，原蕪湖交通銀行經理，現任金城銀行董事兼經理，中国、交通、农工、国貨等銀行及中兴煤矿公司、江南鐵路公司、裕大紗厂、中国建設銀公司、中华国貨产銷联合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的董事；

盧統云，江苏人，現任天津市裕元紡織公司經理；

郑鳳藻，天津人，前天津市大丰面粉厂經理，現任天津市裕元紡織公司監察；

張煥文，天津人，倪幼丹宅現在的賬房；

倪少忱，安徽人，倪幼丹之弟；

朱錫編，天津人；

孙俊卿，天津人，年61岁，現天津市增兴厚米谷店股东；

楊西园，天津人，年42岁，現天津市立德米谷店店东。

監察人 修德夫，北平人，前天津市三津寿丰公司經理；
楊耀庭，天津人，現天津中國銀行交際員；
李頌臣，天津人，現天津市殖業銀行董事及福源昌酒店店東。
總經理，孫俊卿。
經理，楊西園。

歷史沿革，由於機制面粉的進口數量逐年增加，至民國3年已達50萬担，為此，民國4年與在津日商三井洋行合資在現今公司所在地，成立了壽星面粉公司，資本為25萬元（全部集股）。這是當時中國唯一的機制面粉廠，營業成績甚佳，但到了民國8年，由於排日運動興起，在成品的販賣上遭受了嚴重打擊，遂由日華合辦改為華商獨營。

以後資本增加到30萬元，營業成績極佳。到民國13年為外國面粉所壓倒，蒙受了損失，當時股東和業務担当者之間發生糾紛，遂休業。民國18年由倪派着手繼續經營，改公司名稱為壽丰面粉公司。

民國22年合併了大豐面粉廠，同年又以43萬元收買了民豐面粉廠。

設備及支出，第一廠廠房用地係由本市意租界市政局租用，每月付地租1,260餘元。自建房屋用費145,000餘元。安裝鋼磨25台及原動機和其他附屬機械等的總用費計45萬元。

第二廠廠房用地面積20畝，地價35,000元。自建房屋用費24萬元。安裝鋼磨22台及原動機和其他附屬機械等的總用費計40萬元。

第三廠廠房用地面積20餘畝，地價3萬元。自建房屋用費95,000元。安裝鋼磨15台及原動機和其他附屬機械等的總用費計27萬餘元。

以上3廠的總的固定資本為160餘萬元。

北京分店的建築費及設備用費共15,000元（不包括10,000元的流動資本）。

原料來源，小麥原料由本市和冀、魯、豫、蘇、皖等省以及國外購入。

產品銷售地，除銷售於本市各商號以外，在各地通過代理店推

銷。賣款，在本市于14日收齊，在外地于20日收齊。

生產情況，本公司日產面粉6千至7千袋。每百斤的生產成本，原料費約6元，工資、修理、機械油、縫口綫、煤、電、稅、面粉袋等費共7角，地租、佣金、保險費、運費等共3角，三項合計共7元多。

營業及損益，本公司在本市河堤面粉市場設販賣門市部，每天早晨銷售產品，每包面粉手續費為5分。

在各地則委託代理店代為推銷。

民國22年，虧損額達8,200元。民國22年春，由於決定增加洋麥進口關稅的影響，麥價猛漲，後來繼政府的棉麥借款之後，美國小麥和美國面粉大量輸入，面粉價格又狂跌，加上申寧、濟南各廠以廉價的美國小麥做為原料制成的面粉大量行銷華北，擴大銷路，本公司遭受了重大的打擊，蒙受了巨大損失，民國23年年終決算，虧損額達247,580元。

（李公緯譯自日本在中國駐屯軍司令部乙屬託班：“華北紡織、制粉工業調查報告”，第249—252頁，1937年5月出版）

天津福星面粉公司

所在地：天津西头大夥巷。

营业种类：面粉制造。

設立：民国8年。

登記：民国8年在北京政府农商部登記。

資本：最初为30万元，民国18年增加至80万元。

組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刘壬三，河北宁河人，曾历任河北省議會議員、吉林省財政厅厅长、天津海关监督、北京政府监务署坐办等职，现为天津市同順永斗店的股东。

董事：刘鶴齡，河北宁河人，曾任吉林木稅局局长；

刘紀庭，天津人，曾任总统府副官長；

張星樵，天津人，前天津万春斗店股东；

胡源汇，河北故城人，前河北省政府职员。

監察人：王云書，河北丰潤人。

總經理：刘鶴齡。

經理：張良謨，河北滄县人，前天津市庆長順同記斗店股东。

副理：張蘭舫，天津人，前庆長順同記斗店股东。

襄理：于华庭，天津人，现在天津市华丰裕斗店股东。

历史沿革：本公司系于民国8年由刘鶴齡、張良謨发起組織，資本为30万元(每股100元，計3千股)。在成立之初，首先建筑了工厂和房屋，并安裝了机器，翌年初，开始投入生产。其内部的組織設营业部和工务部，在营业部下設庶务、麦庫、面庫、机械賬房等科；在工务部之下分为面粉机械股和原动机械股兩個股。

民国11年、17年先后遭受兩次火灾，因損失巨大，工厂濒于毀損殆尽，故停业。后根据股东总会的決議，重新增招新股投資，增加資

本80萬元，用以重建了被焚毀的工廠，民國18年夏，開始復業。

民國22年，鑑於生產量增加和銷路擴大的情況，租用了嘉瑞面粉公司所有的一切廠房和機械設備，擴大經營。

但是，後來由於外國面粉進口，影響所及，面粉價格慘跌，因此不能再繼續擴大經營，民國23年租用嘉瑞面粉公司廠房設備的租約期滿，即廢除了租約，未再繼續租用。

設備及支出，本公司工廠租用土地11畝，每月支付地租366元。自建房屋450間，支出建築費約15萬元。

機械設備：新式鍋爐3套，每套50匹馬力（美國造）；抽水機2台；原動機1台；美國造最新式450匹馬力發電機1台；調和機1台；篩麥機1台；打麥機1台；清麥機1台；去污機1台；圓麥篩1部；平篩7部；絞輪1部；磨子18盤；打包機7台。上述設備費用共45萬元。

工資支出：職員65名，工人155名，兩項合計每月支出工資總額5千元。

每月总支出約12,000元，其他家俱費約2萬餘元。

原料來源：小麥原料係由當地米谷商和天津市近郊購買。

產品銷售地：當地。

生產情況：日產面粉6,300袋，麩皮5百包。每百斤的生產成本，原料6元，生產費1元，合計約7元。

營業及損益：本公司在天津市河堤的面粉市場設販賣門市部，直接推銷。在其他地方則委託代理商行代為販賣。

民國22年營業額為490萬元，純利為5萬元。民國23年賣出面粉170萬袋，麩皮21萬包，營業額約為5百萬元，年終總決算時，約賠損9萬元。

今年頭11個月共賣出面粉約180萬袋，營業額在5百萬元以上，估計在年終決算時，可得純利30—40萬元。

行庄往來：華商銀行一家，永同生、順和、瑞源永、振義等銀號。

（李公純譯自日本中國駐屯軍司令部乙噶託璣：“華北紡織、面粉工業調查報告”，第247—249頁，1937年5月出版）

复兴面粉公司的創設

一 創 立

四川因为气候过热，不大适宜栽种小麦，因之人民也就不大习惯食用面粉。偌大的重庆城，在20年来以前，只有若干土磨坊，若干切面铺，而并没有机制面粉和机制面条。目前（指1944年——编者）重庆三家面粉厂的生产力，每日在3千袋以上，实际生产量也超过了每天2千袋，其中历史最久，规模最大，产量最多的，要数鲜特生、鲜伯良兄弟主持下的复兴面粉公司。

复兴面粉公司和复华银行以及新近成立的华兴地产公司，是同一系统，都是鲜氏兄弟所经营的。最近该公司经理鲜伯良把重庆人怎样学会吃面食的经过披露了出来，这里介绍给读者。

在民15那一年，重庆若干工商界人士，凑集了十来万元的资本，在牛角沱开设了一个新丰面粉厂。这第一个面粉厂，无疑的规模是很小的，效率也是很低的。最初生产是每天100包，出品品质还好，市场销路也不坏，因为生意不坏，于是在民17年增加设备，扩充生产至每天200多包，推销就没有以前容易了。

因为新丰生意还不算坏，在民18年，另外有人又在江北香园寺创办了一个先农面粉厂，每天出品也是100多包。他们没有想到重庆面粉市场几已饱和，再加上双倍的产量，推销方面便开始发生困难了。所以面粉拿出二、三个月还拿不到钱，竟是常事，如果催讨的太急，便说面粉不好，叫厂方取回余粉。

谁知到了民国19年，又有许多不明面粉市场内容的人组织了一家瑞丰面粉厂，致生产愈益过剩，竞争愈益剧烈。他们以高价竞买原料，以低价竞卖成品，先农改组了三次，瑞丰改组了二次，新丰因历史

較久，資本較多，還能勉強支持。

在民國20年前後，B廠面粉產量總數在600包以上，而市場上只能消納300多包，因竟購原料而麥價抬高，竟賣成品使粉價減低，大家都沒有好處。所以曾一度組織聯合營業處，共同購麥，共同賣粉，結果麥價粉價都穩定了，可是過剩的粉還是沒有法子處置，終於又散夥了。不特先農、瑞豐又改組了一、二次，連新豐也擱淺了。

鮮氏兄弟是新豐的主要股東，廠雖停了還有開支，還有債務，股東是有責任的。他們於是把市場情形研究了一下，發現市場可以消納面粉約800包，其中大部為比較低廉之土面粉，如果機制面粉能和土面粉一樣便宜，面粉廠生意還是可以做的。他們於是決定重新改組，以9萬元代價接盤新豐全部廠房機器，並易名為復興。

當時幼稚的機器面粉業，正在鬧着不景氣，所以復興募股是相當困難的，大家因為面子關係，都不以為在投資，而以為是在捐款。結果只募到6萬元，又向重慶中國銀行借到5萬元，除付廠房機器代價九萬元外，還有2萬元的流動資金，這是十年前的往事。

23年夏改組，到24年夏，辛辛苦苦經營了一年，結果可以支持。於是派人到漢口福民面粉廠去參觀，並請該廠華工程師入川指導。華工程師認為復興機器太欠缺了，必需大事補充。於是又湊了4萬元新股本，在漢口添購了2萬多元的機器，又花了些運費，便又將新股本用完了。

機器改善結果，電力不加，管理費用略加，因生產量增加了3倍，成本減低到和土面相差不遠，復興的基礎才算鞏固，可以和其他兩家面粉廠以及土磨房競爭操必勝之券了。可是切面鋪故意抬高洋面面條價格，而土面面條價格仍舊低廉，切面鋪大獲其利，廉價的機制面粉還是推銷不開。

接着復興便自己出來推銷了，開了10家切面鋪，機制粉切面賣價和一般切面鋪的土粉切面一樣，只賣800文一斤。而切面鋪之機制粉切面則賣至1,400文一斤，結果復興切面不脛而走，每日可消百餘包，他鋪亦不得不同樣減價，銷路增至每日500餘包。又在蒼坪街自設蒸

饅頭，出賣白糖蒸饅，一個銅板一個，顧客極為擁擠。此外又設法破除吃面口渴，午時開花等誤解，重慶人到了26年抗戰前後，才真學會了吃面食。

從26年下半年至27年上半年雖已有了戰爭，而來川的下江人還不多，3家粉廠競爭還是異常劇烈。復興頗有贏利，先農沒有賺錢，因為怕空襲危險，乃作價6萬餘元頂與復興作為工廠，瑞豐原來也商議合併，因為漢口撤退，生意轉好，所以沒有實現。28年大家生意都好，面粉供不應求，次年政府開始施行糧食政策，才變成一個只有佣金沒有買賣的代辦廠家。

戰後復興面粉公司有添置機器增加每日產量為3千包至5千包的計劃。

（摘自楊開道：“面粉與重慶”，1944年9月4日重慶大公報）

二 概 況

復興面粉公司為重慶最多產量之面粉公司，有一、二兩廠分設於牛角沱及香國寺，第一廠原係新豐面粉廠創立於17年，嗣以營業不振，於23年停歇，由該廠股東鮮伯良氏出面清理聯合當時之債權人受盤改組，當即易名為復興面粉公司。第二廠原係先農面粉廠，創立時期，約與新豐同時，因銷路不暢，宣告招盤，續經復興以九萬元盤入，而將原有制面工廠冠以第一廠，先農廠則依次定名為第二廠。31年又以14萬元盤入合川面粉公司。

公司資本在受盤新豐後確定為12萬元，27年增為40萬元，28年為100萬元，30年為200萬元，31年將增至500萬元。職工約170多人。

董事長：鮮特生，董事奚致和、李汝衡、朱大為、鮮伯良。監察：胡銘坤、賈久秦。總經理：鮮伯良，經理葛喬。

（摘自1942年6月國民黨四聯總處工商調查材料）

三 廠主自述起家經過

在舊社會里，我的資本是從哪里來的呢？我18歲時在西充縣立

师范毕业后，还在当小学教员，并不是个有钱人。后来我抱着“找钱发财”的目的来到重庆，首先利用在一个军阀的军医处给人管银钱的关系，从中贪污，两三年就搞了一万多元。然后又搞公债等投机活动，我的钱越来越多，资金就这样积累起来。

我捞了一份本钱后，觉得“华尔街”的道路很好，我就向江海银行入股一万元，辞了军医处的事，到江海银行当副经理，向资产阶级的道路发展。那时正经理主持业务，投机做申汇，大吃其亏，使银行成瘫痪状态。我一面幸灾乐祸，袖手旁观，一面就乘机把他挤下台，当上了江海银行的经理。这时正值复兴面粉厂弄到资不抵债，被迫招盘，我又以银行经理这块招牌和债权人资格，出面转圜，把这家面粉厂一口吞下担任了复兴面粉厂的经理。这时我一手掌握了江海银行，一手掌握了一个新型工厂，工厂有了银行作背景，就利用资金，扩充设备，加紧剥削工人，很快就把一个日产200包的小厂壮大为日产一千多包的大厂。

为了进一步赚取利润，我除了一般的剥削外，更进而实行操纵垄断，左右面粉市场。遇到市面上麦子少了，就提价，麦子多了，我就让瑞丰、先农两厂去买，他们根本没有银行作后台，买不了好多，等他们买足了，市价落下来，这时我才伸手出来一网打尽。这一来，我的成本既低，产量又大，先农厂搞不赢我，被我挤垮，我只化了4万元就把它买了过来，取名复兴第二厂，我仍叫原来先农的厂长当厂长，每年分点红给他，他感激我的照顾，还不知道这是我使用了“大鱼吃小鱼”的恶毒手段。接着瑞丰厂竞争不过我，也被我吃掉。这样，我就有力量操纵重庆的面粉市场了。那时小麦面粉的价格起落，都要唯我的马首是瞻。人家称我是“面粉大王”，我也颯然地当之无愧。

到了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外省人内迁重庆，面粉供不应求，一年我就赚了20多万。我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赶紧将第二厂也扩充为日产一千多包的大厂，更拚命的榨取利润，这时市场由我独占，利润由我主宰，当时每袋我只要净利一元，有人问为什么不加价？我还假仁假义的说，粮食是人民生活的必需品，不能把利看厚了，实

实际上我有很深的用心，我是怕利潤看高了，大家眼紅，都跟着起來搞面粉廠，就會分了我的油水，在戰爭平息以後又會造成過剩，使我不能長期的無限制的剝削下去。可見資本家無論何時何地都想的是如何剝削，根本沒有什麼好心眼。

這時我覺得江海銀行是浙江人搞的，我不能在江海銀行任所欲為，頂好是單獨搞自己的金融系統，變成一個像華爾街那樣的大老板。於是從復興面粉廠中撥款6百萬，創辦了復華銀行，自任總經理。同時勾結軍閥官僚，放高利貸，作黃金美鈔生意，投機倒把，修洋房，坐汽車，討姨太太，狂嫖濫賭，隨意揮霍，走上了更加殘酷剝削廣大勞動人民的道路，陷入了更加腐化墮落的生活。但是不管我怎樣地挖空心思發財致富，在反動統治的舊社會里，在動亂的潮流中，誰都掌握不了自己的命運。正當我在得意忘形的时候，抗日戰爭結束了，市場物價陡跌，銀行錢莊放款收不回來，相繼倒閉的很多。復華也感到周轉不靈，我因賠累太多，無資可增，陷於困境。於是，正像我過去乘人之危，吃掉別人的情況一樣，這一次我也不能不在別人增資改組的手段下，被趕出復華銀行，冷清清的回到了復華面粉廠。

可是資本家唯利是圖的根性是很深的，我雖然在復華銀行失敗了，但我並沒有死心，我還指望利用“復興”的基礎來重整旗鼓。誰知抗日戰爭勝利以後，在國民黨的反動統治下，四大家族不顧人民死活的搜刮榨取，物價飛漲，金元券、銀元券劇烈貶值，再加上特務敲榨，官吏貪污，復興面粉廠的黃金時代早已過去了。雖然我兩次增資竭力掙扎，又出賣了南充面粉廠，把資金集中到重慶，但在黑暗動亂的社會中，仍然是負債纍纍，弄得來沒有錢發工資，沒有錢進原料，欠顧客的面粉也交不出，奄奄一息，頹勢無法挽回。這就是我在舊社會中，依靠剝削起家，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結果。回顧我20多年的剝削生活，損害了社會人民的利益，到頭來還是不能掌握自己的命運。

（鮮伯良：“決不再留恋剝削生活”，重慶工商1956年第1、2期合刊第43—44頁）

張裕釀酒公司

沿革：烟台張裕葡萄酒公司成立於清光緒 18 年(1893)。為粵東張弼士所手創。張氏原為南洋富僑，生平以興辦實業為素志，清同治 10 年，氏在南洋應荷屬法領之宴，席間飲葡萄酒而甘之。因詢其制法，藉悉吾國烟台為種植葡萄佳地。及光緒 17 年返國，乃躬自來烟調查，以資本 300 萬購東西南三山為葡萄園，开辟之始，日雇工千人，碎叢石為薺泥，然後種植，其策路盤縷，艱苦困難，概可想見，是后，又興建廠屋，掘筑酒窖，悉心規劃，20 年而始具規模。其後，復因戰事影響，苛捐繁重，管理稍一失宜，遂致竭蹶不振，6 年前再不戒于火，遂由中國銀行代管。

中國銀行與烟台張裕釀酒公司及烟台啤酒公司，先後發生貸款關係，接管經營，所有出品，皆聘用外國技師釀制。

(摘自“烟台之釀造業”，中國經濟研究會出版：經濟研究 2 卷 3 期)

張弼士創辦張裕釀酒公司經過：張弼士，張裕釀酒公司創辦人。張君世業商致巨富，清末捐道員，值海禁初開，粵省得風氣之先，飲食服御，以及交際酬酢，日趨歐化，烟必雪茄，酒必白蘭，漏卮所出，日有增加，爰創張裕釀酒公司籌備處於香港，聘德人及丹麥人各一，分任技師。初以華產葡萄不适宜於釀造，因渡美考查，購辦葡萄苗一批，以備歸國試種，并就美聘一園丁，擔任種植，時逾三載，已屆纍纍結實之秋，詎望眼欲穿，願仍華而不實，平素壅土堆肥，灌溉培護，初未稍疏忽，雖綠蔭濃郁，蒼翠可愛，奈結子之望杳不可期，園丁徬徨無策，壤土之不宜歟？抑氣候之不適歟？胥無術以取決，先生乃又聘一地質學家，從事於土壤氣候之考查，遍歷各省，所至研討，最後鑑定為山東半島之烟台地方，兼有大陸海洋二種氣候為最适于美種之栽植，先生

乃亲赴其地，購得东西兩山种植場，計千余亩，辟地二区，小作試驗。三年后竟能結实，惟小仅如豆，色青而淡，味酸以涩，不堪入口，时称之謂珍珠葡萄，所聘西人多懊喪請辭。先生于是再度赴美，更採購大宗秧苗及智利肥田粉，并重金加聘一植物学專家，与前者通力合作，重新試驗，大批播种，一面建厂舍，購机器，注册登記，招工訓練，越三載而覩成，于是此張裕酿酒公司遂呱呱誕生，并在兩技師指导之下，而正式开工矣。时清光緒23年(1897)也。复因所需玻瓶为数至伙，乃再斥資建玻璃工厂，自行制造。每岁葡萄成熟，輒开始酿造，依次貯存，历十数寒暑，直至民国3、4年間始出而問世，故所售者都为积藏十余年之品，其甘冽芳香，实不在“五帽”、“老斧头”等牌号(洋酒白蘭地——編者)之下，故舶來品所受影响殊巨。民5張先生与世長辞，寿七十有七岁。

(摘自1943年7月27日南京民國日报)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

一 概 况

簡玉阶先生的一生历史，可以說是中国民族工业史的一段縮影。

他的故乡是聞名的手工业区——佛山，当資本主义的商品廉价傾銷中国市場，佛山的手工业逐漸衰落，大概在光緒20年間，他那时才18岁，便到对外通商的香港，开始学习經商了。

和无数的民族工业家一样，他沒有受过什么正統教育。18岁时，随他的胞兄照南先生到日本学习經商，担任抄写电文和記賬。甲午之后，胞兄在日本运銷香港的瓷器店收盤，他們兩兄弟回到香港，人地生疏，走头无路，于是他倆便凭着在日本办瓷器旧主顧的門徑，繼續办日本瓷器回港向南洋一帶銷售，別人坐着鋪面等顧主，他却到处兜售，业务一天天好起来。

光緒30年間，爆发了著名的“馬福夏”事件，中国人民对于新兴的資本主义国家——美国“門戶开放，机会均等”的侵略面目掀起了广大群众运动的抵制美貨风潮，正如历史上所有抵制外貨运动一样，当时民族工业得有一个喘息和发展的机会。

不用美国貨，不吸美国烟便是当时的口号，早在光緒20年已在中国設厂的英美烟草公司这时大为影响了。人民改吸北洋烟公司和朱广蘭的香烟。玉阶先生兄弟倆便有了开办南洋烟厂的計劃。

南洋烟公司初办时，只有資本10万元，他倆聘請了外国技师回来配制，生产方式仍是半机器半手工的。可是不到一年，抵制美貨运动給清政府的媚外政策鎮压住了，他的烟公司便倒亏十余万元。

他們兄弟倆对于这样的亏累并不气馁，为了填还欠債，玉阶先生跑到暹罗南洋一帶推銷和經營洋什商品，不久以后，便爆发了辛

亥革命。

辛亥革命給予中国工业生長的机会,同时,华侨对祖国的热爱使民族工业的产品获得广大的市場,南洋烟公司站稳了,并且由玉阶先生僱兄弟及其他親屬联合經營,改名为“南洋兄弟烟草有限公司”以后,一直到欧战前后,南洋公司的业务有如紅日东升,扶搖直上。从香港一地百余工人,发展至上海、汉口、东北等地均有分厂,工人万余人。民国7年总公司移至上海。

当南洋这一支新兴的民族工业抬头起来时,馬上便遭到在中国設厂的外国烟草公司所排挤和傾軋。

(摘自清原:“簡玉阶先生和他的事业”,經濟导报1947年24期)

二 創办的三个时期

昔日吾国只有水烟旱烟皮絲等之生产,自欧美卷烟,輸入东亚,国人尙吸者日多,卷烟事业,遂日臻发达,虽曾有北京之大象、上海三星、营口复記者,起而与抗,然皆不消迹,而为外商之所独操,清光緒31年,天津有北洋烟公司之設,营业尙盛,时簡公照南方随其叔銘石先生营商海外,身处异邦,受环境之刺激,爱国之心綦切,鉴于外貨日益猖獗,每岁漏卮之失,为数不資,非謀遠流开源,振兴国貨之策,急起挽剂,則經濟侵略,祖国之命脉系之,乃怀救国之抱負,应社会之需要,对于烟草一項,悉心研究,商諸銘石及昆仲孔昭、靜山、玉阶鑑川英甫諸公,湊集資本洋10万元,于光緒32年2月間,組成南洋烟草公司于南方,盖寓南北相峙与北洋并駕对外之意而名焉,該公司厂設香港鵝頸桥,出品仅双喜、飞馬烟2种,以銷不甚暢,未一年而資本已罄,照南先生虽曾滿拟維持,屢議加本,然以应者乏人,卒致破产,結計亏耗,約达洋20余万元,照南除將私有創設之怡兴泰号資產,悉数抵偿外,不敷尙巨,此少数人組合之南洋烟草公司,遂不得不告一停頓矣,惟照南之志固絕不以之而稍餒,其奋斗之精神,且以之而益坚,感前次之失敗,由于資本之不足,及制造之未精,乃重訂章程,規画改組,但入怀觀望,投資犹豫,迫而复商于叔父銘石及昆仲諸公,設法籌資,

于清宣統元年2月，重整旗鼓，鼎力再起，易名为“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先是，銘石久商安南，暹罗向設有簡氏兄弟運銷商品之代理，至是，銘石由安回港，同心擘划，玉階君赴暹親主營業，其出品為雙喜等烟受華僑之歡迎，所向盛行，復以華僑多礦工，受外商之壓迫，愛國熱度至高，以愛吸該公司出品故，遂由彼輩之轉輾迂運，而遍銷于暹罗星嘉坡爪哇南洋群島，民4該公司所出之三喜牌消胃頗佳，遭忌某公司（英美烟公司——編者），謂形似彼之某牌，提出交涉，几致興訟，以勢不敵，忍莫與爭，將該牌改為喜鵲，不意塞翁失馬，禍兮福倚，經訴諸社論，群起贊助，喜鵲及各烟營業，反以之激進，爰先設分公司于廣州，時該飛馬烟雖已發迹上海，然來貨間續，銷區亦只及滬埠之廣東街，該埠人士，初多不知有該公司者嗣以陳才良先生等反對某外公司，南渡赴港，與該公司妥洽，聯絡烟紙同行12家，合組代理，極力推銷，由該公司之充量接濟，飛艇等烟，遂廣銷于滬埠，該公司亦以上海為商業之樞紐，北京為首都之所在，又相將各設分公司焉，滬平之有國產卷烟者，實以該公司之烟為嚆矢，該公司之名，亦遂漸振于吾國人之耳鼓矣，是年冬，以無限公司名義，呈准農商部註冊，并蒙政府頒額褒獎，資本總額為100萬元，民7加資本至500萬元，再行呈准農商部註冊，并于吾國各省及英荷各屬等埠，設立分司，至是時也上海既有工廠之分設，復于山東坊子，安徽劉府，河南許州等處分發美國烟種教勸播植，設立烤烟廠及收葉處，購辦良好烟葉，以每年制各烟，銷途日廣，利亦俱增，致漸惹敵家之注意，對於國烟，不惜以削價待儼，坐收漁利，或乘入挫折，設計吸收，或借辟造謠企圖傾復等種種手段以逞其破壞壟斷之陰謀，而南洋適當其沖，幸照南深謀遠慮毅力主持，各界團體維護備至，多方援助，此迭經霾霧罩之國貨一綫曙光，得以垂耀于今，其建業之精神及意志，誠足佩者，照南先生昆仲惕于外侮之迭乘，非群策群力，為強有力之大集團組織，不足以抗御頑敵，而挽利權，乃以利益之所沾，公諸國人，于民8之7月提擴充股額為75萬股，每股計洋20元止，招足資本總額共計洋1,500萬元，當時加入者，有前大總統黎公、湖北督軍王公、省長何公、浙江督軍楊公、及海內名

人楊少川、薩桐蓀、郭標、勞敬修、樓恂如、陳炳謙、饒必僧、徐輔洲、朱葆三、王一亭、謝衡牕、袁履登、張闡坪、李煜堂、徐冠南、錢新之諸公，民8之11月再呈准農商部注冊，即于10月1日，開始營業，年銷烟值達洋3千餘萬元占為國烟地位之首席，照南在日，對於慈善公益事業，慷慨樂為，造就學子，尤具熱忱，如助賑各災省區遣送學生赴歐美留學興辦學校及慈善機關等，不勝筆述，民12秋，該公司創辦人照南逝世，由玉階先生繼任總理，實卿先生充任協理，民14實卿又作古于美洲，遺缺由孔昭先生繼任，民17孔昭辭職，由英甫先生繼之，數年來，該公司雖以環境變遷，工潮之澎湃時起，敵家之侵迫愈甚，各烟之競爭日烈，而稍受影響，然玉階與英甫二公，均能振刷精神，克承照南先生之遺志，解除環境上之一切障礙及困難，力事革新，銳意進行，所有工廠內一切機關設施，均照最新式科學化布置，公司內部亦整飭完美可觀，現有出品如梅蘭芳、白金龍、紅金龍、大長城、大喜、金斧、大小聯珠、雙喜、飛馬、新愛國、大愛國、八角、大福祿、地球、和平、佛手、相知、秋千、錦標、尖角等牌香烟，均烟質精良、價格低廉，行銷所及，備受各地士女之贊許爭購，營業日上，前途正未可量，按該公司為吾國偉大工業機關之一，有利於國計民生者至巨，想必為國人之所深愛護而屬望焉，爰為小史如此。

我國烟草事業，向為外商所壟斷，華人欲起而抗衡之，旋即一蹶不振，如北京之大象，上海之三星，營口之復記，不可一二數，當前清光緒31年間，天津有北洋烟草公司之設，營業頗稱發達，而南洋烟草公司，亦同時崛起于南方，其定名為南洋公司者，蓋欲與北洋公司，分峙南北，并駕齊驅，同興國貨，共挽利權，免令外商以一紙烟之微，每歲輦我巨款于海外也，北洋公司，卒以不支，而南洋公司，自開辦至今，經歷20餘年，由少數人股份公司，變為簡氏一家兄弟公司及變為多數人股份公司，其資本由10萬元，進為百萬元，再進為500萬元，更進為1,500萬元，其銷場由港粵而推之南洋群島，再推至長江流域，更推至黃河流域，及東北各邊，此20餘年間，前之十餘年，則以營業未發達之故，為公司本身之憂，后之十餘年，則以營業漸發達之故，觸同業

敵家之忌，自茲以往，銷行愈廣，嫉妬愈深，駭浪驚濤，紛至沓來，自屬事勢所無免，我4万万同胞，知國貨公司成立之不易，閱歷之多艱，相與保護維推，塞此莫大之漏卮，亦愛國者之責也，茲將該公司之歷史，約分為三時期敘述之。

第一時期 該公司為已故總理簡照南君所創辦。當光緒31年間，國人鑒于華工禁約，知非振興國貨，無以雪耻救亡。是時照南昆仲，隨其叔父銘石君，經商海外，刺激尤深，亟思組織公司，仿制舶來品，借挽祖國已失之漏卮。再四籌維，以烟草一項，最屬消耗品，而國人購吸者日眾，既莫能強遏其流，究不如自濬其源，當將紙烟事業，詳加研究，遂與其叔父銘石，及其昆仲孔昭、靜山、玉階、鑑川、英甫等，籌商辦法；其時梁澄波、阮煥如、張讓周、曾星湖、王吉藩、招書三、楊輯五諸君咸建其議。湊合資本10萬元，光緒32年2月，組織成立，設制造廠于香港鵝頸橋，是時出品，只有双喜、飛馬烟牌二種，銷行不甚暢旺，未及一年，資本告罄，照南君設法極力張羅撐撐，屢議增加資本，未得各股東之同意，不得已宣告收盤，計所虧折，已達20余萬元。照南君悉將其所手創之怡興泰號鋪底，抵填債務，不敷尚巨。而第一時期，少數人股份所組織之南洋烟草公司，至此遂告一結束矣。

第二時期 照南鑒于前時之失敗，半由于資本之薄弱，半由于製造之未精，得此失意之經驗，心愈苦而志愈奮，亟思再接再厲，轉敗為成；于是訂定章程，重行組織。當時人懷觀望，募股總無把握，迫得商諸叔父銘石及其一門群從，設法籌資，鼎力上場，易名為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時則前清宣統2年2月也。先是簡氏兄弟，曾有商品運銷暹羅，向托暹商經理，至是玉階君親赴暹羅，設立怡生公司，直接行銷，借作烟草事業之后盾，且圖推廣新嘉坡南洋各埠烟草之暢銷。銘石君久在安南經商，至是亦同回香港，與照南悉心擘畫，共謀烟草事業之發達。南洋華僑久商于外，屢受外商之壓迫，愛國熱度激而愈高，至是咸愛用該公司出品，其中尤以矿工為最多；矿工居無定所，以慣吸該公司双喜香烟之故，每轉一埠，輒載該香烟而去；于是該公司出品，遂漸暢銷于暹羅新嘉坡南洋群島。當民國4年，該公司在港出之三喜牌香烟，

大受社会欢迎，遂为某公司（指英美烟公司——编者）所忌，提出交涉，謂与某牌形式相近，指为冒牌，势將兴訟，卒以势力不敌之故，隱忍莫敢与爭，迫將三喜牌改为喜鵲牌，將不得已之苦衷，訴諸社会，各方皆代抱不平；而喜鵲牌及各种牌推銷，同时为之猛进。于是謀設分公司于广州，又以北京为首都之地，上海为商业樞紐之地，華人出品，当于此等場所，先图发展，故同时于北京上海，亦設立分公司，民国4年冬，以无限公司名义，呈准农商部注册，并蒙政府頒額褒獎，时資本总額为100万元。民国7年，改以有限公司名义，再行呈准农商部注册，資本总額为500万元；中国各行省，及外洋英荷各屬地，均設立分公司，而上海方面，早經分設制造厂，先經購运美国烟种，將烟草栽植法，編印成書，傳播于山东坊子，安徽刘府、河南許州一帶，广劝种植，并設厂烤烟叶，每岁收購烟叶，为額綦巨，所制各种香烟，行銷内外，純利逐年增多，漸为敌家所忌，种种風潮，遂因之而迭起。自20世紀以来，商业竞争，黠者（指英美烟公司——编者）每挾其“托拉斯”势力，巧为吞并之計，始則削減貨价，令小資本公司，无利可图，难于对峙，待其力憊，然后独收其利益；如其屢經挫折，仍与久持，則又改变方針，設計吸收之，餌以厚利，話以甘言，或为全盤之讓渡，或为股份之交換，多方助誘，务令就彼范圍；否則：厉行其破坏手段，造作种种謠言，以傾复之，甚或設計献殷勤于所在国政府，今日为某項之協議，明日为某項之協議，稍一不慎，每易墮其术中，而商业遂归其囊括。烟草事业，尤为黠者所竞争，南洋烟草公司适当其冲，故备受此种風潮，几于无岁无之；迹其所造謠言，前后互殊，而最忌者，乃在国貨兩字，必先將国貨兩字推翻之，乃能为所欲为也。于是乎借复籍一事，阴行其推翻之策。往时照南君經商暹罗安南日本及南洋群島之間，所在地方，每有商事交涉，因无中国領事保护，或国弱保护不能得力之故，不得已寄名外籍，此为海外华侨所慣习。前此我国政府，尙无国籍法之頒布，无所谓复籍之禁也，华侨之占有他国国籍者，均未脱离中国国籍。若謂兼有他国之国籍，即非中国之国民，則虽謂海外华侨，比比均非中国国民，无不可也。而忌者即架大題目，

借此为詞。以傾復照南君時，傾復公司，借以推翻國貨兩字。駭浪驚濤，掀天撼地，雖有智者，亦不免為所搖撼，遂至有取消註冊之舉。時則上海總會，上海華僑聯合會，上海粵僑聯合會，及各大團體，與粵省商學各界，海外華僑，文電交馳，同聲抗辨，人心未死，公理大明，註冊即以回復，照南亦同時脫離寄籍，由我國內務部給照證明之。

第三時期 照南昆仲，鑒於外侮之頻仍，以為一家公司，斷難持久，不如公諸國人，俾同胞咸獲投資，合群策群力，共策進行，乃可以御外侮，而挽利權也。民國8年7月，遂有擴充改組招股之議，先由新舊公司議定契約，舊公司舉出代表簡照南、簡玉階，新公司舉出代表錢新之、陳青峰、勞敬修、陳炳謙，會同簽字。旋即編定章程，登報招股，額定資本1,500萬元，分為75萬股，每股20元，凡海內外中華民國國民，均得附股，一時投資附股者，頗為踴躍；軍政要人，咸投巨資，海內知名之士，如張菊生、薩桐蓀、楊小川、徐翰洲、朱葆三、王一亭、謝蘅臚、袁履登、奚萼銜、孫梅堂、張蘭坪、徐冠南、招畫三、馮少山、黃奕住、李煜堂、梁培基、歐彬、郭標、郭樂云、海秋、樓恂如、李守一、潘澄波、邊浩卿、饒苾僧、曹秉權諸公均樂附股，共計股東15,500余戶；推舉公正人盛竹書、陳光甫、周清泉、黃式如諸人，點收舊公司全盤物業，定自民國8年11月1日起，為新公司營業時期，同時呈奉農商部核准註冊。自改組以來，力圖擴充，現計香港方面，製造廠凡三所，上海方面，製造廠凡五所，山東坊子、河南許州、安徽劉府均有焙煙廠，漢口新設製造廠，正在準備開機。

（添垣然：“中國南洋兄弟煙草公司小史”1931年6月9日時事新報）

三 1931年董監事名單

南洋兄弟煙草公司，昨在東熙華德路，開第十一屆股東常會，到會股東共283,615權，下午一時，開會如儀，公推簡玉階主席，即由簡君報告本屆營業情形，次由監察人勞澤生君宣讀第11年度決算報告書，經眾通過，繼由主席提議，本屆應改選董事及監察人，嗣由股東投

票結果，最多數當選董事周壽臣、李煜堂、簡玉階、黎重光、陳廉伯、郭標、簡英甫、岑伯銘、勞敬修、張闌坪、簡程萬，次多數候補董事，簡孔昭、徐冠南、陳青峰、黃奕住、陳炳謙、陳仙洲、周清泉、王文典、陳禮庭、李應生、羅坤祥、最多數當選，監察人勞澤生、陳廉仲，次多數候補監察人，陳青峰、徐冠南，當場報告，搖鈴散會。

(1931年6月3日上海申報)

四 1937年董監事的變動

1937年4月27日，南洋兄弟煙草公司，在東熙華德路開第二次股東臨時會，及第十七屆股東常會，計到會股東175人，股數為436,792股，219,155權，由周壽臣（香港大資本家南洋大股東）為臨時主席，由主席宣布，依照修正章程案，選舉董事監察，開票結果：宋子文、程叔度、潘杏濃、簡玉階、簡孔昭、宋子良、邗勉仁、胡筠莊、杜月笙、周壽臣、簡敏軒、陳炳謙、陸韻秋、馮炳南15人為最多數，當選董事，又秦穎春、張竹嶼、簡英甫、簡稚川、簡日林五人為候補董事。又陳季臣、邗禮安、勞敬修三人當選監察，又霍亞民、勞澤生二人當選候補監察。

(1937年4月28日上海申報)

五 1930年時停工原因

在宣統初年，紙煙輸入日多，利權外溢，簡照南昆仲，合資創辦南洋兄弟煙草公司，悉心經營，營業蒸蒸日上，民國5年，該公司所出之三喜牌喜雀牌，頗得兩廣及港澳人士所歡迎，營業進步，一日千里，於是上海，廣州，北平，漢口各地，皆設立分公司，代銷紙煙，此時資本增加已至百萬元，又在上海百老匯路設規模宏大之制煙廠，聘請海外制煙專家，烤制煙葉，又將煙草栽植方法，編印刊物，廣勸種植，由是山東，安徽，河南等處之煙葉，日有進步，同時南洋採用國產煙葉，以振興國貨為號召，因此煙支暢銷于各處，民國7年，獲利甚丰，即擴充資本為500萬元，彼時英美煙公司營業減少，較民國4、5年，相去几及一倍，民國8年，海內巨商，均以為英美煙公司資本雄厚，欲與竟

爭，非集合大資本并組織大規模之工廠，不足以與之抗衡，于是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一變成為股份有限公司，以海外人士之援助，不數月而集合資本1,500萬元，每股20萬元，分為75股，凡屬國民，均有認股之權，民國8年，營業頗為發展，后因外國公司競爭，營業稍衰，而每年銷數，尚有10萬箱之譜，至民國17年僅銷六萬八、九千箱，虧折220萬元，民國18年則減為58,000箱，虧折至320萬元以上，營業更劣，又以近年工潮時起，無法維持，不得已而停業，茲將該公司失敗之原因，述之如次：

(一)原料昂貴：烟葉來源以美國為大宗，我國出產烟葉之地，如豫之許州彰德，皖之鳳陽劉府，魯之榆縣、坊子、青州，年產烟葉，價值五、六百萬元，惟仍以美國所產黃金葉種籽播植，鄂之鄧州黃岡，粵之南雄，浙之新昌，贛之廣豐，所產者亦佳，尚合卷烟之製造，但不及美國所產之精良，今滬上流行之烟支，以美國烟葉為本，摻以國產烟葉，乃近年美國烟葉價格漸高，計一等烟葉價格，14年第一季37兩余，至15年第四季漲至54兩余，二年間竟漲46%，同期美國三等烟葉亦漲至15兩許，16年售價微跌，但至第四季仍趨堅俏，近年滬上烟廠之設立，如雨后春筍，烟草之需要既有增無，則烟草價格難望低落，又值金價暴漲，原料之來自外洋者，成本驟增十之三、四，原料既昂成本反大烟價難于低廉，影響于銷路殊大。

(二)出品之遲緩：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百老匯路廠有切烟機60架，制烟機128架，包烟機2架，切烟骨機5架，加香機6架，制盒機36架，浦東廠有切烟機36架，制烟機50架，切烟骨機2架，加香機2架，制盒機16架，切烟機每日出產力可切烟四、五百磅，雙刀制烟機日出烟15萬支，惟近來以工潮關係，往往以空包逕行裝箱，或以乙烟裝入甲罐，或以甲烟裝入乙罐，顛倒錯亂，至卷烟之過松過緊，焙烟之或濕或干，管理員無法處置，每機車一部，照例日出烟5箱，至是每日僅出2箱余，較他廠僅及其半，而其他烟廠工費每箱平均不過10元，該廠工費須26—27元，每箱成本較他人增高17元余，故斷難與人競爭，如欲恢復銷路，勢不能不減輕工本，而又為工人不許，至于該公司之推銷方法，亦

不甚完美，如英美烟草公司年耗广告费数 10 万元，故无论通都大邑，以至穷乡僻壤，无不見其广告，而又利用教士在內地推銷，故我国內地英美烟公司香烟銷路广，而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之香烟，仅銷于交通便利之处，即內地銷路甚少，此非南洋之出品不如英美，推銷法之不善也。

(三)外商之竞争：近代資本集中，大企业壟断市場，小工业以資本少，不能与大企业竞争，往往失敗倒閉，英美烟公司資本雄厚，規模宏大，早有独占中国市場之計劃，近年自得英政府之津貼，竭力扩充營業，增加广告費，往年預算每年广告費仅 10 余万，今已加至 20 余万，又将香烟之品質改良，低价售賣，准备亏本，与南洋烟草公司竞争，以操縱中国之市場，中国人眼光淺，只顧目前，不顧日后，互相嫉忌，同业中一无聯絡，均系自杀政策，民国 15 年后，滬上中国烟草公司风起云涌，但資本既小又无組織，不得不受外国資本势力之极端压迫，令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倒閉，其他公司亦恐难于持久，苟我国各烟草公司完全失敗，外国公司胜利，以达其独占之目的，則利权外溢，与国民經济大有关系。

(四)烟稅之增加：近年烟稅屢加，而烟价反有跌无漲，大联珠原售每箱 200 元，自二五稅实行后，每箱收稅 37.1 元，大联珠連稅仍售 200 元，迨三二五稅实行，每箱抽稅 53.6 元，大連珠連稅仍售 200 元，由前計之，除稅以外，公司实得 163 元，由后計之，公司仅得 147 元，此外尚有空皮換烟，每箱需費 20 余元，是每箱实得之數不及 125 元，較前已減 70 余元，今工資原料俱較前增高十分之二、三，則暗中損失又較前增十之二、三矣，至廉價之烟，如富国、佛手等，每箱除稅所得不过 70 余元，再除工費 20 余元，其用为原料成本者尚不及 50 元，自統稅实行以后，稅局为稽查严密計，运烟之限制极严，甲地之貨不能运至乙地，而公司售貨，則甲地乙地旺淡无常，往往甲地缺貨，乙地滯銷，乃为稅制所限，不能运乙地滯銷之貨，以济甲地缺貨之市，遂令滯者終滯，积而变霉，不特工料成本全数成空，甚至統稅運費亦全归亏折，遞年霉烟之多，亦为損失之大宗，虽現行稅則，霉烟有准予退稅之文，惟章

程細密，手續繁重，非代理商人所能悉，加以報稅運單之上，須將每箱印花號碼逐一注明，退烟之時，必須原箱印花齊全，號碼符合，始准退稅，但長途轉運，印花容易擦落，而代理烟販，拆箱分售，為便是圖，萬難留心原箱印花，故章程雖有退稅之文，而霉烟之能邀准退稅者甚少，故損失卒不能免。

(五)其他原因：我國連年內亂，運輸不通，營業梗阻，武人苛派勒捐，各分公司固當其沖，即各代理處亦不能免，以時局不靖之故，放出賬款，本已難收，益以此等苛捐，各代理處更為困難，倒欠之數，遂至200—300萬元，其他貨倉之被搶，烟葉之被焚，廠房之被占，損失亦近數10萬，故17年度已虧折220余萬元，后以成本愈重，銷路愈縮，至18年度竟虧至320萬元，除以上種種原因外，公司內部尚有暗潮，即簡、張兩大股東爭權，鬧意見，雙方各不上下，不得已而宣布停業，俟賬款收查清楚，再行復業，至于內部詳細情形，秘而不宣，無從查詢，蓋恐工人要求失業津貼，使公司受重大損失，又可借此警告工人，以后安心工作，故表面上因營業衰落工潮激蕩而歇業，實則未必盡然，我國人往往同室操戈，不知對外競爭，求事業發展結果兩敗俱傷，漁翁得利。自本年1月，一面將廠暫停，一面將各分公司極力收縮，徐圖補救。

(1936年6月29日東北商工日報)

六 受帝國主義和官僚資本的迫害

我們的企业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是个具有50多年历史的华侨企业，大約在1916—1917年間，当南洋公司改組为股份有限公司的时候，我父亲花了許多心血，想了許多办法，由当时的北洋政府，批准了公司的一份登記章程，章程里訂明了南洋公司的總經理可以指定他的繼任人选，事实上他要达到的目的就是要把这个總經理的职位世襲地保存在我們家里。当时他掌握了公司的大部分股权，实际上已經控制了整个企业，但是他不以此为滿足，还要更多的保障。他認為仅仅給子孙們金錢和股票还不完全可靠，錢可以花掉，股票也可以

卖掉；只有在章程上訂出總經理可以世襲的規定，才有了可靠的保障，这企业才可以永远傳下去。他的用心不能算不苦，打算不能算不周到，而且这样的章程在中国的工商业史上恐怕也是創举。但是結果呢，我父亲逝世了不到几年，我的两个哥哥也因为生活腐化而相繼逝世，一个只有26、7岁，另外一个也不过30多一点。我当时年紀很小，当然不能当什么總經理，因此尽管我父亲費了这么大的心思，訂了这样的章程，也无法实现。

我們的企业呢，也同样地遭受到惨痛的命运。在我哥哥未去世前，他到美国去訂購烟叶，在美国商人的花天酒地、美人計的种种引誘下，一下子就簽訂了一張2,000万美元的合同，这就等于当时我們整个企业的资产。于是烟叶不断的运来，仓库都堆滿了，而香烟銷售市場却有限，同时还要履行合同，到期就要付款，几乎把整个企业都拖垮了。許多年来，帝国主义用了各种威胁利誘的卑鄙手段来打击我們。举一个例子來說吧，帝国主义挟着雄厚的資金，曾經把我們銷售在市場上的香烟全部收买了去，藏起来，等到霉坏了再大量的拋到市場上去。他們甚至于一直收买到了我們在印度尼西亞(雅加达)的仓库管理人員(那时我們在雅加达有制造厂)，使他們把烟擱霉了再卖出去，严重地破坏了我們产品的信誉。同时，霉烟售出以后，人家是要来換的，这样就使我們在經濟上也遭受到重大的損失。他們就是用这样卑鄙的手段，企图来打垮我們。我們能够支持下来，主要是靠工人的辛勤劳动、广大爱国人士的支持，特别是热爱祖国的华侨。因此，在每一次发生反帝运动以后，我們的业务就蓬勃起来，也一再地把我們从危机中挽救出来。而帝国主义的手段却越来越阴險了，他們就把“英美烟公司”改为“頤中烟公司”。“頤中”是一个道地的古色古香的中国名字，他們就企图这样来蒙蔽欺騙广大的中国人民。

后来，帝国主义又和他們的走狗伪財政部長宋子文勾結起来，通过稅收措施，来打击我們。同时我們企业本身又存在着濃厚的封建性，家庭内部爭权夺利。当时企业的負責人是我的叔父，他感到重重

压迫，非常痛苦，因此灰心意懒，整天地鬧着要出家做和尚去。到了抗战前一年，公司财务周轉不灵，终于逼得我們把家里的部分股份以低价卖給了朱子文，并且还要接受他的苛刻条件，把我們还持有的股份的股权給他支配运用，实质上就是讓他控制了整个企业。这样，他还不放心，又逼着我們和他簽訂合同，承認他可以运用我們的股权。这就是官僚資本的压迫掠夺，这就是官僚資本的猙獰面目。从我父亲逝世的那天起，才不过短短的15年，而我們的企业已成为朱子文的了，我們的家庭也搞得七零八落。我父亲千方百计掌握命运的企图，結果还是落了一場空。

（摘自簡日林：“痛苦的回忆，愉快的展望” 工商界要認清前途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第39·41頁）

馬玉山和他的制糖公司

馬玉山，廣東中山縣人。1878年生，南洋著名華僑。年弱冠即經營商業，以僻處國內，難得廣見博聞，為圖發展，於是遠涉重洋至菲律賓，創立馬玉山糖果餅乾公司於該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遂由菲律賓回國，先在香港創設糖菓餅乾公司，該公司增資至300萬。又設一製造糖薑及裝置糖薑之玻璃廠。其後在廣州、上海皆設馬玉山糖果餅乾公司，其分行遍及北京、天津各省大埠及南洋。1920年又集資千萬在上海設立中華國民制糖股份有限公司，但開設不久即停閉，其後，各地之餅乾糖果公司亦先後倒閉易主。馬氏自營業失敗後，即携眷到南洋，遍遊星洲、庇能、泰國諸海島，原定計劃本擬在海外重振旗鼓，再從事於糖果餅乾事業，但事與願違，在泰國時，家眷忽患病，馬氏本人亦病，於是携眷返香港并轉輪到上海休養。但居住上海頗無聊賴，且以家口眾多，深恐坐食山空，故於1929年8月間又在閘北籌設馬氏糖果餅乾公司，不料籌備粗具，又困於資本，正当此輾轉籌謀之際，忽有前廣西潯州海關監督覃過滬，馬氏偶與其談，即表示願隨覃南行，至廣西平南不及3日，以舊病復發逝世^①。

茲將馬氏經營之糖果餅乾工廠及中華國民制糖公司經營失敗經過錄後：

昨晚6時，馬玉山、嚴直方、勞敬修三君，邀請滬上實業資本銀行家等，在馬玉山公司會餐，籌劃在上海建設糖果、餅乾、玻璃、機器（即製造糖果等者）煉糖廠。馬玉山報告該公司經過情形及最近營業成績云：“本公司始創於小呂宋，初由玉山個人發起，獲利頗厚。在西歷

^① 參看勃德：“現代中國名人傳”67頁及1929年10月30日上海申報。

1911年，移設香港，1916年在香港注冊改為有限公司，收足股本40萬元。翌年，玉山親往美國購辦機器，自行製造糖果餅乾，時因流動資本不充，幸港商陳廣如先生介紹梁燕蓀先生借資10萬元，工廠始克告成，并設分行于廣州星加坡等處。出品暢銷，每100元股本獲分紅利30元，迨去年因設上海支行及京津分行，而增招股款40萬元經已收足。在港則增設玻璃工廠，自制瓶罇及各種日用器皿，已通行市上。在滬則設支行于大馬路拋球場，設分行于北四川路、設臨時工廠于虬江路，規模粗備。本年夏秋間，天津北京兩分行次第開幕，其他長江流域北方一帶各通商巨埠莫不遍設代理處。至于出品，則糖果餅乾玻璃及茄汁桔汁果子露等不下200餘種。港滬工廠作工者不下千餘人，全年工廠製造額約100餘萬元。技術管理營業均日有進步，上年度總結除官利外，計盈淨利10餘萬元。本年雖受物價騰貴影響，預計所盈亦與去年相差有限，現計明年每股可獲紅利25元，以之開作股份則適合百萬元之數。此外，香港星加坡小呂宋公司及本公司所置房產20餘萬元，現下地價日漲，所贏甚巨，留歸將來新股東均沾利益，凡此皆本公司之經過情形及其成績也。”主席嚴直芳致詞云：“糖果餅乾之原料以糖與面粉為兩大宗，現每年進口之糖，約值80萬元，故對於糖果餅乾一業前途極當注意。我友馬君玉山爰以增招股本400萬元，每股25元，遵照有限公司條例在中國注冊，將總行移設上海，以100萬元辦糖果、餅乾、玻璃、機器4大廠，以300萬元辦煉糖廠、合5廠在上海同時舉辦。前4廠香港辦有成效，所需技術管理各項人才港廠可供調用，所謂機器廠者係以修理添補廠中機器為主，仿造零件為輔，其尙待說明者，祇煉糖廠之計劃及其利益耳。

查世界食糖之額，以丹麥英國為最多，每人年用86磅餘，吾國至少每人年亦須3磅，而吾國竟無設廠製造者，有之，如政府前辦之呼蘭糖廠，因時機不合，故無成效，可勝浩歎，此馬君與余等所為殷殷以經營糖業為挽回利權之要着也。其所以先辦煉糖者，蓋糖之為物包含農工商三項而成，但就中國之治安與本公司之需要而論，應分別先後緩急，先從工商入手，以煉糖樹其基礎，自種原料制糖，則俟之將來

耳。煉糖利益約有五端、五厂同地合作，蒸汽馬达，既可緩急相通，貨仓分行，各埠更可互相協助，所收之股，即能生息，其利一也；現計煉糖厂以250萬元之流動資本，大約可達500萬元之營業，而本公司港滬工厂將來推广，年需白糖不下100餘萬元，自用已占制品1/4，且各分行遍設國內外，推銷尤易，營業進行，比較確有把握，其利二也；我國對於糖業，已于民國3年1月頒布獎勵條例，凡制糖公司資本在20萬元以上者，由政府保息5厘，以3年為限，國家既有獎勵保息，商民自樂投資，其利三也；不寧惟是，政府因欲提倡糖業，于保息之外，農商部復于民國5年呈請大總統批准，凡設立公司用機器制糖者，一地方只限一家，以杜競爭，于提倡之中隱示保育之意，較之興辦其他實業，尤有特別待遇，其利四也”（下略）。

昨日下午一時，中華國民制糖公司在總商會開創立會，到會者有籌備主任馬玉山、嚴直方兩君、與發起人嚴少陵、張云樵、楊小川、王一亭、王紹賢、朱進之、勞敬修等。

由籌備主任馬玉山君致詞謂：兄弟系華僑一分子，浮海從事工商業20餘年于茲矣，雖遠適異國，而心未嘗忘祖國也，兄弟創辦馬玉山公司經營糖果餅干，對於糖業關係最切，故極注意。恒以吾國无一糖厂為耻，嘗于南洋群島菲律賓美國各產糖之地悉心考察。回國后，辦馬玉山公司，得國人之贊助日臻發達，屢欲創辦糖業，以無人匡助，遲遲至今，去年遇嚴君直方于海上，相與共同計劃，既荷各界之提挈玉成，得邀政府批准免稅，復承各股東之投資踴躍，已得招足股額，收足第一次股銀，殊深榮幸，嗣后尚希群策群力，扶掖匡助，日臻發達，敢請嚴君報告一切云。次由籌備主任嚴直方君報告籌備經過情形謂：本公司計劃糖厂，起于去年9月間，几經討論，以興辦糖厂，非免稅不足以自存，玉山、直方即于本年正月赴京請求政府免稅，蒙財農兩部提出閣議，即行通過免稅十年。嗣于5月23日開發起人會，着手進行；資本額原定100萬元，以事屬創辦，恐難募集，故先定為500萬元，當時發起人在場簽名認股者占4/5，其餘公募之，舉八人為審查員，審查章程。嗣于6月23日開發起人全體大會，公決通過章程，并定名為中華

国民制糖股份有限公司，因制糖事业与国民经济有关，定名决取广义，以示公诸国民之意。随即刊布章程，7月25日起登报招股，由6家银行经收证据金，未旬日已超过总额500万元，8月4日经发起人大会决议扩充资本为1,000万元，未匝月而已满额。现在第一期股款均已收足，计洋250万元（即1,000万元1/4），分存6家银行，照公司条例，即可成立^①。

中华国民制糖公司，已于本月（11月）15日在总商会开创立会宣告成立，依法选出董事11人，监察人3人。计董事11人：马玉山、严直方、劳敬修（广东鹤山人，泰和洋行买办，广东银行总经理）、李伯行（李鸿章之子，前清驻日及驻英公使）、张馨（大生纱厂总经理）、王万年、张菊生、桑铁珊、曹让之、黎秉经、吴蕴斋（江苏镇江人，金城银行经理）。监察人三人：张云樵、朱进之、杨小川；候补董事：云海秋、杨小川、王一亭（日清汽船公司买办出身，大达轮船公司经理）、朱进之、张馨、沈信卿、周兰槎、钱新之（交通银行经理）、卢子嘉、周佩箴（吴兴人，曾任国民党杭州造币厂长）、陆规亮；候补监察人：贝润生、王儒堂（正廷）、杨瑞生^②。该公司制造厂设于吴淞蕰藻浜泗塘河边，占地190余亩，全厂装置德国格雷芬厂最新式制糖机器，每日可出糖3百吨，规模宏大，为中国未有之糖厂，现建筑完竣，行将开幕^③。

国民制糖公司，为中国最有希望之事业，徒以未开工之前，有董事与董事之争。既开工之后，又以股东观望，二期股款收款无多，致营业迁延无进展之象，坐令日商糖厂施其手腕，不亦可惜。本屆股东会之前早发生两说即：（一）由郭春秧组织之楨祥公司承租；（二）由银团垫款开工；此二者皆取决于昨日之股东会，故昨日之股东会，实该公司之生死关头也。

昨日开会结果，以承租合同损失太大，多数否决，银团合同则以

① 摘自1921年11月16日上海申报。

② 1921年11月18日申报。

③ 1925年3月15日申报。

④ 括号内简历是编者加的。

通过，于是借款成立，該公司营业亦可进行，在股东亦可望公司营业发达于付还借款之息外尚有股息之可派。当开会时，秩序有一番紊乱，并有提議总理代措者，有提議催收第二期股款即作为借款者，然皆以耗費时日停工之損失太大，不若借款可立时兴工，故皆否决。

承租合同否决之故，盖照合同上观，无异將公司出卖，茲擇合同中紧要条款摘录于下：

一、制糖公司将自置全盤地产厂屋机器等項及公司名称营业权商标权免稅权等完全出租于該公司。

二、上述厂屋机器，如植祥公司以为有未尽完全者可以自由添置。合同廢止时，糖公司須照买价偿还，添置費以20万元为度，糖公司不偿清，須照長年一分起息。

三、植祥公司存放制糖公司洋40万元，以为如或植祥公司中途廢止租賃，应付租賃滿期之租金之保証，利息長年6厘，每半年付給一次，植祥公司得向租金項下扣除，但制糖公司須以全部財產及添置之产(即第二項所列)并对于各該产所連帶或附屬种种权利一并抵押于植祥公司，即无异为此存款，添置費、賠償費(因糖公司欲廢約，須賠償植祥75万元)并各利息之担保，并須由糖公司将所抵押之产完全过户于植祥公司。

四、如糖公司未偿清存款，添置費、并賠償費之前，所抵押之产由植祥出面保險，保險費与制糖公司各任其半，若遇損及糖公司厂屋机器等致植祥于繼續两个月內不能使用时，植祥有权得將所收之保險賠款尽先提出清还，植祥原日存款及所欠利息暨代付还一切添置厂屋机器等項，其他当付之粮稅及他項捐款，均归糖公司付清。

五、租賃滿期时，糖公司不能偿清各种款項，植祥有完全自由处分之权。如变卖抵押品后所得之价，不敷偿清，仍由糖公司补偿不敷之数。

以上为合同中之要点，糖公司出租6年，前3年收租金10万元，后3年收租金15万元，合計得租金75万元。此6年中厂屋机器之折

旧需几何，股息无着，而担负20万元添置费之新债务，且出20万元之代价，所得则为使用多年之器物，又关于各种权利不免因出租关系而牺牲，犹须负纳税之义务，有形无形间之损失太巨，此银团借款合同所以得能通过也。该合同之内容，照录于下：

立合約 中华国民制糖股份有限公司(下简称公司)
益 中 銀 团(下简称银团)

兹因公司金融困难，周轉欠灵，虽屡次催收第二期股款，而交者寥寥，以致业务停顿，制造停机，损失之中，尤虞锈坏，且負債累累，已受控追，股东既延不交股款，董事会亦无实力维持，公司现状已日陷于危险之现状。幸陈光甫君及公司原发起人吴蕴斋、馬聘三君允任艰巨，组织银团，以图救济，公司愿以所有地产机器厂棧寄宿舍等全部财产作为抵押品，向银团借款，银团亦经允肯借与，兹经双方同意订立借款及经营合约如下：

第一条：银团允借与公司上海通用大洋100万元，月息8厘计算，每3个月付息一次。

第二条：银团负责担任向上海任何银行开定购原料等信用票上海大洋100万元，随时由公司运用此项信用票，俟所定原料等进港后90天结算，所用之票款其利息照银行结单市价计算，大约在周息7厘左右。

第三条略。

第四条：公司将所有吴淞蕰藻浜泗塘河之工厂地产美册道契，自294号至299号，及301至304号共10纸，并工厂内全部机器厂棧寄宿舍保火险单铁驳船及其他动产与不动产等，另列清册，均抵押与银团。以后银团对于各该动产及不动产有管理及过户全权，并得在中国或上海租界内任何中外官署登记证明之。

第五条：银团为保护债权起见，推举馬聘三君为本公司总经理，以滿足5年为限，所有制造贩卖及营业上范围内一切事业，关于理财用人行政及雇用外国技师聘请外国顾问等，

均由馬聘三君全權負責辦理，無論何人，不得干涉，如有干涉，照第13條辦理。惟遇有特別重要事件，須得公司代表總協理馬玉山嚴直方之同意。

第六條略。

第七條：銀團在本合約有效期內，每年總決算一次，如獲有盈餘，以利益3/10歸銀團，（借款利息在外）以為報酬（即借款現金100萬元，及公司資本實收數合計，分作十分，銀團得3/10）。其餘7/10，歸公司按章程分配之。

第八至第九條略。

第十條：本合約有效時期內，公司所出制品，概由銀團另組販賣機關，負責擔任販賣之事^①。

國民制糖公司呈國民黨政府呈文

中華國民制糖公司昨分呈工商部社會局文云：為遵限籌擬整理辦法，糾葛繁多，擬請政府查照前呈，先行明令免稅，並主持接收廠基，以維實業而免糾葛事；竊查：國民制糖公司前以辦理不善，迭奉鈞令一再限期趕籌整理方法，同人等曾將遵諭集會情形及請明令免除進口原料關稅並出廠精糖稅項，亦經兩次呈報鈞鑒在案，茲復奉令，兩月限期，轉瞬屆滿，自應切實整理，如無辦法，呈部接管等因；奉此。伏思同人對於此案，始終未敢延忽，無如迭次電催，總協理馬玉山始終不復，嚴直方竟具書辭職，復書挽留，並又電催，亦置不問，乃向馬聘三磋商，將廠屋駁船先行交出，俾便開煉，其益中銀團賬目，自當候原經手之嚴直方回申，秉公擬結，既有全廠契據作抵，盡可放心。詎馬聘三不允所請，堅執非認還其地款及營業虧耗80萬元不可，迴憶益中銀團與國民公司結合時，本系嚴直方臨時變更辦法，同人原未與聞，自未便強為交涉，惟探詢馬聘三意旨，儻鈞部主持接管，似尚樂于就范。至華僑郭春秧黃奕住，均以糾葛未清，免稅未經明令宣布，不

^① 1925年10月3日上海商報。

敢出头承办，仅將股东名册印鉴收回保管。同人等受股东付托之重，更蒙鈞委实力維持，况值提倡国貨原料大降机会，滿望早日設法开机，以补前愆，无如期限已迫，委实无法着手，惟有据实呈报，伏望鈞委俯念維一实业，查照免稅呈文，加具切实考語，呈請部長提出政府會議，將进口原料、及出厂精糖一律免稅20年，明令公布，特派監督將厂屋駁船向馬聘三先行收回，一面督同同人設法开机營業，暫为保管，同人等但可尽心尽力之处，无不惟命是遵。查开办之始，股东非常踊跃，首期股款250万元，未及兩月，即行繳足，嗣因当事者办理不善，除招股外，一无章程，信用既失，每次开会，股权不及1/3，所以二期股款，繳者寥寥，果蒙政府实力維護，暫行保管，是糾葛既清，免稅公布，則不特华侨咸願出首承办，即招集股东大会二期股款，亦必欣然呈繳矣。所有严直方来往电辞职書等，附录閱存，临穎不胜惶恐待命之至①。

① 1928年8月30日上海新聞報。

洗冠生和他的冠生园食品公司

洗冠生，广东佛山人，他父亲是專做华侨生意的手工业衣服制造商。談家境，虽然說不上怎样寬裕，可是还算过得去。在他16岁的那年，他父亲就死了。于是，正在求学的洗冠生，不得不丢掉了書本，去寻求生活^①。

最初在一家五馬路他的表亲开設的食品店——竹生居內学习粵式餅点糖果等，因为这家食品店很能制造新奇的出品和运用新穎的广告术，营业是相当的兴旺。洗在这个环境里，除开体味領略生意經外，还能够凭他不断研究的精神，对一事一物，穹原追本的加以探討^②。他自己說：“竹生居习业3年，我无时无刻不在那里研究顧客的心理，食品的制造，以及营业兴衰的原理”。

他开始做店主人，还不过21岁。原来在竹生居服务的5、6年中，除按月寄給他母亲的供养費外，自己节衣縮食，居然有了300元的积蓄；于是，就和朋友合股，在上海新舞台左側开了一家广东菜館，名叫“冠香”^③，專售糖果餅干，楼上并設中西大菜。那时因为新舞台剛才落成的关系，营业倒非常鼎盛。不料，数年后，新舞台为了二次革命的关系，改迁到城內九亩地去，于是命运短促的冠香营业竟一落千丈，从此停业^④。

繼冠香之后，洗又在南京路永安公司原址，曾开过一家“陶陶居”；后来因为拆造房屋，才不得已宣告停业。从此，他的生活就一天天的艰难起来。这样經过了兩年，由于薛寿齡（江苏吳县人，兴华制面

① 上海机联会出版：“工商史料”第一集89頁，1935年12月出版。

② 上海机联会編：“中国国貨工厂全貌”50頁。

③ “工商史料”第一集第90頁。

④ “中国国貨工厂全貌”第50頁。

公司董事，开明房产公司监察——编者）、郑正秋、夏月珊等（郑、夏是演员——编者）的资助，才勉强湊集了几百块钱来办这家冠生园。

冠生园的诞生，在民国7年，店设上海九亩地大境路。那时是洗冠生和几个朋友合夥经营，资本仅500元；出品也只有陈皮梅、香港牛肉等几种，可是规模虽小，出品精美，而洗的推销方法又高人一等（雇用小贩，在戏园内兜售——编者），因此业务的发展大有一日千里之势。到民国12年，为适宜社会之需求，决定除原有出品增加产量外，并添制糖果饼干等其他出品。乃开始招股，集资10万元，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于南市斜桥局门路设立工厂，从事大规模制造。从此，营业蒸蒸日上，资本陆续增加到50万元，出品也由三数种增加到2千余种，计分梅子、糖果、饼干、罐头、果酱果露、面包西点等6大类，此外又设饮食部及照相部等，其总公司原设河南路，后因房屋不敷应用，乃于民国17年迁至南京路。支店除9亩地老店外，又先后开设第一支店于河南路，第二支店于法租界公馆马路，第三支店于小东门，第四支店于老西门；又在老靶子路及天后宫桥的国货商场内，各设一分销处。在外埠汉口有分店三处，杭州有分店二处，南京、天津、武昌、庐山各有分店一处。又在滬西漕河泾购地建屋设立新厂，而职工方面，也随着业务的进展而年有添雇，现在（1925年——编者）本外埠合计，总数已在2千以上。至于营业额，去年已做到170余万元。

在冠生园蓬勃发展的过程中，还有两件事可以附带一谈的，那便是农场与梅林的创设。

农场成立于民21年，地点在滬西的漕河泾，占地约10余亩。里面有花棚，有菜畦，有瓜架，有鱼园，主要出产是各种广东蔬菜和瓜果，该公司饮食部所用的瓜菜大都取给于此。梅林在杭州的超山，这是23年办的。原来该公司制造陈皮梅等用之梅子，需量颇巨，该公司为减轻出品成本计，所以在产梅最著名的超山，买了数十亩山地辟为梅林，同时，在山麓又设立一个制梅厂，这样，梅子的来源既不受人牵制，内地人工又较上海便宜。

冠生园股份有限公司，现任（指1935年——编者）董事是张蟾芬、

洗冠生、薛寿龄、项康元、李炯堂、诸宛明、朱少沂等七人。监察人是张伯荣和郑耀南。总理由创办人洗冠生担任。协理是薛寿龄和黄翰良。在总协理之下，分秘书、主计、营业、生产等4处，各处之下又分若干科股。

谈到组织，冠生园有一种好制度，那便是每天举行的晨会。所谓晨会，也可以说是该公司的行政会议，举凡有关该公司的生产、营业、人事等各种问题，在不违背公司的大政方针之下，都可以提出来讨论。参加这会的，有总经理、协理、各处科主任，甚至各支店以及新旧两厂的重要人员^①。

26年滬战时，斜桥老厂被毁，漕河泾新厂与农场亦受相当损失，乃在江苏路租屋另造工厂，同时增资至40万元。在抗战期间，该公司创办人洗冠生，在西南各省发展业务，设立分公司及分厂多处，30年再由80万元增资至160万元，32年12月再增资至法币800万元，所有南京、武汉、滬、杭各地分厂分店，已先后复工复业，上海漕河泾农场已恢复旧观，总厂亦已复工，并添设美式机械设备。36年6月增资至法币20亿元，每一老股升199股，认缴50股^②。

1941年董监事名單

董事長：朱少沂。董事：張珍侯（浙江吳县人，成康潤顏料号店主）、項康元（康元制罐厂总经理）、張伯荣、謝晋卿、洗冠生、薛寿龄、孙雪泥。監察諸宛明、范益香。总经理洗冠生，协理薛寿龄、黄翰良^③。

1946年董监事名單

董事長：洗冠生。董事：張珍侯、孙雪泥、蔣保厘、潘炳臣、黄翰良、薛双源、陆星庄、金宗城（上海銀行副經理）、王振芳（中国銀行經理）、徐振东（新华銀行經理）、胡国磐、詹沛霖。監察：諸宛明、潘克勤、姜屏藩、王鹏程。总经理洗冠生^④。

① “工商史料”第91—94頁。

② “华股手册”第186頁。

③ “华商股票提要”第168頁。

④ “华股手册”185頁。

范旭东和他的化工事业

按：原文有个别字句，对照了原文和其他材料后，作了某些删改。

一 范旭东略歷及事業概况

范旭东是有名的久大鹽业公司、永利化学工业公司的主持人。是中国化学工业的巨子，与上海的吳蘊初氏有“南吳北范”之称。

范旭东名銳，出身于湖南湘阴世家，年幼时正值戊戌变法前夜，梁启超、譚嗣同、唐才常、熊希齡等在湖南甚为活动，他与他哥哥范源濂毕业于梁启超影响下的湖南时务学堂，受梁氏思想影响。变法失败，他兄弟二人先后赴日本，其兄习教育，与梁启超蔡鐸接近。他入第6高中，繼入东京帝大习化学。民国元年返国，范源濂以进步党資格入閣，任教育总長。他也任农商部职务，得其兄帮助，派往德、英、法等国考察实业，返国后遂从事久大鹽业公司的創立。

民国3年，范氏在大沽口开始建立久大鹽业公司，集資5万元，据云是由几十个小股东集資而成，由財政部官僚，以办鹽政杂志聞名的景本白（学鈴）任董事長。虽遭受吃鹽飯的另一派封建势力反对，但在官僚力量支持下迅速发展，后来資本竟发展到250万元。年产量由3万担增至50万担，銷路远及晋綏。

民国12年，久大公司曾大量投資于青島永裕公司而为其大股东，欧战爆发，中国收回膠澳鹽田，北京政府把收回的鹽田6万亩及設備等包給永裕公司承办，永裕从此成了“青鹽輸日”的專商，每年輸往日本的青鹽达150万担至350万担，获利自然很大，該公司直至“七七”以后始自青島撤退，久大在“九一八”后曾在江苏大浦設分厂。

范氏的另一主要資本活动是永利化学公司（天津，初名永利制碱

公司)，歐戰爆發，市場上鹼價奇昂，民國6年，永利遂成立，以金城銀行及上海銀行出資最多，投資最多。范氏的事業和當時在北京政府極為活躍的政學系便有了很深的結托。尤其是不久以後，永利獲得北京政府批准制鹼的原鹽免稅，此為中國封建鹽政史上的創舉，這件事曾得到永利發起人張弧（岱杉，研究系中統一黨中人物，鹽務署署長）、李穆（賓西，長蘆鹽運使）及景本白等官僚的力量協助。歐戰既止，鹼價又因帝國主義傾銷而大落，此時范源濂在美國，為永利獲得了礦產出口大商人紐約華昌貿易公司李國欽（炳麟）的幫助，又聘請了專家侯德榜、孫穎川及美工程師李佐華（國民黨戰時生產局成立後，美來華專家之一）加入永利，投資試驗十餘年，永利純鹼成功，但又受英國化學托辣斯帝國化學公司的卜內門洋行的打擊，永利成本每担9元，比卜內門成本低，但卜內門減價為4.5元，永利靠了銀行家的支持及有雄厚財政基礎，得以維持不倒，後來卜內門洋行妥協，而永利之成為中國最大的純鹼公司的地位便確立了。到1937年，每天可產純鹼180餘噸。

1934年，國民黨進一步插手於永利（永利有陳光甫資本，另一方面，這時期政學系也漸與南方的國民黨加深結合），得到國民黨政府與銀行借款千餘萬元，建立南京（六合卸甲甸）的國防工業硫酸銨廠，1937年2月開工出貨，日產硫酸銨120噸，硝酸40噸。因此，永利在所謂“化工兩翼”的酸鹼兩方面，都已建立了基礎。

1936年政學系的吳鼎昌到南京任實業部長，第二年，實業部便批准了永利公司註冊為國民政府“特許公司”，并自民國19年7月起至49年6月，扣足30年，免除鹼類成品及原料鹽稅，并核減國有運輸機關運費。這一件事說明了政學系與永利結合的程度。抗戰爆發，永利津京兩廠都全部淪陷於敵手。

除了久大及永利兩單位外，范旭東還創辦了一個科學研究單位——黃海化工研究社，該社由留美的孫穎川主持，民國11年在塘沽成立，主要目的是協助久大和永利的技術研究，并調查研究資源，試驗長蘆鹽滷的利用。性質上是久大和永利的一個研究室或實驗室，1931

年受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的补助，試驗范围扩及菌学，粘土制鉛，海藻制鉀肥及碘，水溶性鹽类等。目的为发展“海洋工业”作准备工作。

抗战爆发，范氏原有的产业基础除大浦鹽厂外都淪入敌手，敌人曾加以引誘，范氏終于在香港脱險抵汉口，就任国民党国民參政員。現將其抗日战争时期在国民党后方的产业單位分述如下：

(1) 久大鹽业公司——將大浦机器西迁入川，在自流井一帶的自貢鹽場建立久大自貢制鹽厂，受国民党鹽务当局委托制鹽，厂設張家坝，有鋼板平鍋8口。呈請年产100万担，鹽务局核准年产60万担(战前日产200吨)。行銷渝、鄂、湘、滇各地。但因国民党造成工业危机，实际产量每年从未超过20万担。該厂創制了久大鹽磚。厂务由李燭尘氏負責。职工600人。

(2) 永利化学公司——战前原在湘潭購地千亩，后津京淪陷，遂入川在犍为县五通桥地方复厂。1938年开始兴建。国民党政府曾由行政院撥“補助費”300万元，1938年11月国民參政会通过复兴基本化学工业案后，国民党又迫不得已，由中、中、交、农4行借予款項2,000万元，协助范氏成立銻、焦兩厂(当时拟設株州)，1939年底簽約。永利由此与国民党的关系也就愈深了。該厂向美定購的机械除深井机外，銻焦机械都因美国故意拖延及运输困难，尚未运到。現該厂設有造碱厂、煉油厂、翻砂厂、机械厂、陶瓷厂、土木工程处、煤矿、发电厂、深井工程处及侯氏試驗工厂等十余單位，是一个大的化学組合。有員工1千人。占地3千余亩。深井工程凿至350尺，发现濃厚黑油，据云前途頗大。碱厂年产3千吨純碱。

(3) 中国化工企业公司——此系范氏与金城銀行合办，負責人为金城銀行重庆管轄行經理戴自牧及范氏。該公司資本100万元(1942年7月)，系1941年3月經国民党經濟部注册。該公司有兩個厂，第一厂設五通桥，制造食鹽副产品。第二厂設于重庆沙坪坝中渡口，1941年10月成立，資本30万元(1942年7月材料)，由化学教授孟心如主持，系采用植物原料制成顏料。日产深咖啡色顏料千斤。

(4) 黃海化工研究社——曾遷長沙，繼入川，1939年受管理中庚款董事會協助。1940年，以後并協助各方化工建設，從事西南資源調查，在制鹽方面及發現鹽為深井均有成就。該社還設立了一個“三一化學製品廠”。

范氏在管理方法方面很擅長，員工比例為一比八，貴州企業公司參觀團曾對其效率之高，加以稱贊。

范氏的久大鹽業公司最初的資本5萬元，雖說由幾十個人湊成，但不能忽略范氏哥哥范源濂在北洋政府中的官僚勢力以及景本白在財政部的官僚地位。久大發展之迅速，實此實不能說明。

1917年的創辦永利，除了倚仗久大的基礎外，他和金城銀行，以及江浙財閥陳光甫結合，集資550萬元。據1942年材料，永利的董監事如下：

董事：周作民，金城銀行董事長、李國欽，礦產出口巨商，曾任湖南錫鉛礦經理，紐約華昌公司負責人，抗日戰爭時還在美、陳光甫，江浙財閥，上海銀行創始人、景本白，北洋政府官僚，鹽務專家、范旭東（總經理）、侯致本（总工程师）、李燭塵，久大精鹽公司主持人、余嘯秋。

監察人：王孟鍾、楊介眉——上海銀行代總經理。

該公司初期完全倚仗金城、上海兩銀行支持。到了1934年以後，南京工廠成立，中交兩行（還有浙江興業銀行）也加入了。“七七”事變，人員撤退及損失巨大，到1937年底，向銀行團負債達1千萬元以上，詳情如下：

透 支 銀 團	透支銀團甲戶(元下同)	透支銀團乙戶	透支銀團丙戶
透 支 原 額	500,000	1,100,000	135,593
未付二十六年下期利息	234,994	46,999	129,861
合 計	734,994	1,146,999	265,454

注：甲、乙戶為中國、上海、浙江興業、金城、中南五行合成。丙戶為中國、交通、金城、中南四行合成。

總計為10,147,446元。這里面包括了抗戰爆發後一個短期（五個

月)在內。后来情况更为支絀困难。

永利初期得到北洋政府的原鹽免稅，与青鹽輸日是一大有利条件。后期(1934年以后)得到国民党銀行借款千万元以上建立鋸厂，靠吳鼎昌获得国民党政府批准30年碱品免稅、運費核減，更是“大有利条件”。但津京陷敌后国民党政府的所謂補助費、借款、自貢鹽場經營的委办等，也是有条件的。

国民党政府成立了国民参政会，国民党为了拉攏范氏入彀，予范氏連任四届参政員，1944年9月，他奉国民党政府派遣，与張公权、盧作孚、陈光甫、李銘等五人为中国出席国际通商會議的代表。同年12月17日国民党发动实业、文化、教育界名流張伯苓等21人通电国外呼吁“增强援助”，范氏为列名者之一。据美国新聞处同年5月25日电，由于范氏向美国借款，美国在原則上已允准永利1,400万美元的貸款。但后来这笔所謂借款不过是美帝国主义故弄玄虛，实际上沒有借到手。

(摘自羊二：“国民党統治区工业界人物介紹之一——范旭东”，1945年6月出版)

二 永利碱厂創辦期中遭受帝国主义的压迫

欧战給中国民族工业以短暫的繁荣。列强自中国市場退出，酸、碱、顏料等来源断絕。尤其是碱，因为是日常最需要的东西，所以价格漲得特別凶。英商卜內門公司不肯拋貨，造成有行无市的現象。一切肥皂、造紙、玻璃工业，都陷入垂危之境，甚至于大家釀面粉做饅头都发生恐慌。这时候在山东、上海、四川都有人建立碱厂，采用电解法，和路布蘭法制碱。但是規模都很小，产量有限。范旭东利用这个时机，就想在塘沽建起大規模的索尔維法制碱工厂。但是那时鹽稅很重。如果制碱用鹽不能免稅，生产就不易維持。范旭东費了許多气力，才使財政部批准了工业用鹽免稅。这在中国2千年鹽政史上还是破題兒第一遭。

1917年永利碱厂开办，初步进行，困难重重。少数的开办費，經

过一年的試驗和开支已用得差不多了。接着欧战結束碱价大跌。那些看中这是个好生意的发起人，大都灰了心，不肯再支持。但范旭东的信心毫不动摇。也幸亏久大的业务蒸蒸日上，股东們都发了財，因此也乐得拿出点錢支持范旭东，随他成功也好，失敗也好。索尔維法制碱工业的技术問題复杂。索尔維氏死后，索尔維公会独霸全球。技术上的秘密决不讓会外人知曉。范旭东剛开办时想請英商卜內門公司設計。但卜內門公司条件极苛，向范旭东要求投資，合作和統銷分銷，想使这民族工业的幼苗走上买办工业的道路，威胁利誘无所不至。范旭东毅然拒絕，并且决心靠自己的力量，在試驗与錯誤中，赤手空拳把碱厂搞起来。

1922年范旭东聘請当时在紐約的化学專家侯德榜博士回国。碱厂最初是請紐約一位号称專家的入設計的。侯德榜回国时，工厂已經在动手裝了。侯那时也非“制碱大家”——他早年的成就在制革工业方面。总之索尔維公会外的人要想建立碱厂，一切都得自己从头来起，技术上的資料是一点都得不到的。侯在永利四、五年之内，真是在“死拚”。从掉換碳酸塔的水管，另行設計新解爐起，历次加强冷却設備，改造濾碱机和石灰窑，还有层出不穷的临时障碍，費尽了他的心血。他往往一天要工作十几小时，設計好石灰窑后，他曾在窑旁盖了一間小屋，一天到晚住在里面，观察它的情况。

永利碱厂终于在困苦重重之下出貨了，开始日产5吨，而且是“紅碱”（碱内杂质如鉄等不能移去），而后数量漸增，品质也漸好。最后达到近200吨的产量，而且顏色也和卜內門的洋碱一样“白”了。这还是亞洲人第一次以新法制碱的成功。范旭东后来回忆到那时的艰辛时，还心有余悸。

然而好事还是多磨。剛剛成長的碱厂迎面就遇到世界托辣斯的打击。卜內門在中国市場上挟着雄厚財力和帝国主义的保护，大量廉价傾銷，“随落不随漲”。想这样窒息了新兴的中国化工事业。于是范旭东不得不与卜內門的老板們苦斗。

（摘自丁迈：“为中国化工事业打基础的范旭东”，载于黄宗甄編：“中外科学家小傳”，1950年海燕书店刊行）

三 抗日戰爭时期和战后的永利

永利的創辦人是范旭东先生，他于民国6年在天津創辦了永利碱厂，其后，經過15年的埋头苦干，在民国26年又在南京的对江創立了硫酸銶厂，試驗从空气中吸取氮气，获得成功，开辟了化学肥料的新途徑。

銶厂是在26年1月开的工，不料开工剛剛半年，日軍便在上海发动了“八一三”的侵略战争。当时受兵工署的委托，大量制造硝酸，改制炸药，因此成了敌人轟炸目标，但仍冒險开工，最后一次轟炸，氧化部，鉄工房，木工房均被炸毀，迫不得已，乃于是年的12月初向后撤退。南京淪陷后，日本人占領該厂，將价值50万美金的硝酸厂单独拆卸，运到九州島的大牟由东洋高压会社改造軍火来屠杀中国人民。胜利后經該公司請政府向盟总交涉的結果，已决定还给中国^①。

又訊：永利硫酸銶厂自从本月复工以来，虽然只有三、四天的工夫，可是在全体員工日夜努力之下，产量方面是与日俱增的。5日制成硫酸銶(肥田粉)123吨，6日就跃进到133吨。該厂在战前每日的产量是150吨，日本人占領时只有40吨。前年复員，經過七、八个月的修理工作，每日产量又恢复到七、八十吨。3个多月前，因为水底电綫断毀而停工，3日修好复工后，产量又大有增加。据傅冰芝厂长7日对記者說：“現在第一步目标是恢复战前每日150吨的产量，而最高目标是480吨，因为只有大量生产，成本减低，才能使一般农民都能用得起硫酸銶。”該厂現正在湖南株州籌办4个工厂：(1)硫酸銶厂，(2)煉焦厂，(3)玻璃厂，(4)电木厂。4个厂共占地3千亩，比卸甲甸的厂址还多1千亩，尤其是玻璃厂，將成为全国規模最大的玻璃厂^②。

全国最大的永利化学公司塘沽制碱厂，最近因困于原料缺乏，不

① 摘自柳嘉禾：“访永利銶厂”看工业远景”，1943年3月13日天津民国日报。

② 1943年2月8日天津大公报。

能充分开展。据悉，该厂战前每年产碱6万吨，约当全国总需要量1/2，战时淪陷，遭日人破坏頗巨，胜利后勉强恢复生产，目前生产量为每日120吨，所需原料鹽由当局配給。据該公司負責人談称，永利目前設備可將产量增至每日150吨至200吨，惟因原料受限制，此項計劃不克实现，致国内需用之碱，仍須由国外以高价外汇購入。

(1948年3月18日天津大公报)

四 抗日战争结束后久大公司的股本和董監事名單

久大鹽业股份有限公司于9日下午在赤峰道公司會議厅召开“七七”事变以来之第一次股东大会。二时到会100余人，代表股权超过法定額数，即宣布开会，公推李燭尘氏主席。李氏代表范總經理报告公司业务，繼即开始討論事項，各股东紛紛发言，當場通过要案多件：(一)久大資本原为210万元，昨經股东大会議决，升值1,800倍。資本額改为40亿元，交新选董監事会处理。(二)久大鹽业股份有限公司設于天津，上海为管理处分处，第一厂設塘沽，第二厂設江苏省淮北，第三厂設四川自流井。(三)通过久大鹽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四)純利329,380,000元，按照公司章程分配，每股可获紅利1万余元。最后选出新任董監事，茲將新任董監事姓名列后：董事：李燭尘、楊子南、任致远、景本白、蕭豹文、鍾履望、胡适之、王子白、陈泊萍、沈舜卿、范鴻疇、蔡慕韓、周作民。候补董事：周寄梅、胡政之、王文达。監察人：吳少皋、俞平伯、黎仲修。候补監察人：朱捷三^①。

又訊：久大鹽业公司昨日下午二时在該公司三楼會議厅举行新任董監會議。計到董監11人，由李燭尘主席。當場选定胡适、范鴻疇、任致远为常务董事，并选定胡适为董事長，李燭尘为總經理。并决定与該公司有联系之各公司負責人，青島永裕鹽业公司由該公司董事楊子南前往主持，至三时半散会^②。

① 1947年11月10日天津益世报。

② 1947年11月13日天津大公报。

吳蘊初和他的化工事業

一 吳氏歷史及事業概況

吳蘊初在抗戰前是上海化學工業的資本家，擁有天廚味精、天原電化、天利淡氣、天盛陶器等四廠。現天廚、天原仍在國民黨大後方開工。他是中國工業協會第一屆理事長，遷川工廠聯合會第七屆理事長，為大後方民族資產階級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國民黨政府聘他為第四屆國民參政員。

吳氏名葆元，江蘇嘉定人，現年55歲。家境清寒，自13歲入私塾兩年。當時正值庚子慘敗之後，吳氏15歲入培養洋務人材的“廣方言館”一年，因須賺錢養家，任小學教員半年，又設法進了陸軍部兵工專門學校，習化學。三年後畢業，到上海製造局（兵工廠）實習，月薪16兩，仍在外兼課，並幫助德國教師杜柏爾在滬設立的“上海化驗室”工作。實習一年後，又在兵工學校任助教教員及兵工廠審檢處技士。民國2年，上海二次革命，兵工廠停工，學校停辦，便轉往漢冶萍之漢陽鋼鐵廠任化驗師。一年後任該廠之制甌廠廠長。民國4年冬，有人在天津籌辦硝鹼公司，聘吳氏主持，但吳氏前往後，股東變計停辦，吳在天津靠典當度日。後在天津造幣廠暫任化驗工作。民國5年重回漢口，歷任漢陽兵工廠理化課長，制葯課長。民國10年才到上海正式從事工業資本的經營。他是一個兵工技師出身的工業資本家。

（二）歐戰使中國工業的發展得到一個刺激，他當時雖在漢陽兵工廠火葯廠做事，但看准了當時火柴原料缺貨，便以5千元資本創立了中國第一家火柴原料工廠——熾昌硝鹼公司。民國10年，因火柴中牛皮膠銷路好，便在上海集火柴商人資本，設立了熾昌新牛皮膠公司。以後便開始創設天廚味精廠。

天厨味精厂 吳氏看到日本貨調味粉“味の素”的暢銷，自己便加以研究，研究成功，民國11年集資5萬元，創辦天厨味精厂(无限公司)，为半机器工业、半手工业。1927年抵制日貨味精銷路更大，除东北华北外，“味の素”在中国的市場几乎被收回，且远销南洋。天厨厂每日产量最高达1,600磅，1931年前年营业额300万元。

天原电化厂 1929年創立，在此以前制味精的原料鹽酸都是日貨。“天原”意即天厨原料，天厨的股东也就成了天原的股东。18年秋出貨，每月出燒鹼4吨，鹽酸2吨，漂白粉3吨。該厂机器系購自海防一个营业失敗了的法国电化工厂，該厂資本原为20万元，因为銷路旺盛，不断增加資本，每三兩年即增加一次，到了抗战前夕，資本总額为105万元，电解槽由50个增加到300个，产量增加6倍以上，由此可見发展之迅速。該厂酸鹼貨比卜內門洋行低5%，驅除了日貨，漂白粉因为新鮮，也战胜了日貨。但据吳氏自己說，天原厂日夜开工，但仍稍賠本。但天原厂是大有扩展前途的工厂，吳氏对它的期望显然很大。

天利淡气厂 1933年9月初籌备，1936年開幕。天利創設的目的，一方面是利用天原的副产品氫气，另一方面則是当时国民党想建立基本化学工业，且已帮助范旭东在南京設立了硫酸鋰厂，可能給吳氏以刺激。刚好美国化学卡特尔杜邦公司出售一个小型淡气厂，吳氏以九万美元收买，募集股本百万，又負債80万元始成立。因为每天可产鋰四吨，但市場太小，又添設一硝酸厂，該厂机器購自法国，值30余万元。所产阿摩尼亞因商場增設冷气設備而增銷路，但不久后抗战即爆发。

天盛陶器厂 1934年創設。次年春出貨。月产20吨至40吨，主要是耐酸鹼的陶器。初为供給以上各厂应用，其后各化学厂及軍需工厂亦向它定貨。

在抗战前，他同时还是熾昌新制膠公司，开成造酸公司的董事。

他在1928年創辦中华工业化学研究所，注重实验，由天厨担任經濟責任，他任董事長，并聘請化学家多人主持，起着天厨天原等厂的

實驗室作用，附帶應一般化學工業界的需要。

吳氏的廠，他都自己直接管理，他是天廚常董兼廠務經理，天原、天利的董事兼經理。管理方法很擅長。

在工業資本家的聯合方面，抗戰以前他是中華工業總聯合會委員，中華化學工業會副會長。此外，他還是大公職校的校董。

(三)抗戰以來吳氏各廠內遷，受了些損失，現獨立開工者為天廚天原兩廠。

天廚味精廠 抗戰爆發時在港設廠，投資200萬元，太平洋戰後大部毀去，重要器材遷川，在重慶江北貓兒石設廠，完全恢復手工業狀態，月產味精200磅。由吳氏之子吳志超主持，技術嚴守秘密，據吳氏說已負債千萬元以上。

天原電化廠 戰前天廚港廠酸鹼部在港日產鹽酸四噸，漂白粉8噸，太平洋戰後遭遇與天廚相同。遷四川後，電解槽有100個，漂粉塔4座。1942年時有技工37人，粗工78人。1942年12月前該廠每月產量：

液體燒鹼	60噸
鹽 酸	6噸(一說75噸)
漂 白 粉	75噸(一說60噸)

現在天原電化廠可注意的新動向有下列三件事：其一，1943年中，國民黨經濟部資源委員會加入了資本，有時已把天原列入其“國營事業”之一。所投資本數不詳。其二，曾由中央、中農兩行貸款4,000萬元，在宜賓成立了分廠，1944年9、10月間出貨，擬設電解槽50個。其三，在新疆成立天原分廠——天山電化廠，吳氏曾往新疆一行，原擬製造品與天原相同，據云去年中可以出貨。據1944年9月訊因新疆天然鹼產很豐富，故將改制氯酸鉀(火柴原料)及液體氨氣，不久可以完工。該廠廠長為吳氏主持之中華化學工業研究所所長沈祖堃氏。

天利淡氣廠機械已全損失，天盛陶器廠機器完整，已進而從事火磚及高壓電瓷的製造，但實際已成為天原廠的一部分而不獨立設廠

了。

吳氏在抗战期中曾三度出国，1939年到欧洲，主要是到法国談判拟在滇緬边界建立褐煤輕油厂（煉汽油），因战争爆发未实现。1941年赴美，拟恢复硝酸厂，已付某公司定洋，因珍珠港事变发生而停止。

此外，他又是大成化学公司（金城銀行主要投資之酒精厂）的常董。

（四）吳氏天厨味精厂在創設时資本5万元，到1935年已增資到220万元。1929年創設天原电化厂时，資本20万元，抗战前增資四次，在七七事变时为105万元，川厂資本額变动如下：

1937年7月	1,950,000元
1942年12月	1,575,000元
1913年	3,000,000元
1940年	14,000,000元

吳氏資本来源，得政学系金城銀行的支持很多。1935年天厨味精厂扩大时董監事如下：

董事9人：吳蘊初、周作民（金城銀行董事長）、李祖恩、吳蘊齋（杜月笙的中汇銀行董事，王明商业銀行董事）、張祖安、徐志禪、陈聘丞、朱子謙、林滌菴。

監事3人：張祖耀、高伯俊、陈蔗青。

1942年天原电化厂董事長及五个董事席的3席，都是金城銀行方面的代表：

董事長：戴自牧——金城銀行重慶管轄行總經理

總經理：吳蘊初

董事：吳儀，天厨味精厂副經理（吳蘊初氏之妻名吳戴儀。此处所据之原材料可能有錯誤，或即吳戴儀之誤）、徐国懋，金城銀行重慶分行經理、李祖芬，金城銀行重慶分行信托部經理、王毅灵，金城銀行天津分行經理、吳豹文，天厨味精厂出納。

据1942年底材料，金城銀行是天原的大股東，股本之分配，金城銀行竟占60%，吳氏只占40%。

前表中1943年資本驟增至300萬元，次年更增至1,000萬元，而1943年即資源委員會資本加入該廠的一年，現在該廠有時已被列入“國營事業”之內。而此後，又向中央、中農獲得4千萬元巨額借款建立宜賓分廠，現在吳氏還任中國經濟建設協會理事兼常務理事（該會是經濟部控制下的組織）。

吳氏事業中的幹部與技術人材：

1. 吳戴儀——吳氏之妻，工廠管理專家，曾單獨管理港廠。
2. 吳志超——吳氏之子，留美，習化學，並學過最新式技術管理訓練。任天廚川廠廠長。
3. 黃佐川——江西九江人，55歲，民國4年畢業於美國米希根大學機械工程系，曾任漢陽鐵工廠工程師，現任天原電化廠協理。

本文主要材料來源：

“新世界”1944年8月號徐盈：“吳蘊初及其化工事業”

四聯總處材料：“天原電化工廠”（1942、12、1），“大成化學公司”（1942、2）

生活版“人物評述”：“吳蘊初傳”

“商務日報”（1943、4、23—24）

“江西民國日報”（1943、12、26）

“中國工業”第二十期（1942、10）

辭典館版“民國名人圖鑑”（1937、1）

“新疆日報”（1944、1、1）

“經濟建設季刊”二卷四期（1944、4）

“經濟新聞週報”（1944、8、12）

西南實業協會：“四川工廠調查錄”（1942）

西安“工業月刊”（1945、1）

摘自羊二：“國民黨統治區工業界人物介紹”，1945年8月30日出版

二 天原电化厂創建經過

天原厂之籌备为期固犹暫，而蘊（吳蘊初自称——編者）着手于电化厂之計劃，則尙远在民国5年。时蘊在汉，以电化方法制造氯酸鉀。适值欧战，薄获微利。因思于相当地点別設一电化厂，制造燒碱、漂粉、鹽酸等，以树久远之基。嗣虽以种种牽率，議未果行。然蘊仍馳書国外調查情形，就原有設備研究制法，未尝或懈也。

按燒碱之进口額年約值美銀七、八十万兩。漂粉約四、五十万兩。鹽酸在海关貿易冊中列入未列名酸內，不知其确数。然依蘊估計，年当不逾10万箱。三者合計，共值美銀200余万兩之譜。我国本为入超国，数百万之漏卮初不能謂为极巨。然以基本工业之重，而其命脉乃悬諸外人之手，情形实至危險，固不能以数量之微而忽視之也。蘊鑒茲危机，設厂之心益亟。然国内酸碱市場久为日英兩國所独占，（英之独霸碱业，尽人所知。日之称雄酸市，完全地理关系，運費低廉，故欧美出品莫能与之竞。如鹽酸在美，百磅仅值金洋一元，而裝运至申，水脚包裝竟需10金洋之巨。）人皆懼难与抗衡，不敢輕試。

自創辦天厨味精厂后，既用鹽酸为水化剂，乃深感日貨之劣，（其間曾用海防远东化学公司之鹽酸頗滿意，然該公司不久即停办。現天原厂机械即由該公司盤来。）如含量之低，如杂质之多。味精向以“品質不苟”为惟一之政策。故用此种劣貨制成之品，必須加工加料，数度精制，方能应市，殊覺不便。于是决定自办一鹽酸厂而着手籌备矣。

鹽酸厂之設立既定矣，乃有种种問題随之以生。第一制法問題。制造鹽酸，本不必限定电化法。硫酸法設備簡而成本廉，亦极可采用。惟照中国現在情形，如用硫酸法，須先設硫酸厂。是設備之費用及時間，均需增多。若購入硫酸，則仍非根本解决。且硫酸法之出品，不及用电化法制成者之純淨，仍无以供天厨味精厂之需要，故决用电化法。第二地点問題。制造鹽酸，以鹽斤为主要原料，在理应設厂于产鹽之区。然仔細計劃以后亦不尽然。盖就产鹽之地設厂，原料

之運費固可節省。但成品仍須運至市場，方能銷售。且鹽酸之轉運，手續繁而費用巨。故其結果，得諸原料者，或竟不獲償所失。不特此也，設廠內地，電力必須自給，設備費既增高，而自辦之小規模電廠電氣價值恐亦較昂。故決設于上海，以求銷售上之便利。第三產額問題。產額多則成本輕，誠為一定不易之理，然為輕而易舉起見，為腳踏實地起見，先暫以供給天廚廠原料為範圍，故名之曰天原電化廠。俟第一步成功，再謀擴充。原定資金10萬兩，其規模自遠遜現在之天原廠。嗣因以廉價購入遠東化學公司之機械，始增資至20萬元，而有今日之範圍，其經過詳見另條。以上各問題既已解決，乃一面進行用鹽免稅，一面訂購機械。

請求免納鹽稅一案，除逕呈財政部外，上海市社會局復為之呈轉，而工商部又為之咨商，中更荷工商部數度之咨催。故于民國17年11月即蒙財政部核准，將本廠原料用鹽之鹽稅分別免減。按實業用鹽條例雖公布已久，而撥用者尙鮮。故政府辦理此案，因成例之可援者少，而審核之時間較長。

再言訂購機械。蘊于制法及機械既略有所知，凡舉世著名各式電解槽之利弊，亦嘗作精密之比較，故但須一詢最近之價格，即可決定向何廠訂購。願正在考慮之時，有人以海防遠東化學公司將售與日人之消息相告。蘊聞之心怦然動。蓋海防出品，在滬市已有相當之信譽，日人得之，天原將多一勁敵。我能取而有之，則永去一勁敵。此中之消長，關係綦大。因專函海防詢其究竟。該公司亦知天廚為彼向來之大顧客，復書頗露合辦之意，招蘊往商。民國17年之秋，蘊于是有海防之行。

海防為法屬安南之一城，鹽煤之取給甚便，勞工之報酬極低。遠東公司之資本既雄厚（計2,000萬法郎），法人在越南又具特殊之勢力，而其出品亦復不劣。有此環境，願竟一敗塗地，天原之情形事事不逮遠東，則此廠之能否舉辦，及電化法之是否可用，實至堪研究之問題。故蘊南行之最要目的，即欲求其癥結之所在，借決天原之進止。若視察機械之良窳，以為收買之準備，尙應列為第二步之行動也。

既抵海防，乃知該廠之失敗，純因組織与管理之不善及營業手段之欠靈活，電化方法固無負于該廠也。嗣察看該廠機械，有已使用者，有尙屬新置者，并皆完整，式樣亦尙新穎，因與商購。然彼猶力持在海防合辦之議。中經彼方債權者（該廠機械等已抵押于當地銀行）之斡旋，乃以國幣8萬元購定愛倫慕式電解槽120具，及與之相當之熬鹼器、氫氣燃燒器、制漂粉機全組。以近日金價之昂，即此120具之電解槽，如盡購新者，已需國幣24萬元，故全廠機械之現值當在30萬元以上也。

上項機械既經購妥，本廠之製造能力與最初之擬議相較，已逾倍蓰，因將股本擴充至20萬元。民國18年5月，本廠依照股份有限公司組織成立，同年10月奉工商部核准註冊。

（“工商半月刊”第2卷第12號，吳蘊初：“天原電化廠籌備之經過”，1930年6月15日出版）

三 吳志超談天廚味精廠的歷史

我是一個繼承父業的資本家，我的父親是吳蘊初。回憶30多年前日本味之素風行我國，我父親認為這項生意可以做得，便埋頭研究。當時自己沒有資本，在富商張逸雲先生出資之下創辦天廚味精廠。在那個時候，全國人民正在掀起抵制日貨的愛國高潮。天廚味精在挽回利權的口號中打開了銷路，一帆風順，從此打下根基。後來為了解決自己的原料問題，開辦天原電化廠，製造鹽酸。為了解決天原廠副產品輕氣問題，再開辦天利淡氣廠製造硝酸。我父親創辦這一系列的事業對於中國基本化學工業的開創，盡了他一份力量。

但是，這創業的過程也是用各種手段進行人剝削人的過程。張氏（逸雲）投資開廠，我父親掌握技術，每出一磅味精，抽酬勞金一角，我記得當時每月出2萬多磅味精，每月就有2千多銀元收入，資金從此累積起來了。“一二八”之後，一度味精滯銷，為了出貨有酬勞金，不願銷路，照常生產，造成存貨積壓，資金無法周轉。同時張氏小老板投機失敗，宕用企業巨額資金。兩頭一軋，天廚幾乎垮台關門。于

是創議改組，通過改組，天廚就從張氏轉到吳氏掌握之中。

天廚靠抵制日貨發財，發財之後，曾捐獻飛機，博得了愛國的虛名，實際上是拉攏反動派，同時為天廚大大的做了一次廣告。當時南洋華僑聽到天廚捐飛機，熱烈支持，飛機是12萬塊錢買的，當年在南洋方面的生意就多賺了30多萬，所以天廚捐獻飛機，實際是名利雙收的。

對於工人，我們資本家懂得硬做是行不通的，一定要想些花樣拉攏工人。我們特別不肯公開做味精的技術，就怕工人把製造味精的法子弄出去。我們除了用待遇好來拉住以外，還想了一個退職儲金的辦法，就是每人每個月由企業代存一塊錢在廠里，17年之後可拿1千元；但做不到17年就一個錢也不能拿。這樣就把工人束縛起來。

資本主義的花樣就是這樣。別人倒霉，我賺錢，甚至吃了人家，還要人家叫我好的。但是我們自己也並沒能掌握住自己的命運。

抗戰開始，我們幾個工廠企業，一部分毀於炮火，一部分拆遷逃難。留在上海的一部分掛上了德國國旗，來苟延殘喘。情況相當狼狽，逃難的一部分就是天原電化廠。在重慶和官僚們相互利用之下，乘當時幣制貶值，把剩在上海的一部分天原機器出賣，就收購了全部小股東的股票，這樣一來，天原就變成了吳氏與官僚資本合夥的企業了。

（摘自吳志超代表在上海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上的發言，載1955年12月28日新聞日報）

中国化学工业社

一 创办及发展概况

中国化学工业社，为上海化妆品企业之巨擘，创立于1911年，开始时规模很小，由方液仙独资经营，设厂于上海圆明园路。1915年，集资5万元，组织股份有限公司，迁工厂于重庆路，并在广东路设立发行所。此后历年都亏折；到1920年，改组为无限公司，由方液仙及其叔方季扬合资经营，业务日有进展，于是在滬西檳榔路购地建立第一厂，并移设总发行所于河南路。1923年，增制调味品之观音粉，在第一厂南端续建第二厂。1928年将制造蚊香部分划出，另建第三厂。1931年，因扩展营业，增加资本到40万元，设晶明玻璃厂于上海胶济路，又设除虫菊试验场于上海之北新泾。至此，不仅出品完备，而且各种重要原料，也可以不再仰求外国了。1934年元旦，该社又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资本增至100万，先收3/4，计75万元^①。“一二八”日寇进犯上海时，该社位在租界，未蒙直接损害，仅有间接损失，停战协定成立后，市面恢复，国人抵制日货之心益趋热烈，于是该社各种出品，以社会需要之殷，销行益巨，故数月以后，渐见起色，所有战事时期中跌落之营业，差可抵补，总计全年营业，仍达200余万元^②。1940年，该社又增资至300万，翌年1月再增资至360万，同年7月1日成立重庆分厂，同年10月增资至500万元^③。

中国化学工业社创办人方液仙，浙江镇海人，光绪末年毕业于上海中西书院后，感到化妆品工业之重要，从事研究，先在家里试验，后

① 上海机联会出版：“工商史料”第1集第38—39页。

② 1933年6月1日北京晨报。

③ 中国征信所1947年出版“华股手册”第144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到裝袋，都是陳一家大小親自工作的。後來銷路好了，便請鄰友親戚來幫忙，成功了一種家庭工業。這就是該廠名稱的由來。

那時候，陳先生和他的公子小蝶先生，以譯著小說所得的稿費，都用于製造牙粉方面；並在實業部立案，成立父子合資的無限公司。可是營業一天天的發達，個人的財力究竟有限，所以在民國7年的7月，改組為股份兩合公司。他的資本，自1萬元起，逐年增加，現在已滿50萬元；連着流動金計之，已達120萬元了。

最初的社址，是在上海西門靜修路三樂里內；民國9年，始建廠屋于江陰街。民國12年，購置梅雪路基地11畝，建設新廠和無敵牌玻璃廠；後來因為煤灰有碍于粉色，所以把玻璃廠并入別廠，改設制盒廠，以取清淨。又在廠後添造房屋，設立鉛石印部及橡皮印刷廠。同時把無錫的汽水厂遷入總廠。除已設第一制鎂廠于無錫外，又設第二制鎂廠于浦東。而原設在寧波和海寧的制鎂分廠，都歸并在浦東的第二廠中。還有無錫的利用造紙廠，也是陳創辦的，家庭工業社所用的紙張，大部分是由利用廠供給。此外，鎮江還有一個製造蚊香蛤油的工廠，以及太倉的一個薄荷油製造廠。至于職工，單就總廠一部分已有3百餘人，若并各廠及發行所計之，就有2千人左右。這是家庭工業社創辦至今的經過情形。

上面已經說過，家庭工業社在創辦之初，原是只做無敵牌牙粉；自“五九”以後，營業日見發達，乃增制化妝品及各種洋酒。總計該廠出品，現在已達400餘種；所用商標，均為無敵牌，民7改組的第一年資本只有1萬，所以只做了2萬餘元的生意。第二年增資5萬，就做到15萬了。第三年增資為10萬，做到22萬。第六年增資為20萬，做到52萬。第七年增資為30萬，適當齊盧之戰，各業都受影響，可是家庭工業社，仍能保持52萬的營業紀錄。第八年的生意，又增加了10萬元。而第九第十兩年，却少做了10萬元的生意，這是因為無恥的投機家冒牌所致。最近數年來，採取薄利多賣主義，逐年營業俱有增加，去年已做到140餘萬的銷數。該廠出品的銷路，可謂已遍全國；不過各處常有冒牌出現，不免受“買主貪廉商人重利”的不良影響；否則依陳先生預

算，至少應該加20倍的銷數呢。

該廠各種出品的原料，如碳酸鎂、碳酸鈣、薄荷腦、玫瑰油、茴香油以及所用瓶盒裝璜紙張等，都是由自己製造的；牙膏管則取給于上海軟管廠，可稱為完全國貨。

家庭工業社自民7改組為兩合公司後，由陳樹園擔任經理，負該公司無限的責任。關於營業上的設施及計劃，採用獨裁制。於財政方面，完全採用公開制度，所以把現金出納保管之權，授與常駐監察，以彰公信。副經理就是小蝶，他們父子兩人，辦了10年之後，陳先生因精力不繼，所以在民國18年的時候，向股東會提議，請由最初創立至今連任之監察人李新甫加入為無限責任股東，來代替他經理的職務。股東會又舉陳為監理，仍以小蝶先生為副經理。因改獨裁制為合議制，以聯席會議為意思機關，以製造與營業兩部為執行機關，以監理及常駐監察為監督機關，取三權分立，中央集權的制度。製造部經理由李新甫兼任，營業部經理由陳小蝶兼任，常駐監督則為涂筱巢。

（摘自上海機聯會：“工商史料”第1集，第113—117頁，1935年12月出版）

該公司在30年8月改組為股份有限公司時，由常務董事胡伯翔兼任總經理，涂鼎元兼任副經理。最高機構為董事會，董事長金宗城（浙江鎮海人，上海商業銀行副經理，1941年為家庭工業社董長），董事：李新甫、胡伯翔、蔣保厘（上海人、律師出身）、陳小蝶（陳樹園之子）、張珍侯（吳縣人，中西書院畢業，自幼研究化學，經營成康潤顏料號，曾任天原電化等廠董事）、姜屏藩、涂鼎元、胡伯洲、周瘦鶴、林志道等。監察顧慶毅、高鏡容、楊恩誠^①。戰前資本為法幣60萬，現在（指1946年11月）總額為法幣9,000萬元。

該公司常務董事兼總經理胡伯翔，號鶴翼，南京人，畫家（為名畫家胡公鄴之子——編者），曾創辦東方美術出版社。30年8月，應家庭工業社聘為總經理，現任上海市化妝品工業同業公會理事長，工業協會常務理事等職。

^① 董監事名單括號內的簡歷是編者加的。

家庭工业社除以无敌牌牙粉，聞名于世外，更制蝶霜，至今全国风行。抗战之前，家庭工业社出品达130余种，俱以机器制造，用人工及輔助机械制成。化妝品有牙粉、牙膏、蝶霜、蛤蚧油等，化妝品原料有：碳酸鎂、碳酸鈣、薄荷油、玫瑰油、茴香油、丁香油等。即所有瓶盒裝璜紙張，均已自制自用，成为純粹之完全国貨。該公司在全国交通樞紐地均設分社，以利推銷。

抗战軍兴，該公司老厂，所有設備已因战事全毀，該公司初以汉口分社为中心，制造牙粉，供給后方軍需民用。后汉口形势緊張，更于距离重庆60里之巴县同兴乡自建厂房，再接再厉，繼續制造牙粉、蝶霜，更在昆明設立分厂，故在抗战期間，始終供应不缺。惟陈栩园先生以高龄远赴内地，对該公司分社分厂添設扩充，心力俱瘁，后因水土不服，返归滬上，于民国29年，遂归道山。

該公司原有地方厅路之总厂，及江阴街第二工厂，俱于滬南淪陷时，被日寇炮火所毀。南京、南昌、蚌埠、汉口、長沙、广州分社，亦相繼淪陷，被毀損失至为惨重。幸当时一部分貨料，随政府西迁，在淪鎮設立分厂，以供后方需要。上海方面，縮小規模，在旧法租界另建厂房，繼續出貨。經該公司全体同人，奮力苦干，現已逐漸恢复，机械均系新置，有制造牙粉用之篩粉机2座，拌粉机1座，制造牙膏之制牙膏机2座，制造蝶霜之攪拌机16座。制造蝶霜之柴油噴头爐灶8座，自印商标用凹凸商标机一架等。

制品以无敌牌牙粉、牙膏、蝶霜为主，現（指1946年——編者）每月生产量，計紙袋牙粉約750箱，方盒牙粉約500箱，牙膏約300箱，蝶霜約600箱，其他約200余箱，每月出品总計2,400余箱。惟因最近各地尙未安定，交通迄未恢复，致未能照原拟計劃尽量扩展。

（上海机联会編：“中国国貨工厂全貌”第41—45頁，1947年10月初版）

五洲大藥房

五洲大藥房創設于1907年，創辦人是夏粹芳（商務印書館創辦人——編者）。不過在那時候，該藥房只是一種普通商號的組織，規模既小，業務不甚發達。到民元前一年，夏粹芳邀請項松茂為經理後，感覺到普通商號的力量薄弱，未能與外貨競爭；乃于民國2年，與夏發起，改組為有限公司，於是營業蒸蒸日上，遂在上海閘北天通庵路購進基地，備作建廠之用；一面又收買上海太和藥房，作為支店，而外埠支店，亦紛紛設立，這是該公司發展史上的第一個時期。

從此，業務一天天發展，到民國10年，乃于天通庵路基地上建造廠屋，開始製造藥品。不久，又接盤固本皂廠，11年又收買亞木臭水廠；12年購進福州路基地及市房，成立總店；14年收買中華興記香皂廠及南洋木塞廠；18年又在寧波東吳鎮設立東吳藥棉廠；此外，又陸續增設外埠支店10餘處，及添置機械，羅致人才，同時派員赴歐美考察制藥制皂等事業，而資本亦擴充到150萬元。這是該公司發展史上的第二個時期。

民國21年，“一二八”事變發生，該公司的北四川路支店適在戰區之內，店內職員，自然遭到了同樣的命運，項松茂為援救支店，不料就此一去，竟同罹于難。

自項松茂逝世後，該公司董事會乃推舉松茂之子繩武繼任總經理，並推高翰卿（鳳池）及盧志學為常務董事，努力經營，四、五年來，該公司還是在不斷的建設，先後設第二廠于滬西，創制甘油，設第三廠于閘北，專制各種原料；并設廣州支店，滬西靜安寺支店，以及福州路總店等。這是該公司發展史上的第三個時期^①。

^① 上海機聯會出版“工商史料”第2集12—45頁，1936年出版。

五洲大藥房的製造工場，除附屬事業太和藥房外，還有第一、第二、第三以及東吳藥棉等廠。茲將各工場情況簡錄如下：

(一)太和藥房。創始於民國4年10月，民8年始歸項松茂獨資經營，建屋於福州路，民9年以俞葆生為經理，是時規模粗具，自製藥品約200餘種，如六〇六治療梅毒藥及肺漿等，後經項松茂建議歸并五洲，成為上海市聯號。

(二)五洲固本廠。該廠原為德人盤門於1908年所創，名固本皂廠，出品有香皂、洗衣皂、洋燭等，初時香皂營業勝於洗衣皂，因當時洗衣皂行銷於我國市場者，多係英國產品，難於競爭，但不久即獲得相當地位。歐戰爆發，盤門氏回國，乃將該廠出盤於張云江，改名為張云江肥皂廠，至民10年，由五洲收買，改上述名稱。民10接辦之初每日產洗衣皂僅百餘箱，繼增至300箱，民14收買中華興記香皂廠合併其中，民15增至500箱，民18又增至1,000箱。1936年更增至每日3千箱。

(三)五洲第二製藥廠。成立於民國23年，主持人為張輔忠，設備購自德國。初時產品為甘油，民24年添設有機合成藥物工場，製造治療消毒藥品等。

(四)五洲第三廠。民23年3月設於上海閘北，出品除製藥外并兼製蚊香。

(五)東吳藥棉繅布廠。廠地在浙江鄞縣，原為鍾崧甫所設，鍾經商於日本，民8歸國集資設立公濟藥棉繅布廠，是為我國製造醫藥用棉之首創者，但因營業失敗停工，民18年被項松茂收買，抗日戰爭前年產藥棉10萬斤，繅布6萬斤^①。

五洲藥房開設以來，資本逐步增加，至25年，實收資本已達150萬。26年將公積金及各項準備撥充股本，增資至250萬，“八一三”戰事發生，上海謹記橋的工廠頗受損失，27年被日本油脂會社強占，并將該廠所有牛油存貨製造同一商標之固本皂在市上傾銷，該藥房乃

^① 五洲大藥房30周年紀念刊，1936年出版。

租賃西康路住宅為工場，製造肥皂，但範圍不大，出品不多。至29年復增資至500萬。太平洋戰後，採取保守政策。抗戰結束後，積極推進業務，35年6月增資至5,000萬，每一老股加5股。36年9月更增資至35億元，每一老股升55股，認繳14股^①。

歷屆董監事名單：

1915年：董事 陳如翔、項松茂、夏筱芳（江蘇青浦人，留美學生，商務印書館經理）、黃楚九（流氓騙子）、印錫章。監察張蟾芬。

1923年：董事 史量才（申報館社長）、項松茂、鮑咸昌（商務印書館經理）、張云江、牛惠霖（醫生）、王顯華、何梯雲。監察陳培生、陳培初。

1936年：董事 刁信德、項繩武（項松茂之子，浙江鄞縣人，聖約翰大學畢業）、夏筱芳（商務印書館經理）、毛安甫、郁厚培、鄒志豪、顏福慶、高鳳池（商務印書館董事）、盧志學（浙江寧波人，留學英德二國，開成造酸公司經理）、監察黃石安、林滌庵（浙江鎮海人，大豐工業原料公司經理）、劉春園。

1947年：董事長 顏福慶。常務董事：張輔忠（浙江杭縣人，德國化學博士，任五洲技師甚久）、高鳳池（商務印書館）、黃宣平。董事：朱如堂（浙江吳興人，聖約翰大學畢業，曾任保裕保險公司買辦）、夏鵬（筱芳）、刁信德、鄭式庭、毛安甫、馬蔭良（江蘇松江人，同濟大學畢業，申報館總經理）、潘公展（國民黨上海市社會局長CC分子）、竹森生（浙江嵗縣人，中國銀行業務科長）、樂文照、潘光迥、鄭湘斌。監察：林滌庵、徐玉書等。代總經理張輔忠^②。

① “華股手冊”，131頁。

② 同上。董監事名單括號內的簡歷是編者加的。

信誼化学制葯厂

一 概 况

信誼化学制葯公司是上海較大的葯品制造工厂，抗战时与新亞制葯厂同称二大巨擘。創始于1922年，原是德国医葯博士霞飞所創。1930年由鮑国昌、何子康合資收买，改組为华商股份有限公司。

該公司資本初时仅为10万元，1932年增至15万元，1936年又增至20万，同年底增至60万，1940年扩充营业范围，复增至250万，此时股票分为优先和普通两种。至1941年4月又增資至710万元，分为71,000股，每股票面100元，內普通股31,000股，甲种优先股3万股，乙种优先股1万股。1942年10月增資至中儲券2,000万元，普通和优先股票实行統一。1943年9月又增至中儲券5千万元，分为100万股，每股票面改为50元。1946年6月，調整資本为法币5千万，后又經董事会議决增資至法币10亿元。

該公司规模頗大，計有总厂和分厂7处：制葯厂、血清厂、玻璃厂、橡膠厂、鉄工厂、化工厂、印刷厂和附設研究所，具有綜合性企业性质。职工約有650人。产品以信誼为商标，共有100余种，最著名者如：消治龙片、維他命制剂、臟器制剂維他賜保命針丸、梅毒治疗剂之新惜花散、力弗肝等。銷路远及南洋各地。

該厂自改組以来，营业頗为发达，年能获利，尤以抗日战争时期上海市面畸形繁荣，貨价逐步高漲，加以欧战爆发，外貨来源减少，产品更暢銷，售价一再狂漲，該厂获利极丰。計1943年营业额中儲券7,400余万元，純益830余万元，1944年营业额中儲券9亿3千余万，純益1,500余万，1945年营业额法币1亿4千余万，純益2,500余万元。1946年起，該公司接受国民党軍政部委托，定制大量葯品，决定添置厂房，

一方面向美国定購机器，以期扩大生产。

1947年董监事名單如下：

董事長兼總經理：鮑國昌（浙江鄞縣人，聖芳濟學校及震旦大學畢業，在怡和洋行及信誼葯廠長期工作）。

董事：徐虎臣、陳偉卿、朱吟江（江蘇嘉定人，久記木材公司經理怡和洋行買辦）、夏錦舫、劉聘三、虞順懋（浙江鎮海人，虞洽卿之子）、陳銘珊（學徒出身，曾在萬國葯房當協理）、鮑國梁。

監察：劉世盛、汪少鶴。

（本文主要材料來源除調查材料外，還有：①1932年9月13日時事新報。②王相泰編：“華商股票提要”81頁，“華股手冊”第137—138頁。③“華股手冊”第137頁。）

二 起家經過及受帝國主義官僚資本的壓迫

我們信誼葯廠開了差不多有30年，但是怎樣起家的呢？是靠了二只牌子，一只是“維他賜保命”，一只是“消治龍”，但主要還是靠了“消治龍”，在敵偽時期消治龍葯片很吃香，但是自己製造的原料不多，市面上價格也很高，因此我叫幾家小廠做消治龍粉，我告訴每一家小廠一個同樣的數字，這個數字就是我所需要的數字，後來大家都做出來了，數量超過了好幾倍，市面上當然不需要這麼多，結果給我一家家的殺價買下來，而我們做成了葯片以後賣出去的利潤卻高到二、三倍。我們現在的廠房，就是10萬支消治龍一起拋出去，這座五層高的鋼骨水泥大樓就到了手裡。當時消治龍銷路很好，外面不大買得到，有一位醫師因為病人等着，開了一張葯方要買二盒消治龍片，我回答他說今天沒有，要明天有，事實上貨色有沒有呢？有！那末為什麼呢，是為了明天要漲價，好賣新價錢，那個時候只想漲價賺錢，根本不管人家生病不生病。

但是“好景不常”，到了抗戰勝利以後，美國葯品大量的來傾銷，上海葯廠倒掉了一半，我們的化工廠停止了，葯廠的產品也銷不出去，於是改做進口生意。當時美國有家商行來電報說有配尼西林片

(就是青黴素)12万瓶,價錢可以便宜些,不过招牌紙要自己貼的,我們一算利潤倒還不錯,自己貼貼牌子那有什么問題呢,而且平常我們总是想打开自己的牌子的,所以就設法匯出去了11万美金,訂定4个月交貨,但是过了6个月、7个月还不來,拚命的打電報去催,等這批貨到了上海的時候,孚中公司、揚子公司這些官僚資本的定貨早已充滿了市場,市價大跌,因此只好跌進成本出賣,結果虧掉了7万多美元。

事情还不就是这样一点,当这些药片卖出了一大部分的时候,我們发现了有几只瓶子原来的招牌紙沒有括掉,一看已經过期失效了,当时我心里一急,怎么办呢?这样大的一笔数目退回来怎么赔得起,向国外交涉未必一定有效,我叫大家不要响出去,我亲手把这几瓶药片拿来毀掉了,12万瓶沒有效用的配尼西林就这样全部卖出去了。

我們厂里还有这样一条厂規,就是不用結过婚的女工,用进来的女工,一結婚就要立即解雇。因为結婚后一定要有孩子,有了孩子,工作效率就要低,所以不許結婚。后来有一个女工他結了婚又有了孕,但是家庭很困难,为了維持生活,怕失业,她使勁的把肚子扎紧,不讓別人看出来,結果生下来的孩子手脚歪曲,变成一个畸形的殘廢。这样駭人听聞的厂規却在我們厂里实行了有15—16年之久,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母亲和孩子的生命和健康。

我們厂就是这样大起来的。藥品对一个病人來說是一样多么可貴的东西,它可以治病救人,但是解放以前我們所做所为的是怎样的呢?不是在治病救人而是在謀財害命。吃了帝国主义的亏不敢去講,而竟然不惜牺牲成千上万人的生命,来保留自己这一点点資本;只顧自己图利,而不顧工人孩子的生命健康,这是多么的殘忍和可耻,回想起来真使我感到万分的痛恨和慚愧。

(摘自陈銘珊在上海市第一次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上的发言,1955年12月27日新聞日報)

新亞化学制葯厂和他的事业系統

一 沿 革

新亞化学制葯厂的創辦人，是許超和趙汝調。許字冠群，江苏武進人。是国民政府核准注册的會計師，曾任上海市商会执行委員，創辦新亞化学制葯厂后，即任該厂之董事兼總經理。又曾办过华商新明行，新苏貿易公司，新农除虫菊粉公司，武青長途汽車公司等事业。現任上海市制葯业同业公会主任委員，上海市新葯业同业公会执行委員，上海市化妝品业同业公会常务委員，中华工业总联合会执行委員，上海机制国貨工厂联合会監察，国民經济建設运动委員會委員兼專員等。

趙号寿桥，江苏武進人，日本千叶医科大学葯学科毕业，得有葯学士学位，卫生署登記葯師，曾在日本內务省东京卫生試驗所及日本大阪藤澤化学工厂实习，旋在該厂新葯部供职，民15年辞职回国，即与許冠群发起組織新亞葯厂，并历任东南医学院，中法大学葯学專修科教授等职。現任新亞葯厂董事兼厂長。

据許冠群說：“新亞葯厂在初創的时候，并不是以制造新葯为主要营业的。最初是制造化妝品，后来因为同业繼起者日多，而且竞争日烈，乃改变方針，添制各种新葯，及玻璃仪器，安瓿注射筒等。初創的时间，是在民15年5月，最初資本，仅2千元，厂址在南成都路，規模极小，职工亦仅10余人，至民17年，因营业发展，乃增資至1万元；19年又增資至5万元；22年增資至25万元；直到今年（民25年）乃大量增資，共为資本50万元。职工数目，亦由10余人而逐渐增添至400余人，厂屋由成都路迁至白克路，制造部則于民国19年，迁入麦根路（即今之第一厂）至民22年，又另設第二厂于新開路，并将白克路之总公司，

迁入新開路第二厂办法。”

該厂的組織是股份有限公司。現任總經理为許冠群，經理为顧健夫、顧克民，厂長为赵汝調。对于职工管理，則分考勤与獎懲两种，考勤方面，則有訓育部与人事部負責，職員由訓育部考勤，工人則由管理員及人事部紀錄^①。

新亞化学制葯厂最初地址在上海白克路，以制造化学用品为主，其它西葯成品为輔，民19年3月設制葯厂于麦根路，以白克路原址为发行所，复增辟玻璃工場，自制安瓿，陸續制葯片、軟膏、浸膏等新葯，营业漸展，在外埠設分公司及办事处以广銷路，原有厂房不敷应用，遂另租新開路1905号，將公司及厂全部迁入，而以麦根路厂全部为玻璃厂，24年設葯物研究所于西摩路，聘曾广方为所長，制造有机砒素剂、梅毒特效葯等，25年在林肯路購地，拟自建厂房，旋以抗战軍兴未及建筑。29年購进新開路中华新邨楼房，公司迁入营业，并附設包裝印字兩工場，而以原賃之1905号房屋完全为制葯工場，繼复設生物研究所，聘余賀为所長，研究防痨特效剂及新亞青黴素等出品，此外又先后兴办新亞材料厂、新亞血清厂、广澄医葯專科学学校、冠群业务补习学校、新亞附屬圖書館等事业，并刊行新医葯杂志，本外埠現有营业处所除上述上海新開路外，在广东、北京設有分公司，湖南、江西、湖北、云南、重庆、广西、蕪湖、天津、青島、济南、陝西、鎮江、苏州、常州等地設有办事处，南洋亦設发行所6处，太平洋战争后生产銳减，抗日战争后恢复各部生产。

主要負責人：董事長：許广澄，江苏武进入，前常州汇丰銀号經理。

董事：許超、赵汝調、顧克民、顧厚甫、曾广頃、陈蔗青、馬蔭良、顧毓琦、吳葆芝、宋友裴、汪伯奇、程叔履。

監察：顧福庆、李伯涵、徐仍礼、朱縉侯、伍連德。

總經理：顧克民（江苏武进入，上海商业專門学校毕业。曾任国

^① 上海机联社：“工商史料”，第2集93-96頁，1936年12月出版。

信銀行常務董事、裕丰織造廠董事長，1947年繼許冠群為新亞總經理，新亞以許廣澄、許冠群、趙汝調、顧克民4人的股份最大——編者）。

經理：顧厚甫 大漢生物化學廠董事。

廠長：趙汝調。

副廠長：客啟兆 廣東中山人，留美化學博士。

藥物研究所所長：曾廣方 廣東中山人，東京帝大藥學博士。

生物研究所所長：余賀 河北人，美國哈佛大學菌學博士。

歷年資本增加：初創時資本2千元，民17年3月增至1萬元，19年3月增至5萬元，22年3月增至25萬元，25年增至50萬，27年3月增至100萬，29年4月增至300萬，30年3月增至800萬，31年以2對1改為偽中儲券400萬元，並增資中儲券2,600萬，共資本3,000萬，32年增至中儲券1億2千萬，35年6月以1對1調整資本為法幣1億2千萬元，分1,200萬股，每股票面10元。

產銷情況，該公司製造各種星牌藥品如龍白龍、寶青春、胚生蒙、新消梅毒、新亞綠藥膏、新亞青黴素等180多種，最高產量日產各種注射劑約3萬針，各種藥片約10萬片，各種藥膏約10萬公分，各種疔劑約8萬公撮，最近3年來員工人數計32年360餘人，33年250餘人，34年320餘人，35年270人。產品行銷國內外，32年銷貨總額為中儲券52,566,000餘元，33年為348,076,000餘元，34年為法幣121,075,000餘元^①。

二 新亞製藥廠直屬企業

甲、玻璃廠 新亞玻璃廠為新亞藥廠一部之分廠，設立於民國19年，設廠於麥根路，為我國製造硬質玻璃之首創者，除專供藥廠使用之安甌及各玻璃瓶罐外，其他各種化學玻璃儀器，注射器，化驗間中使用之玻璃器件，均有出路。

^① 聯合征信所編：“上海市股票廠商概覽”58—60頁，1947年2月出版。

乙、新亞化学葯物研究所 新亞化学葯物研究所設立于民国24年，專門研究各种新葯及各种化学葯品之制造，以便葯厂制品得以推陈出新。設所于西摩路，所長为葯学博士曾广方氏，研究員如錢思亮博士，張国仁化学师，沈仲謀葯师，張毅博士等均系医学界知名之士。有机砒素制剂治疗梅毒特效葯“新消梅素”即为該所最著名研究出品之一，其他各种近世著名新葯，无不由各研究員分担研究中。

丙、新亞生物研究所 新亞生物研究所成立于民国29年，由細菌学專家余賀医学博士为所長，凡屬生物学制品之研究及制造，均由該研究所担任之。該所之历史虽淺，然所制之痲病特效剂“抗痲素”，名聞医界，推为近世治痲圣葯。其他如斑疹伤寒之疫苗，由刘緯通博士研究制造中，不久亦有出品云。

丁、其他社会事业 (1)新亞葯厂为业务之远大計，自办学校，乐育人材，設立广澄葯学專科学学校，为永久紀念新亞葯厂董事長起見，故定名“广澄”所以示崇德报功之意也。

(2)冠群业余补习学校，分日夜兩班，青年子弟就学者达3千余人，在上海教育界頗具声望。

(3)新亞圖書館。

三 旁系事業

(甲)新亞卫生材料厂股份有限公司 該厂于民国26年秋由新亞葯厂橡皮膏部与新生化学制造厂合并，集資5万元，設厂于亞培尔路，專制新亞橡皮膏，品質优良，行銷遍及国内外。嗣以业务发达，于民国27年增資至10万元，于28年又增資至15万元，并設鉄工部，制造各种化学及制葯机械，备受化工制葯兩界人士之乐于采用。因营业蒸蒸日上，以致原址不敷应用，遂于28年夏迁至海格路現址，再度扩大范围，又增資至30万元，添設母机及电鍍設備，以制造医疗器械，国内外医院与医师採購，頗为踊跃，定貨紛紛不絕。至民国30年，因該年营业达130余万元，超过原有資本4倍，乃于是年冬又增資至120万元，添置新式設備，增加生产，充实原料，以供各界需求。

(乙)新亞血清厂股份有限公司 該厂初創时資本为 国 币 30 万元,旋以营业发达,增資为 国 币 60 万元,制造方面計分預防制造部,治疗制品部,血清部。关于各部制造应用設備,均采最新式器械,并有可飼50余头之馬房厂基亦系自置,尤便于未来之扩充。制品如白喉血清單位之檢定,依国际联盟会規定,試驗血清效力时,以丹麦哥本哈根京城国立血清院供給之国际單位标准血清为对照,使該厂制造之白喉血清与世界各大厂所出者效力相同。他如痘苗,霍乱苗,伤寒苗等,均依中华药典所規定,而百乃定敌痢菌汁,保尔泰素,百淋恐等。

(丙)新亞酵素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該公司由許冠群,朱博泉,許宝驊,史子权,赵汝調,陈駒声等諸君发起,遵照有限公司法組織,自 民 国 30 年 6 月 开始集議,至 8 月 1 日設立籌备处,額定股本 国 币 100 万元,分为 10 万股,每股 10 元,至 10 月 20 日股款收足,向政府注册,得有設字第 724 号執照。是时該公司正式成立,設总办事处于福州路 89 号 3 楼,租定大西路 57 弄 20 号錦隆染織厂原有厂屋,裝配机器,进購原料,試制各种酵素工业品,至 31 年 1 月 开始出品大部分,如酒精,酵母等,惟因时局嬗变,复处草創期間,机具既难周备,厂屋亦感隘陋,遂图集資扩展,以赴时运,爰于 8 月中增資为 国 币 300 万元,現在建造新厂于原址左側,定制新式机器,从事扩大范围,所产酵母业已推銷全市,以应戶口面粉发酵之需求,故营业益見发达。至于該公司制品如,一、干酵母,二、湿酵母,三、酒精,四、咖啡因,五、葡萄糖,六、麦乳糖,七、酵素片等,每年出品总值約計 国 币 500 万元。

(丁)新亞科学股份有限公司 民 国 30 年冬,許冠群,赵汝調,曾广方諸先生,感吾国科学事业之落后,爰起而籌設科学公司。最初目标仅为供給新亞药厂本身之用,既而承社会人士交口称誉,营业范围日益扩展,至今各大銀行保險公司及各大公司均先后惠顧,該公司資本为 国 币 100 万元,制品分为,甲、各种印件,乙、各种紙盒,丙、教育用品,丁、文具仪器等四类。

(戊)香港新亞化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香港新亞化学制药股份

有限公司，简称香港新亞药厂，为上海新亞药厂联合香港华侨于民国28年1月所設立。資本金港币50万元，自建厂屋于九龙，設营业办事处于香港。除自制合于南洋方面推銷之新藥成藥，及利用热带所产之原料制成藥品外，并販賣各种原料藥品，及推銷上海新亞药厂出品。去年12月8日事变后，工厂即受軍管理，惟不久即照常开工。今夏軍管理解除后，仍照常制造各种出品。

(摘自新亞建业股份有限公司開幕紀念刊：“新亞建业”，1984年出版)

丹华火柴公司

一 創辦經過

丹华火柴公司是华北最大的火柴企业，历来雄踞华北。1931年时股本总额为120万元，分作24,000股，每股50元，以丹鳳、华昌兩火柴厂旧有的老股50万作为第一次优先股，1919年以后所招新股70万元作为第二次优先股。該公司主要股东如下：

張秦壘（华昌火柴公司代表）、王邛隆（北洋軍閥倪嗣冲之代表人）、陈炳鏞（华昌火柴公司代表）、馮麟需、孙鳳藻、吳鉅勛、魏長忠、李樾、王季烈、温錫楷等。

該公司共轄3厂，总公司設北京崇文門外，在北京、天津、安东3地都設有工厂。北京的工厂創辦于1905年，原名丹鳳，1917年为了避免竞争，扩大营业，与天津的华昌火柴厂合并，改名丹华。丹鳳原系前清补用知县温祖筠等創辦，当时資本仅5万兩。該厂經理为項繳云，副經理王与三。項是前北京实业学堂毕业，曾任該校教員，后在惠通公司工作。約在1930年左右入厂工作。据1914年时調查，該厂設備有篩軸机4架，排軸机24架，卸軸机20架，成年男工570人，幼年男工500人，女工約30人，共1千余人。除篩軸、排軸和卸軸采用机械外，在蘸药、烘干、裝匣和包裝都用手工，其中以裝匣部用人最多，达450人。1913年共产火柴26,500箱，該厂設立以后，即获得清朝及北洋政府的專办特权，同时北京火柴厂只有此一家，故营业甚好，每年可获利数10万元，产品行銷北京及沿京綏、京汉兩鉄路綫各地。火柴厂以木材为最主要的原料，初期系来自外国，其中60%購自日本，后来丹华公司組成，設立安东分厂，所用木材改由安东分厂供給，但所用洋硝及磷仍購自欧美。

丹华天津分厂原名华昌，1911年8月成立。資本25万。机械設備在1931年前計有制梗机2部、理軸机9台、列軸手尾机28盤，石原机32盤，机械多系購自日本。全厂职工1,100余人。年产火柴約18,000箱。

安东厂1916年成立，該厂附設有鋸木部及木場，北京和天津工厂的木料都由安东供給，安东分厂产品推銷东北各地。

丹华在1927年成立时全公司資本仅20万，至1931年时增至120万，十幾年間資本約增加了7倍，发展是很迅速的，其規模仅次于上海大中华火柴公司，在民族資本的火柴业中占第二位，它所以得到飞跃的发展，与主持人是官僚軍閥有密切关系。

(摘自“丹华火柴公司調查材料”)

二 与日本火柴商組織联营分社

行政院据刘志清等呈：津丹华、中华兩火柴公司，勾結外商，組織华北火柴联营社，壟断居奇，請严令制止，行政院現已將此案交实业、財政兩部核办。(1937年2月6日新聞报)

中华全国火柴产銷联营社天津分社，籌备工作业已告竣，昨日正式開幕，該社董事長赵廓如因事滯平未归，由常务董事王瑞三、金山喜八郎(日人)等率領經理王与三(丹华代表)，秘書張执中，运銷科主任馬少群、會計科陆华欽等主持開幕事宜，津市各火柴业，均派員前往致賀。

据經理王与三談，各地分社定于本月內先后成立，华北区各县經銷处，即开始接洽，于15日以前訂妥合同。华北区参加者共有8家，自昨日起，一律停止直接对外营业，統稅局亦自昨日起停止发印花，將來火柴出厂須有联营社发給之凭單。該社为考核監督各厂制造情形，已派有駐厂稽核員6人，常川駐于各厂，昨已分別到任。計(一)中华大生兩厂，孙国卿，(二)三友，單以簡，(三)津丹华，忠島与之助(日人)，(四)平丹华，志田广誠(日人)，(五)北洋，李秀岩，(六)泊鎮永华，刘松齋，至荣昌現在停工期間，北平厚生因其他情形，均未派員駐厂，

所有以上各厂存貨，自昨日起，由駐厂員監視点驗，点驗結果終了后，即呈報該社核办。嗣后各厂开工，均由駐厂員監視生产，以資統制云。

此后各厂产銷数量，由該社按照比額，平均分配，是項比例，系根据民国20年7月至23年6月3年产量总数平均（根据統稅局收稅数字），其各厂产量及百分率如次：（一）天津丹华年产 37,687 箱（小数点后略），占21.363%。（二）北洋，年产20,078箱，占11.383%。（三）荣昌，年产11,504箱，占6.521%。（四）三友，年产 13,858箱，占7.853%。（五）中华、大生兩厂年产 44,574 箱，占23.574%。（六）北平丹华，年产 30,680 箱，占17.393%箱。（泊鎮永华，年产21,014箱，占 11.913%箱。（八）北平厚生，尙无統計，將來营业发达或縮減，均按是項比額平均分配云。

（1937年2月2日天津大公报）

附：清政府商部奏招商設立京師火柴公司并撥助官本片

竊維火柴一項来自外洋，銷數最旺，上海、汉口、四川皆有華商設立公司抵制洋貨，京師都會之地尤宜招商兴办，以塞漏卮。当經諭令北京商會各董事籌議去后，旋据商會董事分省補用知縣溫祖筠等稟稱：擬集股5万兩于京城設立厂屋，名曰京師丹鳳火柴有限公司，并請發給官股予以專办年限等語。臣等查溫祖筠等熟悉商務，家道亦尙殷實，其所請制造火柴意在創兴實業，挽回利權，所擬章程悉照臣部奏定公司律辦理，自應准予立案，撥給官股銀5千兩，以資提倡，并准于京城內外大兴宛平境內專办10年，借免摻奪，一俟資本充裕，獲利較厚，即當設法擴充。除飭該商等從速籌办，并俟建厂時再由臣部咨行五城察院各衙門一体保護，謹奏。

（摘自東方雜誌光緒31年2月9期，“實業”151頁）

龙章造纸厂

創立：公司之沿革当前清之季(1898年时)，我国紙張輸入，逐漸增加，外人乃集合資本，于浦东設立华章造纸厂經營数年，成积頗不惡。1906年上海紳商龐元濟氏(曾任清朝四品京堂官)发起創辦龙章造纸厂，以与华章相对峙，遂集資40万兩，并得北洋政府補助金6万兩，組織股份有限公司，卜地于上海市外龙华之日暉港地方，建設工厂。不意当时銀价大跌，制紙界受不少之打击，兼之德奧兩國紙張竞争激烈，难以抗衡，公司之营业亦甚感困难，設立后不过2年，宣統2年損資至20万兩之鉅。不得已遂减去資本20万兩，另行募集新股20万以补之，然当此工业幼稚时代，且于蝕本之公司，无人投資，結果，仅募得8万兩，得以繼續營業。翌年且得8厘之股息，而公司前途从此亦漸見光明。迨武汉之变，革命軍兴，銷路蒙莫大影响，其后虽有数次短期停工，卒以經營得法，得以奋斗繼續至于今日也。

設備一斑：工厂之設計監督全由日本技师任之(按当时設計为日本王子制紙技师堀越寿助——編者)，其机器排置，大概与浦东之华章相类似(华章亦系日技师設計者)，有幅寬百英寸長50英尺之長網造机2台，各有徑10尺之烘筒一个，及徑4尺之烘筒8个，压光机1座，其他附屬机器及切紙机等俱全。造紙机器之速度。2台設計均为每分鐘可出300尺以上，但現在每分鐘恐不超过300尺，生产能力每月70万磅乃至80万磅。

蒸布球一个，徑14尺，每球可容破布18,000磅，又蒸球一个，專供蒸稻草及其他用者，每球可容稻草1万磅。本厂为以破布原料为大宗，故有剪布机4台，及打灰箱全副。另有洗料机6台，容积1,200磅。打漿机6台，容积1,300磅。

工厂之原料以破布为大宗，水漿、稻草、龙須草、旧麻等次之，破布每担价3元，稻草每担4角，破布来自宁波、江北、苏常一带，稻草则由上海附近供给之，龙須草由汉口购入，每担价2兩乃至3兩，麻类则往江浙内地收买，价不一定，下等品每吨价約70兩，水漿多来自欧洲，年消費約45万担。

工厂出品以洋連史为主要，毛边紙次之，自旧华章紙厂被焚后，此等出品，几为本公司所独占，兼之原料破布价格便宜，数年来已得相当之利益。近来又仿造牛皮紙，貨色虽不能与舶来品相竞争，然价格較舶来廉 $\frac{1}{4}$ 。

頂字及天字两种連史行銷天津北平一带，供綢緞店包裹之用，头字及特字連史多銷于华北一带，以作糊壁及窗戶等用，余字正字連史，则为書画信封之内层紙，書籍之襯訂紙用，川連銷奉天营口一带，多为习字用，上海方面，则以頂字元字銷路最好。但自牛皮紙輸入以来，不免受重大之打击也。各种毛边紙則行銷于鎮江、天津、牛庄方面，供染色包裹等之用。包皮紙为近来制造之牛皮紙也。产量不甚多。

(1928年9月10日上海新聞報)

公司董事部現任董事7人，董事長为龐萊臣。厂内无技师，亦无技手，各部由領班者主管，而領班直接受龐君之命令，經理兼技师，此龐君之特長也。職員有16—17人，月薪由10余元至30余元，月薪虽微，但厂内破布下脚等年可达5,000—6,000元，均归職員分配，故職員之外快較月薪几倍之。职工中常工130名。月僱女工約300人。

(1928年9月11日上海新聞報)

民丰和华丰造纸厂

1921年，上海交易所投机风潮兴起，我（金潤庠自称——编者）用买进卖出的投机方法，和包办交易所向国外領事公館注册、加帽子多取手續費的方法，賺起来四、五万块钱。为了賺更多的錢，我于是去当美商光耀桅灯洋行的买办，將自己5万块钱垫进了这个洋行，推銷它的桅灯，專賺佣金。几个月后，我帮他打开了銷路，覺得只賺几个佣錢，我太吃亏，于是动出腦筋，自己另設一个字号，把它的桅灯包銷下来，再抬高價錢，向市場卖出。正好賺得順手，不料那个美国人經理，是偷用美国总厂名义的，被总厂查到，他怕吃官司，就侵吞了我的5万元垫款，也就是我几年来的积蓄，秘密逃走了。我想貪心多賺，結果連老本都被他卷逃。这是我第一次由发财到破产的經歷。

后来我的老友竺梅先先生到山东去当張宗昌的一个混成旅的軍需处长。我們兩人約好，由我在上海替他采办軍用面粉，賺佣錢大家按規定分配。因为数量大，賺得很快，大家为了金錢，也不管友誼，我揩他的油，他揩我的油，結果，我又积起了7万多块钱家当，他更积起了16、17万。那时，“实业救国”的口号非常响亮，我們想，办实业既能賺錢，又有名譽，可以名利双收。恰好嘉兴禾丰紙厂因同业竞争亏本倒閉，我們就拉攏資本把它买下，开办民丰紙厂，并准备拉攏国内6家同业，組織托辣斯性质的联合营业所，集中掌握定价和銷貨权，避免相互杀价竞争。不料因为我們力量薄弱，拉不攏，失望下来，覺得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必須扩大資本和势力，用这样两种力量来强迫同业参加我們的托辣斯。于是我們拉攏了杜月笙、金廷蓀、叶蔭三共同投資把杭州武陵紙厂买下。我和竺先生已无錢投資了，我們就利用經副理职权，欺騙了其他股东，認下了虛股，只轉了一筆賬，收进股

本，付我暫欠，这样牛牽馬崩地把华丰开起来了。这样一来，我們已經掌握了嘉兴民丰、苏州大华和杭州华丰三家紙厂，資力当然雄厚了，再加杜月笙、金廷蓀等紅帮头子的撑腰，我們就首先联合跌价，对其他三家紙厂施用經濟压力，过一时候，再由杜月笙約他們到家里談判。我記得杜月笙、金廷蓀兩人當場把他們痛罵一頓，恐吓一番，終于他們在双重压力下就范了。我們就組成了联合營業所，很快地把价格抬高一倍左右，从亏本做到了大大賺錢。此后我們用賺来的錢，又添了一部卷烟紙机，并且利用杜月笙的力量，向伪政府取得了在国内独家制造卷烟紙的特权，这样一來，我們的紙版有托辣斯的保障，卷烟紙有独占权的保障，賺錢都有了絕对的把握。当时滿以为自己牢牢地掌握了自己和子孙的命运了，不料1937年日寇侵华，蔣匪敗退，兩厂很快就淪陷了，就在这么一刹那的时候，我的命运已全部垮台，我被迫逃到香港，不得不重复做起我20年以前的捐客生意。这是我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第二次起伏。

1941年以后，日汪成立“东亚共荣圈”，宣称要发还民营工厂。我为保障自己财产，通过汉奸帮助，并为联络日寇，在上海金門飯店开了長房間，招待他們，終于用行賄的方法和日寇簽訂了租厂契約，由他們經營我們兩厂，按月給我租費，按年給我 1/4 的盈余。但是又怕人家說我和敌人合作，于是打了个报告給伪政府，把这样做法，說成是为了“保障民族工业的元气”。这次我回头自己檢查，我已同日寇分肥，还同和日寇合作有多大区别呢？故我没有界綫，还談得上什么“实业救国”呢？这不是为了自己财产，就丧失了民族气节了嗎？是的，我感到很痛心，这就是私有制使我昧沒了良心！

抗日胜利了，我以为命运回来了，不料伪政府一道命令，說道，淪陷区敌占工厂所有接收物資应归国家所有，而占領期間中所受損失应另外向日本要求賠償，但没有賠償日期。这样我等于接收一个空厂，哪里来資金开工，其他工厂也因沒有路道，被迫无法开工。我不服，將情形告訴了杜月笙，他撑我腰，我就利用自己的“經濟部特派接收委員”的身份立即动用接收物資开工生产，偷着运用盈利了一年。

以后虽把接收物资的估价清册上报，但仍一拖再拖，不付价款。伪政府最后光火了，我才由杜月笙介绍去向伪行政院长张群面提申诉，结果批准我们按延期日期加些利息，我估计已占到2千多根金条的便宜，这才付了价款。不料那个混蛋政府，它一面批准我们卷烟纸的独家专利权，一面却大量将官价外汇供给孔祥熙的扬子公司，准备进口美国卷烟纸来打垮我们的市场。我听到这个内幕消息，气伤了，为了抢救自己的命运，我就将自己卷烟纸的价格猛涨了好几倍，敲了全国烟厂一笔大竹杠。等到孔祥熙的美国卷烟纸运到跌价倾销时，我们就被迫停工了。因此要是1949年再不解放，可以肯定，我们两厂早已垮台弄光了！这是我末了一个起伏。

（金潤庠：“我不再起起伏不定动盪不安”，“工商界”1956年第2期29—30頁）

附：民丰及華丰造紙厂資本設備概況

民丰造紙厂 工場地点在浙江嘉兴，原名禾丰造紙股份有限公司，为褚慧僧于1924年所創，翌年夏开工，当时資本为36万元。后由于不敌同业之竞争，一度停工，租賃与上海竟成造紙公司（該厂为王一亭之子等所办），1929年賃期屆滿于翌年卖给竺梅先金潤庠等，改名为民丰造紙股份有限公司。該公司資本为50万元，設有450馬力石油发动机2台，50瓩发电机2台，元鋼式抄紙机1台等，工人429人。年产卷烟紙等4,700吨^①。

該厂總經理：竺梅先（浙江奉化人，大革命时曾在蔣政权之上海市党部任职，1930年設立大来銀行，同年收买民丰華丰造紙厂，其关系企业有协丰益記紡織公司、駿大華行、亿中企业銀公司等董事）^②。

副經理金潤庠、張德明。

華丰造紙厂工場地点在杭州，原名武林造紙厂，为杭州人俞丹屏于1921年創立，当时資本42万元，于1929年租賃給上海竟成造紙公

① “中华民国实业名鑑”第797至798頁，1934年11月出版。

② 日本藤田亲昌編：“中国問題辭典”內人名辭典第47頁，1932年3月出版。

司，翌二年賣給竺梅先、叶蔭三、金潤庠等，改名為華豐造紙股份有限公司。該公司設有元鋼式抄紙機全套，草莖切斷機 2 台等，年產馬糞紙、三色紙等 6 千餘噸，工人有 170 人^①。

該廠總經理為竺梅先。

副經理叶蔭三（原籍福建，生於上海，其父叶鴻英為上海金融實業界巨子，他於中國公學商科畢業後，入其父所經營之正大銀行實習，後任該行經理，正大倒閉後，於 1925 年又進其父經營之駿大華行任經理，及兼任上海搪瓷廠、味中廠經理）^②。

副經理金潤庠。

工程師褚漢維。

① “中華民國實業名鑑”第 800 頁。

② 許曉成編：“上海百業人才小史”第 378 頁，1945 年 2 月出版。

中国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清末叶，中国水泥事业，舍天津启新湖北华記兩厂而外，未有繼起者。以言产量，实不足供全国建筑界之需要，类多仰給舶来，外溢金錢，宁能数計。本公司故总經理姚錫舟（上海人，姚新記營造厂主，建昌錢庄股東，大通紡織公司經理）尽瘁于建筑事业垂30余年，鉴于日后用途，势必日增月盛，毅然有发起創辦水泥厂之决心。爰于民国10年之冬，联合滬上工商业巨擘陈光甫（上海銀行总經理）、朱吟江（久記木材公司店主，买办出身）、吳麟書（江苏吳县人，經營紗业起家，初設益大紗号）、胡耀廷（广东人，买办出身，怡大永記錢庄股東）輩集股銀50万兩，組織中国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其間擘划經營，艰难締造，对原料之征訪，厂址之审擇，煞費苦心，最后乃得江苏龙潭为目的地。地点既定，爰即訂購机器，建筑厂屋，制造泰山牌水泥，暢銷各地，此乃本公司創辦之起因也。

本公司当創立之际，为穩健計，姑从小型入手，觀其成績如何，再定扩充計劃，先行試办日产水泥500桶。11年間，一切建設始告完竣，无如規模不大，成本匪輕，又因战事頻經，运输受阻，产銷不竟，亏耗随之；屢拟扩充，俾增产量，終以时局紛紜，未能实现。民14年之夏，际遇适来。先是錫地士紳，有太湖水泥厂之組織，訂机購屋，事已垂成，預备日产水泥貳千桶；嗣因絀于經濟，未获完工，于是售机之說，甚囂尘上。姚故总經理即計劃購置之方，旋經征得董事会同意，往商荣宗敬，結果賴荣君之力，得有成議，几經籌划，卒底于成。查太湖水泥厂机器，由德商汉运洋行承办，系向德国著名之亨卜德厂定制。当本公司承購时，机器尙未開箱，倘非購自太湖，不但历时悠久，代价更屬不資。至民16年春，一切建設裝置，始告蒞事。不意入秋而后，孙軍渡江

襲擊，所謂龍潭一役，本廠首當其衝，劇變之來，莫之能御。本廠竟被孫軍所占，盤踞各處，予取予求，除彈毀廠屋辦公室及宿舍工房而外，復將臨時棧房，付諸一炬。比及國軍克復，已屬滿目瘡痍，即廠中重要機件，亦多毀傷，修繕經營，匪伊朝夕，直至恢復原狀，始露一綫曙光。當時姚總經理不以規復常態為已盡人事，日夜焦勞，不遑寧處，經年累月，潛心研究，商諸前聘德籍工程師克思明，即就原有機件另添改良設備，使日增出品500桶，此項計劃，旋即又告厥成。然姚故總經理猶以為未足，處心竭慮，日在籌維，蓋覺本廠產品，雖已增至日產3千桶，只以銷路日廣供不應求，若非再度擴充，似與衍進情形不相配合，故對增添機器，未嘗一日或忘。卒又張羅資本，添購日產1,500桶之機器全套，不及一年，計劃終於實現。

本廠位置在龍潭東陸，去市約一英里，形勢為三面環山，北瀕大江，面積合廠基、石山、煤礦、田地等統計不下2千餘畝。陸路交通，則京滬干綫道經廠前，并築有支路一道，直達本廠。水運則有便民河輸入長江，近旁復辟公路一綫，為程均約3英里，船隻卡車同時可運。江口設有堆棧，以便煤斤柴油石膏等巨量物料之輸入，與水泥之運出。至廠內運輸則輕便鐵道滿布四周，異常便捷。土石原料，其開采處，距廠不及百步。煤礦則在肘腋之間，所惜質地欠佳，未能巨量採用，引為憾事。至本廠全部機械，如水管鍋爐引擎發電機等，為英國拔柏葛廠，暨德國納格蘭廠，并亨卜德廠出品。

本公司之組織，設總事務所於上海，設製造廠於龍潭，在京則另設發行所，在漢口與廣州均設辦事處，以推廣業務，至其他通都大邑，則指定分銷處所，俾資聯系。余分機工化驗業會計總務購料運輸等科，處理公司一切業務。

本公司龍潭工廠戰前產品，除銷售京滬等埠供給建築需要外，尚有專約訂定、供應軍政部、鐵道部、資源委員會、中央信託局等之所需。當中日事態緊張時期，原擬停止生產，計劃遷移；第以防禦工程，異常緊張，政府特派要員，駐廠守候提貨，迨至戰事爆發，仍屬日夜開工，以應軍事需要。

至26年11月23日炮火迫近厂址。全厂員工，方始解散。嗣敵軍进占龙潭，当时厂房之遭焚如者，有修机部等数十間，机件材料之遭損毀者，更不胜枚举。敵軍駐本厂后，即將厂产交付日商三菱洋行所屬之磐城水泥株式会社，以軍管理名义，擅自开厂經營。其間曾一再遣其爪牙，施行恐吓迫令合作，經尽力抵拒，未为所乘。但厂中各部房屋及机件，为敌不善使用，拆毀搬移，損害惨重，元气因之大伤。

抗战胜利，日寇投降，消息初傳，一紓积憤，爰即派員赴厂，監視敵商，以防破坏。政府方面，亦由經濟部战时生产局苏浙皖区特派員办公处，派来委员会同接收，故不数日間，即已竣事。旋經政府机关审查完毕，即行明令发还。本公司为早日恢复生产，以应建国需要計，夙夜修繕，百端整理；无如厂中机件，在敵軍管理时，有被拆往外埠，有为使用毀伤，历时数月，始得逐渐恢复，損失之巨，何可胜言，所幸重要机件，尙无大碍，以故逐步开机，进行复业，期与国内复兴建設，共同推进。惟因燃料及原物料并包裝等項，异常缺乏，电力亦屬不敷，以致目前产量，仅及战前2/3，現在每日可产50公斤紙袋裝水泥1万余包之譜。

本公司鉴于水泥銷路，当此势态动盪之际，自难过分乐观。然一旦局势明朗，建設繁兴，则需要之来，恐有供不应求之象。为未雨綢繆計，爰于去冬向美国史密芝公司定購11呎6吋直徑，475呎長之方窰一具，及900匹馬力鋼磨兩具、并軋碎机等机件配合。預計一年期間，可以全部交貨。一俟新机裝竣，則本厂产量，每日可增出3千桶，此后本厂生产全額日計7,500桶。本公司复鉴于水泥包裝，战前习用之鉄木桶及麻袋，已有不济之象。当时姚故总經理，曾有麻袋厂之籌备，嗣因战事爆发，未底于成。

胜利复业之后，市面盛行紙袋，无如外洋供应已感缺乏，外汇亦屬难求，若不根本解决，势必影响生产。爰向美国購得制造紙袋机器，从事自制。此項机器，虽已購置，但制造紙袋原料牛皮紙之机件，尙付缺如，倘向外洋定購，深感時間不及。幸姚故总經理生前創有华倫造紙厂，其一切設備，可以商請讓渡，數度接洽，即覓厥成，該厂遂由本

公司归并，辟为造纸部。本公司除就原有工厂先行制造普通纸张外，近复鳩工厄材，尽量扩充，并向本市数大铁工厂定制烘缸等重要机件，拟再擇地另建新厂，俾外洋之机器运来，即可一气呵成，从事制造纸袋，庶几包装问题得以自给。

(摘自“中国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概况”，载中华民国水泥工业同业公会年刊38至39页，1947年出版)

该公司资本，创立时为规元50万两，14年增至100万两，17年增至200万两，22年廢兩改元后，变更资本为300万元，24年增至350万元，26年再增至法币540万元，分为54,000股，每股票面100元，32年12月折合中储券270万元，再以资产升值5,730万元，资本增至中储券6,000万元，分作600万股，每股票面为10元，35年3月除以中储券资本6,000万元一作一调整为法币外，再以现金增资84,000万元，合共法币9亿元，每股票面10元。

设备：自有基地及矿山共1,836亩，自建鋼骨水泥办公室4所，仓库5所、磚木料宿舍60間。主要机器有生熟料磨各4只，乾烘机4只、成桶机2只、纸袋机1只、鍋爐6只、透光发电机2只等。

董监事名單^①：

董事長：陈光甫，上海銀行董事長。

董事：李銘，上海市銀行同业公会理事長，浙江兴业銀行董事。

胡国梁，广东番禺人，圣約翰大学經濟學士，美国本薛凡尼亞大学經濟碩士，大通紡織公司董事兼經理。

吳瑞元，永大銀行、怡大錢庄董事長、浦东銀行、統益紡織厂董事。

荣鴻元，上海銀行、商報出版社董事，申新紡織第六、七厂經理，荣丰紗厂常董兼經理，恒大紡織公司總經理。

姚清德，上海人，大通紡織公司董事兼經理，华倫造紙厂協理。

史乃修，浙江人，大通紡織公司監察，华倫造紙厂董事，公用电机

^① 董监事名單括号內的簡历是編者加注的。

制造公司常董。

姚乃熾，大通紡織公司董事，華倫造紙廠經理。

董春芳，統益紡織公司董事兼經理。

沈驊臣，大通紡織公司董事長。

胡筠秋，華比銀行經理。

張繼元，上海市營造工業同業公會理事長。

屠述三，龍潭商會會長。

韋伯祥，外匯經紀人。

顧慶毅，南鑫行經理。

監察：王云程，申新一廠、寅丰毛紡染織廠經理。

姚乃煌，華倫造紙廠廠長。

總經理：姚乃熾，經理：史乃修。

(聯合征信所編：“上市股票廠商概覽”52至53頁，1947年2月出版)

江南水泥厂

江南水泥厂之创办于民国23年，创办人为前驻俄大使顏惠庆等，24年，在天津成立常务董事会，顏氏任董事长，袁心武、王仲刘、陈范有为董事。同年5月，在南京设立筹备处，任廖宗滢氏为处长，孙偉寿氏副之。另设建厂安装两工程处。建厂总工程师由廖氏兼任。安装总工程师为赵庆杰氏。茲將該厂内容略志如下：

厂址，擇于南京栖霞山东之攝山渡，地方离栖霞站約10里，該处有山名曰牛尾者，实为制造水泥原料之宝藏，在未擇定厂址以前，曾由專家从鎮江至蕪湖一帶山石与土质細心实验，結果以牛尾山所产青石和黄土为制泥最佳之原料，且蕴藏量可供一、二百年之采用，故厂址即建于山麓，圈地面积共約2千亩。

資本：該厂初期计划，資本定額240万元，全年水泥产量60万桶，繼复添資160万元，尙拟再增50万，合成450万元，預期全年产額可达150万桶，增多全国目前已有水泥总产量三成以上。为适应需要，平衡供求計，拟先开半机，陸續增加产量，以免或有过剩。

运输，为任何工厂最重要問題，該厂对此由厂至栖霞站已筑成3公里之铁路岔道，与京滬路相啣接，造費10余万元，又筑汽車路，与通南京之汽車路联貫，厂北离長江約3公里，拟再筑一挂綫路，直达江边，凡經由水运之水泥即用此項高綫挂車，凌空运输送至江边，每24小时，可輸送水泥1,200吨。

磨房：为制造水泥最重要部分。該厂中备有原料磨和水泥磨各兩具。磨身長圓形。長14公尺，純鋼制，又倉庫左下端設置裝袋机一架，每小时可裝1,400袋，为專裝紙袋之用。

窑房：內列長圓形大窑二，各長13.1公尺，直徑3.2公尺，外层鋼

質，內層用火磚砌成，裝置年余始告完成，需費40余万元。

（曾析：“江南水泥厂內容一般”，1937年5月12日上海申報）

該厂設有美国最新水泥机器二套，每日可产4,500桶（750吨）之水泥。

（1947年中华民国水泥工业同业公会刊第26頁）

童世亨和他的鑄丰搪瓷厂

一 童世亨的簡歷

童世亨，字季通，輿地學者兼實業家。童光緒9年生，江蘇嘉定人，世代書香，家學淵源。初肄業于上海南洋公學，值義和團事件停學，重應科舉，以第六名入津，旋值北洋總督袁世凱委朱正元氏測繪直魯奉三省沿海地圖，遂往從實習，自此精研地理，開一生立業之基。嗣復留學日本，值公費無所出，借編譯以繼膏火，各校所用之中國及世界形勢一覽圖，以及歷代疆域形勢諸圖，皆成於是時，而廣銷國內，及畢業東京高等工業學校電氣機械科，歸應部試，授工科進士。

（張丹子編：“民國32年中國名人年鑑”上海之部，第402頁，1944年4月人文印書館出版）

迨蘇省光復，程德全坐鎮金陵，初委童籌辦江蘇省立第一工業學校，繼委為江蘇省立南京電燈廠廠長。不久二次革命，張勳復辟爆發，私人廠事不堪聞問，遂無意於政界，亟思在實業界有以一展其所長。於是念及本身所學既為電氣，則應在電氣界中，謀一相當地位，以行其所學。惟環顧當時我國商業繁盛之處，其電氣事業已皆有人興辦，未辦之處，多恐難以獲利，思維再三，覺只有浦東一隅，當時雖無市面可言，預料電業興辦後，交通便利，人口增多，必有發展希望。因與張蟾芬、黃任之、錢新之等發起浦東電氣公司。開辦之初，議先集股5萬元，然僅招得2萬元，童遂獨墊3萬元，經理技師，一身兼任，籌備歷2年，始行開機送電，而續招之5萬元，遂踴躍認繳，自是添購機器，延長綫路，營業日有進步，資本亦逐漸增加，今已增至80萬元，各項資產已逾100萬元，晝夜輸電最高負載已達2,000瓩。

浦東電氣公司成立後，復斥資盤受鑄丰搪瓷公司，從事國產搪瓷

品之制造。

(国货事业出版社編：“中国国货事业
先进史”第82頁，1934年8月出版)

二 鑄丰搪瓷厂

民国5年，有美人麦克利氏者，在上海關北顧家灣設立广大工厂，开始制造搪瓷口杯盖杯及食籃等品，行銷市上。未几，有滬商徐道生者，与之合股經營，代任推銷之責，营业逐漸有起色。民国8年，复由徐君邀同李伯葆、周辛伯、顧吉生等，集資10万兩，組織华商鑄丰搪瓷股份有限公司，就广大原址，建屋添机，开始仿制面盆飯碗火油爐等品，以应市面；即任麦克利氏为工程师，呈部注册，并援机制洋式貨物例，呈准免納半稅。会五四运动，抵貨风潮，甚囂尘上，鑄丰出品，遂得乘机广銷內地；三胜商标之名，因之大著。惜因缺少流动資本，每致周轉不灵，各董事又莫肯負責墊借，遂于民国13年1月宣布停工，清理召盤。予(童世亨自称)以中华职业学校校長潘仰堯之介紹，得于其时前往參觀，見該厂机器房屋，俱极完整可用；且建筑未久，即告停頓，不禁为之惋惜不置。因与顧吉生君商定办法，暫行墊款接办，并加通記二字以清界限；即于是年3月試行开工。

公司批发所初設在法租界銘德里，以不敷应用，于15年2月迁設公共租界爱多亞路吉庆里。复派員赴長江各大埠調查商情，酌放客帳，添設批发所于汉口堤口正街通德里，以便交易；营业始有起色。时則同业方面，只有益丰中华兩厂，类皆規模狭小，設備未全，所需瑯粉原料，俱仰給于东鄰，犹未能自行制造也。会有日商和田千太郎者，在關北恒丰路開設和田瑯粉釉药厂，以制售瑯粉为业，其制法漸为华人所探知，于是益丰搪瓷厂先号斜桥附近設厂仿造，鑄丰亦試驗成功；和田营业，遂大受打击，无法維持，乃將全厂資產盤归鑄丰承受。因即用其技工田村与太郎，自行制造瑯粉，成本为之大減。17年春，改設总发行所于公共租界爱多亞路江西路口。是时总厂地基，亦已不敷应用，故又在關北橫濱河东恒业路底租屋数幢，設立分厂，以資扩充。而

汉口龙王庙之分发行所，亦于是年成立。18年春，复設長沙分发行所于省城八角亭，营业日見兴盛。遂与項松茂、吳蘊齋、高翰卿、張蟾芬、俞葆生、陈德彰、何靜之諸君，組織招股委员会，正式改組为股份有限公司，資本总额定为国币30万元，予認1/3，截至18年6月底，各股东踊跃交款，已逾26万元。遂于7月7日，在開北顧家灣制造总厂召集股东大会，报告股款招收情形，通过公司章程28条，并选举董事11人（当选者为予与張蟾芬、高翰卿、項松茂、陈德彰、何靜之、汪伯吹、夏筱芳、俞葆生、郁厚培、翁友三諸君），监察人3人（当选者为吳蘊齋、王康生、吳确生諸君），宣告成立。复由董事会推予为总經理，照常进行。

（童世亨：“企业回忆录”，1941年出版）

大中华橡膠厂

一 創辦和發展簡况

大中华橡膠厂創立于民国 17 年 10 月。創辦人余芝卿，原为旅日侨商的領袖，在大阪自設鴻茂祥，經營進出口业，鉴于我国金錢外溢之巨大和橡膠工业的需要，便决心在国内設厂制造，由余先生負責籌划。薛福基和吳哲生担任技术方面，共主其事，于是上海徐家匯路 1102 号的总厂，便以新穎姿态誕生了。

(摘自上海机制国貨工厂联合会編：“中国国貨工厂全貌”，118—119 頁，1947 年文明書局出版)

初，薛福基与吳哲生在日，因目覩日本工业之发展，国内之生产落后，遂共同努力从事实地練習及研究橡膠等各种工业，頗有心得。民 8，巴黎和会失敗，吳哲生乃先行回国，創辦鴻裕边帶厂于上海天通庵路，薛君則仍留日本研究橡膠事业。民 9 有繆琴余者，赴日投薛，欲从事实习橡膠工业，薛嘉其志，遂斥資 3 千元，与日友合股，設立車胎厂于大阪府河南內，令其往厂实地練習。翌年，繆琴余学成归国，詎忽为病魔所困，留苏疗养，至今尙未能恢复健康，有志未竟，殊深可惜。

民 13 年冬間，吳哲生鉴于边帶事业发展有限，又东渡扶桑，与薛福基相商发展事业目标，第一步拟仿造各种橡膠晴雨鞋，当时志同道合，加入学习研究者有薛仰清、黃伯勤、朱惠人、余姓本、黃成忠、黃胜利、陈鴻濤、黃成孝等。旋由华侨巨商鴻茂祥号余芝卿君出資購办机械，采买藥品，实地試驗，迨至民国 17 年学习告成，乃回国开办大中华橡膠厂于上海徐家匯路，專制造双錢牌跑鞋、套鞋，以及晴雨鞋、运动鞋、热水袋等日用品，出口問世后，以品質优良，媲美舶来，頗获爱国人士之同情，而贊美与采購者亦风起云涌。

大中华橡膠厂創辦之初，資本为 8 万元，至民国19年，为巩固事业之基础起見，容納办事人員全体入股，改組为合伙，企业資本增加至20万元，以11万元創基本工业原料之碳酸鈣厂于徐家汇东庙桥路，名为大中华制鈣厂；同时又于制鈣厂附近，設立大中华加硫油膠厂。迨民国20年，因营业日見发达，出品供不应求，乃添資90万，以增加产量。民22，又因添制新出品，原有資本110万仍不敷周轉，故再增90万，前后台計，資本共为200万。并經多年之研究，撥出 8 万元，即于去秋(1936年)，仍在东庙桥路創辦一养化鋅厂，名大中华鋅粉厂；又因布匹用量日增，乃提出15万元办一鞋面布厂于总厂附近之謹記路。至于职工，最初不过83名左右，今 4 厂合計，达2,600余人。其总厂占地有39亩之广，最近又購进土地数亩，在設計擴張中。

(摘自国貨事业出版社：“中国国貨工厂史略”，49—50頁，1937年2月出版)

公司組織的最高行政权，屬于董事会，現在(指1947年)董事長为杜月笙，董事李升伯、孙鴻皋等，經理以下，分厂务、总务、业务 3 部，分掌各系。

現在(指1947年)大中华系共有8厂，第一厂便是就以前徐家汇的原始工厂，加以扩充而成的，現占地39亩，房屋占70%，备有馬达114架，混合車37部。业务方面，最早由联枝关系的鴻裕、和昌盛兩家專責推广。民国19年，該公司大事扩充，先后受买交通作为2厂，大中央作为3厂，春华即战前的 4 厂。并分別設立制鈣制鋅及織染三原料厂。

民国23年，改变业务方針，着眼于实銷实用，在本市和南京、汉口、重庆、广州、汕头、蕪湖、温州自設发行所。并于上海商品陈列所和蓬萊市場，自設零售处，以便利上海市顧客。

(摘自上海机制国貨工厂联合会編：“中国国貨工厂全貌”118—119頁，1947年文明书局出版)

二 帝國主义官僚資本的压迫

过去我(大中华橡膠厂經理洪念祖自称——編者)自以为有了事业有了錢，就有了前途，就能掌握自己和子孙命运，因此几十年来刻

苦經營，千方百計掙扎圖存，要發展企業。但事實上恰恰相反，在旧中國遭受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國民黨的殘酷掠奪破壞，幾度陷於艱危。

大中華橡膠廠創辦在1928年，由1個廠發展到上海8個廠，天津1個廠。記得1932年，那時全國人民正在展開抵制日貨的愛國運動，民族工業照理應該可以抬頭了，但，相反的反動派后大棒，以所謂抗日會名義，硬說鞋子的夾里布用了日貨，把前經理薛福基捉了去，關在天後宮木籠里，後來不得不走杜月笙門路，於是反動派封建勢力就插足到我們企業里來了。

1933年大中華廠創制腳踏車胎和汽車胎，當時英商耶祿普就借口說車胎花紋冒了耶祿普車胎，侵犯了商標權。誰都知道車胎花紋只是為了行駛方便，不外乎條條塊塊點點，不能用別種圖案，可是帝國主義者為了扼殺中國橡膠工業，以車胎花紋注了冊。昏庸無恥的反動統治官僚，根本不想到民族工業和國防建設會有什麼關係。當時官司打到偽行政院行政法院，訴訟進行了近10年，由於帝國主義勾結了反動統治，最後我廠還是失敗，由此可見倘若不是全國解放，中國車胎工業在三大敵人壓迫下，是絕對無法生存的。

“八一三”戰事爆發的第二天，經理薛福基在大世界附近被炸傷而死。當時，我們即將第四廠全部機器內遷漢口、長沙，又從湘桂路搬到越南同登，並陸續從上海運出汽車胎和膠鞋到越南海防，分運內地，認為搬到國外終可安全了。那里知道，法國維希政府投降了，日本軍隊在海防登陸，把全部物資劫奪了去。最後，我們在雲南昆明籌設雲南橡膠廠，經理吳哲生在昆明定好了機器，不料滇越路封鎖又告失敗了。

上海第三廠在虹口被日寇侵占，為了應付事變，我們把滬西第二廠和南市兩個原料廠改為德商招牌，但這並不能避免日寇和汪偽的脅迫、掠奪。1941年5月8日，日寇通過了當時租界巡捕房，把我和另一資方逮捕，給我們加上了製造橡膠汽車胎、膠鞋和防毒面具等軍用物資供給抗日後援會等罪名，派了大批汽車到倉庫準備劫運，因倉庫挂的是美商牌子，所以沒有被劫走。當我被押解過外白渡橋的時候，

我当时悲痛沒有国家，沒有事业，連本人身家性命亦不保。由此曾产生了为民族独立，把日軍赶走，牺牲一切在所不惜的思想；当时遭到日寇荼毒被难的千千万万人，都和我一样有这个想法的。

可是隔了半年，太平洋战事爆发，日寇进了租界，主要原料仍然被敌人征用。以前，为了自己不能掌握命运，到处寻牌头掩护，結果連帝国主义自己也不能掌握命运。此后更糟糕了，我們在日寇汪伪胁迫下，曾承造了一批車胎和軍鞋，使企业和个人蒙上了危害民族利益的可耻污点。要不是抗战胜利，早被日本帝国主义吞吃掉了。

抗战结束后我滿以为民族独立了，民族工业一定可以翻身，那里知道官僚資本与美帝国主义勾結，变本加厉，限制原料輸入，美貨大量傾銷，鈔票天天貶值。我們为了扩充制造汽車胎設備，以自备外汇訂購一些机器，但反动派不发輸入証，到解放前夕才发出来，解放之后因被美帝国主义封鎖，原来打算要裝机器的鋼骨水泥厂房，只好改作倉庫。不仅如此，在国民党反动統治时期，反动派还进行公开勒索。1946年伪警备司令部奉伪国防部命令，突然对我进行偵查說我是杀宋教仁的洪述祖（他是常州人我是江阴人）的弟弟，一貫反“革命”，更張冠李戴指为汉奸，还扣上一頂用物資接济苏北共产党的帽子，被敲去了一笔竹杠。从上面这些事实，可以看出，我虽然凭借自己实力，运用資本主义竞争手段，在各省重要省会設发行所，挤垮和并吞了同业工厂，吃了不少小魚，但是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命运下，无论进行斗争也好，甚至屈辱妥协也好，都逃不出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摧殘。

（摘自洪念祖代表在上海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會議上的发言，載1955年12月28日《上海新聞日报》）

商務印書館

我國自甲午以還，國人知外患之日熾，由於民智之不開，根本要圖，端在教育，於是公私立學校勃焉以興，需用新教材益亟，商務印書館乃应运而起。最初從事印刷，繼而注重編譯，近且兼營製造，以盡量供給教育界之需求。

創業經過，經始於清光緒23年丁酉正月，夏粹芳、高鳳池、鮑咸恩、鮑咸昌諸君共集股本4千元，在上海江西路租屋三楹，購印機兩架，是為創業之基始。翌年夏6月，遷於北京路，有屋12楹，是為發展之初步。越5年，當壬寅癸卯之後，始建印刷所於北福建路，設編譯所於唐家街，設發行所於棋盤街，規模粗具。是時日本金港堂擬在上海開設印刷廠，該館因欲利用外國技師與之合辦，先各出資10萬元，漸增至100萬元，改組股份有限公司，向本國註冊。旋於寶山路改建印刷所編譯所，復於棋盤街建築發行所，基礎由是巩固。但引用外人兼收外股，實為一時權宜之策。遂為根本計劃，一面遣派學生赴國外學習印刷，一面招集青年學徒，授以各種技術，以為獨立經營地步。其時吾國風氣漸開，該館又辦有成績，附股者漸多，乃於民國元年提議收回外股，由夏粹芳君與日本股東磋商，歷時二載，會議數十次，始得全數收回。民國3年呈報農商部立案，奉批有“熱誠毅力至堪嘉許”等語。自外股收回後，營業愈發展，自創辦迄今，歷時30年，股本達500萬元矣。

增股之年份。該館創立時集股本洋4千元。現已收足500萬元，其增加之年份如下：清光緒23年丁酉4千元。光緒24年戊戌50,000元。光緒31年乙巳1,000,000元。民國2年癸丑1,500,000元。民國3年甲寅2,000,000元。民國9年庚申3,000,000元。民國11年壬戌

5,000,000元。

历任之总理。夏粹芳君自创办时起，至民国3年1月7日被戕出缺，由董事会推举应錫璋君繼任。民国4年11月間，应君因病赴日本医治，病歿于神戶，即推举高鳳池君。民国9年高君因事辞去，总理一职乃由鮑咸昌君接任。

現狀之一斑。該館上海方面計有印刷所五处，1,233所在閘北宝山路(即总厂)，編譯所总务处亦在焉。第四印刷所在吳淞路，第五印刷所在天通庵路，总发行所在棋盤街。北四川路有虹口分店，外埠如北京、香港則均有印刷厂，分館遍于全国各省大都区，北京、天津、奉天、長沙、香港等处。总館均系自建新式水泥鋼骨大屋，尙有数处現在建筑中。机械設備最初仅有印書机兩架，現在計有各种机器約1,200余架，由該館自制者不少。至于职工人数，上海各部職員約1,000人，男女工友共約3,500余人，机器工人約占80%，手工工人約占20%，女工約占总數30%，各省分支館職員工友約千余人。

(1926年7月22日民国日报)

业务。截至1932年“一二八”战役以前，該館逐年扩充，其組織分印刷部、編輯及翻譯部、发行部和研究部4部(見日本东亚同文会編“中华民国实业名鑑”1115頁)。印刷部計分彩印、石印、鑄字、排字、校对、照象、影印、銅版、紙版、鉛版、藏版、裝訂和裝切等40余处。制造部分計分电工、木工、鉄工、仪器、标本、玩具、华文打字机等处。机器設備重要者为滾筒机、米利机、膠版机、銘版机、大号自动裝訂机、自动切書机、世界大号照象机等，总数达1,200余架之多，在远东实无其匹。出品方面，如鉛印、單色石印、五彩石印、三色版、珂罗版、雕刻銅版、照象鋅版、凹凸版及影写版等，皆称精美。棧房計分書棧房、仪器棧房及紙棧房等，貯藏巨量之圖書、仪器及紙張。

該館鉴于国内文化进步之迟滯，世界潮流之日新，認為有設立公开圖書館之必要，又以該館旧設涵芬楼，經張元济氏20年来肆志搜罗，儲書达数10万册，規模已具，乃于民国13年在总厂对面宝山路西，特建五层鋼骨水泥大厦一座，移涵芬楼旧藏圖書实之，名曰东方圖書

館，聘王云五任館長。

(“中國國貨工業史略”第297至298頁)

該館營業種類為：教科書、古今國學、科學參考書、叢書、雜誌及承印中外書板憑證、廣告、帳簿、證書等，並承造鉛版、銅版、木版、鋅版及販賣文房用品、學生玩具、體育器械、印刷機、徽章等。

(“中華民國實業年鑑”第1115頁)

該館自民國26年末迄35年初止，出版之書籍如下：

(1) 出版書籍總類	238(種)	430(冊)
哲學	168	184
宗教	21	30
社會科學	915	1,566
語文學	83	206
自然科學	251	291
应用技术	292	344
藝術	128	147
文學	391	534
史地	340	465
共計	2,827	4,197
(2) 新出大部書		
叢書集成初編(3—6期)	2,311	2,200
萬有文庫二集(5期)	172	452
萬有文庫簡編	500	1,200
縮本四部叢刊初編(三集)	105	200
東方文庫續編	46	50
國立北平圖書館善本叢書第一集	12	70
民眾基本叢書第一集第二組	64	80
中學國文補充讀本	50	80
百衲二十四史(6期)	6	366
共計	3,266	4,698
(3) 新出教科書	共計155	247
3項總計	6,248	9,142

(聯合征信所編：“上市股票廠商概覽”第74、75頁)

按該公司創立之初，規模甚狹小，據熟悉是業者云，該公司實際上之發達，當在民國10年以後，蓋其時國內政治，漸入平穩狀態，新文化事業，日益勃興，各項書籍，均更新出版，營業因此蒸蒸日上，大有一日千里之概，非但該公司乘機獲利，即一般出版業者，亦無不相同。今僅就該公司建設房屋之趨勢觀之，吾人即可窺知其進展之梗概。

營業房屋建設年代

年 代	數 目	原價(千元)	估價(千元)
光緒23	2	72	64
光緒33	2	159	143
民 1	1	58	52
民 2	3	46	41
民 5	3	70	64
民 6	3	16	14
民 8	2	91	64
民 9	5	23	17
民10	4	190	113
民11	6	340	193
民12	4	125	65
民13	6	167	112
民14	5	159	124
民15	7	185	64
民16	1	9	4
民17	2	36	13
民18	1	2	1
民19	5	211	60

觀于上表，借以推知該公司營業進展之經過，雖未免過於簡略，然實際上增設分館，或擴充印刷工場，均為擴充營業範圍之表現，故即按上表，亦能窺知其大概。該館自民國元年以至民9，建築房屋雖不下20余所，而規模均極狹小，費用亦頗微弱；至民國10年，則不但範圍擴大，而且建築費用，次漸增加，蓋此時適當新文化運動之後，各種

出版書籍，如雨后春笋，該公司努力扩充印刷工場，增設各地分館，自屬意中之事。由民10以至民17，中国出版界之兴盛，似乎已达极点；自民17以降，則日現衰頹之象。

(中行月刊第3卷5期第126頁，1931年出版)

“一二八”战争后的情况

民21年1月28日晚，日軍侵犯上海閘北，次晨該館总务处印刷制造总厂各存貨棧房，尚公小学及养真幼稚园等，悉被日机擲彈炸毀，焚燒一空，2月1日，东方圖書館及編譯所又被焚毀，綜計有形之損失1,600余万元之巨。

該館董事会以总厂既已被毀，战争又日趋激烈，財力固无法維持，职工亦无法工作，不得已議決將上海总館及部分暫行停業，职工全体停职，总經理辭职亦經照准。各分支館分厂暫行維持現狀。由董事会另組特別委员会，設立善后办事处，处理一切善后事宜。

(“中国國貨工厂史略”第293-298頁。)

“一二八”滬战中損失不貲，事后核減資本为300万元，复業后慘澹經營，乃于23年起，每年增資50万元，至26年夏，仍恢复原資本額500万元。“八一三”滬战发生后，將总管理处初迁長沙，上海方面初尚繼續出版，一面將机器分运長沙、香港、贛县等处，設立內地工厂；30年12月8日太平洋战后，上海发行所及工厂棧房，同时被封，香港分厂分館亦被占据。31年1月上海发行所及工厂棧房启封，但各項損失頗巨。33年夏，湘桂战事发生，延及粵贛，該公司在各該省設有分支館之地区，先后淪陷，資產損失，不可数計，業務方面更受重大打击，嗣后乃在西南西北各省增設推銷机构，胜利后陸續复員，总管理处于35年4月28日迁回上海。

(联合征信所：“華股手冊”第206至207頁)

历届董監事：

1930年以前，常务董事：王云五

董事：李拔可、夏筱芳、鮑庆林、張菊生、高夢旦、丁斐章、刘湛恩、

徐寄廬、張蟾芬、周辛伯、高翰卿、蔡元培。

候補董事：郭秉文、王康生、鮑慶甲。

監察人：徐鳳石、黃漢梁、叶揆初。

監察候補人：鄭富灼、徐亦庄。

經理：李拔可、夏筱芳。

協理：鮑慶林、潘光迥。

秘書主任：何伯丞。

大股東：鄭孝胥、鮑咸昌、高鳳池、張元濟、王顯華、張鑾、叶景葵、丁榕、李宣龔、張葆初、庄俞、周達、鮑感恩、金邦平、陳敬第、童世亨、黃炎培。

（“中華民國實業名鑑”第1115頁）

1942年以前董事：王云五、高鳳池、李拔可、張元濟、劉湛恩（已故）、蔡元培（已故）、鮑慶林、徐善祥、徐寄廬、丁斐章、陳光甫、李伯嘉、夏筱芳。

監察人：馬寅初、黃炎培、楊端六。

總經理：王云五。經理：李拔可、夏筱芳。

（王相秦：“華商股票提要”第153頁，1942年8月出版）

1947年以前，董事長：張元濟。

董事：張元濟、夏筱芳、陳光甫、高鳳池、王云五、李拔可、俞明時、朱經農、丁斐章、徐寄廬、李伯嘉、馬寅初、徐善祥。

監察人：黃炎培、楊端六、陳敬第。

總經理：朱經農。經理：李伯嘉。

（“上市股票廠商概覽”第73頁）

附：商務印書館創辦人鮑咸昌簡歷

鮑咸昌是浙江鄞縣東鄉人。父名哲偉，任上海南門清心教堂牧師。鮑幼年就在該校讀書，畢業後，入美華印書館為排字，以資糊口（因鮑家境貧寒，不能受較高的教育）。那時他住在上海山西路泰安里，早出夜歸，與夏粹芳為同事，乃相約合辦商務印書館，初則夏任經

理，鮑自己主持印務，後夏死，遂被推為總經理。所說商務初開辦時，資本僅600元，專以代人印商業文件，所以定名為商務印書館。

他有兄弟三位，長威恩，早年物故。威昌自己居次。弟威亨，中西文字均優，曾任海關要職。妹亦有三，長適該館董事張蟾芬。次即為與鮑同是商務創辦人的夏粹芳之妻，幼嫁郭秉文。子女各三，長子慶林，賡續父業。次子慶成，為留美工程博士，三女均嫻英語，長適南洋華僑陳嘉庚之弟。次適前金陵大學校長陳裕光。幼適已故復旦大學文學系主任謝文逸。

（摘自“商務印書館創辦人鮑威昌”，人物雜誌
10期43頁，1946年11月出版）

中華書局

該局創始資本僅 25,000 元。辦事人并編輯員不過 10 余。賃屋三椽，聊蔽風雨而已。是年秋冬之間，遷于上海河南路，資本額 10 萬元，分局 6、7 處，一年間之營業計 20 余萬元。2 年春，移總公司編輯所、印刷所于東百老匯路，延范靜生（源濂）先生任編輯長。添設分局，擴充編輯、印刷，所用之屋約 200 間，編輯員 70—80 人，辦事人連分局 200 余矣。3、4 年，日有進步，資本增至 100 萬，分局 30 余處。合并文明書局，盤入民立圖書公司全部，又并入印局數家，印刷機械大小數百台，一年間之營業，計 100 余萬，本年資本又增 100 萬元，已收 40 萬元，自建總店總廠均已落成，分店增至 40 余處。

該局組織，分立法、司法、行政三機關。立法機關為董事會，以董事 11 人組織之。司法機關為監察，行政機關以局長為首領，執行局務，各機關均屬之。與局長連帶負責主持各業務者，有副局長 1 人，理事 4 人，所長 3 人，助理事所長處理各務者為干事，主任事務者為部長課長。

總店之屋在上海四馬路棋盤街轉角，最新式建築五層樓洋房，共屋百余間，總廠在靜安寺路，為地 40 余畝，已建築者樓房 5 幢，平房 4 幢，共占地 10 余萬方呎，第一宅樓房上為編輯事務兩所，下為印刷，一為單色石印部，一為鑄字紙版木工等課。

該局現任編輯員 100 余，辦事人 800 余，职工 1,000 余人。董事監察及重要職員如下：

監察：潘究臣、郭亮甫。

董事：施則敬、唐紹儀、王寵惠、梁啟超、周扶九、蔣汝藻、陸費遼、王正廷、朱幼宏、沈芝芳、廉泉。

局長：陸費逵、副局長沈芝芳。

理事：陳寅、戴克恭、王祖訓。

編輯所長：范源廉。

事務所長：戴克敦（印刷所長，文明書局總理）、俞復。

法律顧問：王寵惠（干事，上海店長）、夏清貽。

干事：金兆梓、姚漢章、沈頤、高時顯、唐駝、陳育、戴克紹。

（申報1916年10月10日）

吾局（中華書局自稱，下同——編者）創始於宣統3年之秋，成立於民元歲首，當辛亥元黃枕攘之時，正吾局呱呱墮地之日，資本先僅25,000元，繼增為10萬元，25萬元，59萬元，100萬元，160萬元，今則200萬元矣。屈指已二十有一年。溯吾局當草創之際，以少數資本，少數人力，勇往直前，開業之後，各省函電紛馳，門前顧客坐索，供不應求，竭力應付，基礎於是乎立，乃大勢所迫，不容以小規模自畫，於是改公司，增加資本，自建總店總廠房屋，置備機械，自辦印刷，并派技師出洋留學，研究藝術，舉凡雕刻版、凹凸版、三色版、橡皮版、鋅版、鉛版、日新不已，精益求精，一面廣設分局，以利推銷，民元至民5，每年度營業，已逾百萬，駁駁乎有日進之勢。顧因實力未充，擴張太驟，同業競爭，又復猛烈，所集資本，全用於置機械房屋之一途，民6之秋，周轉不靈，忽而擱淺，債務雲集，事甚糾紛，當最盛之時，演出极大之恐慌，左右支絀，維持為難，辛苦3年，始漸恢復。民10以後，基礎漸穩，謹慎休養，逐步進行，每年營業，漸增至400萬，在教育上，文化上均有相當位置。

房產：靜安寺路基地40畝弱，自建廠屋1千數百間，已于前年售去，現在楊樹浦購地40畝，為新廠之用，即將動工，河南路福州路轉角，自建總店，廣州、長沙、南昌、青島、太原各分局，均自置房地產。天津、北平、南京各分局，均租地造屋。

組織：總公司設總辦事處，下分五部，及第一第二各貨棧，各總務部、會計部、統計部、推廣部、出版部、部下又分數十課。

編輯所內分總編輯部、教科部、新書部、古書部、西文部、美術部、

圖書部、詞典部、并附設圖書館。

印刷所事務方面，分事務部、營業部、工務部、承印部。工廠方面，分聚珍仿宋部、鉛印部、石印部、輪印部、照相制版部、雕刻部、凹凸版部、電鍍部、裝訂部等。

總店設存貨、售貨、賬務、銀錢、推廣、收發、庶務六大機關，分十八課暨門市五櫃。

此外，于各省區重要地點，設分局三十餘處，分銷處凡千餘。

營業項目：出版教科書、兒童讀物，編譯新書、精印古書、各種叢書、雜誌字典、西文書籍、函授講義、碑帖書畫、屏聯、製造并經售儀器文具、印刷材料。

印刷如普通、鉛印、聚珍、仿宋版、五彩石印鉛印等無不應有盡有，除自印圖書外，并代政府及工商界、印刷公債票、庫券、股票、支單、商標、廣告、以及書籍雜誌等。

（中華書局編：“中華書局21年之歷史，中行月刊4卷6期，第158—159頁，1932年6月出版）

該局自民10以後，基礎漸固，嗣于民23年又在港增設印刷廠，專印鈔票債券等。翌年，復將哈同路廠地售出，另建新廠及編輯所于澳門路，規模益見宏大。“八一三”後，該總廠及編輯所即告停工，除將大部員工遣散外，并將機器運港，以擴充港廠之設備。同時又將總局遷滇辦公。現各地分局，雖有數處因戰事關係，而告停業者，但于戰後新設者，亦有多處。目前該局雖受戰事影響，營業較遜，但以戰時貨價高漲，兼以員工裁減，開支樽節，頗能維持。

該局設立之初，營業進展甚速。民元以後，其營業額已逾100萬元。自民國16年後，因印刷政府債券，營業較前增進，營業額已增至400萬元，獲利菲薄。“一二八”後，在商務印書館停頓期中，該局營業更有顯著之進展。嗣以新廠落成，政府小額鈔券大都歸由該局承印，是以營業更見飛黃騰達，營業額已突增至1,000萬元左右，獲利之厚，倍蓰于往年。“八一三”後，以各處交通梗阻，出品內銷為難，以致書業方面之營業，頗為不振，惟港廠營業尚佳。

（王相稟編：“華商股票提要”，第158—159頁）

历届董监事名單：

1930年。董事：唐紹儀、孔祥熙、陸費逵、陳協恭、李默非。

總經理：陸費逵。

營業部監督：路錫三。

編輯部主任：舒新城。

大股東：陸費逵、李鐘鈺、范源濂、俞復、戴克敏、汪文溥、徐士淵、王正廷、施則敬、廉泉、吳有倫、黃景范。

（日本東亞同文會編：“中華民國實業名鑑”第1105頁）

1942年。董事：高時顯、吳有倫、李叔明、陸費逵（已故）、唐少川（已故）、舒新城、汪伯奇、王志莘、沈樂康、胡懋昭（已故）。

監察人：黃毅之。

總經理：李叔明。

（“華商股票提要”第168頁）

附：中華書局創辦人陸費逵簡歷

陸字伯鴻，浙江桐鄉縣人。高祖諱墀曾任四庫全書館副總裁，父母均能文，幼承家學尤得力於母教。年19，為讀書便利計與同志設書肆於武昌，費逵任經理。年20，任漢口楚報記者。遭張之洞忌報遂停刊。走上海，先後任昌明公司上海支店經理，文明書局、商務印書館要職及教育雜誌總編輯，後創辦中華書局，被推為經理。

（摘自勃德編：“中華現代名人傳”第78頁）

世界書局

民國6年之時，紹興沈知方（曾任中華書局經理）發起創辦本局。但以資本微薄，出品不多，尙未正式成立為公司。迨至民國10年，沈邀集同志，得陳芝生（浙江人，錢莊經理），羅坤祥（浙江上虞人，久成綢莊股東），趙文煥（浙江紹興人，曾任安康錢莊經理），魏炳榮，李春榮，張云石，林君鶴諸先生的協助，本局始正式成立為股份有限公司。沈先生即被選為本局總經理。但此時資本只有25,000元，發行所僅上海、北平、廣州3處，出版物也只有200餘種，營業額為13萬餘元。這是本局正式股份公司成立後第一屆的情形。

民國11年，本局資本增為3萬元，出版物約300餘種，營業達28萬餘元；并於是年創設印刷所，設分局於漢口、沈陽。到民國12年，資本增至63,000元，添設分局於太原、長沙、南昌，營業已增至45萬餘元。民國13年，本局資本較上屆又增一倍餘，出書已有600餘種，營業額已增至74萬餘元；并於是年購進上海大連灣路總廠地址10畝餘，又於天津、汕頭、重慶、衡州、常德設立分局。民國14年，為本局第五屆。總廠於是屆落成，總務處、印刷所、編輯所均行遷入；分局又添設十處：為溫州、杭州、南京、蕪湖、濟南、徐州、蘭溪、福州、廈門、梧州等地。是屆并得孫羹梅，沈蓮芳，劉復勳，范云六，謝韜甫諸先生的贊助，資本收足50萬元；出版物達800餘種；營業額為99萬餘元。本局至此，規模略具，基礎已定了。

民國15年，本局資本增至549,700元。出版物統計有980餘種。如本局所發行之小學教科書，則已獲得重要的地位，風行全國。但此時適值國民革命軍起，交通梗阻，各分局解款為難，營業收數為71萬餘元。

民國16年，本局資本增為666,400元。出版物已達1,000餘種。但是年以軍事未平，各處交通還未恢復，營業收入，共計68萬餘元。

自民國17年到18年6月的一年半間，為本局第八屆。本屆中可記者：第一，本局聘任徐蔚南為秘書長協助總經理，計劃一切出版事宜；第二，在本局總廠地址，添建印刷廠屋二層樓一宅，存書棧二層樓一宅；第三，南昌分局購進地基，建築房屋一座；第四，巨大機械添置十餘架；第五，出版物達1,200餘種；第六，營業收入，共計為179萬餘元。

民國18年7月至19年6月，為本局第九屆，購進上海四馬路本局發行所地基二畝餘，總廠又添造書棧一座。長沙分局購置店面及堆棧地基房屋。出版物達1,500種，所出之中學教科書亦告完成，頗蒙教育界所推許。營業收入，共計152萬餘元。

民國19年7月到20年6月，為本局第十屆。本屆中，關於建築地產方面，則於廣州，蕪湖購進分局地基，並建築分局店面。出版物已有二千種以上，冊數約四千數百冊。營業亦一日千里，超出以上各屆。

本局財產，自數萬元而增至二百數十萬元，其中關於地產及建築者占大部，故地產和建築實有特別一說的必要。

(一)總廠：民國13年，購進上海公共租界虹口區臨大連灣路、平涼路、榆林路三面馬路之地基十畝另八分餘，已建築之廠屋棧房約占地六分之四；現在建築中四層樓廠屋，約占全地六分之一。本局之總務處、編輯所、印刷所三大機關之各部分，均設在廠內。

(二)上海總發行所，民國18年購進上海公共租界福州路(即四馬路)地基二畝一分另及房屋多幢。現因營業進展，原有房屋不敷應用，九層樓大廈之建築，正在計劃中。

(三)廣州分局店面，20年購進，在廣州永漢北路，市面熱鬧，與上海南京路永安先施地址相似，現正建築四層樓大廈。

(四)長沙分局店面及棧房，19年購進，在長沙南陽街。

(五)南昌分局店面及棧房，16年購進地基，自行建築，在南昌中山路轉角。

(六)蕪湖分局店面，19年購進，在蕪湖長街。

即只以上地產房屋，購價造價，計算已達百萬餘元，超過資本之上。然十年努力，殊不足道，譬之行路，只達其半，尙有一半，須待今後之努力。我們還要“明年從頭再做起”哪！

本局成立為股份公司後，即積極籌辦印刷所。民國11年先設第一印刷部於上海閘北虬江路，嗣又添設第二印刷部於閘北香山路。其時本局鉛印部分，已自能供應，不須外力接濟。

12年底適有俄國西比利亞印書館出盤，本局即前往受盤，印刷能力於是大增。但本局仍嫌印刷能力不夠，遂派沈蓮芳先生遠往國外考察印刷事業，並添辦機器，以資改進。

14年終虬江路之第一印刷部，因鄰廠失慎而遭波及，幸重要機器無恙，損失無幾。其時，適沈君在國外添辦之機器已到，而虹口大連灣路之總廠亦已落成，遂於15年春，將印刷所全部遷入總廠。

印刷所自遷入總廠後，仍繼續擴充，現在狀況，分述如左：

鉛印方面：有美國輪轉機、英國全張機、德國美國四色機等50余台。但本局營業發展，不敷應用，故最近擬添置最新式快速度印機，以應需要。

字體方面：書籍排版，全賴鉛字，本局華文方面，有新式澆字機製造鉛字；西文方面有瑪拿大潑澆字機製造鉛字。前因對於普通字體，不甚滿意，為精益求精起見，特設字形部。聘請專家，創造美術體：字形則工整清晰，式樣新穎；字體則大小完備，可以任意選用。該部籌備已久。將來美術體字完全成功時，排印書籍，必能放一異彩。

美術方面：本局照相房一切用具，均已應有盡有；最近更購入五彩橡皮機，故凡照相銅版鋅版、彩色鉛皮版、五彩石印、一切美術工作，均能應付自如。製造方面現有職工千餘人。

（摘自世界書局編：“十年來之世界書局”，1931年8月世界雜誌增刊）

發展概況：該局創辦於民國6年，其時資本僅15,000元，民10年秋，合併廣文書局，改組股份有限公司，是年設分局於廣州、北京，資本共計為25,000元。民12年盤入廣智書局，設分局於奉天、漢口，資

本增为 3 万元。民12年盤进俄国西比利亞印書館，設分局于長沙、太原、烟台、武昌、南昌，資本增为63,000元。民13年，复盤入东亚書局，又設分局于天津、重庆、汕头、常德、衡州，資本增为136,000元。民14年，資本增为50万元，盤入古書流通处及进化書局，又添設分局于温州、杭州、蕪湖等16个大埠，今年經股東會議决改增資本为100万元，范圍扩大，营业当更望发达。

(1925年7月上海申報)

該局現任董事長为張靜江(杜月笙代理，張曾为国民党建設委員會主任，所謂浙江財閥之一)，常务董事杜月笙(流氓出身)、李石曾(曾任国民党駐法公使)、錢新之(交通銀行)、齐云青、陈孟釗、陆仲良，董事：徐寄塵(浙江兴业銀行常董)、浦心雅(交通銀行經理)等，監察人为吳稚暉等。

注：括号內的簡历是編者加的。

(联合征信所編：“华股手册”203頁，1947年10月出版)

中国标准铅笔厂

該厂系由吳夔梅、潘公展、潘仰堯等于23年7月发起創辦，原来資本为8万元，地点設上海斜徐路，同年6月开始生产。国内自制鉛笔，以該厂为始創。

創辦人吳夔梅，原系留学日本橫濱高等工业学校研究化学，毕业后，目睹日本鉛笔工业的发达，以及国人对于鉛笔工业的忽視；乃立志献身此事业，于是輾轉設法，投入日本真崎大和鉛笔株式会社实习。日本工厂对于外国学者，是認作工业間諜，給予学习者只是若干皮毛，主要部門休想問津。在此严密監視之下，吳氏艰苦备尝，但結果終于获得制造鉛笔的訣竅。

民国22年冬，吳氏学成回国后，于翌年7月，集資設立該厂，选出潘公展（国民党上海社会局長）、潘仰堯、馬蔭良、李光启、吳庆衍、吳鏡予、章偉士等7人为董事；以章偉士兼經理，吳氏則担任协理与厂长。

在抗日战争前，該厂所用原料，如石墨，采自鎮江及陕西郿县等处；粘土，采自宜兴；木材，除制造良好之鉛笔所用之木材向美国購買外，普通笔杆之木材，均采自河北、浙江等地。

該厂自24年6月出貨后，因其质量較好，而国民党教育部又通令全国教育厅、局及学校，一致采用該厂出品，因此营业甚佳，当时每日可生产200至250籮（每籮12打），完全可以銷尽，其銷售区域，已遍于全国。

“八一三”抗战爆发后，該厂奉令內迁，是年底，將全部器材拆运汉口，本拟在汉建立工厂复工，后以战事西移，乃迁至宜昌、繼迁至重庆，28年在重庆建厂复工。

28年，該廠增資為12萬元，30年又增資至45萬，31年再增至資本金為100萬元。

31年時，該廠董事名單如下：崔唯吾、吳鏡予、吳庆衍、熊蔭村、王汝耀、沈長明、馮蔭良、潘仰堯、余仲聯、吳羹梅等，監察，阮覺施、梁有耀、高漢等。總經理及廠長為吳羹梅兼任，董事長為潘公展。

在重慶時，製造鉛筆者只有此一家，因此營業情況甚佳，按當時之設備生產能力，每年可達7,000—8,000羅，惜以原料來源困難，故只產4,000羅。

營業狀況：自28年7月至30年底止，正式復工後產品供不應求，乃在昆明、貴陽二地分設發行所，推銷成效甚著。29年因遭敵機轟炸，損失不少，因而生產萎縮，不得已將部分機件遷至南溫泉設立分廠，至同年9月正式開工，總廠則於同年12月全部復工。至30年營業已見好轉，茲將該廠歷年盈餘列表如下：

24年10月——25年12月 盈餘6,823元	1940年全年 盈餘47,291元
1938年1—12月 盈餘14,997元	1941年1—8月 盈餘153,534元
1939年全年 盈餘43,758元	

該廠原向中國、交通二行商借15萬元，至30年4月經四聯總處准以原料抵押，借25萬元，至30年底以擴充生產，又向四聯總處核借25萬元，連前共借50萬元。

（摘自國民黨“四聯總處工商調查材料”，上海機聯會出版：“工商史料”第2集34—39頁）

照粗略的估計，目前後方（即國民黨統治區）各省所需鉛筆總數每年當在6萬羅左右，重慶中國標準鉛筆廠所能供給的可占到60%，該廠出品計有飛機牌和鼎牌兩種，29年生產量，飛機牌28,200羅，鼎牌12,000羅，30年產量，飛機牌17,000羅，鼎牌16,400羅，31年產量，飛機牌19,600羅，鼎牌16,200羅，實在按該廠現有設備言，如果能發揮全部生產能力，年產鉛筆10萬羅，即較目前產量增加百分之百可無問題。聞該廠尚在增加新設備，完竣以後，全年總生產更可达12萬羅，較目前增340%。非但後方各地所需，可供應無缺，即收復失地以後，

全国各都市的需要都可供应。

但是，原料是成問題的，外来原料断絕以后，代用品如木材、笔鉛、粘土、顏料、硝化棉、金銀箔、坭塢等，虽然費尽苦心均能逐漸克服难关，毕竟在技术运用上，不能不受很大影响。因此，在目前，后方鉛筆需要之另一部分，仍由走私故貨及小部分歐美貨来垫充。

(摘自重慶：“重慶机制工业的一角”，实业之友第1卷第8期)

渝鑫鋼鐵廠

渝鑫鋼鐵廠是戰時國民黨統治區中最大的民營煉鋼廠。該廠原名大鑫鋼鐵工廠，為余名銓、方子重於1933年8月在上海發起籌備，翌年9月，在楊樹浦路設廠完成，開始生產。當時規模較小，設備除普通機械外，只有小型煉鋼電爐，但在工業落後的我國，這種小型電爐煉鋼還是民營工廠中的首創者。其主要產品，除生產普通機件和承接修配外，還有鑄鋼、鑄鐵及各種合金鋼原料。經營數年，略具成績，滬上造船廠、自來水廠及公共汽車公司所需零件機械及原料多向該廠訂購，抗日戰爭爆發前，該廠曾協助上海、金陵等兵工廠製造手榴彈槍械等，1937年6月因時局緊張，呈請內遷，同年7月遷至武昌，翌年因武漢形勢緊張又遷重慶，在遷重慶過程中，由於資金困難與運輸不易，由民生公司加入資本，1938年11月與民生公司簽訂合同，改名為渝鑫鋼鐵股份有限公司，1940年又加入金城銀行資本，此時資本總額增至200萬元，1943年3月續增改資本為1,000萬元。

經過改組增資後，渝鑫成為國民黨統治區有數的大鋼鐵廠，據1942年2月調查，其設備僅次於孔祥熙所屬的中國興業公司鋼鐵廠，而在出品方面卻超過中國興業公司，它在設備方面，有3噸熔鐵爐兩座，一噸合金電爐一座，一噸伯塞式煉鋼爐兩座，每月可產灰口鐵140噸，可產鑄鋼及鋼材百噸左右。其總廠設重慶，並在長壽江北設分廠，並設立煉鐵廠，煤礦及火磚廠。

抗戰初期，國民黨統治區工業因市場需要和受通貨膨脹的刺激，有所發展，渝鑫當時營業尚好，在1941年時還有相當盈餘，但隨著國民黨四大家族壟斷獨占的加強，國民黨統治區民族工業日益陷於嚴重的危機，致當時年產不到3萬噸的鋼竟無銷路，渝鑫亦於此時

(1942年)起一天天走着下坡路,至抗战結束初期,該厂更陷于欲停不得欲迁也不成的境地。

渝鑫创办人余名钰,浙江鎮海人,大学毕业后,得其姊夫江浙財团方九霞之助,后到美国入加里福亞大学校学冶金,毕业后一度在美国工厂实习。回国后曾在安徽的宣城、江西和云南箇旧办过矿务,并曾任云南东陆大学教授、重庆大学采冶系主任和云南省交通司司長。在云南工作6年后回到上海,旋应朱家驊之邀任浙江省丽水县县長,1933年与方九霞之子方子重合办大鑫,該厂主要出資人为方九霞。因余有技术,当时余任該厂总經理兼工程师,方子重任副經理。

大鑫改組为渝鑫后,董事長改由盧作孚担任,其董事有郑东琴、郑璧成(民生公司代表)、戴自牧、王毅灵(金城銀行代表),总經理兼厂長为余名钰。

抗战結束后,余名钰回到上海,向敌伪产业局标买了敌产日亞鋼鐵厂,余兼任該厂經理和总工程师,該厂設備有軋鋼車1套,迴热爐3座,貝氏爐2座,职工327名,每月最高产量为鋼条300吨。此外,余氏还兼任上海华民玻璃厂董事長。

在渝鑫內迁时,上海还留有大鑫鉄工厂名义及部分設備,由方子重主持,当时为避免敌人接收,曾由余名钰与德人孔士德签订保險合同,名义上是作为卖与孔士德。1939年,孔士德將大鑫分兩部出賣,一部賣給日本人,另一部分賣給三兴和鋼鐵厂。至抗战結束后,大鑫由国民党經濟部接收。

(摘自“渝鑫鋼鐵厂調查”)

周恒順机器厂

讀过中国工业史的人，都知道汉阳枪炮局是中国最早的一家国营的冶炼工厂。但，早在張之洞創立汉阳枪炮局及汉阳鉄政局以前30年，周恒順机器厂就在汉阳創立起来了！这个历史最長的民营机器工厂，是当前鼎鼎大名的机械專家周茂柏的祖父所手創的。它开始不过是承襲祖傳的冶鉄业，一个小規模的爐冶坊，后来經過了周茂柏的父亲——周仲萱的苦心經營，从旧有的手工业的基础，不断地改造，不断地采用現代翻砂技术与設置現代工作机。到現在，已有53年的历史了。53年来，中国幼小的工业，經過了无数次的惊涛駭浪，始終走不完崎嶇的道路，多少工厂从繁盛走到衰落而歇业改行了，几年后就連往昔的痕迹也不可追尋。可是，周恒順却是例外的，它从最小型的爐坊变成为武汉三鎮最大的机器厂，象松柏似的耐寒不凋。这是周氏祖孙三代努力的結果，尤其是周仲萱的成績，他不仅善于吸收旧的經驗，并且善于接受新的技术。他受汉阳兵工厂現代化的翻砂技术的影响，到上海江南制造厂打样房学习，并且自修物理化学等課程，后来还到日本去考察。

恒順机器厂的进展是惊人的，它的制品，从簡單的軋花机，茶磚机进步到制翻砂和各种机器。到了光緒31年，該厂已扩充了兩次，已有一个20匹馬力的蒸汽原动机和一批好的工作机，其出品除銷售湘鄂之外并銷入四川。自流井的鋼繩，就是由周恒順承制的；到了民国时代，已能够修船造船了，它前后造过20多艘小火輪，船上所有的大小发动机及主要零件全部自制。在四川開設英記，华記字号，推銷該厂出品及其他五金。周茂柏的大哥周蒼柏就是主持着重庆这部分业务的。

周茂柏的家族有着企业家的傳統，他祖父以下二代；他伯父、亲堂兄弟等都是从事机器业与五金进口业的。

周茂柏生長于这个充滿工业气氛的家庭中，从小就受到很好的教育，毕业于同济大学工程学系以后，到德国司特力工程学校專門学机械工程。回国后，代替他爸爸的責任，当周恒順總經理。发展自己家里經營的机器工厂，另一方面，还参加資源委员会中央机器厂籌备工作。任中央机器制造厂預备厂厂长。这个工厂，在湖南湘潭籌备开办时，周茂柏亲自去布置，到抗战时，恒順厂由汉阳撤退重庆时，与民生公司密切合作，周茂柏担任新的恒順机器厂的總經理，同时兼任民生公司机器厂厂长，而恒順則由盧作孚加入資本。

周茂柏在管理工人方面頗富严格，民生机器厂的工人一提起这位厂长时都有点害怕，因为他勤于督工，而且为提防工人偷窃器材起見，工厂的大門檻，做得特別高，工人假如偷了东西，裝在褲袋里面，过門檻时一举足，褲袋里的东西就会丢出来。

民国24年春，周氏被資源委员会派赴美国考察，抗战结束后，他往上海主持中央造船厂工作。

(摘自怀廉：“中国經濟内幕”第87—89頁，
1948年8月新民主出版社出版)

大隆機器鐵工厂

大隆機器鐵工厂为上海開設較早和規模較大之民营机器厂，創辦于光緒29年，創辦人为严裕棠。严氏上海人，印刷业学徒出身，因承印鈔票获利后創辦該厂，据说，严氏系与日本人合作伪造鈔票起家。民17年严氏复与李仲斌等接办苏州苏綸紡織公司，大隆为苏綸制造及修理紡織机器，大隆新制产品先在本厂及苏綸紗厂試驗获得良好成績后，然后出售。

（“大隆鐵工厂創辦史略”）

大隆機器鐵工厂創辦初时規模甚小，資本仅7,000元，設厂于滬东梅家巷，其时，我国工业方在孕育时期，滬市鑄鐵工厂更屬寥寥，欧美軍艦之航海东来者，輒停集于黄浦江，修理价率凡与各該国相等，故恒得工簡利重之报酬，民初，欧战兴起，五金騰貴，东鄰国因利乘便，將鐵工事业一变而为兵工厂化，鐵工制品凡有东輸之势，維时国内工业以外貨缺乏，遂得勃然以兴，而鐵工营业尤有供不应求之景象。大隆努力經營，一再扩展，由梅家巷而平涼路，而大連灣路，以历年節約盈余之所积，以次扩充，故基础日益堅固。至民16年春，鉴于时代需要，乃复迁地于閘北小沙渡光复路建立新厂，增加設備，除照原有代各厂修理陈旧机器之外，兼造农具小型机器，及紗布应用全部机器。擴張計劃方有端倪，而世界不景气之狂潮已激盪东来，凡植基未固者，輒被淘汰。大隆为爭扎图存計，乃于民24年再集合資本50万元，改組为大隆制造机器股份有限公司，全部业务仍由严氏总攬其成。改組伊始，适值世界金融稳定，物价指數逐漸增高，吾国市場亦呈活跃，年前币制改革，去岁（指1936年）又逢有秋，全国統一，百业向荣，乃再

度扩充資本为100万元，推举严氏为董事長。

(鈞之：“參觀大隆機器制造厂紀实”，上海市政府
成立十周年紀念工业展覽会特刊，1937年出版)

1947年时，該厂設備，工作母机約200部，馬达20只，全厂职工約
900人。

产品以修理及生产紡織机为主，專造整套紡紗、織布机器，及各
种織綢厂、漂染机器、毛巾机及小型农具机等。

抗战前該厂总經理为严裕棠，厂长严庆龄（裕棠之子）。裕棠死
后，其子庆龄繼任总經理。

（“大隆鉄工厂創办史略”）

华丰机器厂

一 华丰机器厂创办经过及其创始人

潍县华丰机器厂，曾为华北最大机器厂之一，创始人是滕虎忱。滕是潍县东乡人，家庭职业为“捆爐匠”（潍县对锯锅、锯锅者之通称），从小即随父亲打铁，19岁那年（光绪27年间），滕去青岛，在水师工务局当学徒。水师工务局是德国修理军舰的场所，为吸收中国劳动力而设；学徒每日做工八时，上课二小时，四年满期后，尚须在該厂服务二年，这时可以拿一点薪金。滕在該厂学徒四年并服务两年后，自己又留在該厂做了七、八年工，滕便在这十多年中，一面做工，一面也学会了一些制造机械的实际知识。当时和滕一起学徒以后又成为华丰同事者，还有李占元、丁执庸，滕在热爐部、李在电气部、丁在木工部，他们常在一起，都对机器制造极感兴趣。

民国7年间，滕回到家乡潍县，想自己筹办一铁工厂，可是自己既无资本，集资又不易，只好在潍县广文中学理化制造所制造器具，自己只有一部旋床、一部手搖鑽、还有些小工具，都是和他妻子合伙打铁，制造而成。一年后，滕就以上述工具创办了华丰工厂，没有工人，仅学徒谭育秀一人。那时潍县很少有人用机器，故开始除了给济南电灯公司打造螺絲釘外，没有营业。北方多旱，滕便研究制造水車，没有样子，完全凭自己所懂得的机械制造规律去创造。水車制成了，車水量也很大，可是做了几部，只卖去了一部，其他则无人购买。资金无法周轉，工厂維持不下去，滕便把家产全部卖去，凑起5百元，放在工厂内做资金，全家则赁了一间小屋，睡觉时，搭上几块鋪板。

潍县的染織业，民初即开始发展了，在城郊及四乡中，散布着为数极广的木制織布机，既要用兩脚踩，又要用兩手丢織布梭，速度既

慢，布面狹窄又不均勻，滕看見水車無法銷售，便設計製造鐵機以代木機，他按照青島電力拉動的織機模樣，去掉傳導輪等不必要的部分，改用兩腳踏，每日可織40碼洋布一匹（十餘丈），制好了數部，滕將鐵機運往農村，當眾試驗，推銷了一些，銷路逐漸改善，滕感到資本短絀，便四處籌劃，到民國9年，始集資3,000元。入股者除了廣文中學校長尹煥齋認股500元外，其大部也是該廠工人，滕本人則將以前之資本500元亦入股。這時設備仍極簡單；在東關大街租了一個小草棚，有兩部旋床，沒有電力，要用人力搖動；另外還有兩部小鑽（一部自制），一部鐵匠所用之紅爐。這樣“窮湊合”起來後，便繼續製造織布鐵機。

從開始起，他們生活都很刻苦，每月工資，一般都是2元到5元。

在濰縣染織業發展的基礎上，華豐的織布鐵機銷路日益擴大，從濰城四郊，逐漸銷售昌邑、掖縣、壽光、益都、安邱等廣大農村，以前的木製織機，逐漸被該廠出品所代替，每一個村莊，都響着這種織布鐵機的扎扎聲，多至一莊有百餘部，促成了濰縣染織業空前發展，每日無數小車，推着布匹，向火車站運送。而染織業的發展，又刺激着該廠產品的增加；從製造織布鐵機時起，到民國20年，十年間，該廠織機銷售在2萬部，而華豐機器廠也便在這十年間擴大了數十倍，買了3畝多（七百二的杆子）地皮，蓋了數十廠房，旋床增至30餘部，工人學徒亦從5人、10人增至100餘人，全部資產達12萬。

沒有高等技師和工程師，連機器圖樣和工程書籍都少有，滕靠着和工人、學徒們在工作中慢慢摸索，在這十年前後，不斷製造着新的機器產品。第一部灌田水車銷出後，銷路不久便好起來，華豐又重新製造。他們又在製造中改良了它，使它更完善。以後該廠又以渤海產棉為對象，製造軋花機、彈花機、棉子剝皮機、榨油機等等，其使用有用人工、亦有可以利用天軸，由電力帶動。這些機器有些是按照外來機器而仿造的，有的則靠工人、把頭或滕本人在外面參觀回來共同創造的。工人、學徒也在这創造中，發揮了他們的才能，由此也學會了每一新的機械製造，從低級到高級，從簡單到複雜，克服製造困難的

信心。

在工厂里，有一部当作动力的15馬力狄塞尔式的柴油机，滕和厂里的人，时常在它周圍端詳，想着制造它，可是他們計劃了好久，都沒有办法。全厂工人都是在厂内学徒出身，連柴油机构造都沒有见过，沒有一个敢說会造的，滕去青島請了一个也是曾在青島某鉄厂学徒出身的工人王宏茂。滕虽然不懂制造柴油机，但他却知道，这一个年青人很聰明，很刻苦而且有一定机械制造經驗。把他請回厂里后，滕便天天鼓励他研究制造柴油机，拆开机器，經過反复研究試制和克服各种困难后，这样繼續的工作了一年多，第一部柴油机居然造成。

柴油机制造成功后，华丰工厂需要建立一个包括机械制造全部过程的完备工厂，不到二年，在原来的基础上，完整的建立起：繪图室、木样部、翻沙部、钳工部、旋工部、装配部、試驗部，一直到营业部。

随着华丰規模扩大，出品增多，資金周轉数量亦更大。这时华丰信用較高，召股較易，便于民国24年再度召股，每股500元，股东200余人，連同原来资产，增至股本40万元，接着便在南关买下地皮，盖起厂房，增添机器，建立第二厂，其規模比一厂还大，一厂除了專造柴油机外，所有机器均由二厂制造，并增制发电机和鍋爐，由李占元任厂长，李亦为工务局学徒，經過多年工作与努力，其能力亦相当于工程师。

但是，对社会有贡献的人們和事业，在当时并不被人重視（当然不是劳动和社会进步人士）。那些只願买田置地，經商投机，或求升官发财飞黄騰达却不願去經營这种“賠本生意”的人們，对这些整日在机器中鑽来鑽去滿身油污，出身微賤的人，是看不起的；当时所謂工业界人士，談起他們来，也都是以“这些人无知識”而概括之，偶去參觀，亦昂首闊步，投以輕蔑的一瞥。当时还有一个高喊“振兴实业”的“政府”，除了收营业税，发一張营业执照（也是化錢）外，却从未对該厂“振兴”一下。

劳动人民的汗水，把华丰培植为华北最大的机器厂之一。到民国26年曾极盛一时。它的两个制造厂，都包括了机器生产全部过程的設備二厂，并設有制造发电机的电气部，造鍋爐的卯工部。一厂厂房180

余間，占地3.2亩，二厂400余間，占地18亩（以上均以七百二的杆子計算）；各种制造机器的机器和工具 180余部，其中旋床70余部，全部资产150余万；工人共600余，最多时达700余人；出品数量以織布鉄机为最多，濰县及其鄰县号称 10 万大机，其中 7 万以上系該厂所造，軋花机在 24 年以后，兩年間約产900余部，彈花机每年可出300余部，柴油机从15馬力到 40 馬力每月可出 5 部，其他如发电机（2 kw 到 25kw）、救火机、抽水机、鍋爐、及机器附件等均甚多。銷路遍及山东全省及华北，西北及江苏境內。滕尚有一颗雄心，当时他正和厂长把头及工人们計劃制造300馬力具有 4 个气缸立式的柴油引擎，并准备制造在黄河及小清河中行走的小汽船，图样模型及一部零件已着手制造，此外又計劃制造小型汽車。可是抗战爆发，工人解散，当时“政府”亦有所謂工业迁移后方的命令，但滕上了数次呈文，要求蔣匪山东省府調車搬运，但該机关却一味推托敷衍，拖延至26年底，日寇快要占領濰县时滕始乘了最后一輛火車，忍痛丢开了十多年来惨淡經營的工厂，和相处十余年的千余工人和同事，逃到后方。敌寇占領濰县的第二天，便派兵看守华丰，不久即强迫“中日合作”，第二年又將全部机器，連同磚瓦木料一并用火車运往济南，按照华丰原来厂房建筑式样和机器的裝置，改成历山鉄工厂，而抗战胜利以后，蔣匪便加以“接收”，成为蔣匪国防部第44兵工厂，3 年于茲，迄未发还。

二 蔣匪霸占華丰厂时期員工的生活

华丰被敌寇蔣匪霸占十多年了，在这十多年中，全厂所有人員都失去了生活依靠，和工作場所。他們为了生活，竭尽力量，四处謀生，但在蔣匪压榨下，仍无出路，其中有数十家为华丰工人集資設立的机械鉄工厂，至去年底，均全部歇业。

华丰原来股东，尙籌划了一部車床，在南关開設一利东鉄工厂，去年底又不得不歇业，此次蔣匪被歼之前，又將該厂房屋焚毀殆尽。华丰营业部內，仅存 15 馬力柴油机及 6.6 kw 发电机一部，亦为蔣匪发现，最后借去。濰县解放后，記者先后遇到华丰創始人及各厂厂

長，其中有丁執庸、王宏茂、譚育秀、李占元等，談到他們近年來遭遇，苦不堪言。丁執庸曾為華豐營業部經理，年已61歲，因華豐遭受種種刺激，曾神經失常，身體已半癱瘓，走路、講話均頗吃力。王宏茂曾任一廠廠長，華豐被霸占期中，曾東湊西拉集股開設三光商行，販賣電料，生意清淡，尤在今年，蔣匪管理下的發電廠常停電，更無銷路。但捐稅依然不能短少分文，欠了不少債，其中很多是布匹，因生活收入短少，王家眷尚須在家兼推面粉，以資彌補，麥麩僅抵電費，百斤麥子僅可掙面二斤。王數年來，凭着實際經驗，尚設計了一些機器圖樣，他曾拿出幾張，其中有一命名為搓絲機，製造腳踏車車軸等，據王說一般鐵工廠每人每天一部車床僅能出30余根，該機器每分鐘即可製造50根，可是自己無力辦工廠，也無銷售出路，一直未造。此次蔣匪以“打聯絡火”為名，抓去瑞泰鐵工廠經理史觀英。史和王在華豐同事，因受酷刑，往往亂招，王時刻恐連累自己，每日在家中，如坐針氈，在極端恐怖中熬煎着。

譚育秀今年已50余歲，由學徒、而旋工、而把頭、而廠長，在華豐被敵人搬往濟南後，譚于民國31年向天豐鐵工廠（亦為華豐學徒以後創辦）借了一部旋床等，僱了4個工人學徒，開設一育秀鐵工廠。譚亦企圖本着華豐初創慘淡經營之作风，發展成為一個新的華豐。當時天旱，譚做了些輕便水車，銷路頗廣，第二年又集股40萬元，規模日漸擴大，到日寇投降前，其較大工具有旋床7部，工人增至50余人，出品種類益增多，頗有華豐早年發展之氣概。以後蔣匪禁止機器出口，苛捐雜稅又愈來愈重，然譚本着當年創辦華豐之毅力，雖有虧累，尚不願歇業，一面製造小鋼磨出賣，一面自己也按鋼磨四盤，兼推面粉，勉力維持。可是以後“拔丁”又拔到該廠：第一次拔去三名，其中兩名是很好的旋工，第二次又拔去三名；前拔之三名因于半年後在營中逃跑，蔣軍又派人向該廠追索，其家屬亦向他要人，譚見該廠實在辦不下去，遂忍痛拆伙。開股東會議時，大家最初決定把機器保存起來，以便一有機會重新干起，可是張逆天佐修械所正在打听何廠歇業，便去借機器，於是他們又在很短的時間內，將機器趕快分了，能賣的就賣去。

这次战斗开始后，蔣匪派仗繁重，譚先生僱不起人，便以50余岁之高龄，每天亲自出伙，常被派往城外修筑工事，譚亲見东关居民，死于炮火之中，一次剛离某地数尺，炮彈即落該地，每日飽受惊恐。

李占元为华丰二厂厂长，今年已62岁，在濰县解放的第二天，即引导工礦部張部長及記者同观南关二厂旧址。現該厂仅剩一水泥建筑大門，里面已荒場一片，为蔣匪挖滿了战壕，厂中还有一間水泥建筑的繪图室，据李称：蔣匪撤守南关时，縱火焚燒該屋，因是水泥建筑，尙未燒坏，但窗櫺的木料，都已燒爛，牆上燻得发黑；房中間尙堆着很多未燒燼的木板，是蔣匪的引火物。

在參觀二厂后，我和張部長同去李占元家中，除了一座自住的房子外，他的不少财产，就是华丰的股份，而战前生活的来源，亦靠华丰的薪金。华丰被敌强迫合作和蔣匪霸占后，十多年来，李蟄居在家过着极清苦的生活。李家有16口人，除了一个兒子教書外，自己和他的大兒也曾用簡單器具，做点机器零件，以維持生活，但蔣匪还要他到商会登記，照攤捐稅，李一气之下，即此停业。

蔣在这次被歼之前，先把南关大馬路东的房子全部燒光了，然后又燒到李的家。有两个蔣匪士兵在門外大叫：“媽的个×，这个房子怎么还不燒！”

“燒吧！”另一个喊。

李听了这話，也顧不得危險，向蔣匪士兵拱了拱手，哀求着：“先生你不能燒，我全家16口就靠这一点房子，你燒了，就等于要我全家的命。

“不行！‘共匪’来了还有你們活的！”

李先生再央求道：“你們兩位先生先去別处，我再向你們团长請求一下。”跑到蔣匪团长那里，依旧說要燒光。他說不出什么滋味，赶紧跑回来，喊着家里人搬东西，但搬什么好呢？要用的东西太多了啊，李先生把手按在額角上，无目的地在院子里乱轉，想着一家人怎么办？怎么办？心里象火一般熬煎，他想要撞死，可是他兒女和家里人，都看到他有些异样，怕有不測，在周圍監視着他。

“讓他燒吧，把門堵起來！”在絕望中，他突然喊。於是指揮全家人搬運磚石，堵住大門，然後又把泥厚厚的塗了一層，全家老少，一齊動手緊張到極點。這時門外已燒得通紅，夾着悲慘的嘈雜。把門堵好後，李從後面牆上打了一個洞，把全家帶向城里。在城里亦飽受驚慌，幸而濰縣很快的解放了，回來看時，周圍已成瓦礫一片，只有他幾間房子尚未損壞，然而家里已無口糧，借？周圍已一片荒場，向誰借？……

華豐機器廠的命運，是中國工業慘被蔣匪掠奪的縮影，也是蔣匪統治下人民生活的一幅悲慘圖畫，在這個工廠的歷史里，看到人民如何為自身，為工業，為社會而胼手胝足、也看到蔣匪的猙獰面目。

三 華豐機器廠向蔣匪交涉“發還”經過

遠在日寇投降以前，滕在重慶即將華豐創辦經過，發展規模。并憑記憶將廠房機器開列了清單，呈報給蔣匪行政院。日寇投降，滕歸心似箭，想立即從重慶動身，趕回家鄉，處理自己事業。可是當時除了“接收大員和亦官亦商的人物能有便利的交通工具外，象這樣一個無權無勢辦工業的人，只好望天興嘆了。滕只得從成都、南鄭、西安繞了個大圈子，時而坐汽車，坐馬車，坐牛車，輾轉周折，到第2年2月才到濟南。一到濟南，看到機器尚完好無損，廠房仍和以前一模一樣，便四處奔走，交涉工廠發還，連家鄉濰縣和留在家鄉共同創辦華豐的老同事，雖十年未見，也顧不得看一趨。當時滕對比較高級的機關，如長官部、省政府、建設廳、省參議會、專署等等，均一一遞上呈文，將華豐創辦經過，發展，規模及敵人強迫合作經過等等詳加敘述，其中對若干機關尚開列清單，繪好圖樣一一呈報。但均遲遲不見音訊，遲至兩三個月後，上述機關，“批示”才陸續下來，且多是互相推托，如蔣匪省府批交財政廳核辦，而財政廳則又在“具呈人”，“具呈事電”，“等因奉此”等等開了一大通之後，批上：呈悉，本廳非主管機關之類。其他機關如蔣專署亦批“據情轉請，仰候核示飭遵！”敷衍敷衍。奔走了幾個月毫無頭緒，直到五月間，滕才從報上知道有一個敵

伪财产处理局这一个机构，于是马上写好呈文，又将华丰创办……在其中详细叙述了一遍，递上去，滕每日东托人，西打听，但有四、五个月之久，却音讯杳然。

在这时候一无着落之时，滕于该年秋回到潍县，下車伊始，便同创办华丰的同事老工人，同观华丰旧址，只见十数年心血，已成荒场一遍，滕于当众之中，即滴下眼泪，同行者亦不胜唏嘘。十年未见，老同事都老了不少，年龄多在60以上。

滕在潍县呆了一个很短时间，因一心挂念着华丰交涉结果，也顾不得家乡人和老同事们的挽留和招待，又匆忙赶去济南四处奔波。到该年十月间，蒋敌伪产业处理局才调滕至该局询问，又从创办、发展、规模、敌人强迫合作，经过抗战后胶东活动，问个详细。滕只得将说过、写过好多遍的：“民国9年，集资3千元……”重新叙述了一遍。问完后还不能决定，说要候蒋潍县府及商会调查证实后，再行处理。经过多次周折，拖到36年1月，蒋处理局始“批示发还”。滕欣喜不已，即写信来潍告知此一消息，大家均争相传颂：“处理局批示发还了！”但不久就看出这不过是一纸空文打官腔而已。原来该厂早成为济南蒋匪国防部四十四兵工厂，“批示”仍要华丰向国防部直接交涉。滕见此事重大，想立即去南京，因年高体迈，派该厂另一负责人交涉，在南京费了一顿周折之后，蒋匪国防部总算也批了个“发还”，但将“批示”向济南蒋匪四十四兵工厂交涉时，却以“戡乱时期”，“借用”为由，拒绝发还，并再三向蒋匪国防部捏造，“华丰系自愿与敌合作”，“全系敌伪产业”，“应全部没收以利运用”（以上所引文字均系蒋匪国防部，行政院以后批示中所引据该厂呈报者），滕无奈何，又于该年八月间亲去南京，往返一月有余，託了好多人，跑了好多机关，呈文“批示”又蒋匪从行政院，国防部，中央信托局、敌伪产业处理局，联合勤务总司令部，及其兵工署兜了个大圈子，也都批了：“照前批发还”，但将上述机关之批示交蒋匪第四十四兵工厂后，不久来了公函一封，内称：“……在总动员期间，军品供应益形繁重，为不貽误戎机起见，……一律按照现状继续使用，除呈报外相应函请查照办理。”

滕和其同事就在呈文“批示”中奔波了二年多，消磨着他們暮年最后的精力，去年有人去济南，据说有些老态龙鍾了，談起办工业虽尙有兴做，但一提到华丰交涉始末便在咬牙切齿之后，說道：“我到滌山当和尚去！”向来不說丧气話，一生不怕任何困难的倔强性格，今天被折磨得万念俱灰了。

(摘自刘冰：“記华丰創辦发展过程及創始人”，“記蒋匪霸占期中华丰厂人員的生活”，“記华丰机器厂向蒋匪交涉‘发还’經過”)

新民机器厂

胡厥文氏在工业上是花过一翻心血的。他从青年时就立志办工厂，就决心终生为中国的工业化而奋斗。他是北京工业专门学校的学生，在民国7年毕业，毕业后即入汉阳铁工厂机械股当一名工人。在那里，他不仅是学习技术，并且研究工厂人事的管理。以后他调炼钢股，化铁股充实习生。在化铁股中他和一批由比国回来的炼钢工人在一起，这些工人都有高明的技术和经验，胡氏跟他们学到不少的东西。

到了民国8年，欧战发生以后，在华的德侨均被遣散回国，同济大学电机，木工，机器工场三位德侨主任走了，胡氏被聘为这三工场的总主任。民国10年他集资24,000元在上海办新民机器厂，当时该厂地宽仅有2亩，职员仅4人，机工40余人，学徒10余人。

民国12年，穆恕冉先生创办的中华第一窑厂，改名信大，聘请胡先生为经理。

民国15年，他鉴于中国五金大都仰给于舶来品，所以他在嘉定设合作五金工厂，专制日用五金品，因出品的优良，销路甚佳，民国20年创设黄度电灯厂，21年联合机器同业创设机器联合公司，22年设石城窑厂于南京，23年于上海杨树浦创长城机制砖瓦厂，日出砖4万余块，空心砖1万余块，同时设新民第二厂于塘山路，专制柴油引擎。他的事业一天天在发展，可惜在“八一三”的炮火中京滬六个工厂全被毁了，但他没有灰心，他决卷土重来。

民国26年9月，新民、合作两工厂迁汉口复工，10月迁重庆，民国30年设新民分厂于邵阳，创大中机器厂于桂林，规模甚大，因为战时环境的需要，胡氏的西南工厂都有过繁荣的时期，在湘桂战争之

后，他在湘桂的工厂被摧毁得干干净净了。他回到重庆，筹设湘桂迁渝六厂联合工程处，但在通货膨胀，物价飞腾的情况下，西南流亡重庆的工厂也和其工业一样遭到不景气的袭击。

胜利以来，在美货倾销和官僚资本压迫之下，迁川工厂更加倒霉了。为了打出这个重围，胡氏屡次呼吁。35年8月20日在内迁工厂联合会招待记者会上，他以迁川工厂联合会理事长的资格出席致词，他希望政府对坚苦奋斗八年的内迁工厂，予以优待和援助，决不能眼看内迁的工厂破产，工人失业，而使他们爱国的情绪一天天消沉，最后他提出警告说：“内迁工厂虽已遭遇最困难的关头，但他们的爱国热诚，以及在后方工作情形，是可以告慰社会人士而无愧的。今天最聪明的办法是改行，从事投机事业，但是我们为什么不这样做，就因为国家复兴需要工业的发达，没有了工业，国家的一切将更为落后。”然而他力竭声嘶的呼吁是徒然的，到了目下，内地工厂已经面临死亡的边缘。环境迫使这位工业家认清这个局面，认清是和非！

（摘自怀庶：“中国经济内幕”，93—94页）

楊濟川和他的華生電器製造廠

楊濟川君，江蘇丹徒籍，他的父親原在蘇州開洋布商店，家境很平常，他的長兄做私塾教師，他自己從7歲到16歲就在這個私塾“讀老書”。到16歲，被送到上海一家洋布號做學徒，學洋布生意，本須帶着布樣隨着伙友跑街學習兜生意，他覺得性情很不近，一年後，這個商號的老板就叫他在店內弄弄賬，管些零碎的賬目，第三年因原有的賬房先生死了，老板就叫他接做賬房先生。此時楊君20歲。

當時他覺得自己的性情很不近洋布行業，雖然他因生計關係，一時不能脫離這個行業，但他立志去商入工，於是于服務余暇，發憤自修算學和化學，他只能看得懂中文，所以只得買當時出版的中国書看，覺得化學也不是他所擅長的，前途未見得有何發展，他便轉而注意到電氣一門。當時他買了伍光建編譯的中學用的教科書，里面有說到電氣的部分，他很感覺興趣，但是讀了嫌淺，而在當時比這樣更深更詳的中文書又沒有，他想來想去，只有再想法讀英文原本書，便到伊文思書局去買這些關於這門科學的英文原本書，翻着字典硬着頭皮閱讀研究，此時他已到了23歲了，一面仍做賬房先生，一面于公余實行他的研究工夫。他所用的那個賬房桌子的抽屜里裝滿了許多齒子錐子電綫種種東西，一有空就把他的這些抽屜開出來玩，他進洋布業共有13年，賬房先生一直做到29歲，從23歲到29歲的幾年間，便是這樣獨自一人在暗中摸索的自修中。到了他29歲那一年，這家洋布商號關門大吉，他便失了業。

舊例的學徒要拜老板做老師，這家洋布店的老板也就是楊君的老師，這位老師雖不幸关了店門，又設法把楊君轉荐到猶太人開的裕康洋行的買辦那里去，職務仍是賬房先生。

在这个时期里，他認識了兩位和他的志願極表同情的好朋友：一位是叶友才君，当时在威灵洋行里做賬房先生；还有一位是袁宗耀君，当时在久記木行里做跑街，每日在下午五點鐘辦公時間过后，外国人去了，這兩位好朋友就常来看他，楊君便將他的“試驗室”里的大大小小的东西拿出来，排滿一桌，搥的搥，捏的捏，打的打，鑽的鑽，接的接，一面和他們大談他的心得，据說最初所研究者为根据書上参考所得，探討各种电气表之原理与構造，直到民国4年，时楊君已35岁，和他的好朋友叶友才君竊議，以为一直这样研究，似乎“无啥道理”，彼此商量根据研究所得，实际創制电风扇。不过他們都是拿不出資本的朋友，袁君与当时的揚子保險公司經理祝蘭舫君（字大椿，怡和洋行买办——編者）是好友，在經濟上頗有請他帮忙的希望，但空口說白話，就要人掏腰包相助，这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于是楊叶諸君討論的結果，以为先做点实际的成績給人看才能說动人，所以决定先努力創制兩個电风扇出来，作为开路先鋒。主意打定之后，开始动工！

楊君当时只有賬房桌的抽屜做試驗室，并无工厂的設備，这样的工作如何开始去动呢？当时市面上已有了舶来品的电风扇，但一个要售百余元，楊君要想买一个做参考，也力不从心，于是只得設法借到一个，他便根据平日的研究，先把图样設計起来，設計之后，勉强湊得几十块钱，买了鉄皮到馬口鉄店去叫他們依設計所規定，指导他們照做。

楊君在民国4年費了半年的苦工，根据平日研究的心得，东拼西湊，最后居然造了兩個电风扇，于是由他的好友袁君持与祝蘭舫君商量，希望他加入些股本，俾得設厂制造，在楊君等以为有实际成績表現，應該易有成議，但事实上却未曾这样容易的如願以償！祝君当时却无意于要造电风扇，只要造禁絕电灯用戶偷电用的“限止表”，因当时苏州、常州、揚州等处都有了电灯厂，祝君是里面的大股東，各电灯厂正亟于需要这种限止表，听見楊君对于电气很有研究，叫他設法創制限止表，以应急需，楊君所辛勤造成的是电风扇，祝君却偏要限止表！楊君因自己經濟上既无力設厂制造电风扇，限止表也是电器之

一种，他也不无多少研究，便暂把电风扇搁开，想法创制限止表，他设法凑了9两银子买一个舶来品限止表做样子，虽然照样做成，但手續既笨，成本又贵，不合实用，只得丢开舶来品样子，自己另想办法创制，经过不少麻烦和研究，居然于民国5年成功，他先把自己所创制的限止表当面试驗給祝君看，祝君認為結果滿意，乃发給苏州电灯厂試用，亦認為結果滿意，遂先定制两千个，言明每个价格5两银子。楊君乃与袁君等湊集数百元的小資本，在橫濱桥弄一家小店开始制造起来，因产品的切于实用，第一批定貨未完，第二批的續定又来，此时店內連助手等，有一桌吃飯的同事，共有7、8人。

这样弄了半年之后，适遇兆丰路元达电器厂因办理不善失敗，楊君等設法湊了一千余兩銀子，把这家厂盤下来，于是在民国6年便由橫濱桥搬到兆丰路，至此規模較大，已有三桌人吃飯，此时除制造限止表外，并修理各种旧电器。楊君到了这个时候，才完全脱离賬房先生的生活，得專心致志于制造电器的事业。到民国7年，他便开始制造发电机和变压器，当时江灣电灯公司使用該厂的出品，因为是項中国貨既切实用，价又較舶来品便宜，所以采用。到民国11年，因营业逐漸发达，原址不敷用，又由兆丰路搬到虹口周家嘴路，即現在华生电器制造厂所在地。在当时厂內同事已达70—80人。

（摘自落霞：“創制中国电风扇的楊济川君”，人物評述，399—407頁，1932年生活书店出版）

抗日战争前华生电器厂，在上海共分6厂：如在周家嘴路有2处，中山路1处，小沙渡1处，檳榔路1处，以上6处，完全制造电扇，——吊扇与枱扇，这两种电扇每天平均可造200只。南翔方面，共分四厂：（一）华明电器厂，制造大小各种电器，如配电板，变压器，电表，断路器，避雷器，电焊机，及家用电具。年来国内各处工厂，定造电器，及铁路局定造火車风扇的，为数甚多。（二）华成馬达厂，專造发电机，最少的馬力，自1/4匹起，以至50匹，100匹的，大小都有，內分交流发电机，直流发电机及礪磁电机等，每天可造发电机10具。（三）联成螺絲厂，專造各式銅鉄机器螺絲，大小代客制造，聞每天可出貨200桶。

(四)华联鑄鉄厂。(五)生明电器厂,为以上四厂电力供給的地方。

(黄密萍:“华生电器制造厂參觀記”,1935年12月13日上海中報)

华生制造电表以前,市上完全是外国貨,定价都在10兩以上;华生开幕后,抱价廉物美的主張,每具定价只有5兩,所以銷路很好,而半年后工厂則逐漸扩充,已由六、七个工人到四、五十人了。但是,在商业竞争中,外国人的傾銷政策是很毒辣的,因为华生电表的暢銷,外貨乃亦不惜低价来竞争,以至电表卖到成本以下的2兩。这的确中了外国商人的压迫中国新兴工业的毒計,在火并的商战中,萌芽期的华生因为成本关系,感到若干的困頓;可是,这就得佩服叶友才等的毅力和精神,他們不独因外貨压迫而被軋出,反若开始制造发电机和变压器。

这是中国自制发电器的开始;因为华生本着价廉物美的一貫政策,当时外貨售价2千兩的机器,华生的只要1千兩,外貨認为可以独占的市場,至此又受一打击。外国电器商自然是一貫的抵抗,一再的减价拚杀,2千兩的机器竟卖到6百兩;这是华生和外貨血战的第二次。

(摘自洽成:“华生电器厂与叶友才君”,1933年2月23日上海申报)

抗日战争开始,該厂奉令内迁,由滬而汉,由汉而渝,在沿途以及重庆,又連遭敌机轟炸,損失惨重,而原有上海、南翔各厂,亦遭轟炸及被敌占据。

(上海机联会編:“中国国貨工厂全貌”36頁。)

該厂于27年底由汉迁渝后,当时以承制兵工厂定制軍需物品为多,嗣鉴于后方各种电器之迫切需要,乃專从事于重要电器如发电机、变压器、电动机、电表等之制造,除由工矿調整处定購者外,尚供給各地电厂及农工业制造厂之用。

迁渝后,原在城区鎮江寺街租賃厂房开工,未及半載即逢轟炸,改迁南岸复工,至29年8月复兩度遭敌机狂炸,厂房全部被焚,損失不少,即于是年冬重建厂房,整理机器,繼續制造。該厂主要出品为交流发电机、变压器、各式电板及电表等。

(国民党四联总处工商調查,1943年12月11日。)

中国亞浦耳电器厂

中国亞浦耳电器厂，初为德人名亞浦耳者所创办（1923年創立，当时职工不足30人——編者）。时設厂于上海倍开尔路之普通民房內。亞氏为工业專家，在德曾任灯泡厂工程师多年，其来华也，盖期在远东制灯泡业，独占鳌头，惜經營不善，亏折甚巨。馴至民国15年，由胡西园出資盤受，改名为中国亞浦耳电灯泡厂。接办之初，便集合同志，日夜研究，无如是时該厂規模尚小，資本仅3万元。每日出品不及1千只，虽竭力籌划，仍难免亏折。旋于民国16年，胡氏适遇交大电机科毕业生馮家錚，自美学习电泡事业归国，因与其合作，努力从事电泡制造之改良，出品始漸臻精良，銷路日見起色。同时更蒙上海金融界巨子之帮助，經濟益覺灵活。民18年春，遂自建厂屋于辽阳路，复添設玻璃部，自制电泡上所用之玻壳、玻管等。是年秋又設电机部于北浙江路。

現該厂之資本金額，已由3万元，而增至50万元，不动产价值已臻于150万元，每年营业总数額約达120万元之譜。职工总数，共計500—600名左右。至于出品方面，电泡一項，在最初每日产額仅千只，現在产量，已达每日25,000只。

（“中国國貨工厂史略”第335頁）

胡西园，浙江鎮海人，曾毕业于鎮海县立中学。据其自己說：“我中学毕业后，曾办过一家恒昌造船厂和一家五金号。民国13年，我因为感觉到电器工业的重要，很想試办；恰巧亞浦耳的厂主德国人有意讓渡，事情就成功了。当我接办的时候，資本只有3万元，后来覺得不够，我就把造船厂和五金号的資本，統統移到亞浦耳来。从此，我就一心一意的把精力与財力，完全用在电器方面，資本也已有5万元

以上了。业务是一天天的发展，可是資本却又感到不够，那时我有兩位知友，一位是王伯元先生（浙江慈谿人，抗战前任中国垦业銀行常务董事兼經理、中国窑业公司、鎮江貽成新記面粉厂、上海通和商业儲蓄銀行、国泰商业儲蓄銀行董事長——見上海工商人名录），一位是梁晨嵐先生（浙江宁波人，福康錢庄副經理），还有一位族人胡祖庵先生（浙江定海人，曾任中国窑业公司總經理），承他們美意，在經濟方面給了我許多的帮助，这时就增加到10万元。不料过了不久，資本还是不敷，所以就开始招股，新旧合計，共有30万元，那是民国17年的事，現在（指1936年）是扩充到50万元了。

注：括号內的簡历是編者加的。
（“工商史料”第1集第17—48頁）

民国20年，該厂于制造灯泡之外，复加制电风扇，馬达，电火爐与电鐘等，因在楊树浦之鄱阳路，設立第二厂，置地15亩，建筑厂屋，制造各种日用电器。

該厂經10余年埋头之苦干，始能由微小之資本，增資拥厚，扩展至宏大之厂基，詎料抗战軍兴，鄱阳路之厂址，毀于炮火，仅存瓦礫，辽阳路总厂內部机器及原料，悉被敌方盜劫一空，复將厂基占領，損失之巨，不可以数字計。

“八一三”战事卒起，創辦入胡西园氏奉命迁厂入川，抗战期間，胡氏在大后方領導各工厂，努力生产，而胡氏自轄之工厂，凡8个單位，除制造电灯泡之外，如热水瓶，玻璃料器，制革化工等各工厂。

27年，乃复在上海小沙渡路，籌設分厂，繼續生产出产品，如各种氬气（即哈夫泡）、可乐泡（即圓泡），生产未曾間断，胜利以后，因过去声誉，出品大有供不应求之势。当时胡西园氏被推为全国工业复員协进委员会主任委員，于34年底飞返上海，首先交涉辽阳路总厂之收回，始由敌伪产业处理局于民国35年7月間准予发还，自收还后，规划全厂修葺，經数月以来，业务蒸蒸日上，并在滬西增設第三工厂，与小沙渡路第二厂同时出品，日后辽阳路总厂，新机裝置完竣，日可出电灯泡20万只左右。

（“中國国貨工厂全貌”第69—71頁）

历年資本：該公司創設于民國8年，資本初为5万元，嗣后陸續增至10万元，16年改組为股份有限公司，增資本至30万元，22年在鄱阳路設立分厂，25年增資至50万元，33年在重庆增資至6,000万元。

（“华股手册”，第217頁）

抗战前董监事：亞浦耳电器厂，于1932年9月9日，在南京路189号，召集临时股東會議，改选董事及監察人，到会股東賀培元、秦潤卿、王伯元、胡組庵、胡西园等2,057权，公推秦潤卿主席，报告开会宗旨，繼由該公司總經理胡西园陈述21年上届营业狀況，并电机部新厂設施計劃毕，各股東遂开始投票选举，結果，張咀英、何谷声、秦潤卿、王伯元、赵仲英、梁晨嵐、胡組庵、胡西园、董占春当选为董事，屠培成、賀培元、戴維廬当选为監察人。

（1932年9月11日上海申報）

抗战结束后董监事名單 董事長：王正廷（国民党前外交部長）。常务董事杜月笙（上海流氓头子，曾任中国通商銀行董事長）、錢新之（交通銀行總經理）、吳启鼎、胡西园。

董事：繆云台（云南富滇新銀行董事長）、錢祖齡、俞佐廷（四明銀行總經理）、吳蘊初、陆崇仁（云南財政廳長）、鮑忠濤。

監察：王震欧、庄仲文、胡組庵^①。

總經理：胡西园。

（“华股手册”第217頁）

① 董监事名單中括号內的簡历是編者加的。

康元制罐厂

我国自制花鉄罐盒，肇始于商务印書館，經短期試办，立即停止，故中国之有制罐工业，实由康元制罐厂于民国11年首先創辦。

（上海机联会編：“中国国貨工厂全貌”，第67頁。）

該厂初为項康元独資創辦。当时資本仅2万元，賃屋于上海有恒路武陵里借作工場，設備簡陋，职工不过40余人。規模虽小，出品頗屬精美，故問世后，深获一般購用者之贊誉。13年冬，适有日人經營之工商制罐厂停办，項乃斥資接盤，而將有恒路老厂迁入，扩充范圍，分为印刷和制罐兩部，其时資產已达12万元。不久，項因事赴綏，厂务日衰，于1、2年間，亏折甚巨；15年，項返滬，积极从事整頓，营业又蒸蒸日上。16年，將厂房余地，添建楼房，人工机械，也續有增加。18年又在厂旁購地建屋。21年又特辟磁花一部，專制搪瓷器及五金木器上所用花紙，規模益大，业务益形发达。

（國貨事业出版社編：“中国国貨工厂史略”卷75頁）

該厂創辦人項康元原系河北人，生于上海，辛亥革命时就学于上海南洋大学，后来到吳淞商船学校学习。他本志在从事軍政界活动，但当时环境却使其失望。于是先与上海的流氓王一亭等办了孤兒院，做了4、5年工作。后又到西北去，在馮玉祥管轄下的張家口担任过运输工作。民国11年創辦康元制罐厂，他的工厂管理方法，在当时被称为最先采用“科学管理”的方法。每日早上他召集职工訓話。厂內定有“厂訓”和“訓練通則”。厂訓提倡所謂“勤、儉、誠、勇、洁”，要求职工做工时不偷懶，只說老实话，自己有过失要改过，和提倡所謂做工与讀書結合等等。在起居、飲食、卫生、勤务、礼节等方面都規定有“訓練通則”，这些通則每个职工必須絕對遵守。如起居通則規定，清

晨聽見搖鈴就要起床，到指定地点等候点名等。此外厂中并組織有所謂义勇軍、童子軍、消防队。这一套管理方法当时曾为一般資本家和国民党要人所称贊。实际上这一套管理方法是資本主义的同时又夾杂了管理孤兒院和管理旧軍队的混合品。

(摘自“康元制罐厂調查材料”)

該厂初創时規模甚小，民国13年盤买了日本人經營的制罐厂，17年增資为40万元，22年9月改組为股份有限公司，增資为100万元。23年4月收买了香港华益制罐厂，改为香港分厂，同时添設玩具制造部，并在揚州設厂制醬菜。同年11月又收买北門鎖鑰公司，改为五金部。24年3月設立天津分厂，并增資至150万元。26年再增資至200万元。“八一三”上海战事发生后，华德路总厂被毀，后拉都路、福煦路及武定路三处房屋作为工厂，恢复营业。至31年始归并于武定路一处，同年10月增資至中儲券1,000万元。32年9月再增資至中儲券4,000万。34年又复減資本为1,000万(中儲券)。1947年調整資本为法币1,000万元。

(中国征信所編：“华股手册”第230頁)

該厂初創时，只有制罐部，出品只白鉄罐一种。自民国13年扩充营业，出品除白鉄罐外，有花鉄罐、各种五金、門鎖、玩具等。抗战前老厂設備計有大小机器一百五、六十部，抗战后增至457部。

(見1932年9月4日申报及“华股手册”第230頁)

历年营业，初創时全年仅3万元，次年增至5万元，民13、14兩年因办理不善，年銷跌至3万元左右。15年又增至6万元，18年再增至12万元。此后即逐年猛进，計17年30万元，18年55万元，19年67万元，20年达百万元，21年90万元，22年百余万元。23年項康元又亲赴星加坡、檳榔嶼、泰国等处，設立代理处。

(“中国国貨工厂史略”第76頁)

該厂自21年改为有限公司后，增加了股东有薛篤弼(官僚)、王曉籟(流氓，上海市商会长)、林康侯(銀行家兼官僚)、張公权(中国銀行總裁)、王志莘(新华銀行總經理)、唐佛哉、裴德潤、簡玉阶(南洋烟公

司經理)、勞敬修(買辦)、龔季通、潘仰堯等。22年選出之董事為簡玉階、史海峰、胡文虎、王志莘、薛子良、項康元(兼總經理)、洗冠生、裴德潤、梁國昌、唐佛哉、張公權、鄒敏初、阮維揚、馮炳南。監察為王曉籟、朱吟江等。

(見1933年9月26日申報。括弧內的注是編者加的)

1947年董事長為周宗良(浙江鄞縣人，德國謙信洋行買辦出身，曾任中國銀行董事)、董事史海峰(久鰲，中國銀行經理)、王志莘(新華銀行總經理)、張公權(中國銀行)、杜月笙、馮炳南(大振航業公司董事長)、高朗文、鮑國昌(信誼藥廠董事長)、簡玉階(南洋煙公司)、錢新之(交通銀行董事長)、朱吟江(曾做怡和洋行買辦)、項康元、阮維揚、洗冠生(冠生園)等。監察為王曉籟等(流氓出身，上海市商會會長)。

(“華股手冊”230頁。董監事名單中括號是編者加的)

尹致中及其經營的制針制釘事業

尹致中先生系山東萊陽縣人。民國13年，東渡至日本廣島市入制針工廠，學習制針技術。至民國17年返國，首在青島創辦“忠記制針廠”，旋以各種條件之不完備，發生種種困難，復因經濟準備之不充足，多次波折而擱淺。尹氏不以此稍具灰心，一再努力，于民國20年在青島另集資金，創辦“冀魯制針廠”。當時日貨在我國傾銷，尹氏以非研究出品優良，得用戶歡迎者，不足與其競爭。乃不辭勞苦，自己深入各鄉間，訪問使用者之情形，以實地考察之經驗，復憑其自己熟悉精良之技術，專心研究，不獨注意品質之改良，且對於機器，亦細心研究，經時2年，發明CCR式“連三制針速度機”，該機除速度增高外，且能省工減料，減低出品成本，得有前實業部頒給一等獎章，并給予專利權。民國23年，尹氏在青，又創辦“中國興華實業工廠”，除制針外，另設機械場，專事研究製造新式機械。

“七七”抗戰後，27年乃在上海租界創設“大中工業社股份有限公司”。戰事西移，29年至重慶，另創設“大川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該公司情況見前述），除先設制針廠外，又逐步增設機械廠及石棉製造廠。32年尹氏受經濟部之委託，在成都設立制粉工廠，專事供應盟軍之空軍所用。同時以地方需要，又增設機器榨油廠。茲將尹氏所辦各廠列表如下：

廠名	所在地	出品	廠名	所在地	出品
冀魯制針廠	青島	針、釘	大中實業工廠	香港	針、鈕扣、 羅絲釘
中國興華實業工廠	青島	針、機械	大川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重慶	針、機械、 石棉
大北制材廠	青島	木材	大星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	面粉、榨油
大中工業社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	針			

（摘自言志：“初訪制針大王尹致中”，新世界月刊1946年12月号）

上海華商電氣公司

上海華商電氣股份有限公司，系由內地電燈公司及華商電車公司合併改組而成。當前清光緒30年時，上海馬路工程局總辦翁子文太守發起于局中設電燈部，購小電機一座，安置于十六浦橋南，供發電之用。此為南市有電燈之始。至32年改歸總工程局接管，月須虧蝕五、六百金。長此不已，勢難持久。經議會公決，歸張君逸槎專理其事。張君以電燈營業前途未可限量，必集股擴充，改為公司性質，始能維持不敗。詢謀僉同，一日間即得10萬元之股金。會其時有發議不必大舉者，故僅以此數為限，不然尚可增多。股款既已認定，議以紫霞殿為設廠安機之所。張君即與該廟住持奇緣僧議定以小石街海因庵為交換。商妥后即鳩工拆卸。不意奇緣之徒永清，出而反對，四出運動，因而涉訟。年余得兩江總督委員商笙伯君查辦，批令知縣會同地方紳士估價，另加給奇緣銀若干元，始得寧息。同時購機設廠，至33年8月接綫開燈，是為內地電燈公司正式成立之始。其時風氣未開，經張君惨淡經營，不及1年，用戶日多，機力有不敷之虞，始添設分廠于斜橋望道橋兩處。擴充需款，原有資本不敷周轉，因向汇丰抵借洋款。張君又以年老多病，于宣統3年告退，由董事會另舉陸君伯鴻接任，又以張君為手創公司之人，慰留襄理一切。而民國元年得民政總長李平書先生之允許，復開辦電車營業，即購用電燈余電以行車，定名為華商電車公司，與內地電燈公司各不相涉。不數年間，燈車俱有起色。其后經兩公司股東之同意，始合併改組，而今日之華商電氣股份有限公司，因以正式成立焉。

公司與市政廳訂立合同（總工程局改名市政廳），得在市政廳所轄區域內行駛電車。如市政廳欲于規定之路綫外另設新軌道，必先

將情形通知公司。如公司不願承造，則市政厅有权另招他人，惟不得損害公司已有路綫上營業之權利，且距離公司路綫200公尺之內，他人不得另設軌道。又公司中軌道電杆電綫及關於電車工程——各種車輛，皆有免納地方稅之權利，并可經市政厅允准得電車內收取張貼告白及印刷品費，惟市政厅得抽提公司每日進款內3%為報酬金。以上一切權利，以30年為期，自公司開車之日計算。期滿後或由市政厅購回自辦，或歸公司續辦，或招他人承辦。

資本總額定40萬元，作為4萬股，每股10元，先收20萬元作為優先股，其餘為普通股。此事發生於電燈公司，故招股以一半盡電燈公司老股東，不願者听。凡招滿優先股百股者，酬以紅股五股，不發官利，只給紅利。所有股本官利，常年8厘。年終結賬，於次年春間報告賬略後，即登報發息。

（摘自譚楚：“上海華商電氣股份有限公司之調查”，
“上海總商會月報”第3卷第4號1923年4月）

華商電氣公司的前身是內地電燈公司，再前則是官辦的發電廠，在前清光緒年間由馬路工程善后總辦創辦，廠址在十六鋪，光緒31年歸并到總工程局，那時已有電燈一千多盞。次年由張逸棧等接歸商辦，改稱內地電燈公司，把廠址移到紫霞路，到民國7年，由總經理陸伯鴻和那時南市的華商電車公司合併，改為今名。

華商電車公司，也由陸伯鴻創辦而自兼經理。那時備有1,600瓩的氣輪發電機一部，裝在車站路，自行發電，供給電車，并把多餘的電售給內地電燈公司。

兩公司合併後，發電量日增，并与當時上海市府訂立合約，特許於原有滬南區外，將漕涇涇行兩全區及法華蒲松兩區內之一部分擴充為營業區域，延長專營期限至民國49年12月31日止。後以營業需要，於24年10月，勘定吳淞園路、浦濱為新發電廠址，并与西門子洋行訂購15,000瓩汽輪發電機兩部，又向拔拍葛鍋爐公司及斯可達洋行訂購蒸汽鍋爐等件。到25年底，用戶統計已達50,490戶，是年售電共計76,127,519度，原有20,000瓩之發電設備已不勝負荷，臨時向閘北水電公司購電補充。

迨發電廠建築甫竣，運來機件正在裝置時，“八一三”戰起，遂告

停頓。日寇將所有新旧发电設備及車輛軌道拆遷一空。6,400 瓩及 3,200 瓩发电机各一部被遷至北京石景山电厂；后为国民党資源委员会华北鋼鐵公司接收。6,400 瓩发电机一部被遷至山东博山神头发电所；后为国民党資源委员会淄博矿业公司接收，原有 1、2、3、4 等路電車，路綫共長 22,745 公里，馬达電車 54 輛，拖車 27 輛，悉被日寇分移于上海英商電車公司，天津比商電車公司及北京华商電車公司，34 年 9 月 17 日，由原公司接收复業，向上海电力公司購电轉供。35 年 2 月 5 日正式发还該厂，但被遷走之設備迄未发还。

該公司在 37 年有 1,440 瓩发电設備，是向龙华水泥公司租来的。当时，水泥厂因營業不景气而停工。兩公司訂立 3 年之合同，同时規定如水泥銷路好轉，水泥公司复工后，华商电气公司必須供給水泥公司 6 百瓩电力。由是华商的龙华电厂才告成立，技師由华商派来，工人則仍是水泥厂的雇工。

战前該公司的主持人是陆伯鴻。陆本是閩北水电公司的總經理，抗战期間陆被暗杀（据說系国民党軍統特务所为）。抗战后，由浦东电气公司董事童受民接收因他有股权。他頗有野心控制华商电气公司。但沒有几月，由于杜月笙手下一批門徒的恐吓威胁，他就离开該公司，这样华商电气公司的全部大权重又复到杜月笙的手里，抗战结束后杜为該公司的董事長，總經理为黄炳权。

資本：民国 7 年为 100 万元。至 23 年 3 月第 4 次增資为止，共 600 万元；26 年 3 月，增至 800 万元，計 80 万股。

（摘自“华商电气公司調查材料”）

附：陸伯鴻簡歷

陆伯鴻原名熙順，1874 年生于江苏，上海实业界之有力者。与上海犹太人有密切之資金关系。陆为前清秀才，在上海法租界之中法中学毕业后赴法国留学。归国后入华商电气公司为工程师，后被推为董事長兼總經理。此外并兼任閩北水电公司、浦东电气公司、上海內地自来水公司、大通仁記航业公司、新和兴鋼鐵厂董事，和兴碼頭堆棧公司董事兼經理，圣心医院院長，上海法租界工部局華人董事等职。

（摘自藤田亲昌等編：“中国問題辞典”人名辞典 81 頁，1942 年 3 月出版）

上海閘北水电公司

在前清光緒末年閘北居民見租界自來水之便利，擬接用租界自來水，而當時租界方擬擴充租界，對於華境居民請求接用自來水者必須強令承認編釘租界門牌，繳納租界巡捕捐，當時上海道徐南屏鑒於華界主權之喪失也，曾提出抗議不果，為維持主權計，議組織公司饋用租界自來水，派員與上海自來水公司接洽，而該公司稟承工部局意旨，拒絕間接饋給，非直接接用不可，以上情形散見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1906年，至宣統元年報告遂由地方人士稟准兩江總督籌設閘北水电公司，此為閘北有自來水之嚆矢，而當時租界工部局仍極力阻撓該廠之成立。

前清宣統2年，地方人士因公共租界工部局指使上海自來水公司越界埋設水管，因而編釘門牌，征收巡捕捐侵犯主權，呈准兩江總督張人駿檄行滬道撥借官款，照會邑紳李平書等組織閘北水电公司，聘Max, M. Engel 為工程師，於閘北恒丰路底購置民田16畝，建築廠房，取水吳淞江（俗名蘇州河）裝置水电機器，先後提撥官款銀10萬兩，連同借入商款共用銀26萬兩，至宣統3年9月成立，其出水量為每日200萬加倫，此時公司每日供給10萬人口，計每人每日可用20加倫，曾預備擴充，如再加規銀15,000兩即可供給50萬人口，而時鼎革，集股為難，旋於民國元年將全部廠房機器向日商大倉洋行抵借款項40萬兩，原議備作擴充水廠之用，復為軍事挪移，擲諸虛耗，廠務遂益陷於困難，民國2年，政局紛擾，公司經理李君倉卒離滬，廠務無人主持，復以延欠大倉債息兩期未付，日人借口合同規定，擬即乘機攫取，地方人士鑒於情勢危迫，不易收拾，爰請願省署負責清償債款，收歸省辦。

省辦時期 省公署接收後，即於3年4月撤銷公司名。改名江蘇

省立上海閘北北电厂，遴委厂长办理，嗣后閘北市面日渐兴盛，水电需要量随之增加，厂务亦逐渐扩充，惟以困于财力，未能统筹全局，应付需要，加以吴淞江水源日涸，沉淀无方，涓细恶流，居民嗟怨，地方人士遂于11年春再行请愿江苏省署及省议会，改归商办，一面组织商办閘北水电公司筹备处，招集股本，12年秋由省署咨请省议会，议决改归商办，13年9月实行移交公司接收。

商办时期 公司于13年8月组织成立，定名商办閘北水电股份有限公司，股本总额计银400万元，先收2/4，即行开办，同年9月1日接收省厂计缴全部厂价1,280,827元，营业权代价60万元，营业区域规定为东北沿黄浦江至张华滨，西南沿吴淞江至董家渡，东南毗连公共租界，西北达彭浦江湾等镇乡，面积袤广400方里；人口20万。

初公司拟通管于北四川路以东之华境，而工部局为图扩充租界计，特强不许公司掘动越界筑路路面以埋管，当时公司经理李平书先生愤而诉之于领事法庭，领事团不能违背万国公例，断绝住民之饮料，判令工部局发给公司需要之掘路执照，公司虽幸得直，而工部局终逞狡阻挠，当时公司原拟接通虬江路东宝兴路及横滨桥三处穿过北四川路，仅得虬江路埋六吋管一綫，工部局已借故翻悔，阻止工程进行，公司乃连夜于横滨桥下通过六吋管一綫，而东宝兴路（当时称老淞）已不及动工矣，所有北四川路以东之华境内居民自民国元年至16年間因干管太小，水量不足之故，不得不接用租界自来水，直至16年7月上海市政府成立，因居民邵孝慈不愿缴租界巡捕捐，被工部局停止水电，经市公用局与工部局交涉，结果始克于东宝兴路埋12吋干管一綫，此17年8月事也。19年3月又经公用局交涉于士庆路添埋8吋管一綫，于是北四川路东西两边之华境，始得沟通顺畅，住户称便，而引翔镇仍未通达，因于18年9月自天同路埋管，穿过狄思威路以达引翔，又至东体育会路埋20吋管，经欧阳路以达天同路，两头沟通，水利充畅，更埋支管西迄施高塔路，东抵沙虹路，所有引翔一镇，完全通达，此项工程至19年9月底完工，租界之上海自来水公司至此亦知越界筑路不复可恃也，乃向公司接洽，愿将閘北全部越界给水，自动交

还于公司。其条件亦至9月底始大致磋商就绪，此乃工部局图借越界给水以扩充租界政策失败之归宿。

(摘自朱有霖：“上海商办闸北水电公司之新水厂”，
中国建设第3卷第2期，1931年出版)

“八一三”战事爆发，该公司首当其冲，其后淪入敌手，日本人組織伪华中水电公司，将闸北作为其北部支部。1945年8月战争结束，先由国民党上海市公用局接收，后经原经办人交涉，于1946年2月发还原主，其时公司器材已被盗卖一空，设备支离破碎，锅炉发电机等均已损坏，水厂8百匹馬力及250匹馬力电动唧机各一座又被官僚资本挤往南京水厂，屡经交涉而未能收回。

该公司初創时股本(1924年8月)，額定为400万元，实收1,311,950元，此已收之股本即全部作为优先股，每股10元。其后，因建設新水厂、电厂及增加设备，陸續增資至1930年止实收400万元，1931至1933年二次增至600万元，1953年至1937年又增至900万元。

1945年日本投降复业后，資本仍为900万元，1947年6月重估資本为270亿元，分为27亿股，計优先股262,390股，普通股2,699,730,000余股。其中主要股东如下：

孙煌峰	裕康企业公司	702,526(千股)	施鍾元	30,925(千股)
李道南	上海交通銀行	91,818	顧雨江	20,950
王兼士	公司董事	113,457	罗叔澄	20,000
雷怀德		49,240	繆天行	14,550

其中銀行持有股票者：

代 表	股数(千股)	代 表	股数(千股)
国华銀行 張邦鏞	213	交通銀行 李道南	91,818
国华信托部 沈新榮	11,268	綢业銀行 王延松	1,300
上海儲蓄銀行 陈光甫	300	茂华商业銀行 朱彬元	3,600
女子商业銀行 严叔和	360	金城銀行 王梓笛	3,000
新华銀行 徐振东	9,549	浙江实业銀行 俞軒堂	1,000
浙江兴业銀行 向錫璜	2,028	通商銀行 孙子鏞	15,000
浙江兴业銀行 王萃耕	200	惠中商业銀行 黃綏隆	100
浙江兴业銀行 貝新作	960	中一信托公司 严成德	3,822

董監事名單：

董事長：錢新之(交通銀行)。

董事：李銘(浙江興業)、李叔明(農民銀行)、繆天行、王子崧、浦心雅(交通銀行)、姚啟聖、陸子冬、劉聘三、王兼士、孫煜峰(裕康企業公司)、顧麗江、金翰齋、施丙之、竹森生。

監察：唐伯文、施博群、李濟生、潘仲麟、童沖周等。

(摘自“湖北水電公司調查材料”)

广州电力公司

广州市商办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前名粤垣电灯公司。于前清光緒31年由英商旗昌洋行承办，其营业区域以广州市为界，河南沙面在內。依原訂合同，声明專利30年，至25年后可將公司全部生財产业，备价买回，其价值应照公司每年溢利15倍計算等語。嗣以开办数年，不洽輿情，乃由前清司道提議籌集官商股本150万元，收回自办（編者按：广州电力公司轄厂两个，一是美国华侨黄秉常于1890年稟准张之洞开办，另一厂是光緒31年旗昌洋行創辦，后由清政府集官商股本收回自办，两个厂合并为一个厂。1932年該公司股东有鄒敏初、蕭冠英等，鄒，广东大埔人，曾任广东省财政厅稅务股主任、广东中央銀行行長，蕭曾任中山大学教授）。其时据該公司称每年約有溢利12万元，以15倍計，約在180万元，原索价值港币150万元，經再四磋商，減至港銀133万元，連补銀水合广东毫洋 1,442,942.0005元。当即定議將存貨机器及各項合同厂屋图說开列清單，妥訂合同，于宣統元年5月18日签字。即以官商合股150万元，向該行將电灯公司贖回，接收自办。遵照商律，拟訂章程，詳請稟咨立案。当接办之初，用戶尙少，月收17,000元，入不敷出。宣統2年，灯数目見加增，营业情形，頗有起色，收支相抵，略有盈余，宣統3年值3月29日之役，粤垣风声鹤唳，富戶紛紛他迁，营业衰落，每月收入驟減4千余元，損失頻仍，收支复絀。計一年間，被用戶暨各机关积欠灯租裝費数逾9万元，加以历年积欠，共約10万元以上。民国元年，秩序漸复，营业漸有起色，計收費27万余元。2年，市內用戶，日見推广，收入45万余元。是年添机拓厂，增設街灯等項，共投資24万余元。3年，用戶益多，收費75万余元，机力又感不充，乃向美国訂購500匹馬力油机兩架，以免求过于供。4年，

收費69万余元，是年因添購油機兩架及各機件，共投資23万余元。5年，將油機兩架裝妥，收入共75万余元。所有分別展布各街燈綫及增加變壓機等項投資14万余元，又擴充機廠及添配機件11万余元。六七兩年，收費各100萬元有奇。是時機力又漸不敷，因向上海慎昌洋行訂購3,300匹馬力透平發電機兩架，同時先購現貨200匹馬力油機一架，以濟眉急。8年收費111万余元，情勢更見發展。是年經股東會議決議以公司自開辦起，截至本年止，股東應得溢利75万余元。而歷年墊本將及百萬，此次添購3,300匹馬力發電機兩架，連擴充機廠種種費用，須140萬元。原集股本僅150萬元，實不敷用，應將股本增至300萬元。除以歷年股東溢利75萬元，分填股票派給股東外，另由股東按照原有股份每股先加3元，續加2元，充成300萬元之數。民國8年，官股招商承買，完全退出，該廠遂成完全商辦。同年9月26日，省長公署訓令，以此項官股，既經悉數提變，則電力公司即屬完全商辦，所有官委督辦及官派查賬員，應一併撤銷，令即更正商號名稱，按照商辦性質，遵依現行電氣事業取締條例，暨公司條例，分別修改，另行妥備各項圖書文件，呈候核准立案。該公司當即改名為廣州市商辦電力股份有限公司。近10年來，該廠增加設備，機力已擴充至16,000余基羅瓦特，最近全年收入約400萬毫洋，發電6,250萬度，實為華南最重要之電廠。

該廠工程設備，全用美國標準，其發電機為奇異公司所制，周率為60，電壓為2,300伏。開辦之時，計有複式蒸汽引擎4座，每座馬力為175匹。其鍋爐為200匹馬力水管式者4具。又復兼用柴油機，計200匹馬力四沖程提士引擎6只，300匹馬力者1只，及500匹馬力者2只。所有發電機除兩座500匹馬力者系三相改作單相外，其餘均為單相60周波。總計單相送電綫，共有19條，高壓2,300伏，低壓110伏，220伏（現改120伏，208伏）。各發電機之運轉，各自獨立不相連接。惟為供給外界大批電力需要起見，此種小機器，實不經濟。乃加裝透平發電機以謀發電費用之減省。新廠最初設計預定有3萬基羅瓦特之最後容量，現有容量為16,000基羅瓦特，計2,500基羅瓦特者二具，5

千基罗瓦特者一具，6千基罗瓦特者一具，均为美国奇异公司出品。

20年夏，又向上海慎昌洋行添購1千匹馬力鍋爐一具，6千基罗瓦特透平发电机一座，全厂总容量，不久可达24,000。

該厂原有股資150万元，后以事业扩充，增加至300万元，其固定資產，据20年年度最近报告，为452万余，相差計150余万，全部仰給于銀行透支。近复加增6千基罗瓦特透平机，及增設河南分厂，投資額不在少数。19年冬，广东省政府議決，自20年1月起，以2年为限，期内每用电一度，帶收附銀一角，付足股銀7元，核給10元股票一股，与旧股东同等待遇，一方面既可借以籌集股資，以謀扩充，一方面用戶全体投資，亦可使公用事业归之公有，消費合作，共同維護，用意至善，兩年間以售电4,000万度計算，可得現款400万元，足以謀長足之扩充。該公司历年分派股息，不甚优厚，第一、二届股息均8厘。第三届无息可派。第四届股息4厘。第五、六、七届股息均8厘。第八、九届股息8厘，并加派溢利2厘。第十届股息8厘，溢利5分，以溢利加股，移作資本。第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届股息均8厘。第十六届股息8厘，溢利9厘。第十七届股息8厘。第十八届股息8厘，溢利1分2厘，惟現款缺乏，溢利无从分派，仅发期單，作为付項。第十九届股息7厘，其时財政益形竭蹶，亦发期單，一再逾期，未能支付。第二十届无股息开派，收支相抵仅余56,561元6毫7仙。第二十一、二届均无股息。二十一届亏蝕15万余元。二十二届盈余約10万元。利息不优厚及亏蝕原因則为用户欠費，用户偷电，发电成本过高，配电設備欠佳，公司資本过少，管理欠善，暨紙币等損失。其历年意外之損失，为數亦頗可观，18年以前，历年每遇紙币低折，電費仍按十足收入，此項損失共达百万余元。

民国19年，該公司发电度数为62兆492,220度。实售电量，以包灯加入估計之为21兆68万零20度，耗損达65%以上。配电設備不佳，虽亦为耗損原因之一，而最重要者，实为私灯与偷电。据历年統計，其耗損百分数約如左表：

民國12年	41.59%	14年	56.35%	16年	66.42%	18年	65.25%
13年	49.27%	15年	63.29%	17年	65.36%	19年	65.31%

電力損率年有增加為該公司前途最危險之現象，而歷年用戶欠費為數甚巨，民國12年底改組會計簿記，年底繳去欠費 291,506元9毫8仙。13年底，繳去359,406元2毫2仙。14年底，繳去396,885元3毫2仙。15年底，繳去 374,329元3毫1仙。16年底，繳去 255,530元4毫3仙。17年底，繳去 525,932元1毫8仙。十八十九兩年，經竭力整頓后情形稍佳，計共繳去40余萬元。合計8年以來呆賬損失在260萬元以上。公司之不能獲利，此乃重要原因之一。電價成本，常在二毫以上(以抄見度數計算)，19年度亦達1毫9仙，目下廣州市電價每度毫洋2角，對公共地方用電或全部免費或減1/3，電力用戶，另訂合約，電價在1角左右。包燈16支燭光者，月收毫洋1.5元。包燈每盞每月電費洋5角，修理材料歸市府負責。

(摘自國民黨建設委員會編：“中國各大電廠紀要”49—53頁，1931年11月出版)

成都电灯公司

成都市区内，电灯事业，創始于前清光緒32年，川督錫良，于省城銀元局內，安設发电机，就厂內蒸汽发动机，拖动电机发动电，耑供督院內之用。34年川省行政当局，提倡实业，奏設劝业道，以資督飭一般工厂事业。乃有人紛紛集資籌設股份公司，內中則有商业場电灯公司之設立，其性质屬于商办，籌集股本2万兩，購机发电，耑供自建場商业內用戶之用，其发起人，亦即当日劝业道周善培。是时商业場为一地产公司，自建之小市場：其創辦入組織該場发电厂之意旨，不过仅供該場之用，无供給全市之能力。及至宣統元年，始經陈嘉爵等16人之发起，集合投資創辦，遵照部頒条例，組織启明电灯股份有限公司。一面援照重庆燭川公司之例，呈請咨部注册給照，規定成都城廂內外，为該公司营业区域。一面虽經核准开办，一面即于宣統元年4月初一日，向上海瑞生洋行，訂購60匹馬力发动机，及十启罗瓦特电机等項并擇中新街修建厂房，工程既竣，即于宣統元年12月发电燃灯，是为成立之始。及至宣統2年，裝置电灯之用戶，日漸增多，大有供不应求之势，遂購20启罗瓦特直流电机一座，机关車鍋爐立式引擎电板等。民元以来，电气事业，日益进展，又購75启罗瓦特交流电机，及100匹馬力发动机，110磅鍋爐等，裝置成功，突遭民四城內罗戴之战，公司方面，損失甚巨。嗣后幸能撑持危局，維系一、二年間，始有一綫生机。直至民八、九，扩大組織，复購厂址于外东，先后訂購交流电机，及拔撥葛厂鍋爐等，該公司資本总额，原定国币30万元，分作6万股，每股5元。当前清宣統元年开幕时，仅收足股本6万元。嗣后历年递增，截至本年，已收足股本232,700元。

組織 該公司为股份有限組織，并依照公司章程第四章股份有

限公司所規定各條款，定立章程。

營業概況 該公司 19 年度，營業尚屬平穩，統計全年收入燈費 128,665 元，除各項開支外，計純益 18,041 元。其盈餘分配，以 17,139 元，發給股息，其餘 902 元，悉數提為公積金。

用戶統計 該公司全市用戶，共計 2,908 戶；共用燈數 6,543 盞。

主要機械 該公司主要機械，計鍋爐 3 座，2 座各 1.010 呎，一座為 437.5 呎之傳熱總面積。原動機 2 座，一座為 300 馬力，一座為 110 馬力。發電機 2 座，一座為 200 基羅瓦特，一座為 75 基羅瓦特。

本年發電情形 本年發電總數，為 623,420 度，最高負荷，為 305 基羅瓦特。至燃料種類，多為煙煤，約消耗 5,757 噸。平均每噸燃料價格，約合 24 元。平均每度燃料消耗，約 10 磅。每度發電成本，約 0.278 元。

（摘自中國銀行重慶分行：“成都啟明電燈公司調查報告”，中行月刊 3 卷 6 期 1931 年 12 月出版）

長興煤礦

長興煤礦原為長興之商界巨子鍾仰貽君所創辦，股東都是以前浙省之軍政各界重要分子，開采多年，損失不貲，蓋以該礦開采之煤，多為直徑，而所出之煤，中間多含沙質，又因硫磺太重，以致銷場并不見佳。

（“中行月刊”5卷5期第114頁，1932年11月出版）

該礦在湖州長興縣屬之南皋四畝墩。民國紀元，由鍾仰貽君創辦，繼由劉長蔭君接辦，後因經費困難，商同朱葆三（買辦出身）、劉萬青、易楠植諸君公司組織公司，于民國7年1月成立，惟當時辦理頗費周折，工程未免延緩，近兩年來，竭力經營，布置均已就緒，復聘德國著名礦師畢象賢博士為工程師，因擴充礦區，添置機器，曾于上年4月，由股東會議決，增加股本110萬元，由原股東攤認，連同原股本共計330萬元，并照畢礦師計劃，積極進行，爰將前次參觀所得，略述于下：

（一）出煤預算，查該礦區面積已有74方里，目下擬增之礦區尚不在內，照畢礦師預算，每方里可采烟煤100萬噸，單就現有礦區而論，可得煤7,000余萬噸，若每日出煤2千噸，足供百年之開采。

（二）工程計劃，老井一座名芳濟井，因出煤日久，木架稍有損壞，故于老井左邊，開一新井，達現在出煤之平巷，至210米達，橫開平巷，分為南北兩巷。

（三）出煤時期，照該礦現在工程預計，今年1月至3月，每日可出煤150噸，4月至6月，每日可出煤300噸，7月至10月每日可出煤500噸，11月至年底，每日可出煤800噸，今年內將出煤機件安置完備，即可日出煤千噸。此指該礦第一部工程而言，至第二部工程進行，計三年

后，每日出煤可达2千吨以上。

(四)鐵路建設。查該公司鐵道，由長興五里橋至新礦廠，有52華里之遙，車頭鐵軌枕木等項均購自外洋，約3月間即可完工，以後每日可運煤4千噸。

(滄新：“參觀長興煤礦記”，錢業月報2卷1期，1922年2月出版)

查長興煤礦開采始於何年，無從稽考，但該地煤市名稱，至今猶存，可知當年開采已有成績。嗣因鄉人惑於迷信，於乾隆9年呈請官廳封禁，載在志乘。厥後風氣漸開，於宣統2年間由本地紳商集資銀洋四千元用土法重行開采。旋因資本不敷，不能進行，以致停頓。彼時鄂人劉長蔭君適經理申湖杭湖航業公司，因與長興紳商接近，而長興紳商遂商諸劉君出資承辦。劉君深知開礦非資本雄厚，不足以利進行，亦遂置之不議。後劉君與友談及，友人極力慫恿，並允擔任籌借銀40萬兩。劉君對於煤礦本甚注意，因有友人擔任借款之後盾，遂於民國2年間先行墊款設法興辦，一面與就地紳商訂立合同，一面向官廳註冊，開始仍用土法。詎知開辦數月，友人承認之借款不特影蹤全無，反被騙去銀千餘兩。劉君憤極，不得已勉自承辦。至民國4年，延請德國礦師畢象賢計劃全局，又請德國礦師庫賒(譯音)駐礦督率開采，並令其子立德君隨同習練。後因歐戰發生，我國加入戰團，勒令德人回國，又聘法人龔達明為礦師。至民國6年經過老坑達至大煤煤層厚度第一層4尺5寸以上，第二層7尺5寸至8尺以上，且已出煤千餘噸。劉君方欣辦有成效，不料其子立德君因觸煤氣殞命，礦師龔達明又因意見不合辭職。數年間礦師更替，非常困苦。劉君因經几載艱辛，且痛子情切，是以當時有國人願出200萬金，購此礦區，亦有某國人願出資合辦，而劉君一概謝絕。蓋劉君以為如合外資，不獨有負當年倡辦之苦心，且亦無以對以身殉礦之兒子也。爰取公開主義，有組織公司之意。迨7年3月公司成立，議定資本為220萬元。劉君與發起人立訂合辦礦業合同，遵照有限公司條例辦理，舉朱君葆三、劉君長蔭、朱君志堯、劉君萬清、虞君洽卿、劉君漢濱，易君楠楨、沈君先立、黎君秉經、胡君英初、袁君仲符為董事，並推劉君長蔭為總理，劉

君万清为协理。議明刘君長蔭名下以全矿矿区及种种設備作資本100万元，另招新股120万元。后因股東會議時有人提議，刘君以矿区及設備作資本100万元似欠平允，經公眾討論，公決刘君資本以七五折算，所招新股亦以七五交款。嗣又因資本不敷，續招110万元，現只收到30余万元。此調查刘君長蔭承办長兴煤矿之經過，及添招新股之情形也。

（盛竹书：“長兴煤矿調查記”，“上海总商会月报”第2卷第7号，1922年7月）

峰 峰 煤 矿

早在民国以前，峰峰地区即有許多小窑。民国20年，怡立公司經理楊以儉，在峰峰、西佐一帶收买矿場，經營50余座小窑，雇用工人2,000余名，采用手工业方式开采，每天能产煤300—400吨。以后怡立公司扩大經營，运用机器开采，工人縮减至1,200人，产量比以前提高了几倍。民国9年，怡立公司經手修筑西馬铁路，煤的銷路，由豫北推銷到平汉沿綫，公司由4輛輕便的列車，增到每天用12輛火車向外运煤，而平汉路中每天則有300—400輛大車来裝煤，平时不为人所注意的峰峰鎮，成了車馬如流的繁盛市場，煤的銷路遍及河北、豫南、湖北、武汉等地，每日产量在1,500吨以上。除供輪船火車动力使用外，大部运往武汉作煉鋼之用。抗战前，峰峰煤矿完全是由北平临記洋行經理楊以儉，临記洋行买办李墨卿等一部分商业資本結合北平实业部的“官資”兴办起来的。楊以儉經理怡立公司，大奸奸曹汝霖是董事。到民国18年，共投資480万元，經營有东大井、大安坑、18号井、19号井和16号井，其中以东大井产量最大。李墨卿經營的中和公司，也在峰峰西南傍西山一帶，收买矿場，开办通余井（即南大坑）、双和井，工人在1,000以上，其产量和矿山建設規模，均不如怡立公司。还有所謂“官工局”矿井。

抗战以后，敌人还没有到来，国民党失敗主义者中央技术委员会宋某，来把矿山仅有的几部蒸汽机和水泵摧毀了。全部矿井，即遭受了大水淹沒。日寇搶占了峰峰煤矿后，在他“以战养战”的掠夺政策下，施行“軍事开采”。敌人用一个大队兵力，沿孤山建立兩道封鎖綫和縱深的防御体系，保护矿区的治安；从27年春天开始，即强迫工人用高車抽乾新記井和通順井的大水，以后为了便利他的掠夺，由軍管

理兴中公司建立200基罗瓦特发电机，运用电泵抽水。经过一年多功夫，敌人从平津和关外运来了新式电动机、抽水机，通顺井才开始采煤了。敌人强迫工人们从冰雪中修理坑井。到32年，敌人在太安坑建设500基罗瓦特发电所，安置好电泵和四部高车。工人们开始用木头从窑底里一步一步的架上天柱来出煤。在开采中，敌人不顾工人的死活，不管坑道建设，使坑道常常塌下来压死工人。工人在敌人压榨下，普遍的“磨洋工”，所以敌人投了资本800万元，但出煤产量除通顺井赶上中和公司经营时代产量外，全部产量每天没有超过怡立公司的总产量。民国32年以后，敌人把军管理改为磁县煤矿股份有限公司，曾经引诱怡立公司经理杨以俭拿出股票中日合资经营，并设法贱买中和公司的矿产，在临水兴修五千基罗瓦特发电所，准备把峰峰观台出产的煤与磁山铁矿联接在一起，并利用当时沦陷区普遍严重的灾荒招募苦力，实行“增产运动”，工人数目增加到六千以上。敌人在名义上给工人配给粮食，但事实上除一般职员和矿工可以贱价购买配给品外，一般下窑工人，每天只发给一公斤豆面饼子，挖炭工人不但吃不饱，而且一下窑喝了冷水都病倒了。在灾荒年间，每天都有大批工人被饿死，最多时每天饿死40—50人，工人当时死亡率占全部工人1/2。所产煤炭，敌寇把它全部经平汉线运往平汉和关外。去年（1944年）又把西佐、峰峰、街儿庄私人经营的50多座小窑没收了，迫使生活在煤矿区里的人民没有煤烧，爆发了成千成万群众性的武装抢煤运动。据采炭科测量系职员谈，敌人为了进一步开发峰峰煤矿，曾拟订一个计划，想从磁县、彭城、临水经过峰峰到武南的磁山，划为一“重工业区”准备开办炼铁厂、瓷器厂、面粉厂、硫磺厂，通过临水的发电所，把磁武的煤铁充分利用起来，变成侵略与压榨人民的工具。和建筑临水公司同时，磁县炭矿公司建筑了中央工厂、木工厂、两个电气厂及机器厂，强征西佐区人民兴修了太行庄、鼓山庄、淮庄及新兵营等新式建筑；建立了电报局、化学分析室、火药研究室、测量室及国民学校1座，汽车仓库2座，各种仓库12座；还有日人宿舍、华人宿舍、工人宿舍、医院、澡塘等。敌人把西马路火车延伸到临水。西佐、

峰峰、街兒庄一帶人民的地，大部被敵人興修建築無代價占領。但是敵人的苦心經營，在我們游擊隊四面襲擊與礦區工人普遍怠工之下，受到很大阻礙，解放區大進軍後，峰峰礦區為我光復，敵寇掠奪的好夢，最後破滅了。

（“摘自1945年11月13日延安解放日報太行通訊：‘峯峯煤礦’”）

附录：上海、天津等地工商业团体简介

一 上海总商会简史

清光緒26年，商約大臣盛宣怀、呂海寰駐上海修訂商約，飭江海關道会同通商銀行總董严信厚^①，絲業董事施則敬，邀集各行商議立總會。27年9月，奏設上海商業會議公所，委严信厚為總理，議定簡章六條：曰明宗旨，通上下，聯群情，陳利弊，定規則，追逋員，28年正月成立，賃屋于英租界南京路五昌里辦事，委周晉鑣為提調。29年七月始設商部。30年，尙書載振奏設京師商會，并推广上海商業會議公所，遵奏定章程，改為商務總會。部委信厚為總理，委徐潤、周晉鑣為協理，定試辦章程73條，事務規條23條，議董孫多森主之。其年，會所自五昌里移于愛而近路，設商部駐滬接待商會處於會內，以聯合國內外商人，擴充各地商會之成立。31年任滿，公舉曾鑄為總理，朱佩珍（即朱葆三）為協理。32年任滿，公舉李厚裕為總理，孫多森為協理。33年任滿，公舉周晉鑣（即周金箴）為總理，李厚裕為協理。34年11月任滿，議董陳作霖提議，依商業習慣，改于歲首選舉，2月任事。宣統元年，選舉晉鑣繼任總理，严义彬為協理。2年，复選晉鑣為總理，邵廷松為協理。3年任滿，選陳作霖為總理，貝仁元為協理。是年9月，上海軍政府興，南北市行商公議，在北河南路天后宮設立商務公所，臨時公舉朱佩珍為正會長，林世杰、貝仁元為副會長。民國元年正月，上海商務總會合并商務公所，定名上海總商會，開全國商會聯合會，議定商法。6月，舉周晉鑣為總理，貝仁元、王震為協理。

① 严信厚，字筱枋，慈谿人，同治初年，以貢生入李鴻章幕，隨蘇軍攻復湖州。鴻章督師剿捻時，委為駐滬襄辦餉械。信厚當從軍日起，已留心商務，及在滬，遂以鹽務起家，曾創設機器、紡織、面粉、榨油諸公司（見上海總商會月報1卷1期）。

任期改为兩年，3年6月，复举晋鑣为总理，朱佩珍为协理。先是商部定章，商会办公处所，应由地方官撥給。租界无官地，但給賃价租屋办事，莫之便也。历届总理、协理、議董，以天后宮内出使行轅，不受外人管轄，載在約章，借为办公处最宜。請于部，議不得行。民国后，申前議得請，而行轅朽敗，不可修葺，于是晋鑣、仁元与坐办严廷楨，商之議董，集各行商，公籌經費，就行轅址建总商會議事厅，楼屋三层，中为議場，容800人，四周为办公处及各业公会办公之地，費銀10万兩有奇，銀行錢业所捐为巨，开始于2年10月，落成于4年3月，5月3日行開幕礼，中外来宾千余人，于是規模大备焉。4年10月，晋鑣任滬海道尹，举佩珍为总理，沈鏞为协理，依商会法总理改称正會長，协理改称副會長。五年任滿，复举佩珍为會長，鏞为副會長。民国7年，佩珍、鏞复公举連任。于是議建商品陈列所，广集經費，于天后宮之后議事厅之东建筑，为屋三重，所費10万兩有奇，9年夏落成，适已任滿未及開幕。7月，公举聶其杰为正會長，秦祖澤为副會長。十年夏，公推田时霖为陈列所所長。征集国产貨品，定于双十日開幕，并籌办总商会月报，于8月出版。

(上海总商会月报第1卷第2号傳記第1頁，1921年7月出版)

二 天津市商会的沿革

天津市工商联合会定于今日正式成立，而具有47周年历史的天津市商会，到今天为止，已即成为历史名詞。本市工商兩业过去都是組織在商会里面的，自1947年伪天津社会局才把29个工业單位由商会划分出来，于次年另組織工业会。关于天津市商会的沿革，可以分为四个时期，但是就过去的組織职权来講，一般的都是在当局安排下进行組織，而主持会务的大权，都为巨紳富賈所掌握，小的行业，在前两个时期里还没有資格参加，普通行业的意見也多被漠視，从来就是小行业任大行业的宰割，小戶受大戶的支配。商会的決議就等于命令，尤其是在滿清时代商会的威权更大，一个商会的会董通地方官都要懼怕他三分，天津現在一切都民主了，工商业界更没有大小高低之

分。这次工商业联合会是以团结天津市公私营的工商业，在人民政府领导下，依据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的规定，贯彻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总方针，而达成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总目标，而负责会务的委员们就是基于这个总目标，为整个工商界，也为广大人民而服务的，并不能象过去仅为本位利害来打算，和过去有本质的不同。

(一) 清代的商业组织

天津地当五河汇流之处，在明、清时代，船只往来如梭，商贾云集，由一个仅仅十几户的小直沽镇，以后就逐渐发展为内地商业中心。1901年(光緒27年)辛丑条约签订，清廷在帝国主义胁迫下，允许把天津开辟为通商口岸，于是洋商接踵而来，洋行公司纷纷成立，津市乃一跃而形成全国第二大都市，华北的经济中心，而本市工商业也随之日渐扩展。

津市商界之有组织，最初名商务公所，成立于1903年(光緒29年)5月，此即商会之前身。商务公所的起因是由于1900年天津义和团之役，“八国联军”攻占天津，市内十室九空，迁徙殆尽，疮痍满目，元气大伤，商业一落千丈，不可收拾。转年年终市面发生私钱帖，私钱票及拨码贴水风潮，辗转牵连，各业震盪，内外行商倒闭颇多。1903年春各业纷纷商议救急之策，遂呈准当地官署，假北門东当行公所旧址设商务公所，并经委派天津巨绅卡煜光、王贤宾、宁世福、么联元等四人为总董，总揽大纲，规划一切，又公举邑绅华世铭、刘永蔭为襄理，随事随时互相挽济。自成立后，本市商业乃得以渐渐恢复和发展。

1903年冬月清农工商部令改商务公所为商务总会，人事上因卡煜光病辞，乃公举王贤宾(竹林)为总理、宁世福(星普)为协理、么联元为坐办。后又推举会董杨恩隆等七人分理评议、会计、庶务、调查等事項，常川驻会办公，各行业遂也开始有同业公所之组织，当时参加商务总会的計有当行公所、钱行公所等36个行业，此为天津商业有

团体組織之开始。1906年后，商务总会組織比較健全，頗做了些工作，其主要事項有六：（一）开办天津商報，以启发商人智識，介紹各地行情；（二）成立商业学校于东馬路（即今之育才商职学校前身），以培养商业子弟；（三）設救急善会，集資捐款，救济当时南北各省灾民；（四）設立戒烟会于西头永丰屯，解救烟民脱离苦海；（五）設劝工厂，于天后宮举办工业展覽会一个月，以扩展工业，而广銷路；（六）开办公估局于北門內錢行公所，公估通行銀色，以維市面銀根穩定。此外并因庚子賠款过巨，奉清廷指令設有籌还国債会，代收国民捐，調解商业会员之間一切糾紛，振兴各項公司工作。該会因为当行公所旧址在义和团之乱后被焚大半，房舍傾頽，曾于1908年（光緒34年）重建新厦，同年秋月落成。

（二）民國成立後的總商會

民國成立，天津商务总会又改組为总商会，1931年經公推巨紳叶登榜（蘭舫）、卡蔭昌（月庭）分任正副会長，参加商会的增到60个行业，內部工作仍旧。为补充地方軍警之不足，曾奉令設立商团，由商号挑选青年受軍事訓練6个月，卡蔭昌任团长，另聘津市武举武国栋为副团长兼总教練官，在东門內旧道衙門訓練，团员有800多人，枪枝400多枝，一切枪械服裝都由商人集資开办，訓練期滿即負商民自卫之責。

1919年，“五四”运动的浪潮激盪到天津，会長叶登榜托病辞职，副会長卡蔭昌也避不露面。乃由秘書長夏琴西出头参加爱国运动，于轉年一月夏曾被警厅拘捕六个月之久。当时，本市工商界紛紛組織同业公会，参加活动，倡导振兴国貨，抵制日貨，加强了工商业界的团结，在爱国运动史上有着光輝的一頁。1920年經公推卡蔭昌繼任正会長后，卡仍不常到会，会务即由各会董等支持。1927年遂改选張仲元（品題）为会長，王益保（君值）为副会長。北伐成功后，1931年总商会又改組为天津市商会，并改为委員制，前任会長張仲元嬋联主席。至1934年紀华被选为主席。本市工商业同业公会已由1930年开

始組織健全，計有錢業、紗廠業、米業、斗店、估衣、磨房、典業等72個行業。

(三) 天津淪陷期間

1937年7月間天津淪陷，偽治安維持會在日本特務機關主使下，指定由治安維持會的委員王賢賓（即王竹林）來擔任偽商會會長，因為他在商會開辦的時期擔任過總董和總理，又是天津老鹽商，王賢賓後調任偽社會局長，1940年又選出劉靜山繼任，1942年改選屈秀章為偽會長，轉年日寇以屈秀章有“通敵”（國民黨）嫌疑，逮捕未獲，乃將常務董事邱玉堂等拘押，旋被釋出，同年四月間邱玉堂即被推代理偽會長職務。1944年6月商會乃由北門東遷于前華商公會旧址（即現在商會地址）。日本投降後，劉靜山、邱玉堂均以漢奸罪名被國民黨法院判處罪刑，而王賢賓早于淪陷期任長蘆鹽務管理局長時，在舊法租界某飯莊赴宴後，被愛國分子所槍殺。在敵偽統治八年過程，偽商會無異是壓榨商民的總機構，所有獻銅、獻鐵、獻機、獻金等等，偽商會要仰承日人鼻息，督促商民如期繳納，商民都是敢怒而不敢言，而偽商會更很少對商民有利益的工作。

(四) 國民黨統治時期

日本降服之後，偽天津市政府派人接收，1945年10月間組織商會整理委員會，選派楊西園為主任委員，開始辦理工商登記。1946年11月正式改組，經選出姬奠川為理事長，這新商會出現後，工商業界因在敵偽鐵蹄壓榨下，八年來橫氣難伸，所以對新商會抱有十二分的期待和擁護，但是事實證明瞭這個商會不但沒有使工商業界獲得滿意，反而倒給他們增加了許多負擔，所有偽黨政軍團攤派捐款賣殘票，借修築城防款項等等，都是找商會轉派各業來承擔，因此工商業界對商會負責人極抱不滿，乃有大部工商業多遲交或拒交會費，以作消極抵抗，而商會威信全失，收入毫無，工作推動遂呈停頓。1948年姬奠川南逃，會務一度由常務理事負責。直到1949年才改組為商務整理委

員會，公推畢鳴岐為主任委員，經年商務委員會改組成89個商業同業公會。與工業會所屬的55個工業同業公會合組成今日成立的天津市工商業聯合會。

（馬惠卿：“津市商會的沿革”，1950年4月29日天津進步日報）

三 全國工業協會創立經過

（一）設立緣起

“中國全國工業協會”，成立在抗戰最艱難的時期中，當時太平洋戰爭已經發生一年多，因為英美兩國倉卒應戰，步步後撤，我國在西南唯一的國際路綫——滇緬路，也被敵人封鎖，在國內不論軍需或民生的用品，不得不依賴自己來生產，政府當局特邀請各地工業界代表，及各有關部門的主管官員，在重慶召開第二次全國生產會議，研討有關增加戰時生產的各項方案。當各地工業界代表聚集一起，均感到以往各地工業界缺少組織，因此，凡有關工業生產上的各項困難及應予改革的地方，也就很少有互相交換意見，和共同研討的機會，尤其在國外物資無法進口的时候，工業界方面迫不容緩的應當團結起來，共同設法克服當前的困難，於是各地工業界代表即擬議發起組織全國性的工業聯合會。

但以往我國對於工業與商業視為一體，所有各工廠，皆附屬於各地商會中，其實工商業的性質迥然不同，前者以製造為主，後者以販賣運銷為目的，權益既不一致，志趣復又互殊，況一般商會均以商業為主，因此往往不能兼顧工業界之權益，去積極解除工業界的困難，以發展工業，當時即有人動議，工業界應另有單一合法的團體組織，並經政府採納，在六中全會通過制頒工業會法，交由經濟社會兩部會同辦理，工業界人士聞之無不欣喜興奮，遂決定不等工業會法正式頒布，即擬籌組全國性的純工業團體，一方面解決目前許多有關工業的問題，一方面督促政府迅速制定工業會法。

在上述的兩種情況下，經過數度的磋商，在社會部指導下，推定吳蘊初、胡西園、顏耀秋等負責籌備組織“中國全國工業協會”，于民

国32年3月18日在重庆迁川大厦，召开成立大会，出席者有湘、桂、粤、赣、滇、黔、陕、甘等地工业界代表百余人，通过章程，制定十项任务：

一，促成产品标准化，二，促进全国工业化，三，促进工业金融之发展，四，“劳工福利之增进”，五，事业保险及必要统制之推行，六，工矿之调查统计及编纂，七，技工劳工补习教育之办理，八，工矿展览之举办，九，请求生产事业之维护，十，其他合乎第三条：即以联合全国工矿业共谋发展为宗旨项下之事项。

推定吴蕴初为理事长，胡西园等21人为理事，陶桂林等7人为监事，理事吴羹梅兼总干事。

成立大会上更发表宣言，决定今后共同努力之鹄的：

一，促进工业会法之制定，二，完成国父实业计划之建设，三，贯彻全国工业化之目的，四，加紧工业经济之研究，五，妥筹战后工业之设施，六，注意修改商约之贡献。

全国工业协会成立之后，第一步工作即着手于各地成立分会，以谋普遍发展会务，首先响应的是湘、桂、粤三省的工业界，联合成立中南区分会，继有江西、贵州、甘肃、重庆等省市区别成立分会，截至抗战胜利止，在大后方不论民营或国营及其他工业公会，凡稍具规模的，几均全部参加为会员，共计有824单位。

抗战结束，工协的会务，推展到各收复区，首由苏南区在薛明剑主持下，成立苏南区分会，湖北、青岛、天津等工厂集中地区，亦相继成立分会。

34年9月工业总会理事长吴蕴初随工厂复员，返回上海，乃在上海设立工协总会上海办事处，同年3月总会正式迁沪。

胜利后第一次工协理事改选大会，系于35年11月9日，大会筹备委员，除由总会推定吴蕴初等7人外，各地分会均曾推派代表参加，计有上海、天津各分会代表十四单位，此次大会的重要决议有三，为：

一，中国全国工业协会会址改设南京，上海仍保留办事处。

二,規定每年11月11日為工業節。

三,推定吳蘊初等25人為理事,周茲伯等7人為監事,由吳蘊初任理事長,庄智煥為總幹事。以上情形,迄至目前止,尙無變更。

(二) 組 織

工業協會,本為人民自由團體,與商會及各同業公會等職業團體組織,迥然不同,各地工協彼此間之關係,乃為聯合組織性質,全國工協,亦僅為各地工協之總聯繫機構而已,並無總會分會等名稱之規定,更無總會統轄分會之限制,故各地工業協會皆為獨立性之組織。

工業協會所屬會員,除一部分為發起會員外,皆係由原有會員轉介紹加入者,會員入會時,先填寫入會申請書一種,由原有會員工廠兩家介紹,經各地工協理事會核准後即可入會。

工協會員分工廠會員與團體會員兩種,入會時除上項應有手續外,工廠會員必須備具工廠法所規定之條件,方為合格,同時根據其資本數額,機器設備及工人人數分列為甲、乙、丙三級;團體會員入會者皆為乙級。會費數目,因會員在會等級不同,及各地經濟差異,尙無一定規定。且因物價變動,亦不時予以調整。

各地工協,現已正式組織完竣者,計有18單位,詳見後表:

名 稱	理事長	名 稱	理事長
中國全國工業協會	吳蘊初	湖南省工業協會	朱 謙
上海市工業協會	吳蘊初	貴州省工業協會	
青島市工業協會	尹致中	安徽省工業協會	沈嗣芳
江蘇省工業協會	薛明劍	綏遠省工業協會	霍世誠
浙江省工業協會	羅霞天	山西省工業協會	彭士弘
台灣省工業協會	劉普鈺	重慶市工業協會	潘仰山
江西省工業協會	余行魯	川東區工業協會	華晉古
湖北省工業協會	宋立峯	川西區工業協會	樓兆燿
雲南省工業協會	繆嘉銘	河北平津區工業協會	李燭塵
甘肅省工業協會	胡逸耕		

(三) 河北平津區工業協會

当抗战胜利之始，津市工业界深感复員建国期內生产事业責任重大，津市为华北工业中心，工厂林立，各种工业工厂几达五千家之多，实有联合組織共同努力之必要，同时为响应全国工业协会起見，乃由本市工业界名流朱繼圣，劳篤文，陈調甫等 30 余人联合发起籌备，为时約在34年9、10月間。其时久大，永利兩公司协理李燭尘先生复員返津，亦啣全国工协之委托，在津籌組工协津会，于是乃联合原有諸发起人加强籌备工作，于35年4月20日在津正式成立工协津分会，推定李燭尘，劳篤文等19人为理事，朱繼圣等5人为监事，同年11月又因全国工协大会之決議，廢弃原有全国工协津分会名称，更名为“河北平津区工业协会”。

附：河北平津区工业协会理监事姓名：

理事長：李燭尘，久大鹽业公司總經理。

常务理事：劳篤文，唐山华新紡織公司總經理、陈調甫，永明漆厂經理、秦幼林，德盛窰业公司總經理、宋棊卿，东亚企业公司總經理。

常务监事：朱繼圣，仁立毛織公司總經理、譚志清，光明植物油厂總經理。

理事：侯德榜，永利化学公司總經理、周叔弢，启新洋灰公司總經理、王晋生，华北制革公司經理、王汰甄，中天电机厂經理、朱夢苏，北洋紗厂經理、何宗謙，天津造胰公司經理、焯南笙，启新洋灰公司副總經理、孙冰如，寿丰面粉公司經理、陈范有，开灤蠶事、王瑞基，中紡副理、龐永选，义堂橡膠厂經理、孙克壯，思動油厂副理、李潤芝，織染公会理事長、葛敬新，义姓造紙公司副理。

监事：袁紹周，华光織染公司經理、王翰臣，大新織染公司經理、景雨林，同心电化厂經理。

(摘自刘錫純：“全国工业协会的現狀”1948年3月1日天津民國日报)

三、利潤和剩余价值

下面介紹的民族工业若干厂矿的利潤率計算，是从許多資料中選擇出来的。主要是以有盈余的厂矿为統計对象，至亏损的厂矿一般不予以統計。

这些利潤如大家通常所說的只是一种賬面利潤，至于隱蔽的或其他額外利潤如逃避稅收、造假賬等等获得的盈利則沒有加以計算在內。

民族工业的利潤的增減幅度，在各个行业、各地区和各个时期都是很不平衡的，这种不平衡狀況是和中国政治經濟发展的不平衡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資本主义的加强或暂时放松压迫有密切关系。大体上，輕工业和日用品工业尤其是棉紡織业在某些时期其利潤率較高，而重工业的机械制造业、鋼鐵工业甚至在景气时期其利潤率也較前者为低。

民族工业在正常时期的利潤率与資本主义国家工业利潤率相較，并不显得低，相反地，它却比后者为高，如抗日战争前，民族工业若干工厂的利潤的平均計算也达到 12—13%，而資本主义国家正常时期的利潤率則在 10% 以下。但應該指出，中国民族工业的利潤率不仅远低于帝国主义在华工业，而且其盈亏的起伏是很不稳定的，往往一个短时期有盈利，但过一些时期却亏本甚至因亏蝕淨尽支持不住而陷于停工倒閉。这种情况是很多的，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1929—1932年世界經濟恐慌时期、1942年太平洋战争后和抗日战争結束时期等，都曾經有过大量厂矿停閉。这种盈亏的不正常状态是

民族工业不能获得正常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也更促使民族工业在生产上愈趋向于投机性和趋向于容易获利的日用品工业的发展。

从后述，民族工业所负担的捐税、运费、利息等材料中我們还可以看到，民族工业虽然在正常时期所获的利潤不算低，可是它轉手交給反动政府、銀行家等为数也很大，特别是在抗日战争中期和抗日战争結束时期，表面上民族工业的賬面盈利相当多，但由于通貨膨脹，和虛盈实稅，給国民党反动政府拿去的也就越多了。

下述民族工业若干厂矿剩余价值率試算表，也是从相当多的資料中選出来的，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由于我們缺乏經驗，而計算剩余价值率又是一个比較复杂的問題，甚望讀者指正。

應該說明，下述的計算，剩余价值率是偏低的，偏低的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資本家往往想办法隱蔽其剝削，开支賬目的分类很混乱。例如关于資本家所拿的車馬費、应酬开支，本应列入剩余价值率，但在賬目中，他們往往列入杂費支出或列入營業費內，这些都因不易剔出，只好暫算入不变資本內。又如職員薪金中有一部分是那些挂名領薪水的董监事和資方薪金，因不易剔出，也暫時都列为可变資本，凡此种种都說明剩余价值率的計算是偏低的。

由于旧中国工人階級所受剝削的惨重，中国工业有机構成低下，而正常时期利潤却并不低，这反映着民族工业的剩余价值率相当高，根据我們計算的結果，剩余价值率平均約在250—300%。

抗日戰爭前民族工業利潤率的一個計算

我曾根據我所搜集的工廠營業報告，計算他們的利潤率，根據我們的分析，92家工廠中，每年都有純益的74家，發生虧損或損益相間的12家，情況不明的6家。除了情況不明的6家剔除不計外，發生虧損的工廠，可能是因為營業的保守性，低估資產的價值，隱蔽利潤，實際並未發生虧損，可能是由於競爭，致本廠勞工產生的剩餘價值，由與本廠競爭的同業攫取以去。如果屬於後一種情形，那末我們計算各廠的平均利潤率，發生虧損的各廠，就不應該剔除。其次，本廠實際運用的資本，除了本廠股東的原始投資和歷年資本蓄積以外，還包括外界對本廠的長期投資或短期融資，所以計算本廠實際運用的資本的利潤，應該還要包括本廠付出的利息。包括了利息付出以後的利潤，才能和本廠實際運用的資本比較，求出它的利潤率。

各廠的年利潤率如下：

廠名	統計時期	利潤(千元)	資本(千元)	利潤率%
鑄亞鐵工廠	1935	6	113	5.3
大公機器廠	1936	10	71	14.1
大華鐵廠	1936	21	243	8.6
中華鐵工廠	1936	175	204	85.8
〃	1937	35	311	11.3
公勤鐵廠	1935	34	399	8.5
〃	1936	127	287	44.3
康元印罐廠	1934	242	1,948	12.4
〃	1935	211	2,072	10.2
〃	1936	222	3,252	6.8

厂名	統計时期	利潤(千元)	資本(千元)	利潤率%
新中工程公司	1935	28	224	12.5
〃	1936	56	291	19.2
〃	1938	8	461	1.7
泰山磚瓦厂	1935	48	496	9.7
〃	1936	37	532	7.0
中国水泥厂		801	5,447	14.7
上海水泥厂	1935	81	3,276	2.5
〃	1936	408	3,384	12.1
中央玻璃厂	1935	8	67	11.9
〃	1936	16	98	16.3
翔华电气厂	1934	60	380	15.8
〃	1935	61	386	15.8
〃	1936	78	434	18.0
浦东电气厂	1930	60	518	11.6
〃	1934	146	1,440	10.1
恒大紗厂	1936	249	1,831	13.6
中新紡紗厂	1937	8,429	86,179	9.8
崇明紗厂	1933	251	2,008	12.5
豫丰紗厂	1932	1,000	13,175	7.6
协丰紗厂	1933	42	478	8.8
富安紗厂	1937	240	1,978	12.1
宝兴紗厂	1934	115	1,763	6.5
〃	1935	61	1,571	3.9
〃	1936	133	1,812	7.3
天翔駝鞍厂	1935	16	193	8.3
〃	1936	13	209	6.2
〃	1937	54	386	14.0
上海毛紡厂		107	381	28.1
五和織造厂	1934	111	899	12.3
〃	1935	103	977	10.5
〃	1936	158	1,111	14.2

普益經緯	廠	1936	25	390	6.4
嘉丰染織	廠		135	1,318	10.2
达丰染織	廠	1934	768	3,051	25.2
	〃	1935	362	2,300	15.7
丽明染織	廠	1934	38	461	8.2
	〃	1935	73	537	13.6
	〃	1936	339	499	67.9
中国內衣	廠	1933	2	1,392	0.1
	〃	1935	49	1,236	4.0
	〃	1936	25	1,232	2.0
	〃	1937	157	1,263	-12.4
华福制帽	廠	1934	77	305	25.2
	〃	1935	48	258	18.6
	〃	1936	128	344	37.2
大中华橡膠	廠	1936	816	3,892	21.0
大有余榨油	廠	1934	48	408	11.8
	〃	1935	135	776	17.4
	〃	1936	197	794	24.8
	〃	1937	-72	1,192	-6.0
長德榨油	廠		-174	768	-22.7
中国制油	廠		-7	101	-6.9
恒兴泰榨油	廠	1936	224	483	46.4
天生滋味素	廠	1935	20	137	14.6
	〃	1936	16	138	11.6
天厨味精	廠	1935	294	2,072	14.2
	〃	1936	422	2,259	18.7
	〃	1937	320	1,886	17.0
天一味母	廠	1934	92	234	39.3
	〃	1935	51	174	29.3
	〃	1936	73	171	42.7
中南烟草公司		1935	-41	431	-9.4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		1935	758	16,638	4.6
	〃	1936	484	18,124	2.7

厂名	统计时期	利润(千元)	资本(千元)	利润率%
华成烟草公司	1934	1,191	4,886	24.4
〃	1935	1,432	8,049	17.8
〃	1936	1,070	6,617	16.2
大同面粉厂	1936	581	2,408	24.1
兴华面粉厂	1936	2	30	6.7
阜丰面粉厂	1934	656	6,091	10.8
〃	1935	713	5,496	13.0
〃	1935	578	5,496	10.5
〃	1936	738	8,273	8.9
〃	1936	526	8,273	6.4
〃	1937	356	7,164	5.0
扬州麦粉厂	1935	57	826	6.9
冠生園	1932	61	386	15.8
〃	1934	95	873	10.9
〃	1935	- 3	964	- 0.3
浦东电气厂	1935	204	1,707	12.0
〃	1936	246	2,331	10.6
上海内地自来水厂	1934	686	5,316	12.9
〃	1935	676	5,460	12.4
〃	1936	677	5,803	11.7
大中华火柴厂	1936	15	140	10.7
中国火柴厂	1935	- 14	168	- 8.3
〃	1936	34	179	19.0
中华玻璃厂	1934	40	199	20.1
〃	1935	31	242	12.8
〃	1935	38	242	15.7
〃	1936	87	310	28.1
华丰搪瓷厂	1935	- 2	576	- 0.3
〃	1936	88	504	17.5
益丰搪瓷厂	1934	62	452	13.7
〃	1935	63	536	11.8

益	丰	糖	登	厂	1936	81	649	11.5
		〃			1938	48	797	6.0
久	新	碱	哪	厂	1935	25	215	11.6
		〃			1936	26	192	13.5
		〃			1937	65	348	18.7
信	誼	药		厂	1936	48	270	17.8
		〃			1937	52	668	7.8
新	亞	药		厂	1934	67	301	22.3
		〃			1935	72	320	22.5
		〃			1936	196	560	35.0
五	洲	大	药	房	1934	454	2,239	20.3
		〃			1935	466	2,136	21.8
		〃			1936	588	5,409	10.9
中	西	大	药	房	1934	91	499	18.2
		〃			1935	80	681	11.7
		〃			1936	236	718	32.9
中	英	大	药	房	1935	95	628	15.1
振	华	油	漆	厂	1936	194	307	63.2
		〃			1937	74	310	23.9
开	林	油	漆	厂	1935	- 42	852	- 4.9
开	成	造	酸	厂	1934	1	937	0.1
		〃			1935	74	855	8.7
		〃			1935	83	855	9.7
		〃			1936	116	724	16.0
亞	光	电	玉	厂	1934	20	156	12.8
家	庭	工	业	社	1935	101	600	16.8
		〃			1936	106	522	20.3
大	中	染	料	厂	1936	107	293	36.5
		〃			1935	40	206	19.4
		〃			1937	56	306	18.3
大	成	纺	織	厂	1935	443	5,073	8.7
		〃			1936	744	6,025	12.3
大	通	纺	織	厂	1934	2	2,180	0.1

厂名	統計时期	利潤(十元)	資本(千元)	利潤率%
利用紡織厂	1933	- 39	787	- 5.0
沙市紡織厂	1935	274	3,122	8.8
〃	1936	311	3,164	9.8
美恒紡織厂	1934	- 23	579	- 4.0
〃	1935	80	618	12.9
〃	1936	107	671	15.9
統益紡織厂	1936	496	3,795	13.1
大生紡織厂	1936	536	12,580	4.3
永安紗厂	1934	1,585	29,471	5.4
〃	1935	741	23,896	3.1
〃	1936	1,626	30,061	5.4
民丰紗厂	1935	253	2,355	10.7
〃	1936	481	2,971	16.2
恒大紗厂	1934	106	1,682	6.3
〃	1935	108	1,549	7.0
冠生園	1936	60	923	6.5
〃	1937	21	998	2.1
泰康罐頭厂	1934	140	1,125	12.4
〃	1935	151	896	16.9
〃	1936	180	989	18.2
梅林罐頭厂	1933	20	363	- 5.5
〃	1935	2	352	0.6
〃	1937	63	448	14.1
沙利文糖果厂	1934	251	1,125	22.3
馬宝山糖果厂	1934	36	210	17.1
三一印刷厂	1935	49	515	9.5
〃	1936	44	629	7.0
华一印刷厂	1935	310	1,068	29.0
〃	1936	449	1,047	42.9
大东書局	1935	76	975	7.8
中华書局	1935	723	5,572	13.0

中 华 书 局	1936	768	8,428	9.1
商 务 印 书 馆	1935	1,143	8,905	12.8
商 务 印 书 馆	1936	1,316	9,857	13.3
世 界 书 局	1936	273	3,958	8.9
开 明 书 店	1935	44	399	11.0
利 济 印 刷 厂	1935	48	176	27.3
科 学 仪 器 馆		25	381	6.8
平 均				13.7

原注：利潤包括提存折旧准备以后之純利及付出之利息。原营业报告中付出利息一項，沒有单独列出的，一律以其业外对本厂投資或融資額的10%計算，作为利息付出額。計算純利前未提存折旧准备的，一律以其实际运用之資本的2.5%計算。

注：有“-”符号者为亏损数字。

(摘自汪馥蕙：“中国工业資本估計的几个基本問題”，“中国工业”新1卷第8期)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区工业利润

一

記者于迁川工厂联合会第七届会员大会前夕，分訪工业界人士吳羹梅、胡西园諸氏，探詢当前民营工业諸問題，据談：目前工业界之不景气者仍有鋼鐵机器业，紗厂本較可获利，自实行原料統制之后，利潤漸趋减少，較有生气者为造纸及制碱等工业，惟一般工厂，最高利潤仅为20%，故近来游資流入工业界絕无仅有，年来获利最大者为大地主，其次为商业投机，工业界則无日不在艰苦困难中，即使稍有所得，不得不用在扩充設備方面，故資金周轉欠灵，实为必然。

(1944年4月17日重庆相瀟报)

二

下表是摘自1943年11月出版的国民党經濟部統計处編的“后方工矿資金研究”，所列的产业利潤統計表，这个表格是該处根据1941年和1942年121家厂矿資产負債表計算出来的(資产負債表是經国民党四联总处調查而来)。这些厂矿包括水电业3家、冶煉工业8、金屬用具2、机械22、电器制造1、木材和建筑业3、土石器8、化学工业32、飲食品工业9、紡織16、文化工业1、矿业16家。

这121家厂矿大部分是民族資产階級經營的，但也有少数厂矿是官僚資本参加投資或官僚資本經營的企业。虽然，从数量上看，这121家厂矿并没有包括当时国民党統治区所有的工矿，但这121家都是当时較大的厂矿，所以这个統計大体上还反映了当时国民党統治区的工业利潤情况。这121家厂矿的盈亏有如下表：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区工业賬面利潤統計表

业 别	淨 值(千元)	利潤或亏损額 (千元)	利潤率或亏损率 %
总 計	356,543	51,815	14.53
水 电 工 业	31,154	(-) 2,842	(-) 9.12
冶 煉 工 业	73,166	(-) 2,637	(-) 3.60
金 屬 品 工 业	3,081	—	—
机 器 制 造 业	33,413	(-) 1,063	(-) 3.18
电 器 制 造 业	289	23	8.03
木 材 和 建 筑 工 业	4,268	210	4.91
土 石 品 工 业	44,505	(-) 192	(-) 4.32
化 学 工 业	49,034	7,462	15.22
飲 食 品 工 业	18,612	4,802	25.80
紡 織 工 业	43,600	39,311	90.16
文 化 用 品 工 业	460	442	96.05
矿 业	54,960	6,300	11.46
总 平 均			14.53

注：(一)上表“淨值”，是包括資本金和公積金在內。

(二)有(-)符号者为亏损，无此符号者为盈利。所謂盈利是純益額。

从上表可以看出，总平均利潤率为14.53%，其中以文化用品工业和紡織工业盈利为最高，純益在90%以上，次为飲食品工业，在20%以上，再次则为化学工业及矿业，在10%以上。金屬品制造工业平均无盈余。而水电、冶煉、机器和土石品工业则为亏损，尤以水电工业之亏损率为最高。

三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区民族資本若干厂矿賬面利潤率調查

厂 矿 名 称	利潤計算年月	資 本 (千元)	純 益 (千元)	利潤率
上 海 机 器 厂	1941全年	650	103	15.8
新 中 工 程 公 司	1941全年	1,000	159	15.9
新 昌 实 业 公 司	1942年1—5月純益率	2,000	572	28.6
中 国 建 設 工 程 公 司	1941全年	100	43	43.0
同 益 丰 記 机 器 制 造 厂	1942年1个月純益率	600	12	2.0

厂矿名称	利潤計算年月	資本 (千元)	純益 (千元)	利潤率
精勤鐵工厂	1942年3个月純益率	1,600	95	6.3
中国工业社綦江鐵厂	1941年上半年純益率	180	46	25.5
恒順机器厂	1941	1,000	334	33.4
姚順兴机器厂	1942年上半年純益率	1,500	85	5.6
西京建工机器厂	1941年9个月純益率	150	42	28.0
天原电化厂	1942	1,570	300	19.1
新兴化学染煉厂	1941	106	42	39.6
庆华顏料厂	1942年5个月純益率	4,000	860	21.5
华新建筑材料公司	1942年4个月純益率	2,000	123	61.5
华生耐火材料厂	1942年1个月純益率	500	27	54.0
建新实业公司	1942年10个月純益率	1,800	171	9.5
建成煉油厂	1942	100	203	10.3
大华煉油厂	1941年11个月純益率	350	11	3.1
創力动力油料厂	〃	600	260	43.3
嘉乐造纸厂	1941年4个月純益率	930	72	7.6
广中制革厂	1941	300	119	36.0
义成織布厂	1941	500	72	14.4
普益經緯公司 (制絲織)	1941	200	99	49.5
胜利絲織厂	1942年上半年純益率	300	122	40.6
西北毛織厂	1942年5个月純益率	600	262	43.6
西安民生工厂	1942年10个月純益率	200	264	132.0
复兴面粉厂	1942	2,000	3,000	150.0
西安成丰面粉厂	1942	1,300	702	54.0
蜀益烟草公司	1942	5,000	1,543	30.8
建成面粉厂	1941年8个月純益率	3,000	193	6.4
天府煤矿	1942	4,500	1,340	30.0
陝西白水新生煤矿	1941年8个月純益率	600	131	21.8
三才生煤矿	1942年2个月純益率	8,000	145	1.8
中国标准鉛笔厂	1942	450	151	34.2

注：本表仅算有盈利的厂矿，亏损者不包括，利潤率是純益和資本的比較，賬面外的非法利率不在內。

資料来源：根据1942和1943年国民党四联总处工商調查算出。

工厂的若干行业历年利率统计

纺织业

一 南通大生纱厂历年利润率

年 度	資本(兩)	純益(兩)	利 潤 率	年 度	資本(兩)	純益(兩)	利 潤 率
1900	500,000	52,369	10.47	1905	1,892,490	483,070	26.80
1901	580,000	105,978	18.27	1906	1,802,190	400,204	22.20
1902	580,000	187,002	32.24	1907	1,919,390	55,904	2.91
1903	1,130,000	255,134	22.57	1908	1,995,790	158,852	7.95
1904	1,130,000	225,124	19.92	1909	1,995,790	207,383	10.39

(根据通州实业史第147、204、252、259、267等頁算出)

二 永安紡織股份有限公司

年 度	資本(千元)	純益(千元)	利 潤 率	年 度	資本(千元)	純益(千元)	利 潤 率
1938	18,000法币	?	?	1942	60,000中儲券	12,000中儲券	20.0
1939	18,000 "	5,000法币	41.6	1943	120,000 "	22,000 "	18.0
1940	18,000 "	4,000 "	33.3	1944	120,000 "	55,000 "	45.8
1941	18,000 "	5,000 "	41.6	1945	120,000 "	109,000 "	90.8

历年股息紅利发放

年 度	股 息	紅 利	年 度	股 息	紅 利
1941	5厘	1分5厘	1944	8厘	1分2厘
1942	8厘	2厘	1945	1分	2分
1943	8厘	2厘			

(1947年“中国股票年鉴”。联合资信所編“华股手册”第42頁,1948年出版。“上市股票厂商概覽”第8頁)

三 中國紡織股份有限公司

历史沿革:該公司成立于民28年1月,初名英商中紡紗厂有限公司,曾向香港政府注册,資本为法币160万元,由英商 W. C Gormersal 任董事長,华商王启宇等任董事。其时仅設一个厂,至30年,收买第二、三兩厂,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被日軍軍管。1943年发还,事后改組为华商公司,董事長为王启宇。其历年資本和利潤率如下:

年度	資本(千元)	純益(千元)	利潤率	年度	資本(千元)	純益(千元)	利潤率
1943	99,000中儲券	?	?	1945	99,000中儲券	185,700	197.6
1944	99,000 "	18,512	19.0	1946	297,000	2,456,229	

注:1946年純益表現甚大,系因通貨膨脹影响,而資本未升值的緣故。

历年股息紅利发放:1943年股息1分。1944年股息1分,另垫发1945年中期股息4分。1945年股息4分,另垫发翌年中期股息26元。1946年股息紅利共20元,移作升股之用。

(見“华股手册”第40、41頁。“上市股票厂商概覽”第5、6頁)

四 統益紡織股份有限公司

該公司創立于民国9年12月,为已故紗业巨子吳麟睿发起創辦,初創时資本仅規銀30万兩,其时兼制棉紗团,嗣后專营棉紡。17年起委托英商庚兴洋行垫款經理,至26年时資本为法币170万元。滬战时厂屋无恙,照常工作,至27年又改組为英商公司,向香港注册,翌年增資至400万元,实收为2,975,000元。30年12月为敌軍管理,至32年4月发还,5月間又恢复华商組織。其历年資本和利潤率如下:

年度	資本(千元)	純益(千元)	利潤率	年度	資本(千元)	純益(千元)	利潤率
1938	4,000法币	?	?	1945	60,000中儲券	340,968	568.2
1943	30,000中儲券	23	0.7	1946年	600,000法币		
1944	60,000 "	21,179	30.5	6月			

历年股息紅利发放: 1945年股息和紅利, 每股法币30元。1946年以历年盈余撥作升股, 每股升9股, 另发息法币90元。1947年墊发股息150元, 又升股39股。

(1947年度“中国股票年鉴”。“华股手册”第49、50頁。“上市股票厂商概覽”第13、14頁)

五 荣丰紡織厂股份有限公司

該厂系章荣初及韓志明昆仲所創辦, 初設厂于虹口, 專織造各种棉毛呢, “八一三”战后停頓, 至27年7月, 由徐采丞、郁震东等加入, 集資法币50万元, 扩大組織, 公推章荣初为总經理, 28年添設織布部, 29年章君辞职, 改推韓志明任总經理, 30年增設漂染部, 31年3月增資至法币300万元, 同年11月增資至中儲券1,250万元。32年敌伪收买紗布后, 即于9月間附設造紙部, 同年11月又增資至中儲券5,000万元, 33年5月再度扩充, 接盤上海紡織漂染印花整理厂, 成立第二厂, 同年6月再增資至中儲券2亿元, 34年5月, 因营业不振, 为紧縮开支計, 減資为5,000万元。同年12月除恢复原有国币資本300万元外, 將历年所增之伪币資本4,700万元, 发还股东, 計每股实发国币19.4元, 另行增資至法币1亿元。其历年利潤率如下:

年 度	資本(千元)	純 益 (千元)	利潤率	年 度	資本(千元)	純 益 (千元)	利潤率
1938	500法 币	75	15.1	1944	200,000中儲券	139,280	69.6
1942	3,000 "	475	15.8	1945年5月	50,000	?	?
1943年11月	12,000中儲券	2,155	17.3	1945年12月	100,000	113,902	113.9

历年股利发放: 1943年每股升3股, 另发股息0.75元。1944年每股升1股, 另发股息紅利3.75元。1945年每股升1股, 另发股息紅利5.15元。1946年股息5厘, 紅利0.236元。

(“华股手册”第51頁, 1947年度“中国股票年鉴”, “上市股票厂商概覽”第15、16頁)

六 抗日戰爭結束後民族資本的紗廠無利可圖

本市民營紗廠，近以市場原料缺乏，工資昂貴，所有生產、售價雖高，但多無甚利潤，倘長此以往，則其前途，頗堪憂慮。昨日紗布業透出的消息：現時各民營紗廠所有生意，按過去廠價而言，即無甚利潤，若就市場售價挂牌，盈利亦殊輕微。例如昨日20支之粗紗，市價僅在七百六七十萬元之間，而紗廠成本則達760萬元以上。蓋以每包20支之粗紗，需要棉花約435斤，按現在棉價130萬元折合，即達5,655,000，人工約費150萬元，出廠稅約450,125之巨，成本共約760萬625元。民營紗廠以受原料缺乏，人工高昂之威脅，所有生產俱無甚利潤，若現狀不能改善，在不久之將來勢必陷于絕境。

(1947年6月9日天津益世報)

染織業

一 大公紡織印染機器製造股份有限公司

該公司創設于民23年4月，原名大公染織布廠，系唐性存、單志伊、洪明電等發起組織，資本初為法幣10萬元，以代客漂染為主要業務，25年增設絲光部，“八一三”戰時，新建廠房一部分被毀，幸機件無恙，29年重振旗鼓，并加擴充，30年增資至150萬元，加設布織廠，勝利以後，于1947年2月擴充範圍，添設紡紗及機器製造，同時改為今名。其歷年利潤率如下：

年 度	資 本 (千元)	總 益 (千元)	利 潤 率
1944	60,000中儲券	9,000	15.0
1945	60,000中儲券	7,600	12.6
1946	60,000法 幣	13,707	22.8

歷年股利發放：1943年每股發息5厘，紅利作為增資增股。1944年發息1分，另每千股發黃金2分。1945年發息1分。1946年與1945年度同。

(1947年度“中國股票年鑑”，“華股手冊”第52、53頁)

二 中国国光紡織印染厂

該厂成立于民26年。初以印染布匹为业务，其后添設厂房并增設紡紗部。其历年資本和利潤率如下：

年 度	資本(千元)	純 益 (千元)	利 潤 率	年 度	資本(千元)	純 益 (千元)	利 潤 率
1937	150法 币	?	?	1945	60,000中儲券	7,420	12.4
1943	60,000中儲券	264	4.4	1946	60,000法 币	↑	↑
1944	60,000中儲券	7,395	12.3				

历年股息紅利发放：1941年每股发股息 8 厘，紅利1分1厘。1942年发息 6 厘，紅利 6 厘。1943年与上年度股息同。1944年和1945年各发股息 1 分。

(1947年度“中国股票年鉴”)

三 祥華棉毛染織厂

該厂成立于民国20年，原系合伙組織，設厂于上海江灣路，織銷象牌棉毛織品。26年中日战起，乃迁至江宁路繼續生产，至33年 2 月因营业发达，改組为股份有限公司，資本額定为中儲券 3,000 万元，后又添設分厂。其历年利潤率如下：

年 度	資 本 (千元)	純 益 (千元)	利 潤 率
1944	30,000中儲券	16,073	53.6
1945	30,000法 币	4,472	14.9
1946	150,000法 币	23,734	16.8

1946年度股利，移作增資升股。

(“华股手册”第70至71頁)

絲 織 業

— 美亞織綢廠

年 度	資 本 (千元)	純 益 (千元)	利 潤 率
1943	10,000中儲券	2,124	21.2
1944	36,000中儲券	17,793	49.7
1945	40,000中儲券	17,111	42.8
1946	3,600,000法 币	17,478	0.5

1946年資本增加中，有32億元由美亞股東認繳，其辦法是固定資產升值26億，現金認繳560,000,000，合每一老股送65股，認14股，其餘4億元作為收購美興地產公司股份之用。

历年股利發放：1943年股息8厘。1944年股息8厘，紅利1分2厘。1945年股息8厘，紅利1分2厘，1946年股息1分，紅利1分。

（“華股手冊”第116至117頁，1947年度“中國股票年鑑”，“上市股票廠商概覽”第41頁）

二 中國絲業股份有限公司

該公司創設於民國32年4月，為蔡聲白、黃吉文等所發起，資本初為中儲券2,000萬元，同年10月，擴充營業，增資至5,000萬元。

該公司在無錫、硤石兩地設有繅絲廠，共有繅絲機536台、復搖機336台，自動循環煮茧機2台。其历年利潤率如下：

年 度	資 本 (千元)	純 益 (千元)	利 潤 率
1943年4月	20,000中儲券	2,906	29.0
1944	50,000中儲券	19,600	39.0
1945	50,000法 币	50,690	101.0
1946	500,000	51,504	10.3

历年股息紅利發放

年 度	股 息	紅 利	年 度	股 息	紅 利
1943	6元	—	1945	8元	16元
1944	8元	12元	1946	8厘	4分2厘另每百股送絲棉1斤

（“華股手冊”第113至114頁，“上市股票廠商概覽”第37至39頁）

內衣織造業

一 新光標準內衣染織整理廠

該廠創設於民國22年9月，原為傅良駿氏獨資經營，當時專以制銷各種內衣為業務，33年籌組股份有限公司，改名為新光標準內衣製造廠股份有限公司，額定資本為中儲券7,000萬元，是年冬盤入唐山路恒豐染織廠，增資至21,000萬元，並改今名，從事於布匹及內衣之製造，35年4月調整資本為法幣21,000萬元，同年11月4日設立南京分公司，12月盤入三星內衣廠。36年2月又與興業銀團合投資新大織造廠。其歷年利潤率如下：

年 度	資 本(千元)	純 益 (千元)	利 潤 率	年 度	資 本(千元)	純 益 (千元)	利 潤 率
1933	10 法 幣	?	?	1946	210,000法 幣	36,151	17.2
1944春	70,000中儲券	9,041	12.9	1947	3,800,000法 幣	?	?
1945	210,000中儲券	27,670	12.8				

歷年股利發放：1944年股息1分，另每500股送襯衣一件。1945年股息1分。1946年股息1分。

(1947年度“中國股票年鑑”，“華股手冊”第106、107頁)

二 景福衫襪織造廠

年 度	資 本(千元)	純 益 (千元)	利 潤 率	年 度	資 本(千元)	純 益 (千元)	利 潤 率
1942	15,000中儲券	?	?	1944	200,000中儲券	22,523	11.2
1943	50,000	1,800	3.6	1946	200,000法 幣	24,515	12.2

該公司從1943年起，至1946年止，每年各發股息1分。

(“上市股票廠商概覽”第28頁，
“華股手冊”第108、109頁)

三 景綸衫袜厂

年 度	資 本(千元)	純 益 (千元)	利 潤 率	年 度	資 本(千元)	純 益 (千元)	利 潤 率
1934	240法 币	?	?	1943	24,000中儲券	1,867	7.7
1936	240法 币	18	7.5	1944	50,000中儲券	11,780	23.6
1938	240法 币	24	10.0	1945	50,000法 币	9,051	18.1
1939	240法 币	51	21.2	1946	50,000法 币	23,784	47.5
1941	1,000法 币	134	13.4	1947	1,000,000法 币	?	?
1942	12,000中儲券	1,300	10.7				

历年股利发放:1943年股息 8 厘,紅利 2 分 2 厘。1944年与上年度同。1945年股息 1 分,紅利 1 分。1946年股息 1 分。

(“华股手册”第1105頁,“上市股票厂商概覽”第29-30頁,“股票要覽”第60頁)

四 五和織造厂

該厂成立于民14年,原为任士剛、罗庆藩等合伙經營,專織售边帶,至17年 5 月改組为股份有限公司,資本初为10万兩,設总厂于虹口,并添設針織部。20年增資至15万兩,22年 5 月增資至25万元,26年上半年再增資至40万元。滬战后虹口工厂頗受損坏,不能开工,嗣在康定路、西康路、复兴中路另設三厂繼續开工,并将一部分机件迁至重庆建立分厂。1943年因敌伪收买紗布后,原料缺乏,又受电力限制,上海工厂曾一度停工,日本法西斯投降后复工,其历年利潤率如下:

年 度	資 本(千元)	純 益 (千元)	利 潤 率	年 度	資 本(千元)	純 益 (千元)	利 潤 率
1928	150 兩	9	00.6	1943	24,000中儲券	3,000	12.5
1939	400法 币	100	25.0	1944	24,000中儲券	7,900	32.9
1940	600法 币	278	46.0	1945	24,000法 币	10,000	41.6

历年股息紅利发放

年 度	股 息	紅 利	年 度	股 息	紅 利
1939	4 元	5 元	1944	8 厘	8 厘
1940	4 元	8 元 5 角	1945	8 厘	8 厘
1943	8 厘	4 厘	1946	2 分	8 分

(“經濟研究月刊”第3卷6期,“华股手册”第87-88頁,“上市股票厂商概覽”第22頁)

五 中国內衣織造厂

該厂成立于民国9年,为华侨黃鴻鈞所創辦,初名中国內衣織布厂,資本原为2万元,14年改組为股份有限公司,增資至25万元,并改今名,其历年利潤率如下:

年 度	資 本(千元)	純 益 (千元)	利 潤 率	年 度	資 本(千元)	純 益 (千元)	利 潤 率
1929	600法 币	?	?	1944	100,000中儲券	21,899	21.9
1938	600法 币	14	0.2	1945	100,000法 币	37,214	37.2
1939	600法 币	100	16.7	1946	2,000,000法 币	232,808	23.3
1943	30,000中儲券	6,775	22.5				

历年股利发放:1943年股利,老股2元,新股0.7元。1944年老股2元,新股0.5元。1945年每股股利概发2元。1946年股息2元,紅利10元。

(“經濟研究月刊”第3卷6期,“华股手册”第103至104頁,1947年度“中国股票年鉴”)

飲食品工业

一 冠生园股份有限公司

年 度	資 本(千元)	純 益 (千元)	利 潤 率	年 度	資 本(千元)	純 益 (千元)	利 潤 率
1936	400法 币	?	?	1944	?	11,300	?
1937	400法 币	13	3.3	1945	?	31,000	?
1939	400法 币	63	15.8	1946	?	86,939	?
1940	400法 币	229	57.2	1947	2,000,000法 币	?	?
1943	8,000中儲券	2,500	31.2				

历年股利发放:1937年股息1.5元。1939年股息5元,紅利1元。1940年股息5元,紅利5元。1943年至1945年,每年各发股利1分。1946年股息1分,紅利0.14元。

(“經濟研究月刊”3卷第6期,“华股手册”第186頁)

二 梅林罐頭食品公司

該公司設立于民國20年10月，當時資本僅5千元，“一二八”事變後，因時局關係，營業不振，資本虧折大半，難以維持，乃于21年8月改組，增加資本至5萬元，在虹橋路租地自造廠房，至23年4月落成。該公司董事長為竇耀庭，常務董事馮義祥、石永錫等。其歷年利潤率如下：

年 度	資 本(千元)	純 益 (千元)	利 潤 率	年 度	資 本(千元)	純 益 (千元)	利 潤 率
1932	50法 幣	?	?	1943	10,000中儲券	2,200	22.0
1938	200法 幣	23	11.5	1944	10,000中儲券	3,700	37.0
1939	200法 幣	80	41.0	1945年 8月以後	80,000法 幣	3,300	4.1
1940	400法 幣	180	46.0	1946	80,000法 幣	61,000	76.2

歷年股利發放：1938年股息5元。1939年股息和餽贈合計25元。1940年股息5元，紅利5元。1943至1945年股息和紅利各1分。1946年股息和紅利各2分。

（“經濟研究月刊”3卷第6期，“華股手冊”第187至188頁）

三 張樂新釀酒制醬公司

該公司設立于光緒元年，原為張祖耀、張祖安昆仲合伙組織，至民國31年9月，由上海金融界投資，改組為股份有限公司。改組初期資本初為中儲券300萬元，其歷年利潤率如下：

年 度	資 本(千元)	純 益 (千元)	利 潤 率	年 度	資 本(千元)	純 益 (千元)	利 潤 率
1942	3,000中儲券	?	?	1945	5,000中儲券	2,000	40.0
1943	5,000中儲券	560	11.2	1946	100,000法 幣	?	?
1944	5,000中儲券	3,500	70.0				

歷年股利發放：1944年股息8厘，紅利4分2厘。1945年與上年同。1946年股息和紅利移作增資增股之用。

（“華股手冊”第188頁）

四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

年 度	資本(千元)	純益(千元)	利潤率	年 度	資本(千元)	純益(千元)	利潤率
1931	11,250	761	6.7	1935	11,250	601	5.4
1932	11,250	1,055	9.3	1936	11,250	302	2.7
1933	11,250	1,359	12.0	1939	11,250	2,300	21.2
1934	11,250	1,205	10.7	1946,6月	56,250	809,326	

历年股利发放:1938年每股垫发 0.8 元。1939年每股垫发 1 元。1940年每股垫发 2 元。1946年股利全部抵充認股,并每 5 股送香烟 20 支或代金 1,200 元。

(“經濟研究月刊”3 卷第 6 期,
“华股手册”第 228 至 229 頁)

五 華成烟草有限公司

該公司成立于民国 10 年,初系烟商沈德华、沈其群、沈延康等合伙組織,資本仅 2 万兩。13 年春由戴耕莘、陈楚湘等加入,改組为股份有限公司,增資为法币 4 万元,嗣因营业发达,17 年增資至 40 万元。“八一三”滬战后,汇山路厂房堆棧机器設備被毀一空,損失浩大,27 年复业之初,仅委托同业代卷,29 年始在江宁路另建新厂,至 31 年 3 月起自行开工卷制,共历年利潤率如下:

年 度	資本(千元)	純益(千元)	利潤率	年 度	資本(千元)	純益(千元)	利潤率
1936	3,600 法 币	934	26.0	1944	18,000 中儲券	11,500	63.8
1939	3,600 法 币	1,238	34.3	1945	?	43,000	?
1943	18,000 中儲券	5,900	32.8	1946	180,000 法 币	1,417,970	

历年股利发放

年 分	股 息	紅 利	年 分	股 息	紅 利
抗日戰爭前	1 分	1 分	1943	2 分 5 厘	—
1938	1 分	—	1944	6 分	—
1939	2 分	—	1945	4 分	—
1940	2 分	—	1946	3 分	—

(“經濟研究月刊”3 卷第 6 期,“华股手册”第 229 至 230 頁)

制 药 工 业

— 新亞化学制藥厂

年 度	資本(千元)	純益(千元)	利潤率	年 度	資本(千元)	純益(千元)	利潤率
1932	50法币	31	61.2	1942	30,000	1,176	3.9
1933	250法币	51	20.5	1943	120,000	3,756	3.1
1936	500法币	192	38.3	1944	120,000	17,742	14.8
1938	1,000	162	16.2	1945	120,000	17,705	14.7
1940	3,000	459	15.3				

历年股息发放

年 度	股 息	年 度	股 息
1932—1940	3元	1943	10元2角5分
1941	2元	1944	4元
1942	10元	1945	3元

(“經濟研究月刊”3卷第6期,1947年度“中国股票年鉴”,
“华股手册”第139頁,“股票要覽”第83—84頁)

二 五洲大藥房

年 度	資本(千元)	純益(千元)	利潤率	年 度	資本(千元)	純益(千元)	利潤率
1933	1,500法币	221	14.6	1943	?	45,000	?
1936	2,800法币	251	9.0	1944	?	65,000	?
1937	2,800法币	123	4.0	1945	?	150,000	?
1938	2,800法币	338	12.1	1946	50,000	563,820	?

历年股利发放

年 度	股 息	紅 利	年 度	股 息	紅 利
1937	7厘	—	1943	7厘	4分3厘
1938	7厘	—	1944	7厘	5分3厘
1939	1分2厘	—	1945	8角7分	7分
1940	1分5厘	—	1946	每股发130元 另十股发肥皂1块	

(“經濟研究月刊”3卷第6期,“华股手册”第131—132頁)

四 中法大藥房

該公司于1890年設立，为国人自制新葯之首創者，初为顧某經營，后为黃楚九獨資接盤。民元改為合伙，資本为68,000元，民4改組为股份有限公司，增資至10萬元，先后盤進中華制葯公司及羅威公司，18年增資至50萬元，并在北京路租地自建四層大廈，作为總店，另設制葯廠。23年黃楚九故世，重行改組，再增資至60萬元。抗戰发生后，該公司曾以總廠所有原料及機器之一部，迁往武汉設立分廠，旋又迁重慶，29年增資至160萬元。其历年利潤率如下：

年 度	資本(千元)	純益(千元)	利潤率	年 度	資本(千元)	純益(千元)	利潤率
1934	600法幣	52	8.6	1943	45,000中儲券	4,000	8.8
1935	600法幣	50	8.5	1944	45,000中儲券	19,000	42.2
1936	600法幣	87	14.5	1946	540,000法幣	51,221	9.4

历年股利發放：1937年每股股息2元。1938—1939年各为2元。1943年股息8厘，紅利2厘。1944年股息8厘。1945年股息8厘，紅利1分2厘。1946年股息1分，紅利1分5厘。

（“經濟研究月刊”3卷第6期，“華股手冊”第124—125頁）

火柴、水泥、橡膠等工業

一 中國火柴股份有限公司

該公司設立于民國21年7月，系烟兌商沈其祥、沈星德等26人發起組織，其股東以烟兌商居多，資本初为法幣12萬元，工廠原在閘北，“八一三”時毀于炮火，至27年春間，另在長寧路設廠，同年秋間落成復工。其历年利潤率如下：

年 度	資本(千元)	純 益 (千元)	利潤率	年 度	資本(千元)	純 益 (千元)	利潤率
1933	120法幣	20	16.8	1944	15,000中儲券	13,162	80.7
1940	240法幣	49	20.4	1945年8月	15,000法幣	3,100	20.1
1943	6,000中儲券	843	14.1	后			

历年股利发放:1933年股息0.16元。1936年和1940年股息均为4元。1943年老股股息为4元,新股1元。1944年每股股息8元,又每5股送火柴一小盒。1945年股息与红利各4元。

(“经济研究月刊”3卷第6期,“华股手册”第160-161页)

二 中国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年 度	资 本(千元)	纯 益(千元)	利 润 率
1936	3,500法币	783	22.3
1937	3,500法币	1,354	25.1
1946年3月	900,000法币	410,052	50.0

历年股利发放不詳

(“华股手册”第157页,“上市股票厂商概覽”第53-55页)

三 上海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历年利润率

年 度	资 本(千元)	纯 益(千元)	利 润 率
1936	2,000法币	383	19.1
1937	2,500法币	300	12.0
1946	5,000法币	†	†

历年股利发放:1937年发股息1分6厘。战后曾垫发股息1分6厘,32年发股息8厘,34年度垫发股息8厘。35年度因亏损未发股息。

(“华股手册”第154-155页)

四 華丰搪瓷厂

年 度	資本(千元)	純益(千元)	利潤率	年 度	資本(千元)	純益(千元)	利潤率
1941	300中儲券	32	10.7	1944	35,000中儲券	3,319	9.5
1942	2,500中儲券	256	10.2	1946	315,000法 币	21,333	6.1
1943	35,000中儲券	921	2.6				

历年股息紅利发放:1943年股息 8 厘,紅利 1 分 2 厘,每股升 6 股。1944年股息 8 厘,另每股贈10元。1945年股息 8 厘,紅利 1 分 2 厘。1946年股息 1 分。

(1947年度“中国股票年鉴”,“华股手册”第166—167頁,“股票要覽”第88頁)

五 大中華橡膠厂

年 度	資本(千元)	純益(千元)	利潤率	年 度	資本(千元)	純益(千元)	利潤率
1936	2,000法币	300	15.0	1943	?	21,696	?
1937	3,000法币	200	7.0	1944	?	115,445	?
1938	3,000法币	250	8.2	1945	?	105,913	?
1939	3,000法币	1,000	33.3	1947	500,000	?	?

历年股利发放:1938年股息 8 厘,紅利2厘。1939年股息 8 厘,紅利不詳。

(“经济研究月刊”3卷第6期,“华股手册”第161—162頁)

六 双龙橡膠厂

該厂創設于民国28年,原为旅滬甬商郑仁业等合伙組織,設厂于华山路,資本初仅法币 6 万元,嗣由30万元增至60万元,其历年利潤率如下:

年 度	資 本(千元)	純 益(千元)	利 潤 率
1943	20,000中儲券	582	2.9
1944	20,000中儲券	10,000	50.0
1945	20,000中儲券	1,000	7.0

历年股利发放:1943年每股股息 1 分,紅利 2 分。1944年股息与紅利合共 2 分 4 厘。1945年股息 6 厘。1946年股息紅利 5 元。

(“华股手册”第165—166頁)

七 明星香水肥皂公司

該公司历史悠久,原系中西大葯房之附屬事业,設工厂于上海东

余杭路，民国30年7月以业务发达，始脱离中西独立组织，资本初为法币200万元，32年7月增至中储券600万元，现任董事长为金宗城。其历年利润率如下：

年 度	資 本(千元)	純 益(千元)	利 潤 率	年 度	資 本(千元)	純 益(千元)	利 潤 率
1943	6,000中儲券	800	13.3	1945	100,000中儲券	12,000	12.0
1944	100,000中儲券	16,290	16.2	1946	100,000中儲券	65,914	65.9

历年股利发放：1943年股息紅利撥作增資增股。1944年每千股送明星皂10块。1945年每股股息8厘，紅利1分2厘。1946年股息紅利合共8元。

（“华股手册”第150頁）

八 中国保安玻璃医学仪器厂

該公司創設于民国18年，原系独资经营，至31年10月改組为股份有限公司，改組初期資本为中储券100万元，32年秋增資至中储券500万元，該公司董事長为余松筠，總經理为陈永富。其历年利润率如下：

年 度	資 本(千元)	純 益(千元)	利 潤 率
1945	20,000中儲券	4,352	21.7
1946	20,000法 币	2,838	14.2

历年股利发放：1944年股息紅利共2元。1945年股息1元，紅利0.5元。1946年股息5元移作升股之用。

（“华股手册”第147—148頁）

文化用品和印刷业

一 中国标准紙品公司

該公司成立于民国30年9月，原名中国标准信箋公司，为赵麟祥独资创办，資本初为法币5万元，嗣因营业发达，增資至法币20万元，31年7月为謀发展起見改組为股份有限公司，并改今名，資本初为中

儲券100萬元。現任董事長為許曉初，董事趙麟祥、傅在源等。其历年利潤率如下：

年 度	資 本(千元)	純 益(千元)	利 潤 率
1944	5,000中儲券	661	15.2
1946	30,000法 幣	4,982	16.6

历年股利發放：1943年股息8厘，每股升值一股半。1944年股息8厘，紅利3分2厘。1945年股息8厘，紅利1分7厘。1946年股息1分。另每股送贈品20元。

(“華股手冊”第208頁)

二 中國天車造紙廠

該公司創設于民國28年，原系沈星德、戴耕莘、顧少卿、周陸震等創辦，資本法幣30萬元，至33年1月實行改組，冠以“中國”兩字，資本為中儲券6,000萬元，現任董事長為陳寧荃，常務董事徐文照、胡桂庚等。其历年利潤率如下：

年 度	資 本(千元)	純 益(千元)	利 潤 率
1944	60,000中儲券	9,530	15.9
1946	60,000法 幣	6,594	11.0

历年股利發放：1944年每股股息1元，紅利10元。1945年股息10元，紅利3元。1946年股利移作增資升股之用。

(“華股手冊”第211-212頁)

三 永祥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該公司成立於前清末叶，為已故印刷業巨子陳永泰所手創，設廠於上海山東路，專營印刷，陳君逝世後，由其子陳安鎮繼承，銳意經營，業務更盛，至民國30年4月改組為股份有限公司，資本初為法幣50萬元，同年9月增資至200萬元，於福州路添設總發行所，並承盤山東路大昌元紙號，作為聯號，兼營文具儀器紙張教育文化用具等，32

年7月增資至中儲券700萬元，33年1月承盤陝西南路俄國四維羅印刷報館作為第一廠，又歸并藝林彩印公司作為第二廠，原有山東路之廠作為第三廠，同年2月增資至法幣4,000萬元，同時自建廠房，而將三廠歸并一處，同年秋間又歸并美繪股票印刷公司，於是範圍更形擴大。現任董事長為許曉初，常務董事為陳安鎮、吳華嶽等。其歷年利潤率如下：

年 度	資 本(千元)	純 益(千元)	利 潤 率	年 度	資 本(千元)	純 益(千元)	利 潤 率
1943	7,000中儲券	4,400	6.3	1945	40,000中儲券	14,000	35.0
1944	40,000中儲券	5,300	13.2	1946	100,000法 幣	11,509	11.5

歷年股利發放：1942年股息8厘。1944年股息8厘，紅利1分2厘。1945年股利與上年度同。1946年股息1分。

(1947年度“中國股票年鑑”，“華股手冊”第205頁)

四 商務印書館抗戰前利潤率

年 度	資 本(千元)	純 益(千元)	利 潤 率
1929	5,000	769	15.4
1930	5,000	765	15.2

歷年股利發放：1936年至1939年每股各發股息3元。1940至1942年每股各發股息6元。1943年每股發息10元。1944年每股發息3千元。1945年每股發息100元。

(“中行月刊”第365期，“華股手冊”第207頁)

機器電氣製造業

一 公信電器製造廠

該公司成立於民國28年，初系李信惠、童智開、周教貴等合夥組織，最初範圍甚小，資本僅法幣10萬元，設作場於上海廈門路，專制各種膠木電器用具，31年7月改組為股份有限公司，額定資本為中儲券200萬元，另租賃北蘇州路996弄88號為第二工場。其歷年利潤率

如下：

年 度	資 本(千元)	純 益(千元)	利 潤 率
1943	6,000中儲券	740	12.3
1944	25,000中儲券	1,122	4.4

历年股利发放：1943年和1944年股息各8厘。1945年股息3元。1946年每股200元。

(“华股手册”第216頁)

二 信义机器厂股份有限公司

該公司成立于民国27年7月，系周市隱、吳伯僧、姚仲拔等发起組織，資本初为法币120万元，至31年增資至中儲券500万元。其历年利潤率如下：

年 度	資 本(千元)	純 益(千元)	利 潤 率
1943	20,000中儲券	3,493	17.4
1944	20,000中儲券	12,475	62.3
1945	20,000法 币	4,338	21.6

历年股息发放：1943年每股股息8厘，紅利7厘。1944年股息8厘，紅利3分2厘。1945年股息和紅利合共10元。1946年股息和紅利合共8.5元。

(“华股手册”第226—227頁)

电 气 工 业

(1) 鎮江大照电气公司

年 度	資本額(千元)	純 利(千元)	利 潤 率
1934	741	82	11.1
1935	741	67	9.0
1936	743	81	10.9

(2) 上海华商电气公司

年 度	資本額(千元)	純 利(千元)	利 潤 率
1934	6,000	1,271	21.2
1935	6,000	1,582	26.4
1936	6,000	1,528	25.5

(3) 上海開北水电公司

年 度	資本額(千元)	純 利(千元)	利 潤 率
1934	3,000	996	33.2
1935	4,573	994	21.7
1936	8,641	1,061	12.3

(4) 上海浦东电气公司

年 度	資本額(千元)	純 益(千元)	利 潤 率
1934	800	143	17.9
1935	1,000	179	17.9
1936	1,226	207	16.9

(5) 上海翔华电气公司

年 度	資本額(千元)	純 利(千元)	利 潤 率
1934	250	58	23.2
1935	250	60	24.0
1936	250	76	30.4

(6) 苏州电气公司

年 度	資本額(千元)	純 益(千元)	利 潤 率
1934	1,800	481	26.7
1935	2,100	529	25.2
1936	2,205	522	23.7

(7) 常熟电气公司

年 度	資本額(千元)	純 利(千元)	利 潤 率
1935	200	35	17.5
1936	340	56	16.5

(8) 武进电气公司

年 度	資本額(千元)	純 利(千元)	利 潤 率
1934	506	106	20.9
1935	600	137	22.8
1936	660	162	24.5

(9) 滬西电力公司

年 度	資本額(千元)	純 利(千元)	利 潤 率
1935	3,000	191	6.4
1936	3,000	268	8.9

(10) 蕪湖明远电气公司

年 度	資本額(千元)	純 利(千元)	利 潤 率
1934	694	21	7.1
1935	694	7	1.0
1936	694	72	10.4

(11) 吳兴电气公司

年 度	資本額(千元)	純 利(千元)	利 潤 率
1934	409	62	15.2
1935	413	55	13.3
1936	417	55	13.2

(12) 鄞县永耀电力公司

年 度	資本額(千元)	純 利(千元)	利 潤 率
1934	1,200	233	19.4
1935	1,200	225	18.8
1936	1,220	195	16.0

(13) 紹兴大明电气公司

年 度	資本額(千元)	純 利(千元)	利 潤 率
1934	600	40	6.7
1935	628	53	8.4
1936	700	56	8.0

(14) 永嘉普华兴記电气公司

年 度	資本額(千元)	純 利(千元)	利 潤 率
1934	300	32	10.7
1935	300	35	11.7

(15) 杭州电气公司

年 度	資本額(千元)	純 利(千元)	利 潤 率
1934	3,000	381	12.7
1935	3,000	383	12.8
1936	3,000	394	13.1

(16) 福州电气公司

年 度	資本額(千元)	純 利(千元)	利 潤 率
1934	1,300	55	4.2
1935	1,300	65	5.0
1936	1,300	62	4.8

(17) 厦門电燈电力公司

年 度	資本額(千元)	純 利(千元)	利 潤 率
1934	1,342	96	7.2
1935	1,357	96	7.1
1936	1,400	114	8.1

(18) 广东南海光华电燈公司

年 度	資本額(千元)	純 利(千元)	利 潤 率
1934	208	-17	-8.2
1935	192	-10	-5.2
1936	200	1	0.5

(19) 广东順德光中电燈公司

年 度	資本額(千元)	純 利(千元)	利 潤 率
1934	1,200	0	0
1935	1,200	0	0
1936	200	-58	--29.0

(20) 中山迪光安記电力燈所

年 度	資本額(千元)	純 利(千元)	利 潤 率
1934	94	-11	-11.7
1935	94	- 9	- 9.6
1936	94	- 8	- 8.5

(21) 汕頭开明电燈公司

年 度	資本額(千元)	純 利(千元)	利 潤 率
1934	200	27	13.5
1935	400	22	5.5
1936	400	15	3.8

(22) 昆明耀龙电气公司

年 度	資本額(千元)	純 利(千元)	利 潤 率
1934	850	9	1.1
1935	850	9	1.1
1936	849	20	2.4

(23) 長沙湖南电燈公司

年 度	資本額(千元)	純 利(千元)	利 潤 率
1934	700	174	24.9
1935	827	200	24.2
1936	1,200	299	24.9

(24) 漢口既濟水电公司

年 度	資本額(千元)	純 利(千元)	利 潤 率
1934	3,715	401	10.8
1935	3,715	149	4.0
1936	3,715	- 96	- 2.6

(25) 武昌竟成电气公司

年 度	資本額(千元)	純 利(千元)	利 潤 率
1934	197	11	5.6
1935	0	41	
1936	0	72	

(26) 成都启明电燈公司

年 度	資本額(千元)	純 利(千元)	利 潤 率
1934	296	0	0
1935	390	28	9.3
1936	590	126	25.2

(27) 阳曲太原新記电燈公司

年 度	資本額(千元)	純 利(千元)	利 潤 率
1934	656	128	19.5
1935	656	87	13.3
1936	656	219	33.4

(28) 濟南电气公司

年 度	資本額(千元)	純 利(千元)	利 潤 率
1934	809	64	7.9
1935	809	148	18.3
1936	809	137	16.9

(29) 烟台生明电气公司

年 度	資本額(千元)	純 利(千元)	利 潤 率
1934	600	175	29.2
1935	600	179	29.8
1936	600	157	26.2

(30) 北京華商电燈公司

年 度	資本額(千元)	純 利(千元)	利 潤 率
1934	4,500	203	4.5
1935	4,500	369	8.2
1936	4,500	384	8.5

(31) 南通天生港电厂

年 度	資本額(千元)	純 利(千元)	利 潤 率
1935	300	104	34.7
1936	429	107	24.9

(32) 江都振揚电气公司

年 度	資本額(千元)	純 利(千元)	利 潤 率
1934	400	47	11.8
1935	400	45	11.3
1936	400	47	11.8

(33) 松江电气公司

年 度	資本額(千元)	純 利(千元)	利 潤 率
1936	120	13	10.8

(34) 南通通明电气公司

年 度	資本額(千元)	純 利(千元)	利 潤 率
1936	200	27	13.5

注：有“-”符号表示亏损。

(材料来源：1934年材料来源是“中国电气事业统计，民国23年第5号”；1935年材料来源是“中国电气事业统计，民国24年第6号”；1936年材料来源是“中国电气事业统计，民国25年第7号”。)

若干工厂利潤分配举例

通州大生紗厂歷年利潤分配

年 度	純 益 (兩)	分派成数	股東余利	花 紅	師範學費
1900	52,369	13 成	10 成	3 成	—
1901	105,978	13 成	10 成	3 成	—
1902	187,002	14 成	10 成	3 成	1 成
1904	255,134	14 成	10 成	3 成	1 成
1905	225,124	14 成	10 成	3 成	1 成
1906	483,070	14 成	10 成	3 成	1 成

上表內的花紅3成，紳董、机匠共得2成，各執事共得1成。紳董、机匠之2成及執事之1成，各作10成分派如次：

紳董、機匠花紅表

年 份	1900	1901	1902	1904	1905	1906
分受者						
總 理 張 紳	一成半	一成半	一成半	一成半	二 成	二 成
協 理 張 紳	—	—	一成二五	一成二五	一成七五	一成七五
股 東 惲 紳	—	一成半	一成半	一成半	一成半	一成半
行 董	二成半	三 成	二 成	二 成	一 成	一 成
廠 董	二成半	二 成	一成半	一成半	一成半	一成半
銀 錢 董	一成半	一 成	一 成	一 成	一 成	一 成
雜 務 董	一成半	半 成	半 成	半 成	半 成	半 成
机 匠	半 成	半 成	七 五	七 五	七 五	七 五

各執事花紅表

分受者	年 份	1900	1901	1902	1904	1905	1906
廠 執 事		三成半	四 成	四 成	四 成	四 成	四 成
行 執 事		三成半	三成半	三成半	三成半	三成半	三成半
銀 錢 執 事		二 成	一成半	一成半	一成半	一成半	一成半
雜 務 執 事		一 成	一 成	一 成	一 成	一 成	一 成

(材料来源:通州实业第147-149頁)

1931年永安紡織公司利潤分配

永安紡織公司 20 年份決算報告, 營業總額 3,600 萬元, 開支 785,235 元, 純利 2,230,425 元。其分配如次:

公 積 金	223,042 (元)
本 年 股 息	1,200,000
特 別 公 積	161,476
花 紅	121,107
滾 存	524,798

(材料来源:“紡織周刊”第 2 卷 23 期 602 頁, 1932 年 6 月出版)

1924年北京丹華火柴公司利潤分配

丹華火柴公司, 實收資本 1,167,500 元。上年盈餘 125,689 元零 9 角。其分配如下:

	(單位: 元)
一、提 公 積 金 (15%)	18,853.49
二、開付本屆股息	70,050.00
三、淨 純 紅 利	36,786.41
(一) 眾股東(得 ^{10/17})	21,639.06
連上屆派余 1,504.36 元并計	23,143.12

1. 第一優先股, 每股應派紅利一元零五分(原派 0.75 元加給四成計 0.3 元正共得此數), 共一萬股, 計 10,500 元正。

2. 第二优先股,每股应派紅利9角正(原派7角5分加給二成計1角5分共得此数),共13,350股,計12,015元正。

尙余銀628元零4角2分,并入下屆分派。

(二)办事人(得7/17) 15,147元3角5分。

(材料来源:1925年2月2日晨报)

1930年成都啓明电燈公司利潤分配

該公司資本总额,原定国币30万元,分作6万股,每股5元。当前清宣統元年开幕时,仅收足股本6万元。嗣后历年递增,截至本年,已收足股本232,700元。

該公司1930年度,营业尙屬平穩,統計全年收入灯費138,665元,除各項开支外,計純益18,041元。其盈余分配,以17,139元发給股息;其余902元悉数提为公積金。

(材料来源:“中行月刊”3卷6期第106頁,1931年12月出版)

1929—1930年上海閘北水电公司利潤分配

(單位千元)

	1930年	1929年
本年純益	260	326
扣去營業稅	26	33
淨存	234	293
支配如下:		
股東紅息	156	195
優先股紅息	16	20
董事分紅	23	29
職員分紅	31	39
职工分紅	8	10

(材料来源:“中行月刊”3卷6期第133頁,1931年12月出版)

1945年中紡紗廠股份有限公司利潤分配

(單位元)

1945年度純益	185,699,893
上期盈餘滾存	3,162
付公債	18,569,989
付所得稅	33,425,980
付官利	9,900,000
付股東紅利	89,100,000
付董監酬勞	3,564,000
付經理及職員酬勞	26,136,000
本期盈餘滾存	5,007,085

(材料來源：張一凡、張安友：“股票要覽”第22至23頁，1947年7月中國文化服務社出版)

若干厂矿剩余价值率試算表

1. 山西太原利華織染公司簡况及其剩余價值率試算表

沿革：利華公司之前身为民國3年成立之利晉公司，資本金1萬元，分100股，每股100元，大股東为宋篤臣（經營布匹，洋貨店，并在榆次近郊拥有200亩以上的土地），占股本50%以上。

該厂設有丰田式力織机25台，足踏机200余台。自民3創辦时起至民13年止，營業甚佳，历年均年有盈餘，民17年增設染色部。民19因战争和农村經濟破产曾一度停業，民22及25年先后收买利民及模範工厂。民27年中日事变时被炸，設備被炸坏一部分，民29年1月改組为利華織染公司。資本額增为6萬元，实收55,000元，主要出資者如下：

姓名	职业	住所	出資額 (元)	姓名	职业	住所	出資額 (元)
李宝春	布庄	天津	10,000	閻必有	布庄	榆次	3,000
閻药恒	估衣商	太原	6,000	李浩臣	布庄	太原	3,000
張逸民	顏料庄	天津	3,000	張刘生	药店	太原	3,000
張宝	地主	天津	3,000	王揚之	旅館业	天津	6,000
張徑平	地主	天津	3,000	許云生	布庄	天津	3,000
宋純如	財政厅长	太原	12,000	武斗南	地主	榆次	5,000(未收)

职工人数：1940年时該厂共有職員19名，普通工58名，学徒61名。

生产能力：日產10斤粗布20匹，8斤粗布41匹。

（資料来源：日本南滿鐵道株式会社：“华北工場実态調查報告書——山西之部”第649-651頁，661頁，1941年2月出版）

山西太原利華織染厂剩餘價值率試算表(一)

（以1940年度8斤粗布一匹計算）

不变資本	11.706(元)		
其中經紗	6.607	緯紗	5.607

柴油	0.180	零件費用	0.068
电灯	0.004	包皮等物料	0.080
清浩費	0.080	文具賬簿	0.016
折旧	0.028	運費	0.020
柴炭	0.016		
可變資本	2.118		
其中經紗	0.288	整理費	0.050
緯紗	0.280	技師薪金	0.160
整經	0.210	會計及員役薪金	0.230
織工	0.900		
剩餘價值	4.580		
其中房租地皮	0.074	營業稅	0.073
官息	0.130	公益捐	0.300
廠長薪金	0.060	利潤(注)	3.943
剩餘價值率	$\frac{4.580}{2.118} = 216.2\%$		

說明：(一)資料來源：日本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華北工場實態調查報告——山西之部”第662—664頁關於生產成本及每匹雜色羅紋布或條布(同樣價格)單價。

(二)可變資本中的織工費、緯紗等費都較當地規定的“標準工價”為高，如當地條格布織工費為0.80元，而這裡却0.90元。此外原表還有獎金一項計0.70元，因不易分別究竟職工和資方各所得若干，故未計算在內。

(三)(注)這裡所說利潤是當時出售單價扣除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各種捐稅、官息等剩餘價值的盈利。

山西太原利華織染廠剩餘價值率試算表(二)

(以1940年雜色羅紋格布或條布一匹計算)

不變資本	4.173		
其中經紗	2.036	柴炭費	0.008
緯紗	1.860	零件	0.031
柴油	0.081	包皮等物料	0.060
电灯	0.018	文具賬簿	0.008
清浩費	0.045	運費	0.013
機械折旧	0.013		
可變資本	1.360		
其中經紗	0.140	緯紗	0.130

整經	0.160	技師薪金	0.072
織工	0.700	會計及員役薪金	0.108
整理費用	0.050		
剩余价值	3.766		
其中官息	0.060	營業稅	0.032
房租地皮	0.034	公益捐	0.085
廠長薪金	0.032	利潤(注)	3.523
剩余价值率	$\frac{3.766}{1.360} = 276.7\%$		

說明：(一)資料來源：日本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華北工場實態調查報告——山西之部”第662—664頁關於生產成本及每匹粗布單價。

(二)可變資本中的繞經紗、繞緯紗、整經、織工等費都較該地“標準工價”為高，如織工，當地標準工價為0.50元，而這個成本表則為0.70元。此外在表格中還列有獎金0.560元，因不易分別職工所得多少，廠長及高級職員和資方得多少，故未計算在內。

(三)(注)與表一注(三)同。

2. 濰縣裕魯顏料公司簡况及其剩余價值率試算表

該公司成立於1923年4月，為張荊芳（日本留學生）、叢良弼等所創。當時資本為5萬元。開業後二、三年因虧損，再增資5萬元，前後共資本10萬元。至1927年營業好轉。

該公司董事長為叢良弼，董事張荊芳，另有股東8名。其營業範圍為從事顏料製造，其設備有發動機、制罐機、硫化元機及抽水機等，全廠職員計21名，工人68名，學徒3名。1936年計生產蓬萊牌硫化青14,177箱，萬年青牌硫化青5,348箱，喜字牌硫化青831箱，合共生產金額504,360.61元，是年盈利44,402.28元。其利潤分配如下：

法定公積金	4,500.00(元)	職員賞金	10,000.00
發起人	14,000.00	技師賞金	1,200.00
普通股東	10,000.00	獎金準備金	202.28

(資料來源：根據日本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華北工場實態調查報告書——濰縣之部”第39—42頁，45—46頁整理)

濰縣裕魯顏料公司剩余價值率試算表

(以1936年度蓬萊牌、萬年青牌、喜字牌三種牌子平均一箱顏料平均計算)

不變資本 22.6610 (元)

其中原材料	20.7850	日用品	0.4593
机械补充	0.1325	电报电话费	0.0124
工厂用品	0.2419	文具费	0.0407
补修费	0.1067	旅费	0.1560
电灯费	0.0669	防火捐害金	0.1007
广告费	0.0197	杂费	0.5387
可变资本	0.7351		
其中工资	0.4355	工人医疗费	0.0312
职员薪金	0.2634		
剩余价值	3.4392		
其中利息	1.1074	保险费	0.0730
营业税	0.1008	商会经费	0.0120
救济义捐	0.0549	利润(注)	2.0583(注一)
警备费	0.0328		
剩余价值率	$\frac{3.4392}{0.7351} = 480\%$		

说明：(一)资料来源：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华北工場实态調査报告书——濰县之部”第42至44页成本計算表及販賣成品單价表。1940年3月出版

(二)成本計算，据原文說，系根据該厂1936年度損益計算書算出，計該年生产蓬萊牌、万年青牌、喜字牌三种硫化青共120箱，每箱單价为24,776元。

(三)注(一)之企业純利，系根据原文第44頁，該厂生产之蓬萊牌、万年青牌、喜字牌三种硫化青販賣單价之平均数(共26,8353元)，扣除成本(24,7770元)共得純利2,0583元。

(四)与前表注三同。

3. 四川重慶建成煉油厂剩余價值率試算表

(以1942年9月份提煉每加侖汽油計算)

不变資本	61.30		
其中桐油	40.50	燃料	4.00
硫酸	4.00	運費	3.00
燒碱	1.80	管理費	3.00
五金材料	3.00	折旧	2.00
可变資本	15.00		
其中工資伙食	10.00	职员薪金	5.00

剩余价值	43.70		
其中利息	4.00	利潤(注二)	38.70
保險費和捐稅	1.00		
剩余价值率	$\frac{43.70}{15.00} = 291.3\%$		

說明：(一)該厂历史沿革請參看前述“抗日戰爭时期国民党統治区民族工业若干厂矿簡表”。

(二)注(一)原成本計算并無職員薪金一項，仅有工資伙食，但原管理費列有8.00元，按一般厂矿成本計算，往往將職員薪金包括在管理費內，現按其資產負債表算出，管理費中扣除5元為職員薪金，余3元為管理費。

(三)注(二)系扣除不变及可变資本和剩余价值后所得純利。根据原文所載，該厂以桐油提煉之汽油每加侖售價為120元，而各項成本僅為81.3元，純利為38.70元。

(四)資料来源根据国民党四联总处工商調查材料算出。

4. 營口精鹽公司剩余價值率試算表

(以1933年每担精鹽出厂成本計算)

不变資本	204(元)		
其中粗鹽	18	修理費	05
煤炭費	60	消耗折旧	10
水电費	10	運費	34
生鹽麻袋費	10	公司各項开支	15(注)
精鹽麻袋費	36	雜費	06
可变資本	30		
其中工資伙食	20	職員薪伙	10
剩余价值	76		
其中匯水折息	05	公司各項开支	15
总分会攤派經費	12	利潤(注)	44
剩余价值率	$\frac{76}{30} = 253.5\%$		

說明：(一)資料来源：“中行月刊”第8卷第1、2合期，“全國精鹽公司調查記”，1933年2月出版。

(二)(注)原表关于公司各項开支共30元，这里面可能包括一部分剩余价值，現以15元為不变資本开支，15元列為剩余价值計算。

(三)(注)是以出厂售價成本扣除各項开支所得之純利。

5. 重慶復興面粉廠剩餘價值率試算表

(1941年12月份)

(以小麦一市石磨成面粉計算)

(單位元)			
不變資本	319.26		
其中小麦一市石	290.87	折舊	0.96
包裝費	7.88	辦公費	2.90
燃料電力	7.01	文具印刷	1.50
機械修理費	2.90	潤滑油	1.92
房屋修繕	2.76	運費	0.56
可變資本	11.42		
其中工資	3.06	薪津	4.12
膳費	4.12	醫藥費	0.12
剩餘價值	45.98		
其中保險費	3.76	統稅	2.12
利息	0.98	利潤	39.00
捐稅	0.12		
剩餘價值率	$\frac{45.98}{11.42}$		= 402.63%

注：(一)利潤中包括副產品鉄皮21.0元

(二)本表根據1941年12月3日國民黨四聯總處工商調查材料算出。

6. 四川綦江東原第一煉鉄廠剩餘價值率試算表

(按該廠在1938年3月共產生鉄180,508市斤，折合成公噸，每公噸賣價90元計算)

(單位：元)			
不變資本	7,163.430		
其中木炭原料	4,001.530	修理費	3.200
矽砂原料	1,783.943	辦事處費用	114.508
房屋折舊	25.000	原料運費	994.100
工具費	65.160	分公司費用	42.600
器具折舊	3.640	分站費用	3.420
用品費	69.750	廢料	66.581

可变資本	560.339		
其中职工薪金	56.664	工資	61.028
伙食費	225.964	男工杂力費	52.140
路用伙食	19.270	剃头洗衣費	1.700
工人伙食	143.573		
剩余价值	1,934.031		
人債善捐	7.420	利潤(注)	1,710.011
厘稅	216.600		
剩余价值率	$\frac{1,934.031}{560.339} = 345.15\%$		

注(一)資料来源: 根据赵德民:“四川之冶鉄业”, 經濟动员 4 卷第 2 期, 第 68 頁, 第 8 表: 东原一厂在 1938 年 3 月中一个月之内的制造成本分析算出。

(二)(注)是扣除各項开支所得的純利。

7. 华丰煤礦簡历和他的剩余價值率計算

該矿矿区在山东宁阳县, 有东西兩窑, 西窑在东磁窑村, 东窑在城头村, 相隔不到一公里。

沿革: 济宁有米猷臣者, 向在嶧县棗庄开煤窑为业, 及中兴公司成立, 米难立足, 宣告歇业, 其时中兴公司有独占津浦全綫煤矿之野心, 乃派員四出調查煤矿, 探得宁阳县磁窑村有煤矿, 調查員不报于中兴, 而以告米, 米乃約会魯桐山、李幼垣等十余人集資 4 万元, 于宣統元年呈領矿区, 成立华丰公司, 米猷臣被举为正經理, 李幼垣为副經理, 宣統 2 年正式出煤, 历年营业甚为发达, 民 6 結賬盈余現金 32 万元, 由各股东分領清, 并估計矿区财产作价 20 万元, 为現有股本, 民 7 米經理病故, 股东公举魯桐山、李益园为正副經理, 二年內兩遭匪灾, 劫財架人, 公司損失 12 万元, 乃添設护矿队, 开支增多, 管理不善, 难复旧觀, 民 12, 張連云繼为正經理, 聘請專家, 开凿大斜井一口, 添購机器, 改良开采, 气象焕新, 产量增多, 民 13 結算, 获利 67,000 余元, 同年以 75,000 元收买牆头矿区, 牆头旧矿主官岐山以 15,000 元入股, 得为公司永久副經理, 复另招股 3 万余元, 前后股本湊足 25 万元, 正拟扩充, 而 14、15 兩年軍事迭兴, 矿場工作大受影响, 停工 9 个月之久, 亏损 7 万余元, 16 年轉佳获利 1 万余元, 19 年夏, 因战再起, 矿場被

紅槍會占據一月，解散礦隊，強迫停工，有形無形之損失又達3萬餘元，至是公司債務，前後達20萬元，為維持營業起見，不得已於20年春以苛刻條件，加入滕縣高鶴巢等股本5萬元，合成30萬元，公司改名為華豐合記公司，以高鶴巢為正經理，有用人與行政全權，從前欠債歸舊華豐償還，與新股東無涉。分劈紅利時，新股本5萬元按照10萬元攤算，高經理於20年7月1日就職，嗣後公司狀況日佳，連年得利。

產額：公司在平常年間，每年產額約4萬餘噸，20年因股東會內部發生齟齬，全年產煤僅32,000餘噸，21年達68,000餘噸，為該礦歷來最高紀錄，現（指1934年——編者）每日產煤約200噸，充分出產可達270噸，出焦日約10噸。

職工：職員約30餘人，采煤外工312名，里工30名，機工約180名，雜工35名。礦警隊兵70名。

歷年盈虧：華豐股本號稱30萬元，估算其資產價值，亦頗稱是，考其創辦之初，集資僅4萬元，兩次續招股本10萬元，故實收股額共計不過14萬元，其餘均為盈利，茲將該礦資產負債大略情形列表如下：

資產	(單位元)
財產	300,000
6年盈利	320,000
21年盈利	100,000
共計	720,000
負債	
最初股本	40,000
續招股本	100,000
債務	200,000
共計	340,000
歷年盈餘	380,000

（資料來源：孫越璋、嚴爽：“全國煤業報告——津浦鐵路沿綫調查第110—111頁、123—125頁、127—128頁，國民黨參謀本部國防設計委員會參考資料第5號，1935年2月出版。

华丰煤矿剩餘价值率試算表

(以1934年度生产每噸原煤計算)

不变資本	2.42(元)		
其中支柱費	0.20	爐用煤費用	0.67
杂料費	0.50	杂支費	0.50
鉄工厂費用	0.35	保安費	0.20
可变資本	1.40		
其中采煤包工价	1.18	職員薪金	0.20
井下里工	0.05		
剩餘价值	4.68		
其中矿产稅及省府補助費	0.60	利息	0.44
矿区稅	0.20	企业純利	3.62
剩餘价值率	$\frac{4.68(\text{元})}{1.40} = 334.3\%$		

說明: (一)資料来源:孙越琦、严爽:“全国煤业报告——津浦鉄路沿綫調查”,国民党參謀本部国防設計委员会参考資料第5号,1935年2月出版。

(二)剩餘价值中的利息,原表格未列具体数字,是根据原文說:公司因流动資本不足全額借款維持,利息有高至一分者,連同利息,每噸煤矿山总成本合計約近5元(原統計表总成本为4.44元),这里系根据总成本加利息一分合0.44元計算。

(三)企业純利是根据原文矿場原煤售價每噸为8.5元,总成本4.88元加企业利潤3.62即为8.5元。

层层被剝削下的鑛工人

(編者按：在旧中国，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矿場資本家和商人对鑛工人的剝削是很殘酷的，下面介紹的江西大庾西华山鑛調查，不过是旧中国所有矿山工人受剝削中的一个例子)

大庾西华山鑛位于大庾县城西北十公里。清光緒末年，德牧師鄔礼亨夫妇游西华山，发现鑛，向土民收买，每斤制錢十文。鄔詢山上观音庙住持妙玄，山为公有或私有？妙玄冒为庙产，以1千元私售于鄔，宣統时贛南江道来庾，以西华山为四大名山之一，不应售于外人，适孝廉刘人俊亦有收回名山之請，乃由南安知府令大庾县抽收紙捐备价2千元向鄔購回。民国初年，大庾紳士組織錳矿公司，集資10万元分作1万股，每股10元，时贛南各县以西华山为贛南公山，大庾一县不应据为己有，紛紛要求加入股份，相持不决，公司遂于民8無形解散，民7鑛价高涨，粵商新昌記、湘商裕丰公司先后来庾收砂，民8鑛价暴跌，大庾砂价跌至每吨大洋40元，鑛业几完全停頓。民10至民17，大庾鑛价漲落于210元乃至200至250元之間，国鑛因成本低廉，执世界鑛业之牛耳。

西华山系官山占有，矿工得自由占据一地作为口子，从事开采，向不許成立矿区，从前政府但知收稅，不問其他。

18年春，江西省政府批准建兴公司代营鑛业，西华山矿工以建兴規定砂价每担毫洋16元，不敷生活，发生工潮，数千人到县請願，預备暴动，县长及矿警出走南雄，嗣由贛州駐防旅長馬昆派兵二营来庾彈压，工潮始息。

大华山采矿純用土法，全山矿工約有2千人，日产鑛砂50担，調查时(指1935年——編者)适值廢历新年，工人大半回家，矿山工人減至1千人，日产鑛砂約20余担，平均計之每人每日可采鑛砂二斤

半。

矿工多为合伙制，雇工者甚少。采費，以每人每日采砂二斤半計之，其采矿費用如下：

項 目	每工費用(元)	每 吨 費 用(元)
黑 药	0.360	242.00
方 鋼	0.026	17.50
工 資	0.144	96.50
伙 食	0.194	130.00
共 計	0.724	486.00

(編者按：这是应有的成本，但因矿工受商人的剝削，其所得在成本以下，請參看后述)

矿工生活，工作時間約十小时，大都只做日班，不做夜工。屋不蔽雨，衣不蔽体，食則但求一飽，此为国内矿工普遍現象，西华山工人亦不能例外。

合伙工人推定一人為工头，因无隔日粮，由工头向商店賒購，名曰“繳棚”，商店一面提貨价，一面减低砂价，茲列表于下以明之：

貨 品	原 价(毫 洋 元)	繳 棚 价(毫 洋 元)
米(每担)	15.00	16.80
方鋼	0.30	0.42
鑛砂(每担加二或加三秤)	35.00	32—33.00

(注：毫洋每元折合大洋0.72元——編者)

觀上表，可知矿工生活程度在“繳棚”商盤剝之下，提高10—30%，而其劳动報酬减低10%。

工人无正当娱乐，上坳及下坳各有番攤館(賭館)一家，名为某某公司銀牌餉館，月納賭捐毫洋五百元，据商会會長称，每家連賭捐及花鼓戏，每天須抽头錢毫洋24元，方能开消，兩桌月計毫洋1,440元。此外尚有烟館及土娼亦有蛀蝕矿工而設。工人血汗，大都消耗于此，縱令遇見富矿，产砂特多，亦不过为烟室賭館及土娼造机会而已。

矿工可将口子(即矿工占有之采矿场所)出租于他人,每产砂100斤抽收5斤至10斤作为租费,亦有月收租金10元至20元者,出佃者以3年或5年为期,佃价七、八十元至七、八百元,视其出砂疲旺而定。出卖每一口可售二百元左右至千余元。如王老三大洞售于顺记得价一千余元。

西华山錫砂买卖极尽尔詐我虞之能事,且内容极为复杂,兹分述之:

小贩向矿工收砂(编者按:根据作者调查在1935年以前,江西錫矿绝大部分是矿工合伙生产后,卖给小贩商人,由商人辗转卖给外国人),矿工要求之砂价至较大庾县城为高,如现在(指1935年下同——编者)大庾砂价每担毫洋32元,而矿山砂价每担毫洋至38元。售于繳棚之商店每担减价3元,尙可得35元。商店重利盘剥矿工,矿工即抬高砂价以为应付。

西华山小贩甚多,有专以小贩为业者,有小商店兼做小贩者。小贩之业务为向矿工收砂运至大庾售于錫商,小贩在錫砂涨价时,易于获利,因矿工所得消息较晚,当錫砂跌价时,亦以矿工知之较晚。

矿工提高砂价,小贩即改用大秤,始则加一,逐渐至加二加三,即每百斤砂,可得110斤乃至130斤。小贩之秤愈大,矿工索价益昂。小贩收买之毛砂(有九成净砂)先掺入杂质5—10%,然后运售于錫商,兹约计小贩每担錫砂可获之利益如次:

(单位毫洋元)

收砂价 (以加二秤计)	收砂价 (以錫商用秤计)	掺杂后砂价 (以7.5%计)	运 费
38.90	31.67	29.30	0.70

小贩每担成本并县政府砂捐五角计之,为毫洋30.5元,售于錫商每担毫洋32元,其利益为毫洋1.5元,如系繳棚者可得毫洋4.5元。

錫商收砂,向凭肉眼评定成色,以为出价之标准,往往故意抑落成色,减低砂价,錫商砂价愈抑,小贩所掺杂质益多,甚至掺和錫渣,其弊在錫商收砂后须加以精密之淘洗,并须雇请多人拈选,不但成本

加高，且須多費時日。

現在大庾砂價每担洗淨錫砂合成本毫洋35元，每噸合大洋428.40元。其運至港滬，每噸成本如次：

項 目	至香港成本(大洋元)	至上海成本(大洋元)
大庾淨砂價	428.40	428.40
至港滬運費	73.53	85.08
捐 稅	203.60	320.80
管 理 費	50.00	50.00
共 計	755.53	884.28

注：根據同一材料在概論中作者說，過去錫商收砂後大都運至贛州，由贛州商人或錫砂局售于上海商人，然後才出口，但自1935年後大部錫砂改由香港出口。

錫砂運至香港，售于廣東省營產物經理處，每担砂價毫洋65元（廣東毫洋1.18元合大洋一元）即每噸合大洋914.00元，其利益為每噸大洋158.47元。

錫商運砂至贛州售于江西錫礦局每噸成本如下：

項 目	金 額(大洋元)
大 庾 砂 價	428.40
至 贛 州 運 費	10.80
贛 南 錫 稅	122.40
江西省政府錫稅	68.00
管 理 費	50.00
共 計	679.60

江西錫礦局在贛州收砂每担毫洋70元，每噸合大洋840元，其利益為每噸160.4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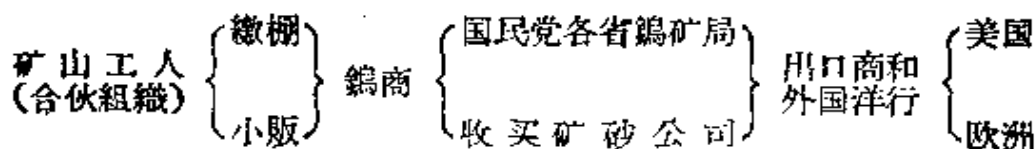
茲將廣東省營產物經理處及江西錫礦局收砂運銷港滬之成本利益列后：

項 目	贛州收砂運滬(大洋元)	廣州收砂運港(大洋元)
砂 价	840.00	914.00
运 費	75.00	4.00
矿 产 稅	20.40	8.50
关 稅	110.00	85.00
管 理 費	50.00	50.00
共 計	1,095.40	1,061.50
港滬砂价	1,200.00	1,200.00
每 吨 毛 利	104.60	138.50

(資料来源: 黃伯達: “贛南錫矿調查報告”
油印本, 第59-67頁, 1935年7月付印)

(为使讀者易于明了旧中国江西錫矿矿工被剝削的情况, 特根据上文及作者調查報告所載, 將矿工被剝削的过程和工人实得及各剝削階級所得利潤, 列成圖表如下: ——編者)

第一表 矿工受剝削过程



第二表 矿工实际所得工資伙食及各剝削階級所得利潤

(單位以每吨計算, 大洋元)

矿工(按就地出售計算)

卖给小販砂价	361.20
扣除生产材料(里药、方鋼)	259.50
工人实得(包括工資伙食)	101.70

小販繳棚平均所得(按运至大庾出售)

卖给矿商价	394.26
扣除收砂价	361.20
扣除運費	8.60
扣除县府砂捐	6.10

利潤	18.36
錫商所得(運至贛州出售)	
賣給江西錫礦局價	840.00
扣除收砂價(收砂價加洗選費)	428.40
扣除運費管理費	60.80
扣除捐稅(包括贛南錫稅及江西省府稅)	190.40
利潤	160.40
國民黨江西錫礦局所得(運至上海出售)	
售價	1,200.00
扣除收砂價	840.00
扣除運費管理費	125.00
捐稅(礦產稅及關稅)	130.40
利潤	104.60
外國洋行或出口商所得(由上海運至紐約出售計算)	
紐約售價	3,283.00
扣除收砂價	1,200.00
扣除運費打包裝驗費等	75.00
國外代理人佣金及保險費	81.20
美國關稅	1,580.00
利潤	346.80

說明：(一)礦工實際所得係根據前述調查材料賣給小販售價扣除生產費用後之生活費用。(二)小販所得是根據前述調查材料以每担毫洋32元售給錫商價折合為每公噸394.26元，扣除各種費用捐稅後之所得。(三)錫商及國民黨錫礦局所得都是根據前述調查材料。(四)外國洋行所得是根據原調查報告第25至26頁以每元美金折合大洋2.45元計算。

門头溝煤矿工人所受的剝削

整个門头溝煤矿的开采方法，可分作机器和人工两种，在今天这两种方法，所患的病症基本上是一样的。

門头溝和城子村大小小有 300 多个小窑。但每天的产量是一千多吨，相当于其他 3 个机器窑的生产量，也就是平津用煤的半数要靠他們来維持。这个古老的生产方式，浪费着过多的人力，他們用 13,000 多工人和門矿三千工人来竞争相等的生产量，为了补足隔离着几个世紀的生产力的缺陷，因此工人們享受着极重的剝削。

小窑工人从窑底背五十斤煤到坑口，工資是 2 万元，每一个工人一天最多能背 200 斤，按着以件計工法，每个工人一天的工資是 8 万元。那么每一吨煤的成本应当是 80 万元，可是事实上，工人們却忍受着一种最原始最封建的剝削，窑主为了利潤，用 20 兩一斤的大秤去称那用一步一滴汗背出坑口的煤，然后按度量衡的新秤卖出去。所以單純在斤兩上，每一吨煤里，窑主就有 500 斤的利潤。也就是每吨煤的成本仅仅是 64 万元，不过窑主却按着 80 万元加上活工工資，炸药、木材等等开銷，把出坑的煤价提高到 120 万元，但他們对煤商对外人連連喊着：“賠錢哪！ 賠錢哪！”其实，煤埋在地下，本来是沒有价值的，不过从工人的背上卸到窑主的煤場上，便由 64 万元增值到 120 万元。这样去構成消費者購入的价格。

在門头溝一吨煤只要一离开窑主的煤厂，便有許許多多知名的不知名的捐稅加上來，叫得出口的有：修崗樓費兩千元，貨物稅捐 35,500 元，灰煤捐 15,000 元，学校基金費 3 千元，养路費 45,000 元（皆以吨計）。其他如自願从軍的自願出錢，保公所鎮公所的办公費，駐軍的煤火等等一大堆化銷，各自都加了上來，然后才是通过煤商，合

作社或者窑主自己运到城里来。

从门头沟到北平运输煤的交通工具有火车、马车、汽车和骆驼等四种，汽车大多和城里的煤栈有直接关系，马车和骆驼运输量较小，一般都是运到阜城门、广安门的临时煤市上兜售，运输量最大的是火车，困难最多的也是火车，这话的提出并没有责备路局的意思，但据商人们讲，如果手眼不灵活，要车皮的确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等到车要妥以后，许多费用又跟着凑上来，在100公里以内，每吨运费是281,000元，调车费4万元，押车费3万元，卸车装车费6万元。当到了车站以后，再用汽车或者大车运到煤铺以市价或者黑市出售，才算到了消费者的手里，完结了这一段苦难的历程。

用不精确的统计，我们可以计算得出，每吨的成本加上摊派、运输费，它的价格应当是64万元，加上材料费、活工费16万元，摊派15万元，运输费411,600元，总计为1,361,600元，而今天的市价却卖到200万元，也就是32%的利润被窑主煤商和煤铺老板所榨取，使市民加重了一层可以不增加的负担。使工人过着一种可以提高的下层生活。

至于门头沟煤矿公司的煤价是受着管制的，最新的订价，据说是12万元，然而门煤主要是配售公教人员和军队，所以和市民发生的关系，是比较间接的。所起的作用也仅仅是不要让小窑卖黑市到疯狂的程度而已。

门头沟各煤矿的工人（包括门矿公司在内）分里工、件工、装卸工、和活工四种。门矿公司的里工，也可以说是技术工人，所以待遇上和件工相差很大，他们每月的工资是面粉两袋，煤500斤，底薪每日0.25元，按生活指数加成。因此里工的生活一般讲起来都过得去。但件工就远不如里工，他们每日工作八小时，工资是每日7万元。每个工人一天要吃二斤十两棒子面，每斤棒子面在门头沟的价钱是19,000元，二斤十两就是4万元，再买上几千块钱的咸菜，便所剩无几了，此外买双鞋，买件褂子在他們便成了奢望。我曾向门矿负责人探询造成这样低下待遇的原因，据说是因为“包工制”的原故。在

事实上，門矿公司本乃資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工人与資本家应建筑在出卖劳力换取工資的契約关系上，然而在中国的社会里却挤进去这种非常封建的落后的包工制，来从中剝削工人，門矿公司按着每日出产量給包工头所有工人的工資，然后由包工头发給工人。包工头不出一点資本和劳力，便可以获得很高的利潤，我問一个工人，問掌櫃的(工头)待他們怎么样？黑着臉的工人站在鋪在敗草的坑上罵着說：“我們掌櫃的，他媽拉个×，我們有了病歇一天工，借一千块钱都借不出来，可是掌櫃的拉个唱戏的来睡一宿竟就是100万、200万，給他老婆买肉紅色的冻子一买就是“打”。門矿公司的件工有3千多人，包工头每天从每个工人身上賺1万块钱，一个月便是270,000,000，这样一个吸血的大臭虫，不論从什么地方講都是要清除的。

(孟北：“溫陵与冷酷之間——記門头溝的煤矿”，
1948年3月9、10兩日，北京平明日报)

附录：若干工厂成本计算资料

一 抗日战争前2435个工厂成本统计

(编者按：这个统计材料是由国民党统计机关调查统计的，数字不够确切，但因这个材料带有全国性，比较概括，特摘录以供参考。)

业别	厂数	原料费(元)	燃料费(元)	电力费(元)	工资类(元)	薪金类(元)	其他(元)	费用总数(元)	已销产品总值(元)
木材制造业	18	2,706,753.78	29,457.20	29,418.47	238,301.00	32,805.00	173,240.00	3,209,975.45	3,268,600.38
家具制造业	12	644,405.90	4,014.50	9,586.55	229,791.80	33,780.61	14,817.25	936,396.61	1,519,554.79
冶铁业	33	1,469,657.60	41,833.83	22,782.70	423,202.40	60,535.20	1,059,963.00	3,077,974.79	4,755,154.00
机械及金属制造业	306	14,796,389.67	122,615.51	350,914.61	3,281,327.27	1,017,192.25	1,394,913.91	20,963,353.22	32,876,251.36
交通运输业	55	10,935,333.38	568,808.28	183,892.29	6,827,478.61	1,213,695.62	460,466.68	20,189,674.96	22,352,160.39
土石制造业	112	4,490,262.36	1,947,336.07	94,418.99	3,255,514.14	649,666.21	6,841,404.35	17,278,602.12	29,996,419.68
建筑业	14	508,803.68	1,620.00	7,111.80	140,047.78	36,304.00	15,680.00	709,567.24	1,746,325.55
水电业	14		1,666,857.07	241,314.55	402,045.73	589,668.70	519,709.62	3,419,596.27	13,166,607.56
化学工业	148	26,680,048.54	545,583.97	270,519.50	3,808,171.11	1,090,147.78	5,300,659.34	37,695,130.24	49,693,859.28
纺织工业	821	344,997,570.07	9,037,749.41	6,155,855.50	40,460,613.61	5,696,061.09	29,363,135.40	435,700,985.08	483,585,167.89
服装制造业	141	17,273,501.21	14,407.40	187,260.60	2,817,104.75	474,617.94	373,311.53	21,140,203.45	27,425,346.67
皮革及橡胶制造业	84	12,464,546.82	87,656.58	517,939.12	2,824,132.40	501,295.08	3,489,993.63	19,885,563.63	30,530,805.41
食品制造业	390	242,222,851.58	1,676,912.89	1,453,582.02	7,926,566.72	1,663,122.27	56,557,499.50	311,500,534.98	361,587,390.42
造纸业	234	22,568,055.45	1,342,472.25	524,029.09	4,467,280.06	1,940,139.76	801,155.31	31,643,131.92	45,450,423.49
印刷业	26	1,292,621.40	2,500.00	18,360.83	269,187.85	82,200.00	66,188.00	1,731,058.08	2,684,496.31
仪器仪表制造业	27	934,704.45	7,950.00	38,005.10	259,205.20	70,033.15	335,228.61	1,645,126.51	3,335,349.84
其他工业									
总计	2,437	703,985,605.87	17,097,775.66	10,104,991.74	77,619,970.43	15,151,264.66	106,767,366.19	930,726,874.55	1,113,974,413.02

(材料来源：刘大钧编：“中国工业调查报告”中册第337—428页，经济统计研究所1937年2月出版。)

二 全國華商棉紡廠每包紗成本(工資、動力、物料)比較表

	產 量		每包紗	每包紗	每包紗	每包紗	每包紗	每包紗	每包紗	每包紗
	平均 支數	包 數	製造成 本	工資成 本	動力成 本	物料成 本	製造成 本折合 20支	工資成 本折合 20支	動力成 本折合 20支	物料成 本折合 20支
全 國 總 指 數	17.68	1,383,858	23.12	10.91	6.67	5.54	26.16	12.34	7.55	6.27
華 東 總 指 數	18.32	936,586	22.62	10.50	6.88	5.24	24.69	11.46	7.51	5.72
上 海 總 指 數	19.67	556,514	23.64	11.42	6.72	5.50	24.03	11.61	6.83	6.59
華 中 總 指 數	15.44	163,802	25.10	12.77	6.18	6.15	32.52	10.54	8.01	7.97
華 北 總 指 數	16.85	283,470	23.65	11.20	6.31	6.14	28.07	13.29	7.49	7.29

原編者注：本表“華東區總指數”一欄數字包括上海區數字在內。

(國民黨全國經濟委員會棉業統制委員會：“全國棉紡廠統計資料匯編”，1937年6月出版)

三 西安中南興記火柴公司成本分析

(1942年)

項 目	所占費用的百分率	項 目	所占費用的百分率
原 料	63.15	保 險	1.39
燃 料	1.48	監 督 費	0.06
薪 工 伙 食	1.87	廣 告 費	0.05
電 力	0.05	運 輸	0.29
房 租	0.04	捐 稅	30.10
水 費	0.04	制 箱 費	1.48
合 計		100.00	

(材料來源：1942年8月28日重慶商務日報)

四 四川威远鉄厂冶煉土鉄的成本分析

(1942年7月份)

項 目	費用(元)	百分比	項 目	費用(元)	百分比
(一)原料費小計	7,105	88.46	伙 食	25	
鉄 矿	2,200		材 料	50	
木 炭	4,800		(四)管理費小計	475	5.77
煨 矿	105		薪 金	10	
(二)冶煉費小計	377	4.72	伙 食	25	
工 資	97		杂 支	40	
伙 食	270		开爐消費	200	
灯 油	10		稅 捐	8,040	
(三)修理費小計	83	1.05	合 計		100.00
工 資	8				

注(一)土鉄成本,据1942年7月之統計如上表,共計每日开支为8,040元,現以每日产生鉄2.5公吨計,則每吨成本为3,176元。

注(二)合計數原文为7,940元,經編者計算修正为8,040元。

注(三)資料来源:童承康:“威远鉄矿区及其冶煉业”,四川經濟季刊2卷1期,第197頁,1945年1月出版)

五 四川威远鉄礦采鉄成本分析

(1941年5月)

項 目	費用(元)	百分比	項 目	費用(元)	百分比
工 資	100,000	57.306	通 風	500	0.287
照 明	21,000	12.035	間接生产費用	20,000	11.461
支 柱 費 用	8,000	4.585	管理及其他費用	6,000	3.438
地 下 运 輸	3,000	1.719	爐 外 运 輸	14,000	8.023
排 水	2,000	1.146			
合 計	174,500	100.000			

注:該矿系用土法开采(矿精凿井采矿),因此开支浩大,鉄矿成本极高,如上表所示。該月共出鉄矿350吨,每吨鉄矿之成本为498.57元。

(童承康:“威远鉄矿区及其冶煉业”,四川經濟季刊2卷1期第196頁,1945年1月出版)

六 中國采煤成本与外國采煤成本比較

查21年春，各國采煤每噸成本，日本約日金4元90錢，合華幣5元余。安南印度約合華幣4元余。美國約合華幣6元。歐陸各國約在8元以上，以與中國之3.798元較，中國實屬低廉。中國工人以勤苦耐勞著稱，又因生活簡單，所需生活費不多，故每8小時工作之工資全國平均約僅5角，此采煤成本低廉之主因也。

(黃金濤：“中國煤礦事業之發展及其希望”，“中國實業”第1卷10期)

七 華商紗廠和在華日本紗廠20支紗每捆生產費比較

(單位元)

項 目	華 商 紗 廠	日 商 紗 廠	華商紗廠与日商紗廠之比較
工 資	10.50	5.80	(+) 4.70
動 力 費	5.50	4.80	(+) 0.70
機 械 修 理 費	1.80	0.60	(+) 1.20
其 他 修 理 費	0.40	0.40	—
消 耗 品 費	1.70	0.50	(+) 1.20
包 裝 費	1.50	1.20	(+) 0.30
職 員 薪 津	1.20	0.60	(+) 0.60
其 它 雜 費	1.50	0.50	(+) 1.00
衛 生 設 備	0.30	0.50	(-) 0.20
合 計	24.40	14.90	(+) 9.50
運 費	0.20	0.20	—
營 業 費 支 出	2.50	2.00	(+) 0.50
各 種 捐 稅 及 利 息	15.00	2.70	(+) 12.30
保 險 費	0.20	0.10	(+) 0.10
其 它 雜 費	1.50	0.50	(+) 1.00
合 計	19.40	5.50	(+) 13.90
總 計	43.80	20.40	(+) 23.40

注：原合計數不確，經編者引“中行月刊”11卷第9期修正。

資料來源：“滿鐵調查月報”1937年9月号，第23頁。

八 抗日戰爭前后手帕織造業成本比較

以棉織業中的手帕織造工業為例，現時與戰前的成本計算比較有如下列(成本費用均按每件紗計算):(1937年6月,單位元)

年 份	1937年6月	1946年5月	對總成本所占百分比		
紗 價	580元	353萬元	年 份	1937年6月	1946年5月
染 費	130	70萬元	紗 價	38.5	34.1
整 煉	14.0	81.6萬元	染 費	8.5	6.8
工 資	172.74	207.75萬元	整 煉	9.3	7.9
裝 璜	85	75.82萬元	工 資	115	110
廠 繳	382.57	122萬元	裝 璜	5.6	7.3
利 息	17.5	125萬元	廠 繳	25.3	11.8
每打成本	1.77	12.178元	利 息	1.2	12.1
售 價	2.2	9.800元			
盈	24.3%	—			
亏	—	24.3%			

從手帕織造工業的成本計算中，可以發現現在各項成本費用均較前激增，但其增漲的倍數並不一致，從數千倍至萬餘倍不等，其中以利息和工資對總成本所占的比例增加最速，而各項成本費用上漲的速度，又大都超過產品售價的上漲，致在戰前復業可維持20%的利潤率，而現在反將虧折20%。

(摘自齊進文：“當前工業危機的檢討”，
1946年7月1日上海“文匯報”)

四、捐稅、運費給予民族工業的負擔

上海絲廠請國民黨減免捐稅電

上海絲廠業協會致電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云：竊維我國廠絲，為國際貿易大宗，有聲于歐美垂50年矣。顧自日本絲業勃興，競爭于海外市場，華絲已日就衰落，考日絲國外貿易迄今僅37年，據最近調查，日本全國輸出，每年計24億餘元，而生絲及織品約占10億元，倘以全世界絲之產額為比較，除意法等国少數生產不計外，日絲占75%，華絲僅18%也，上年江浙皖三省產絲區域廠絲出口不過五萬餘包，日絲上年輸出之數為58萬包，彼之土地面積不及我國1/16，生絲國外貿易后于我國者13年，乃貿易數量超出我國已逾10倍，照此現象，我華絲再不急起直追，則數年而后恐不能生存于世界矣。嘗聞法國總理大臣叶里俄氏有言，以武器滅日本頗困難，欲不戰而滅日本者其惟開發中國蠶絲業乎。日絲之所以興，華絲之所以衰，固不外乎負擔之不同，蓋日本對於原料之繭無捐，對於出口之絲無捐，國內運輸絕無捐稅，至于繅絲之工作時間特長，工資反廉，勞資有真正互助之精神。返觀我國，繭有繭捐（向來江浙繭捐，干繭每百斤8元，皖省每百斤6元，此外尚有附帶北伐捐4元，由此省運至彼省須納過境捐1元，進口落地又有子口半稅關銀1兩5錢），及其成絲每百斤平均約干繭6担，出口時（須納正附各稅10兩6錢2分），是百斤之絲，共負擔捐稅至103元

之譜。而廠內負擔，則工資津貼獎酬等一應開支較兩年前陡增50%，此華絲與日絲負擔之比較相去天壤矣。于此風雨飄搖之際，欲求勉強維持，徐圖發展，不得不請將各項捐稅一律蠲免，從符刪除苛捐雜稅，維護民生之旨。除分電財部外，瀝情懇請鈞會鑒核施行，曷勝迫切待命之至！上海絲廠協會委員會叩印。

(1929年3月26日上海申報)

封建割据刮削下的四川蚕絲业

四川防区分制，各軍暴斂橫征，商民窘苦，实非笔墨所能罄述，兹略举絲业一端，由产地至重庆500余里內所經之关卡征額，以概其余。

川中产絲，以川北之三台县为中心，每絲一担（重100斤），在三台田頌堯防区内，須征統捐4元，杂捐6元余，去200里至遂宁，为边防軍李其相防区，于此200里內分太鎮、遂宁、安居設三关卡，各抽护商印花查驗等費，每关約7元，后經絲商再三請求，始合并于遂宁一处，共收护商等費，每担14.5元，在遂宁約200里至合川，为二十八軍陈魯农防区，于合川抽統捐7.5元，印花查驗0.4元，又于合川下游数十里內分，大河坝、三河溪、北碚等处分設关卡，各征护商印花查驗等費10元有余，本年經絲商再三請求，始允于合川設联合收稅收护商費19.5元，統捐7元，去合川約200余里，至重庆为二十一軍刘湘防区，于离渝城20余里之磁器口十余里之香国寺設机关二处，各征所謂护商印花，查驗江防渝夔护商渝北护商等等名目，各共30余元，于是始至重庆，又征进口稅11元零，統捐7.5元，此川絲自产地三台历500余里之节节抽征，大概如此。每絲百斤运至上海，售价不过500—600元，而自产地經500余里至重庆出口，共須納稅140—150元，至寸寸关卡，步步留难，600里地非20余日不能到，此中千苦万辛，更有非文字所能表达也。

（1930年12月28日时事新报）

抗日戰爭前棉紡織業負擔的 捐稅和運費

我國棉業對於稅率之關係，視任何貨物為切。以言國外，則進口物品棉類居首，以言國內，則外商紗廠占數最多，故無論對外之關稅及對內之稅則，其影響於棉業者實為最巨。我國關稅稅率最輕，雖經一度提高，比諸他國仍低，邇來傾銷盛行，各國益積極增高稅壘，以御外貨，而尤以向居于被經濟侵略之國為甚。印度對於日本紗布，一再增稅，最為顯著，其他不勝列舉，而我國迄未有增稅以應付傾銷之舉。故最近兩年，棉貨雖隨進口總額而退減，但棉紗比諸同樣貨品，減率仍屬較低，實為國內棉貨銷路呆滯之大原因。國內紗布稅則，自實施統稅，表面上以紗支分類，中外紗廠，似無軒輊，然以中外紗廠紡紗支數觀之，則其有利於外廠者甚著，蓋統稅紗支以23支為粗細之分級，而稅率相差，每担僅有1元，外廠紗支，前已以20支為中心，今益移高，殆已超出23支，而華廠中心紗支，在昔不及16支，今雖提高，要仍在20支以下，茲試以20年，上海華廠日廠產紗支別，作簡明比較如下：

上海華廠日廠紗支數分類比較

	華 廠	日 廠
19 支 以 下	55.8 %	14.1 %
20 支	26.90%	48.10%
21 支 以 上	17.3 %	37.80%

在實施統稅之初，本會再三吁請更改等級，雖立法院已表同情，然卒為事實上之困難所阻，故從關稅與統稅言之，均為不利於華廠之稅率，而自統稅實行以來，重征退稅情事，視昔大繁，因此本會對於稅

务交涉，几于日有其事。茲將兩年來關於稅務之舉犖大端分陳如次：

營業稅 棉業本不在營業稅徵稅範圍之內，營業稅法及統稅條例，均已載明，然各省藐忽法令，惟知苛征，最初則強令紗廠分庄及批發所納稅，由本會請免，始允凡經向實部註冊之批發所，得准免稅，其後蘇省營業稅局，又勒征紗廠在產地所設之花庄，本會據理力爭，至再至三，卒未達取銷目的，旋且變本加厲，即廠門收花，亦須納稅。

統稅條例，紗布已經納稅，不得再征其他任何稅捐，然目前政治狀況，各省為自裕收入，另征新稅，時有其事，舉其著者，（一）20年秋長沙征收紗布堤工捐。（二）20年冬湖南舉辦產銷稅，棉紗每包6元。（三）21年夏皖省征收紗綫特種營業稅。（四）21年夏蘇省舉辦特種營業稅，棉花亦在其例，以上四事，均經本會爭免。此外尚有數端，雖經根據稅則力爭，未能免除，但均獲得相當救濟辦法者。（一）21年夏江西征收紗布產銷稅，凡與統稅相等，本會一再吁免，卒無效果，但最後蒙稅署准予退還。（二）川東稅捐總局，近忽征收國產棉紗，本會呈蒙中央飭令改為每包收免票費0.5元，其餘地方附加，一概免征。（三）21年冬長沙對於進口棉紗，忽有征收築路捐每包5元情事，目前紗銷不振，湘省為銷紗要區，如再征稅，關係非淺，然雖函電交馳，湘省政府終以築路無資，堅持不允，初則減為2元，近擬改征為借，尙在洽商之中。

（摘自1933年4月“華商紗廠聯合會報告書”紡織週刊，3卷第17期）

國內捐稅苛繁，雖中央之禁令屢頒，而各省之征收如故。即自統稅實施，內地之苛捐雜稅，仍未免除。詎營業稅頒行，各省為充裕稅收，又復強令紗花納稅，棉花由農民以達于紡廠，及紗布由紡廠以達于農民，轉手甚多，每一轉手，即須納稅一次，是以內地棉花運至紡廠，紡織成布而復運至農村，恒納營業稅至十次以上。本會（華商紗廠聯合會自稱——編者）鑒于其影響于紗布成本極巨，據理力爭，案牘盈尺，吁再至三，始則准免紗廠產地設庄收花之稅，繼則紗廠分事務所之營業稅亦邀豁免，惟販賣紗布之營業稅，雖以棉統會之申請，亦未能邀豁免也。

我國交通不便，運費奇重，頗足影響棉貨之運銷，曩者西北棉花運滬，其費過于印棉之運費，且几與美棉之運費相等，故內地棉價雖廉，但以運費之巨，售價仍貴，本會早向當局請減運費，以利運銷。

說者謂中國紡廠之衰敗，由于自身之不隨時代以并進，斯言允當。吾人固無庸諱言吾人之不健全，然中國紡業之興，不及20年，為時固暫，即此20年間，內患外竟，交迫而至，無一日之喘息稍蘇，且如改進技術，必先有人才，中國紡校迄今僅有南通一校，呼吁于當局，既視為緩圖，欲自營則又力有未逮，技術之人才不足，曷言改進。

（“中行月刊”第8卷第2期211—212頁）

棉紗統稅未頒布前，紗商要求分為四級，而政府為改良稅收，只將其分為二級。原系粗紗需求既大，出貨乃多，故側重粗紗，希望稅收之暢旺，忽略細紗。以為定能得失相償，于是華商紗廠，几至不能立足。蓋現在征收之稅率，為23支以下每担征收2.75元，23支以上每担征收3.75元兩種。而華商紗廠出品，均在10支，至多為32支，但銷路較大者，為10余支。而日商紗廠出品，均為細紗，最少亦在40支以上。夫棉紗愈細，價格愈巨，抽以重稅為宜。而我國此次改訂稅率，則完全背道而馳，致我紗廠，受日商種種優勢紗廠之壓迫，岌岌不可以終日。因此日人資本在政府獎勵和保護下，擬在上海設一極大紗廠，抱30萬錠出貨之企圖，并希收買華紗廠云。

（“中行月刊”3卷1期，1931年7月出版）

山东火柴业因捐稅負担过重 向当地政府請願

中央增稅后，青島火柴廠商，因統稅过重，不堪負担，前曾向当局及濟南省府請願，請轉財部減輕統稅，韓（復榘）、沈（鴻烈）兩氏，皆允如所請，代向当局陳訴，惟迟至今日，尙未解決。茲將該市火柴業之統稅負担摘錄如下：

每一箱火柴之制成，計藍色色紙火柴盒、氯酸鉀、松香、葯膠、腊料、胡料、玻璃粉、白玉粉、鉛粉、紅色杆子、硫化磷、木箱商標、機器油、夾立板、炭球等原料，需洋22.52元，再加工人工費、糊盒費用，職員薪金，扣用運費電燈煤炭，利息雜項等費共約8.5元左右，共達30余元，再加統稅10元，售價41元，至38元，業已有亏本之虞，今再加統稅17元，共27元，几与貨價相等，全世界火柴稅率，將以我國為最重。故自加稅以后，由本月5日至現在，一箱未銷，所制成之箱，皆存積倉庫，致資本積壓，不克周轉。倘目前不能解決，年關前后恐有全數停業之虞，不特外貨可以傾銷，致利權外溢，而直接間接賴火柴廠生活之20萬人，將全數失業，實為目前之大問題也。

（摘自“中行月刊”8卷第1、2合期，1933年出版）

實業部前奉行政院令，關於調查國內產麥滯銷，設法救濟一案，由該部派商業司長梁上棟，先往晉、冀、察、綏、魯、豫、等省，及北平市、青島市，与当地省市府會同調查具報，梁氏即遵于去年12月3日乘車北上，先后到濟南、青島、天津、北平、綏遠、張家口、太原、開封等處，于本年1月30日回京，茲特探悉梁氏調查報告書如次。

濟南商民之意見，（一）紙烟及火柴兩種特稅之增加，商人異常感覺悲觀，因全省小火柴工廠有17—18家之多，加稅后，至少有半數無

法維持。小紙烟厂則所在多有，不可胜数，加稅后，多数須关闭，因紙烟特稅只分兩級（一級每箱 160.2元，二級每箱 80 元），本地普通紙烟一箱，成本不过30—50元，科以80元之重稅，万难負擔。（二）面粉厂則完全受洋面进口之影响，大半已減工或停頓，对于洋面进口稅率，仍嫌太輕。（三）希望政府对于国貨工厂，与以獎勵及方便。

厂方困难情形。据熟悉火柴业情形者談，火柴新稅，虽經財部拟定变通办法，但目前困难仍多，不足救济。（一）自統稅增加后，黑头与紅头火柴稅率既不平均，銷路亦难竞争，盖南方多用黑头火柴，北方多用紅头火柴，此次增加統稅，黑头每箱成本 54 元，只担负稅款 21.4元；紅头每箱成本 22元，竟負担稅款 27元。稅率既不平均，而負担輕率与負担重稅之厂商銷路当然要受影响。（二）各厂为竞争营业，均尽量做下存貨，对各地推銷处廉价賒賬出售，致各厂互受損失，欲謀根本解决办法，惟有由政府用記賬法，限制各厂生产过剩之弊。（三）自加統稅后，各厂負担稅款甚重，火柴勢須漲价，而农村破产，購買力减少；外国火柴傾銷，受其影响，且各厂又系先繳稅款，卖出之貨，多系賒賬，致金融活动大受影响。現在为設法自救，拟联合各厂商台組一团体，共賃房屋若干，將各工厂积下之存貨移去一部分，由保險公司保險，再以利息向各銀行抵押，支取現金，暫維金融，或可漸上正軌云。

（“中行月刊”第9卷第1期“产业”117—131頁）

陶瓷业負担的捐稅年年加重

景德鎮查稅，為省庫收入大宗，近又改征特稅，名目繁多，征過于本，一貨出省，在本鎮有出山稅，古縣渡、鄱陽，則有查驗或補抽稅，湖口則有出口正稅，運川、湘、鄂者，有武穴、漢口、新河、鸚鵡洲、觀音洲補抽稅。前清定例，大率以百分抽十，光緒癸卯，改章統稅，以百分抽十四。民國以還，繼續增加，民3增加15，民5增加55，民13九景汽車路捐又增加15，較之遜清統計增加22.5成，如運京滬瓷1担，為值不過30元，除在景完納正稅一元外，近又附加0.2元，沿途所經湖口、華陽、蕪湖、大勝關、三叉河各處，均須加納稅約一元二三角有奇，若合正稅及其附加，以計其稅率，已達8—9%，科稅之重，無與倫比。

(1930年5月28日東北商工日報)

據該會(陶瓷業公會)調查：江西瓷器，早經改征特稅，并依裁厘要點三項，定為產銷一次并征，故原訂稅率比之舊厘，有重至十餘倍者，即最粗劣之品，亦較重于舊厘三、四倍不等。河北厘捐征收瓷厘，其始不過每百斤征銀2錢2分5厘，屢次加捐，迄今已達3.9元，超過原訂捐額十倍。其次，則瓷器自江西景德鎮運至天津銷地，除運費外，按產地買本地細瓷所納捐稅，約合5/10，粗瓷竟達9/10，益以營業開銷，較之往者，逐年增加，故不得不提高市價，以顧血本，于是向來在津辦貨者，遂皆裹足不前，別尋途徑，致使津地瓷業，一落千丈。再日本細瓷入口，僅納海關正稅每百斤征銀9錢，由津運往內地，每百斤亦只征4錢5分，較之國產不啻少征一半，故近來僅見洋磁暢銷，國貨几已絕迹。茲將由贛運津沿途捐稅列下：

景德鎮 每百斤舊征特稅0.96元，加征0.69元，共征1.65元。

九江鎮 出口正稅9錢，附稅4錢5分，共征1兩3錢5分。

九江特別市 市政捐 1 錢 3 分 5 厘。

天津海關 入口正半稅 4 錢 5 分，附半稅 2 錢 2 分 5 厘，共征 6 錢 7 分 5 厘。

天津常關 出口稅 4 錢 5 分。

河北厘捐局 厘捐舊征 0.35 元，加征 3.55 元，共 3.9 元。

計由贛來津，每瓷器百斤，共納稅銀 2 兩 4 錢 7 分 5 厘，又洋 1.65 元，約捐銀 8 錢 3 分 5 厘，又洋 3.9 元。

（“中行月刊”第 1 卷第 4 期第 42 - 43 頁，1930 年 10 月出版）

上海机制面粉业請国民党 减免麥粉特稅呈文

呈为呈請免除国内麥粉特稅以維实业而保民生事：窃維国家之稅收，莫非出自人民之負擔，故一方为謀財政之发展，一方当顧人民之資力，若但从国家財政上着想，徒为暴斂横征，而不注意于人民，人民基本財產日為侵蝕，則財產有尽，稅源亦有穷期，其結果必致經濟界陷于恐慌之狀態，实业之不能振興犹其余事。今我大部頒布之征收麥粉特稅條例，病民病商适足阻塞国家稅源，查該條例規定，凡本国机制麥粉行銷内地者，每包納特稅大洋1角，行銷国外者，于出口时每包退還特稅大洋5分；舶來麥粉，每包亦照0.1元征稅，分区設立專局，按數征收，其供机制麥粉之国产小麦，一切捐稅，一律免繳。驟視之，以为原料小麦，本有捐稅，为數煩苛，今則移諸制成之粉，按包收取，似覺挹彼注茲，聚散为整。裁厘加稅，預立雛形，固亦事理所宜然，应有服从之义务，正不知此項特稅，較之从前小麦捐稅，多寡輕重，大相悬殊，其初籌各諸員到滬与厂商協議，雷厉风行，勢在必办，商等当时以为軍事尚未大定，餉糈浩繁，国民革命，責有攸歸，不得不抱犧牲主义，暫为認繳，乃各区各地厂商，对于此項稅率立时起而反对，至今毫未破白者有之，嘗議滬厂別有作用要求减免者有之，众論沸騰，举国为患。而我上海各厂，身受痛苦，未尝不有感覺，所以欲言而不即言者，一則因大局未平，軍事尚未結束；一則因厂商艰困，政府尚未明知，遽起改革，易起糾紛；是以茹苦含辛，权宜应付。慨自7月1日起征此項特稅以来，已逾3月，商等外困銷路，內加成本，未受保护之实益，已有破产之危机，現在統一完成，訓政开始，恤商裕課，自宜并顧兼籌，为民众輕一分負擔，即为国家培一分元氣，揆諸先

總理建國大綱，建設之首要在民生一語，良以民生難保，何以國為，此項特稅直接取之于廠商，間接取之于食戶，以今日之現狀而論，無論廠商食戶，皆有請求免除之必要，是以商等公同集議，上海各廠應繳前項稅款，自10月1日起，一律停繳，在未經核准免稅以前，所有出廠麥粉數量，仍請暫行登記，听候解決，業經分呈大部暨蘇浙區麥粉特稅局在案。謹將廠商不能担任麥粉特稅原由，敢為大部縷晰陳之：

(一) 从前吾國機制麥粉為提倡實業關係民食起見，概免稅厘。原料小麥征收厘稅，始於清季甲午，其初每石僅征制錢30—40文，合洋不過2分有餘。自民國紀元，改為產銷并征，每石4分。迄民國15年，增加稅率，每石征稅洋7分，此指在江南各縣采辦而言，若至江北各縣購麥，則厘稅較重，再加揚州關關稅一道，每石約征稅洋1角2分。每小麥一石，可制麥粉二包半，則用江南小麥制粉、每包合厘稅2分有奇。江北小麥制粉，每包合厘稅4分有奇。今免去原料厘稅，改征麥粉特稅，每包0.1元，互相抵划，一則增加7分以上；一則增加5分以上，平均扯算，每包約增稅洋7分而弱，採用皖省蚌埠之麥，厘稅未免，尚不在內。上海各廠，旺月出粉數目，月可240萬包，特稅应征24萬元，以增加之7分計算，每月驟增168,000元，淡月出粉較少，數可类推。民國10餘年來，軍事頻仍，百業雕敝，麥粉銷路疲滯，運道梗阻，廠商虧耗血本，已覺力盡精疲，得免原料厘稅，委屬得不償失，何堪再增巨大之負擔，此對於前項特稅不得不請求免除者一也。

(二) 上海附近產麥為數極微，民食尚屬不敷，各廠需用原料，皆采自大江南北或皖省之蚌埠，運輸等費，多有定數，查由江甯購麥到滬每包運費，需洋0.481元，鎮江0.314元，常州0.342元，無錫0.301元，高郵0.709元，姜堰0.752元，泰縣0.669元，凡此數處，運費高下不一，平均扯算，每包已在0.5元以上，其或采自皖省之蚌埠，每包運費，竟須2.6元之多。上海各廠即以小麥運費一端而論，則與就產麥之地設廠，得以隨地採購者，其成本輕重已有霄壤之殊。而小麥運自遠方，舟人摻泥和水，沿途拋撒，斗量虧耗，尤與就地採購者不可同日而語。他如上海各廠，地價高於他處，多或數十倍，少亦十餘倍，職工薪資昂貴，特別捐款繁多，尤

为显著之事实，此对于前項特稅不得不請求免除者二也。(三)上海各厂日可制粉8万包，本埠日銷不足1/10，其余均須行銷于南北洋各地，年来洋粉充斥于市，华粉銷路为其阻塞，已成强弩之末。良以洋商資力雄厚，以經濟压迫之手段，为营业竞争之方針，竟致不惜牺牲賤价兜售，商等資力有限，成本非輕，若再加以此項特稅，勢难与之相敌。說者謂洋粉入口，亦征特稅0.1元，初无軒輊之分，不知此正資力成本之不足，实未可相提并論。現在調查南北洋积存洋粉300—400万包，已訂而得入口者240—250万包，訂而未裝者300—400万包，綜計數在一千数百万包之多，香港一埠，洋粉輸入，无从洞悉，尙不在內。自今觀之，洋粉勢如潮涌，华粉安有立足之地，設使南北各地均为所占；我上海各厂，惟有停机歇业，坐以待斃。商本不足恤，其如数十万工人之生計何？不甯唯是，各地如为洋粉占据，則粉市由其操縱，一旦提高价格，其如数千百万之人民食料何？此对于前項特稅不得不請求免除者三也。(四)奉頒之麦粉特稅条例規定，分区設立專局，征收稅款。我上海各厂粉稅，已于7月1日起征，無論他区至今均未征收，即苏浙一区，办法亦未一致。前奉大部快邮代电內开，苏浙区内地麦粉各厂請求減稅一案，本部业予折衷决定，江南內地各厂，提給獎勵金二成，江北內地各厂，提給獎勵金四成，上海各厂，仍照定率繳納等因；是此項特稅条例，不啻为上海之一种單行法規。設令上海具有特殊之利益，或受优厚之保护，則虽早繳稅款，增加稅率，亦无足怪，无如上海各厂，成本之重，銷市之难，已如上述，以今日之情勢而論，創深痛巨，迥非仅求酌數成之獎勵金所能維持，此对于前項特稅不得不請求免除者四也。(五)上海各厂採購本省原料小麦，仅數六个月制粉之用，若皖魯等省收成不丰，并无余麦可購，則为維持工人生活計，勢不得不采办洋麦，以資接济，道远費重，尤非購自国内可比，若就产麦之地，設厂制粉，得以随时收买，則无空置之虞。或謂上海各厂麦粉，可以大批出口，更可坐收退还均分之利益，不知外洋各国，于外粉进口时，抽稅极重，日本每包征收日金7角，南洋群島每包有征收至金洋5角者，試問区区5分之稅，何能抵补。以今日之情勢觀之，上海

各厂，实为危急存亡之秋，此对于前项特税不得不请求免除者五也。

(六)欧美各国对于人民食料，多不征税，我国建设伊始，自应抱世界大同主义，关于民食诸税，一律免除。党国要义，食为人民四大需要之一，政府当与人民协力共谋农业之发展，以足民食，麦粉为民食之一种，尤为穷黎日常必需之品，从此免除一切捐税，非为减轻厂商成本，实即减轻人民负担，此对于前项特税不得不请免除者六也。总之此税果欲实行，非待关税收回自主，将洋粉进口提高税率，确定保护税则，全国行政趋于一致，然后酌定相当税率，庶无畸重畸轻之弊。为此瀝陈下情，呈请大部迅赐暂行免除麦粉特税，废止麦粉特税条例，以维实业而保民生，实为公便；谨呈。

(1928年10月26日上海新闻报)

天津面粉厂因軍閥混战影响 捐稅負擔过重紛紛停业

津市面粉厂商，因受連年战事影响，什九賠累不堪，其未歇业倒閉者，亦在苟延殘喘之中，面粉公司同业会，昨致函总商会，請轉呈行政院等設法救济，商会据函，已轉呈核办，其文云：窃据天津面粉公司同业会函称，查我国关税受协定桎梏，垂80年，商业日益衰微，国势因而不振，幸經全国一致努力，毅然宣布关税自主，国定稅率重行改訂后，敝会于欣幸之余，追忆痛史，撫今危狀，特將本业受害情形，再为縷陈，俾于稅則中有所救济焉。我国本以农业立国，国内产粮，向来足敷本国之用，远姑不論，即在民国元年以前，津关进口，鮮有洋粉之輸入，良以彼时国内安定，农产尚丰，粉价不昂，故外貨无由而入，民元以后，津埠粉之企业，繼增逐起，数年之間，先后成立者，計有8家，貧富民生，均賴調剂，市面金融，頓現活象，迄今連年战乱，农民首遭其殃，既感征发之痛苦，飽尝軍隊之蹂躪，更苛捐暴斂，剝削难支，遂不惜弃其固有之田产，轉徙流离，別寻生路，农田既以强半鬻耕，則生产自漸供不应求，外貨遂得以挾其不平等条約之保障，任情輸入，而国内粉厂，乃受其压迫，敷衍支持，延至民16年，各商率皆相繼停业，統計粉厂8家，至此已去其半，不意麦粉特稅，又于17年頒布施行，当局之意，固以此为統一稅收，实行关税自主之先导，殊不知洋粉运銷北省內地，向須到处納厘，每袋約計一角六、七分，乃自特稅实行，国粉外粉，列为同一稅率，国粉不过改厘为稅，等于未減，而外粉因划一統稅之故，反形輕減，更可通暢行銷，而国粉之压迫，轉益加甚，津埠粉业，受此絕大打击，几至全体敗坏，暫時支持而已。查世界各国关税原則，莫不减免国产，重征外貨，另予破格獎勵，如日本之獎勵粉厂，

除對外粉向征進口稅日金1.4元，所有輸出成品，全數免稅，故其國人努力于增加製造，因而國內粉業，始得與美粉競爭。洋粉并非我國需要，且又妨害國內實業發展，按諸一般關稅原則，外粉應在重征之列，麥粉為民食大宗，復考歐美日本各國除進口者外，從無征及國產者，津海關洋粉進口數目，最近調查，已達1,400余萬袋之巨，其由上海轉口來津者，尚不在內，其數至為可驚，我國若不自行維持，亟籌獎掖，一任外貨之供給，竊恐長此以往，民生前途之危險，實有未堪設想者。顧救濟之策，不外二端：甲，增加外粉稅率，減免國粉稅。乙，發展農產，改良種植，使原料逐漸豐富，糧價低落，則外貨自無從而入。然後者一時既難期其實現，而前者實為救急之謀，應請貴會迅轉呈行政院、工商部、財政部，採納施行，無任感盼之至。

(1931年11月3日天津大公报)

市商會近據津市各面粉公司呈稱，以本市面粉業因受洋粉傾銷，及南方面粉原料免厘金影響，各廠商將無以自存，懇祈轉呈國府，對於洋粉進口援照各國先例，重課進口稅或列入傾銷稅則以資救濟。經商會核議結果，以津市各粉廠所遭困苦，俱系實情，當即據情分別轉呈國民政府、行政院、財政部、實業部及財政部稅務署等5機關，請即俯念商艱，准如所請施行。原文略謂：查津市面粉，自民國17年施行統稅以來，華洋一律待遇，每包同征銀洋1角，津市國粉遽爾一落千丈，其原因（一）為舊日洋粉行銷內地，原處到處納厘，自改統稅，反覺輕減，故華粉銷路益被侵奪。（二）原料南麥有厘，北麥無厘，自小麥免厘改征面粉統稅之後，南方粉廠得獲原料免厘之益，而北方粉廠則徒受增稅之累。基于以上兩大原因，遂至逐漸衰落，彼時原有粉廠8家，竟至關閉其6，去歲雖有一、二廠勉強恢復，然實際既被洋粉傾銷，復受滬粉壓迫，處茲華洋各種麥粉傾銷之中，豈能尚有掙扎之地，本年傾銷數量，更行激增，華粉益無立足之地。倘不迅籌維持，則國粉廠商，勢必盡行破產，而公家稅源亦必逐漸枯竭。

(1932年11月18日天津大公报)

四川制糖业負担的各种捐稅

全川产糖之量，既在 1 万万斤上下，而其稅捐，自然頗有可观，計每万斤白糖，須繳納产地捐 40 元，其运銷各处，又另有各种附加稅捐，計自阳县至万县，共有稅关 18 所，每件白糖，約重 100 斤上下，应納稅 12.715 元，而式式之出口稅尚不在此例。茲特將自阳县至万县沿途附加之糖稅列表如下：

重庆市糖业同业公会調查沿途附加糖稅一覽表

县 別	征稅名称	白糖每件稅率(元)	备 考
阳 县	护 商 費	0.50	
汉 中	〃	0.68	
內 江	〃	0.68	
富 順	〃	0.60	
泸 县	〃	0.80	外加印花稅 1/10
合 江	〃	0.90	
松 溉	〃	0.10	
重 庆	江 防 費	1.50	
〃	印 花 費	0.30	
〃	自來水股 款馬路股款	0.28	
長 寿	护 商 費	0.50	外加印花稅 1.5/10
涪 陵	〃	0.60	外加印花稅 1/10
鄭 都	〃	0.60	外加印花稅 2/10 及 市政馬路 2/10
〃	乐 捐	0.60	外加市政馬路經費 2/10
忠 县	护 商 費	0.60	外加印花稅 2/10 及 市政馬路經費 2/10
〃	乐 捐	0.60	外加市政馬路經費 2/10
万 县	护 商 費	0.80	外加印花稅 2/10 及 市政馬路經費 2/10
万 县	乐 捐	0.60	外加市政馬路經費 2/10
合 計		11.24	外加 1.375 元

所謂川糖，一經制出，即被抽收產地捐，繼運銷他處，又被抽收各種附加，為日既久，產糖之地段與材料雖稱富有，而業糖之商民則日見賠累，對於售出之價值不能不有所增漲，而其制糖之方法，又無余資以加改良，於是只納海關進口稅之外國糖，浸假而輸入來川矣。茲特將19年度每月洋糖（又名車糖）進口之數量列表如下：

年度月份	進口件數	每件斤數	共計斤數
1930年2月	400	180	72,000
1930年3月	200	180	36,000
1930年4月	1,750	180	315,000
1930年5月	1,707	180	313,260
1930年6月	1,439	180	259,020
1930年7月	3,140	180	557,200
1930年8月	3,065	180	551,700
1930年9月	1,054	180	189,720
1930年10月	2,200	180	396,000
1930年11月	700	180	126,000
1930年12月	2,030	180	365,400

備考：總計件數 17,685 總計斤數 3,181,300其每件進口稅較川糖約多一倍但無附加各稅

糖業沒落最大原因有二：自上述吾川產糖之量數觀之，全年共約1萬萬斤左右，其現象不為不可觀矣，但就19年度洋糖進口之數量觀之，則川糖之銷場，已為其侵占1/10（因19年洋糖之進口數量為300餘萬斤），此為吾川糖業沒落最大原因之一也。又吾川所產之糖，每年除正稅不計外，每萬斤糖汁，除抽收40元之產地捐外，每百斤左右（即糖一件）尚應繳納12.715元之各種附加稅。至如洋糖，除繳海關之正稅而外，概不完納其他各稅，故其成本自較川糖為低。且洋糖雪白晶瑩可愛，川糖烏黑可憎，銷糖之住戶，更不願推銷川糖，此又吾川糖業沒落最大原因之一也。有此二因，故自今年以來川糖之銷場頗不景氣。

（摘自1931年8月18日天津大公報）

烟酒联合会向北洋軍閥政府 請願減稅原文

为請願事，維烟酒兩項为我国之极大利源，商民业此者数逾千万人。兩业病，則栽烟草者、制烟者、种粮秣者、造酒者，皆病。世之談新政者，輒襲各国緒余，以烟酒为消耗品，不虞寓禁于征，捐稅新章日增一日，遂使兩业蒙不測之亏损，停种、减制害及农工，相率歇业，影响全市。夫至兩业病，欲稅源之增收不可得矣。而我国更受商品之拘束，輸入外貨納稅至微，領一子口稅單，即可通銷全国，卒至卷烟盛行，洋酒充斥。我烟酒业之衰落，早已寓諸无形，近且厉行公卖，为国怙怨，長此不变，必至兩业生机与国家稅源同归于尽。現狀如此，无可緯飾，兩业痛深切肤，联合全国同业，合詞請願，敬將兩业狀況，請願理由主旨臚陈于左：

烟酒业之狀況 烟之大宗，甘肃产青条黄烟，福建产皮絲，广东产淨絲潮烟，其余紅黄烟叶，各省均有，烟稅之名目，除普通繳納之产地稅（为烟絲捐），落地稅（为熟条串），通过捐（为貨物稅及各处厘金），又有牌照捐、分銷捐、刨子捐、榔头捐、公卖費、地方附加稅等。

酒之大宗，浙江产紹酒，山西产汾酒，直隶奉天产高粱，其余黄白土酒各省皆有。酒稅之名目，除釀捐、厘金等屬于普通正稅外；复有釐照捐、印照捐、所屬印花、糟燒捐、麵麦捐、公卖費、牌照費、附加稅及地方慈善等特捐。

烟酒业負担捐稅之繁苛，实为中外古今所仅見，今約举数端：如燒酒一壘运至北京，納捐之数几过成本3倍，即福建烟絲运至最近之浙江，每担納稅亦需洋30余元之多，更兼办法参差，地异其施，稍有誤会，輒膺严詞，局棧則愈設愈多，捐稅則愈征愈短。因上列之扰累，发

生下述之弊害：如安徽宿松、福建永定、浙江桐鄉、湖北均縣等，向特栽種煙草為生，計近則減種十之六七；紹興釀額歲計 15 萬缸以上，自公賣實行，減至 83,000 余缸。閩廣等煙草原料暢銷洋庄幾占十之七八，煙業自制旱煙不逮十之二三。漢口汾酒幫去歲迄今虧銀 20 余萬，歇業 10 有余家，邇來浙贛等省兩業之虧資輟業不勝枚舉。舉一隅以概全國，我煙酒業之陵夷至堪感喟，而洋商來華經營煙酒業者，因稅率之便宜，歲獲盈餘達數千萬。外國煙公司前在產地收買原料，近復辟地自種煙草運銷全國，獲利甚豐。稅務所、公賣局俯首側目，不敢過問，其所獲之千萬金錢不啻擢我煙酒業農工商人之手，今閩廣發現外人歛費包運情事，滬商有謀遷租界之議。漢口有華法合組之酒廠，仿制汾酒，認捐不繳，經征員司置諸不聞。本國煙酒業行將滅絕，非捐稅之不良（外貨稅輕，國貨捐重）；何致於是？蠹國病商，莫此為甚。又查財政部 5 年內預算，煙酒項下所列稅目：曰正雜各稅，曰正雜各捐，曰煙酒牌照捐，曰煙酒稅增收，曰煙酒公賣收入，統計銀洋 27,994,181 元，在部中以散匯總名目具 5 項之多，各省經征煩苛更可相見（因沿革習慣，有歸貨物公所者，歸統捐局或厘卡者，牌照捐各縣征收，公賣費設局專管）。機關愈雜，積弊愈多，病商亦愈甚，曰稅捐公賣均有不平之憾，僅就公賣言之，畸重畸輕各省不一，印照、印証重迭，加征既有巡丁，偵緝復許軍警協助，严查苛罰，漫無制裁，視商民如寇盜，假法令為網羅（江蘇煙酒公賣細則之苛擾，有通崇海泰總商會駁議可証），是以煙酒業對於公賣甚感苦痛。

（1916年10月21日上海申報）

国民党卷烟稅有利于洋商 不利于华商烟厂

財部改訂卷烟統稅七級制为三級制，对华商烟厂打击甚大。查从前卷烟按七等計算时，以5万枝一單位，卷烟統稅之分等，一等为404.625元；二等为258.375元；三等为185.25元；四等为136.5元；五等为92.625元；六等为53.625元；七等为29.25元；自改为三級制后，据最近調查結果，外烟負担減輕，而华烟負担加重，致本国紙烟前途，感受莫大之影响。即如南洋烟草公司所出之紙烟，原为七等者，現改三級，因实行新章，損失甚多，如新爱国等12种牌子，前均納七等稅29.25元，現改为三級稅，須納洋39元。每5万枝，計加稅9.75元。又原日六等現改三級者如大長城、大喜、金斧等烟，前納六等稅53.625元，現改列二級，須納洋81元。每5万枝，須加稅洋27.375元之多。按新三級稅率之規定，为一級305元(批价540元以上)，二級81元(批价150元以上)，三級39元(批价150元以下)。以上海而論，英美、大美之外烟，銷者約50余种，若按新稅則計算，均行減輕，計每箱可減14元至百元左右不等。即如大水兵及茄力克，每箱原納404.725元，現仅納205元，計減99.625元；大前門原納136.5元，現納81.1元，每箱減55.5元，大紅錫包原納92.625元，現納81元，每箱減11.625元；大嬰孩、小哈門、情人、美傘，原納53.625元，現納39元，每箱均減14.625元；雅达原納446.25元，現納305元，計減141.25元。至我國制造之万华林等牌20余种，每箱各增27.375元，原列七等之北平等200余种牌，現均改列三級，每箱計增9.75元云。

(摘自1931年2月2日天津大公報)

上海总商会等四团体电請国民党政府 改变卷烟稅率

南京国民政府財政部鈞鑒：

卷烟稅法在各国稅率有二大公例，一、稅額超过价額；二、外貨重于国貨。在党治主义亦有二大要件，一、国内稅法应完全自主不可再蹈關稅协定之复轍；二、华商烟厂曾奋斗有功不可演成兔死狗烹之慘劇。茲查修改卷烟稅条例均与四者相反。倘不別籌救正或施行方法，不独吾国之羞，窃恐商人因功受創，財政且伏危机。本政治上之正义，为我政府及大部分析言之：吾国卷烟稅率均在值百抽百以上，吾苏原办卷烟特稅專供教育經費，稅率为值百抽20，所謂值者从市价而又加零为整也（以50元为进位不滿50元者均以50元計算），自提为国稅，各界人士茹痛吞声，未持异議者，滿拟大部重其稅率，增其收入，故不惜損一指而养背肩也。今所定稅率及估价标准乃仅及原办省稅之半。（例如紅錫包卷烟每箱市价二百十数元，省稅照250元計算，收稅50元，連二五稅共計55元，以上今照海关估价。紅錫包每箱銀90兩，照225計算，仅收稅20兩零，合銀幣27元有奇，剛得半数。）此种低稅率，在昔英美烟商始托安特生以600万元餌齐燮元，而严孟繁厅长以去就爭而止，繼托杜友樵以6百万元餌孙傳芳，而省校各校長以全体爭而止，此尚系一省低稅之代价也，今貪数百万之預繳稅款而牺牲全国之稅率，不独各界人士所痛心，且为以前軍閥所窃笑，此急应救正者一也。各国奢侈稅率外貨較国貨几为二与一之比，而帝国資本侵略主义，依建国大綱，政府有抵御之职责。卷烟岁銷就江苏一省調查所得已达3千数百万元，全国計之至少在2万万以上，关系国民經济不为不大，华商所銷十之一二耳，此区区者不加保护又压抑之，真是助長帝国主义之侵略，与建国大綱背道而馳，此应救正者二也。倘使事屬關稅受协定之拘束，則民众亦不敢責难于当局，然此国内稅也，

当严孟繁長苏財政时，北京外交部因英美公使之交涉，会同財政部通令各省撤銷此稅，严厅长独提抗議，以为国内稅法尙无国际协定之惡例，迨齐督采温交涉員調停之說，欲与英美烟商協議，严厅长于督軍省長厅道會議席上拍案力爭变相协定之不可，卒此拒回外交財政兩部之令，今国民政府与吾南方民众方以關稅自主以實現民族主义之初步，若本由自主之国内稅而反放弃以效协定之实，則是聚十八洲之鐵鑄此大錯，此后党綱党义所揭櫫，国府党部所号召，何者足以取信于国人而折服乎友敌？夫已往丧权辱国之事国府一时不能伸雪犹可說也，軍閥官僚政治时代所未忍放弃者，今乃弃之不可說也，此应急救正者四也。华商者弱小之民族，于党义应加意扶植者也，又曾率先納重稅于私烟充斥之时輸財救国者也，更增設公棧禁私烟与外商奋斗为稅局之鷹犬者也，施者虽不望报，而受者不可以不报此道德也，今姑舍道德而言是非，此稅为間接稅而非直接稅，国内稍明經濟学者所公認也，負納稅义务者吸戶耳，烟商則媒介也，吸戶即有輕稅可受，絕不願再受重稅，非媒介所能强也，然則此种已購已貼未售之印花，令媒介負之，于理不合。令曾經报效曾为鷹犬之媒介負之，于义更不安。即再舍是非而言利害，商民者，国家租稅所从出，犹木之有本，水之有源也，培之而后滋，开之而后暢，故理財政者第一使人有納稅之能力，第二使人有乐輸之情感，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此能力說也。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寇讎，此情感說也。今华商之情急矣，在公家所失不滿百万耳，救之則飢者易为食，杀之則兔死狐亦悲，利害較然，无待再計，此应急救正者五也。至于解决之方，簡單易举，附加省稅第一問題解决矣，減稅貨則第二問題解决矣。从市价不从关价則第三問題解决矣。最近二月已貼之印花补发6成国庫券准其抵換新印花，最近二月未貼之印花照价更換适用之印花則第四問題解决矣。屬会完全为国府保威信，为大部养財源，为民生增福利，一得之愚，尙祈采納。上海总商会、上宝兩县、閩北商会，上海各路商界总联合会叩。

（“商业月报”第8卷第2号国内外商工消息欄，1928年2月出版）

繁重的鹽稅負擔

長蘆鹽稅捐，日下所征收者，几达鹽价之20余倍，此固为全国共同之現象。計鹽价約1.4元外，以运至豫境或平汉路一帶者而言，为每包正稅12元，附加1.2元，产銷捐6元，軍事捐4元，河工捐2元，加征产銷捐4元，脚力約2元，馬后营0.115元，做費0.2元，麻袋費1元，麻繩0.3元，連同鹽价，每包合洋34.215元，其附加1.2元，乃今春因金貴銀賤，不敷抵償外債，中央明令新加者。

(1931年10月6日大公报)

皖岸鹽斤稅捐本极繁重，計鹽每担成本不及兩元，而一切捐稅已达9元有奇。皖岸推运局以鹽貴滯銷，并影响民食，現在所轄31个县行銷区域，各地尙有其他苛扰，国府虽迭加明令制止，迄未見各县取消。盖其中有作为公安教育慈善之用者，各县无法籌补，致告延擱，推运局今为減輕民食負擔，再將各地方附加列表呈报財部，轉行皖省府飭令各县迅籌抵补，停止附征。茲將該表附录于下：

县別	名 称	征收数 (單位分)	年收 总数 (元)	附注	县別	名 称	征收数 (單位分)	年收 总数 (元)	附注	
全徽	公安費	5.250	1,700	最近征 收同 上 同 上 同 上 同	石埭	区立和悅	28千750文	103		
	教育費	18.625	7,250			商會費	0.450	900		
	慈善費	5.000	2,000			教育費	6.000	700		
	災荒費	15.250	3,000			教育費	200文	180		
	警學費	8.653	余元			东流	小 学 費	200文	200	
	地方还欠	15.000				宣城	公 安 費	11.935	360	
	軍差用費	10.000					紅十字會費	2.000	600	
(县屬)	自卫团費	10.000			甯國中學費	1.640	400			
赤嶺	小 学 費	1.125			商 會 費	1.925	500			
滁县	公 安 費	17.000	1,500		甯國	自 卫 团 費	2.500	200		
銅陵	月 繳	90千文	220		桐 城	慈 善 費	2.350	2,200		
	区立大 小 学 費	34千170文	120		舒 城	商 會 費	1.300	600		

(中行月刊第10卷第1、2期合刊125-126頁, 1935年2月出版)

煤矿业負担的各种捐稅

国内各省，苛捐杂稅，名目繁多，不胜枚举。据22年12月10日上海“新聞报”載，国煤所負担之捐稅，可分为四类：(甲)矿区稅：中兴煤每公亩已采者5分，未采者1分；华东煤于开办五年以内每公亩2分，五年以外5分，另采矿煤稅1分；宝兴煤每公亩0.3元。(乙)产銷稅：中兴煤每吨按市价5%；大通煤每吨0.45元；华宝煤五角；宝兴煤0.175元。(丙)海关稅：中兴煤每吨銀1錢5分；大通煤0.337元；华东煤銀1錢2分；保晋煤0.22元。(丁)杂稅：大通煤地方教育捐每年1,500元；井陘煤警察捐每季洋500元，保卫队捐每队洋150元，公安局煤車捐每月洋825元，公安捐每月洋100元，附加稅每月洋500元；华宝煤补助政府捐每吨洋0.3元；保晋煤每吨杂稅0.6288元；天兴煤牙稅每吨1分；長城煤公益捐每吨块煤7分，末煤4分。煤业捐稅如此繁重，实为世界各国所罕見。印度除矿区用煤及碎煤无煤稅外，块煤政府只抽每吨約合华幣3分之稅。坎拿大煤稅每吨合华幣0.2元。澳洲大块煤每吨合华幣0.24元，小块者0.12元。

(范师任：“振兴国煤之我見”中国实业第1卷第5期第12-13頁)

山西阳泉产紅煤，质脆耐燃无烟，适于冬季生爐火多用之，年来捐稅迭加，以致成本較大，茲將最近紅煤运至天津，一切運費捐稅調查如下：

紅煤分大中小碎末五級，阳泉山价，最近大煤每吨价洋4元，中煤3.75元，小煤3.5元，碎煤2.5元，末煤1.6元。由阳泉起运至石庄，按正太路每車(計20吨)在阳泉納貨捐7元，平定兵差捐1元，警捐0.7元，煤捐1.8元，学捐1.3元(惟小碎煤貨捐系4.5元，余均同)。在石庄交正太運費65.1元，起票印花0.2元，又納統稅捐7.8元，警捐0.5元，护捐1元，

押煤入川資0.8元(每車平均),卸車脚力1.5元(碎末煤多加0.4元),过棧費6元,由石庄起運至丰台,交平漢運費88.4元,印花0.2元,裝車脚力2.5元,又納保大貨捐2元,警捐0.5元,中途驗單費0.2元(每車平均),再由丰台起運至津,交北寧運費32.5元,印花0.2元,倒車費2元。由石至津,押煤入川資6元(每車平均),由陽泉運至天津,每大煤20噸,運費捐稅山價等,總計大洋309.2元,車皮費尙在外云。

(1930年12月16日天津大公报)

战时,宝源煤矿对于各种捐稅的負擔,亦相当繁重,屬於中央政府者,有矿区稅、矿产稅,屬地方政府者,有出征軍人家屬优待金、公路捐、学校補助經費捐,屬於公会者,有公会捐及經常費之攤派數額,尙有其他各种临时之大小捐款,每月不下20萬元,按月催繳甚急,刻不容緩,而各种巨額公債及捐款之攤募,尤难預計。各矿資金已感无法周轉,更复增此重荷,并添其难,对于生产不无影响。

(“介紹宝源煤矿公司”,1943年6月10日重庆商务日报)

抗日戰爭時期國民黨統治區 工商業界負擔的繁重捐稅

我們平心靜氣的檢討，抗戰以來在經濟上最吃虧的人，是靠少數儲蓄公債維持生活的人；最便宜的人，是依恃特殊勢力，囤積居奇，走私漏稅，而沒有人敢過問的少數人，吸收了每天貶值的存款而自行經營每天漲價的商品買賣的一部分的金融業和廣大的資產永不貶值而收入大量增加的地主。正當的工商業，大多數都在困苦艱難中掙扎得幾乎喘不過氣來。關於此，伍先生（指伍啟元——編者）只要翻一翻幾家公司的贏余分配案，就可以知道。有一家公司資本200萬元，去年做了2千餘萬元的營業，賺了差不多200萬元的利潤。這樣的結果，自然可說是十分圓滿，在正當工商業中，可說是第一流。但贏余分配案上面，股東所得的股息僅及年息2分6厘餘，總數僅50餘萬元，而所得稅和利得稅的支出，則達70餘萬元。股東的所得與政府的所得，是5與7之比。此外還要加上營業稅和積谷捐70餘萬元、印花稅8萬餘元、同盟勝利公債60餘萬元（依營業額3%），倘使再加上鄉鎮公益儲蓄120餘萬元（依營業額6%），一共又是260餘萬元。直接間接負擔合計起來總數要達三百三、四十萬元，要超過它的純益額或者資本額一倍半以上！此外地方上零碎的攤派等等，都還不在內，而且數目也一定很可觀。這樣的負擔，還不夠沉重嗎？

讓我們再來看一看地主的負擔吧！據本月14日新民晚報的記載，重慶市的地主，佃出田地的收益計有谷32,579市石3斗，小麥272市石5斗，雜糧242市石零5升；而征實征購的負擔卻只有2,984市石5斗2升，還不及收益的9%。辛勤的正當工商業，負擔達純益額一

倍以上，不劳而获的地主，负担才及收益的 9%；负了危险投资于正当的工商业，分派股息不过年息 2 分 6 厘余，不劳而获的放放比期，倒可以得月息七、八分。

（摘自迁川工厂联合会、中国全国工业协会：“敬质伍启元先生”，1944年6月14日重庆“新华日报”）

临近解放前石家庄立元柴铁工厂 的捐稅負担

該厂在1947年1月至11月共10个月零7天中的支出，捐稅和利息的負担是很重的，茲將其收支計算表列后以供參考：

項 目	單位偽法幣元
1至11月營業共收入	162,846,600
1至11月共支出	149,093,620
其中支出捐稅小計	8,485,600
支1946年全年所得稅	401,900
1947年全年牌照稅	91,500
1946年兩季營業稅	1,303,000
區保公所經費(包括軍用糧草及保警捐費用)	3,398,000
公會會費及商會捐款	794,300
挖戰壕溝捐(共三次)	1,087,000
保兵役安家費	1,150,000
難民從軍費	75,000
修路費	123,000
槍稅經費	34,900
難民募兵費	5,000
貧民救濟費	2,000
買義務戲票費	5,000
學捐	10,000
國民黨特捐	5,000
其他開支小計	140,608,020
其中水電、電話電報及艱苦力費	1,656,620
銀行銀號利息	26,500,000
薪水工資及雜用	19,935,000
伙食費	32,133,000
房租	5,998,400
原料	54,379,000
本屆盈餘	13,753,380

注：區保公所經費按該市規定的乙等二級征收。但隨內戰的擴大而增加的。

(摘自“解放前石家莊工廠調查”)

华商煤炭運費較矿山成本尤高

紊乱重复的运输系统和以营利为目的的运输机关，对于国煤之威胁更大，其结果竟使国煤之运费较其矿山成本高至数倍，以至未能与外煤竟销于国内外市场。据地质调查所调查，下表所列各矿之煤，每吨运费约如下：

煤 别	铁 路	运 费	輪船運費	共 計
大 同 煤	平 綏 路	5.405元	5.10元	12.077元
	北 寧 路	1.527		
井 陘 煤	正 太 路	0.426	5.1	8.880
	北 寧 路	1.572		
六 河 溝 煤	平 汉 路	1.782	5.1	9.123
	北 宁 路	1.572		
淄 博 煤	平 汉 路	2.451	3.5	7.460
	淄 博 路	1.700		
	膠 济 路	2.260		

上表所列各种煤运至上海费用，均较其矿山成本及杂费总额高至数倍。例如大同煤矿山成本2.6元，杂费1元，共计3.6元；井陘煤矿山成本2.25元，杂费1.5元，共计3.75元，均不及或稍过运费总额1/3。六河沟煤，矿山成本2.6元，杂费1.5元，共计4.1元，不及运费总额1/2。淄博煤矿山成本2.88元，杂费1元，共计3.88元，仅及运费总额1/2。

（范师任：“振兴国煤之我见”中国实业第1卷第5期16页）

運費桎梏下的山西煤矿

晉省藏煤聞名世界，惜其多未开采，至今則仍貨弃于地，虽开采者，已有数十县，然多为旧法，出产有限。阳泉之保晋煤矿公司，大同口泉之晋北矿务局，虽系新法开采，然因正太平綏二路運費問題，出口为难，致今貨堆如山，銷路停滯，此亦为本省經濟雕敝之一大原因。实业厅长耿步蟾，自就任，对于本省煤产及运输問題，均极注意，前曾迭电铁道部，請求酌减運費，俾晋煤得以暢銷，借以抵制日煤，但至今尙无結果。但本省产煤区域，究有多少，面积具有几何，一面并无詳确調查統計，实厅为彻底明了起見，前曾派遣專員，分赴各县实地調查，业已返厅报告，計本省产煤区具有62县，其中蘊藏最富面积最广者，可分为八区，总計全年产煤量約有220万吨，第一区为阳曲太原榆次，全年产額約50万吨，第二区为平定盂县昔阳，全年产額約110万吨，第三区为晋城高平阳城，全年产額約30万吨，第四区为大同怀仁左云，全年产額約70万吨，第五区为介休孝义平遙，全年产額約20万吨，第六区为洪洞赵城临汾全年产額約10万吨，第七区为五台崞县宁武，全年产額約20万吨，第八区为乡宁，全年产額10万吨。

(摘自1933年5月15日民报)

晋煤运銷于国内外市場者，以阳泉大同兩处煤矿为之代表，其余各县之矿既不能大量輸出，姑不贅論，本节所述，亦只就阳泉大同兩处調查以見一斑。

陽泉煤業狀況

煤矿 据平定煤矿事务公所調查，平定煤矿除土法开采就地行銷之小窑不計外，共运煤到站裝車出境者，共47家，內計安設鍋爐水

泵及提煤机器者，有保晋各矿厂及建昌广懋中孚平記富昌等6家，仅安鍋爐水泵者11家，此外均屬土法开采，現多停工或倒閉，即規模最大之保晋公司原有6厂，現亦停其二矣。

产量 查阳泉各煤矿公司每年所产煤量，根据最近五年之調查，逐年增加，22年因停閉者多，产量因之縮減，茲表示如下：

1929年	535,155吨	1932年	741,911吨
1930年	600,220吨	1933年1—10月	476,727吨
1931年	712,548吨		

輸出量 据最近調查，硬煤去年有增加，22年則頓形銳減，茲將最近五年輸出吨数列表如次：

1929年	399,340吨	1932年	589,580吨
1930年	499,220吨	1933年1—10月	404,180吨
1931年	475,200吨		

据阳泉商会分事务所調查，近年来营业盈亏之各煤矿煤棧，分別比較統計如下：

年 份	盈 亏	亏 損	比 較
1 9 2 9	9,530	54,246	亏 44,716
1 9 3 0	28,030	29,166	亏 1,075
1 9 3 1	24,041		盈 24,041
1 9 3 2	33,740	88,831	亏 55,090

按上表觀之，阳泉各煤矿煤棧历年营业狀況，盈者与亏者較，除1931年外均屬亏损，其中尤以1932年为最，1933年虽无統計，但以价格之狂跌而論，亏损之数量必重巨。并据調查，阳泉煤棧原有60余家，近年倒閉者时有所聞，截至現在仅有33家，煤业之不振，于此可見矣。

大同煤矿机器开采者，計有晋北矿务局、保晋分公司、同宝、宝恒、同泰、恒义等16家。土法开采者，計有五福、同盛、赵子瑜等23家。

产量及輸出量 大同煤矿以晋北矿务局規模最大，机器設置亦完备，其产量每月增产至1,500吨，現在每日产400吨左右，热察战时

每日仅出 200 吨左右，盖产量随销量而增减，近年来因销路不畅，产量亦受限制，兹将最近一年半以来晋北矿务局煤矿产销概况列表如下，以见消涨之一斑^①：

年	月	产煤吨数	销售吨数	年	月	产煤吨数	销售吨数
1932年	1月	19,913	12,985	1932年	10月	18,329	16,673
"	2月	14,065	15,397	"	11月	23,037	15,106
"	3月	23,453	13,691	"	12月	28,617	20,739
"	4月	23,074	10,423	1933年	1月	15,221	14,193
"	5月	22,308	16,864	"	2月	9,193	14,681
"	6月	18,829	20,483	"	3月	14,205	11,347
"	7月	19,083	21,535	"	4月	9,415	14,227
"	8月	20,805	15,171	"	5月	9,900	12,068
"	9月	13,531	19,966	"	6月	2,438	3,406
		共 計		310,485	269,236		

此外保晋公司往年产量，每日均在500吨以上，现则每日仅产300吨左右，滞销情形，亦与晋北矿务局相同。其余各煤矿规模较小，产量更为消缩，输出亦属有限，往年大同输出之煤，连晋北保晋及各矿厂计之，由火车运销者，每日平均（夏季少冬天多）40吨车40辆，计1,600吨，全年约合60万吨左近，用火车骆驼等及其他运销方法销于本地者，尚不在内，今则销路日减，产量日细，输出日少矣。参看上表，所言当非虚构也。

成本 晋北大炭二炭混煤三种，平均每吨2.1元至2.5元。

盈亏 按大同各煤业盈亏情形，虽未有数字之报告，但据最近调查，现在机器开采者，类多营业不振，计倒闭者有同成公司、晋华公司、及狼儿沟同宝公司之分厂数家，其未倒闭而现已不出煤者，有大同煤厂等，其他土窑歇业者亦甚多。

按以上调查，证明阳泉大同煤业均属不振，若不设法救济，则有破产之危险。至其不振原因，惟在销路之不暢，而销路不畅，又则以运费过昂为之主因，于节当分述之。

^① 产量和销售数字原文吨以下有小数点，经修正为四舍五入，合计数有些不符。又，1933年6月份产量截至6月20日止。

晋煤滞销与运费之关系

近年来国煤滞销，已成普遍之现象，而滞销原因，大概不外下列数端：(1)外煤贱价倾销，壟断市场，国煤资本薄弱，难以抗衡。(2)农村破产，购买力薄弱，煤虽日常用品，亦不能不受影响。(3)运费过昂，不能远销。(4)捐税担负太重，增高成本。以上四者为国煤滞销之主因，晋煤当然不能例外，然晋煤受运费之束缚，则较其他国煤为甚。兹将各路运煤费率列表于下，以资比较：

路别	矿名	每吨每公里运费 2分16716	路别	矿名	每吨每公里运费 2分16716
平汉	各煤矿	1分63246	平綏	晋北	出口專价前约合1分1厘662 现为9厘1811 但以1年为限 同上
		1分20284			
北宁	开滦	8厘9101	济膠	其他各煤	7厘610
		8厘004			
津浦	北票	7厘340	正太	華商各矿	7厘300
		6厘667			
湘鄂	阳泉煤矿	1分2厘043	專价	井陘	6厘21477
		5厘5			
湘鄂	中华	7厘	待价	正丰	8厘769
		7厘42			
湘鄂	汉冶萍	7厘42	成价	阳泉各煤矿	1分0456
				阳泉译末煤	1分8厘75

甲种回扣……阳泉硬煤 2分3厘131

乙种回扣……阳泉硬煤 2分2厘3967

根据上表，可知全国煤运费率，以正太路为最高，而该路所定运费，对于各矿亦甚悬殊，最低者为河北之井陘矿，正丰次之；最高者为晋煤，其费率与井陘为4与1之比。又查该路定有回扣办法，但限度太高，实际不易享受，甲种回扣本属有限，乙种回扣依吨数之多寡，定回扣之大小，就表面观之，似属优待，但实际上阳泉硬煤每家每月曾未有出六万吨以上者，且以运费如此之昂，决无此种希望，是以乙种回扣办法，于煤矿补助甚微，晋煤之不能出口，此其主因。平汉路运费旧章每吨里6.825厘，现虽改订新32款，然较正太路为低，且运途愈远，运价愈低，亦合运输原则。至平綏路前订出口專价为1.1662分，民国16年經各矿之请求，另订專价，每吨每公里定为7厘3毫2絲，矿商

咸感便利，輸出曾為巨數，嗣該路將專價取消，出口煤船因之停頓，前年改訂價目，每噸每公里約合9厘有奇，較之專價未見減輕，故煤船出口仍不能暢旺，且為期僅限一年，轉瞬即屆，受惠亦屬有限耳。由上表觀察，晉煤較其他各煤之運費負擔多至一倍以至四倍，所奇者，同一路線，運同一物產，亦不能平等待遇，欲其抵制外煤，固屬不易，即與國煤并銷，亦所難能也。據最近調查，陽泉煤由陽泉至上海，每噸成本及雜費不及5元，而一加運費，則需18元以上，晉煤在上海市價僅售17.2元，每噸須賠1元有奇，大同煤運至天津合本10元左右，上海為17元上下，廣東為21元左右，與現在各地市價比較，亦屬有絀無盈，是則晉煤不振之原因，尤不能與其他國煤相提并論，運費過昂，乃其唯一之致命傷也。

（山西平定煤礦事務所調查：“運費極樁下之晉煤”，1934年1月5日天津大公報）

晉省煤業年來之日益雕敝，當以正太鐵路之運費奇昂，不能盡量運輸出境為一最大原因，自正太鐵路收歸國有後，該省煤業為挽救頹運起見，曾向鐵部路局一再呼喚，請求減輕運費，俾晉煤得以暢銷全國，在再年餘，迄今仍無相當結果。日前南京中央晚報，對於此事曾有記載，晉省煤業公會，因此特致函該報申述所受困苦，請代呼喚，并作哀鳴，茲志其原函于左：

貴報紀載國煤不振之主要原因，在於運費高昂，尤以正太鐵路運晉煤為最，并舉各路事例以為實証，調查精確，紀載翔實，足見關心實業，維護國煤，欽佩之餘，尤深感謝。嗣讀6日貴報續載鐵道部業務司致貴報社之函，對於國煤本身之責備與期望，以及鐵道部年來維護國煤之熱忱，同人等深感愧之中，敢不努力改進，以副當局路礦相維之盛意？惟原函謂煤礦不振，全在經營不善，與運價無關，又云國煤成本往往在57元以上，加以苛捐雜費，以致售價高昂云云。就敝省言，按之事實，殊有未盡符合者，即如陽泉之煤，現時成本平均僅2.6元餘，然而由陽泉運至上海每噸鐵路運費即需11.33元，此外船資2元，雜費1.8元，稅捐統計不過0.55元，是則運價與捐費孰輕孰重，不辯可知。故以晉煤成本連同一切捐費計之，合價尚不及5元，而一加鐵道

運費11.3元，船費2元，則需18元以上，因此陽泉之煤近來運往上海如此，運往平、津、漢口，亦可想而知。故謂國煤不振與運費無關，實不能一概而論。而正太路對於晉煤之運費特別費昂，尤為晉煤致命之傷。查該路對於井陘煤運費，每公里每噸定為6.21,447厘，而對於陽泉煤運費則特定為2.5分，而相比較，為1與4之比。此中固有其特殊之沿革關係，且為外人管理時代之所規定，但該路現已收歸國有，且已為國人自營，則此種不平等之待遇，似不應再繼續沿行。且其他國有各鐵路，至多亦不過1.7分，正太路同屬國有鐵路，則運費一項應與其他各路比照互相均衡，不應彼輕此重，低者太低，高者太高，而同一路線，乃有此1與4相懸殊之運價，尤與鐵部當局所謂劃一運價，待遇均等之旨不相符合。年來正太路營業收入甚佳，去年盈利為48%，前年盈利占52%，則減少區區之運煤費，固無損於該路之收入。且路礦相依，可以互助繁榮，運費減則煤銷日暢，路收亦必因之而旺，雙方俱有利益。況國煤流通，利益更能普及全國。抵制外煤，杜塞漏卮乎？值此外貨傾銷、國產不振，幾至全國產業衰落，勞工失業之際，尤應急謀救濟，以解除全國煤商之痛苦，保持國家之經濟命脈。至若謀煤業本身改良經營方法，縮減浮濫開支，煤商等自當遵從當局盛意，努力辦理云。

（“中行月刊”第8卷第3期第136-137頁，1934年3月出版）

重慶工商業團體呈請減低輪船運費

重慶蘇貨幫旅滬同業協會，以運川銷售之國貨，自民生、太古、怡和、捷江、三北、光耀各輪公司於上月間增收運費後，成本提高較前倍蓰，際此民生離敵之秋，四川人民實乏購買能力，以致銷路一落千丈，國貨前途，岌岌可危，爰特函請上海市民提倡國貨會，准予轉呈社會局及市商會迅速救濟，向各該輪船公司協商改訂運價，以維國貨運銷。原函云，逕啟者：敝會同業，向以在申採買華洋雜貨運川銷售為職務，近年來抵制仇貨，提倡國貨，敝幫愛國，素不後人，向來採運之洋貨，已悉改銷國貨，每年在申採辦華洋雜貨1,000餘萬元，銷售貴會會員各廠之搪瓷器、棉織品、針織品、毛織品、橡膠套鞋、跑鞋、球鞋、牙粉、牙刷、熱水瓶、玻璃杯、鋼精器、電木盤、玩具、風燈、燈罩、泡等，不下700—800萬元之多，歷以捷江、太古各公司輪運、水腳尙覺合宜，故運銷尙無滯礙，不意本年2月中旬，民生、太古、怡和、捷江、三北、光耀各輪公司，不知由誰首創，忽訂聯合組織，類似托辣斯之合作同盟，各貨水腳，比較去年冬間增加80%至200—300%不等，甚有比宜渝水腳舊章增加至六、七倍者，水腳奇貴，為中國各埠所未聞，亦為世界各國所僅見，僅憑一無識李某管窺之見，即將成本微薄之國貨，妄分等級，一律規定量尺納水腳，每方呎2.5元至1.25元不等，水腳超過成本，及為買本十分之七八者，不知凡几，運到川省，尙須再加海關稅及地方等稅20%，匯水15—16%，雜繳2%，足任何貨品，申買1元者，到川須售2元以上，方足保本，現值民生離敵，軍閥混戰後之四川人民，何有加價購貨之能力，如強將各國貨照此新加水腳上，即無一不折大本，故敝會同人已定貴會會員各廠之國貨，非暫時停運，實無辦法；而各國貨廠家，希望同人能速將國貨運川推銷，以期經濟得以活動，當

亦深具热情，詎各輪公司只顧自己私人之厚利，不顧國貨之推銷有无阻碍，一意孤行，欽定水脚，强令交納，实无异阻碍國貨運川之大路，对于貴會會員各厂，每年数百万之銷場，行將因而断絕，关系國貨推銷前途，实非淺鮮，除將現時各輪公司增加水脚数目比較表抄附外，相应縷述緣由，懇請查核，准予轉請市商會社會局召集調解會，訂适宜之水脚价目，俾便國貨運輸，而利推銷，实納公誼云。

（“中行月刊”第8卷第4期，“貿易”第171—172頁，1934年4月出版）

抗日戰爭時期運輸工具使用的不合理

在国际通路未打开的前几年，運輸不能解决，要想从国外輸入原料工具，原是困难的，但如果真有計劃地去做，笨重的工具原料固然解决不了，但輕便的仍可以解决。我們在過去可以有由飞机运来的口紅、香水，最高貴的絲襪、香烟，甚至香蕉、名酒，为什么就不能把这些位置和載重量，騰出来運輸輕便的工业生产上不能解决的許多用品呢？事实往往是相反的，正当而必需的工业用品要进口，其手續与限制是很麻煩的，沒有人事关系就根本办不到，而那些奢侈消耗品，倒轉很容易帶进內地来。比如說，昆明的飞机起飞可以裝石头来压重，可是我們的生絲却不能出口，就是一例。因为如此，所以工业上的技术困难問題，也絕不是一籌莫展的，要相对地解决这些問題，也得要澄清政治，扫除官僚作风，提高政治为經濟服务的热忱。

(刘敏：“33年之四川經濟”，四川經濟季刊第2卷第2期)

附录：棉紡織业呈請国民党政府制止 紗布交易所投机原文

华商紗厂永安、偉通等28家，昨日联名呈請府院部，及上海市政府云：呈为投机家摧毁实业，取締刻不容緩，联恳当机立断，以維全国紡业事，查年来棉貴紗賤，业紗厂者，已亏累不堪，毫无生气，而一般投机家，明知国内产棉不敷厂用，犹复抬价竟收，屯积居奇，以致紗布交易所，拍出花紗兩价，相差逾远，不能平衡，紗业之危，不可終日。考世界各国，凡有棉产之地，其交易所从无以花紗兩項同时拍价者，盖恐价值悬殊，妨害紡业也。乃上海华商紗布交易所則不然，花紗兩种，同时开拍，棉花一項，專以国棉为标准，致令投机家得逞其壟断操縱之手段，花价逾拾逾高，而紗价則瞠乎其后，按照标花現市換算标紗价格，每包棉紗須亏本20余元之多，数月以来，全国紗厂，飽尝此苦。盖一般投机家，只图私利，不顧大局，明知原棉价格，虽抬至极高，厂家断不能停工不用，紗价虽亏本甚巨，厂家断不能壟存不沽，各厂工作一日不停，既不能不忍痛买入貴棉，售出賤紗，进退維谷，莫知所措，是全国紗厂之生命，尽操諸此少数有組織投机家之手，事之危急，无逾此者，政府如不火速救济，則全局崩潰，即在目前，时机一逝，后虽欲設法挽救，亦无及矣。为此披瀝陈詞，联恳鈞院部，立派干員蒞滬，切实調查实况，一面令飭华商紗布交易所，对于花紗兩价之开拍，务須設法保持平衡，如以标准棉花市秤430斤換算20支标准紗价，其制造各項費用(統稅在外)，不足45元时，应即停止拍卖，俟市价恢复相当差額，然后照常开拍。此系急則治标，刻不容緩之办法，务恳俯賜采納，立予施行以解倒悬，同深企禱！謹呈行政院立法院实业部上

海市政府。具呈人永安一厂二厂三厂四厂、緯通、申新、恒丰、青島
华新、协丰、大通、民丰、通成、豫丰、苏綸、和丰、大生三厂、大生一厂、
三友、民生、振泰、宝兴、大成、鴻章、富安、溥益、恒大、大丰、振华。

(1935年1月13日上海申报)

五、銀行錢庄与民族工业

我国銀行与工业

一 我國銀行的發生及發展

近百年中，我国社会金融組織的形式，最重要的是票号、錢庄和銀行三种。这三种組織形式虽沒有历史的內在关系，但就其社会金融的意义，或其后来的可能发展上說，却代表了三种不同的性质。票号是我国社会經济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固有的形式。它的地域的行会性的汇兌和高利貸业务，一方面既已脱离生产过程以至流通过程的金融活动，而自觉的踞促于官僚和特殊商人的狹隘范围之內，另一方面又复頑固自守，不能适时地改变自己，以适应帝国主义經济侵略的要求，或参与錢庄和銀行的新活动；所以恰如在机器生产压迫下的許多手工业的命运一样，經過一个殘守壘保的阶段，完全毫无結果的沒落下去，票号以及其所累积的資本，也就被排除于我国金融业的范围以外了。錢庄的起源，顧名思义，亦与銀号相同，原系經營貨幣兌換的組織。鴉片战争后，广州十三行之一的“銀行”对于国际貿易的貨幣及金銀兌換的壟斷特权，既为自由貿易的条約所取消，而随后随着进口和出口貿易的发展，特别是随着外商銀行在我国通商口岸普遍設立，为了中外貿易中汇兌及兌換的圓滑进行，所謂“內国銀行”的錢庄，就被外商銀行所选中为国际商业金融的中介人，和为其伸張在华金融

的最受寵用的分枝机关，而錢庄亦即于此种买办商业金融的活动中发展了自己的組織和勢力，直至辛亥革命以至民初的股票風潮以前，錢庄还是壟斷我国出入口貿易的外商及外商銀行所認許往来的唯一金融組織，同时，亦是我国实际的金融中心。就上海的錢庄說，因为出口时我国商人收受汇丰或其他外商銀行的票據，須經錢庄向外商銀行取款，入口时外商銀行收受“庄票”或錢业公会“公單”而向錢庄收款，必要时錢庄还有由外商銀行通融資金的信用能力。所以“公單”和“庄票”在国内国际市場中，既有甚大信用，而錢庄亦每天須向外商銀行收解数千百万元的“洋款”“洋公單”。錢庄是少有在各地設立分支庄的，可是因为內地通商口岸的錢庄，既同为出入口貿易金融业服务，又因为相互汇划的关系，事实上各地的錢庄皆成为外商銀行在华金融網的一分子。以致新兴的銀行，无不低首下心的与錢庄发生往来，及向錢庄存入一笔同业存款，或間接直接加入錢业公会以后，才可以开始銀行业务的。不过因为錢庄組織(合伙)的业务(信用放款)的缺点，經過几次風潮中的不断倒閉，外商对之大失信用，同时，又以仰給銀行放款以資活动的結果，不但使銀行通过錢庄而参与国际貿易的金融业务，并使錢庄漸漸的附屬於銀行之下，而最后并采取改組的办法，結果銀錢兩业数十年来对立傾軋的局面，而在組織和业务的形式与精神上合流起来。

說到我国金融組織中的最后一个形式——銀行，虽然受了錢庄的极大影响，却并非是錢庄的繼承者，或由錢庄演变而来。它的发生，是和工业生产方法的輸入一样，直接由外国仿效来的，特别是在华外商銀行的設立和发展，更实际地使我們認識了这一新形式的重要意义，和学习了新的組織和业务方法。不过，我們要补充的說，錢庄的金融业务的发展，既为銀行的发生擴張了社会基础，而錢庄营业地盤的引入銀行勢力，銀錢兩业資本的交互变换，以及錢庄采取銀行的形式和方法等，无疑的都帮助了銀行的加速发展。并且这两个国际經濟勢力孕育下的双生子，虽然一个更多的保留了若干民族的習慣，另一个則完全仿效外来的形式，但在业务性質上原本无什么根本的差

异，所以在国际商业金融业务及国内经济的演变过程中，终于不能不相互合作而渐趋统一了。关于银钱两业势力的演变消长，是下列的三件事或三个阶段所促成的：第一、依存于对外贸易并成为外商银行宠儿的钱庄，辛亥革命中，外商银行怵于我国政治局面的变乱，停止对钱庄的资金融通，迫使钱庄不得不和银行发生借贷关系，因而银行得渐渐扩张其对钱庄的支配作用。第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钱庄由于对橡皮股票等的过分投机，结果发生普遍的倒闭风潮，而使其势力大大削减。例如农商部统计钱庄和银行资本额的比较，民国5年钱庄共有资本246,029千元，占总额87%，银行共有资本37,804千元，仅占13%；但至民国9年，却已完全倒换过来，钱庄资本突减至31,314千元，仅占总额37%，而银行资本反增至51,987千元，已占总额63%。第三、废两改元和法币政策的实行，使国内各地数千百种的货币成色和计算方法得以取消，这样，使钱庄赖以生存的另一基础——金融的地方性也为之削弱了。以上指出的钱庄势力日趋衰落的三种事故，个别的分开着，则为钱庄或因对外信用的低落，或因经营不善所致的力量的削弱，或因货币统一而减少了地方性的优势；而综合起来看，则这些变故的后面，显然还隐藏着一件更重要的事实，即是近数十年我国经济的发展，反映并影响到金融上：国内金融市场的加速形成，资本累积的大量增加，货币和信用的需要数量与范围的增大，使得行帮性地方性并以合伙组织的钱庄，日益不能应客观环境的要求。所以钱庄的没落和银行的发展，已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

促使我国银行发生和发展的原因，可从下列五方面来观察：

第一是外来的影响。我们在上面已经指出我国银行的发生是直接受了外国的影响，特别是在华外商银行的影响而仿效起来的，但如将这种仿效认为组织形式和业务技术的单纯的袭取，究尚不免流于浮浅的观察，而亦不能解释为什么在英商麦加利银行于上海设立分行(1857)40年后，才有国人创办的中国通商银行(光绪23年——1897)之设立，以及为什么在自中国通商银行的成立至抗战前夕的40年中，接踵而起的银行又达406家之多，我们要知道一种进步的金融组织亦

如进步的生产方式一样，当其破坏并战胜落后国家的固有組織的过程中，即附有被人学习仿效的特性；而在落后国家何时始仿效以及仿效的性质程度怎样，却又要視这一先进的組織在落后經濟中的作用达到了何种地步，換句話說，即視其为新的組織所准备的条件达到了何种程度而定的。关于这一方面的研究，笔者在20年前曾綜合外商銀行的設立和各国对华投資及我国对外貿易的发展情形，編制了一完統計表(表略)，这是极富参考意义的。

这个以我国几次重要的对外战争划分时期的国际經濟关系的統計表，原是可以作多方面的观察，不过我們在这里要指出的，是外人在我国經濟势力的发展的迅速：如外人直接的工商业投資，自中日甲午战争至1931年計增加了4倍，而自1864年以来的国际贸易，更增加了22倍，其中出口貿易增加了16倍，进口貿易增加了27倍。这种在华經濟势力的发展，直接的結果是外商銀行的增加，据1925年24个主要銀行的統計，共有資本647百万元，公积金471百万元，存款4,547百万元，发行鈔票812百万元，总資產6,878百万元。而間接的結果，虽然是用得不偿失的巨大牺牲换来的。亦在商业金融方面为我国銀行的設立准备了某种前提条件了。

第二是財政方面的影响。民国以来，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財政常处于入不敷出的不平衡状态，除了几次政治意义的和有担保的外債外，最主要的方法就是发行公債和向国内銀行借款。如將短期借款及地方政府发行的公債不計，則自1912至1931年中央政府公債发行額共达1,630百万元，偿还額共計701百万元。这些公債的发行，都是以八厘以上的利息，六、七折的折扣，經由銀行代理和抵押承受的。据計算，年利8厘6折发行时，实际利息为4分3，七折发行亦达3分多，这样自然引起了竟設銀行的兴趣。比如1917至1922及1927至1931年是內債发行最多的时候，亦是銀行設立最多的时期。总計自1912至1933年新設了195家銀行，而其中在1918—23年設立的共有90家，1928—33年設立的亦有60家，二者合計共占总数的77%。由此可見內債与銀行发展的因緣了。

第三是投机事业的影响。上海是我国战前的金融中心，全国银行的总行有1/3以上集中在那里。上海所以成为金融中心的原因，经济上的条件固然很多，但投机事业的发达，亦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例如外汇公债、标金、地产以及各种物品的期货买卖市场等，一切卖空买空和“套利”者，都趋之若鹜，而银行自然又是这些投机市场的主要参与者和组织者。银行在这些投机性的营业中，一方面获得了超额利益，另一方面又由投机事业的发展 and 内地游资渐趋集中的过程中，因为存放款的增加而壮大了自己。例如1923年全国银行的实收股本为1万余万元，至1937年增为4万余万元，约增3倍，同时期的存款数额，由55,000万元增为378,000余万元，则约增6倍。同时，在实行白银国有以前，据估计全国可认为流通资金的现货，约6万万元左右，而其集中在上海中外银行库存中的即达到5万万元，其握在我国金融机关手中的约在60%左右。这种现金向银行库存集中的现象，才不过十数年间的的事，当在1920年初，上海中外银行所有的库存现金，共计不过3,700余万元罢了。这些自然都是非健全发展的畸形现象，但是我国银行就在这种不健全的畸形现象中畸形的发展起来了。

第四是国内经济发展的影响。近数十年来，我国国民经济在内外的政治经济各种因素的作用之下，真是遭逢了一个千灾百难的时期，但就银行业务说，一方面固然受到了许多挫折和损失，而另一方面在分支行和存放款的增加上，已经大大地增加了它在国民心目中的信用和业务范围。这里的原因，自然不是一般工农业健全的正常的发展，只是在国际贸易的发展和国内市场的形成中，扩大了国内商业银行的金融基础。举例说，对外金融业务的部分参加，特别是货币和发行的统一，不特是我国近代财政金融史上划时代的大事，亦是我国银行发展前途的一个关键，同时，银行业在组织上和技术上，亦能适时的作了某些重要的改革。这样，银行在这种国民经济的灾难和商业金融的繁荣的矛盾中，扩大和巩固了自己的势力，而形成金融的中心地位了。

由以上对于我国银行之发生和发展的简单分析，可知银行这一

新金融組織形式的移殖，主要的是为国际資本主义經濟侵略下国外和国内商业金融的发展所推动，并且亦是建筑于这种半殖民地性的商业基础之上。这种半殖民地性的商业金融对于銀行的影响是双方面的：一方面由于商业的发展所形成的金融需要，促成40余年来銀行数量和业务的增进；另一方面由于国际資本主义对于商业金融之最高权力的把持，势力范围的划分以及国内商业之地方性的保留，又严重限制了銀行正常的健全发展。因此，我国銀行是以半殖民地經濟的各种弱点为其主要特征。这种弱点，可以略举如下：

第一是一切銀行都是商业銀行的性質。战前的164家銀行，依其名称或法定的任务分类，計有中央銀行及特許銀行四家，省市立銀行26家，商业儲蓄銀行73家，农工銀行36家，專業銀行15家，华侨銀行10家。这完全是形式的分类。无论所称农工銀行者，均屬資本較小，而其业务亦終未超过交换过程的商业資金的融通，即特許銀行或省市立銀行，除了享有发行权及代理国庫省庫外，在业务性質上亦未发生什么本质的不同。所以我国公私立的各种銀行，都只是商业銀行。这一点，不單是資本的来源問題，或是經營者主观認識問題，亦即是我国国民經濟客觀的事实問題。我們要記着零細分散的手工工农业，仍是我国国民經濟的最主要的基础，那是不能成为銀行业务的对象的；所謂新式的工矿业，則是数量既小，而事业亦多在风雨飄搖的局面，这只要看專業銀行不能不在本业以外寻求資金应用的出路，就是一个最实际的說明。

第二是組織的不健全。这可以从資本微小和忽起忽仆的現象来看。依据战前163家銀行資本的統計，計在50万元以下者75家，50至100万元者33家，101至300万元者28家，301至500万元者10家，501至1,000万元者10家，1,001至2,000万元者6家，2,001万元以上者仅有1家。这种90%以上的銀行資本都在500万元以下之一事实，一方在說明銀行資力的薄弱，除了做点商业金融及投机业务外，实在不足胜任任何工业的投資；另方又說明象銀行这样的有利事业，在我国亦是不易招集股份和累积資本的。况且总合全国164家銀行的資本总额才不

过4万万余元，尚不及美国一家次要銀行的資本，更可以想見我国銀行資力的如何薄弱。与資本的微小相連的就是倒閉比開設更为常見的現象，比如自清末至战前，陸續設立的銀行共有406家之多，存在的才不过164家，是則倒閉的銀行已占設立总数的60%，而为存在銀行的148%。这种倒閉現象的頻繁，和經營的是否良善，自有甚大关系，但此种現象不是經營的技术所能完全說明，却是无可怀疑的。

第三是沒有形成全国的統一金融市場以至沒有形成地方的統一金融市場。我国战前的164家銀行共設有1,332处分支行，分布于9大都市，23省区，并在少数的国外地方，也已設有分行。这种分布情形，虽說有79%的总行，50%的分支行偏集于9大都市和江浙兩省，显見得极不平衡，但从表面看来，似乎我国銀行已在发展它的全国金融網，并将它的触角伸展到华侨較多的国外去了。其实，从实际情形分析，不用說国际汇兌尚难插足其間（华侨的家用汇款，自在此处所指的国际汇兌的范围以外），即国内金融市場，亦还是四分五裂的为各种势力所割据，离开統一阶段还极遙远的。这种畸形現象所以形成以及不易打破的原因，完全是基于国际和国内兩种特殊势力之上。国际的特殊势力，已如一般人所知道的即是享有特权的在华外国銀行。这些在华的外国銀行，由于資力的雄厚，历史悠久和不平等条約赋予的权利，既操有壟断国际貿易、决定汇率、发行鈔票、經營存放款业务、保管稅收、支配財政的权力，迫使我国金融机关成为沒有独立能力的附屬体，复以其所代表的国家利益划分并擴張各自的势力范围，不但在华外国銀行間，同时亦在我国民族的金融事业間，树立了許多互相对立的集团，而使我国金融业成为不能自力統一的分裂局面。至于国内的特殊势力，却是一般人不大注意的地方性和行帮性的金融派別。無論銀行与錢庄，或銀行与銀行、錢庄与錢庄之間的关系，都是不能按照法定的或合理的原則处理的。而人的、行帮的和地方的关系，反常常居于决定的地位。在战前，我們在对外貿易和投机市場的作用上，固須承認上海是一个最大的金融中心，不过同时要指明，这种中心作用并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了行帮和地方的金融組織才

能實現的，关于沒有統一的国内金融市場一点，在这里，无庸博录許多事实来作証明，只須指出一点，即我国各地利率差异，常比欧洲各国間的差額还要巨大，而且这种利率的大小，既非銀行所能主动的决定。亦非銀行的力量所能調整的。更进一步說，不但我們現在尚沒有以銀行作中心的名实相符的全国統一的金融市場，即是銀行最称发达的九大都市，亦尚沒有形成一个都市的統一市場。即以上海为例，銀錢兩业各有自己的同业組織和业务範圍，并在存放款利率的决定上，錢庄至今仍操持了最大的权力，如在內地的都市，則旧式金融机关的实际权力，自然还要发生更大的作用的。其实，我們如再进一步觀察我国社会金融或都市的金融市場的情形，則無論銀行或錢庄，即在交換过程的商业資金融通上，仍是受了极大的限制，換句話說，所謂小額而极普遍的借貸关系，既不通过銀行，亦不通过錢庄，而是由資本所有者直接进行。我們前面曾說到，各地利率的决定，錢庄的权力大过銀行，而实际上錢庄对于利率的决定，又是依据这里所說的民間自由借貸之标准的。以上分析国际国内的兩種特殊勢力，就是構成我国民族的和国内的金融市場不能統一的原因，我們自然不能抹煞銀行在这統一工作上的进步，不过無論在战前或战时，这种統一工作尚不过剛剛开始，而沒有統一的金融市場，仍是今后的主要的特征。

第四是商业銀行主要的业务不是供給商业金融的信用。我們曾在我国銀行发生及发展的考察上，說一切銀行都是商业銀行的性质。这句话只能用在討論銀行的一般性质时才是适当的，如果用在分析銀行的业务时，我們必須改說銀行业务的一部分，甚至是最主要的一部分，并不是供給商业信用的需要，而是在商业銀行正常的业务范围以外，兼营或專营外汇、标金、公債、地产等投机和套利业务的。我国銀行的資力的微小，固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不过高利吸收来的活期和短期存款，必須应用于获利最大收回迅速的业务上；因为金融市場的組織不完全，例如沒有票据市場，則以商品或原料为抵押的放款，亦不免时生信用冻结的危險，反之，那些投机和套利的业务，風險虽大，但获利既厚，又可随时脫手，換得所需要的現金，所以銀行資金的应

用，亦向着利潤最多的方向匯流了。這里，還有一個重要的意義須加指出的。即銀行資金应用于正当業務以外的投機活動上的原因，不只是由于資金是来源于官僚資本和高利貸資本的變相，亦且由于正当的商業金融業務，外受帝國主義在華外商銀行之壟斷，使國內銀行的活動嚴格的限制于非常狹小的範圍以內，換句話說，在外商銀行所容許的需要限度以外，國內銀行經營商業金融的業務是遭受外商銀行的排斥的；內受手工工農業經濟的半自給的特性和天災人事不斷發生的災難，使國內貿易的進步受到了大大的限制，而不足為銀行資金擴張所需的新用途。由于這種內外的原因，故我國銀行資本，不單站立在供給生產事業資金的範圍以外，并亦徘徊在商業金融以外的投機活動上了。

上面對於我國銀行之性質和特征的分析，在我們的論題範圍上，或不免占了較多的篇幅，但是這種分析，對於銀行與工業的關係的考察，以及今後銀行發展的趨勢和改進的方策上，無疑的仍是一種不可缺少的前提認識。

二 抗日戰爭前銀行與工業的關係之考察

上一節我們從銀行的發展過程的考察中、指出我國銀行的發生是和生產事業極少關係的特征，這自然不是說它不曾或永不能進到產業金融的活動上來。我們的意思只是說明我國銀行和歐美先進國家的銀行有基本質的不同，以免誤用美國或英國的金融資本的含義和觀念，隔靴搔癢的大談其一般的銀行與工業的關係罷了。其實，我國銀行也在隨着我國經濟發展的總趨勢中，漸漸的改變着它的性質，而和工業或農業發生了某種程度的關係，不管這種關係是怎樣發生的，性質和程度是否已足以適應工業的要求？假如不能，那麼原因何在？缺點何在？以及我們可能採取何種方策，才可以使銀行與工業的關係走上正常的相互發展的道路？這就是本節和下節所要具體檢討的。

我們現在從工業資金問題的角度上，來考察我國銀行發展過程

的另一方面。

鴉片戰爭是我國社會經濟發展史上由自足經濟轉變到商品經濟，由手工業生產轉變到工業生產的大關鍵。然而鴉片戰爭後最初四、五十年的歷史只是在適應帝國主義開辟商品市場的要求中，附帶的為輸入工業生產方式並含有重大的社會經濟意義的，尚是開始於中日甲午戰爭前後的棉紡織工業。這種棉紡織工業的輸入，既是我國最重要和最普遍的手工紡織業的革命，同時亦即成為較發展和較有成績的一種新式工業。在有數千年手工業歷史的國家，雖然經過帝國主義經濟侵略的破壞和分化，但如要由輸入的新生產方式在破落的廢墟上建立一個新基礎，問題卻是非常艱巨的。例如從生產工具的機器，到技術、管理和原料、銷場等，處處都是滿布着不易通過的困難。依據我們的研究，在所有的困難問題中，最重要最普遍並且是從第一個工廠開設起直至今日還不會適當解決的，仍要算是工業資金問題。我們這裡舉二個官辦工業和民營工業作為代表：

在清季，張之洞算是有名的“新政”家，他曾創辦了紗布局、航政局、槍炮廠、鐵廠等新工業。當他任兩廣總督時，鑑於洋紗洋布“既不能禁其不來，惟有購備機器，紡花織布，自擴其工商之利，以保利權”，所以決定在廣東創設織布局，後來又隨他宦迹變動改設於湖北。在他設廠經過中，關於購機建廠，聘請外國技術等，都尚順利，但資金的籌措，却是最感煩惱，是終使“新政”失敗的一個根本問題。第一次購紗機30,440錠，共價84,832英鎊，加上運腳基地廠房等約需華銀60余萬兩。而在“成本甚重，商股既不易集，庫款支絀，官本亦屬難籌”的情形下，只有利用廣東人對鄉試及歲科試預卜得中人姓名的賭博行為向“闖姓”派捐。注派定光緒15年份者40萬兩，16年份者56萬兩，在捐款未到前，訂機款229,000余兩，先由庫款暫為墊支，以為“官為商倡”。後來工廠隨張移設湖北，除收到15年派款40萬兩外，16年派款，後任李鴻章則借故推諉，不肯再交。經張再三交涉，以作為粵方股本，6厘起息，獲利則按股于息外分贏，虧折則由鄂方獨任，于粵款利息絕不短少的條件下，才允再撥16萬兩。此外又以9厘年息借用山西善後

局借款20万兩，和提倡湖北藩司善后局存当生息的善举公款10万兩。而当粵省第二次闖姓捐派未交之前，因需款急迫，于光緒16年4月以捐款作担保向汇丰銀行抵借10万兩，認息5厘，至8月間又續抵借6万兩，足見“急不擇食的窘态。其后第三次向英商訂机扩充紗厂时，更不得不采用分期付款的办法，先付机价1/4，除款以湖北織布局担保，分三年六次撥还，自訂約后每半年付款一次；交貨后按6厘起息，机器分二年交清。上述二事都在說明我国官办的紡紗工业，在創业資金中，即因国内无法籌集，而走上引用外資的道路了。至于張氏所办的鉄厂即后来成为我国第一大鋼鉄厂的汉冶萍煤鉄矿公司，創办資金的籌集比較紗厂还要恶劣。考鉄厂的規模頗为巨大，所有創办資本，除請一部分庫款外，就凭張氏东撥西借，甚至欲以新办紗厂的利潤“酌量撥补鉄厂之費”，直至1896年已共用庫平銀568万兩，还未正式开工出鉄，而張氏的張罗能力，亦至水尽山穷，致不得不交由盛宣怀接办。在盛氏手中，1896年至1907年間，新办大冶鉄厂、萍乡煤矿、运煤輪駁及扩充設備等，規模益見宏大，但鉄厂已用商本銀1,020余万兩，煤矿輪駁已用商本銀740余万兩，外債商欠將及1,000万兩，在改組股份公司后，更益依賴日本的借款維持，最后則將整个公司投入日本帝国主义的掌握。其結果，已是我們大家所共知共見的，这里不用多說。

如果上述張之洞的办厂，可以視作官办工业的代表，那末，現在所說張謇的兴办紗厂，似可視作商办工业的代表，虽然張謇本人是一个中过狀元并有远大眼光的紳士，与那时的买办商人錢庄商人迥不相同的。張謇創办紗厂的动机，一面以“洋紗內灌，通海商人，利其紗細，轉向購買，摻織土布，每年消耗40万金”，“若不急就該处兴办紗厂，則民間此項漏卮，无从而塞”，另一方面，張之洞因为湖北織布官局南厂无資開設，极力鼓励領購其預購紗机四万余錠，另行設厂，这即是南通大生紗厂創設的由来。但大生紗厂自創議至購机建厂開車，共历时44月，为籌集資本，几經挫折，始底于成。开始时原拟商办，光緒21年秋，張氏往来上海南通海門，約劝商股6人，拟集資60万兩，至次年秋滬董因見紗市不利，首先退出，接着通董亦推翻成議，要求

退股。不得已又創官商合辦之議，奔走官商之間，而商人畏難而退，官又空言不可靠。張氏舌敝神疲，奔走權要之門，“乃至凡相識之人，有冀其可助而言之者，有明知其未必有助而言之者，有明知其未必有益而言之僥倖者”，結果，向以建廠激勵的大吏，皆掉頭不顧，友朋詰責，謂其不當出任此事，地方士紳散播謠言，群起而攻；真如張氏自述所言，“官吏阻遏百端、紳商觀望”，“阻儉黠吏，陰嗤而陽弄之者比比皆是”，至于“上海資本家挾母財以蓄匯兌存放之錢庄，基本不出十萬金，獲利則稱是，或十之四五，或十之二三”，對於投資工業，尤絲毫不感覺興趣。在此情勢之下，只有“聞謗不敢辯，受侮不敢怒，閉目塞耳”，“趨程盲進”，“辟之躋危涉險之人，攀虎豹而踞虬龍，稍有錯趾胸睛皆有叢粉之勢”。所以大生紗廠能以開成并大獲盈利的原由，主觀上固由張謇氏鏗而不舍的精神，客觀上更因洋紗已在我國市場上獲得了廣大手工織布業者作為主顧，而南通又是棉產豐富和手織業繁盛的區域，所以大生的創業資本雖只25萬兩，除各項開支外，作為流通資金的更只有四、五萬兩，而他却憑拋紗買花，“紗花自轉”的辦法，不但把紗廠維持下去，並且大獲盈利，股東在官利之外，大分紅利，紗廠也可以添設分廠了。

根據兩位張氏創辦工業的經過，可知一個落后的手工業經濟的國家輸入一種新生產方式時，資本是居于如何重要的地位，而由商業資本、官僚資本轉變為工業資本又是一個如何艱難而長期的過程。資本總是流向利潤最高的處所，所以商業資本走向工業的放款或投資，只有在工業利潤在事實上證明比商業利潤更高以後；此後的官僚資本和買辦資本的一部，參與建立紡織工業的競爭，就是一個證明。不過，我國紡織工業因為外受國際紗布輸入，內受日英在華紗廠競爭，時興時衰，並無鞏固基礎，而紗布市場又無主動的控制力量，因此資本的轉向工業的運動，常是稍稍嘗試一下，又復回到商業資本的老巢。

有人批評說，轉到工業生產方面的商業資本，依然發揮高利貸資本的作用，例如工廠不論開工或盈虧，股本官利，必須照付，紅利必須

多分，所借流通資金皆須担負市場一般利率以上的利息，實是我國工業資本不能大量蓄積的根本原因之一。我國社會經濟發展中所形成的資本，無論它的來源是官僚、地主或商人，性質上都是典當錢庄式的高利貸資本。它們投資于工業，是與開典當錢庄、經營投機事業或與外國資本作買辦工作，都是等量齊觀的。我國工業家的創業資本，或來自官僚資本，它的目的等于錢庄，典當等高利事業的經營；或來自商業資本，它的目的仍在買賤賣貴的商业經營，這些都和生產全然無關的，而在它們創業資本還未能籌足時，急于開工獲利，不得不靠短期借款來維持流通資金，以至充作固定資本的一部分，所以就感覺資金問題的特別嚴重了。本來大企業的順利進行，必須有高度的金融組織以為扶助，始可以適當的方式獲得短期和長期的必要資金。但因為我國工業既多是合伙的組織，極少是股份或公司債的公開發行，而金融組織連短期資金的票據市場也未形成，所以在工業或金融界方面都只有依照商業金融以至高利貸資本方式獲得或供給資金。研究我國工業獲得借貸資金的方式，大概可分為六種：一為成品及原料抵押借款，二為廠基及機器抵押借款，三為低價拋出期貨，四為商品押匯，五為信用透支，六為直接吸收戚友及職工的存款或儲蓄。其中除儲蓄存款及預售期貨外，它的對象都是要與本國銀行錢庄或外商銀行和洋行辦交涉的。而在這幾種方式的工業和金融的關係中，外商銀行的關係是遠較本國銀行錢庄為早。比如1890年左右，李鴻章整頓第一家紡織工廠上海織布局時，即有舉借德華銀行借款10萬兩的擬議，張之洞的湖北紡紗官局曾向香港匯豐銀行借款16萬兩，1895年開工的裕晉紗廠，自始即靠道勝銀行的透支度日，盛宣懷接辦下的漢冶萍煤鐵礦公司，更逐漸投入日本幾個銀行的投資系統；此外如開灤、臨城、井陘、六河溝等煤礦事業舉借外債以解決資金供給問題的，實屬舉不勝舉，而這些工礦事業的結局，也頗多因借款抵押關係而為外人攫奪以去。我國金融業與工業資金發生關係的，在銀行開設以前，乃至第一次歐戰以前，自然要推錢庄和銀號，不過它們的資力有限，利息又高，而且業務方針也完全放在國內外貿易的資金融通上，

所以錢庄銀号虽有信用借款的經營，而对于工业資金的助益却是极少的。至于銀行，在其最初阶段，也和錢庄无甚差异。例如我国第一个銀行，虽是由官僚兼实业家盛宣怀創办的，但主要业务却在經營汇兌，嗣后成立的官办的戶部銀行、交通銀行，或是商营的浙江兴业、四明、浙江实业等銀行，也只是着重汇兌、商业金融或发行业务，而和工业是极少关系的。銀行与工业发生較密切的关系，和其在工业資金的融通上占取相当的地位，实开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及其以后。在欧战中，在我国輸入貿易占有重要地位的各国，除日本外，都已暂时撤退，因使民族工业，特别是紡織工业和日用品化学工业等都有了空前的发展，工业利潤也空前增加，甚至赶上并超过了商业利潤。因为国际战争突然发生所引起的民族工业的兴起，对于流通資本和固定資本的需要，益形迫切巨大，而利潤的优厚，亦大足以保証放款的如期偿还，这样就使銀行与工业的金融关系，亦由商品押款、商品押汇而进到厂基押款了。

中国銀行上海銀行各年度末工业放款余额

(單位千元)

年 別	上海銀行		中国銀行	
	工业放款	紡織业放款	工业放款	紡織业放款
1931	22,991	10,051	—	—
1932	34,565	21,361	36,840	24,137
1933	34,549	24,272	49,477	25,401
1934	37,000	26,217	54,441	34,243
1935	33,780	22,450	—	—
1936	38,360	25,816	—	—

从上面这个兩行的不完全报告中，可以看出几点事实：第一，兩行的工业放款，大体上都是逐年增加的，促使工业資金的需要与銀行資金的放出兩者結合起来的，仍是欧战賜予的民族工业利潤的优厚。不然的話，我們就全无法解釋少数銀行的突然热心于工业放款，以及不久之后又有从工业資金的供給上撤退下来的現象的。第二，我国銀行的經營工业放款，原是发生于少数銀行的試探性質，并没有造成

一般銀行業務方針的改變，即在歐戰中我國工業特別景氣的時候，全體銀錢業還都是熱中于非生產的投機營業。同時所謂工業放款的經營，亦非遍及于各個工業部門或是性質上更較重要的部門，而是集中于獲利最快最厚的輕工業部門。上表中國上海兩行的工業放款有60—70%是投放于紡織工業，就是一個極好的說明。並且就我們所知，各行的紡織業放款，亦是比較集中于原有借貸關係的少數紡織工廠；已於某一銀行訂有抵押放款的工廠，別的金融機關的貸款，固然不被接受，但是一个新的工廠要求獲得銀行資金的融通，亦是不易得到允許的。第三，表列時期中工業放款的增加，不是工業景氣的反映，而是恐慌的結果。所謂恐慌的結果，亦不是泛指恐慌時期工業資金需要的一般增加，主要的是訂有廠基押款的少數工廠日需生產維持費罷了。

以下我們再從另一方面，從工廠借入資金上來觀察銀行與工業的關係。

王宗培先生搜集1932—39年一百家公司研究其資本構成，這些公司有73家屬於製造工業，并有77家分布于江蘇一省，上海一埠更占了63家之多，所以這只是企業資本構成的一個選樣研究，且是偏于公司組織的選樣研究。這些所說的借款，系指由銀行錢庄借入的資金，存款則指直接來自親友及工人的儲蓄存款。依據上表分析（表略——編者），可給我們這樣的觀念：首先是我國公司企業資本組成中，平均有40%以上來自借入資金，而紡織工業更幾達50%；足見我國工業需要借款的急巨。至于其他製造工業中，借入資金僅占30%左右，自非自有資本的充足，而是借債能力薄弱的反映。換句話說，它們并非不願接受借款，乃是銀行錢庄不願對他放款所致，比如借入資金對自有資本的比例低到43.95%，而借款與存款的比例，又為43.84對56.16，就是一個極好的說明。其次，銀行錢庄的放款，在擁有262,206千元資本的一百家公司借入資金總額中，平均占到43.8%，紡織工業的比數最高為72.62，其他工業最低，僅有19.27%，而在資本構成總額中，銀行錢庄放款平均只占26.06%，在其他工業更只占13.38%，即在与銀

行資本关系最密切的紡織工業中亦不过占36.66%，这是充分說明我國銀行資本在工業資金中，實处在較任何工業國家遠为低微的地位。再次，最值得注意的現象，就是各種企業襲用原始的籌集資金的方法，直接從各個私人借入或存儲的所謂存款，竟還占了極為重要的地位。在這一百家公司中，直接吸收的存款共達6,300余萬元之多。在整個企業資本的分配中，平均雖只有14.45%，但在借款與存款的百分比上，却已占有64.32與35.67的相對地位，而在紡織業以外的製造工業中，更占有43.84對56.16的優勢。我們知道這百家偏在通商大埠的公司組織，私人的直接借款依然占取如此重要的地位，則那些獨資、合伙以及偏處內地的企業，自必更要依此為融通資金的最重要方法的。一個工業經營者的親友及職工無論怎樣多，亦無論是否用公開方式征求儲蓄存款，其以較高利息吸收存款以致增高了生產成本的利害，這里且不去討論，而直接吸收來的各個私人的零星存款，絕不足以適應工業資金的要求，自是毫無疑問的。我們雖從外國輸入了新的機器和新的技術，但是工業資金的供給依然依賴于手工業的方法，實是“死的抓住活的”的矛盾現象，而銀行資本，更進一步說，社會金融的變革，趕不上工業發展的需要，亦是毫無疑問的問題。

在上面，我們已從銀行放款和工業借入資金的比較研究中，說明銀行與工業的關係，一方面，銀行資本漸以工業資金的融通作為業務的一部分，從我國銀行的發生和發展史上看，究應被認為難能可貴的進步現象；另一方面，銀行放款的微小既不足以適應工業資金的需要，放款範圍的窄狹，更使許多工業享受不到現代金融的便利，仍不得不因襲手工業的籌款方法以自束縛機器生產方法的發展；同時放款利息的巨大和條件的苛刻，又常使工業始則為付出利息而生產，繼為還債而借債，終則因付不出利息而破產，以造成工業與銀行交受其困的窘境，在這種交受其困的環境中，許多工業是停工、清理、破產和被沒收；而銀行則是監督、代辦而直接經營工業了。

下面即擬就這種新現象，加以簡單的分析，以為戰前銀行與工業關係的考察結果。

我們曾經說過工業獲得銀行信用的方式，最主要的有二：一為商品押款；另一種為廠基押款。商品押款因時期較短（最長不過六月），數量較小，放款本利的收回亦是較易處置的。廠基押款却不盡然。它的時期較長，普通一年到三年，數額亦較大，如申新第一、第八、第二和第五廠廠基機器等抵押品共估值1,300余萬元，上海銀行抵押放款即達950萬元，約合抵押品價值的73%。銀行因押款而取得了定期所有權，又因為是對物的抵押信用，而不能轉變為票據，所以一至恐慌時期，銀行不但不能如期收回本利，且為避免成為呆賬起見，更不能不繼續供給再生產的資金，但是等到負債等於或超過資產總額，營業狀況又無起色時，就是銀行與某一工廠最後清算關係的時候了。

我國工業原是處在“先天不足，後天不調”的境遇，再加以經營的不善，“舉借辦廠，得利先分”，始終沒有跳出高利貸的“吃利子”和商業資本“賣貴買賤”的投機性的泥淖，所以在工業繼續興起的後面，同時跟來了停工、改組、轉讓、出租或拍賣等許多失敗事實。等到銀行資本以抵押放款的方式滲入工業以後，這些變化又和銀行發生了“不解之緣”。依據棉業統制會調查1936年4月底在停工中各紡織工廠的負債情形是：

1936年4月底停工棉紡織廠負債情形

廠名	所在地	資本總額	負債總額	負債占資本百分比	債權人
恒申	上海	1,512,000	3,600,000	238	浙江興業銀行
裕中	蕪湖	1,000,000	1,800,000	180	中國實業、上海、中國等銀行
漢口第一	武昌	5,600,000	10,000,000	179	沙遜銀行、浙江興業銀行
民生	上海	700,000	1,080,000	154	中南銀行及錢莊
協裕	上海	200,000	280,000	140	恒興錢莊
經緯	天津	5,600,000	5,908,000	106	大倉洋行、金城、中南等銀行
振華	上海	550,000	550,000	100	中國興業銀行
和豐	上海	420,000	400,000	95	中國興業銀行
寶成	寧波	900,000	600,000	67	中國興業銀行
新新	天津	3,000,000	2,000,000	67	中國、上海、浙江興業銀行
華新	無錫	1,250,000	414,000	65	上海銀行
大生第一	天津	2,420,000	1,492,000	62	中國銀行等
魯豐	濟南	1,980,000	1,100,000	56	中國、交通兩銀行
豐興	濟南	1,860,000	820,000	44	民生銀行等
申新第二	武昌	1,710,000	281,000	19	安利洋行
申新第三	上海	—	2,012,000	—	中國、上海等銀行
申新第三	上海	—	2,907,000	—	中國、上海等銀行

上列18个停工紗厂負債調查，可以作为我国工业一般經濟状况的代表看。其最大多数的負債都达到資本总额的50%以上，最高曾达238%。这些工厂債权人，除了英商沙遜洋行、安利洋行及日商大仓洋行外，都为我国銀行和錢庄。工厂的負債达到这样的程度，即在景气时期，利息負担亦是一个严重問題；如裕元紗厂在1923至1935年1月，共計付出利息9,647,000元，平均年負利息达80万元之多，而本息滾刻的結果，必然只有破产清算的一条道路。在这种情形下，我国銀行家似乎也曾試行过各种办法：首先是破产清算的办法，即是得不偿失，有时又行不通。例如震寰1933年清算結果，机器房产等資產的总購价才不过200余万元，而負債却有300余万元之多；永豫全部財產的估价为1,292,119元，而所欠銀行債務实达150余万兩；天津宝成拍卖結果，得价1,375,000元，而所欠銀行債務便达200余万元；尤其大生第二，1936年举行拍卖三次，限价由200万元减至160万元，再减至130万元，始終无人投标，最后还是作价100万元，由債权人中国交通兩銀行接收了去等事实，似乎証明銀行为保障債权，不得不采行另一方法；这个另一方法，也就是在华外国銀行洋行屡屡实行的，由債权人——銀行——直接經營工业了。

銀行利用放款攫取紡厂的方式，据严中平先生的研究，是随紗厂的負債程度，約可分为兩类：一为負債較少者，由銀行取得經營权；一为欠債較多者，归銀行接收，成为自己的产业。“因債務关系归銀行接管的紗厂，大約依下列条件，繼續營運：第一，紗厂股东仍对紗厂保有所有权，銀行則获得經營权，或有定期或无定期总須股东履行条約义务，方得收回自營；第二，在代管期內，紗厂所欠銀行之旧債保本停息，另有債权銀行撥借新押款充流通資金，利息应付；第三，紗厂一切管理營運业务完全由債权人派人执行，股东則有監察权，惟营业如有亏损归股东負責，如有盈余，則按协定成数，由債权人与股东瓜分。截至1937年上半年止，以这样条件归銀行或其委托机关經營的紗厂有汉口第一、上海印染、申新第二、申新第五、恒丰、恒源、振华、振新等厂。在欠債业已与資產相若或竟至于超过資產的紗厂，实际业已

成为债权人的投資了。这时銀行或將紗厂拍賣以抵償其債務；否則將紗厂接收过来，自己經營。在此蕭条期中，被銀行以这样方法攫取了紗厂有北洋、永豫、久兴、裕中、大生第二、溥益第一、溥益第二諸厂。”“1932年后，中国金融业既因上述理由，不得不侵入棉紡織业部門从事活动，經營既久，終酿成直接投資的嘗試。截至1937年上半年为止，虽无純由銀行投資創建的紗厂，然由銀行投資合办者，則已不乏其例。如济南仁丰紗厂，昆明云南紡織厂及在籌建中的豫安、嘉陵、咸安、衡中各厂皆是。”“不过，紗厂的債权人往往不是一家銀行，而銀行如要大規模地經營紗厂，也必須另有独立的机构，这样遂有多家銀行合組銀团、信托公司来負責經營紗厂的新設施。截至1937年上半年为止，銀行业已組成此种集团的計有中国棉业公司，誠孚信托公司、汇业銀团、中一銀公司等諸家。”

从上面的分析看来，由于銀行对于工业資金融通方式的改变，似已开始了銀行資本走向产业資本道路的新动向。这一新动向的形成，如我們在上面一再指出的，是我国內外經濟条件限制着新式工业不能健全发展的产物。我国的銀錢业本来是不願投資于各种产业的，錢庄的信用放款或是銀行的抵押放款，其目的都不过是以風險最少的方法获致最大的利息的收入，而工业本身的兴衰，在放款者看来，却只是債務保障的一个附屬条件而已。在这方面說，过去銀行以商业資本甚至高利貸資本的精神和形式供应工业資金部分需要的結果，从許多工厂的停工、改組和沒收的現象上所反映出来的，可以說反面的作用远多于正面的作用。現在銀行由于放債收利，保本保利而被引到直接經營和投資工业的新道路上来了，这从工业的观点看，应被視为进步的現象。在銀行經營工业的几个方式中，自己經營和直接投資两种，更已接近工业資本的正常要求，反之，代为經營的方式，尙是由股东負担营业亏损的責任，可以說仍未脱离高利借貸的窠臼的。

不过我国工业經過銀行的接办，能否就可一帆風順的发展下去，能否可由紡織业发展到更基本更重要的部門去，以至銀行資本能否

由地方性的高利貸資本發展到統一的產業金融資本，還要視以後的各種具體條件來決定的；且在沒有產業金融市場的條件之下，銀行的經營工業既是有它的最高限度，而與其接收信用和授與信用的本身業務，是否又產生更多的牽累，也要待較長時期的更多事實來證明。可是銀行與工業的這一新關係在剛開始時，就遭遇了日本帝國主義武力侵略的摧殘，在戰時，因為客觀條件的種種不同，在銀行與工業的關係中又加上許多新因素了。

三 抗日戰爭時期銀行與工業關係的考察

抗日戰爭對於我國工業及銀行都帶來了一個空前的災難，同時又給帶來了一個空前的发展機會。所謂空前的災難，是說敵人在各大都市尽情的破壞和掠奪，已使我國幼稚的工商業的一點薄弱基礎，可謂十去八九；所謂空前的发展機會，是說外來的經濟勢力的暫時撤退，戰時物資的缺乏與需要的相對增加，以及通貨膨脹政策下的戰時景氣，使工商業又在經濟較落后的廣大區域獲得發展。這種後方工商業的新發展，可以用數字表示的，工業方面，截至32年底已設立合於工廠登記法的大小工廠4,524家，共有不同時值的資本總額2,640百萬元，如以時值計算，全部工業的固定資本約有300—400萬萬元之巨。銀行業方面，許多總行的內遷，新行和分支行的添設和錢莊的改組，猶超過民國初年的盛況，至30年底，僅重慶一處新設的分支行即達70—80家，全後方開業及籌備的縣市銀行亦有159家。

然而戰爭景氣中，亦增加工業和銀行資金問題上許多新的需要和困難。就工業說，工廠的遷建，首先增加了固定資本的新支出，生產總過程中各種條件之戰爭的阻礙和不定的因素，又增加了流通資本的新需要，同時物價的不斷高漲，一方面固然造成了十倍百倍於資本的利潤，另一方面又造成再生產資本的激急增加。一方面我們看到許多“白手起家”，由小廠擴張為大廠或添設分廠的新興資本家，另一方面我們亦看到許多工廠的改組、遷移、停工或歇業的現象，以及更多的時時酬應於銀行、錢莊和私人的借款或索款。這種矛盾現象，正

是我国战时工业景气真实的反映。现在我们依据30年及31年121家重要工厂的资产负债统计,来分析战时工业的资本构成情形。这121家工矿业资产及负债,其分配如下:

121家工矿业资本及负债比较 (单位千元)

产 业 别	家 数	净 值		负 债	
		数 目	所占百分比	数 目	所占百分比
总 计	121	426,679	38.97	668,250	61.03
水 电 工 业	3	32,597	45.63	38,845	54.37
冶 炼 工 业	8	73,207	52.58	66,025	47.42
金 属 品 制 造 工 业	2	3,081	69.18	1,373	30.82
机 器 制 造 工 业	22	36,650	31.52	79,610	68.48
电 器 制 造 工 业	1	313	48.41	333	61.59
木 材 及 建 筑 工 业	3	4,478	32.18	9,437	67.82
土 石 品 工 业	8	45,632	60.73	29,504	39.27
化 学 工 业	32	57,727	52.81	51,587	47.19
饮 食 品 工 业	9	23,616	39.53	36,125	60.47
纺 织 工 业	16	86,538	23.50	381,716	76.50
文 化 工 业	1	902	49.02	930	50.98
矿 业	16	61,938	45.98	72,765	54.02

121家工矿业资本之分配 (单位千元)

业 别	资本及 公 债	长期 负债	长期负债 对资本之 百分比	短 期 负 债	短期负债 对资本之 百分比	其 他 负 债	其他负债 对资本之 百分比	负债总额 对资本之 百分比
水 电 工 业	31,154	10,424	33.46	22,832	73.29	5,589	17.94	124.63
冶 炼 工 业	73,166	18,399	26.14	44,478	62.16	3,148	4.30	92.60
金 属 品 制 造 业	3,081	724	23.49	647	20.99	2	0.07	44.55
机 器 制 造 业	33,413	6,896	20.64	53,943	122.44	18,771	56.18	238.26
电 器 制 造 业	290	—	—	259	89.71	74	25.52	115.23
木 材 建 筑 工 业	4,268	—	—	9,127	213.84	310	73.34	287.18
土 石 品 工 业	44,505	1,087	2.44	26,667	59.92	1,750	3.93	66.29
化 学 工 业	49,034	4,003	8.16	28,993	59.12	18,591	27.92	105.20
饮 食 品 工 业	18,612	650	3.49	34,014	182.75	1,461	7.85	194.09
纺 织 工 业	43,600	8,186	18.78	183,173	420.12	90,357	207.24	616.14
文 化 工 业	460	—	—	812	176.52	118	25.65	202.17
矿 业	54,960	11,763	21.40	53,045	96.52	7,957	14.49	132.41

121家工矿业固定资产与长期负债及流动资产与短期负债之比较 (单位千元)

业 别	固定资产	长期负债	长期负债对 固定资产之 百分比	流动资产	短期负债	短期负债对 流动资产之 百分比
总 计	327,533	62,132	18.97	550,332	457,990	83.22
水电工业	34,056	10,424	30.61	27,225	22,832	83.86
冶煤工业	31,143	18,399	59.08	23,931	44,478	158.86
金属品制造业	1,905	724	38.01	2,523	647	25.64
机器制造业	30,518	6,896	22.59	72,096	53,943	87.82
电器制造业	91	—	—	554	259	46.75
木材建筑业	2,985	—	—	10,194	9,127	89.53
土石品工业	34,998	1,087	3.11	30,919	26,667	86.25
化学工业	51,736	4,003	7.74	52,366	28,993	55.37
饮食品工业	11,227	650	5.76	43,288	34,014	78.58
纺织工业	64,635	8,136	13.27	234,695	183,173	78.05
文化工业	531	—	—	1,157	812	70.19
矿 业	63,658	11,762	18.48	51,383	53,045	103.23

由以上三表关于121家工矿业资本之多方面的分析,可见战时工业的资本问题是具有这样的几个特点:第一、就资本、公积及盈余等科目所组成的净值与负债比较,借款已占到企业资本的平均61.03%,最低的金屬品制造业为30.82%,最高的纺织工业为76.50%,多数工业的负债均在50—70%之间。如与前引的战前100家企业资本组成之统计相较,那时负债在企业资本总额中平均才占49.52%,仍远在战时工业的总平均数之下。如此看来,如果说战前工业已以借入资金作为再生产的资本,那末,战时工业依赖借入资金的程度是更加增加了,换句话说战时工业资本中工业资本家自有资本尚占不到2/5,可以说,如果没有借入资金任何工业都是不能进行再生产的。这种借入资金中自然还包含有直接存款、预收货价等项目在内,但自银行业借入的无疑要占最大部分。这样,就表明战时工业几已完全依赖于银钱业资本的融通资金,而银钱业对于工业的支配力自亦普遍增加。这都是战前所没有的现象。第二、资本及公积与负债的对比中,负债平均已达到资本及公积的187.71%,比例最高的纺织工业竟达到46.14%,最低的金屬品工业亦在44.55%。在上节所引战前

18家停工紗厂負債与資本总额的对比，最高不过达到238%，最低且在16%以下，而那些厂已陷于停工、改組或被债权人沒收的命运了。然而战时工业負債虽多，却还极少发生被沒收的事实。这种現象的合理解釋可以有二：一为通貨膨脹下的币值不断跌落，所以資本及公积金的帳面数字虽甚微小，而其所代表的資產的时值，却可能在法定数額数十百倍以上；另一个原因是短期負債占了最大的成分，所謂長期負債平均不过当資本总额的17.43%罢了。我們知道短期負債，除了无抵押借款外，多是以原料、成品作抵押的，所以短期負債虽达到資本总额的128.73%，事实上却不会发生沒收工厂的問題。

这里，还有一值得注意的現象，即是銀行对于長期放款，是极不願意接受的，尤其是厂基及机器抵押放款，更不願意經營。这在銀行一方面，或是鉴于战前經營厂基押款的不良好結果，同时，战时的可能損失更行增加，而資金的呆滯，又为通貨膨脹下的最应避免的一件事，但是从工业方面看，借入資金的80%以上，都是屬於短期借款，即其在資金运用上是会更加困难，亦会更时时感觉資金的恐慌的了。第三，前面已經指出，由于币值的不断低落，各个工厂的固定的时值，都远在帳面数值的数十百倍以上，可是奇怪的現象，是長期負債对固定資產的比之低，平均才不过18.97%，比例最高的冶煉工业亦不过占59.08%。而电器制造工业、木材及建筑工业、文化工业，更沒有長期負債可言。这虽可以战时的反常現象来解釋，亦可知当前工业資金問題的困难和其关键的所在。至于短期負債对流动資產的比例，平均高到83.22%，矿业的比例最高为103.23%，金屬品工业最低亦为25.64%，普通皆在70—80%左右。我們知道短期負債之抵押品的流动資產，如原料成品等比較都是接近于时值的，而通常流通資產与短期負債之比，是以流动資產二倍于短期負債为最适宜。依此标准，仅有金屬品制造工业及电器制造工业尙能符合要求，其他各业均远在此項标准以下。在当前物价时时暴漲情形之下，虽可不会发生无力償債的問題，但是短期負債对流动資產的比率已經如此之高，如果不能获得厂基机器的抵押借款，那么一般工厂已极少可以提供新借款

担保的流动资产了，这或者就是许多工厂经营者所以要在比期市场上获得半月或一周期的比期借款的一个重要原因罢。

上面关于工矿资金的资料，自是一种限于重要都市而经营成绩尚称良好的少数工矿业的选样研究。我们的分析如作为战时工业资金的代表趋向，可信是极接近于一般事实的，即是战时工业比较战前是更加依赖借入资金，主要的是以短期资金进行扩大再生产，以至维持单纯再生产的。这种现象可以从两方面来观察：工业的依赖借入资金的程度的增加，必将迫使其从手工业的合伙或独资的组织形式中解放出来，而采取适合于银行放款，亦即适合于工业发展的股份公司的组织形式，这应视为进步的一方面。同时，长期借款只占负债总额的1/10以下事实，不单表示当前工业经营者运用资金的困难，并亦表明战时工业资本的构成，反较战前更加不合理和不健全了，这又是退步的一方面。现在，我们再拟从银行资金的运用上，对战时银行与工业的关系，作另一角度的考察。

战时银行量的增加，已于上面说到，同时组织上亦有不少的改进。例如发行的统一，“四行专业化”，商业银行的管制，放款用途的比例规定，中央银行经营贴现业务，票据交换所及联合准备库的设立，以及票据市场和产业证券市场筹备等等。不过，在这里是无暇分析这种组织改进的意义或成败过程，我们只拟就商业银行、国家银行的工业放款业务及银行投资工业三方面论述于下。（编者按：关于商业银行和国民党四大家族经营的银行对工业的放款，因原文所引用的材料都是来自别处的，在分析上也还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关于这两种银行的放款，请参看后述原始资料）

战时银行在投资方式上约有三种形态：各银行联合投资，如裕滇纱厂由中国、交通及富滇新三银行共同投资，中国兴业公司由国家各行局（按即四大家族经营的银行——编者）及川籍诸银行共同投资是；投资省营工业（按即国民党各省地方官僚经营的工业——编者），如中国、交通银行投资贵州企业公司是；直接经营工厂，这类银行附属业务的工业经营，颇难一一列举，我们可以中国银行和中信局为代表；

中国銀行的雍兴公司，已創辦包含各种工业的 30 个單位左右的工厂，成为川陝甘等地一个有力的产业公司；中信局本身历史和其参与工业經營的历史都很短，可是長袖善舞近年来頗着力于收購工厂，直接經營，似有欲与中国銀行爭衡之势；至于商业銀行及地方銀行，如上海銀行、富滇新銀行，亦都有自己經營的工厂，不过范圍和规模都較狹小了。第二、在經營的范圍上，亦已不是局限于紡織业一个部門，而在某种有利条件下擴張到各种工业了。据現在所知，从冶煉、机器、化学、紡織到印刷工业，几乎都可找到銀行經營的工厂，自然，紡織工业仍不失为銀行投資或經營的重要对象。今將后方各重要紡織厂与銀行資本的关系，列表于下，以見銀行与工业之新关系的一斑。

重要紗厂与銀行資本之关系

厂 別	投資銀行	密切往来行	普通往来行	其 他
豫丰紗厂	中 国	中 国		
裕华紗厂	聚兴誠	聚兴誠	中 国	
沙市紗厂		聚兴誠	中国、通商、 交通、上海	
申新紗厂		中国、上海	交 通	
濰昌紡織公司		上 海		四行貼放
民治紡織公司	和 成	和 成	中 信 局	四行估放
新民紡織公司	交 通	交 通	中 信 局	
大 华 紗 厂		中央、中农	中国、交通	
咸 阳 紗 厂	中 国	中 国		
雍兴公司蔡家坡厂	中 国	中 国		
业精紡織厂	中 国	中 国		
云 南 紗 厂	富滇新	富滇新		
裕 滇 紗 厂	中国、交通、 富滇新	中国、富滇新		
广 西 紡 織 厂		交 通		
湖南第一紡織厂		中国、交通、农民	湖南省銀行	
申新宝鷄厂	中 国	上海、交通		

上面列举的16个重要紗厂，有9个为銀行直接經營或投資，其他各厂亦与銀行有密切的資金融通关系。可見盈利最大的紡織工业，在銀行家方面既視為投資的对象，而工业家方面，亦必須有一家以上的銀行作为融通資金的支柱，才可以維持的。这种工业与銀行相需相助的关系，抗战以来，确是日益密切起来。而銀行的直接投資或經營工厂，战时和战前比較，也确有极大的发展。至于銀行直接投資工业的动机何在，有的說由于与工业的历史关系，有的說由于贊助国家促进生产的政策，还有的說由于国家限制銀行放款之分配比例的关系，而最基本的事实似乎仍是工业的利潤超过或相等于商业投資，至少亦是投資工业是保存貨幣价值最适宜的一个方法，然后才能吸收銀行資本在經營商业之外繼續投放到工业上来。（編者按：上述投資于工业的銀行大都是官办銀行，而且是都是投放在盈利較厚的紡織业，投資時間也在抗战初期和抗战中期的景气时期，1942年国民党統治区工业崩溃时，銀行对民族工业的投資就减少了。）同时，若干銀行对于工业投資的增加，固亦宜視作战时工业的特殊发展促进了銀行資本产业資本化的一个表现。假如客觀条件繼續适宜于工业的发展，或者工业資本家必須更进一步的依賴于銀行資本时，則銀行直接投資或經營的工业，自尚有繼續发展的可能，因为一个銀行的信用，在一般的条件下，总比一个公司或工厂的能力大得多。不过有一个日益严重而漸显著的現象，即是在現存条件繼續发展之下，任何一个产业公司的組織，如果不能从广大社会中获得投資的来源，而超額利潤又为私人分紅所耗蝕，不能积累为扩大再生产的資本时，則成为工业之后台的銀行資本，在接受信用及授与信用上都会日益縮小的。这样，我国工业資本增殖过程中所遭遇的暗礁，并不会因銀行的直接經營即无形消除的，这是我們在討論“銀行資本产业化”或工业資本的累积时，不容忽視的一个問題。另一方面，銀行放款自然还没有满足工业的需要。

（摘自李紫翔：“我国銀行与工业”，四川經濟季刊
第1卷第3期，1944年6月15日出版）

抗日戰爭時期國民黨統治區 民營商業行莊放款的分析

28年年底，3家商業銀行及12家錢莊銀號放款對象的統計，在這個統計中，是將個人放款，放在商業放款之內的。就全體行莊說，商業放款，計占全部放款的89%強，工礦兩業的放款，則不足1%。其餘公用、交通、文化等業的放款，共計所占不過10%強而已。單就銀行而論，商業放款，也占86%強。其詳細情形如下表：

28年年底15家行莊放款對象

類 別	金 額(千元)	百 分 比
總 計	24,890	100.00
商 業 放 款	22,215	89.25
工 礦 業 放 款	34	0.13
公 用 事 業 放 款	280	1.12
交 通 事 業 放 款	317	1.27
文 化 事 業 放 款	81	0.32
政 府 事 業 放 款	1,452	5.83
其 他	5.12	2.05

29年年底2家商業銀行及24家錢莊銀號放款對象的統計。在這個統計中，是將其他放款及個人放款，放在商業放款之內的。商業放款，在全部放款中，就全體行莊說，約占97%，工礦兩業放款，則不足1%。單就銀行而論，商業放款，也占87%強。其詳細情形如下表：

29年底26家行庄放款对象

类 别	金 额(千元)	百 分 比
总 计	42,754	100.00
商 业 放 款	41,410	96.86
工 矿 业 放 款	275	0.64
公 用 事 业 放 款	144	0.34
交 通 事 业 放 款	61	0.15
文 化 事 业 放 款	660	1.54
政 府 财 政 放 款	203	0.47

(摘自康永仁：“重庆的银行”，四川经济季刊1卷3期，第125页第30表，第126页第31表，1944年6月出版)

再就30年年終，重庆市36家銀錢业行庄的放款余額类别而論，商业放款，在全部放款中，計占89%强，工矿兩业放款的合計数，所占共計不过7%而已。又31年3月下旬，重庆市60家銀錢业行庄的放款类别，其分配情形如下表：

类 别	金 额(元)	百分比	类 别	金 额(元)	百分比
总 计	274,370,519.89	100.00	交通事业放款	4,594,530.33	1.67
商业放款	143,189,839.92	52.19	同业放款	54,921,906.10	20.02
工业放款	19,265,591.73	7.02	个人放款	10,603,092.44	3.87
矿业放款	7,226,993.67	2.63	其 他	34,568,565.65	12.60

在上表所列放款总額27,000余万元中，商业一項，計占52%，而工矿兩业放款的合計数，仅占9.6%而已。若將同业放款除外以計算，則商业放款約占65%强，工矿兩业放款为12%强，交通事业放款为2%强，个人放款为4%强，其他放款为15%强。又个人放款，事实上类皆屬於商业性质放款，其他放款中大部亦系商业放款，兩者如并入商业放款內計算，則商业放款之百分比，应达80%强。

商业銀錢业行庄的資金运用，偏重于商业資金的供給，其情形已如上述。我們并曾將工商业資本与其向商业銀錢业行庄的借款，分別作过一个比較。商业資本与其向商业銀錢业行庄的借款之比，为3比

1,亦即平均有3元資本,就可获得商业銀錢业行庄的一元借款了。工矿兩业資本与其向商业銀錢业行庄的借款之比,为7比1,也即工矿兩业平均非有7元的資本,不能获得商业銀錢业行庄的一元放款也。就重庆市而論,商业銀錢业行庄及省地方銀行的全部放款,据我們的調查估計,約为55,000万元,除同业放款外,約为43,000万元。又重庆市全部工商业厂号的資本,据我們的調查估計,共計約为123,000万元,与商业及省地方銀行放款的总額与全部工商业厂号的資本之比。又商业銀錢业行庄的放款甚为集中,据我們所調查的30年12月底,重庆市140家与商业銀錢业行庄有大宗往来的厂号,其借款余額共計竟达133,000,000元,約占全部商业銀行及省地方銀行放款的1/4强。工商业資金来源,除資本及向銀行借款外,还有逕收的存款,如果將这一項除掉的話,管理銀行所能控制的資金虽仅約1/4,但是关于这个問題,不能用这样的机械看法,第一,銀行类似股权公司的形式,即以投資的方式参与各业活动,以少数的資金即可收到操縱各业活动的功效。第二,真正具有扰乱或操縱左右市場的能力的,不是分散的小規模的商号,而是大規模的組織,不但获得了銀行的支持,实际上也差不多都与銀行保持有密切的关系。第三,就是与銀行沒有关系的商号,其資金的調撥——汇兌也是沒有不通过銀行这个機構的,我們抓住了这个機構,真是象获得一把鎖鑰,可以看出資金活动的方向。

(摘自康永仁:“論銀行授信业务的事前审核”,新經濟1943年第10期)

抗日戰爭以來國民黨四聯總處各項貸款統計(單位法幣億元)

年份	小計	工	礦	交通公用	鹽	務	糧	食	貿易	其他
1936—1939	5.32	0.49		0.21		0.52		0.16	0.17	3.77
1940	6.96	1.03		0.17		1.84		0.56	2.70	0.66
1941	15.45	2.09		1.94		8.42		1.53	1.07	0.40
1942	26.62	9.23		2.75		4.19		2.38	6.64	1.43
1943	110.96	65.57		14.47		10.14		8.01	5.52	7.25
1944	330.25	238.22		9.09		46.95		9.01	19.70	7.28
1945	758.05	374.36		46.53		155.19		29.27	57.00	95.70
1946	7,488.92 又東北幣61.87	3,363.49 又東北幣34.80		671.60 又東北幣2.23		777.61 又東北幣4.02		477.93 又東北幣12.80	566.52	1,631.77 又東北幣8.02
1947	49,494.32 又東北幣388.23	20,437.90 又東北幣218.00		6,949.95 又東北幣38.32		7,182.25 又東北幣8.75		3,714.92 又東北幣50.60	7,459.02 又東北幣47.15	3,750.28 又東北幣25.41
合計	58,256.85 又東北幣450.10	24,492.38 又東北幣252.80		7,696.71 又東北幣40.55		8,187.11 又東北幣12.77		4,243.77 又東北幣63.40	8,118.34 又東北幣47.15	5,498.54 又東北幣33.43
1948上半年	308,647.95 又東北幣63.65	99,093.16		23,283.00		13,950.00 又東北幣18.50		150,611.52 又東北幣30.00	4,000.00	17,710.27 又東北幣15.15
總計	366,884.80 又東北幣513.75	123,585.54 又東北幣252.80		30,979.71 又東北幣40.55		22,137.11 又東北幣31.27		154,855.29 又東北幣93.40	12,118.34 又東北幣47.15	23,208.81 又東北幣48.58

注：其他貸款一項包括國民黨行政機關、軍事機關及軍事工程、教育機關及學校、文化社團等貸款(資料來源：國民黨四聯總處秘書處編：'37年上半年度工礦貸款報告'第16頁)

工业貸款杯水車薪无济于事

本来，3年来内迁之工厂，共448个单位，已复工者达312家。又并入“国营事业”（即四大家族经营的企业——编者）或自行合并经营，暨迁移时损失过巨，物资补充困难，暂时无法复工者，计125厂，其余11厂，正在进行建厂期内，尚未复工，而去年上期受资金协助者则仅69个单位。协助之资金总额虽有71,199,210.03元，如与全年民营工矿业产品比较，则亦为数无几。按29年度民营工矿业产品总值约47万万元，30年度较上年约增加一倍，而协助资金总额仅占全年产品总值0.76%。且有资格接受此项贷款协助者，不仅工业之种类限于电气、机械、化学、纺织、农产制造、采矿、冶炼等7大类，而其资本额亦定为20万元以上，此即说明一般民营工矿业，特别是资金不足20万元者，均无法享受是项资金之协助。

以上系就30年度整个工业贷款而言，倘分区观察，情形亦复相同。例如我们去年在桂林市实地调查所得，桂市大小工厂112个单位，其中民营厂数则有88家，占全市工厂总数78.58%，其中向经济部工矿调整处以及经由该处介绍而向四联总处先后借得迁移、添建、购料等贷款者，只有民营工厂9家，全部贷款数额仅636,150元，且其中60万元为3个规模较大之工厂所借得。

（摘自秦柳方：“工业贷款的新趋势”，半月文萃第1卷第5、6期，1943年出版）

1948年上半年国民党各行局貸款
按官营民营分类比較表
(單位法币亿元)

类别	国营及公营事业			民营事业		
	笔数	金額	百分比	笔数	金額	百分比
总计	2,382	375,040 又东北币64	54.08	26,395	285,347	45.92
工 矿	411	115,238	57.44	4,900	85,521	42.56
交通公用	467	43,141	83.12	287	8,714	16.88
鹽 务	178	9,268 又东北币19	28.34	808	23,488	71.66
粮 食	46	150,699 又东北币30	95.99	818	6,657	4.01
貿 易	659	40,153	22.30	18,279	140,217	77.70
其 他	620	16,547 又东北币15	44.37	1,304	20,750	55.63

注：“国营及公营事业”。即国民党中央及地方政府党政社团等出資經營或官商合办的企业，但不包括以“民营”面目出現而实质上是官营的企业。因此，如把实际上是官营但以民营面目出現的貸款加上的話，則国营及公营事业的貸款占的百分数比原統計高得多。

(資料来源：国民党四联总处秘书处編：
“37年上半年度工矿貸款报告”第25頁)

官营与民营各得的貸款額相差太悬殊

据关系方面悉,32年度工矿貸款总数为20亿元,业志本报。在此次参政会上据四联总处負責人报告及所列貸款之数字已达28亿元,其中仍以民营工业占2/5,但据洞悉内情之人所知,32年度实际貸款之数目仅达7万万,其余21万万貸放何事、何处,皆无从知悉,就鋼鐵业而言,在此次参政会上之报告民营部分占2万万7千余万元,官营部分占2万万4千万元(指資源委员会所轄之鋼鐵厂而言——編者),但实际上,民营鋼鐵厂中包括中国兴业公司所貸之1万万6千8百万元,但中国兴业公司并非全屬民营(按該公司为孔祥熙和华西兴业公司合办,孔为該公司董事長,实权操孔家——編者),而貸款之数又如此之大,以致其余真正民营鋼鐵厂所得之数,堪称寥寥无几,茲將記者所探悉各厂批准之貸款数目而未領到之貸款如下:

榮昌	800(万元)
人和	1,500
渝鑫	3,000
大昌	200
中国制鋼	800

(1943年10月8日重庆商务日报)

桂林市在本年(1942)有宝泰机器厂,永利电机厂向四联总处各借設備貸款2万元,华中、中兴、大中3机器厂向該处合借60万元,此項借款为4年来民营工厂所借之最高者,內1/3为設備借款,2/3为購料借款,周息9厘,惟加上保險、仓库及稽核員之薪水負担,利率約需1.4分。至国营、省营大規模工厂对于資金一項,既可向上級主管机关請求,又可直接向四行設法,活动較易,如中央电工器材二、四兩厂、中央无线电厂、中央造币厂,本年各得購料款項美金20—30万元

不等，广西紡織机械厂在交通銀行桂林分行有活期透支借款100万元之合約，六河溝制鉄公司在該行亦有活期透支借款合約，29年为10万元，本年增至15万元。广西士敏土厂先后向工矿調整处借得設備放款40万元，广西面粉厂于去年向四联总处获得設備購机及營運（購料）借款30万元，本年又获得第二年營運借款100万元，周息均7厘。

（秦柳方：“桂林工业調查”，中国工业第5期）

金融机关虽然有工业貸款以及貼現等办法予工厂家以救济，但杯水車薪，无济于事，且手續麻煩，緩不济急，目前，除“国营”工厂以地位优越，向主管机关或金融机关通融資金較为容易外，省营企业，已受歧視，民营工厂，希望获得工貸，尤为艰难。因民营工厂，多半規模狹小，資金有限，即工矿調整主管当局，往往漠視民营工业，而存着不屑协助的心理。甚至認為：“这許多中小工业，規模不大，机器不够，資金困难，人力尤为缺乏，抗战以后是无法繼續存在的”，因而不予資金上的协助。虽然目前金融界已漸感信用緊縮之足以妨礙工业生产，提出了加强資金运用的口号，希望导社会游資，作正当之运用，但对工厂融通之主要方式，为30日至90日之短期貼現，利率高，時間短，仍无补于工业生产。于是狡黠者，購囤原料，囤积产品，或經營商业以自保；不善应付者，因周轉不灵，日感亏累，終至出卖机器，停工歇业，或被合并，值得吾人之注意。

（秦柳方：“广西的工业建設”，新工商1卷2期，1943年8月1日）

抗日戰爭前和抗戰期間 四川商業銀行放款利率

就放款利率而言(按: 这里所指的是短期信用放款, 即月半或月底到期的放款利率——編者), 抗戰前夕, 川境一般銀行之放款利率, 平均在1分5厘以上, 抗戰以來, 各地利率因物價之刺激而上漲, 財政金融當局乃有限制利率之舉。本年(指1944年——編者)上半年重慶銀錢業之放款利率, 經中央銀行核定, 放款利率最高不得超過3分2厘, 惟除國家銀行以低利率貸款于工、礦、農等業以外, 一般市場之商貸利率(黑市利率)最低為3分5厘, 最高則達七、八分以上, 成都放款利率通常為六、七分至八、九分, 內江則由八、九分至13分, 瀘縣、富順則由七、八分至10分以上, 萬縣、自貢八、九分。樂山、宜賓、涪陵、遂寧均為七、八分, 南充利率最高時曾達18分, 至各地之每日折息, 則成都平均為2.4元, 自貢平均為2.3元, 內江通常為1.4元, 萬縣平均為1.8元至2元。因各地資金數量多寡不同, 供需情形不同, 故利率乃有差別, 重慶為金融重心, 資金素多, 向為低利市場, 年來因受外埠如南充、內江等地高利市場之激誘, 常致重慶資金大量外流, 引起銀根奇緊之恐慌, 而各埠間此類短期資金之流動, 亦恒為造成金融市場波動之原因。同時金融業既多從事商貸, 往往與商業投機相關聯, 每值商品價格波動, 商業市場發生變化之時, 即致金融市場震蕩不定; 而比期制度之流行, 使金融商業債權債務之清理, 過於頻促集中, 每值臨時需款, 窘迫無計, 故常有頭寸不足之苦痛。

(摘自楊澤: “四川金融業之今昔”, 四川經濟季刊
第1卷第3期第225頁, 1944年6月出版)

抗日戰爭前紡織業負擔的 利息高達一分以上

年來我國商業，因受世界經濟不景氣影響，致一蹶不振，今茲尤岌岌可危，銀行停業，紗廠停工，商店倒閉，凡日有所聞，記者昨特訪紗業界領袖聶潞生君，詢問對於24年度紗業發展之新計劃。據云：我國紗業失敗之原因，一方面係受世界經濟不景氣及劣貨傾銷之影響，而另一方面實係受重利所累。譬如現在紗廠，向銀行借款若干，最低之利息為月息9厘，重者幾至1分1厘，較之外國，相懸過遠，即以英美等國而言，政府對於各種工業之保護，無微不至，如向國家銀行借款，概無利息，故各工廠當然可以努力發展，回顧我國，則適得其反，故本人（聶氏自稱）希望已經與紗廠有來往之銀行，組織銀行團，輕利放款，紗廠最高不得超過月息4厘，如其不能，則4厘之外，當悉由政府代為付給，俾與紗廠以發展之機會。

（1935年1月13日上海申報）

國內紡廠，多半成於大戰之後，組織倉卒，資本不丰，詎意惡劣環境相逼而來，10年以還，迄未稍蘇，竭力支持，負債遂多。每錠借款，多者幾及百元，少亦30元左右，而利率高昂，尤感困苦。各廠債息高者，達12%，最低亦在8—9%。全國紡廠，平均紡紗所負利息，10支每包約6元，16支約10元，20支約13元，32支達18元，凡占製造成本總額1/3，如此情形，殆為他國所鮮見。

（“華商紗廠聯合會年會報告書”第25頁，1935年5月出版）

抗日戰爭結束後的高利率

高利貸的名詞對於工業界真是最大的惡魔了，在 35 年春季至秋季，不知有多少工商业犧牲于高利貸的重壓之下。去年 11 月間因為物價高漲的關係，政府把一切貸款都停止了，於是我們小型棉織工業，乃陷入于悲慘的境地，因為我們自從向中國紡織建設公司請購棉紗起製成品——袜子，至少要 15 天到 20 天的時間，出售成品的貸款所收得的，還是 10 天的期票，而我們原料材料的支付，如棉紗、燒碱、顏料、燃料等，都是需要現款，在那遙遠的製造過程中，在高利率的重壓下，那一個工廠的負責人不是為了調度頭寸而感到頭痛？自從今年以來，政府的財政政策逐漸走上了高利率的道路，例如中央銀行吸收銀錢業存款利率，由 0.12 元——0.15 元——0.2 元，期限由 10 天縮到 7 天，利率逐漸增高，期限逐漸縮短，在這種情形之下，試問工業界的周轉資金，從什麼地方再可以獲得 0.24 元以內的利率，及 7 天以上的期限呢？繼之而來為抽緊銀根，為發行短期國庫券，為禁止支票抵用等，一連串的金融措施，都是以打擊投機取締囤積為目的，但是我們倘使仔細研究一下，遭受最大打擊者，第一還是我們工業界。因為投機者所持有的，都是金鈔、股票、棉紗等，容易脫手之物，在政府施行抽緊銀根的時候，他們早已售脫貨物而變為現款，而我們工廠呢？成品沒有受主，即有亦為遠期支票，有什麼用處呢？賣原料吧，機器將不能轉動，同時我們亦沒有原料可賣，因為我們僅有 7 天至 10 天原料呀！那時候我們所受的痛苦大極了，利率有高至 0.36 元——0.4 元——0.6 元以上，甚或還沒有地方可以告貸，試問我們過的是什麼日子？再說短期庫券上市以後，每天套利高至二角七、八分，我想此後若要獲得流動資金，那末利息一定不會少於 0.3 元吧。至於支票不能抵用呢，

亦无非使我們多受一天利息的損失，及調度頭寸更增加一些困難罷了。所以我敢代表上海工業界——至少是我們針織業的同業，肯定的說一句沉痛的話：我們同業 6 百餘家，至少已有半數被迫停工了，其餘或減少生產，或間日開工，亦无非苟延殘喘而已。

（摘自徐世雄：“高利貸壓制了工業界”錢業月報第19卷第6期，1948年6月出版）

國家行局（按即四大家族壟斷的中、中、交、農四行及郵政儲金匯業局、中央信託局等）貸款，原則上維持低利政策，但利率亦已逐漸提高，29年以前，各項貸款利率平均為月息 1 分以下，民國31年以前，鮮有超過月息 2 分以上者，嗣後漸漸增高，但勝利以前，仍鮮有超過月息 3 分 6 厘以上者。復員以來，金融市場變化頻繁，銀根時松時緊，物價漲跌幅度增巨，利率一致趨漲，目前國家行局放款利率，平均在月息 5 分左右，國家行局放款利率，遠較市場利率為低。勝利以前，後方市場利率，約月息大 1 分強，復員以來，節節上漲，最近滬市利率常在月息大 2 分以上，其他重要都市，大致相同，商業行莊竟以高利吸收存款，復以更高之利率作短期貸款，利率愈高，行莊之利益自然愈厚。惟此種高利環境，必然阻礙正當生產事業之發展，亦必然迫使物價跳躍上漲，例如按照月息大 2 分每月復息一次計算，一年之間，利息成本，便在 8 倍以上矣。

（摘自“四聯總處對於調整利率之意見及辦法”，金融週報17卷23期，1947年12月出版）

国民党四联总处各种放款利率比较表 (月息:厘数)

时 期	工矿业贷款		产业贷款		交通贷款		贸易贷款		粮食贷款			
	最高	最低	最高	最低	最高	最低	最高	最低	最高	最低		
1937-39年	9	4	12	7	9	4	9	10	6	8	6	6-7
1940	10	6	10	7	12	7	7	85	5	7	4	5
1941	12	6	12	8	12	7	7-8	10	5	5	6	8
1942	15	6	20	8	15	8	9	14	5	6,9,12	5	8
1943	35	7	36	10	30	10	12	30	5	20	8	10
1944	50	7	45	12	82	12	24-30	36	12	30	33	12
1945	48	7	50	14	40	9	30	45	25	38,32	40	30-28
1946	60	12	45	12	50	6	30,36,50	60	5	5,36	60	40-30
1947	80	22	80	12	75	15	36 40-45	95	15	24,45-50	60	20或36

注: 有△符号者系官营事业一般贷款, 有+符号者系对民营贷款, 有×符号者系对国际贸易贷款。
 (资料来源: 国民党四联总处秘书处编: “37年上半年度工矿贷款报告”第71页)

銀行貸款的形形式式利率

最近一些民營廠礦反映工業貸款情況說：工廠向銀行借款，極為困難，除少數大工廠經人事關係還能有些辦法外，小廠不能問津。銀行工貸照規定利率2.4分，實際工廠方面負擔5分以上，因除利率外，還有對銀行駐廠員的供應，雜項應酬開支乃至儲蓄券之類，加上去就超過五分。照市面情形，五、六分還是有人借，因此金融業還是不願意放款。

一個銀行駐廠員，除銀行照行員發給薪津外，每月廠方還得要化2萬元“孝敬”。

(1944年5月23日重慶新華日報)

昨“星五聚餐會”關於工貸問題的討論，吳彥梅首先發言謂：工礦調整處工貸預算，本定為9,200萬，以大公報數篇緊縮生產之社論，致削減為7,200萬，吾人現擬呈請增加。因許多如建築借款之類，銀行不願承辦，銀行所歡迎者，為原料及制成品之抵押。但吾人所希望者，至少為房地產、機器及半製品之抵押，過去工貸，僅有有辦法之工廠始得享受。一般人以其手續麻煩，利息雖稱9厘，但加上兵險火險，亦等於2分。故一般人寧借3分4分之比期。

(1942年4月24日吳彥海在西南實業協會等團體“星五聚餐會”討論工貸的發言，西南實業通訊5卷第5期)

官办銀行貸款目的是为了控制民族工业

四联总处注意工业投資：四联总处对生产事业放款之監督办法，正积极加强中，希望能逐渐消灭囤积原料投机获利之現象。該处已实行之監督办法要点为：貸款达 5 百万元以上之厂家，派稽核一人經常監督；貸款在此数以下之厂家，派監管員加以監督。今后除积极实行以上办法外，并拟采用游动稽核制，以补固定監督之不足。按四联总处去年貸款总数为 14 万万元，其中大部分为工貸。聞本年貸款方針仍注意工业投資，特別注重国防有关事业之发展，例如汽油提煉业等，农貸之数额將繼續紧縮。

(資源委员会公报 3 卷 1 期 60 頁，1942 年 7 月 16 日出版。)

若干商办和官商合办銀行对 民族工业的投資

1.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及其在工業方面的投資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簡稱上海銀行，屬“南四行”的一家較大銀行。成立於1925年4月，是陳光甫、庄得之、張嘉璈、李銘等人所發起。最初資本總額僅10萬元，實收8萬數千元（一說僅5萬元），職員不上10人，在上海寧波路租屋三間開始營業，規模之小可以想見。上海銀行之所以出名是該行總經理陳光甫舉辦小額儲蓄，凡存戶有1塊錢也可以在上海銀行開立戶頭。當他舉辦這種小額儲蓄時，其他銀行界都替他擔心，認為1塊錢的儲蓄不夠賬本支票成本的開支，但陳光甫認為凡是能夠存一塊錢的，必可存10元。果然，依靠這種宣傳，吸引了上海許多小資產階級、職員等紛紛到該行儲蓄，因而業務得以發展。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除了舉辦小額儲蓄外，還做商業放款，這是該行名字的由來。該行最初從事上海、無錫、常州等地的米麥糧食等貨物的押匯和放款，其後又注重國外匯兌的發展，以發展國際貿易為營業方針。1923年成立了中國旅行社（由該行附設之旅行部改組），代客辦理車船飛機票，并在各通商大埠設立支店，招待來往旅客。因為服務周到，甚得旅客稱贊，而上海銀行的招牌也就更加響亮了。

如上所述，上海銀行得以迅速的發展，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其時正當我國民族工業的勃興。

該行董事長為庄得之，常務董事長為陳光甫、楊介眉、貝戡安。總經理陳光甫兼任。陳名叫德輝，江蘇丹徒人。前清光緒30年時官

費送至美国留学，当时兩江总督端方恰好在美国考察，陈以同乡的介绍，对端方有所协助，后为这位大官所賞識，端方回国后，不久便召他入幕参与經濟事务。后来南洋劝业会成立，陈奉派参与此工作。其后他又做过官办江苏省銀行經理，1914年因对当时的官府挪用銀行款項发生意見不合而辞职，改任中国銀行顧問，同年籌措款項发起建立上海銀行。

上海銀行发展很快，开办初期存款不过50万，資本不过10万，分支機構仅上海一隅。1916年即增資为30万，1918年又增为70万，1919年更增为100万，1930年增至500万，1946年增至1,000万元。分支機構在抗日战争以前計上海有10处，外埠有85处。1934年存款达160,000,000元，公积金增至500万元。

上海銀行的业务以商业汇兌和押款为中心，而以小額存款为其基础。該行在商业方面的投資有大业公司，該公司向以販賣鹽及粮食等为主要业务，成立于1938年，資本500万，董事有赵汉生、李芸侯、朱如堂等。

除了大业公司外，上海銀行还与英商太古公司合作，于1931年11月成立宝丰保險公司，1945年又和浙江实业銀行及美国兩家投資公司合作，設立中国投資公司，从事发行公司債券，吸引外資投放中国等业务，由此可见，上海銀行是帶有濃厚的买办性格的。此外，上海銀行也和其他江浙財閥經營的銀行一样，在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承銷国民党的公債。

上海銀行在工业貸款方面，經營甚早，1915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間，民族工业如雨后春笋地发展，上海銀行那时就举行了抵押放款，获得上海銀行貸款的有申新紗厂、鴻章紗厂、上海紡織印染公司、大成紗厂等，其中与申新紡織公司的关系尤其密切，对申新貸款数量和次数特多，1932年以后，紡織业不景气，上海銀行握有申新第二第五和第八各紗厂的管理权。1940年陈光甫和章乃器等合組上川公司于重庆，該公司資本100万，轄有畜牧場、农化厂、电机厂、机器厂等四部分。上海銀行除了上川公司外，投資还有下列單位：

厂矿名称	地点	资本(千元)	创办人或负责人	投资人代表
鎮江水电公司	鎮江	?	?	上海銀行
揚子电氣公司	南京	10,000	建設銀公司	上海銀行
既济水电公司	汉口	5,000(1905年)	宋律臣后为宋子文吞并	上海銀行
汉冶萍煤鉄公司	武汉	20,000(1931年)	張之洞盛宣怀后为国民党接收	上海銀行
溧州矿務公司	唐山	2,000千磅 (1931年)	英商	上海銀行
淮南矿路公司	安徽	14,400,000(1943年)	中国建設銀公司中国銀行等	上海銀行
江南水泥公司	南京	7,200(1935年)	顏惠庆	上海銀行
上海水泥公司	上海龙华	1,200(1920年)	刘鴻生、李拔可	金宗城(上海銀行副理)任董事
中国水泥公司	句容	2,000(1931年)	榮宗敬姚錫舟等发起	陳光甫任董事長
光大瓷业公司	江西九江(后迁云南曲靖)	4,000(1941年)	中国和交通銀行及云南經濟委员会	上海銀行
民生橡膠厂	上海	30,000兩(1930年)	唐和衷	金宗城任董事
民誼葯厂	上海	12,000(1946年)	周文同	金宗城任董事
中法油脂化学(制造)	上海	50(1939年)	許麟初	金宗城任董事
中西大葯房	上海	500(1931年)	顧松泉創辦后为黃楚九收买	金宗城任董事長
五洲大葯房	上海	1,500(1936年)	夏粹芳、項茂松	朱如堂(上海副董事長)任董事
裕华化学工业厂	上海	50(1933年)	梁嵩齡	朱如堂(上海副董事長)任董事
富安紡織公司	上海	500(1931年)	王丹揆、杜少如等	金宗城任董事長
洪康織綢厂	上海	400,000(1946年)	張翔青	金宗城任董事長
大成紡織印染公司	武进	1,400(1931年)	吳鏡淵、刘靖基等	金宗城任董事長
中国絲业公司	上海	50,000(1943年)	黃吉文	上海銀行
华光染織厂	上海	200,000(1946年)	高介石	金宗城任董事
安达紡織公司	上海	500,000(1946年)	徐吟甫、顧吉生等	朱如堂任董事
和新紗厂	上海	1,000,000 (1946年)	刘吉生	朱如堂任董事
台湾糖业公司	台湾	240,000	国民党资源委员会	上海銀行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	上海	15,000(1931年)	簡照南	上海銀行
冠生食品公司	上海	300(1931年)	沈冠生	金宗城任董事

梅林罐頭食品 公司	上海	50(1931年)	饒耀庭、馮又祥等	金宗城任董 事
标准味粉厂	上海	100(1939年)	姚俊之	金宗城任董 事
华美烟厂	上海	50,000(1946年)	金亦耕	金宗城任董 事
振华面粉厂	无锡	240,000(1946年)	陆辅仁	金宗城任董 事
九合铁钉厂	上海	500,000(1946年)	黄介辅	金宗城任董 事
永祥印书馆彩 印	上海	500(1941年)	陈永泰	金宗城任董 事
商务印书馆	上海	3,000(1932年)	夏粹芳、鲍武昌	陈光甫任董 事

注：資本数和创办人或現任經理有些是从联合征信所出版之“上海制造厂商概覽”、“中华民国实业名鑑”、“华股手册”和其他材料补上的。

(资料来源：“上海商业儲蓄銀行投資事业調查”)

2. 浙江实业銀行及其在工业方面的投資

浙江实业銀行最初原为浙江官錢局于光緒 34年創設，宣統元年改組为浙江銀行，由官商合办，資本总额100万兩，实收700,300元，总行設于杭州，分行設上海。辛亥革命民国成立，該行改称中华民国浙江銀行，經理省庫款，并代发行軍用票。1914年改称浙江地方实业銀行，將金庫移交給中国銀行，1921年設分行于汉口，整年增加資本至100万元。1923年3月官商划分各自营业，官股称浙江地方銀行，商股由李銘等改組为浙江实业銀行，原有上海、汉口兩分行撥归商股經營，設总管理处于上海，另設分行于杭州。上海总行先后增設国外汇兌部、儲蓄部、信托等部。自改組后即招足資本180万元。1930年提撥历年未結余的盈余110万元，以20万元作为股款派給股東，补足股本200万元，以90万元轉入公積金。

抗日战争前，浙江实业銀行的董事長为李銘，常务董事盧学溥、錢新之、陈朵如。董事周亮、曾宗鑑、陈光甫、徐寄顾等。总經理李銘兼任。李字馥蓀，浙江紹兴人，是中国著名的买办金融資本家。他早年曾留学于日本山口高等商业学校，并在橫滨正金銀行見习，归国后，于1912年入金融界，先后做过浙江銀行練習生，又做过浙江地方实业銀行上海分行經理，在上海打下基础后，于1923年領導該行商股

拆出，成立浙江實業銀行，他曾與陳光甫、張嘉璈等發起組織銀行公會和銀行俱樂部于上海，促成江浙財閥集團的閉結。1927年任銀行公會副會長，並支持國民黨，承銷國民黨發行的公債，他得意的傑作是當蔣介石到了上海時，他曾獻計于蔣說：“取蛋必先養雞”，使江浙財閥和國民黨合流，蔣深為同意，這樣，南京國民黨政府便有了內戰資本，而江浙財閥也獲得一定利益，同時李氏也成為江浙財閥的名義統帥。他投資的事業很多，看他一身兼任十多個企業的董監事便可想見，他投資和兼職是：中國銀行董事（一度做過該行的董事長）、交通銀行董事、浙江興業銀行董事、中國墾業銀行董事、中國建設銀公司董事、美商上海電力公司董事、閩北水電公司常務董事、華商電氣公司常務董事、揚子水電公司常務董事、杭州電氣公司董事長、既濟水電公司董事長、美商泰山保險公司董事、英商業地產公司董事、英商沙遜投資公司董事、美商沙利文食品公司董事、國民黨行政院輸出入管理委員會副主委等。

如上所述，浙江實業銀行的買辦性格在李銘身兼英商美商公司的董事已可表現出來，特別值得提出的是，浙江實業銀行曾經為美商上海電力公司大力推銷過債券，而上海電力公司也將它的存款及電費委託浙江實業銀行代存代收。此外，在抗日戰爭時，李銘還將浙江實業銀行及美商上海電話的款項套買外匯，以逃避貨幣貶值及借此權利。

浙江實業銀行除帶有濃厚的買辦性格外，它的業務還承銷公債及花紗、米麥、蠶絲的押放。對工業方面的投資以水電業為主。鼎鑫紗廠也是它投資的，鼎鑫成立於1934年3月，資本180萬，董事長為陳朵如，董事徐廣遲、潘久芬、盧潤泉、孫錫三等。

（摘自“浙江實業銀行”）

3. 浙江興業銀行及其在工業方面的投資

浙江興業銀行創於光緒33年4月，初為試辦性質，到同年11月9日正式成立，由浙江鐵路公司發起，資本總額100萬元，先收1/4，計25

万元。設总行于杭州，在上海設分行。同年 11 月得到前清度支部批准，获有发行兌換券的权利。1915年12月，浙江鐵路公司收归政府所有，浙江兴业銀行另招商股，次年收足股本 100 万，將总行迁到上海，改杭州总行为分行。1921年 8 月增資为 250 万，翌兩年，以营业发展，采取总行制，設总經理統轄分支行。1929年 8 月增設儲蓄部，次年春并成立房地产信托部。

浙江兴业銀行与浙江实业、上海銀行同被称为“南三行”。該行在抗战前获有发行权，及經營房地产业务，1927年蔣介石政府成立，又承銷其公債，故营业很发达。到1935年，股本已增至 400 万，公积金 270 余万，分支机构达 30 以上，1935 年有仓库 8 处，房地产尤不少，如上海北京路口的浙兴大厦及虹口的一些房产都是該行的产业。

但自 1935 年，国民党政府实行“法币”政策后，該行的发鈔权即被取消，改为向中国銀行訂立領券合同，其实力大为削弱。

根据銀行年鉴所載，該行在抗日戰爭以前的董事長为叶揆初，常务董事为：徐寄廬、徐新六等。叶揆初名景葵，浙江杭县人，曾任中国銀行前身的大清銀行監督，又做过中兴煤矿公司董事長，商务印書館董事。抗日战争时期，由叶出面在上海主持业务，抗战结束后因年老退居幕后。

徐新六，字振飞，江浙財閥之一，浙江杭县人，交通大学毕业，曾留学英国，归国后做过北洋政府財政部秘書，后入金融界，历任北京中国銀行副經理，浙江兴业銀行天津分行經理，泰山保險公司董事長，其后升任浙江兴业銀行总經理。徐氏在政治經濟上靠近孔宋，做过时事新报、大晚报、申时通訊社董事長，并历任中国建設銀公司、四海保險公司、上海毛紡織厂、交通銀行、閩北水电公司等董事。1940 年与交通銀行董事長胡笔江同乘飞机由香港至重庆，中途为日本飞机截击，随机墜入江海而死。

徐氏死后，繼任总經理者为項叔翔，董事長則为徐寄廬。徐氏名陈冕，浙江永嘉人，日本山口高等学校毕业，归国后历任蘭谿、九江中国銀行經理，上海浙江兴业銀行副經理、协理等职，并做过上海公共

租界納稅華人會副主席，中央銀行副總裁，泰山保險公司、溫州商業銀行董事長，中國畢業銀行常務董事。

浙江興業銀行除了經營房地產外，它主要的投資單位是泰山保險公司，該公司于1933年2月設立，資本100萬，董事長徐寄廬，董事有李銘、周作民、王啟宇、房樹棠等。浙江興業銀行在工業方面的投資也不少，茲列表如下，以供參考：

廠礦名稱	地點	資本(千元)	創始人或負責人	投資人代表
華商電氣公司	上海	10,000(抗戰前)	陸伯鴻	浙江興業銀行
閘北水電公司	上海	4,000(1932年)	施肇曾等	浙江興業銀行
揚子電氣公司	南京	10,000(1933年)	建設銀公司	浙江興業銀行
淮南礦路公司	安徽	14,400,000(1946年)	建設銀公司、中國銀行等	浙江興業銀行
中原煤礦公司	焦作	3,000(1915年)	趙澗創辦大革命時為國民黨接收後與英商福公司合併	浙江興業銀行
中興煤礦公司	棗庄	7,500兩(1921年)	原為戴華藻所創後歸商辦大革命後為國民黨派俞飛鵬接收	浙江興業銀行
啟新洋灰公司	唐山	7,000(1921年)	周學熙	浙江興業銀行
江南水泥公司	南京	7,200(1935年)	顧惠慶	浙江興業銀行
大中華火柴廠	上海	3,650(抗戰前)	劉鴻生	浙江興業銀行
福華薄荷製煉廠	上海	100,000(1946年)	曹吉如	徐寄廬任董事長
世界書局	上海	1,000(1931年)	沈知方	徐寄廬任董事
商務印書館	上海	3,000(1932年)	夏粹芳、鮑成昌	徐寄廬任董事
榮豐紗廠	上海	3,000(1942年)	章榮初	徐寄廬任董事
三一印刷公司	上海	200(1931年)	金有成	徐寄廬任董事
統益紗廠	上海	1,700(1937年)	吳麟書	浙江興業銀行
漢口第一紡織廠	漢口	4,800(1916年)	馬星棠	浙江興業銀行
美麗綢廠	上海	2,000(1935年)	莫福清、蔡聲白	浙江興業銀行
華豐面粉廠	上海	75,000(1945年)	陳枚甫等	浙江興業銀行
壽豐面粉廠	天津	600(1931年)	侯嗣沖等	浙江興業銀行
南洋兄弟煙公司	上海	15,000(1931年)	簡照南	浙江興業銀行

注：資本數和創始人或負責人有一部分是根據中華實業名鑑和聯合征信所編：“上海製造廠商概覽”，“華股手冊”補充的。

(資料來源：“浙興”投資事業調查)

4. 新華商業儲蓄銀行及其在工業方面的投資

新华商业儲蓄銀行，为中国交通兩行所籌办，初为儲蓄銀行，为国内儲蓄銀行之嚆矢。創立于民国3年，总行原在北京，总理方仁元，上海为分行之一以黄明道为經理。民国20年才把总行由北平迁到上海。由官办而轉为增入商股，現在有官商股本，商股的增加，似已冲淡官股的色彩了，但在系統上，它是中交兩行的旁支。

初成立时資本为15万元，袁世凱称帝时，拟改为帝国国家銀行，委托其发行新华儲蓄票1,000万元。民国6年由于袁的倒台而与政府疏远，在天津設分行，招集商股，增資50万元，民国8年增資为500万元，实收125万元。在上海設分行，儲蓄存款日漸增加，創辦四季儲蓄，公共儲蓄，民15年，改名为新华商业銀行。民20年，中国交通兩行派員主持改組，增加資本200万元，收足200万元，增办信托銀行兩種业务，又改名为新华信托儲蓄銀行，中交兩行以此来与商业銀行及外商儲蓄会竞争，將总行迁到上海，北平改为分行，聘王志莘为总經理。此后不断发展，到了目下，已成为上海商业銀行的一支生力軍，在全国13个城市設分行，有办事处18所，仅上海一地就有9个办事处和1个倉庫。該行除了經營儲蓄信托之外，銀行部的业务，更有着長足的进步。在36年1月初至5月半，存款由100亿元增至400余亿元，放款由30余亿元增至160余亿元，在4个月中存款增加4倍余，放款增加5倍左右。資本額听說也增加了，新华銀行的信托部并兼做証交所零股交易。

新华銀行的总經理王志莘，是一位很有經驗的銀行家。他在金融界的前期是張嘉璈一手提拔起来的。他的幼年时代，十分穷苦。他之能够由中学而大学以至于留学，几經波折，而有今天的成就，据說他母亲对他的帮助很大；另一方面却由于他自己立志从事銀行业，不断苦学的結果。他是上海人，今年已51岁，幼年丧父，家貧如洗，全靠他母亲做針綫供他入学。到了他15岁时小学仍未毕业，家里沒有錢再讓他讀下去了。由他叔父的介紹，到一家錢庄做事，做了几个月

就不干了，虽然这种职业已引起他对金融业的兴趣，但是他念念不忘于学业，他的母亲再刻苦筹措学费让他再进学校，终于得在南洋公学及南洋中学毕业。他的志愿是进银行界，但苦无门路。只好在上海教3年书，以后又在新加坡教过书，当过橡皮垦殖公司的经理，在南洋一住4年，在入社会7年中，王志莘无时无刻不打算干银行工作，到了26岁才下决心再求深造，想学些金融知识，于是改入上海商科大学，专门研究金融，又兼任中华职教社编刊物，在半工读中完成学业。大学毕业了，他仍没有满足，他认为学识仍不够用，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幸得在亲友帮助之下，进入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读书，专念银行学，获得了经济学硕士学位。他在回国之前，曾赴欧洲作了一番银行界的考察，研究英美的银行机构，调查了东北的储蓄会，回到国内，仍未能实现其理想，不得已出任中华职教社教业，国立商科大学教授，及兼任生活周刊编辑，这刊物后来为鄒韜奋先生所接办。

回国后，应薛仙舟氏之请，入工商银行，担任储蓄部主任，至薛氏死后，出任江苏省农民银行之职。从民国14年到20年，这7年中，他吸收了不少的银行经验，及至担任新华总经理以后，他把全副精神，整理新华银行的业务，停办公共储蓄四季储金，收回储蓄券，添设人寿储金，证券部，小额贷款，建屋贷款。由于业务展开，各地的分行及办事处也纷纷设立起来。王氏的声誉和地位也就一天天的发达了。民国26年，他任赴暹使节团团员，出国考察，民国21年至27年任上海银行公会执行委员。

抗战后新华银行内迁，大后方各地都建立据点，王氏任经济建设协会会员，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32年在重庆创办联合票据承兑所及联合征信所为主任委员兼总经理。民国33年10月，王氏赴美出席国防通商会议顾问，现在他是上海证交所的总经理，中国国货公司，中国丝业公司，久安实业公司等董事长之职，已由银行界而打进工商界了。

（摘自徐寄庠：“最近上海金融史”第83页，1929年出版，
怀康：“中国经济内幕”第31—33页）

厂矿名称	地点	资本(千元)	创办人或负责人	投资人代表
湖北水电厂	上海	4,000(1932年)	施肇曾等	新华银行
扬子电气公司	南京	10,000(1936年)	建设银公司	新华银行
淮南矿路公司	安徽	14,400,000(1946年)	建设银公司、中国银行	新华银行
溧州矿务公司	唐山	2,000千磅	英商	新华银行
中兴煤矿公司	枣庄	7,500(1921年)	戴华藻创办后改商办又为国民党接收	新华银行
启新洋灰公司	唐山	7,000(1921年)	周学熙	新华银行
江南水泥公司	南京	7,200(1935年)	颜惠庆	新华银行
中国水泥公司	句容	2,000(1931年)	屠宜厚、荣宗敬等	新华银行
大中华火柴公司	上海	3,650(1937年前)	刘鸿生	新华银行
中国化学工业社	上海	1,000(1934年)	方液仙	王志莘任董事
联合颜料厂	上海	5,000,000(1946年)	潘公展	王志莘任董事
九福制药公司	上海	200(1931年)	黄楚九	孙瑞璜(新华副总理)任董事
晶华玻璃厂	上海	100,000(1931年)	程慕灏	孙瑞璜(新华副总理)任董事
晶明玻璃厂	上海	50(1932年)	方季扬	王志莘任董事
久新玻璃厂	上海	100(1932年)	顾志康	王志莘任董事
天厨味精厂	上海	110,000(1946年)	吴蕴初	王志莘任董事
光华橡胶厂	上海	500,000(1946年)	陈梅芳	陈鸣一(新华副总理)任董事
中国萃众棉织公司	上海	120(1938年)	李康年	孙瑞璜任董事长
中国丝业公司	上海	50,000(1943年)	黄吉文	王志莘任董事长
鹤新染织厂	上海	200,000(1946年)	胥仰南	王志莘任董事
振丰振记毛纺织整染厂	上海	15,000(1941年)	叶弗康	孙瑞璜任董事
美亚织网厂	上海	2,000(1935年)	莫麟清、蔡声白	孙瑞璜任董事
鸿兴织造厂	上海	500(1941年)	李康年	孙瑞璜任董事
景纶衫袜厂	上海	240(1934年)	徐雨之	徐振东(新华副总理)任董事
青美罐头食品公司	上海	1,000(1942年)	顾福源	王志莘任董事长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	上海	15,000(1931年)	简照南	新华银行
康元制罐厂	上海	1,500(1935年)	项康元	王志莘任董事
永宁印刷厂	上海	4,000(1946年)	中华书局	王志莘任董事

注:资本数和创办人或负责人有一部分系根据“上海制造厂商概览”“中华民国实业名鉴”及其他材料补上的。

(本表资料来源:摘自“新华银行投资事业调查”)

5. 四明商业儲蓄銀行及其在工業方面的投資

四明商业儲蓄銀行与中国通商、中国实业、中国国貨銀行同被称为“小四行”，成立于光緒34年8月，由宁波人袁鑿、周晉鑣、陈薰和火买办虞洽卿所发起，設总行于上海宁波路，1930年9月迁入北京路，自建行屋，股本原額規銀150万兩，实收75万兩，1933年廢兩改元，資本改为225元，同年5月，呈准国民党政府获得发行权。1935年11月国民党政府实行法币政策，发行权被取消，当时該行积欠数字很大，周轉不灵，由国民党財政部加入官股3,662,500元，將旧有股本以一五折減值改为337,900元，合財部官股，資本总額增至法币400万，至此，該行遂变成官商合办銀行，其人事上也起了变化，原董事長改由財政部指派之吳启鼎担任，抗日战争结束后，吳氏辞职，改由俞飞鵬任董事長，其总經理一职，在該行改組初期以靠近国民党的浙江財閥的叶琢堂担任，1947年6月該行改組，俞佐廷繼任总經理。俞籍浙江鎮海，曾任宁波市財政局局長，宁波商会會長，是上海錢业界和实业界的著名人物，他的投資事业頗多，除投資于宁紹輪船公司、光华火油公司、惠中商业銀行、四明保險公司等外，在工业方面也有相当投資。

四明銀行的业务主要有二，一为經營房地产，其二为办理儲蓄业务，設有四明儲蓄会，但在工业方面投資也不少，茲將它在工业的投資列表如后：

厂矿名称	地点	資本 (千元)	创办人或負責人	投資人代表
既济水电公司	汉口	5,000(1906年)	宋偉臣后为宋子女吞井	四明銀行
中华化学工业社第一厂	上海	25,000(1943年)	楊富臣	俞佐廷任董事長
新华薄荷厂	上海	?	?	俞佐廷任董事
新亞化学制药厂	上海	3,000(1940年)	許冠群	俞佐廷任董事
中南味英厂	上海	25,000(1946年)	楊富臣	俞佐廷任董事長
大德新榨油厂	上海	100千兩	盛宣怀所創	俞佐廷任董事
民丰造纸厂	嘉兴	500(1930年)	金潤庠、杜月笙等	俞佐廷任董事

大中华火柴厂	上海	3,650(抗战前)	刘鸿生	四明銀行
明明机織印染厂	上海	300,000(1946年)	王岐才	俞佐廷任董事長
南华織染厂	上海	100,000(1946年)	徐永炎	俞佐廷任董事長
天隆染織厂	上海	1,000(1942年)	鮑忠濤	俞佐廷任董事長
童涵春國藥号	上海	?	?	俞佐廷任董事
均益聯合印刷公司	上海	30(1932年)	陈苻蓀	俞佐廷任董事
國華烟厂	上海	30,000(1946年)	李康年	投資代表为俞佐廷
越东煤球厂	上海	?	陈玉书	投資代表俞佐廷
大信會計用品社	上海	?		投資代表俞佐廷
洽茂冷藏制冰厂	上海	?	杜月笙	投資代表俞佐廷
天原電化厂	上海	100(1932年)	吳繼初	投資代表俞佐廷
統益紗厂	上海	1,700(1937年)	吳麟书	投資代表俞佐廷
安達紗厂	上海	500,000(1946年)	徐吟甫、顧吉生等	投資代表俞佐廷
和新紗厂	上海	1,000,000(1946年)	刘吉生	投資代表俞佐廷
美輪毛紡染織厂	上海	80,000(1945年)	朱学仁	投資代表俞佐廷
越成毛紡厂	上海	?	陈庆塘、王鴻生	投資代表俞佐廷
觀兴紡織衫袜厂	上海	168(1940年)	余仰敬	投資代表俞佐廷
亞浦尔電器厂	上海	500(1936年)	胡西園	投資代表俞佐廷

注：資本数和創办人或負責人有些是根据联合征信所編：“上海制造厂商概覽”和“中華民國实业名鑑”“華股手冊”补充的。

(摘自“四明銀行投資事业調查”)

6. 中國实业銀行在工業方面的投資

中国实业銀行是“小四行”之一，1919年4月正式成立，原系奉北洋政府財政部之命而設，由当时中国銀行總裁李士偉、財政總長周学

熙、国务总理熊希龄、錢能訓等所发起，实收資本350万元。总行原設天津，在上海、天津、青島、北京等大城市設有分行。1932年总行迁至上海，并得北洋政府特許获有发行权。由于有北洋政府做靠山及有发行鈔票的权利，故业务相当发达。但自1935年国民党实施法币政策后，取消其发行权，并与四明銀行遭到同样的命运，由国民党財政部加入官股，將旧股减折，改为官商合办，資本总额增至法币400万元。抗日战争爆发后，总行先迁至汉口，繼于1938年8月迁至重庆，1940年得国民党政府許可加入华侨資本，增資至法币800万元。抗战结束后，于1945年10月將总行迁回上海，1946年增資为1,200万。

該行董事長在抗日战争前为龔仙洲，常务董事有刘晦之、賈沅、周学輝、李士熙，总經理为胡祖同。抗战后孔祥熙系之傅汝霖(中国兴业公司总經理)就任董事長。

中国实业銀行除經營商业放款、信托、儲蓄外，并投資于工矿业，抗日战争时，孔祥熙的中国兴业公司、四川地方系經營的四川絲业公司及刘鴻生經營的中国毛紡織厂都有它的投資，其在工业方面的投資有如下表：

厂矿名称	地点	資本(千元)	创办人或負責人	投資人代表
灤州矿务公司	唐山	2,000千磅	英商	中国实业銀行
启新洋灰公司	唐山	7,000(1921年)	周学熙等	中国实业銀行
江南水泥公司	上海	7,200(1935年)	顏惠庆	中国实业銀行
大中华火柴厂	上海	3,650(抗战前)	刘鴻生	中国实业銀行
康元制糖厂	上海	1,500(1935年)	項康元	中国实业銀行
美亞織染厂	上海	2,000(1935年)	莫賜濤、蔡声白	中国实业銀行
大生第一紡織公司	南通	2,500千兩	張季直	中国实业銀行
唐山华新紡織公司	唐山	1,800(1922年)	龔仙舟	中国实业銀行
卫輝华新紡織公司	河南汲县	2,000(1932年)	龔仙舟	中国实业銀行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	上海	1,000(1915年)	簡照南	中国实业銀行

注：資本数和创办人或經理有一部分是根据“中华实业名鑑”“华股手册”等材料补充的。

(摘自“中国实业銀行投資事业調查”)

7. 聚兴誠銀行及其投資事業

聚兴成銀行是川帮銀行的首腦，也是四川成立最早的商业銀行，創始于1915年4月，为楊榮三(名培英)昆仲手創，它的发展过程与楊氏家族的兴起是分不开的。

在前清光緒中叶，聚兴誠的始祖楊文光，其父是靠教学度日，因为家貧，便把楊文光送到重庆一家叫刘质堂的商店去当学徒，文光学习期滿后，留店任事，依靠当时环境及他的勤儉积蓄，不久自己开了一家經營四川土产輸出和輸入外地布匹杂货的商店，叫聚兴仁。由于經營得法，获利甚多。文光生有三子，楊榮三是他的第三子，榮三的大哥培德(字寿宇)曾与吳助臣合开聚兴成商号，也是經營土产杂货生意。后来吳助臣退股，培德便独攬股权，將該店改名为聚兴誠，当时資本仅为2万元。宣統年間，培德逝世，其父叫榮三主持該店业务。楊榮三曾为四川銅元局买銅并承办过銅元局，获得不少利益。楊文光的二子培賢，先后留学日本、美国，在美时与楊伯乐等組織了中华物产会社，經營桐油輸出美国生意。

聚兴誠銀行的起緣于聚兴誠商号的兼营汇兌，当时四川經營汇兌的仅有大清銀行、順天祥及山西票号数家，营业甚好，楊氏昆仲便商議改聚兴誠商号为銀行，定为股份兩合公司，資本总额100万元，股份分由楊文光、楊氏家族及其嫡堂兄弟承担，于1915年4月正式開幕，由楊榮三任總經理，楊培英任协理。

聚兴誠的业务以汇兌和商业为主，設有貿易部、信托部、儲蓄部及国外部，其貿易信托部一方面經營四川的桐油土产的輸出，另一方面經營出口押汇，該行資本初創时，实收60万，后收足100万，1933年改組为股份有限公司，增資至400万，1943年又增資至1,000万，1946年由国民党核准为外汇經紀人。

該行业务除側重汇兌貿易外，在工业方面也有投資。1933年在湖南常德曾設立桐油提煉厂，1936年并投資于中国植物油料厂，抗日战争爆发后，西南工业因需要而勃兴，聚兴誠銀行更于此时大力对工

业进行投资。其投资单位有如下表：

投资行别	户名	投资金额(元)	投资年份	该行关系人任董监者
渝銀行部	自来水公司	3,466,500	27年1月	?
渝銀行部	江合煤矿	3,360	26年7月	楊榮三任董事
渝銀行部	华西兴业公司	20,000	25年11月	楊榮三任董事
渝銀行部	四川水泥公司	83,300	25年7月	楊榮三任董事
渝銀行部	兴华保險公司	285,000	26年	?
渝銀行部	中国制藥厂	1,000	27年9月	?
渝銀行部	中国抗建垦殖社	766,000	28年4月	黃學涵任監察
渝銀行部	四川机械公司	200,000	32年6月	楊榮三任董事
渝銀行部	票据承兌所	200,000	33年8月	
成都銀行部	川康毛織厂	4,619,600	27年	楊榮三楊季謙任董事 陈梓材任董事長
成都銀行部	启明电灯公司	837,600	28年12月	陈梓材任董事長
成都銀行部	利川公司	100,000	30年7月	
昆明銀行部	云南汽車公司	86,000	27年9月	
上海銀行部	上海电话公司	1,500	?	
汉口銀行部	既济水电厂	92,000	?	?
渝儲蓄部	自来水公司	2,000,000	29年3月	?
渝儲蓄部	木业公司	344,000	27年3月	?
渝儲蓄部	民生公司	600,000	26年	?
渝儲蓄部	电力公司	1,300,000	26年	楊榮三任監察
渝儲蓄部	絲业公司	1,680,000	27年	楊榮三任发起人
渝儲蓄部	西宁公司	53,480,000	29年	?
渝儲蓄部	川康兴业公司	669,000	30年	?
渝儲蓄部	西南物产公司	23,000	30年	

(摘自“聚兴誠銀行投資事業調查”)

8. 四川美丰銀行及其投資事業

四川美丰銀行原来是美帝国主义投資的,我(美丰銀行經理康心如自称——編者)利用北伐时期第一次革命战争的机会,收买了美国人的股票,成了美丰銀行的主持人。我主持美丰以后,首先利用美丰原有的基础,发行“美丰券”。美丰券是当时重庆和附近州县的一

种很吃香的鈔票，美丰的資本不过25万銀元，而美丰券倒发行了150万，发行数量达美丰資本五、六倍之多。我这样利用他人的錢来剝削他人，当然是最合算不过的。其次，我的哲学是用：“以經濟控制政治，使政治为經濟服务的办法”，达到我富貴双全的欲望。我就和当时住在重庆的封建軍閥互相勾結，互相利用，拉他們当美丰銀行的股東。他們在美丰得到經濟利益；美丰从他們那里得到政治保护。这样互相勾搭，膨脹我的銀行事业。再次，我又根据“人弃我取”的原則，扩充美丰銀行的分支机构。我認为人家不去的地方，我就去，那里一定有搞头。所以几年之間，美丰的分支机构扩充到了34处，除了北方一隅之外，全国的重要城市都有美丰的分支机构。分支机构一多，存放汇兌业务大为发展；賭中汇，賭公債，賭黄金美鈔的投机条件更为具备，很快的美丰在金融市場的活跃增强了，实力增加了。这样一来，美丰在八年的時間內，由25万元的資本扩充到300万元的資本膨脹了12倍。

美丰有了基础，我就建筑一幢有現代化設備的重庆美丰大楼；同时，我又在“实业救国”这个幌子下，染指于生产事业。美丰先后投資了重庆电力公司、自来水公司、西南蚕絲公司、天府煤矿公司、民生輪船公司、渝新紗厂、中国毛紡織厂等60几个生产事业。就这样，我在30年間树立了美丰銀行的資本系統，而成为社会上一个有力量的銀行家。我又当了伪重庆市參議会的議長，有了更多的利用政治的机会。

美丰銀行巩固以后，国民党反动政府搬到重庆来了。国民党反动政府到重庆以后，就是一个每况愈下的局面，特别是它自己造成金融动荡，物价飞漲是它在經濟上的致命伤。当时貪污橫行，特务当道，一般工商金融事业随时都要受到摧殘，我虽当了伪參議会的議長，在許多場合还是不能保障自己的事业。尤其是抗日战争結束，蔣介石匪帮回到南京及解放战争开始以后，国民党的搜括更加厉害了。1948年国民党借发金元券的机会，逼迫美丰交出了黄金几千兩；解放前不久，又被敲詐硬洋十几万元，最后战犯楊森在逃跑前还借退股为

名勒索了巨額黃金，其他如郭文欽、夏斗樞之輩也來勒索黃金美鈔；另外，特務存偽幣、估提硬幣的事，更是隨時都有。加以偽幣貶值，風波極大，成天神經緊張，惶惶不可終日，美丰在這種明搶暗奪下，蒙受了極大的損失，到解放前夕，就顯出搖搖欲墜的情勢來了。

（康心如：“從30年的長期剝削中醒悟過來”，重慶工商1956年第1、2期合刊第34—35頁）

若干厂矿主在銀行的兼職

下表材料来源，主要是根据1948年联合征信所編：“上海金融业概覽”、1935年“全国銀行年鑑”及上海企业周刊社出版的“企业周刊”各期，汇編而成的。这个表格所收集的材料虽然还不够完全，但一些較具規模的民族資本厂矿大体上都列入了。

民族資本經營的厂矿和銀行的关系，与官僚資本或帝国主义在华工业和銀行的关系是不同的，第一，从這張表格可看出，民族資本經營的厂矿与銀行的关系并不普遍，全国民族資本經營的厂矿很多，但厂矿主参加銀行活动的却很少，他們在銀行中兼任重要职务的也屈指可数，而且絕大多数是和中等規模或小銀行发生关系。第二，他們与銀行发生关系的原因往往是为了取得資金的融通巩固自己的地位并借以抵抗帝国主义和官僚資本的压迫。

若干工厂主在銀行的兼職簡表

姓名	所屬主要工厂	在銀行地位	銀行設立年月	銀行資本額(千元)
范旭东	永利和久大化工厂	1944年建業銀行发起人	1944,6	原額50,000
范旭东	永利和久大化工厂	1935年金城銀行監察	1917,5	1927年7,000
范旭东	永利和久大化工厂	1935年金城大陸中南四行儲蓄会監察	1923,1	—
榮宗敬	申新、福新、茂新公司	1935年上海商業儲蓄銀行董事	1915,4	1919年1,000
榮宗敬	申新、福新、茂新公司	1935年中央銀行理事	1928,11	原額20,000
榮宗敬	申新、福新、茂新公司	1935年中和商業儲蓄銀行董事	1931,4	原額500

姓 名	所 屬 主 要 工 廠	在 銀 行 地 位	銀 行 設 立 年 月	銀 行 資 本 額 (千 元)
榮鴻元	中新紡織公司總經理	1941年廣新商業銀行董事長	1941	總額1,000
朱佩珍	定海和舟山電燈公司	1915年中華商業銀行董事長	1912	1933年5,000
朱佩珍	定海和舟山電燈公司	1896年中國通商銀行總董	1896	1896年5,000千兩
叶澄衷	燧昌火柴廠	1896年中國通商銀行總董	1896	1896年5,000千兩
刘鴻生	大中華火柴公司	1931年中國企業銀行董事長	1931, 11	原額1,000
刘鴻生	大中華火柴公司	1935年中國國貨銀行監察	1928, 7	原額5,000
刘鴻生	大中華火柴公司	1921年中國煤業銀行發起人兼董事	1921	原額400
處洽卿	三北輪船公司機器廠	1941年中實銀行發起人	1941	原額3,000
傅筱庵	龍章造紙廠、上海內地自來水公司	1935年中國通商銀行常務董事	1896	1896年5,000千兩
傅筱庵	龍章造紙廠、上海內地自來水公司	1915年中華商業儲蓄銀行董事	1912	1933年5,000
孙多钰	阜丰面粉廠	1935年中華銀行董事長	1916, 11	原額1,020
叶鴻英	上海華商電氣公司申大面粉廠董事	1935年上海通和商業儲蓄銀行董事	1925, 春	原額500
叶鴻英	上海華商電氣公司申大面粉廠董事	1925年正大商業儲蓄銀行董事	1925	原額250
叶蔭三(叶鴻英之子)	上海精奇廠味中調味粉	1943年浙東興業銀行常務董事	1943, 1	原額10,000
叶蔭三(叶鴻英之子)	上海精奇廠味中調味粉	1935年大滬商業儲蓄銀行董事	1932, 11	1933年500
竺梅先	民丰和華丰造紙廠	1930年大滬商業儲蓄銀行董事長	1930, 9	原額500
金潤庠	民丰和華丰造紙廠	1935年大滬商業儲蓄銀行監察	1932, 11	1933年500
金潤庠	民丰和華丰造紙廠	1947年華威銀行董事	1942	原額5,000
金潤庠	民丰和華丰造紙廠	1947年光中銀行常務董事	1941	原額1,000
顏惠庆	江南水泥廠	1935年大陸銀行常務董事	1919, 4	原額2,000
章榮初	榮丰紗廠	1935年大滬商業儲蓄銀行監察	1932, 11	1933年500
章榮初	榮丰紗廠	1942年上海企業銀行董事	1942, 12	1943年5,000
章榮初	榮丰紗廠	1935年農商銀行董事	1921	1921年1,730
諸文綺	昌明染織廠	通華商業銀行董事長		

諸文綺	自明染織廠	1931年順東商業銀行董事	1931,7	原額500
諸文綺	自明染織廠	1923年浦海商業銀行董事	1923,1	原額100
施肇曾	閩北水電廠	1935年上海永亨銀行董事長	1918,1	1931年200
陈小蝶	家庭工業社	1935年上海綢業銀行董事	1931,2	原額500
許曉初	中法大藥房	1942年中國藥業銀行董事長	1942,11	原額5,000
鮑國昌	信誼化學制藥廠	1942年中國國藥業銀行董事	1942,11	原額5,000
鮑國昌	信誼化學制藥廠	1941年中實銀行監察	1941	原額3,000
冷泉榮	中國通用化學公司	1941年永泰銀行總經理	1941,3	原額700
禰之游	民丰紗廠	1947年亞洲銀行常務董事	1934	原額500
邵善修(霍爾康之子)	大明火柴廠	1947年恒利銀行董事長	1924	1933年750
黃奕佳	廈門電話電燈公司	1921年中南銀行董事長	1921,6	1924年2,500
黃奕佳	廈門電話電燈公司	1920年中興銀行董事	1920	原額5,765菲律賓幣
顧馨一	立大和申大面粉廠	1935年中華商業儲蓄銀行董事	1912	1933年5,000
穆藕初	豫丰和厚生紗廠	1921年中華勸工銀行董事	1921,10	1930年500
郭乐	永安紡織公司	1930年永安銀行董事長	1931	1934年2,200
郭順	永安紡織公司	1935年上海市興業信託航	1933,10	原額1,500
盧作孚	民生實業公司	1931年北碚農村銀行董事長	1928,10	1931年100
周志俊	信和紗廠	1935年青島市農工銀行董事	1933,1	原額100
周志俊	信和紗廠	1947年茂華銀行董事長	1941	原額1,200
夏粹芳	商務印書館	1934年上海信託公司董事	1930	原額200
項繩武	五洲大藥房	1947年中國企業銀行董事	1931,11	原額1,000
严裕榮	大隆機器鐵工廠	1935年武進商業銀行董事	1934,2	原額250
刘靖基	安達紡織廠	1936年中華勸工銀行董事	1934	原額250
周星棠	漢口第一紗廠	1935年漢口商業銀行董事	1934,11	原額842
周星棠	漢口第一紗廠	1934年中央信託公司董事	1921	1923年3,000
吳麟书	統益紗廠	1922年中華勸工銀行董事	1934	原額250
許冠群	新亞化學制藥廠	1943年新亞建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1943	原額5,000小儲券
丁裕泉	中國福新烟公司	1947年光華商業銀行總經理	1934,5	原額500
陆允升	正實絲廠	1947年中實銀行總經理	1941	原額3,000
苏汰余	裕華紗廠	1943年水利銀行董事長	1943	1947年100,000